

第一卷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谭天河 林正康

ISBN 7-218-05259-2



9 787218 052595 >

ISBN 7-218-05259-2/K · 1

全套六卷：315.00元

本 卷：4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 - 218 - 05259 - 2

I. 广… II. 广… III. ①文史资料 - 广东省②广东省 - 地方史 - 史料 - 民国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780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3.5
字 数	381 万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5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5259 - 2/K · 1012
定 价	315.00 元 (全六卷)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前 言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省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创建于1960年。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主席举行茶话会，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号召：“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正是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标志着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端。从此，全国各级政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近现代历史资料进行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开创了历史资料收集的一种新方式，开辟了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新领域。众多的当事人、见证者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作了客观的回忆和记述，生动、具体、翔实地展现了自戊戌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沧桑，其中凝聚着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整体说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感染力。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书刊面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社会各界读者的喜爱。

四十多年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存真求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坚持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

不求全面系统的投稿要求；坚持征集编辑大协作的工作方法。在各级政协历届领导的重视下，在政协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全国和地方政协共征集了40亿字的文史资料文稿，编辑出版了20多亿字的历史资料选辑和专题史料图书。我省各级政协也征集了4亿多字的历史资料，出版了1.6亿字的历史资料选集和各种类型史料图书，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我省三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8年5月，第九届政协伊始，针对全国政协尚有近3亿字库存文史资料文稿，李瑞环主席强调指出：“征集到文史资料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年轻一代更深刻地了解过去，珍惜现在，面向未来。”“建议你们近几年内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下大力量进行清理、挖掘和抢救。”1999年1月，他在接见出席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全体同志时又提出：“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同心协力，抓紧时间，争取在本届任期内，把已经征集到的资料都能够整理成册。尽快与世人见面。”库存文史资料是政协文史工作创办以来逐年积累下来的，主要形成于1959年至“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第五、六届政协期间。在浩繁的库存文稿中，有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会库存稿件也有2600多万字，质量参差不齐，编审工作费力费时，我们遵照李瑞环主席的指示，充分发挥政协文史工作部门的整体优势，统一部署，统筹规划，紧张有序地展开清理工作。我省有几十位政协文史工作者和特邀的专家学者以

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齐心协力，埋头苦干，夜以继日，精心筛选“淘金”，精心核对史实，精心编辑加工，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将这部 370 多万字的《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奉献给广大读者，奉献给社会。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主要从全国政协和我会库存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中选辑而成，也采用了部分市县政协以及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总工会等单位的少量存稿。其内容上起 1911 年辛亥革命，下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部综合性的史料集成，从不同侧面展示或折射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特别是广东这个中国近代史发祥地的历史发展中许多领域的具体情况，披露和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富有价值的史料。由于所收文稿限于库存范围，因此各专题的史料多寡不一，丰歉有别。这些文稿，或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史料，或填补了尚缺史料之空白，或匡正了有关史实，或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脉络和线索进行了梳理。鉴于史料提供者各自的经历不同，角度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记述，编选时采取“多说并存”的原则，对不同说法不强行划一，以供研究者参酌。为保存史料的真实和叙述的精练，对一些入选文稿作了订正和删节。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编排大体按照时事经纬的方法。以历史先后排序，按文稿内容分类，适当组合，逐项编目。全书分为：一、孙中山和第一次北伐·黄埔建军与东征·广州商团事变；二、护法运动和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五卅”运动与沙基惨案·北伐战争；三、省港大罢工·港澳华侨史料；四、辛亥革命与人物·广州起义·两广“六一”事变·广东抗日战争·民国时期广东经济·文教卫生·宗教；五、民国时期广东名人录·民国时期广东政情·民国时期广东民俗·灾害·广东解放和起

义；六、广东政海拾遗。共六个分卷。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问世是我省政协文史工作部门及有关部门开展大协作的成果，我会文史委员和史学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具体的审订工作。在此，我们向支持、参与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各协作单位和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库存资料选编数量多，工作难度较大，加以时间较为仓促，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4年8月5日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编辑委员会

顾 问：陈绍基 郭荣昌 周天鸿 杨 懂
主 任：邱金用 林亚杰
副 主 任：曾庆榴 邱 捷 陈忠烈 黄绍龙
委 员：丁身尊 王 杰 李吉奎 张宝锵 陈剑安
段云章 徐英焰 黄世展 谭天河

主 编：林亚杰
副 主 编：曾庆榴 邱 捷 陈忠烈 徐英焰
编 辑：龙瑞庭 陈 珊 曾德明 林正康 古流森
甘黎明

特约编辑：李森祥 官丽珍 陈志雄 李振武
责任编辑：谭天河 李达强

目 录

·孙中山和第一次北伐·

- | | |
|---------------------------|---------------|
| 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的生活 | 杨连合 (3) |
| 孙中山与医学 | 宋大仁 (7) |
| 孙中山在石岐开设中西药局 | 郑砺石 (18) |
| 辛亥前之革命宣传品 | 邓新夏 (20) |
| 参加广西辛亥革命和北伐的回忆 | 陈树庭 (22) |
| 1912年孙中山回粤返邑之盛况 | 黄季骞 (26) |
| 1914年谒见孙中山的回忆 | 黄梦熊 (28) |
| 反袁时期孙中山与黄兴的分合 | 田 桓 (30) |
| 孙中山和反袁华侨义勇团 | 秦竹斐 (33) |
| 孙中山卖车救同志 | 吴志新 (34) |
| 孙中山和东海十六沙自卫军 | 王慧民 (36) |
| 孙中山对甘肃革命的影响 | 张锦堂 (47) |
| 孙中山联俄的第一次使节 | 税西恒 (53) |
| 孙中山在川建立革命政权和有关联俄的见闻 | 唐昭明 (54) |
| 孙中山制止李安邦暗杀议长 | 冯 义 (69) |
| 回忆 1920年的孙中山先生 | 龚师曾 (72) |
| 关于孙中山灵活运用革命策略的忆述 | 金汉鼎 (76) |
|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办飞行学校的经过 | 胡汉贤 (80) |
| 孙中山派我创办强华飞行学校的回忆 | 胡汉贤 (85) |
| 孙中山对陆荣廷的争取和讨伐 | 潘乃德 (96) |
| 孙中山组织粤军援闽经过概况 | 杨启明 陈视斋 (116) |

孙中山先生组织护法政府的经过	沈太闲	(121)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部分议员政见的分歧	张少甫	(125)
孙中山在广州越秀区的活动与遗址	黄汉纲	(126)
潮州金山中学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回忆	张淑岱	(138)
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琐记	张叔俦	(140)
孙中山先生北伐随军记要	张铸铁 陆壮游	(145)
中山先生北伐改道前后军政点滴	梅放洲	(160)
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	李任仁	(180)
孙中山先生率领海军进攻陈炯明叛军	吴 迺	(186)
对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的回忆	李毓藩	(193)
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时二三事	郑砺石	(203)
孙中山派我策动飞行人员反陈炯明的经过	胡汉贤	(206)
陈炯明叛变后我奉中山先生之命赴越南工作经过	张 猛	(212)
孙中山蒙难后在上海筹款纪实	何 侠	(217)
奉孙中山命赴柳梧策动滇桂军讨陈经过	张 猛	(219)
孙中山先生肃平沈鸿英叛变的经过	林 祥	(226)
孙中山 1923 年春回粤前后	罗志铸 罗 平	(237)
1923 年冬孙中山先生在石龙、广州指挥作战	施惠之	(241)
关于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见闻	林丛郁	(243)
关于孙中山先生遗稿的一次意外发现	庞镜塘	(248)
孙中山先生保护广州回民坟场	杨绍权	(250)
孙中山 1924 年秋在韶关	吴宗泰	(258)
国民党东京总支部改组和欢迎孙中山	郭瘦真	(260)
1924 年孙中山经过日本神户时的情景	高仁绂	(263)
回忆孙中山北上及逝世前后	鹿钟麟	(268)
中山陵陵墓图征集展览时见闻	陈于德	(278)
西山碧云寺护灵琐记	马 湘	(280)

孙中山先生灵柩南运经过	田象奎 (283)
参加孙中山奉安典礼纪略	林 泽 (285)
拱卫中山陵的回忆	张 猛 (289)
戴季陶谈孙中山先生的事迹片断	陈强立 (294)
孙中山与复旦公学监督李登辉博士	陈于德 (298)
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和见闻	张 猛 (301)
追随孙中山革命见闻	黄梦熊 (319)
回忆孙中山二三事	潘乃德 (335)
难忘的教诲	朱仲华 (340)
孙中山的若干革命轶事	梁照林 (342)
关于孙中山的几点回忆	戴 岳 (346)
在新加坡成为“中山信徒”的回忆	张竞生 (350)
中山先生关于“系统”的一番话	张竞生 (354)
回忆孙中山先生几席话	叶菊生 (357)
关于孙中山先生二三事	韩 锋 (358)
我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片段回忆	姚雨平 (363)
孙中山先生轶事十则	罗翼群 (378)
我当孙中山警卫的一些回忆	何问渠 (387)
附：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	丁身尊 (390)

·黄埔建军与东征·

二次东征河婆战役的回忆	张性白 (397)
回忆东征时期周恩来在汕头	吴华胥 (403)
回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潮汕的革命活动	吴华胥 (410)
回忆周恩来追查廖案的片断	李 甫 (420)

第二次东征中的五华双头之战	符昭騫	(422)
参加东征的片断回忆	杨立	(426)
陈炯明军踞东江时惠州的给养	张友仁	(428)
1925—1927年我经办各税收机关之回忆	温福田	(430)
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	沈仲强 吴述彭	(434)
变卖广州市产、官产前后的财政情况鳞爪	吴述彭	(439)
港英政府扣留粤军兵船事件	张慕融	(444)
40年前在香港的一宗旧事回忆	温翀远	(447)
广州第一制弹厂	许万全	(449)
许济自传	许济	(460)
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	刘騫	(467)
讨伐杨刘广州之战亲历记	刘騫	(474)
有关黄埔军校的一些回忆	林志光	(480)
黄埔军校从创办到结束的回忆	卞稚珊	(488)
黄埔军校早期女杂工回忆黄埔军校	谢玉兰	(510)
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	魏治和	(512)
黄埔军校学员生活点滴	陈希孔	(516)
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经过情形	刘騫	(520)
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台籍黄埔军校学员 李友邦的一段经历	佚名	(526)

·广州商团事变·

1924年商团事变见闻	黎初日	(539)
广州商团叛变记实	邓警亚 唐璞园	(545)
顺德商团见闻	余照等	(558)
容桂商团始末	梁永	(567)

商团事变前后南海县官山商团的动态	陈天杰 (576)
我所知道的“香城商团”	郑砺石 (586)
新会城商团始末	麦炳琨 黄霄南 (590)
略谈莞城商团	聚 成 (609)
商团事变时石龙商团活动点滴	陈天杰 (616)
范石生与广州商团事件	万寿康 (622)

孙中山和第一次北伐



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的生活

杨连合*

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早年生活，特别是在檀香山这一段，传说不一。某些人说，孙中山先生幼年，曾跟随其兄长德彰在檀香山一间商店里学做生意。

1935年，我曾为此事问过一位在檀香山的老归侨陆华选先生，他是翠亨村人，是孙家的世好，而且又曾在德彰的畜牧场当过十多年的长工。陆华选先生向我谈了以下情况：

我初到檀香山做工时，孙中山先生已在正埠意奥兰尼书院读书了。曾听过中山的舅父杨文纳说：“中山初到檀香山，是农历四月，当地学校是秋季才开学，在入学前三个多月时间，他为了入学准备，就在畜牧场附近的一间私立商业学校补习英数，他进步得很快，日常惯用的英文，讲得很流利，加减乘除数字，算得很准确，诚出乎于其兄德彰意料之外，认为是可以造就，遂下决心，不惜任何困难，务使他入学，俾能成材，以光门户。在他未进入意奥兰尼书院前，德彰的脑海里，要选择一间具有教管兼备的学校，才肯使他入学，但畜牧场附近的学校，不够理想，若到正埠，将托谁人照料，颇费踌躇，最后决定，为便于入学，征求邓荫南的同意，按月给伙食费，寄宿在邓荫南开设的一间杂货店里，这时，德彰与邓荫南关系，还只是一般友谊。”

孙中山遂于是年9月，进入于店里附近的一间官立意奥兰尼

* 作者系孙中山外甥。

书院读书，课余时间，常主动帮店里干大小工作，不畏艰苦，有些店伴，向他开玩笑说：“老板用多少钱雇请你来这里做工？何苦要贴钱买难受。”但他却认为不然，回答说：“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愿闲坐这里等待吃饭。”这样他在店里一言一行，经过几个年头，都留给邓荫南良好印象。以后中山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邓荫南第一批参加为会员，捐款甚巨，和德彰齐名。

这间学校，完全是用英语授课的，同学中除少数是土生土长的原有华侨子弟外，尽是其他国籍的人。由于他聪明，勤学苦练，克服不少困难，我们很羡慕他。他对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怕志不坚。好像我们这畜牧场里，雇佣不少外籍人，他们初到场里，是不懂我们讲话的，大家工作一起，也感到有些不便，那么就要随处用心，为了生活需求，自然会学懂，即使一时学不好，逐渐也会学好。”我们听了，觉得很有意义，并不是俗人所说的一般话。

他在意奥兰尼学院读了三年书，在奥阿厚书院读了二年，不但各科成绩优良，每个学期，都获得书院奖品。1882年7月，中山先生以第一个华侨子弟获得夏威夷国王架刺鸠奖品。

有一传说，由国王架刺鸠、皇后奄麻、公主利奥架兰尼亲自到校主持颁奖。但陆华选说：是由主教牧师、代校长威利士亲自将国王奖品送到畜牧场中山的手里。这天德彰为此事万分高兴，设宴招待，我在这天，特别起劲，东奔西跑，一点不觉疲劳，中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辛苦了。”我只有微笑，好像同样光彩，整个畜牧场工友，引以为荣，皆大欢喜。

至于校外生活，如游泳、打球，他亦非常爱好，记得有一个夏天，他和十多个同学，在老师率领下，到海滩去游泳，这时，他还没有剪发，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他开始游泳时，习惯把辫子盘在头顶，有一位加拿大籍同学，有意捉弄他，游近他的身

边，动手解他的辫子，但给他摆脱了。随后这位同学忽然呼救，水深即遭灭顶，他不计前嫌，反身扑救，使这位同学得免于难。但回到校里，老师竟袒护这位加拿大籍的同学，指责中山顽皮闯祸，罚他立在耶稣像前，祈祷赦罪，他据理力争说：“难道救人一命，也犯罪吗？”这位老师也哑口无言。事后我们听了，嘲笑他笨蛋，有仇不报非君子，救人一命，反受其辱。他却反责我们说：“良心在哪里？有什么重大冤仇？见危不救，就不是正人君子。”^①

中山出身于农村，对我们的劳作，有深切的了解，常把我们疾苦意见反映，因此，惹起了场里师爷的妒忌，背里咒骂他倒掉德彰的米缸。自从他浸信了耶稣教，假期回到场里，向我们宣传，不要膜拜场里的关云长偶像，并阐述关云长的故事：“关云长只是三国的一位英雄人物，死后怎么能降福人间，又替人医治百病呢？有病的人，要请医生医治才对，富贵是从苦难得来的。”因此，更惹得场里师爷不满，经常向德彰离间他们兄弟的关系，捏造是非，诽谤他信奉异教，无父无君，扰乱场规，煽惑工人，不听指挥……甚至以辞职要挟，叫嚷有中山在场里，坚决不干。德彰几次动火，要殴打中山，幸亏中山的舅父杨文纳出头劝阻说：“昔日有个孟母，三迁其址，后来使孟子成了显圣，不是很好的教育方法吗？中山终日和洋人相处，读洋人书，接受洋人的教育，习染洋人风俗，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若遣他回国，多读一点圣贤书。”

这段时间，中山的母亲亦在畜牧场里，为解决他兄弟争端，背里对中山说：“你的年纪大了，回到唐山，也可以同样读书，只要你立志成大人。父亲在乡，同时亦可晨昏兼顾。”

^① 另一传说，是中山和几位同学，散步到海边，见一群小孩在堤岸嬉戏，其中有一位失足堕水，他立即跳入水中，把小童救上岸。

1884年中山回国，我肩挑行李送别，心里依依不舍，由于中山帮助我进步不小，好像失了良师。

(1963年)

孙中山与医学

宋大仁*

前 言

孙中山先生少年时，在檀香山。有一天，在教会职员兼翻译杜南山家，见他的书架上有医学书籍。孙问：你为什么要有它呢？杜答：范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就是这个道理。孙中山先生不同意他这种说法，他说我们读书不一定要做官，即使做官，未必马上能执大权，倘若一意追求作相，久不可期，然后为医，无论良医不可为，即使努力为之也晚了，我意一方面致力政治，一方面致力医术，以此为目标，对国家才有贡献。此段话是杜南山在南洋对邓慕韩讲的。可见孙先生对救国学医并行之志，早有所怀。孙先生是学医出身，他学医时期成绩怎样？行医时期，外科手术怎样？治绩怎样？对人民有过什么贡献？这都是中外人士所关心的，因为时间久远，文献不易搜集，淹没渐多，以前虽有少数人提及一鳞半爪，但未经详考，常有错误。我治医史三十多年，现将孙先生早年学医经过及行医情况，晚年患肝病经过，整理成文，未尽与错误的地方，尚望读者补充订正。

一、学医时期

1. 在广州博济医院医学班

广州博济医院（初名医局）是英美传道会于公元 1835 年所

* 作者系医史研究者。

创办，是中国和远东各国西医医院的始祖。广东省内海口、阳江等处最先兴办的医院，都是博济分设出去的。该院在 1844 年首次割治砂淋，1875 年始用伊打麻醉法，次年乃用哥罗方，1875 年首次施用剖腹治疗术，治疗各病，很有成绩。时有美籍嘉约翰医生（Dr, Glasgow John Kerr）到广州接任院长，1855 年于院内开办医学班，初时只收男生，1879 年兼收女生。当时的授课，只用口述笔记，跟着开始翻译医书。先后译著出版的有《全体新论》、《体用十章》、《化学摘要》、《内科全书》、《割症全书》、《眼科撮要》、《皮肤新编》、《花柳指迷》、《妇科精蕴》、《医科提要》、《儿科全书》、《中西病名》、《西药略释》、《卫生要旨》等 20 余种。在孙先生 20 岁时，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在路上遇着一个外国人，他便走上前，用英语和他攀谈。这个外国人，就是主持博济医院的嘉约翰医生。他听到这个中国青年很有志气，而且英语娴熟，可为院用，就劝他在医院习医，孙先生便进博济医科学习了，当时学费每年 20 元，住在院内哥利支堂十号宿舍，即今日的 48 号病房。

孙先生年少时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没事的时候，不言不笑，有事时，却议论滔滔，九流三教都能与他聊天，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粗茶淡饭，甘之如饴，这是他的特异性情。当他在博济学医时，在同学中物色反清志士，他与郑士良、尤列密结。相传有一段趣闻，先时，有个早已毕业的博济学生尤裕堂，在顺德县乡间行医，每年到广州购买西药数次，必到博济访问旧友。这天恰与他的族人尤列同行，住在登龙街某银号。晚饭后，想到博济一行，路经十三行果摊间，见有数人争吵。裕堂看了原来是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士良及邓景晖三人。事情是因为孙等想买荔枝回院同吃，而三人衣袋中都没有钱，便对卖果者说：“我们是博济的学生，请你明天来收钱便是。”卖果人不答应，因此引起了争论。尤裕堂身边有钱，代付了果钱，并批评了卖果的人，再买

了一些别种水果，果价总共不到半元，于是一同回到博济，畅叙所怀。此时又和杨襄甫、尹文楷、区凤墀等人交游，反清思想油然而生。

2. 在香港西医书院

孙先生在博济医科读了一年，闻知香港有英文医校的开设，便认为该校课程较优而比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于是就转学香港西医书院。

创设西医书院的是粤人何启，他早岁留学英伦，得医学士及大律师学位，为伦敦皇家外科专门学校律师，娶英贵族雅丽氏（Alice）为妻。归国后，任香港参政局议员。雅丽氏逝世，何博士就以妻的遗产，于香港荷李活道兴办医院，即以雅丽氏做院名。公元1887年1月，医院落成，何启与香港伦敦会中人为造就医学人才计，发起创办香港西医书院，招收中外学生入学，得代理港督剑美劳赞助，而在港王克私威廉爵士，亦以办理书院，列为要公，因得与医院同时成立，程度与一般大学医科相等，是五年制的医科专门学院。创办之初，康德黎医生和医生瞿尔玛共同办学，设有管理委员七人，医校是假借雅丽氏医院余房，分班上课，并以医院做实习医院，校长为康德黎兼外科主任，其他各科，均由有名医生担任，何启为医校开办人之一，兼授法医学。

博济附设之医科，全用中文教授，香港西医书院，全用英语教授，这两所医校都注重外科，两位校长均兼外科主任，因为当时西医外科，是中国人最所信仰的，孙先生得力于这两位医师者不少。孙先生在博济习医学了一年，医学已有根底，自比其他初来学生为优，加之记忆力之强与研究之专精，又非常人所企及。故康德黎博士曾经说过，投考本校各生，以孙逸仙君（孙先生学医时名逸仙）为第一人。当时来校投考的约有24人（一说32人）只有孙逸仙君使予最为注意。经过五年的时间，各科考试，

多列优等，获得数种学业上的荣誉，除为华生氏奖得奖人外，其他化学，简易外科学，及诊断学，三科名列第一，植物学、物理学及生理学名列第二，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 13 人，试官 8 人，及牧师书记官签字，由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手批，准其以内外科产科行医，是为香港第一张医照，于 1892 年 7 月 20 日颁发。与孙先生同时毕业的还有江英华，后来在南洋行医。

3. 学习成绩

孙先生于 1887 年 1 月（光绪十三年丁亥）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 年（光绪十八年壬辰）7 月毕业，以及考试成绩，有直接史料可为确切的证明，可据香港西医书院学员注册簿、专门考试成绩簿、考试成绩单、当地《南华邮报》剪稿等重要直接史料，更能明确了解。是项文件，原存香港大学最为名贵。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香港，香港大学郑文光多方设法护运脱险。孙先生所肄业之西医书院，于 1913 年归于香港大学，不复招生，自 1887 年开办至 1915 年结束，凡 29 年。因属于专门医科学院，且须配合医院实习，故历年入学学员共有 128 人，而毕业的仅有 51 人。所考学科，计有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法医学、公共卫生学、产科学、外科学与内科学等 11 科。解剖学复分普通解剖与骨学两类。

兹将孙先生考试成绩列述如下：

1888年各学科之专门考试成绩（应考者共13人）

姓名	植物学	化学	解剖学	生理学	药理学	病理学	临床诊察	统计最高数为700	平均百分比	名次
王约翰 John. Wong	90	78	86	74	91	93	78	590	82	1
江云万 Kong Wing Wan	62	78	85	81	71	78.5	65	520.5	75	2
孙逸仙 Sun Yat Sen	43	92	65	81.5	39	92.5	70	493	71	3
江英华 Kong Ying Wa	57	45	67	73.5	42	31	69	384.5	55	4
胡尔楷 W. L. Kai	剥	落	50	62.5	9	29	65	剥落	59	5

(五名以下成绩从略)

1889年各专门考试成绩（应考者9人）

姓名	解剖学	生理学	试次	等别	名次
孙逸仙 Sun Yat Sen	80	85	第二试	优等	1
江英华 Kong Ying Wa	80	80	第二试	优等	2
王约翰 John Wong	70	70	第二试	及格	3
胡尔楷 W. L. Kai	55	80	第一试	及格	4
关景良 Kuan King Liang	60	69	解剖第一试 生理第二试	及格	5

(五名以下从略)

1891年7月法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及实用初级
外科专门考试成绩(应考者5人)

姓名	法医学			公共卫生			实用 初级 外科	平均 分数	等 别	名 次
	笔 试	口 试	合 计 百 分 比	笔 试	口 试	合 计 百 分 比				
孙逸仙 Sun Yat Sen	66	32.5	98.5 82.5P.C	86	30	116 77P.C	90	83	优 等	1
江英华 Kong Ying Wa	70	32.5	102.5	88	18	106 70.6P.C	90	81.6	优 等	2
关景良 Kuan King Liang	63	31	94 78.5P.C	75	18	93 62P.C	60	61	及 格	3
刘四福 Law Sze Fuk	62	27	29 74.5P.C	61	15	76 50.6P.C	60	61	及 格	4
胡尔楷 W.L. Kai	48	26	74 61.5P.C	74	15	89 59.3P.C	50	56	及 格	5

1892年7月产科、外科及医学专门考试成绩(应考者4人)

姓名	产 科			外 科			医 学				平 均 数	等 次	名 次
	笔 试	口 试	合 计 百 分 比	笔 试		合 计 百 分 比	笔 试			合 计 百 分 比			
孙逸仙	80	80	160 80P.C	62	80	142 71P.C	85	60	60	205 68P.C	73	及 格	1
江英华	68	50	118 59P.C	80	80	160 80P.C	50	80	60	190 63P.C	67	及 格	2
刘四福	58	40	98 49P.C	57	70	127 63P.C	60	35	40	135 45P.C	52	不 及 格	3
关景良	47	40	87 43.5P.C	60	70	130 65P.C	30	25	50	105 35P.C		不 及 格	4

由此可知，该书院首届学院之第五年考试，能得及格以上成绩者，仅孙先生与江英华两人而已。

继之即为毕业时（1892年7月）统考成绩，孙先生各科成绩均属优等获第一名。与孙先生同时毕业者，只江英华一人。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7月23日举行毕业典礼，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亲任主席，首由汤姆生秘书报告：“在康德黎博士未颁发学员毕业执照前，特为征求港督允诺，对优等学生8人颁发奖品。”受奖名单中，有：

医科：孙逸仙 奖给丹那氏与美阿都氏合著：《婴孩与儿童之病症》。

产科：孙逸仙 奖给纽曼氏著：《外科肾症》。

（其他名单从略）

奖品颁发后，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演说，即颁发孙先生与江英华二人成绩优异的毕业执照；内载中英文词句大致相同。唯英文方面则增加“并由书院当局授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及外科等硕士之学位称号”一语。执照副本“一予孙逸仙，一予江英华”字样，由书院保存。执照的签署，除掌院与教务长、教师外，有审查委员、考试委员。

看此直接史料，证明了孙先生确是毕业于1892年7月，而且考试成绩优等，名列第一。

以上内容可见于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

二、行医时期

1. 在澳门行医

澳门原属香山（今名中山）县，与孙先生故乡翠亨，陆路相连，与广州香港水路轮船往来不绝。当孙先生在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门的绅士曹子基、何穗田等家人久病不愈，

延孙先生诊治，一药便愈，惊为神奇。及孙先生毕业后，曹、何和港绅陈赓虞，协助孙先生在澳门开设中西药房，开业行医，凡是贫困的人，完全送诊，不取分文报酬，因之就诊的都很感激。澳门的镜湖医院，是中国人所设，一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人，后也破除旧例，聘请孙先生到该院使用西医西药治病，孙先生慨然担任义务工作，不受薪金，于是中外人士，请其诊治，莫不着手成春，称为国手。

孙先生最精的为割症和助产科，助产器具是在香港考取医照，为英政府所颁给。割症更具有渊源，他前后学医于广州及香港，前者院长是美人嘉约翰，后者教育长为英人康德黎，均是权威的外科医师。他经多年研究与实习，手术之精，在中国人中一时无两。在镜湖医院初试手术，割了一个石淋，大如鸡蛋，重一两七钱多，当时大家诧为罕见。

孙先生在澳门施行手术时，其师康德黎博士数次前往参与其事，助其施行手术，并力赞其诊断的明确，手术的熟练而敏捷。因此，在澳门行医不到数月，求他医病的，一天比一天多，不但国人非常信仰，即葡人也多前来就诊，却为葡籍医生所妒忌，因孙先生没有葡国行医执照，便控准澳葡政府，勒令停业，于是只好转到广州开业。

2. 在广州行医

孙先生结束澳门中西药局之后，来到广州开业，于双门底圣教书楼，再设东西药房于冼基，每日10时至12时赠诊，出外诊金随意致送，若难产服毒等急症，不论贫富，一邀急至。他不但医术精良，品德更加慈祥而廉洁，因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多知孙逸仙医生之名。他把所得诊金与药费，多充作交结衙门、会党之用。

东西药房的司理是孙先生的博济同学庞文卿，所往来的如同

学廖德山、梁乾初等，这时都同情革命事业。后来药房经济入不敷出，而革命工作繁忙，孙先生无暇兼及医务，于是停歇药房，与尤列、陆皓东、周昭岳、程耀宸等，发起农学会，借双门底王家祠做会址。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前数日，有人向两广总督谭钟麟告密。谭以孙先生是有名的医生，且是教会中人，恐生交涉，主张慎重处理。怎知叛党朱蕤生将孙告密，事机尽泄，清吏即向农学会捕去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槐、刘次、梁荣等六人，随后孙先生亦设法离开广州。

3. 其他医学事迹

(1) 孙先生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曾向镜湖医院药局借到本银二千大圆，立有“揭本生息赠药单”一纸。

(2) 1903年孙先生在檀香山，曾替来访求医的人诊治，险症如杨鯤池酒醉脱阳，杨畅文妻谭氏脱阴四次，陈大茂长女产后奄奄待毙，孙先生替他们疗治，不收诊费，皆得治愈。

(3) 二次革命后，孙先生寄居日本东京，胃病复发，服药按摩，均未见效，后因服芥菜，病有起色，乃连吃芥菜佐膳数月，病得治愈。

(4) 梁重良医生是孙先生西医书院的先后同学，1911年到上海行医，孙先生与黄兴联名特写介绍启事。

(5) 1923年孙先生介绍日本高野太吉翁医生，说高野发明的胃肠人工蠕动法，名为“抵抗疗法”，谈到他自己胃病，延翁诊治，依其法而行，躯体渐次康复，因翁来至上海，开设治疗院，特为介绍给外国人。

(6) 孙先生于饮食卫生学说，很有研究，认为人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不为过量的饮食，即是养生第一要诀。其文见于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第一章。

(7) 罗鉴龙询问医事函，孙先生批答，对其所著子女唯心法

稿一书，不拟写序，交秘书处作复。

三、医学著述、遗物及摄影

1. 著述

孙先生的医学著述，有手译《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伦敦赤十字会总医生柯士宾原著），为1897年所译，有丙午十月章炳麟序。是书内分六章：（1）形体功用；（2）论血脉；（3）受伤上编；（4）受伤下编；（5）移病各论；（6）妇人待病法及附录裹扎须知问题。

2. 医具用具遗物

（1）开业时期所用时计（金面刻有西文孙逸仙名字，闻为檀香山友人所赠）。

（2）割症剪刀一把，为陈粹芬女士所藏。

（3）澳门业医时所用之滤水器一具，为“四大寇”之一老同志杨鹤龄所藏，后归广州市博物馆。

（4）澳门葡人飞南第氏与孙先生最稔，孙先生所有嵌瓷圆桌一、四头吊灯一、花罩吊灯二、绿瓷花瓶二、锦瓷茶杯八、白瓷糖盅一、大瓦鸚鵡一、手术用刀针剪钳14件，英文百科全书12册及医书等，均移赠飞氏，并寄存中西药局招牌，及飞氏去世，闻上列遗物，由氏之夫人保存。

（5）牙医李星泉，曾购得孙先生医局停办时之剩余药品数瓶，1929年陈列于西湖博览会，后因战乱，闻已遗失。

（6）闻檀香山某老药房尚存孙先生所开的经验药方多纸。

（7）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藏有若干件孙先生用过的医疗用具。

3. 文物史迹摄影，予藏有22种，其中有极为难得的，兹将

名称录下：

- (1)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与同学合影。孙中山学医时期摄影。
- (2) 孙氏学医时期的博济医院摄影。
- (3) 博济医院哥利支堂 10 号宿舍摄影。
- (4)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博士摄影。
- (5) 孙氏博济同学郑士良烈士遗像及处方摄影。
- (6) 香港西医书院院长康德黎博士摄影。
- (7) 香港西医书院注册簿（1887）摄影。
- (8) 香港西医书院各考核分数单（1887—1892）摄影。
- (9) 香港西医成绩簿（1892）摄影。
- (10)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文凭（1892 年度报告 23 日所发英文本抄件，附中文译件）摄影。
- (11)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文凭（有英文注明副本字样）摄影。
- (12) 香港西医学院毕业与同学合影。
（前排：刘四福、孙逸仙、关景良、江英华）
（后排：陈夔石、黄泽民、黄怡益、王以诺、王九泉）
- (13) 学医时课本书面有孙逸仙签名摄影。
- (14) 揭本生息赠药单摄影。（在澳门借款办中西药局）
- (15) 澳门行医结束时赠葡友飞南第氏的医具及用具 43 件全部摄影。
- (16) 镜湖医院欢迎孙中山先生摄影。
- (17) 孙先生在广州行医时，病家鸣谢广告三则摄影。
- (18) 孙译《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书摄影。
- (19) 孙译《赤十字会救伤法》孙中山自序摄影。
- (20) 孙氏 1896 年手书生传摄影。
- (21) 孙氏家族 1924 年在天津侍病摄影。
- (22) 北京铁狮子胡同病室摄影。

本文蒙陆丹林先生校正，附此志谢。

孙中山在石岐开设中西药局

郑砺石*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7月，中山先生以第一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即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卖药兼治内外全科。翌年迁往广州洗基开业，易名为东西药局。次年又在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西门口（今孙文西路东段）开设一间小规模药局，也叫中西药局，和邻乡南荫人程北海合伙。这间药局，只系贩卖中药的膏丹丸散和中山先生所自制的成药，没有医治病人的设备。大概中山先生在石岐开设这间药局，含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中山先生对乡人的爱护，因为当时最普通的西药，在石岐未有出卖，人们不知西药特效治疗的妙处。中山先生既存心造福社会，故特将自制的发冷丸、癣癩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成药向县人介绍，成药外面都贴有“孙逸仙医士监制”的字样（作者在少年时见过不少）。第二是中山先生当时常常往来于广州和翠亨之间，经过石岐也要住宿一夜，翌日凌晨乘肩舆返乡，路程有28公里（现时公路计算，前时当更远），直到傍晚才到。这时，石岐没有客舍旅馆，投宿极不方便，中山先生开设这间中西药局，或者是利用它为中道的居停。

1895年中山先生于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即迁居日本，同时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中山先生。石岐中西药局的司理人程北海，恐怕累及自己，星夜把中山先生的成药的招牌纸尽数揭去，不使留存。从此以后，中山先生至民元解除南京临时大总统职后，才再到石岐一次，而中西药房已改由程氏经营。至解放前依

* 作者系孙中山同乡和早年同志。

然存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程北海的儿子程大元，工于心计，把进口著名的西药囤积居奇，后来西药来源断绝，竟然获利几十倍，光复后他还把这间中西药局大大扩张起来。在铺面的店前，建筑一个牌栈，写着平方三尺“国父手创”四个大字，以广招徕，其实药局原有的资金，老早就被他们吞没了。

(1961年)

辛亥前之革命宣传品

邓新夏*

我年十八时（庚戌），尚在广州府中学堂求学。其时堂内有教师数人是同盟会会员，如高剑父、高奇峰、李壮吾等，是由日本归国者。其时革命是在绝对秘密中进行。高剑父是一兼负主盟责任之人。我是他介绍加盟的，加盟时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失信矢忠，同心协力；如有违反，任众处罚”八句。我加盟之后，嘱我担任宣传工作，时常将宣传品输入堂内，分给同学，摆在堂中的一角，任人取阅。其时学堂之监督（即校长）丘逢甲，同情革命（他曾是前清割让台湾与日本时，台湾自主之副总统），对于此等宣传品之输入堂内，伪为不知也。我犹忆宣传品中，有数张语气甚壮，文云：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而况我神明华胄，匍匐于犬羊之下，生长于水深火热之中。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黄汉遗裔，奕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表。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夷，曾不介意，遂因缘祸乱，强割我土地，奴役我人民者二百三十有一年。残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彝，四野有豺狼之叹。群雌嘻嘻，羌无远虑。遂开门揖盗，弃裂土疆，曾不少吝。是非特逆胡之死罪，亦我汉族之奇羞也。我幕府统摄机宜，恭行天罚。惟是义师所指，或未达悉。致畏之徒，妄生讨乱。幕府因特为文以告国人曰：在昔弯弓而斗，蜂目鸩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远越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以令吾民输粟忝金，豢其丑类。

* 作者系同盟会会员，当时在广州府中学求学。

途更无状，卧榻之侧，鼾声四起。鱼馁肉败，腥秽遍耸。宁赠友邦，毋遗家奴。瓜分之祸，近在眉睫。万劫不复，噬脐莫挽……用是幕府为军中之要约曰：惟尔虏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即知运会，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惟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知运会，宜怀本根。思其远祖，无抗义师，认贼作父。幕府并励国民同伸复仇大志……以三千毛瑟高飘义侠之旗，持十万横磨，平扫腥膻之国。钟撞自由，旗张独立。鸡鸣起舞，尽驱牛鬼蛇神。狮睡已醒，行见世界大千。此亦邦人君子之所有事，甚愿与我父老昆弟共图之者也。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又反正后，同盟会公开时，设置在东堤官煤局，支部则在司后街（即今之越华路），其门联云：“同兴与汉族，盟誓灭胡夷。”

（1966年）

参加广西辛亥革命和北伐的回忆

陈树庭*

我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即 1903 年）时 18 岁，到南宁府进行道考中，当上秀才。自此一科之后，清廷废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当时风气渐开，我的父亲渭川公，以我读书根底尚浅，命我往桂林求学，争取进步。我遂于 1906 年离开家门，前往桂林转入速成师范学堂就学。但该堂是私立的，只招收学生一班 60 人，一年后毕业，蔡锷时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兼任该校监督，堂内教职员皆留日学生，为东京中国同盟会派回广西联络革命的同志，多湖南籍，如邹代藩任历史教员，上课由法国革命讲起，暗中宣传革命，播下革命种子。在庆祝清朝九年预备立宪游行时，对内不唱庆祝歌，而唱哀祖国，为带队的所制止。诸如此类，学堂内充满了革命空气，该堂实为同盟会的秘密机构。我受到熏陶，决心参加革命，于 1906 年经教员邹代藩、堂长曾广式的介绍，在学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进入了革命行列。1907 年毕业后，蔡锷特考送我入保定清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事。1909 年冬，在第一期第二班毕业，咨回广西委派工作。经上海时，我与同学黄华新、莫献深三人将头发剃光（以前是留辫发的），以示革命决心。在街上遇见监督曲同丰（我们的一班后他已不做监督，奉命调去云南当陆军第 38 协协统），随后他就到我们住的旅馆泰安栈来看我们，说：“你们都把辫发剪去，不方便吧。赶快买个假辫戴上。”及回到桂林，蔡锷亦已调去云南当陆军第三协协统，当年教员同志均已他去。但桂林方面暗中有了同盟会支部组织，我

* 作者原名陈建猷，当时系广西辛亥革命和北伐的参加者。

即加入工作。

广西巡抚张鸣岐派我任广西陆军混成工兵营排长，时孙中山先生因镇南关（现改为友谊关）起义失败，住在南洋新加坡，命朱执信和李登同，回广东活动，组织民军，配合会党，并以黄兴为总指挥，准备广州发难，拟定先占领广州为根据地，再图北进的计划。方声涛，曾醒等从香港到桂林联络，原定四月初一，广州、桂林同时举义，使清廷不能应付。

桂林的中国同盟会支部附设在福棠街二号南风报社内（该报社以赵正平为主笔，梁史为经理，月出一册）。当时耿毅任支部长，同时派刘建藩任广西陆军混成协分部长，杨明远任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分部长（以上各员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梁史任陆军小学堂分部长（幼年同学同乡），蒙经为咨议局分部长，其余如法政、师范各学堂亦暗中散布有了同样组织，形成了革命组织总支部，并派廖轰到混成协炮兵营，派陈锦松到我工兵营，充当士兵深入联络。当时桂林革命党人为了准备响应广州起义，加紧准备枪械，但因陆军小学有枪无弹，遂由骑、工、辎各营抽出子弹 3000 发，以便接济。2 月中旬，分部长、骑兵营长刘建藩命我负责将子弹运送到陆军小学交梁史为攻城用，我便设法骑蒙古马运输（当时广西共有 2000 余匹，这是在混成协筹备期间，派刘建藩同刘洪基到口外采购的，当时每匹价值京秤白银 40 两，由陆路运回广西，备训练干部学堂学生和混成协成立骑、炮、辎营之用），在马鞍后边的两个皮包，各装上 500 发，分三次运完。头一次，经将军桥被边防营哨兵注意，险被检查，幸得无事，及到了陆军小学，我便将马带入堂内，以免惹人再注意，这个任务给我完成了。及得到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的消息，时桂吏亦甚见疑，加紧防范，并时加注意我们的行动，桂林方面乃不得不暂时隐伏以待时机。

直到 10 月中旬传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桂林革命党人又

准备响应，听候命令，准备厮杀。至11月7日，巡抚沈炳堃，藩司王芝祥，知事情闹大了，为势所逼，同意继各省之后，宣布独立。当时同志们以广西既经独立，就应出兵援鄂，以振起革命声势。否则，万一武汉有失，便会牵动全局，革命事业又遭挫折，遂决议组织援鄂军，迅速出师。议决以广西陆军混成协为主力，全部改编出发，推赵恒惕为统带，冷遁为帮统，耿毅为参谋长；并组学生军一队，以赵正平为队长，梁史为副队长，随军行动。时我任工兵营队官（连长）。编组既成，于11月30日誓师，向湖南出发，到了长沙，编成湘桂联军，担任侧击汉口之任务，由水路东下。我军于1912年1月19日，在金口镇渡江，即由蒲潭经蔡甸，向东山开进。敌人震惊，乘夜向武胜关方向撤退，我军遂占领孝感。我队驻在车站前方的最前线，当时情景犹在目也。

武昌起义后，清廷惊惶失措，乃起用袁世凯为国务总理大臣，以应付当前形势。袁世凯当时掌握了北洋军队实力（北洋陆军四镇是当年袁经手成立训练的），本欲以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势力，但各省独立日多，革命势力已成，惟恐不可收拾，且湘桂军队已进到汉阳，袁不得不假和议之名，以缓和时局，因此提出停战，北京派唐绍仪，南京派伍廷芳为代表在上海谈判。

在南北和谈期间，我们奉调到南京卫戍首都。王芝祥已借名北伐离开广西，率巡防营六大队随我们之后，经武汉，到南京。中央任王为北伐军第三军军长，耿毅任参谋长。及南北和议签定后，前南京陆军第九镇奉命改编，部分江西官兵，被袁利用，借名闹饷，在三牌楼焚毁掳掠，我军奉令平息，南京人心即时镇定下来。陆军部将广西军改编为陆军第八师，邕龙标编为陆军步兵第十五旅，我援鄂步兵编为第十六旅骑炮团及工兵营。任我为陆军第八师工兵营营附，营长为吴和宣，开驻丁家桥劝业场，开始编补训练。巡防营六大队则回广西解散。

在我军到达南京后数日，广西同志周毅夫即到南京接头运动，以当时战事既定，主张援鄂的部队和邕龙标开回广西以铲除陆荣廷（沈炳堃、王芝祥离广西后陆即接任广西都督）旧派势力，建立真正的革命阵地，在南京牌楼戏院开广西同乡大会征求意见。我在当时认为广西军留守南京，是既定的计划，恐未能要求变更的；如果陆有不稳行动再行回师，未为不可，目前似不应过于操切，以免激成变故。我不主张调回广西的主张，得到当时多数的同意，却未得到当时领导的许可。

此事为黄克强获悉，次日即在召集初级以上军官训话，大意说武汉战役的经过，并将广西军改编为中央军陆军第八师的编组计划理由说明，散会后我们援鄂军同盟会员的军官同志十余人，请耿毅要求黄兴陆军部长带领我们谒见大总统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对同盟会员原本重视，而我们又是援鄂军骨干，故于次晨即在大礼堂接见训话，大意以革命军事初步结束，此后任务还是繁重的。我们同人应一心一德，服从命令，贯彻始终，以尽革命军人天职等语。训话完毕后，我们即各回驻所。此事是我毕生的光荣。

1913年我继任营长，讨袁之役守南京城时，担任守幕府山和狮子山炮台，兼守卫南京各国领事馆（各国领事馆一向归我营负责守卫）。后程德全、黄克强先后离开南京，第八师团长以上军官亦相继离去，我师遂成为无统帅的部队。当时守城的为第八师，并江苏的陆军第一师，兵力既单，防线又长，在冯国璋、张勋两支大军围攻下力量悬殊，经血战两旬，至9月1日，弹尽粮绝，南京沦陷，我们无一屈膝投降。

（1966年）

1912年孙中山回粤返邑之盛况

黄季騫*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4月间由南京至广东时，备受全粤各界人士的欢迎，开粤省空前未有的欢迎大会，尤其是孙一行于5月下旬回到故里（时称香山县，今中山县）时所开的欢迎大会盛况，更是人山人海，个个都欲一见孙先生的丰采。是时系以东门学宫为会场，张灯结彩，牌楼四处，高贴长联。中山先生在县政府休憩后，即偕同英文秘书宋霭龄暨香山县县长林寿图等到欢迎会。首先由香山县全体欢迎会向先生宣读欢迎词。该欢迎词乃邑人李应庚孝廉所撰。词云：“昔汉高祖定天下还过沛，共故人子弟置酒为乐，后世多艳称之。然以帝王之尊，挟衣锦还乡之见，势分睽隔，往往文至而情不生。今我中山先生固推翻政府者，又辞大总统而不为者。其对于民族皆视若平等，况香山为钓游之区，香山之人皆若布衣昆弟之好者乎？窃维先生提倡革命奔走三十年，其志可谓坚矣，合五族为民国，不期月而成，其绩可谓伟矣！功成身退，推贤让能，其节可谓高矣！奇行卓绝，震于殊俗，乃自视夷然，且引为分内事。在里人亦知固先生分内事也，莫敢再以浮词进，请进而述所以欢迎之意可乎。今夫黄祸之说，腾播于近年间。大抵中外政法不同，感情自隔。莽莽五大洲，悠悠廿世纪，所谓和平之会，弭兵之旨，大同之盛，非有大英雄孰与胜任之。先生生平定域中，周知四国，宏愿毅力，万国具瞻。意者中外一家，天留此以待先生乎？此全球之宜欢迎者一也。抑

* 作者系同盟会会员，当时情况的目击者。

又闻之先生素持三大主义，今者民族、民权目的达矣，至民生之组织千绪万端，扩之则驾美凌欧，违之则土崩瓦解。民国甫定，图始尤贵图终，微先生谁与归！此全国之宜欢迎者二也。岭海之间，向称富庶，军兴以后，外强中干，负担重而民力殫，杼轴空而怨咨作，‘虽则如毁，父母孔迓’，来苏之望惟在先生。此吾粤之宜欢迎者三也。若夫香山尤与先生有特别之感情焉。生甫及申，山川生色，宗族交游，引为光宠。曩者蕞尔一邑，首先反正，为全粤倡，虽不敢自以为功，抑亦体先生之志者也。轩车莅止，先生其有思乎。思夫民气嚣浮，何以静之？军纪紊乱，何以肃之？财政艰窘，何以裕之？实业衰微，何以振而兴之；教育衰败，何以修而正之？亦群盗满山，何以削而平之？哀鸿遍野，何以劳之来之？此先生分内事，即里人不知，先生必引为分内事也。故统帅万方，不足为先生贵；名满天下，不足为先生荣；轶巢、许，迈夷、齐，不足为先生异。而惟安民国于苞桑，登民生于衽席，使共和政体传之无穷，千秋万岁后，巍巍铜像，与拿破仑、华盛顿比烈而争光，是皆先生最初之志愿，最后之事功，最难缓之责任。而区区欢迎之意，以为祭香默祝之者此也。若徒云崇拜伟人，敬恭桑梓，犹是循歌风击筑之故事焉，则亦浅之乎视先生矣。谨贡刍言，以当芹献，维先生俯而鉴之。里人之幸，抑不独里人之幸也。香山全体欢迎会谨上。”

(1962年)

1914年谒见孙中山的回忆

黄梦熊*

1912年，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后回广东，在此期间我曾一度瞻仰大革命家的威仪。1914年间，随李海云晋谒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寓邸。我想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必不容易亲近的，心殊不安。见后，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很温和地命我们坐下，李海云给我介绍毕，孙中山先生问我在中国学了什么。我答：学陆军。问我几时加入同盟会。我答：赵先生任广东陆军小学监督时加入。问我：几时来东京？我答：随胡汉民、朱执信二位先生来，已有年余。问我在东京打算做什么事。我答：学习日、英文，准备考帝国大学。问我：加入中华革命党未？我答：尚未，将请胡汉民先生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曰：辛亥革命成功迅速，党人志得意满，对我所倡导之民权、民生主义，不曰理论太高，即曰“言之非艰，行之为难”。一经失败，即志气颓丧，不曰革命不可能，即曰须待十年后，把从前的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弄致一蹶不振。我取消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为的是要正本清源。把有志气，愿吃苦的同志，集合起来，重新革命。革命能不能，在我人肯干不肯干，古人谓愚公移山，明告我们能吃苦就能成功。我答：然。凡人能有志气，有决心，无论什么事，都有成功的一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中山先生曰：袁世凯与美政府进行美元大借款，准备建立帝制，摧毁共和。我说：袁氏借款成功，对我人革命，大有阻碍。孙中山先生曰：无妨，决不会成功。我问：美政府与袁氏进行借款，条件正在磋商

* 作者曾任孙中山副官。

中，为何不可以成功？孙中山先生曰：美国国会不同意借款即不能成。美国是民主国，国会有一权监督政府。我问：能使美国国会不同意么？孙中山先生曰：能。美国国会议员中，我有旧友在，又是国会的权威分子。我将打电话给他，请他在国会提议阻止。谈至此，宋霭龄女士来，我等遂辞出。我与孙中山先生是初晤，孙中山先生谈吐，至诚恳切，不杂丝毫客气，态度雍容肃穆，如与至亲爱的人座谈。

邓荫南，檀香山华侨，孙中山先生老友。某次，孙中山先生乘车出总统府，途次，邓荫南呼孙中山先生名，举手令停车。孙中山先生即命停车，下车问他何事，同他乘车返总统府。我在总统府代表接见华侨。孙中山先生告我：华侨文化低，出言粗鄙，要平心静气接见。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必须反复说明，不能解答的，用纸笔记录来给我看，以便约他们来谈。孙中山先生接见华侨，用平易的词句，雍和的态度，反复解答。从未见他表现烦躁的情绪，凌厉的颜色。

(1965年)

反袁时期孙中山与黄兴的分合

田 桓*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组织兴中会。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上，规定其任务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904年2月15日，黄兴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也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与会的有刘揆一、宋教仁、杨笃生、陈天华、刘道一、谭人凤等500人。在这两个会中间的一段时期里，各地所建立的会、社、团、舍、馆、所、室之类，名称繁多，不胜枚举，而其领导的核心，则为兴中会和华兴会。

1905年7月，中山先生赴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两人畅谈革命形势，极为契合，主张将兴中会和华兴会合而为一，以便壮大革命力量。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随后他们同心同德，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前赴后继的斗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

然而，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和黄兴产生了分歧。逃亡日本后，双方分歧更加扩大。1913年年底和翌年春，正当中华革命党酝酿期间，黄兴也在东京。但陈其美在筹备工作中，事事不与黄兴商量，个人独断独行，形成了一个宗派，上有胡汉民、张继、居正、许崇智、戴传贤、谢持等人的支持，下有15兄弟

* 作者系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员、中国国民党党员，曾任孙中山随从秘书。

(一说 13 兄弟) 的拥护，他们是方剑飞、王介藩、俞奋、宁武、李元箸、杨虎、丁士杰、石子奇、曾孟启、张宗海等人。

1914 年 7 月 8 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先生宣誓加盟，就任总理职务。入盟誓约由我的哥哥田桐以小楷书写，用道林纸石印。《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规定入党要有党员一人或两人介绍，由党的上级人员主盟，宣誓后还要在《誓约》上打手印。克强先生对此表示不满：（一）认为党员只能服从大众，不能服从个人，所以不赞成“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语；（二）反对打手印，因为犯罪的人才打手印，我们入党何必如此呢？

其实，上面所述只是克强先生反对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对陈其美、胡汉民的独揽大权。仅以《誓约》来说，他们事先没有向黄兴商量过，黄兴因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田桐既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又为克强先生的至交，一再在两人之间从事斡旋。早在 1901 年，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求学时，即与田桐相识，并以宣传革命相砥砺。不久，黄兴走日本，越一年，田亦去日本，两人朝夕过从，称为莫逆。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为都督，黄兴为总司令，田桐以秘书长的名义参赞军机，两人交谊之深，更不言而喻了。中华革命党酝酿成立，田桐建议在《誓约》问题上稍事修改；在人事安排上，仍按同盟会的办法，孙为总理，黄为协理。中山先生对人选无异议，但对《誓约》表示不能更改。至于陈其美、胡汉民之辈，更不肯丝毫让步，他们早已想把克强先生排斥于门外了。

当时，支持黄兴的大有人在，曹亚伯即为其中之一。他原来住在民国社内，民国社即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的所在地。该部部长为居正，居正看到曹亚伯支持黄兴，就叫他即日搬出民国社，曹不答应，居正就命令仆人将他的行李丢出门外。后来日本警察前来干涉，经了解情况后，代曹亚伯将行李搬至附近的旅舍。

白逾桓和杨时杰都是湖北省人，也支持克强先生，时常到民国社与居正吵架。一天，白逾桓被居正和夏重民、丁景良诸人打倒在“他他米”（日语，即草席）上，狂喊救命：“居正要打死人了。”这时，白逾桓小便急，居正不许他到厕所，便溺在他他米上。结果，许多人把白拖出门外。还有向海潜，在黄申芴的指使下，也到民国社来吵闹。虽然其势汹汹，但究竟民国社的人多，他不敢动手，悻悻而去。支持黄兴的还有李烈钧、周震鳞等十余人。

黄兴见到事态日益恶化，决定买船票至旧金山，以息争端。临行前夕，他为了顾全大局，邀请中山先生小酌，以志话别，便致函田桐，文曰：“梓琴（按田桐的号）兄鉴：弟将远适，特于明日（27日）午刻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不谈国事），乞届时驾临寄寓，藉慰离绪。此颂大安，弟兴启，6月26日。”从信中可以看出黄兴颇有情绪。他于1914年6月29日由东京动身赴美。孙黄两人分道扬镳，此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大损失也。

不过，中山先生对于黄兴还是很谅解的。5月29日，他曾经致函黄兴，指出“二次革命”的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所以坚持今后要做真党魁，庶几事权统一。对于黄兴之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不苛求，因为各人主张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

黄兴旅居美国期间，在华侨中继续作反袁宣传，护国战争爆发后，孙中山与黄兴又恢复了联系，共同致力讨袁。黄兴在国外为国内的反袁军积极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黄兴到上海，与中山先生来往密切。1916年10月31日，克强先生病逝于上海福开森路393号寓所，时年42岁。孙先生亲自视殓，主持丧事，并发函给国内外各党部告哀，函中说：“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察之。”翌年黄兴归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1984年）

孙中山和反袁华侨义勇团

秦竹斐*

1915年间，当时居正、许崇智奉孙中山命在山东潍县、高密、密县一带举义讨袁，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居正任总司令，许崇智任参谋长，吴大洲任山东军总司令。孙中山在日本策划接济，同时通电南北美洲和南洋群岛各党部，饬令他们积极筹款接济东北军；并电召旅美国、加拿大各埠华侨归国效力。当时华侨同志第一批归国效力的有周子骥、周炳文、周燮猷、李杰三、陈思球、秦竹斐、高汉堃、杨星辉、方有志、李赤、关宝华等十多人，第二批有黄惠龙、马湘、吴择理、蔡鹤明、张爱熊、周抚泰、缪卓荣、萧桂荣、梁捷、李全板、陈添全、郭伦、李鉴禅、李梦锂、杨月山、李藻、谭伟楼、谭泰垣、方七运、黄吴甘等一百余人，途经日本，赶赴青岛转入山东潍县地区成立华侨义勇团，夏重民任团长，伍公赤任副团长，直辖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总司令指挥。是时，东北军正在准备进攻济南府，忽接到袁世凯死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消息，遂途中停止战斗。

时孙中山先生已由日本回国，寓在上海租界环龙路重新策划。当时派居正和胡汉民北上见黎元洪，商改编中华革命军，和保存华侨义勇团当总统侍卫事，不料被总理段祺瑞阻挠，不允收编，并派遣陆军参议曲同丰前来遣散革命军。遣散后，为国效力的同志便再回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嘉勉备至，然后一部分再渡重洋前往美洲和加拿大，大部分华侨则仍留上海等候，审时察变，再为国效力。

(1962年)

* 作者当时系华侨义勇团团员。

孙中山卖车救同志

吴志新*

泾县胡朴安是近代朴学大师，国民党元老。最近我和他的孙女婿、任职上海南汇教师进修学校的汪尚棣先生谈到朴老，他告诉我一件很值得写出的史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等逃至日本，朴安先生与一批国民党报人寄寓上海租界，生活极度困难。更严重的是，《中华民报》总经理邓孟硕因刊发讨袁文章，遭到袁氏党徒的迫害，被租界当局逮捕入狱。当时聘请外国律师（租界法庭蛮横，不允中国律师出庭）费用特贵，加上罚金 1000 元。总计需耗用 2000 元，其时陈其美尚在沪，送来 500 元。朴安先生探知中山先生有一辆汽车托王宠惠（字亮畴，民初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寄存某处，即与王宠惠商量把汽车售出以救同志，王则坚持必须有中山先生亲笔信才可售出。两相言谈不洽，朴安先生难抑愤怒，以一介书生，竟至拍桌打凳，王亦毫不相让，冷然下逐客令。朴安先生无奈，怏怏归，然一腔怒气实难平息，即将此事告知汪子实，汪亦颇感不平。适周星瞻去日本，于是朴安先生即与汪先生合书一信，由周带给中山先生，大意谓：此间同志性命，系于先生汽车之上，未知肯割爱否？不久即得中山先生回书，大意谓：欣然同意，亮畴亦吾党忠实同志，乞勿误会。于是把汽车卖去，得 2000 元，把罚金缴纳，律师费付清，使邓孟硕于监禁六个月获释后重归革命阵营。这件事，胡朴安是毫不客气

* 作者系安徽省马鞍山市十七中学教师。

地要求，中山先生是毫不拖延地慨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党人的亲密无间、襟怀坦诚。

(1986年)

孙中山和东海十六沙自卫军

王慧民*

一、香山县东海十六沙和顺德县大良护沙局

香山东海十六沙是面临珠江三角洲入海的西岸一片广袤无涯的农作地区，西江上流带来肥沃的泥沙淤积而成为这大片的沙田。因土壤、水源、气候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使它成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高产地。论理，辛苦经营的农民，应该自享其所得的果实。但是，在解放以前，这里的农民虽然终年胼手胝足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得褴褛破烂，经常乞怜于高利贷者，卖儿卖女，度着半生半死的悲惨生活。

东海十六沙地区和顺德的沙田毗连，而十六沙的田地大半是属于顺德的地主阶级所有，尤其是属于顺德大良以龙、罗两姓为首的封建地主集团所有。这个封建集团，具有武装——大良护沙局，作为维持其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

东海十六沙在香山，为何归顺德的地主集团所有，且有顺德地主的护沙局？这是由于顺德地主封建势力，从百年以来显著地强大，龙元禧、罗惇衍等在清廷的北京做了大官，许多中小地主也有政治地位（功名、官位）；并由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小农作经济急促地崩溃，虽以珠江三角洲的富饶，农民也日趋破产，因而地主阶级的兼并也加紧，这样，不但顺德的沙田尽为这个集团所有，毗连的中山沙田也被蚕食。

护沙局于咸丰年间在龙、罗势力鼎盛时代设立，借口保护业

* 作者系当事人王光庭之子，根据其父之忆述写成。

权维持“沙所”治安为名，实则靠着武力以镇压农民的反抗。

护沙局的所作所为，主要有：

(1) 每亩征收三角的保护费，使农民增加经济负担。

(2) 护沙局根据地主的控诉，追索佃农、耕户的欠租，甚至拘捕农民，扣留局内，至缴纳贿赂，始行释放。

(3) 护沙局时常巧立名目，额外征收费用。

(4) 护沙局霸占公产，如鸭埠、禾虫埠等，指使私人以低价承包，朋比分肥。

(5) 新生子沙，若干年后便应照熟地升科纳税，而护沙局则瞒报，但照旧收正附税捐，尽入私囊。

(6) 护沙局勾通当地流氓、痞棍，开设赌档，包庇分肥，陷害农民。

(7) 护沙局名为护沙，而实际是纵匪。每当上下造时，局收保护费，而匪亦收保护费。局的保护费名曰“红票”，匪的名曰“黑票”。局收多少保护费，匪亦照收多少保护费。局对匪徒勒索农民，熟视无睹，护沙局变了护匪局。

(8) 护沙局为地主阶级服务，更令封建地主如虎添翼，常毫无理由，任意加租或取消租约，千方百计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稍与抗争，则控诉于护沙局，逮捕此农民。

以上不过就记忆所及随手录出数条，实则它加害于农民的罪恶，万不止此。据当时内行的人说，归护沙局收费的香顺沙田约50万亩左右。每年保护费收入，就有30万元之巨。然而远不止此，他们每年从沙田上括去的钱（连保护费在内）约100万至150万元左右。这都是农民血汗，而都被封建地主集团抢走了。

护沙的部队，名为两营，实额不过三四百人，食额是统领的外快收入之一。局中正项开支很少，但是馈赠、干修、饮宴的费用，大得惊人。局中无日不有宴席，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宴席照例是翅席。干修则视人的地位高低和与局的关系深浅

而定。多的一二百元，少的二三十元。馈赠是贿赂，数目就不一致了。

人们会问，护沙局既然是块肥肉，为什么香山的封建地主不会争来自办？过去双方曾有过争执，相持不下，但敌不过顺德封建地主集团的势力，后来顺德地主集团在表面上让步，名曰“香顺护沙局”，而局址则设在顺德县城大良镇，也给对方一些好处。横竖所争的是“钱”，“钱”既到了手就没得说话了。至于农民，原是双方砧板上的“鱼肉”，更谈不上抗争护沙的事情了。

二、十六沙的农民组织自卫军反抗护沙局

农民尤其痛恨护沙局。在军阀统治时期，封建地主和军阀勾结，对农民镇压，农民只得忍气吞声，压下怒火。及至孙中山南下组府，领导西南人民讨伐北洋军阀，农民虽然不曾理解到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是什么，但是十分清楚，孙中山既是革命党的领袖，当然能够解除他们自身的痛苦，因此助长他们反抗的念头。

十六沙中牛角沙是比较大的沙，沙里有个农民区培曾读过蒙馆，时常阅报，有点文化，为人冷静、机智、勇敢、能干。因所耕田地不够养活家口，他到各沙给人们带蚕茧到容奇（蚕丝原料的集散地）茧市出卖，而取得一些佣钱，以此为副业；这样走遍十六沙，人面既熟，各沙的经济情况也深刻了解。因为他对经手钱银丝毫不苟，一点嗜好没有，因而取得农民的信任。日子长远，连各地的黑帮、堂口也都熟识。由于他的机警，常能巧于避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和损失。

那时欧战方酣，蚕丝滞销，丝厂多半停工，茧价、桑价随着下跌。十六沙农民有不少是种桑养蚕的，原料跌价，当然影响农民的收入，收入既越来越少，租税便无法交纳，或延期交纳。当时，每亩所纳的正附税捐已达二元以上，虽说是主佃各半分担，但地主常用尽方法，全数或大部转嫁于农民身上。

农民交不出保护费和租税，当然触犯了护沙局和地主，他们拘捕了许多农民，引起层出不穷的纠纷，导致双方冲突的导火线是在牛角沙一个农民被局派来的沙勇拘捕，惹起农民和勇丁的斗殴。被殴伤的勇丁扬言将起大队来报复，农民答说：“欢迎你来吃莲子羹。”就是若果来犯，当以子弹招待。

农民们集合起来商讨对策，区培因业务关系，目睹这些纠纷是普遍存在的，便倡议联合各沙对付护沙局，而得到大家同意。经过各沙大会多次的聚谈，一致认为由自己组织护沙队，自筹自护，征收税捐，缴解给政府是抵制护沙局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同时推出数人来进行。其中之一是牛角沙的区培，另一个是大拗沙的黄盘，其余的人记忆不起姓名，黄盘也是地道的农民。

区、黄两人不知怎样着手进行工作，便找王光庭商量，他们都是基督教教会的教友。

王光庭是在顺德桂洲开业的医生。他原籍罗定，幼年家境贫寒，为衣食辗转奔走各地，曾到香港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执役，王韬见他勤勉聪慧，怜其少年失学，教他读书识字，鼓励他上进。孙中山在1894年间组织兴中会和外围的农学会。他加入农学会为会员。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未几，他进博济医学校学医，毕业后，在顺德桂洲开业。他执业医疗并不赚钱，对贫苦病者赠医施药，常步行数十里为农民治病和助产，分文无所得，也悉心为之治疗，因此很得农民敬重。他利用余暇，开办阅书报社、简易识字班、文娱剧团等，热心于群众福利事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加入同盟会，因此，他俨然成为一方进步势力的重心。

王光庭告诉大家要办的几件事：

(1) 团结一致和护沙局分家，但暂且避免正面冲突，以免工作发生阻力。

(2) 先向省政府请愿，不准，再向省议会、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等请愿。我看孙中山一定肯给农民支援助力的。

(3) 未进行各事之前，须认真调查护沙局设立的来源、历史，彻底清查他们的积弊，提出确凿证据，结合当前分家自办作合理论证，才易于博得人们的同情。

事情大致依照这样进行。十六沙内部的联络和准备工作由区、黄和各代表等负责。草拟方案、计划和省议会、非常国会、军政府等各机关的接洽联系由王光庭进行。调查护沙局的积弊则委托一个开布店的杨逸亭办理。

请愿书分头向各方面投递。同时，王光庭对省议会议长谢已原说：“十六沙筹办自筹自护，原是民兵之一种，办之有效，可推广至西海十沙，并可以全省推行。以之守境，绰有余裕，进而加以训练，亦可以裕兵源。至于清算沙田积弊，短期难于实现。但是民兵多一些地盘，即土豪劣绅少一些地盘，也即是筹款之路较宽一些。今宜全力巩固十六沙，以为明日推行于各沙的示范，实亦自治之初步，也可以造成民党的根据地。目前大举北伐，而桂系横梗，与我为仇，现在香、顺、两阳、四邑一带，桂系尚未占据，宜从速招募民军，屯驻各地，一以树军府声威，次可以裕饷足兵，此为目前要举，当与大元帅言云。”后遂有香顺联军纵队之设。

十六沙农民自筹自护的请愿，得到谢已原的积极支持，他在大良教会任职时，对护沙局的黑幕知之甚审，而对十六沙农民之被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均曾目击。通过非常国会王正廷的合作，两人的热心和努力，虽有一些阻力，终得进言于孙中山而获得批准立案。孙中山对此极其注意，批令改称“十六沙自卫军”，并令廖仲恺负责处理自卫军的事。另一方面，则委派其侄孙振兴为香顺联军纵队司令，朱卓文为联军第一支队司令，招集部伍，在香山起义，并催促孙振兴从速前往顺德，组织第二支队。

三、十六沙农民自卫军成立和发展情况

自卫军于1917年底冬间得到批准立案，直至1918年春间才告成立。它的编制、组织、人选均由大本营核定并受大本营的指挥、监督。它的名称是“大本营直辖香山县十六沙自卫军”。是从县的系统一变而成大本营的系统，可知孙中山对于农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利益，是十分重视的。自卫军的编制组织，略述如下：

(1) 自卫军暂编一大队，必要时再由大本营核准扩充。大队等于营，大队辖三中队；中队等于连，中队辖三小队；小队等于排。大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中、小队各设中、小队长一人。

(2) 大队正副队长由十六沙群众公选，呈请大本营委任。中、小队长由大队正副队长从各沙选派后呈请大本营核准备案。

(3) 自卫军成员，一律发给伙食费毫洋8元，但大队正副队长，中、小队长，得酌给津贴，数目由各沙公议决定。熟烟由公家发给。

(4) 自卫军成员，按照各沙人数，决定派出名额，并自行配备枪支子弹入伍。入伍成员的素质、品格及过去历史，各沙须严格保证。

(5) 队本部设征收、会计、书记各一人，待遇与自卫军各成员同。征收沙捐（每亩三角）、捕费（即保护费，每亩六角）及各项税费事宜，除经大本营核定的部队的经费留备用外，余数应立即缴解大本营。

各沙推选区培为大队长，黄盘为副队长，其余中小队长及入伍人员均经选派齐全，遂告成立。群众认为牛角沙地点适中，且乡众较多，枪支配备都较各沙为好，遂盖搭大棚厂一座，以为队本部及会议办公之用。当日自卫军成立典礼和成员就职同时举行，大本营派来高级人员和常驻指导人员等十余人参加典礼。十

六沙可以抽空来的人也赶来占一席。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自筹自卫是破天荒的事，踊跃参加庆典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却被一个可疑的陌生人闯入，这个自称为省政府派来的李贤，因不服从纠察的劝导出场，反而拔枪威胁群众，恶言辱骂，在热情高涨的群众愤激之下，这个奸细被人们拉出去枪毙。虽然检查他的尸身，发现他是省政府的侦缉员，但人们指出他是护沙局的奸细。由此可见他们怎样的仇恨护沙局。

自卫军成立后，分配防务，征收税捐，分头进行，同时肃清烟赌，以清除潜在的内奸。前后共雇了六条小火轮船，担任巡逻，并负责运输及方便农民运载茧桑等到容奇贩卖。农民歌颂孙中山，认识到他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没有大本营的支援，自卫军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自卫军从三月起便陆续征收保护费和税捐。那时，县区和乡村既没有任何银行可以存放税款，而所收全是毫洋，保管不易，故收存相当数目，即用小轮押运上缴大本营。到了上忙时，收款既多，缴款也更频繁，大本营派有常驻联络员——副官陈铁伍驻在王光庭家里，居间联络，协助解款。

那时，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专责管理自卫军的事。一次，陈铁伍、王光庭、区培等缴解巨款到大本营，廖仲恺亲自接见，很为高兴，并兴奋地说：“你们办事都很认真，对革命很有贡献，你们跟我在这里办事好不好哩？”这是对王光庭说的。他答说：“现在我们已经替大元帅办事了，我们各有职业，反正我们都尽了党员应尽的责任，为地方服务，并不是为个人着想的。”廖仲恺很赞赏他这番话。

四、封建地主集团的反扑和自卫军的自行解散

自卫军的成立和香顺联军纵队的设立，原是一件事，但是相辅相成有密切关系的。设立香顺联军纵队的军事目的，是企图占

领空白的香顺两县，扫荡反动势力。大本营对全省民军，本有全盘计划。招抚民军方面，委任邓跃为两广招抚使，办事处设在东堤八旗会馆，已开始活动。邓跃是老民党，在香港政府任侦探长多年，香顺联军方面曾与他有过联系。大本营曾派出干部多人前往顺德桂洲驻在王光庭家里。现在有姓名可稽的，计：陈铁伍、陈子刚、关业汉、余鼎中、陈复初、黄根、谢英、梁大公、梁某某等。同时，由各方面介绍而来的民军领导人及代表等十余人（姓名多秘而不宣）先后齐集，也住在王光庭家里，由他招待食宿。

大家议定：

(1) 香顺联军纵队第二支队成立两营。由各方面代表召集。召集一营人数，枪支自备，军队成立后，由大本营正式委任。

(2) 军队在指定地点集合前，先发给开拔费及伙食费若干。

(3) 支队司令人选，由孙振兴到后决定（当时假定为陈铁伍）。

(4) 军需由余鼎中担任，并负责筹款（当时召集民军有一惯例，就是由主要负责人先垫一笔款项，余鼎中是美洲的华侨，他自告奋勇，愿意垫款）。

(5) 军事行动与一支队配合，同时并举，袭取香山和顺德。

但各方面的民军代表不愿意到广州，坚持必须最高当事人当面接洽条件。这可溯源于1912年陈炯明以武力解散辛亥起义的民军，和捕杀他们的首领一事，以后，他们对国民党即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愿意来广州是可以理解的。而区培等，因自卫军成立日子浅，未经训练，一时不能将之投入战斗，亦不能向各沙筹款接济以加重农民负担，这都是曾向大本营事先陈明的。所以两事各自兴办。但自5月以来，军政府与桂系的矛盾与时俱增，时局的演变，日益险恶，香顺联军纵队的成立未能争取时间。孙振兴先于1917年11月20日于黄埔乘差轮到广州公干，误入海军警

戒线，水兵发枪射击，孙出船头制止，致堕水死。后来，朱卓文以少数部队占据香山起义，旋为桂系部队扑灭，朱逃澳门。这些噩耗传来，在众人心中投下一个暗影，急推陈铁伍到大本营请示。各方面的民军代表以事已中变，不能久候，均陆续散去，而余鼎中则托辞到广州筹款一去不返。

反动的顺德地主集团和护沙局对十六沙自卫军视如眼中钉，无日不思拔掉为快，但以自卫军为大本营委办的一个正式机构，且名正言顺和顺德护沙局划清界限，各自为政，无懈可击。护沙局是替地主阶级服务的，既然自卫军成为护沙局的眼中钉，那封建地主集团的头子，自然不会置之不理。如龙建章、龙殷官之流和在广州文澜书院的邓华熙等老顽固，他们表面上是不问世事，但幕后却在操纵着的。他们不但痛恨自卫军，还痛恨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进步分子。他们斥孙中山为“孙大炮”。他们加紧勾结桂系广东都督莫荣新，向他贿赂，并污蔑自卫军是土匪，现受孙中山的指示拟攻取顺德。因此莫荣新对香顺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省议会议长谢已原，坚决拒绝开赌之议，联同民党评论员，实行否决。桂系决意以武力解决谢已原，两次派部队搜捕谢之住宅，谢幸逃逸得免。谢无法行使职权遂辞职走檀香山。

桂系最后一着为联同各反动分子作大联合，改组军政府，设总裁制，推前清老官僚岑春煊为主席，与北洋军阀妥协，以逼走孙中山。情势既然如此，孙中山知护法之无望，遂通电辞职离粤。

顺德封建地主集团，前以碍于军政府之存在，不敢对自卫军进行迫害。1918年7月后，情势大变，他们认为回来的时机成熟，便将护沙局的护沙统领一职让出，请莫荣新委人和派部队前来顺德解决自卫军。莫见这块肥肉送到口来，如何不答应。也认为自卫军虽属星星之火，终非扑灭不可，遂委任自己的儿子桂军第一旅旅长莫正聪兼任大良护沙局护沙统领，率领该旅第一团团

孙中山对甘肃革命的影响

张锦堂*

民国初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大部分国民党议员成了驱逐的对象，甘肃议员也都仓皇星散。到1917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又在广东聚集，重新召集部分参众两院议员恢复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孙先生被推任大元帅，进行护法运动。有些甘肃议员便联袂投奔到广州去，其中以曾任甘肃国民党党魁的周文山（之翰）为最活跃。周文山在民国六七年曾于广州被选为众议院副议长。

孙中山对当时甘肃局势，很为重视，不时召见周文山有所咨询，因而对甘肃情况有一定程度的明了。他认为在边远省份进行革命活动比内地可能性更大，而配合政治工作，鼓励或者设法掌握地方武装力量，是一个必需的步骤。当时由大元帅府决定，根据甘肃军事实际情况，成立三个军，每一个军设置参议一名。这个参议实质上是搞党务工作的。这三个军是：第一军军长马安良，参议蔡大愚（回族，四川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第二军军长焦桐琴（在张广建部队里任军官），参议赵学普；第三军军长陆洪涛，参议张锦堂。各人的委任状于1917年由孙中山签署从广东发出，命一个甘肃人叫张德安的带回甘肃，相机分送。

这些委任状是不是送到各人手里，不得而知。我那时正在省外，我是没有收到的。不过焦桐琴、赵学普等在建右军发动军事暴动枪杀刘忠盖一事，实际上正是与广东方面联系受孙中山指使

* 作者当时系甘肃革命党人。

一致认为护法政府既已失败，孙中山亦离粤赴沪，凡能给与自卫军支援及同情的人，如谢已原等均已离粤，自卫军势单力薄，难与反动势力抗拒，应自动对内宣布结束。若是反动派再向十六沙用武力压迫，则应厚集群力，拿起枪支重与周旋。随后区培等分头向各沙报告，解释结束的理由，群众俱无异议。自卫军自成立迄于解散为时仅得7个月，然陈铁伍和若干干部直留至是年年底，看准十六沙已无任何变化，才回广州。区培、黄盘等依然从事农业生产，自由往来，无人敢与留难。经过这一次军事组织之后，土匪和护沙局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横行无忌了。

孙中山屡念农民的艰苦朴素，可为革命效力，在1920年欲再度收复广东以为革命根据地。令驻闽粤军回师攻粤，复打算结合全省民军及农民起义，揭起反对桂系的旗帜，里应外合，广东光复之举成效当速，于是派朱执信前赴广东办理。朱不幸在虎门被害，但十六沙农民自卫的印象犹深刻留在孙中山的意念中。王光庭知其事，因陈汉光兄弟（与李易标同为防城人）的介绍说李易标以脱离桂系响应粤军占取香山顺德宣布独立，王光庭当劝说十六沙农民出兵拥护以相助，李善其言而不能行。

1924年国民党改组，奉行三大政策，王光庭仍竭力协助十六沙成立农民协会。廖仲恺虽于百忙中犹抽空躬至十六沙宣传三大政策对农民解放的关系，以及农民协会的利益。

(1979年)

长李易标驰赴顺德。

自卫军接到情报，认为即将面临一个迫切战斗的问题，即召集主要人物商讨对付方法。敌我的对比既如此悬殊，很难作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有人主张将兵力开到陈头石壁（在陈村附近，是广州到顺德河道最窄的一段）河面两岸埋伏，伺他的运船通过时，集中火力，聚而歼之。众以为条件不够，且亦冒险，更不知对方是否通过这里。最后，大家认为来到再说，同时加紧戒备。

8月，李易标一团人开到顺德容奇，数日并无动静，人们渐将警惕放下。突然，他的部队开始抓人，将桂洲人周太庵和住在他家里的原大本营派来的干部和民军代表（不是中顺联军纵队的系统内）八九人一并捕去，星夜逮解广州，不经任何法定审判，即押赴五层楼下枪决。接着一个晚上，用小轮拖运两艘大船的士兵，潜开至牛角沙附近登陆，袭击自卫军。自卫军即行放枪抵抗，然而对方携有机枪，猛烈扫射。自卫军分散，各沙兵力不能集中，子弹也缺乏，且战且走，退至村中桑林隘路处抵抗。而敌方却不追击。只包围空无一人的棚厂——队本部进入搜索，掠走一些现金和财物后，举火将棚厂付之一炬，散队归船而去。自卫军也不追击。

此后，李团无何动作，再没抓人，也没有给王光庭的医务所任何麻烦。后来了解到李易标和莫荣新父子有很大的矛盾。莫荣新生性鄙吝，视钱如命，对部下官兵不但不加爱惜，且向他们身上刮削。他的儿子莫正聪比乃父更为庸劣，贪财好色（在护沙局统领任内纳姬妾至16人之多），父子之间还是斤斤计较，甚至乃父亦鄙其为人，卒至父子决裂，此是后话。素称能战的李易标，有这样庸昏无能的顶头上司在上，当然心内不满。这次莫氏父子以护沙局之故而获至巨款，更因莫正聪坐享肥缺之得而丝毫未曾沾润及于部下，因此军中怨声载道，莫肯为之尽力。

事后，自卫军负责人区培、黄盘等和王光庭、陈铁伍商议，

的结果。临洮事变失败后，师仲武（世昌）脱险来到北京，与我会晤，相对不胜唏嘘。因甘肃当局行文通缉甚急，他不便公然住会馆，怕太张扬，只得在东城张完夫家藏匿。我每天去找他们，我们三人每晚便在斗室内密谈一切。在旅京同乡中，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还有杜汉三。他正在直军第九师魏宗瀚部当骑兵连连长，在永定门外南苑驻防。有一天我和师仲武、张完夫同往访谈，杜对我们深表同情，款待我们以酒饭；并表示如有需要他之处，情愿竭力以赴。谈到师仲武的安全问题，杜汉三说：“通缉令我早见过，那是狗屁，谁管他呢。你们如果住城里不放心，就索性搬到我这里来，我这里多少有几杆枪，敢保证你们安全无事。”师仲武说：“我这次从甘肃远道而来，并不是专为避难，我们还要做些事情，继续干些革命事业，才能对得起死难的朋友。我打算不久到广东去一趟，听说周文山在孙中山先生那边很能说话，我想找他领见一下孙先生，问一问甘肃的事今后怎样办才好哩。”那天晚上从南苑回来已经是夜静更深，路过郊区一个苇子坑，师仲武忽然趴在坑边又哭又说：“湘臣啊湘臣！好久没有好好地把你哭一场。今夜在这个荒郊里，是个好机会。我们大家同声一哭吧。”接着就放声大哭起来了，我们情不自禁的也痛哭了一场。直到午夜以后才逡巡返城。

师仲武决定南下。我们给他借凑了几十元路费，俾得成行。听说我和张完夫的名字也在通缉之列，可是我们一直在北京居住，似乎没像师仲武那样明显，但不能过于高枕无忧。张完夫家眷住北京，移动不便，我是个单身汉，行动比较自如，就于1918年春，离开北京到了上海。

数月后，师仲武又从广州返沪。据他说，在广州已由周文山介绍谒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甘肃事特别关心，告诉我们不要气馁，要再接再厉地往下干。孙先生特为甘肃拨了110万元军用券，以作继续开展活动的费用。因军用券在内地的兑换率尚不明

了，特来上海打听一下。当时打听到河北省的议员张继为了在河北省开展活动，曾领到广东军用券 200 万元，都以每元 5 角的价格卖给日本商人。因此，就推我专程到广州去领此款。我到广州，见了财政部长廖仲恺，允先拨 10 万元，我领了这 10 万元军用券又回到上海。

回上海与日本商人接洽兑换，彼竟故意贬值，每元只出一二角。我们不肯，迟疑不决，以至后来该券无人收要，竟成废纸。此券始终存旅沪的甘肃同乡会长王逊吾处。王回甘时将此券带到兰州。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传闻有收兑军用券的消息，我曾追问，始知王已把它当作废物糊了墙壁了。

1918 年 5 月，孙中山先生因与桂系军阀发生纠葛，回到上海。稍后师仲武也随之而来，我经师介绍，于 1918 年 5 月谒见孙先生于莫利哀路 11 号，孙先生身穿夏布大褂，态度非常和蔼。对我说：“仲武常谈到张同志对革命很热情。甘肃的事主要是要甘肃的同志共同努力，能协助的地方我们当然义不容辞。”谈话中，孙先生问到甘肃的周子高、杜少川情况，我告以周现在四川熊克武处，杜仍在广东。孙先生说：“熊目前和我们搞不到一块，可叫周子高离开，杜少川请兵援陕甘一事，我早就给唐继尧去信，叫他赶快设法派出军队，据闻已经派叶荃（滇军第八军军长）带着一部分军队从四川北上，可能现在已经到达陕甘地区了。”提到临洮事变失败事，孙先生很为痛心，特为革命烈士赵湘臣亲笔写了“为国流血”四个大字的题词，以作表彰。（原笔迹后来仍存张完夫处）

这时北方军阀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有点缓和，我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又离沪来到北京，相机活动。当年秋季，我与汪剑平等以旅京甘肃同乡会名义发电鼓动甘肃各镇军变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在甘肃的统治，因而被捕，羁押四个多月。孙先生曾由沪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把我们释放。

我出狱后，北京无法久留，就又到了上海。首先到孙中山先生处，表示对孙先生拍电营救的感激，同时也多少表示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日孙先生对我说：“我们革命党人都应该以革命当作我们的终身职业。一直干下去，不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止。”这次在座的还有穿和服的孙先生的副官长黄大伟（子荫），孙先生转向黄说：“可以领张同志同他们几个人谈一谈。”所谓他们几个人，指的是胡汉民、戴传贤、谢惠生等人，他们住在环龙路63号。我因黄的介绍，也去过一两次，主要谈了些甘肃的情况，他们也都表示关心。

孙先生的客厅里，原来铺的一张很精致的栽绒地毯，这次不见了。我和黄大伟谈话时提问一下，黄说：“孙先生本来不喜欢在屋里讲究陈设的。那块地毯是一个南洋华侨赠送的，孙先生只得收了。前月谭平山的母亲去世，丧葬费很困难，孙先生叫我们把那块地毯取下抵押了二百元作奠仪了。”孙先生克己为人的事迹，其实不止这一件。1920年夏天，汪剑平也来上海，他央我介绍去见孙先生。会见时，孙先生照例殷勤接待。汪在高谈阔论之余，微露告贷枯尽之意。适那天我因有集体约会，就先告辞出来。他们谈话详情，未能尽悉。不过事后听孙先生对人说过，“有的同志一见面就说生活困难，没花消了向我借钱，你想我哪里有许多钱，我也是靠华侨汇款维持的，现在我的负债真不少哩！”这些话不知指的是谁。听说广西省有个叫张伯林的也是常到孙先生那里打秋风的。

在甘肃经过好几次事件，张广建坐不下去了，终于在1921年倒台了。我们认为这是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初步胜利。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他的军队基本上是在甘肃土生土长的。因此，我们对陆洪涛寄托以不少的希望。孙中山先生当时就派师仲武回甘肃进行活动，并给陆洪涛亲写了介绍信。也给马少翰写了一封介绍信。依孙先生之意，打倒北洋军阀是当时主要目标。按照甘肃

的实际情况，在策略上也不妨回汉协力进行，可能收效更大。师仲武返甘肃后，因孙先生之介绍，陆深表欢迎，即委任为督军署总参议。日常咨询军政事务。

当时国内总的形势，由于北方军阀混战，连年不休，直皖、奉直战后，老牌北洋势力逐渐消沉，新兴军阀遂有发起所谓“庐山国事会议”之举，企图在盈虚消长的演变中各分到一杯羹。各省都派有代表来参加此项会议。在甘肃方面，可能是由陆洪涛与师仲武商量决定，派我为甘肃省的出席代表，按规定要到汉口去报到。我向孙先生禀辞后即离沪赴汉。在汉口等候多日，不见动静，旅居好几个月后，忽接到张绍曾（北京政府陆军部总长）之弟张绍程的信。说：国事会议已决定不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已有十人现在已来北京，因其兄张绍曾不久将组阁，这些代表们将都有前途。并叫我即日到北京来。我到北京不多日，果然张绍曾当上了国务院总理，我也接到一个国务院额外秘书的委任状，批准月薪一百元。就这样定居下来荏苒一年多，自己感到无职无权，非常寂寞。

在甘肃方面，听说督军陆洪涛和省长林锡光摩擦很大，陆派陈能怡、魏鸿发二人专程来京活动，旨在排林自兼省长。此事后来居然如愿以偿。我这时以为如果返回甘肃可能尚有所作为，打算同陈魏二人一同回省。无如此时忽接师仲武的信，大意是陆洪涛头脑陈旧，不易转变，其所作所为与我们的宗旨完全不合，工作简直无法做下去，劝我不必来甘，他不久也要离开兰州了。因此我就打消了回甘的意图。直到张绍曾倒阁，孙宝琦上台，我才辞退了国务院差事。

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与孙先生很少联系，后来孙先生北上直到病逝，我一直在北京。彼时北洋军政府对孙先生的来往联系，曾布置有一定的监视防范，因此我曾几次几度往谒，均未见面，仅于报端得知孙先生的起居情况而已。其实我自己在北京虽

然居留时间较长，但感到没有做工作，即使见面，也愧无以报命。至于师仲武，他离兰后曾一度在河西回军防区借办税收，联系诸马。后又转往新疆，有所活动，终于在民国二十几年被盛世才杀害。

(1966年)

孙中山联俄的第一次使节

税西恒*

伟大的十月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在孙中山先生身上也很快产生了影响，产生了联俄的念头，并派出了他的第一次使节曹亚伯同志。由于那时东部西伯利亚还没有解放，全世界只有德国和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通苏俄道路只有经过德国一途。曹亚伯同志乘海轮经过地中海、意大利、瑞士，用一个多月时间才辗转到达德国。大概是1918年1月初来到柏林。那时德国外交部长辛慈是德国原驻中国公使，中国对德宣战时，他回到德国，后来升任外交部长。孙先生寻找辛慈朋友写了介绍信，由曹同志携带到柏林会辛慈，请求假道前往苏俄。由于德国那时还在妄想在大第一次大战中获胜，从而继续侵略剥削中国。所以不愿意让孙先生和苏联取得联系，因而拒绝了孙先生所派使节经过德国前往苏俄的要求。

我那时还在柏林留学，国民党员只有两个，我们想不到办法，曹同志住了两个月没有达到目的，就回国复命了。我次年回国，在上海会见他，他在孙先生领导下，还在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孙先生逝世后，我又会见他一次，他与蒋介石没有什么联系，个人搞一点经济事业，后来就没有会见过。近年我看到有关孙先生联俄的文件没有载这一件事。虽然那次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这是他第一次联俄的实际行动，理应予以补遗。

(1961年)

* 作者当时系留德学生。

孙中山在川建立革命政权 和有关联俄的见闻

唐昭明*

(一) 南京国史馆馆刊，载向楚作《杨庶堪》传，有“北方安福系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扬言和平，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欲背弃国会，与北方议和，总理、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持不可，乃宣告移政府、国会于重庆，以川滇黔为根据地。”

杨庶堪曾说：“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外受英、法、日、德、意、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政策的要挟，内遭北洋帝制余孽和军阀盗国毁法的祸变；广州军政府成立，更遭英、日、法的无理干涉和桂系军阀的排挤，乃决计把革命根据地西迁到外力干涉较少和军阀势力较弱的四川重庆，并积极部署在川建立政府事宜，密任我为四川宣抚使，返川开展活动。因密任被报纸披露，不能通过北洋驻军区域返川，遂留上海。”

(二)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遭到帝国主义无情封杀。当时，广州与苏俄无直接通讯设备，孙中山先生致苏俄政府和列宁电，经无数波折始发出。中山先生曾感慨说：“发出承认苏俄政府电报，与我在伦敦蒙难，发出求救消息，同样困难。”

孙先生当时详察国内外形势，认为实行联俄，惟有在川早日

* 作者当时系川军将领。

建立革命政府，取道陕、甘，出师北伐，直捣幽燕，乘机由西北打通通往苏俄路线；^① 和列宁携手，实行中俄合作，共同革命。^②

孙中山电召杨庶堪由上海返广州，面授机宜。杨庶堪受命，匆匆经沪返川。据说，杨庶堪系人士以4000元贿通英兵舰威尔号才得成行。据化装水手同返重庆的向楚说：“杨庶堪的政治秘密，是不要我预闻的。我看见蒋中正来送杨庶堪乘威尔号返川，把头上戴的俄国式帽子取下，戴在杨庶堪头上说：‘这顶帽子老师戴上恰合适，送给老师做纪念。’”这是杨庶堪受有中山先生在川建立革命政府、实行北伐联俄密计的旁证。

（三）杨庶堪、向楚同乘英国兵舰威尔号返重庆时，广州政府已发表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杨庶堪任四川省长；并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熊克武、杨庶堪和唐以联军总司令委任的川军将领兼北伐援鄂副总司令黄复生、卢师谛，北伐援陕第一、第二、第三路总司令石青阳、颜德基、李静安，及滇黔军将领均出席，会议讨论到北伐出师费时，熊克武推卸筹付责任^③，会议遂无结果。

熊克武约杨庶堪到成都后，商量如何同就督军省长职。杨庶堪因受孙中山先生双重任务秘嘱，经四川省籍国会议员和四川省

① 向楚说：“我同杨庶堪到广州，曾听中山先生说：‘苏俄友人愿由我国西北，用飞机接济我们革命需要的军火。’”

② 石青阳（曾被中山先生任为川东北招讨使）曾说：“中山先生要我们由陕甘北伐直捣幽燕，并乘势打通苏俄路线，与列宁携手共同革命，我们均没有做到。”

③ 王子骞（原任文史委员）说：“唐继尧在重庆开军事会议，讨论到出师经费时，熊克武曾说：‘出兵如要动用四川款项，需要经四川省议会通过。’实际上熊克武把持四川盐款，收支均不通过省议会。”

议员开会督促^①，遂在重庆先就省长职，并将国、省议员督促情形，亲函请熊克武谅解^②。

当时军人兼理民政者，咸不满意于军民分治，熊克武亦不例外。熊克武以唐继尧开军事会议，有动用自己把持的盐款做北伐军用的意图；及杨庶堪在渝先就省长职，遂由不满而至愤怒，置杨庶堪就职电于不理。经其秘书长黄至祥一再劝谏，并以长达2000余字亲笔函，陈述利害，熊克武始通知政务厅准备交代，并欢迎杨庶堪到成都。并把对中山先生若即若离的态度^③，改为坐北向南^④，对杨庶堪则颇为礼貌，希望其做官而不做事^⑤。

（四）中山先生同意杨庶堪电请^⑥，委任廖仲恺为川省财政

① 潘式民（国会议员）在开会时说：“军民分治，是必实行要政。如要与原握军民两政武人同时就职，万一他有意拖延，或不就职，省长能与他一致否？”

② 王子骞说：“我曾看过杨庶堪就省长后，写给熊克武的亲笔信。”

③ 李元白（原任文史馆馆员）说：“我辞大元帅府秘书返川时，向中山先生建议，选熊克武任副元帅，以便川省早日出兵。中山先生说：‘可以，但要熊克武有电承认军政府，才好根据来电，转知非常议会改动副元帅名额，选举熊克武为副元帅。’我到成都，把中山先生话面达熊克武，未得明确答复。”

④ 熊克武派黄肃方为北京代表，联络段祺瑞等；派刘亚休为上海代表，直接联系江苏督军李纯，间接联系冯国璋等。

⑤ 向楚说：“杨庶堪向我说‘熊克武对我感情，好到极处，一年三节，总是熊先来叩贺。宴会总是推我坐首席，临行总是让我的轿子先行。说到政治权责问题，就一点不来气。’”

⑥ 谢持曾说：“杨庶堪请委朱执信、廖仲恺、蒋中正为川省高级职员电时，秘书处有人持电问中山先生说：‘杨庶堪要把我们要人都抢走，是何用心。’中山先生微笑地说：‘这是我的意思。’”

厅长，内定朱执信为川省秘书长、蒋中正为川省警务处长^①。廖仲恺任财政厅长发表后，中山先生曾以私人名义电川省党人向楚等，协同廖仲恺切实计划方案；表示廖来川省，不仅是负川省财政责任。向楚等曾去电欢迎廖仲恺早日来川。

廖仲恺在上海锦纶丝厂，取用川省府汇存路费，乘船到宜昌，得但懋辛领衔和部分军人署名电^②，反对其来川任财政厅长，廖仲恺遂折回。

时任川省警务处长杨革友，当面向杨庶堪反对蒋中正来继任，并活动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陆荣廷做调人，通过两面手法^③，获得熊克武同意和杨庶堪委任，为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五）四川省议会届满改选，杨庶堪想从省议会改选，稳定川省护法局势，获得熊克武同意，共同主张国民党同志多候选。选举结果，国民党同志当选议员者，占全额百分之九十以上。

省议员齐集成都开会。杨庶堪提朱之洪、郭崇榘为省议长候选人，熊克武提李肇甫、熊华为省议长候选人。双方坚持意见，暗斗甚烈。

李肇甫、熊华当选正副议长，署秘书李晁父（省议员）同向熊克武建议，选举朱之洪为第二副议长。张亚光（时任督署副官长）在旁说：“我们是军人，只知道遇见敌人要打，见降

① 李元白说：“我在大元帅府秘书处，看见杨庶堪请委朱执信为秘书长、向楚为政务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中正为警务厅长电报。中山先生指示，先发表向、廖，余作内定。”

② 向楚说：“赵铁樵（时新任沪川源银行总理）曾向我说：‘反对廖仲恺任财政厅长的人不少。我即签名的一人，领衔发电的是但懋辛。’”

③ 向楚说：“张群密电岑春煊、陆荣廷，以由军政府任但懋辛为省禁烟督办的交换条件，和蒋中正随时到川、随时交代的表示，获得熊的同意和杨的委任。”

将才收。”熊克武默不做声，李晁父送李、熊上轿时说：“如此狭隘，我们调和军民更难了。”^①

（六）关于北伐问题，杨庶堪、石青阳、卢师谛等曾一再催促，均为熊克武以“北伐要有种种准备，不能如书生章太炎所说‘说出兵，就出兵’那样简单”，一直拖延下去。

依附北洋系的川军刘存厚部被驱逐出川，驻陕南。其部下营长彭斗胜、周启燮，想举义返川，被刘存厚发觉，派兵围剿。彭、周两营长，即向附近驻扎川军第五师十八团熊世招团长（现任省政协委员）告急救援。

熊世招以川军北伐援陕，酝酿已久，迟早总要实行，一面电请出兵援陕，一面率全团兵力往救彭、周出险，包围汉中。

熊克武派江防军副司令朱华经兼任援陕总司令，由川东南永、荣、隆一带，率新收编杂枪部队往援，接任包围汉中历时甚久的任务。仅数日，即因子弹用罄溃败，影响曾经获胜的熊团，亦不得不撤退返防，援陕遂告结束，北伐因之中止。^②

事经中山先生驻上海代表孙伯兰查确^③，熊克武派兵援陕，舍弃驻防川陕边界的有战争经验部队，对唐继尧加有援陕名义的吕超和石青阳、颜德基等，也一概不用，仅派朱华经由远道

^① 向楚说：“我曾听李晁父说‘熊克武性情狭隘，为其左右所挟制，不顾全局’。省议会议长选举，是其例证。”

^② 督军署主办的《戊午周刊》，有“川军安土成性，不愿远征，尤其是北方生活，川人大感不惯。此是援陕失败主因。章太炎主张由川取道陕西北伐。完全是书生见解，当时如信其宣传，大举北伐，失败如此次一样，而损失则更大”的时评。

^③ 覃理鸣（湖南国会议员）曾说：“我在上海帮助孙伯兰代表中山先生接洽各方。孙伯兰原以为川军攻下汉中，联系各方必作起义响应，怀疑中山先生部署很久的由川北伐，失败为何如此迅速，始调查事实真相，建议中山先生去熊。”

率兵往援，又不补充其子弹，这是有意造成援陕失败，从根本上破坏中山先生由川出兵北伐计划。

同时，侦悉江苏督军李纯，屡因中山先生拒绝其对护法稍事折衷的办法，直系愿与南方政府合作倒段的缓兵计，交结川滇黔将领^①，阻挠北伐。熊克武故造援陕失败，更超越北洋系“护法稍事折冲”的限制。故中山先生等认为熊克武与北洋系勾结很深，非去熊克武，川省无出兵希望。

中山先生因北伐援俄，形势急迫，环境条件，利于速进，乃采纳孙伯兰建议，下令川军将领吕超、向传义、石青阳、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刘湘、廖谦，准备去熊，后电唐继尧协助去熊，并再电唐促其去熊。

〔我写补充材料，错将中山先生电中所指的川军第二师长刘湘，误为川军第四师长刘成勋，后经友人说：川军旅长廖谦派其参谋长廖益（廖谦的胞弟）往谒中山先生，表示第二师长刘湘和旅长廖谦，诚意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故中山先生去熊令列刘、廖两人。〕

〔在去熊战争未发生，刘湘已以武力解除廖谦旅长职。在去熊战争酝酿中，石青阳、卢师谛等均对刘湘时防其生变，提高警惕。特此更正。〕

熊克武阻挠北伐，事实显著，中山先生不对熊下令北伐，不仅是中山先生已去大元帅职，不便正式下令的关系，也是中山先生在策动川省民军时，致黄复生、卢师谛电所说“前此未及附义将领，苟可转圜，幸勿深拒”，以及川省统一时，致吕

^① 章太炎纪念专号，太炎言行轶录有：“李纯电商唐继尧‘护法’稍事折冲，直系愿与南方政府合作。先生知其事，严电责唐继尧。唐派人致意先生，谓政治主张固宜坚决，然方法手段，似可多取途径，并自誓决不负中山。”

超电所说“未及附义将领，要斟酌收编，不可一律歧视，以便集中力量，从事北伐”。同样是为“团结川省全力，实行北伐”特留余地，待熊克武觉悟，共事北伐。

川中同志接令去熊，原拟约湘滇黔将领联电熊克武，以兵谏方式，推行中山先生命令，促其北伐，因意见未得一致，禁烟事件即发生，未能实现。

卢师谛于战争酝酿前，在万县亲函熊克武从速北伐，自己愿将所有部队，交友军指挥，请熊克武给以代表名义，联络省内外有关部队，共同努力于北伐事业^①，未得熊答复。

颜德基于熊克武败退之际，驻兵保宁，熊克武派人游说颜德基，许以重利，要求不迎头重击。颜德基只劝熊克武不要阻挠北伐，不受饷，不打击，自动退保宁。^②

(七) 但懋辛任川军第一师师长，经广州总裁制军政府委任为川省禁烟督办，率兵由成都到重庆，撤换在县署公开吸烟的巴县知事杨霖。时川东道由唐继尧所委任川军北伐援鄂总司令黄复生兼任，因其有烟癖，感到威胁，即离职到万县与副司令卢师谛商对策。

成都督军署电机室与政务厅长向楚办公室，仅隔一壁，向楚听熊克武打电话说：“叫卢师谛把兵权交出来，我保证他安全离开川境。”^③

^① 刘泳曾说：“我辞代理财政厅长出川，过万县时，见卢师谛为劝熊克武决心北伐，写了40多张信笺。”

^② 颜德基在上海当陈凤石面，向曾子玉说：“我当时信你信上所写熊克武要收编残部，办交代，不使人枪丧失，为害地方，我才退让保宁。这同是川中党人体会中山先生团结川省力量，共同北伐的用意，而表现出来的行动。”

^③ 向楚说：“我亲听熊克武在电话机上的谈话，才相信当时的舆论说：‘熊克武以郑庄公待公叔段的手段对待义军’是公正的舆论。”

当时，重庆纷传但懋辛奉军政府严令，率兵禁烟，如有违抗，无论军民，格杀勿论。滇黔两省一贯种烟，运销各省，支持军政。在渝滇黔军将领恐川省禁烟风潮扩大，影响滇黔，联电唐继尧请示。唐继尧令滇黔将领监视但懋辛行动，以倍于但所带兵力，跟踪戒备。

但懋辛由重庆到涪陵，黔军朱绍良师长已作准备，但懋辛欲为所带士兵谋一宿营地而不可得，知事机不妙，乘轮绕忠、酆、石一趟，即返重庆，回成都。

(八) 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同因军饷困难，各在驻区内种烟抽税，对但懋辛率兵禁烟，咸感不安，合谋积极推行中山先生去熊令。

适石青阳、颜德基因防区发生争执纠纷，吕超得熊克武率兵一团往武装调解，卢师谛亦由万县亲往顺庆，调解石、颜争执，遂在顺庆开军事秘密会议，推吕超任总指挥，刘湘任副总指挥。准备武力去熊，遂由此会议发端。

(九) 顺庆会议不久，熊克武在成都为太翁祝寿，吕超在绵阳为吕太夫人祝寿，寿期恰值相近。双方主宾在寿宴酬酢外，交换军事意见，是必然的事实。熊太翁寿辰，北方大总统徐世昌送寄寿礼，更是官场应酬寻常事，熊克武和其左右为表示与北洋系无来往，以解释顺庆会议所传出的“熊克武勾结北洋系阻挠北伐的罪名”，宣传熊克武接到徐世昌隆重厚寿礼，赫然大怒，不准悬挂。^① 来宾则相互私议，熊太翁祝寿是临时约集，徐世昌礼能此时送到，可见他们交往的密切。

熊克武为熊太翁祝寿，原想演戏三天。因侦知军情紧张，

^① 王子骞说：“熊克武接到徐世昌隆重厚礼，赫然大怒，不准悬挂。我想熊太翁祝寿未发文启。北方政府何以知道，可能是刘亚休在上海搞的。”

乃于第三天开秘密军事会议。熊克武在会议时，始终哭泣，未发一言。列席人员大骂义军将领背义反熊，犯上作乱的不少。谈到对策，有主张团结“大五师”^①，利用中立旧川军，共谋挣扎者。熊世招说“我看以‘大五师’为骨干，联络义军，改造川局，较为适当”。王子骞说：“义军不情至此，我主张宁可战败，誓不与义军合作。”会议无结果而散。

绵阳方面为吕太夫人祝寿的主宾，在交换情报后，认为第三师人事复杂，师长向传义态度不够明确，要吕超抓紧向传义，免出岔子。

(十) 吕超电约向传义到其防区德阳面谈，向传义不便独往，诡称吕超要我约但懋辛同去面谈，获得熊克武许可，吕约在驷马桥会见向传义，至时熊克武单骑赶到，同往德阳。

熊、但、向、吕在德阳交换情报，同认对方优势较多。熊提出团结“大五师”和自动辞职办法。吕说“逼不得已，锦公辞职避战，亦是一法”，遂集中商讨如何团结“大五师”，如何扭转各方关系，并约定熊辞职时，推吕继任川军总司令，及熊辞职而不离川，协同支持川局；并要吕负责疏解义军，不要逼人太甚。

(十一) 成都传遍德阳会议消息，各方咸庆川局和平解决，惟虑义军进逼生事，咸属望杨庶堪出面作调人。熊克武、杨庶堪采纳众意，同电约共信的驻简阳滇军顾品珍军长到成都^②，陪同杨庶堪到简阳再去川东作调人。杨庶堪到简阳，以出险电告唐继尧。顾品珍即把杨致唐电，照抄电知熊克武。

① 时川军一师长但懋辛、三师长向传义、五师长吕超，同是熊克武任五师师长时军官，故称一、三、五三个师为大五师。

② 董鸿洞（时任川省印花税处长）说：顾品珍曾向杨庶堪表示坚决执行中山先生去熊令。后又与熊克武助其返滇去唐协约，因得双方相信。

(十二) 杨庶堪到遂宁，约集去熊将领和代表在遂宁双红镇开会，获得“警戒待变，不急进激战，不松懈受愚”的结论。川军二师长刘湘独持异议，谓“去熊军事，如箭在弦，利于速发，迟必生变”。

杨庶堪乘船到重庆。刘湘在合川派兵一营，护送其到北碚，经过黔军警戒哨，因是护送杨省长队伍，获免检查和不解除武装。杨庶堪到重庆，即闻枪炮声，刘湘派送护卫的一营兵，已配合刘湘部署各路军队，向重庆黔军袭击。^①

(十三) 杨庶堪留成都警卫营枪械被收缴，马匹被牵走。熊克武与其左右，纷纷宣传杨庶堪要把四川置于“九幽地狱”。

报载，政务厅长向楚被逮捕，向楚即叫通督军署电话说：“我是向楚，现在政务厅，如要逮捕我，我即来投案。”接电话的李郁如（后为刘湘枪杀）参谋长说：“我们知道你不闻杨庶堪秘密，我人格担保不妨碍你自由，报上消息错了，我马上叫他们出号外更正。”

(十四) 川省本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武力，因省议会对于护法救国和北伐安川的正义主张意见分歧，熊克武侦悉对方军情，针对设计。如对滇黔军则乘其各自弱点，分别分化利诱；以川兵治川，收回防地，由其主持；拉转有力的川军二师长刘湘；以下野时推任继任川军总司令拉紧绰号“水漩”四师长刘成勋；以出兵助战提升混成旅长陈洪范为第八师长；对三师长向传义、五师长吕超，除以“大五师”关系和缓其积极主战外，并对三师进行人事离间，五师加以猛力袭击；自信掌握有人枪精良、子弹充足的但懋辛一师全师、余际唐江防军 30 营，估计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部，是未经训练的队伍，自有不堪一击

^① 《巴县志》载：“民国 9 年 5 月 3 日，省长杨庶堪由成都到重庆。5 月 4 日，驻防合川川军第二师长刘湘潜师袭重庆。”

的胜利把握。为先发制人计，于支使刘湘潜师袭击黔军的同时，令一师周发和旅长率重兵猛袭绵阳五师吕超师部^①，战争遂开端。

(十五) 去熊将领方面，因防刘湘生变，和不相信熊克武自动去职，早抽调部队集中，交卢师谛指挥。熊克武既开战端，卢师谛派兵东下，与黔军夹击刘湘，西进与吕超调集部队，会合解救绵阳，战事遂扩大，川东北战况，尤为激烈。

这次战争总因，是中山先生策划川省军民和滇黔军驱逐北洋系在川武力，为建设革命政府北伐援俄排除障碍；近因是黄、卢、石、颜同受熊克武川军的不公平待遇，军饷困难，种烟抽税，致干查办，积极推进中山先生去熊令并脱祸自卫；也是熊克武为谋固权位，指挥直属但、余和旧川军刘湘等部队，制造川人治川，先发制人，排除异己和客军的战事。

在战争进行中，虽川军三师向传义、四师刘成勋守中立，七师颜德基等参加护法联军而不积极协同作战，但因“护法”将领尚能忠于革命而努力，和熊克武先发制人战术失败、士气不振的因素。熊克武终于时胜时败，退到保宁。

熊克武退败，川滇黔将领在龙泉驷石经寺开会，公推川军总司令吕超领衔，联名通电，欢迎中山先生和政府、国会来川，主持大计。

中山先生早放弃广东革命根据地，留驻上海，即积极部署在川成立革命政府，实行政府、国会迁川。广州军政府参谋总长李

^① 蒋特生（时任五师参谋长）说“熊克武以大兵袭绵阳，大出我们意外，时城内无官无兵，或以师部仅有现洋2万余元，调集各处留守卫兵，组织敢死队，抗拒待援”。又熊世招说：“当时绵阳空虚，确如蒋特生所说，非常危险。”

烈钧率滇军朱培德师开重庆^①，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同各地国会议员分道来川，集中重庆，预备开会^②，中山先生决定来川主持。^③

(十六) 熊克武败退保宁，一方面进行其前未完成的设计，拉拢曾接受诱惑的川滇黔各将领；一面派李直生为代表勾结前被驱逐驻陕西的亲北洋系四川督军刘存厚^④ 合力攻川，得到刘存厚接济子弹八百万发^⑤，并同刘存厚订约分道攻入四川和反川后权利分配协议^⑥。

“护法”联军因作战疲劳，子弹缺乏，川滇黔将领各在不同程度上受了熊克武的引诱。如滇军将领顾品珍军长，急于返滇驱唐，无心作战。赵又新军长为刘湘以同学关系，诱其参谋长兼团长杨森叛变，致赵死泸州。黔军王文华与袁祖铭意见冲突兵无斗志。川军第三师旅长邓锡侯、刘斌倒戈投刘存厚，拉垮师长向传义。四师师长刘成勋接熊委任成都卫戍总司令。八师陈洪范由荣县进攻叙泸滇军，争回地盘。熊克武引诱川滇黔军将领，各争私

① 《巴县志》载：“民国9年10月7日，广州政府参谋总长，率滇军朱培德全师，抵重庆。”

② 《巴县志》载：“九日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率国会议员多人到重庆，预备开会。”

③ 冯君逸（现守法外保就医住玉泉街）说：“我因有事通报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亲笔复书，有行将来川一语。”

④ 黄肃方曾说：“熊克武派李直生为代表，与刘存厚合力攻川，李直生于归途为匪所杀害，是前世冤孽活灵活现的佛家报应。”

⑤ 《巴县志》载：“熊克武在保宁得前督军刘存厚援助，反攻回川”。又向楚说“我听说刘存厚接济熊克武子弹八百万发，合力反攻。现在服务于省政协的田颂尧，就是熊、刘合攻返川时刘存厚的前线作战官员”。

⑥ 叶绍尧（时任熊部营长，现住外东大安街）说“熊克武反攻回川，是与刘存厚订有协约，刘存厚由广元攻绵阳，我们由保宁攻潼川”。

利设计成功，护法联军遂败而不可收拾，因而国会宣言离重庆^①。李参谋总长因所委重庆卫戍司令鲁子才战死，同滇军去渝^②。杨庶堪辞省长职^③。中山先生苦心经营结合川滇黔为一体的团结，立被击散，在川建立革命政府北伐联俄计划，全被打消。

此后北洋系刘存厚、吴佩孚等相继祸川。川省军阀为争夺政权和防区，在数十年中，发生大小战数万次，致川省有魔窟称号。滇黔将领互争权利，残酷厮杀，死亡过半。川滇黔三省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更难以数计。谁为厉阶，遗此荼毒，留待掌握正确史料者，作公平解答。

(十七) 川省盐款，是属于中央性质的款项，熊克武自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总理民政，以及担任四川督军数年中，均掌握盐款，未公开收支。川省整军后，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所需军饷。同由熊克武统筹统支。黄、石等因军饷困难，没有得到过盐款补助^②，故种烟抽税，以图弥补，致干查办。熊克武却有大量款项，存于香港花旗银行，后全部倒账^③。

(十八) 川滇黔“护法”联军失败，黄复生、卢师谛、杨庶堪、石青阳、吕超、彭远跃、熊世招等，和熊克武通缉的有关军政党人，均逃上海，咸向中山先生作“各是其是”的报告。经中山先生诚恳劝导，严厉批评，熊克武秘密向中山先生认错悔改。

① 详《巴县志》，所记有离渝月日。

② 杨庶堪曾说：“石青阳、黄复生等，屡向我说军饷困难，没有得到过盐款补助。我据以向熊克武建议，把盐款收支公开，没有得到答复。”

③ 陈凤石（曾主任熊的军事财务）曾说：熊屿帆（熊克武胞兄）在香港任花旗银行债权团总代表，把载有熊屿帆署名、电请香港法院追收花旗银行全部倒款申请书的报纸，交与曾通一看。曾通一说：“熊屿帆这个老好人，怎能为总代表？”陈说：“这是花旗银行倒闭时，熊克武化名存款数额，在第一二名之列。”

中山先生嘱咐省党人“化嫌合作，努力革命，此后均不准再提此痛心事”。

川省党人，咸以实际行动遵从中山先生训勉，如：吕超、石青阳于讨贼之役，就任川省讨贼军第一、第二路司令时，均自动声明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一职留待熊克武来担任。杨庶堪被四川同僚责其不该与熊克武打内战，把整个川省国民党地盘打掉了。杨庶堪只说：“是中山先生叫我除掉革命障碍。”后卢师谛病死，杨庶堪作墓志，初以为是叙述“民九川战”真相机会，继念中山先生嘱咐，终不提及。1925年春，熊克武率川军驻常德被赵恒惕军迫离湘时，卢师谛由北京派代表往劝熊克武移驻湘、川、黔边境，等待广州大举北伐，会攻武汉，并愿负责联络各方，为解决军需困难。

1925年秋冬，熊克武、余际唐、王子骞、陈大枝、喻华伟、丁款喜六人被扣留虎门时，朱之洪由重庆往广州营救。^①

（十九）我挽中山先生联云：“追踪万里，晤面无缘，仅传语巴蜀同人，毋自战争伤百姓。革命卅年，鞠躬尽瘁，因产生肝癌奇疾，亦偕勋业共千秋。”

近忆王子骞说：“1923年熊克武率川军驻常德，派我代表谒中山先生，先生见面，即怒责熊克武不该又同赵恒惕搞联省自治，破坏革命统一。我陈述熊克武处境困难，和我不是专为熊克武作游说，是要以党员资格报告湘川革命近况，先生怒气渐消。”黄复生曾说：“1921年春，中山先生因在川建立政府计划被打消，熊克武秘密悔过，嘱咐川人党人化嫌合作，努力革命。说到‘此后不准再提此痛心事’时，语气沉痛，面容惨沮，为我生平

^① 向楚说：“1926年，吴玉章返重庆，把用钢板印有熊克武致陈炯明信的广州《羊城报》交我看。我看信上是盖的熊克武章，字是但懋辛写的。”

所仅见，石青阳当时曾感动泣下。”

(1961年)

(编者按：本篇所述有关联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细节与1994年俄罗斯公布、出版的关于苏俄与孙中山联系的档案有出入。作者很可能把发生在1920年以及发生在1922—1923年间的事混在一起忆述了。)

孙中山制止李安邦暗杀议长

冯 义*

民国6年（1917年）国会与海军南下护法，此事已经过四十多年，久已忘记不清，日期一概未敢加入，而事实必有先后的倒置，我希望有人对我此史料予以纠正，幸甚。

民国6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及参众两院南下护法，护法议员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大元帅府设在河南士敏土厂，参众两院的议员住在长堤海珠酒店（全部为招待所），该酒店距元帅府不甚远，以期就近接洽一切事宜。大元帅府成立后委许崇智为上将军长，黄大伟为中将参军，何克夫等为参军。参军长许崇智因公到闽省，由中将参军黄大伟代行其职权，同时委任吕宋的华侨李安邦为大元帅府亲军行营卫队司令。我在卫队司令部任上校副官长，马伯麟任该部参谋长。后调马伯麟任长洲要塞司令，其参谋长由我暂行兼代。当时广东督军是莫荣新，督署参谋长是钮永建。后调钮永建为兵工厂长，而以桂人郭椿森任参谋长。

大元帅于9月10日宣誓就职，以为粤督莫荣新从此就范，而国事可以顺利进行，并希望桂系方面能同心协力，达到护法救民救国之举。不料桂系方面阳奉阴违，从而勾结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众议院长吴景濂，参议院长王正廷，俱已变质，明目张胆，竟将大元帅府改为军政府，设七总裁制，以分散孙中山之权。在酝酿改组当中，事为亲军行营卫队司令李安邦所侦悉，遂约我入司令官室，两人秘密商谈。李谓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我帮助，并云：“要有胆有勇气的才能担当。你是一个军人，现任我

* 作者时系大元帅府行营卫队司令部上校副官长。

的副官长，又代行参谋长的职权，量你必能协助，所以与你密商，你的意见如何？”我即答说：“司令官你要我帮忙的话，我有能力做得到者，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但司令官要我干什么事，何妨明白指示。”李答以败类的参议院及众议院的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及议员一部分已勾结桂系军阀陆荣廷及粤督莫荣新，和运动南下的海军一起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军政府，设七总裁制，明明是要拆孙大元帅的台，也即是要驱走大元帅之意，我最恨是反对孙大元帅的人，所以我决定暗杀吴景濂及王正廷二人，以泄我的愤怒。我答此事非常重要，更与孙大元帅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杀了这两位议长的话，恐外间不察，以为是孙先生唆使你去杀之，孙大元帅的革命事业前途及信誉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不是不帮忙，但要三思而后行，且事情重大，更要考虑周详，方可行事。我的话说完后，李就嘱我赶快为好，千万不可泄露为要。

在李安邦方面，他要杀败类之徒是出忠心耿耿拥护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与一般所谓救国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我为着李司令想杀吴景濂议长的事情，极为不安；万一真杀了吴景濂的话，谁人负责。外间一定认为孙大元帅主谋杀的，因李是大元帅府的亲军行营卫队司令。我以情势紧迫，我入大元帅府楼上办公室找参议夏重民详谈李安邦约我要杀吴、王两议长的事情，夏重民立刻面报大元帅。大元帅得报，马上叫李安邦到办公室当面严责及教训一番，说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华侨爱国者，其志可嘉。现在你是我的亲军卫队司令官，你的责任就系整理你所属的军队及护卫事宜，军风两纪尤为注重，其他一切政治的事，你不宜过问及乱搞，切记勿忘。李安邦回来司令部，对我似有不悦之色。

过了两三天之后，李安邦忽然约我去长堤一景酒家食中午饭。他说我被大元帅教训一番，是增加我的知识，又得到你将利害的界线说得清楚，使我以后做事从谨慎两字着想，我不怪你报告大元帅，仍感到你做事小心及深刻见解，谨敬你一杯云云。我

说此事虽未做出来，足见司令官忠心耿耿来维护大元帅，如果你不是现任大元帅的司令官，随便杀一个坏人是不成问题的，今你是现役军人，如不请示便杀议长，则参众两议院全体议员们对大元帅方面发生极大的不良印象，从而对大元帅的忧怀国事无补，且认为孙大元帅是主谋罪魁，因此我就请夏参议重民报告大元帅请示办理，尚请司令官见谅。谈至此双方一笑而别。在当时预谋之际，我本想密告参军处，后回想万一告密后，诚恐事传出外对李安邦有所不利，故特托夏重民转报。后来夏重民被委为广三铁路局局长，在职时不受陈炯明调动车辆，因而被杀，杀后尸体投入海中，陈败走后始在石围塘车站建一塔作为纪念夏烈士重民之塔。

(1965年)

回忆 1920 年的孙中山先生

龚师曾*

我于 1919 年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电邀，赴滇担任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兼炮兵科长，1920 年，因驻粤滇军“易帅”问题，曾代表唐继尧到福建漳州与陈炯明联系和交换意见。在漳州这一段时期中，比我 1918 年在广东潮汕担任援闽第四军（军长伍毓瑞）参谋长时，了解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处更多了。兹就记忆所及，略作回顾。

一、驻粤滇军的由来和“易帅”问题的经过

驻粤滇军原来是护国战争期间由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率领，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向其爪牙广东都督龙济光进攻的一股军事力量，与护国军第一军蔡锷由四川进兵，同为反袁的两大主力。护国战争结束后，这股军队仍然留在广东。1917 年孙中山南下护法，驻粤滇军和后来培植起来的粤军，以及由孙中山先生率领南下的海军，便成为孙中山先生用来联络、利用桂系（当时两广为桂系陆荣廷所控制，陆任两广巡阅使）并与之作斗争的军事力量。所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时，便以陆荣廷和唐继尧（云南督军兼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为元帅，并委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滇军师长张开儒为陆军部长，以示笼络。当时四川发生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的战争，后来又发生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战争，唐继尧便组织“靖国军”，自为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

* 作者当时系滇军少将参议。

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并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第四两军总司令，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声言“先平川乱，再行北伐”。后来，唐继尧因川战失利，即想把驻粤滇军调回，投入四川战场，而桂系也想把这支军队的领导权抓过来，造成了滇桂两系的暗斗。唐继尧因为这股军队是李烈钧率领开入广东的，便委李烈钧为驻粤滇军统帅，桂系也委托与滇军有历史渊源的李根源“督办北江防务”，来统率驻粤滇军。当时唐继尧派我到漳州，想会同粤军陈炯明夹攻桂系，怕桂系培植李根源回师返滇，夺取自己的政权。谈到粤军，它又是在桂系压制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军队。这批军队本来是前任都督龙济光被迫下台以前，朱庆澜以省长名义先到广东来接收的“警卫军”。当时的兵额有 40 营，接收后变为省长直辖的地方保安部队。广东宣布自主时，桂系军阀广东都督陈炳焜借口军事时期军权必须统一，要求接收这批军队，朱被迫交出 20 营，仍留 20 营改编为“省长亲军”，委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朱庆澜被迫去职后，陈炳焜调陈炯明为督署高等顾问，硬是接收了省长亲军。在由陆荣廷主持召开的梧州会议上，桂系答应出兵援湘，国民党出兵援闽，并同意将陈炳焜“劫去”的省长亲军 20 营拨交陈炯明指挥，并以陈炯明为援闽军粤军总司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福建人）为援闽军滇军总司令，林葆懌为援闽军海军总司令，而以程璧光为援闽军海陆联军总司令，这支粤军才得以壮大起来。

陈炯明在孙中山辞大元帅职以前，原驻惠州，以粤军总司令名义兼惠潮梅防务督办与税务督办（当时军队都是就地筹饷）。迨援闽军粤军出发汕头，滇军也移防潮州，齐向福建推进，一举而克服漳州，进而占领闽南各地。这时军政府已改组为总裁制，桂系乘机委陈炯明为福建省长，想把粤军一脚踢出广东去；但粤军志不在闽，遂驻军漳汀之间，不再前进了。一向留在韶关观望

风色的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因为唐继尧改派郑开文接任师长，张拒不交卸，又被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诱捕。

就是在滇桂两军在争夺驻粤滇军的领导权的声浪中，李烈钧和李根源两位日本士官老同学、云南讲武堂老同事几乎兵戎相见，后经国会与两方接近的议员调解，由军政府发表李根源为琼崖镇守使，原属张开儒师的赵德裕、赵德恒两部由李根源带往琼崖，原属李烈钧率领的朱培德、杨益谦等部，由李烈钧带往重庆，而原属方声涛师的伍毓瑞部滇军，却早被桂系刘志陆解决了。

二、我在漳州所见的“红的运动”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政党，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由于辛亥以来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护法运动中想借地方武力从事革命的幻想受到挫折，又受到“五四”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所以，孙中山在辞去大元帅职回沪从事研究的结果，开始初步认识了“以俄为师”的真理。他除先后写成《心理建设》——“行易知难学说”和《物质建设》——《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等著作及出版《建设》杂志鼓吹建设思潮和主张外，并经常与许多最先进的革命者接触。林伯渠同志就在当时作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工作（当时管组织的部门），酝酿着革命更生。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和杨明斋（华侨，山东人）来华，进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划工作，就有不少的进步青年学生、工人，深入各地开展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活动。

我在漳州时是1920年3月，住在漳州西园旅馆，正值漳州举行春季运动大会，闽南青年学生多数参加，在漳州公园举行。陈炯明派其幕僚邀我参观运动会。运动会的节目，田赛有跳高、跳远、铁球、铁饼、标枪等，径赛有100米、200米、400米、

1500 米、1 万米等赛跑，此外还有“全能运动”和“球类竞赛”——篮球、足球、排球等，应有尽有。但有一项叫做“红的运动”，却为我所不懂。我问他们：“这是什么运动？”他们回说：“这次运动会，在沪请了共产党人来漳，宣传共产主义。”到了这项时，运动员概须停止活动，只见公园各处都设有许许多多的演讲台，群众一丛丛一丛丛地在听演讲。我们也走下来宾台，到演讲处去听听。走到一处，见一小黑板悬挂在树枝上，上书“人生观”三字。说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也没有一直听下去，可见我的阶级不同，自不感兴趣，也由于水平关系，听不懂，便自回旅馆休息去了。事后听说这些担任演讲的人，都是由孙中山先生从上海约请来的，当时，朱执信先生、廖仲恺先生都在漳州。

(1965 年)

关于孙中山灵活运用革命策略的忆述

金汉鼎*

1922年3月，云南政局急剧变化，北伐军连战失利，总司令顾品珍战死于宜良天生关鹅毛寨，部队溃散。唐继尧已进驻蒙自，我即离滇，经过会理、西昌入川，于6月初到上海。为避喧嚣，去苏州虎丘静住，旧长官黄斐章闻知，派副官张云、娄度约我到上海他家住。

延至8月，知孙中山先生已从广州到了上海，我才去黄家，同到莫利爱路（今香山路29号）孙先生住宅谒见，汇报云南北伐军失败的经过，凑巧于右任也从三原辗转到上海，向先生汇报陕西靖国军从护法以来的经过和目前的状况。一日，孙先生约宴，同席的有于右任、廖仲恺、柏文蔚、黄斐章，以及张作霖的两位代表（姓名已记不清）。在这以后，我常同黄斐章、杜钟琦去见先生，一次黄斐章写有一篇《民权主义》商榷，约同去和孙先生交换意见。再是云南北伐军部队将领杨如轩、杨池生、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从广西联名来信，请我去领导，向先生反映。他听了很高兴，问他们兵员人数和武器，各有若干。我说：“我不在军中，究有若干不大清楚。”因他有要事就没再谈。

过些日，杜钟琦（他是范石生的姐夫，我和范人同盟会就是由他介绍）代表范、杨等从香港来到上海，促我去领导，并约我去会见孙先生。他们相见，倍觉亲切，因杜是东京同盟会的老会员，又是河口起义共患难的老战友，所以握手不释。寒暄后，先生问：“你从那边来，知道范、杨、蒋的部队有几多人，武器若

* 作者当时系滇军高级将领。

干，军纪如何，官兵生活怎样？”表示很关心样子，经杜逐一答复后说：“范，杨，蒋等过去都是跟金铸九做事，他们资历相等，人望不够，自知谁也不能领导谁，所以都盼望铸九去领导。”孙先生听了，连说很好，很好，现在有一个大计划可稍待。这时，正逢广东北伐军朱培德部参谋长黄实，从军中来向孙先生汇报从吉安回师讨伐陈炯明在韶关战斗的经过。因出师久缺饷粮而无功，朱部已转向桂林从事休整。黄实向我们建议，取道湖南，到了桂林朱培德军中，就容易到部队里去。杜又约我同去见先生。由于这次谈及陈炯明背叛革命问题，孙先生就讲了一些革命理论和观点来，他说：“我们讲革命，不能凭着一张嘴空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它的内容，应包含有大多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了工农大众作基础；我们进行革命，要学俄国，以他为师。有了这样一个鲜明的旗帜，就可吸引群众，号召群众，有了群众，革命就不怕失败，只要认真向群众宣传，组织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领导他们作坚持不懈地斗争，革命事业，最后必然获得成功。”又说：“现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窃权弄柄，穷兵黩武，祸国害民，极不得人心。他和皖段、奉张的矛盾日在扩大，尤其段与曹、吴已成誓不两立；他派徐树铮来和我联系，我要他去闽南和许汝为就军事方面尽情交换意见，再来研究拟定对付直系的具体办法”；“段过去曾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是一种革命行动。现在又派人和我联系，愿走革命的道路，共同推翻曹、吴是对的。张雨亭早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曾有过物质的帮助，今也有代表来联系，商谈如何协作对付直系的问题。这种行动我们是极表欢迎”；“我们革命党，光是有了革命纲领还不行，还要在策略方面能够灵活应用，不失有利时机，联合同情革命者，去打倒反革命者；分清敌友，辨明是非，是每一个革命党人起码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大计划还待缜密研究。你们就经桂林去掌握部队，我会派人来和你们联

系”。

杜和我研究后，他仍回香港。把在上海联系情况和我的行动，告知范、杨等。我带着秘书徐虚舟于8月下旬离沪，经长沙到零陵，因路途不靖，滞留近月，朱培德派沈静安营长率部来迎接，才到了桂林。而蒋、范、杨的部队则远在大湟江。广西境内，由于地方势力各争雄长，秩序混乱，交通梗阻，桂人民鉴于唐继尧兄弟的军队过境，抓夫劫掠，侮辱妇女，对滇人恨之入骨；骂滇军为红头牛（因滇军帽边是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前进，就呆在朱培德军中。到了10月上旬，杨、范、蒋等给我一个“鱼”电^①，要我在桂林宣布就滇军总司令职。因我有我的打算，如自行筹款、自行招兵、自行任免各级干部、自行委派行政和税务人员，严禁经营商业、吸烟赌博、虚报名额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严肃的纪律性和内部的团结，也就谈不上革命，所以我没有宣布就职，随派徐虚舟去柳州与林俊廷联系通行办法，结果人被软禁不许回来。

这时，吴佩孚指使沈鸿英率部一万四五千，从江西回桂。朱培德为避受袭击，要我随朱部经龙胜退至古宜和长安。在这很短的时间内，朱部曾发生两次变故，在古宜，第三旅旅长胡国秀率部叛唐继尧到长安。王均第一旅、胡思舜第二旅官兵又包围朱培德要饷，气势汹汹，乱叫乱骂，王、胡均不敢露面，朱脐下生一个毒瘤，躺在床上不能动，很着急。我随朱一路到古宜、长安。看见他的下级官兵，不少是赤足露腿，头发长得很长，因无钱买草鞋、理发，患病者也少医药，生活确很艰苦，即自我介绍，请弟兄们不要叫骂，找你们的长官来和我谈话，或许有办

^① 电文如下：桂林朱总司令益之兄，请译转金铸公：欣悉钧驾已抵桂林，三军闻之欢腾，倍于寻常。请即在桂林宣布就滇军总司令职，以慰众望，勿任盼祷。职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范石生同叩。鱼印。

法，不致你们失望。

随找来一个团长甘芳，我要他传达给弟兄们由团营连各代表一人，在此和我谈，部队各自回营听消息。扰扰攘攘的人群，转眼就不见了。我将所带慰劳部队兵员港币一万元，送给朱分发他的部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我也就没有按中山先生的愿望，到达部队里去，而感到内疚。

(1966年)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办飞行学校的经过

胡汉贤*

1915年10月底，为了向孙中山先生请示讨袁事宜，我从加拿大中部动身，11月初到达加西，偕同李赦、关保华两同志为代表往日本。同月9日到达横滨，夏重民等前来接船，10日陪同我到东京青山一丁目中华革命党本部。翌日，我们到青山四丁目孙先生寓所晋谒先生，报告加拿大党务情况及组织军事社与美洲华侨讨袁军敢死先锋队的经过。当时陪同孙先生接见我们的有廖仲恺等同志。孙先生听完报告后，对侨胞热爱祖国和支援革命的热情，表示很欣慰。说及现在讨袁军事转移方向，你三人回来可准备跟夏重民同志往西京八日市，参加他所筹办的飞行学校学习，其他等待后命。当时先生曾指出：“革命事业要靠人心、经济、武力三项。袁世凯称帝窃国，遭全国反对，人心的向背早已清楚。至于经济一项，我们现在亡命海外，自不能不依靠各地爱国侨胞的筹集捐输，以侨胞一向热爱祖国，相信今后必能继续支援，不成问题。说到武力，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曾将清朝的武力转化为革命反清的力量，今天自然也可以把袁世凯拥有的武力，变为反袁的力量。所缺憾者我们使用飞机人才与制造者仍未发展起来，我们如能迅速培养空军人才，建成飞机队伍，当可加速军事上的胜利。最近我已在西京八日市进行筹办一间飞行学校，已聘请日本教师数人，和得到美洲侨胞捐助飞机数架，尔可准备前往，早日学成，为国家多出力。”我听先生这番话之后，心里很高兴，立即表示遵命前往。

* 作者当时系华侨革命志士。

孙中山先生的重视航空事业及培养航空人才，据我所知，早在1902年便已开始。当时，先生在美国搞革命工作，曾资助冯如学习飞行（冯飞行技术很好，在美国飞行协会名列第四名，曾自己设计制造飞机一架，在哥伦比亚市试飞，成绩良好。其后，冯回国，因飞行失事不幸牺牲，孙先生深为惋惜）。后又培养谭根、林福云等：谁料谭根学成回国，竟为龙济光所收买，作了反革命派的工具（其后，龙逆失败，又投效桂系）。孙先生对此虽很愤慨，但是他的航空救国主张仍坚持不懈，对于培养人才也依然不遗余力。后来又于1914年资助陈庆云赴英及张惠长赴美，专门学习飞行。同时并分领各地华侨党员，加意培养有志青年，在国外研究飞行技术，如美洲的吴东华、杨耀昆，日本的杨永安等，均先后在国外飞行学校毕业。

在我赴日前一年冬天（即1914年），原来孙先生曾命日本神户中华革命党分部筹办留日飞行学校，兼办小型飞机修理工厂，选收留日侨胞中的优良党员入校学习。正在筹办期间，不料被袁世凯的驻日公使查悉，照会日本神户当局不准开办。但孙先生没有因此而灰心，于1915年夏，改由中华革命党总部直接筹办留日飞行学校，由先生直接指挥。同时，为了避开袁贼的耳目，采取秘密方式，着周应时与日本飞行协会洽商；商谈结果，由日本飞行协会出名，对外称为“日本飞行协会八日市民间飞行学校”，对内则仍称“中华革命党留日八日市飞行学校”，并介绍飞机师坂本三郎及立花寿一二人，与周应时同为筹办员，校址则设在西京八幡町八日市飞行场。又由坂本三郎介绍，聘吉田安仁为飞行教师，另雇请日本机械工人6名为机械员。至于实习飞机，除由美洲党支部林森经手先将飞机两架，于同年10月间运到日本横滨，寄存横滨侨海联谊社，由严华生保管外，由坂本与吉田介绍在日本购买英制风号飞机一架，作为练习之用。

到了我到达东京谒见孙先生的时候，这间学校可以说是已初

具规模了。由于周应时工作任务很多，不能常驻学校，所以孙先生又加派夏重民前往协助和负责管理校务。至于学员的招收，因实习所用的飞机无多，不能大量招收，故学员名额只规定30名；但当时海外各地党部函电保送到校肄业的青年约有六七十名，孙先生乃按照当时具体情况，将名额分配与加拿大、美国、南洋、日本党部、日本留学生及各省留日本的党员等六个地方，每处5名，学员人选由孙先生亲自圈定。记得当时孙先生所圈定的学员，在加拿大方面为胡汉贤、李赦、马少汉、马栋庭、曾甦汉等5人；在美国方面为雷奇宝、梁焕庭等5人；南洋方面为李新民、沈熙周、冯侠民等5人；日本党部方面为刘季谋、李岐生等5人；日本留学生方面为刘文沾、韩昆等5人；各省留日党员方面为孟季纯、李振兴、鲍兴、马超俊及邓荣等5人〔马超俊因党籍不明，本来无人保送，曾屡次请求入校，并自称在粤因档案被龙济光追捕潜逃来日，但以无人证明，初来邀准，后适遇其兄马星甫（系中华革命党党员）与我们同船回乡，在横滨与马超俊相遇，其兄担保其确系因档案逃日，乃由我们介绍与夏重民认识。马结识夏之后，即多方面骗取夏的信任，得送入校为学员〕。

我在东京逗留十多天后（其间曾与李赦、关保华、及南洋华侨邓子瑜等参加东京党部各同志为庆祝孙先生诞辰举行的公宴会，便送李赦同志前往八日市飞行学校报到。关保华因体质不合，留在横滨。

1915年12月1日，飞行学校正式开学。孙先生以百忙之身，亲来主持开学典礼^①。随孙先生前来的有陈树人、刘纪文、连声海等；护卫先生的有日本警探处人员。至于前来观礼的来宾，在日本方面则有八日市市长，八幡町町长，西京日本社会名流，及日本飞行协会会员等；在侨胞方面，有神户杨寿彭，横滨的苏无

^① 原文如此。

涯、严华生、鲍某等人。首由孙先生训话，谆谆告诫各学员须决心革命，努力学好技术，从事航空救国。继请来宾演说。典礼告成后，由日本技教坂本三郎驾驶飞机表演。八日市市民到场参观的，极为挤拥，许多人争相瞻仰孙先生的丰采，以一见孙先生为荣。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英法等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时机，企图独占中国。怂恿袁世凯称帝，诱其签订二十一条约，及发觉袁世凯地位不稳，又联合英法等国警告袁世凯，声称采取监视态度，同时，于1915年12月，又暗中支持中国各派反袁力量倒袁，准备在混乱局面中乘机取利。孙先生所创立的飞行学校，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办理起来的。

飞行学校课程分为三期：第一期教授的科目为：飞机构造原理、机械动力讲解（包括修理实习），电力学（包括飞机对电力使用），飞行原理（包括飞行操纵术，与地面滑走起飞下降实习）。第二期教授的科目为：飞行学（包括低空飞行与高空飞行），航行学（包括近程与远程航行），气象学，地理学，无线电学。第三期课程为：初级飞行实习，高空飞行实习，仪器飞行实习，特技飞行实习。此外，并有政治课，讲解国内外形势，及中华革命党员的任务等（周应时、夏重民、陈树人等曾担任讲述）。以上三期，每期学习的时间，规定为4个月，一年之内学习完毕。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作最后挣扎，企图以总统地位继续统治。当时，孙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已占领了昌乐、高密、潍县等地。孙先生为了适应讨袁军事在山东的需要，着飞行学校迁至山东潍县，改编为飞机队，负责飞往山东各地作空中侦察，协助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进行讨袁。计飞行学校从1915年12月1日开学，至1916年3月底奉命迁校，共办理了4个月，刚好教完了第一期的课程。至于第二期、第三

期的课程，因迁校和改编，停止教授。

4月初，学校迁至山东潍县，改编为飞机队，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派该军华侨义勇团团副胡汉贤兼任飞机队主任，管理队务（不设队长，团长为夏重民）。原来的日本教师，仍以飞行学校教师的名义，担任飞机队的教官。

是年6月初，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总统，孙先生电居正停止军事行动，同时提出恢复约法，召开国会的主张。得黎复电同意后，孙先生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归北洋政府改编。同年8月底，飞机队奉命结束，所有物资及飞机则寄存青岛，全队队员及教职员，随同华侨义勇团回到上海，听候孙先生安排，只有马超俊一人不听命令，与日本教师立花寿一私往北京，投靠北洋军阀去了。

以上所述，事虽亲历，但以事隔40年，多已遗忘，错漏之处，仍请识者教正为幸。

(1965年)

孙中山派我创办强华飞行学校的回忆

胡汉贤*

1917年12月，我在广州被旧桂系军阀莫荣新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拘捕下狱。1918年1月获释后，孙中山先生因我曾在加拿大各地组织“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①回国参加讨袁的关系（此事始末详见《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拙作《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一文），命我再往加拿大联络华侨组织飞行学校。当时孙先生面示说：你在加拿大组织华侨敢死队回国讨袁，现任务已完成，又被桂系仇视，你可再往加拿大，将回国讨袁经过，向侨众报告；另你对飞行事业已入门（因我曾参加1915年底孙先生在日本西京八日市开办的“中华革命飞机学校”的飞行训练），可在外国再行深造；并可借助外力，组织飞行学校，培养飞行人才，将来回国效力。孙先生给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到加后找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长陈树人联系（陈是1915年底夏重民离加回国参加讨袁时接任支部长的），并叫我经常与国内朱执信、夏重民等联系，遇有特别事情，则向他本人报告。

我于1918年2月19日在香港坐日本邮船赴加。起程前，先在中华革命党侨海交通联谊社香港分社打一电报给加东域多利城《新民国晨报》（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机关报）有关同志。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侨海交通联谊社的情况。该社是中华革命党联络海员的外围组织，参加成员多是海员，总部设在日本横滨，主

* 作者当时系华侨革命志士和“强华飞行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① 有的回忆录称“华侨义勇团”。

持人为严华生（惠州人）、苏无涯（广西人），在香港、三藩市等地设有分社，各主要远洋轮上也设有秘密分支机构，任务是收集情报、运送军火等。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后，该社也改名为海员联谊社，吸收成员范围扩大了，不是海员也可以参加，因而品流复杂，性质逐渐改变了。

28日晨，我坐的船抵达加拿大域多利，有报社同志马杰端、李公武、高云山三人来码头迎接。我向加拿大海关办理入境手续后，同他们三人回报社稍事休息，即往分党部。适是日是星期天，同志齐集，晚上开欢迎会。我将国内情况及军事社（讨袁时在加组织青年党员进行军事训练的组织）同志回国参加讨袁经过，向同志们作了介绍。数日后，我同高云山乘船到温哥华埠（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设于此，随后改为中国国民党支部）。我先见到前军事社社员曾石泉、刘儒堃，有他们两人陪同前往见支部长陈树人，交出孙先生的介绍信，并说明来意。陈通知各党员于是晚齐集党部开茶会欢迎我。我将回国参加讨袁经过，这次来加任务向同志们作了报告，各省同志听后均欢迎我在温哥华埠或B.C省范围内组织飞行学校，唯陈树人模棱两可，未明确表示态度。我在温哥华住了将近一个月，由于陈树人诸多拖延，筹款及寻找建立飞行学校地址等问题，毫无着落。陈拖延的原因是他正在建筑党支部楼房，需款十余万，他怕同时在温哥华筹建飞行学校，又需十万八万，会影响党部建筑的进行。故他想拖延至党部建筑完成后，始行设法。

我为了急于完成孙先生交给的任务，培养飞行人材，回国讨伐军阀，不愿再在温哥华等待下去，即电加属中部各分党部，征求对建立飞行学校的意见，随得点问顿埠分党部来电表示欢迎。点问顿埠是过去军事社的根据地，回国参加讨袁同志最多，群众基础较好。我乃于四月初离开温哥华，乘火车两天先到加中亚拉佛打省（ALLERTA），先到卡忌利埠，与该地分党部黄民章、何

林等见面，谈及回加任务，盘桓数日。又转到列必珠埠，得到黄发文及前军事社同志等的欢迎，应酬了一天，他们对组织飞行学校一事，咸表赞成。接着，我与黄发文到达点问顿埠。各同志见面后，欢迎倍加亲热。过去军事组织的警世钟剧团，仍然存在，且新添了一些有祖国来的新演员，遇有国内外庆典，照常在本埠及邻近各埠演出。我到达后，剧团召集各演员演出新编剧目《袁世凯末路记》，以表示欢迎。在开演前，介绍我报告祖国形势及华侨敢死队回国讨袁经过，我还转达了孙先生对华侨的关怀。以后，又到临近各埠慰问华侨同志。这时加属华侨党员及新联系的华侨群众，多数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的。但致公堂仍然与中华革命党闹对立，在《新国民报》与《大汉报》常有笔战之事发生。保皇会已失势，不敢做声，但暗中还是反对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的。

数天后，马超凡等同志从别埠赶来，在点问顿城分党部召集当地同志开会，我把奉孙先生命来加任务加以详述。大家对创办飞行学校，极表赞成。马光珠同志提出，光点问顿一埠，同志虽有数百，恐力量不足，最好以加中名义来筹办，力量较大，经费也容易解决。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并决定4月召集加中各分党部会议，加以具体议决。

4月5日，加中各省、埠，包括亚拉佛打省卡忌利部、利必珠埠、尾利慎辟埠、市抬珠畔省（SASK）、沙市加寸埠、雷振埠、舞市阻埠、市笔汉埠，与点问顿埠附近列孔埠、列姐埠、草菲罗埠等各分党部均派代表来点问顿埠开会。对筹备创办飞行学校一事，大家一致赞成，但对经费筹措及校址选择等具体问题，则意见颇不一致。最后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即席推选胡汉贤、马光珠、胡秋昌、马本哲、余灼、黄桢良、研石湖、林胜、李仲唐、陆功甫、马才晃、林安、余百炯等13人为筹备委员。俟学校建立后，这13人即为董事，不用再选。以胡

秋昌、马本哲为正副董事长，胡汉贤为校长，余灼为财务员，林安为交际，李仲唐为总务，陆功甫为文书。其他各项任务，也均有分配。

经费筹措办法，分为四种：（1）自由乐捐；（2）加中附属党员每人额捐 10 元；（3）警世钟剧团筹款；（4）收取学费，学员名额暂定 20 名，从加中党员中挑选保送年青力强者为主。由于各代表分居各埠，经常召集开会有困难，乃发动各人即席乐捐。胡秋昌带头认捐加币 1 万元。其余各人量力认捐，合计即席共认捐 1 万多元。以加中党员约 1000 人强，可额捐 1 万多元。两项合计，可筹得经费 3 万多元。此外尚可发动加东、加西等热心同志助捐，于是经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学员学费，每人每月定收 30 元。另外还有捐助实物的。如马本哲捐助小车一部。陆求胜捐助全副修理机器工具。李仲唐、余百炯担任监工建筑机库，等等。

对飞行学校校址的选择，经讨论后，大家认为以沙市加寸埠较为合适，因该埠有公立飞行学校和民办飞行学校各一间，又设飞行协会分会。林安同志在民办飞行学校当机械工人，与该校主持人麦可伦（Maclarem）稔熟，便于介绍接头。于是即席公推林安与胡汉贤两人找麦可伦接洽，并寻找飞行场地。

麦可伦是加拿大沙市加寸埠人，空军驾驶员，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后复员回沙市创办民办飞行学校。我与林安同他洽谈，他欢迎我们同他创办飞行学校。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利用我们的人力财力来发展他的事业。我们考虑到与他合作会对我们诸多不便，经商谈结果，双方同意名义上我们的飞行学校附设于麦可伦的飞行学校之下，名称为“麦可伦民办飞行学校附属华人飞行学校”，以取得合法手续。就内部言我们独立自主，他不得干涉。对内名称为“中华革命党强华飞行学校”，交换条件是麦可伦介绍两个教员给我校，每人每月 500 美金，又由他介绍购买飞

机及零件等物，还由他介绍租一麦园作飞机场，每月租金 200 元。以后我校学员毕业，由他呈请飞行协会分会发给毕业证书，每张证书给他 100 元。这几项计算起来，他获利不少。

有了头绪后，即在沙城成立筹备处，召开首次董事会议，通过我们同麦可伦商定的条件和办法。接着派马本哲和林安前往多伦多埠加拿大飞机厂购机，购得 CN 式教练机一架，加币 5000 元；美式旧式 JZ—6 双人飞座机一架，加币 4000 元。另各种零件及修理工具一批，加币 3500 元。另外，在麦可伦介绍下租给我们的空旷地上（离他的民办飞行学校约 2 公里）建筑机座一间，工作室一间及其他各种布置等。总设计一切费用，共花 2 万多元美金。

飞行学员由各分党部选送，经送往麦可伦学校代为考试，结果选取合格者有林安、余百炯、黄家达、黄臻（即黄荣臻）、余啓成、甄健民、陆露斯、陆求胜、马竞存、张发同、马少汉、梁百平、朱师汉、余锦中、吴心存、胡汉臣、方富谅、李仲唐、朱伯熙，连见习生胡汉贤等共 22 名。另 BC 省、域多利埠选送来聂光汉，温哥华埠选送来的朱仲良，加东多伦多埠选送来吴求革等，因不属加中范围，被选为备取。

麦可伦介绍两位加籍的飞行员给我校，一叫李麦市（Charlie Mases），一叫爹佛西（Auest Wind），还有机械工人转臣（Johnson）等。学员中林安、陆求胜也兼任机械工人。这样，小修我们自己可以搞，大修才要找麦可伦飞行学校或飞机厂。

强华飞行学校原定 8 月 1 日开学，旋接孙中山先生着上海党部办事处来电，知孙先生已于 5 月 4 日向护法国会辞大元帅职到沪。原因是桂系军阀勾结政学系岑春煊与部分国会议员，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制。孙先生不肯同流合污，辞职另图护法。来电要我们联合海外同志，坚持革命，努力奋斗，听候时机回国效力，与军阀斗争，以达护法初衷。我们即提前于 7 月 1 日开学。

开学后，碰到的主要困难是经济问题，因学校开办伊始，在在需要支出。飞机零件经常损坏，需用现款提前向飞机厂购买，尤其是汽油每天耗费量甚大，党员乐捐款项已收足，为规定党员每人额捐 10 元的（共约 1 万元左右），因缴交的先后不一，收到不足半数。于是有接济不继之虞。幸党员中热心者如胡秋昌、林胜等，一遇学校有困难，即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支持，随后清还，才得以勉强维持，不致停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世钟剧团的许多同志，宁愿脱离职业四处演出，筹款接济学校，感人至深，演出剧目又多具有革命内容的。记得有“陈涉、吴广揭竿起义，反击暴秦”、“高丽英雄安重根行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冯夏威以死抗美国”等。尤以冯夏威一剧，最为感人。冯夏威是侨居美国三藩市的华侨，亲受亲见华侨受尽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苛待，而清朝政府又惧外和腐败不堪，对华侨权益毫无保障。1905 年，美国政府又威迫清政府修改和重定《华工条约》（比原来更多限制和苛迫华侨），因而在国内掀起了排斥和歧视华侨的浪潮。冯夏威愤于美帝欺人太甚，又愤清政府腐败无能，毅然归国回到上海，号召国人抵制美货和成立拒约会，并决然留下反美遗书，往上海美国领事馆门口自杀，以死来唤醒国人抗美。冯夏威死后，上海与各地人民开会追悼，激励了反美运动的发展。这一剧演出后，华侨因深受其害，感受最深，解囊捐款者，异常踊跃。

开学以后，学员专心向学，先学飞行原理，次为飞机制造与维修工作，再次为机械与飞机的拆卸与安装实习，最后为飞行训练。为时仅数月，学员多数成绩良好。各处同志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遇有主要成员来校参观时，我们带同他们一起飞游一番，引起他们更大兴趣。于是加东、加西两地不少同志要求把学校扩大，多收学员。但我校因场地及经费所限，不能满足各地同志的要求。因此，有的同志把这问题反映给全加党支部长，指责

陈树人不负责任，未对飞行学校统筹办理，致令各地同志求学向隅。陈树人反而怪责我校不与党支部合作。我们答以支部开始既不支持我校创办，事后又无分文支助，现支部想扩大我校可以，但先解决经费问题，对各同志乐捐之款也必有所处置。陈树人没作答复，以后又提出将学校迁往温哥华埠（即党支部所在地）。学员们纷纷反对，说我们行将毕业，迁校会拖延毕业时间；同时又接漳州粤军来电，说我军不日回粤，要我校飞行员加紧训练，毕业后回国效力。我们将不能迁校理由及漳州来电复陈树人。他反指责我校不服从党纪，诸多挑剔。后他为搪塞加西同志的意见，将聂光汉、高树槐等数人，送到温哥华埠西人的民办飞行学校学习（聂等毕业后，随同我校学员李仲唐等一同回国）。这是飞行学校创办过程的一点小风波。

此后学员益加发奋学习，加多钟点飞行。不久又逢天气寒冷。每年10月以后，当地习假为“避春节”，温度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满地冰雪。飞机着陆，原用轮胎已不能在雪地滑走，于是改装为雪橇，故又多用时间学习雪橇，才能安全着陆。是年冬12月，机场结成冰块，学员林安用雪橇单独飞行，着陆时为冰块所阻，全机翻倒，机损人伤，林安断了右足，飞机重新修理，停飞月余，学校因此大受损失。

至1919年4月开春，冰雪融化，天气恢复正常，各学员加紧练习飞行技术，由初级而中级，由中级而达到专技。至7月间，林安、余百炯、黄家达等，已能单独专技飞行。为着配合漳州粤军回粤，决定把部分成绩优良的学员提前毕业，即送麦可伦学校试飞，认为合格，转请沙城飞行协会发给毕业证书。但该会多方拖延，直至10月，又将届“避春节”，始派机师到校验飞。是时，全校学员均以飞行及格，乃一起发给毕业证书。接到毕业证书后，先打发林安、余百炯、黄家达、马竞存、朱伯熙等五人于1920年回国。胡汉贤、张爱同、余启成、黄荣臻等自费往沙

城省立飞行学校深造高级飞行技术，星期天仍回原校自学维修机械及温习飞行。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许崇智等自漳州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军阀与政学系岑春煊。原来粤军援闽时，附设有飞机队，以杨仙逸为队长，飞行员有李光辉、叶少毅、张惠长、陈庆云、关东华等人，只有飞机四架，人多机少。后孙先生派杨仙逸带领林伟成、黄炳衡、聂开一与在美华侨黄光锐、杨光宇、胡锦涛雅、李逢仙、陈卓林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飞行，又派陈庆云在澳门聘用西人飞机师帮助练习水机。粤军回粤时，以李光辉、叶少毅为飞机队正副队长，率领机队助战。适有华侨蔡湘臣在美发动华侨捐助飞机两架，由在美学成飞行的陈应权、蔡斯渡率机到漳州，遂加入飞机队一同回粤。在澳门训练水机的陈庆云也奉命驾机向桂系攻击。桂系在粤军海、陆、空三方面的攻击下，败退广西。

漳州粤军飞机队与陈庆云等人，各驾机回粤，集中于广州大沙头。孙先生于同年11月29日回到广州，旋为非常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孙先生任朱卓文为航空局长，成立两个飞机队。以张惠长、陈庆云为第一队正、副队长；陈应权、林安为第二队正、副队长。我校培养第一批归国之飞行人员，除林安任第二队副队长外，其余黄家达、余百炯等均为该队队员。

援桂之役，第一飞机队随海军出发广西桂平。第二飞机队出发高雷，追击桂系余孽申葆藩。1921年秋季，桂系已被荡平，广西底定。两队均回广州，集中大沙头训练。第一队统辖在澳门训练之水机十多架；第二队统辖漳州原有之飞机与华侨捐助之飞机。两队人员因争功争利，互相倾轧。航空局长朱卓文从地方主义出发，偏袒第一队。朱是中山人，而第一队正、副队长张惠长、陈庆云及队员多是中山人。第二队正、副队长陈应权、林安及队员多属四邑人。意见一直闹到孙先生那里。孙先生很重视，

曾亲偕粤军参谋长邓铿到大沙头向全体空军人员训话，强调团结对付军阀，并批评朱卓文处理不当，令邓铿居间调解，联系两队飞行人员。

1921年8月，我校接到国内总支转来孙先生电示，令我校所有飞行员与机械员一律回国，准备参加讨伐北洋军阀。我们即召开校董会，结束校务，决定由胡汉贤带领张爱同、黄臻、余启成、甄健民、陆露斯、马少汉、梁百平、朱师汉、余锦中、吴心存、胡汉臣、方富谅等23人先行回粤；留李仲唐、陆求胜等收拾一些收尾工作，随后回国。我们于同年10月底离开加拿大，11月下旬到达香港，闻孙先生已出发广西。我个人先赶回广州，张爱同等13人暂留香港，听候命令。我到广州后，往见夏重民（夏时任广三铁路局长兼广三路警备司令），他说孙先生已出发广西，即将出师北伐，现仍在梧州。他随即同我赶赴梧州，见到孙先生，我报告强华飞行学校创办经过及这次带领学员回国等情况。孙先生指示说，你们回来正好，现航空局正在编集飞机参加北伐，你们可即向广州航空局长朱卓文报到。同时交代夏重民带我返穗转致朱卓文照办。

我返广州后，张爱同等人亦由港到穗，其中余锦中、吴心存、方高谅、朱师汉等人返乡一行。我与张爱同等到大沙头航空局向朱卓文报到，被分发在航空局插队训练。另有未编队的飞行员周宝衡、陈炎长、蔡斯渡等亦同时插队训练。我本人又被夏重民委兼广三局第一分段分巡官，代理总巡官职务。我因一面要回航空局练习陆空联合飞行，故第一分巡官着文书胡卓汉代理。（陈炯明叛变时，夏重民拥护孙中山，把机车悉数开往三水，阻止叛军的调运。叛军袭击广三局，把夏重民枪杀，弃尸于河，胡卓汉则被击断右手，此是后话。）

朱卓文用人唯私的做法，上次虽受过孙先生的批评，但他仍没有改变。这次在北伐飞机队的编队上，他还是偏信张惠长等，

而排斥其他一些人。张惠长因他的第一队实力差，技术低，看到我校新回国的十余个飞行员实力足，技术较他们高，因而想拉拢我们。结果以第一队及我校新归国十多人为骨干，加上周宝衡、蔡斯渡等，编成北伐飞机队。对第二队人员不选用，编为预备队，留守广州。

北伐飞机队以张惠长、陈庆云为正副队长，下分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由陈庆云兼任，小队副张爱同；第二小队队长周宝衡，小队副陈香；第三小队队长胡汉贤，小队副蔡斯渡。三个小队飞行员加上炸弹师、摄影员、地勤人员等共 30 人。每小队配有水、陆飞机各两架，水机因前方未有水机场，暂留广州，陆机随队出发。总队部人员除正、副队长外，主要成员有秘书吴光洲，副官宁克烈、宋绍殷，军事委员雷子定及其他军需人员等，总计全队人员共 300 多人。另编飞机掩护团一团，以张振武为团长。

1922 年 5 月 1 日，飞机队奉命出发，集中于广州大沙头机场。孙中山先生亲偕黄大伟、陈友仁到场检阅，并作训话，大意是勉励大家服从命令，打倒军阀，奋勇当先等。

孙先生训话后，有编留广州的飞行队员陈炎长擅向孙先生请求随队出发北伐。孙先生查询航空局长朱卓文及飞机队长张惠长，均称陈炎长系初由美国返国，未熟悉飞行作战，且素有神经病，不守军纪，故暂留广州后方。孙先生对陈炎长说：前后方均为国效力，俟有需要时，再委任你到前方。陈炎长因心怀不满，随后陈炯明叛变时，他就投靠陈军，还驾机到肇庆轰炸东下讨伐陈炯明的滇、桂联军，为虎作伥，此是后话。

另有朱卓文的爱女朱慕菲，平日在我队搭机飞行，自称为女飞行家，又与出发北伐的飞行员周宝衡热恋，竟请求随我队出发北伐为飞行员。朱卓文支持她的要求。但为飞机队长张惠长、陈庆云所反对，引起冲突，直闹至孙先生跟前。孙先生下令朱慕菲

留在后方，始予平息。这是出发前的一支小插曲。

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以许崇智率领第二军及梁鸿楷第一师和李福林的福军为右翼，由南雄进攻信丰；以参谋长李烈钧率领滇军朱培德部、赣军彭程万部为中路，由南雄越梅岭进攻南安、新城；以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全部为左翼，从仁化进攻崇义，上饶。三路得手后均向赣州会攻。全部兵力约三四万人。我们飞机直属许崇智指挥，但在作战上则配合左、中、右三路进攻。

至于飞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经过；及攻下赣州后，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和叛军激战于韶关，北伐军失败，转入福建等情况，可详见我于1964年4月所写《1922年飞机队讨伐北洋军阀亲历记》一稿，这里不赘。

(1966年)

孙中山对陆荣廷的争取和讨伐

潘乃德*

孙中山先生对陆荣廷的争取和讨伐，我曾参与其事，现将亲历的情况忆述如次。惟我已年逾八十事情又相隔四五十年，难免有错漏的地方。

一、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派我争取陆荣廷

辛亥革命前两年，我在广州读书，由刘古香和古应芬二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员群集香港，商议今后的行动。胡汉民、胡毅生一班人主张联络绿林，待机再起。广西方面着重联络陆荣廷。当时陆是清军的提督，驻在南宁，于是派我和施正甫二人回广西，进行工作。施的任务是联络新军和各处绿林，我的任务是联络陆荣廷和六万大山一带的绿林。

前清光绪年间，陆荣廷被招安出来未久，当帮带兼哨官，奉上级命令到我家乡贵县木格区作清乡工作。我的叔祖潘子材是木格区北一乡的士绅，陆曾到过我家，与我叔祖来往赌博。陆有微时的拜把兄弟陆二孙住在我的邻村，当时陆二孙虽不在家，陆荣廷要到他家认亲拜祖，我的叔祖叫我替陆带路，我那时才十一二岁。陆荣廷在木格区清乡期间，偏听讼棍谭子云一面之词，把大地主邓邦光作窝匪论罪，派兵去铲邓邦光的家，把铲家抢到的东西拿到桥圩公开摆卖，而且还强奸了妇女。铲村时邓邦光不在

* 作者时为同盟会员、护法国会议员、军政府参议，参与联络陆荣廷的工作。

家，他得悉后，就向驻南宁的提督控告陆荣廷，提督批交驻扎贵县桥圩的马统领查办。马统领查明陆荣廷纵兵抢劫强奸是实，要杀陆荣廷。陆和我叔祖已经混得很熟，知道马统领要杀他，就向我叔祖求救。我叔祖托桥圩士绅杨济仁向马统领疏通，马统领答应只要原告不来催逼，他可置之不理。杨又转去疏通邓邦光，叫邓不告陆荣廷而转告谭子云，邓听从了，于是陆荣廷的案就不了了之，免了杀头之祸，是以陆很感激我的叔祖和杨济仁。胡汉民等知道我家和陆荣廷有这点关系，就派我担任联络陆荣廷的任务；我也自以有这点关系，而敢于接受这项任务。

我先返到贵县家乡将这项任务密告并问计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说陆荣廷在越南当绿林时，陆二孙在龙州开裁缝店，常得陆二孙的接济，衣服破烂也由陆二孙的老婆缝补，后来陆荣廷发迹了，就提拔陆二孙在左右做工作。我父亲叫我上南宁找陆二孙帮忙。我和施正甫到南宁，找到陆二孙告以来意。陆二孙说陆荣廷常常谈到他那次在贵县清乡被告的事情，幸亏你的叔祖帮忙才免杀头之祸，对你家很有好感，你去见他和他联络，谅不致发生危险的。于是陆二孙带我去见陆荣廷，在他密室里和他谈话。我说我是奉同盟会之命上来的。我又说孙中山先生很重视他，认为他讲义气，因此派我来联络，希望他能帮助革命。陆荣廷说革命我赞成，但是要看时机，有机会我就帮助。他还谈到他在越南时被法国鬼子欺负和被洋狗咬的故事。他又说本想请我吃饭，但怕别人看到不好，并关照我行动要秘密一些。最后问我旅费够不够，叫陆二孙送我一些钱。这是我第一次联络陆荣廷的情形。

二、我代表陆荣廷去南京见孙中山

武昌起义不久，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先被推为副都督，后来因为都督沈秉堃和另一副都督王芝祥以援鄂北伐为名，相继率兵离去，陆继任为都督，从南宁带领一部分部队到梧州，拟转上

桂林。我和施正甫在广州，就相偕到梧州见陆，目的是想动员陆出师北伐。陆荣廷见到我们很喜欢，还和我谈到我的叔祖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和他谈到出师北伐的问题就有意推托了。他说：“北伐是不是还要广西出兵呢？广西已经出了沈秉堃和王芝祥两部分人了。”最后他说：“好吧，我派你们去南京见见孙中山先生，问孙中山先生是不是还要广西出兵。假如还需要广西出兵的话，广西还有不少困难，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枪械补助。”我们只好同意他的意见。施正甫提出要增加一个刘辉廷，因为我和施都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而刘辉廷参加过防城起义，和孙中山、黄克强等人很熟识，此时刘正在广州。陆荣廷同意了。我又提出要求，请他发给护照，以便在香港订购德造双筒枪 2000 支。理由是地方不精，自己的家乡和桂平、平南一带朋友的家乡都打算组织民团自卫，需要武器。其实是卢殿林想在平南组织军队，托我设法购买枪械。陆也答应了。事后听说郭椿森曾向陆进言，说潘某买这批枪械是想造反的，护照切不可发。陆对郭说，潘某的家世我是清楚的，他是殷实之家，不会造反的；护照还是发了。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想打这批枪械的主意。我和陆荣廷这次接触，觉得他表面上豪爽豁达，实际则城府甚深，手段圆滑，像北伐这么重大的是否赞助革命的关键性的问题，他一推就过去了。

陆荣廷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信，并发给我们旅费，我和施正甫到广州会同刘辉廷一起到上海转南京。刘辉廷和孙中山很熟识，很容易见到。孙中山先生见到我们，经刘辉廷逐一介绍并说明来意，孙中山先生很高兴。他说：“陆荣廷的信我已经看到了，我正想派人去和陆联系，你们来得正好，就派你们去，不必另派他人了。”又说：“陆荣廷是绿林出身，有义气，现在正在广西执着军权，我很重视他。”还说：“你们在广西一方面要联络巡防队，一方面要联络绿林。”说到这里，他以严肃认真的口气说：“你们要特别注重陆荣廷，你们要认真在广西工作，多多和陆荣廷联

络。”我从前在香港同盟会南方总支部听胡汉民说孙中山先生很重视陆荣廷，我当时怀疑也许是胡汉民这些人的意见，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名义说出。至此，我知道确实是孙中山先生意思。我问孙中山先生：“陆荣廷问先生是否还要广西组织北伐军北伐。假如要的话，广西的枪械和款项都有问题，怎么办？”孙中山先生说：“能够组织军队参加北伐，加强革命的力量，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对枪械和款项均无法协助。你们可以回去对陆荣廷说，可以把广西的绿林招安出来，招安出来的绿林手里有枪，就不用担心枪械了；至于款项可以由广西自筹。况且把绿林都招安出来，就不再骚扰广西的治安，款项也易筹了。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我们辞别时，孙中山先生一再叮嘱要我们返回广西做事，多多帮助陆荣廷。我们说：“陆身边可用的人都是一些翰林、进士、举人之类人物，他们对于新人是排斥的。我们回广西和陆荣廷接近是可以的，但是想在陆那里做事恐怕有困难。”孙中山先生说：“你们尽管回去，我写信给你们带回给陆荣廷。”黄克强和胡汉民那时也在南京，我们都会见了。黄和胡也和孙中山先生那样，一再叫我们认真联络陆荣廷。

我们会见孙中山先生后，除刘辉廷有事还要在南京停留一段时间外，我和施正甫即离南京南下。行时，孙中山先生果然写了一封信交我带给陆荣廷。信中很称赞陆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义举，并提及希望我等三人留在广西工作。到了广州，施正甫不愿回广西，只由我一人上桂林将信交给陆荣廷复命，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话，我当然也向陆荣廷转述了。陆见了孙中山先生的信，表面上很高兴，但是一说到北伐的事，他就推托了。他说：“不用再组织北伐军了，因为广西已经出了兵，由沈秉堃、王芝祥带了很多军队出去了。”我以为陆不满意没有得到枪械的补助，因想到我向香港订购的2000支德造双筒步枪已经运入口，我经过梧州时，这批枪的半数已经运到梧州，另一半给陈炯明强留要照

价让给广东。我因向陆建议，可否申请陈炯明将强留的 1000 支仍运到广西，将那 2000 支枪成立一个旅，由刘辉廷任旅长，率领出省北伐。谁知他不但没有接受我这个建议，反而打我们已运到梧州的那 1000 支枪的主意。他说他已经知道这 1000 支枪已经运到梧州，梧州府长莫荣新有电告诉他。他又说莫荣新提及，这样好的枪支应该给军队用，地方团队用这样好枪枝太可惜了。建议用旧枪调换这 1000 支新枪，叫我到梧州和莫商量。至于我们留在广西工作的事情，他闭口不谈。

为了这 1000 支步枪的事，我又下梧州与莫荣新交涉。莫提出以 1500 支大十步枪换我们这 1000 支德造双筒步枪。处于他们的势力之下，不答应也无法把 1000 支新枪运走。我和卢殿林诸人商量之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这时陆荣廷从桂林回到南宁，我再上南宁见陆，陆知我答应换枪，表示满意，并说他还要托我代他购买枪炮。我乘机提出希望能够在他身边做事，以后可以多多为他效劳。他说很好，但目前无机会，以后有机会再说。我又提出希望以广西官费送我到美国留学，他先是满口答应，但接着说待我和财政厅长商量。第二次去见他，他说财政厅长严端说目下没有这笔钱，缓一步再说吧。总之，这个时候我对陆荣廷的印象，觉得他并不是什么豪爽讲义气，而是城府深邃、手段圆滑。

三、二次革命时再争取陆荣廷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案发生，接着爆发二次革命，江西、安徽、广东宣布独立。我赶忙从南宁到广州去，见到刘辉廷、施正甫，联名写信到上海给孙中山先生，报告广西的情况，力说陆荣廷的左右如曾彦、郭椿森之流对我们非常嫉视排斥，而陆思想陈旧，权利之心很重，恐怕对革命不能有什么帮助；但没有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复信。

广东虽然宣布独立，但陈炯明迟迟不敢发动讨伐袁世凯的军

事行动。原因是陈怕广西的部队，特别是龙济光的部队受袁世凯的收买东下袭击广东。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打电报给陈炯明，叫他派一些与陆荣廷有关系的人到广西向陆疏通，希望他帮助革命，牵制龙济光。陈炯明接电后召集施正甫、刘辉廷、苏无涯、刘玉山和我等一班广西籍的同盟会员商谈，问及谁与陆荣廷关系较深，可以担当此项任务，大家又推我。我就于1913年7月8日偕陈炯明派往梧州联络龙济光的代表陈任平上梧州，会见龙济光后，陈任平留在梧州，我则上南宁拜访陆荣廷。我见了陆荣廷，转告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意见，并将陈的亲笔信交陆，陆看了后连说：“这事不好办！这事不好办！”明显地拒绝了。这次争取陆荣廷的工作又告失败，陆明目张胆地帮助袁世凯，镇压了刘古香在柳州的讨袁军事行动，并枪杀了刘古香。又在桂林执行袁世凯的命令，枪毙武昌起义的元勋蒋翊武，完全站在反革命方面。

我见陆荣廷后，在南宁只住一天，就赶忙下梧州转广州向陈炯明报告。经过梧州时知道陈任平已经被龙济光枪杀了。接着龙济光就率兵东下，加以陈炯明的部下钟鼎基等叛变，陈仓皇出走，广东的二次革命就宣告失败了。

四、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主张争取陆荣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流亡东京。我到东京去见他。他一见我就说“这次失败不要紧，我们再接再厉，再来吧。”接着说要派我到南洋筹款。他又顺带问我当时陈炯明派我去广西见陆荣廷的情况。我说：“陆荣廷没有革命的头脑，是不会革命的。他左右的人如曾彦等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变节了，都想做大官。我们不会为陆荣廷这班人欢迎的。”孙中山先生说：“你们看错了，我叫你们去帮助陆荣廷，就是要你们做工作，影响陆荣廷，改变陆荣廷，你们没有耐心，这是不对的。陆荣廷是绿林出身，还是有点义气的，以后你们还是多想办法打进去起作用。”

接着他批评刘岫说：“刘岫也不屑接近陆荣廷，摆架子，总想自己当督军，这是不对的。”

我奉孙中山先生派去南洋筹款，一直到袁世凯称帝，酝酿讨袁护国时才返香港。这时革命党人多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民军，如朱执信、邓铿、何克夫、周之贞、陈策等都进行组织民军的活动。我也潜回家乡贵县联络十万大山的绿林谢旺兴、梁亚忠、亚磊六等，准备组织民军。这时广西已经响应云南的讨袁护国起义，宣布独立。陆荣廷从南宁下梧州，所乘轮船经过贵县时有短暂的停留。我事前写好一信，报告他我奉孙中山先生命在广东广西交界地方组织民军，请他予以协助，持信到他乘坐的轮船投递请见。他看了信走出船头见我，说船里另有客人不方便谈话，可以在船头谈谈。接着他说，讨袁是大家赞成的，组织民军讨袁，他当然不反对，但是希望不要在广西境内组织，以免扰乱广西治安。明显表示他表面赞成暗中反对的态度。这样话不投机，我就知趣告辞。谁知陆荣廷并不就此干休，还派出暗探、贵县伍耀珊到我乡下监视我的行动。伍在乡下放出空气说：“陆老师不许任何人在乡下组织军队，违反了就要捉人。”组织民军是需要款项的，我原在乡下向地方上的乡绅父老筹款，他们曾口头答应，经伍某一说，都缩头了。筹不到款，民军当然组织不成。我觉得在乡下也难以立足，就把组织民军的事情搁下，走往香港。这次组织民军由于陆荣廷的破坏而失败，还是归咎我对陆认识不足，抱有幻想所致。

五、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又争取陆荣廷

讨袁护国战争以袁世凯的暴毙而告终。接着又发生护法战争。袁世凯死后，被袁世凯非法解散的国会复会，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改选。广西选出的参议员有三名出缺。我在广西竞选参议员获得成功。1917年三四月间，偕同广东的众议院议员邹鲁前

往北京报到。途经上海时曾去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对我们说：“国会快要解散了，你们还去干吗？不如南返搞军队罢！”又说：“我就要南下组织政府。”说到这里就专对我说：“你最好先回去疏通陆荣廷。”我和邹鲁都想去北京看看，因而对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还是到北京走一趟，看看情况很快就回来。”

我们到了北京，这时国会因参战问题和段祺瑞发生矛盾，段祺瑞要解散国会的空气很浓厚，我们在北京住了20多天就离京南下了。其他国会议员也陆续南下。

旧桂系军阀借着讨袁护国的机会，占据了广东地盘。当时广州虽在旧桂系势力之下，但仍不失为南方对抗北洋军阀的中心，国会议员南下的目的地是广州。我们到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先生也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护法。孙中山先生到达广州时，旧桂系军阀表面上也表示欢迎。旧桂系军阀头子之一的广东督军陈炳焜曾在黄埔开了一个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群众大会，胡汉民、邓家彦、马君武和我等一些人都被邀参加。陈炳焜先致欢迎词，言词简单，感情也不热烈。接着孙中山先生讲话，大意说北洋军阀毁法祸国，他决心讨伐北洋军阀，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救国救民，还说到海军南下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说完之后，广东省长朱庆澜接着说：孙中山先生南来护法，就要北伐，我们要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伐，我愿将我统帅的巡防营全部交给孙中山先生作北伐之用。参加欢迎会的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森、马君武都相继讲了话。最后胡汉民也要我讲几句，我大意说，孙中山先生率领海军南下，是壮大西南的革命力量。刚才陈督军说欢迎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那就要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伐，大力地支持枪械，支持军饷，使北伐早日实现。朱省长又说把巡防营全部交给孙中山先生率领北伐，尤应促其早日实现。

旧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口头说欢迎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是经过疏通才得到的。当孙中山先生酝酿率领海军南下护法，并

在南方召开非常国会和组织军政府时，曾派胡汉民上广西向陆荣廷疏通。陆最怕要他负担经费，问胡海军和国会的经费如何筹措。孙中山先生对胡作了指示，海军和国会的经费由他自己负责，用不着旧桂系军阀负担分毫。胡据此面告陆荣廷，陆才勉强同意孙中山先生南下，也才得到陈炳焜在欢迎会说那句欢迎的话。后来海军和国会及军政府的经费，是孙中山先生命令粤海关缴交关余解决的，没有用着旧桂系军阀的钱。而朱庆澜在欢迎会上说愿意将广东的巡防营全部拨交孙中山先生作北伐之用，却触痛了旧桂系。因为旧桂系军阀垂涎广东巡防营已久，总想一口吞光而后快，将巡防营交给孙中山先生，不啻抢掉它将到口的肥肉，此事一时成了孙中山先生和旧桂系军阀比较突出的矛盾。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旧桂系军阀才答应拨 20 营给陈炯明带到福建去。

虽然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到了广州，但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却躲在广西，或住在南宁，或住在武鸣宁武庄老家，没有到广州和孙中山先生见面。孙中山先生派胡汉民为代表到南宁和陆联络，希望陆对北伐予以帮助。何以派胡汉民为代表呢？因为那时胡汉民的胞兄胡清瑞在南宁当海关监督，和陆荣廷交情还不错，想胡汉民通过胡清瑞的关系疏通陆荣廷。谁知胡汉民上南宁住了几个月，天天陪陆荣廷打麻将，表面上关系搞得还不错，但是一提帮助孙中山先生北伐的问题，陆荣廷就推托说，广西北伐的军队已经够了，用不着孙中山先生另组织北伐军了。胡汉民做了几个月的工作毫无效果，只好失望回到广州来。

接着，孙中山先生又派古应芬上广西继续做陆荣廷的工作。古的老婆是广西平乐某富商的女儿，同广西也算沾上一些关系。我为国会议员，工作是很少的，孙中山先生要我兼任军政府的参议，也是个挂名的闲差。古应芬上广西前曾到我处座谈，说孙中山先生写了亲笔信交他带去面交陆荣廷，陆现住在武鸣宁武庄，

问我上广西，入武鸣的行程。我告诉古，到了南宁找到广西督军谭浩明，他会派人送你到武鸣去。古不认识谭，要我替他写介绍信给谭，我写了。可是古上广西没有多久就回广州，我去找古询问情况。古说他见到了陆荣廷，面交了孙中山先生的信，陆表面上恭维孙中山先生，实际则不赞成孙北伐，他见到没有什么希望，在武鸣只住两三天就回广州了。

古应芬回广州后，孙中山先生找我去谈话，要派我上广西，继续争取陆荣廷。我对孙中山先生说：“陆荣廷对你的感情还不错，但是陆荣廷左右这批人顽固得很，很难对付。”孙中山先生说：“你先上去吧，做事要有毅力，不要怕，不要畏难。”接着把他的北伐计划大致对我说了，要派李烈钧出师江西，陈炯明出师福建。最后叮嘱我：“你切实对陆荣廷说，我们决不与桂军争地盘，我们的北伐是向江西方面发展，向福建方面发展；不会妨碍桂军在湖南方面发展。我们希望和桂军会师武汉。”又写了亲笔信给我带交陆荣廷。

我上到南宁先找谭浩明，告诉他孙中山先生有亲笔信给我面交陆荣廷，请他派人送我到武鸣去。谭表示欢迎，并邀我到他的督军署住宿，次日即入武鸣。我见了陆荣廷面递孙中山先生的信后，就谈到北伐问题。陆说：“孙中山先生要北伐，怎样解决餉项问题呢？筹组北伐军是要大批餉项的，我看他没有办法筹到这笔大款。况且我们已经派军队出湖南了，何必又要他去呢？”我说：“孙中山先生北伐不是和你们一路，而是从江西方面去，从福建方面去，不但不会妨碍你们，反而可以互为声援，壮大声势，对桂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陆仍推搪说：“我们已经有北伐军了，不必另外组织了，因为枪弹和餉项实在不易解决。”我见话不投机，在武鸣住两日就出南宁转广州向孙中山先生复命。孙中山先生责备我说：“我叫你上广西，就是要你长住南宁。你怎么又匆匆下来，是不是留恋那国会议员？我们还是设法筹备北

伐要紧！”于是他责成我马上返回南宁，以后长住南宁，切实打听旧桂系军阀的动态，对孙中山先生个人的态度，对北伐的态度等等，随时向他报告。最后孙中山先生叹口气说：“陆荣廷这班绿林头，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义气可讲了！但是你还是再上去吧，探听他们有没有不利我们的事情。”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南宁去。

六、孙中山先生决心讨伐旧桂系

我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再上南宁去，仍然住在谭浩明的督军署东花厅里。虽然天天同他一起吃饭，但在旧桂系军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情况下，我能有什么作为呢？只能像闲人一样，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有一天同谭浩明吃饭的时候，同席有谭的家庭教师李子豪对谭说，他好像听到东花厅里有炸弹声，这时住在东花厅的只我一人，明明是暗示我是危险分子。后来知道是谭的参谋长陈继祖怂恿李子豪放出这样的空气，好使谭浩明把我驱逐出督军署。

在我闲住在谭浩明的督军署那段时间，孙中山先生和旧桂系军阀的关系更形恶化。陈炯明带领朱庆澜所交出的广东警卫军20营到了福建，军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而且拥旧官僚岑春煊为首席总裁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拒就总裁职，而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旧桂系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势力大有非扑灭不可之势。我虽然像闲人一样住在督军署的东花厅里，但有些不明底蕴的中级军官，以为我住在督军署里，定是督军的客人，有些来头，因而常到我这里谈天，特别是有些贵县籍的中级军官，以同乡关系，更和我接近。大约是1919年秋末的时候，旧桂系的军官们显得非常忙碌。我问他们，知道他们要开到广东去，准备打福建。他们还说：“是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告知开军事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详

细内容，我相信他们不会无中生有对我说谎。我一连问了几个中级军官，回答都差不多。我听闻之下，知道旧桂系军阀要对接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驻扎福建南部的陈炯明部队动手了。我急忙找个借口说有事要和非常国会接头，骗过谭浩明，立即到广州去。先找到胡毅生把情况告诉他，并由他密电上海报告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复电要我到上海面谈。我到了上海见了孙中山先生如实报告。孙中山先生问我：“是否真有其事？”我说：“我住在谭浩明的督军署东花厅，常和桂军的中上级军官接洽，是他们无意中泄漏给我知道的，不会是假的。”孙中山先生沉思了一会：“你马上到漳州去告诉陈竞存，叫陈竞存准备班师回粤，争取主动。我一定设法帮助他。”

我虽是同盟会员，多少年也是遵从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工作，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我并没有办理入党手续。因此还不算是正式的中华革命党员。这时才由邹鲁介绍办理入党手续。宣誓入党后就起程赶到漳州去。举行宣誓仪式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监誓。宣誓后，孙中山先生又一再吩咐我，到漳州后一定要将旧桂系军阀调兵遣将要消灭闽南粤军的情况详细告诉陈炯明，叫他做好充分准备并从速班师回粤。又说陈炯明可能顾虑枪械和款项，叫陈炯明不要顾虑，一定会设法援助。并指示我，到漳州见了陈炯明之后，就要协助陈班师回粤讨伐旧桂系军阀。我的工作主要是深入敌人后方做分化瓦解和策反工作。他具体指示说：“你的工作主要是运动桂军，在桂军将领中要特别注意做林虎的工作。但是重点要放在中下级军官，因为桂军盘踞广东后，上级军官包烟包赌，腰包已经胀了，打不得仗了，一打就垮。而中下级军官分不到份，心中一定怀恨，运动他们反正就较有把握。”他随即写一封信交我带给林虎，内容大意是这样：“我离开广州住上海专心著作，想你很关心我，现乘潘君过沪回粤之便，托其致意，请与协商一切。”他

又对我分析林虎说：“隐青是个将才，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又缩一缩。你要鼓励他。他湖口发难讨袁一役，震动全国，表现很好，可惜一碰到失败就灰心，将部队遣散，枪械交给别人，没有坚持的决心。你这次见到隐青一定要将革命的形势和一切情况告诉他，叫他不要灰心。”他要我明天，至迟后天就要离开上海。

我从上海到了香港，找到了陈炯明的兄弟陈达生、陈觉民二人，将上海之行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说我要马上到漳州去，又将孙中山先生给陈炯明的信给他们看。陈氏兄弟看了信后说：“我们也要到漳州去，那就一同去吧。”又说：“这次仗一定打成了。”于是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与皖系段祺瑞联络的情况以及陆荣廷与直系冯国璋、吴佩孚勾结的情况大略告我。本来我在上海时已隐约听到孙中山先生与段祺瑞联络的消息，由汪精卫拉拢和鼓吹孙段合作，段的代表许世英曾秘密见过孙中山先生。但是孙中山先生不愿意这事公开，对我便没有谈及。听了陈氏兄弟的话，我才知道不但孙中山先生和段祺瑞有联络，连陈炯明也和段祺瑞及驻福建的皖系军阀有联络，并恍然大悟孙中山先生对多年争取的对象——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这么快下讨伐的决心，不仅由于旧桂系军阀咄咄逼人，阴谋消灭革命的队伍；同时也由于北洋直、皖两系军阀的明争暗斗，孙中山先生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与段祺瑞联系策略。

我和陈氏兄弟经厦门去漳州。到厦门时我问陈氏兄弟怕不怕检查，孙中山先生给我带的信要不要秘密收藏。陈氏兄弟说不会检查。原来驻扎厦门的是皖系军阀李厚基的部队，和陈炯明部队已有联系。到漳州后住在陈炯明的司令部，我面交孙中山的信，当晚就和陈炯明详谈。我说：“我得到可靠的消息，陆荣廷调兵遣将，准备来攻。”陈说：“真有其事吗？”又问：“先生有什么吩咐你？”我说：“先生吩咐我转告你，准备班师回粤，讨伐陆荣廷。枪弹款项，你不用过虑，先生自有办法。先生还吩咐我来漳

州见你之后，从速到桂军后方做策反工作，还写有信交我带给林虎。”陈炯明听了马上问：“先生给林虎的信说些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情况？”我说：“信里只作一般问候，要我口头转达他的意见，叫林虎反正，帮助粤军，还叫我侧重运动中下级军官，假如我能运动桂军反正，或是不逃回广西而留在广东接受改编的话，我也可以成立一支军队。先生指出我们革命，以前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党人没有抓军队的缘故。”陈炯明说：“我已经有了一些准备，但是还不够，还得加紧准备。”于是他叮嘱我要照孙中山先生所指示，切实做好运动桂军反正的工作。并表示对于其他部分军队，他自有办法。最后他问我打算在漳州住多久，我说不打算住太久，越快走越好。

当晚陈炯明还和陈觉民、陈达生商量决定，派陈觉民北上见段祺瑞，接洽援助枪弹饷项问题，派陈达生回粤运动江防司令兼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和福军头子李福林做内应，驱逐桂军。这是陈氏兄弟告诉我的。

我原定第二天要离开漳州，但陈炯明说汪精卫就要到漳州，等汪到来见见面再走也好。于是我就在漳州多住了三四天，陈曾请我吃饭，和粤军将领邓铿、梁鸿楷、洪兆麟、熊略、黄强等见面。席间也谈到对桂军的策反工作。陈曾问我：“在潮汕前线的军官中，特别是当营、连、排长的，有无认识？”我说：“我的胞弟潘乃茂就在刘志陆部当连长，驻在汕头前方。”他又问：“此外还有什么人？”我说：“有是有，但不扎在前方。如营长蒙廷楠、蒙威和好些连长，我均认识；至于不带兵的副官之类更多了。陈坤培师的参谋长莫鲁我也熟识。”陈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在前线。你的胞弟肯听你的话吗？”我说：“为了革命，不肯听也要想办法叫他听吧！”他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运动前线的桂军，不但你的胞弟，其他中下级军官能运动到更好，最好是能够使他们反正，做不到的话，至少也使他不打。”

我到漳州的第三日，汪精卫也到了漳州。当日陈炯明就开了欢迎大会，我和汪见了面，但没有谈什么。汪精卫之来，也是和陈炯明商量粤军班师回粤、讨伐旧桂系军阀的问题。据陈觉民、陈达生兄弟向我透露，汪精卫对陈炯明说：“段祺瑞的桥我已经搭好了，你赶快派代表去联系。”陈炯明告他，已派定陈觉民。

汪精卫到后第二日，我就离开漳州了。行时陈炯明写了一信交我带给林虎。对我说：“信中我不便多说，只作一般问候。一切请你口述。务请他在我们班师回粤的时候响应。”陈炯明并送我旅费400元，至于运动桂军反正的活动费，他提也不提。

七、策反旧桂系的工作

我离开漳州后先回到香港，遇到所熟识的广西同乡苏竹君，他在广东督军莫荣新之子莫正聪旅当副官。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的部队驻扎顺德。他说近来部队调动频繁，好像风云紧急，快有战事发生。我挑动他说，有战事发生正是升官的好机会。你年年当副官会有什么前途，应该找个机会升一级。他向我诉苦说经济很困难，上级长官扒钱很多，但他们都没份，希望我能接济他一些，我就送给他30元，叫他回去最好能够活动带兵，能够带兵，打仗时就有办法了。我知道他和莫正聪旅的帮统黄韬很亲密，便告诉他我不日就到广州，住中法韬美医院，请他和黄韬来找我联系。

我到了广州，住在韬美医院，首先去找林虎，面交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信，恳切的对林虎说，孙中山先生对他希望很大，最好是他能宣布独立，否则至少也做到不打。我特别提到孙中山先生赞扬他湖口起义讨袁的功劳。林虎先问我漳州方面情况怎样，我说有机会他们就班师回粤，陈炯明确实希望他能对粤军回粤有所帮助。林虎说：“看时机吧。”又半开玩笑半发牢骚地说：“国民党在桂军里总不会得志的，不但你不得志，我也不得志，虽

然给我带兵，但是马济快要当督军了，我林虎当得督军吗？”第一次见面林虎并没有作肯定的答复。第二次去找他，他才比较确实地说：“我同意帮助他们，但是要看情况能否独立，假如不能独立，至少我也做到不打。”谁知这竟是假话，后来粤军回师广东，抵抗比较剧烈的还是林虎这部分部队。

我又做运动马晓军的工作。马是桂军的团长。他先不敢和我直接见面，派一个姓韦的代表来见我，我说孙中山先生有话要面告他，接着他才亲自来找我。我把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告诉他，他面有难色说：“我也是个同盟会员，我知道这个工作要做，但是有困难。”我说：“就是不独立，只要把军队不拉走就行。”他说：“这里的军队太多，我这团人无能为力，下命令要我这团人拉走，我就不能不拉走。不如退到广西才想办法吧。”我说：“退回广西的时候已经迟了。”总之马晓军胆小如鼠，谈来谈去都谈不拢。

有贵县同乡梁季芳，在刘达庆军当副官长，我叫他去运动刘达庆，但没有结果。

老朋友刘辉廷，这位防城起义的老革命党，他因生活所迫，没有饭吃，不能不就马济的副官。我和他见面，转告孙中山先生之意，叫他尽力做策反工作，他说他去运动马济的上校参谋长陈良佑，但结果怎样，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报告。

我又运动桂军驻在广州城市的宪兵司令谢冠群，是通过他的副官长蒙显斋接洽的。谢是横县人，是蒙的同乡，蒙早年在广州警官学堂读书，是我的好友，由蒙介绍我认识谢，据他们说共有六营部队，可以不跟桂军走，愿意受编，当粤军将逼近广州市郊时，蒙到我处索取十万元，我无法应付，他说，没有办法则由魏邦平收编，后来他与魏接洽，归魏收编。谢本人离开部队，再后回桂被陆荣廷枪毙。

以上所举的做高级将领和中上级军官的策反工作，都无收获。倒是在香港所遇见那位苏竹君却发生了作用。他回到部队就

来广州和我接洽。他说他们部队的营连长都很穷，上级又克扣军饷，连帮统黄韬都没有钱，尽管他们所驻扎之地顺德是富庶之区，旅部包烟包赌捞得大把钱，但都给莫正聪一人独吞了。大家都很气愤，要打仗的话，大家都不愿打。他已经和黄韬商量好，可以拉到一部分军队。黄韬叫他来告我要我准备伙食费，因为打起仗来，他拉到的部队在撤退时不拉走就要维持伙食，否则没有饭吃就无法维持。我问他到时可不可以扯白旗？他说拉到的部队不多，扯白旗不容易，恐怕一下子就给别人消灭，只有要撤回广西时，他们开到广州就不拉走，准备接受改编。至于怎样改编，他们相信我，由我负责。这点，他们以后真的做到了。具体情况下面我还要谈到。

此外经我运动成熟，后来接受收编尚有盐运使缉私队一个队，枪约 80 支，其队长是欧阳干，广西平乐人，同盟会员。造币厂守卫队一个排，约 30 支枪，排长是潘芝庭，贵县山东石龙人。广东财政厅守卫一个排，约 30 支枪，排长秦某（忘记名字），贵县山东石龙人。

我在广州的策反活动，不知是谁泄漏给马济知道，马济要派兵捉我。刘辉廷知道这消息，他不敢来找我，只秘密告诉我的叔父潘法卿（当时在广州）转告我，叫我千万不要外出，躲在韬美医院里还不致有什么危险，因为这医院是外国人办的，马济的军队不敢进去。自此我的行动不能自由，策反活动的进行就困难了。

八、粤军班师回粤讨伐旧桂系的一些活动和见闻

旧桂系军阀是和直系军阀紧密勾结的。旧桂系军阀调兵遣将阴谋进攻驻扎闽南的粤军，固然是封建军阀争地盘仇视革命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是北方密锣紧鼓的直皖战争在南方的反映。因为闽南的粤军是受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孙中山先生正利用北洋军

阀的内部矛盾，和皖系军阀作某些联络。旧桂系军阀要进攻闽南粤军一方面配合北方直皖战争，攻击和皖系有联络的部队，进一步和直系军阀勾结；一方面又可消灭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扩大地盘，在他们看来，正可一举两得。直皖之战发展得出人意料之外地快，1920年7月初战事爆发，7月18日胜负已决。皖系失败，19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引咎辞职。旧桂系军阀就喜出望外地以为形势于自己大大有利，就赶紧下手，于8月11日下进攻闽南粤军的动员令。粤军得到桂军动手的消息后，也于8月12日在漳州开讨伐陆荣廷、班师回粤的誓师大会。以陈炯明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洪兆麟为第三路司令，迅速回师广东。粤桂两军的战争于8月16日开始。粤军士气旺盛，攻势锐猛，桂军则相反，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一触即溃。旧桂系军阀虽多次调兵增援，在某些地方虽然也进行顽强的抵抗，但终抵挡不住粤军英勇的进攻，终于各线崩溃，到9月底10月初，距战争发生不过一个多月，战事已经进展到广州了。魏邦平和李福林把部队集中广州河南举兵响应粤军，吁请莫荣新率领桂军回桂将广东还诸粤人。10月下旬莫荣新狼狈逃离广州，桂军大崩溃，撤回广西。

由于旧桂系军阀在广东残暴统治多年，平日贪污舞弊，搜刮掠夺，无恶不作，弄得天怒人怨，民愤极大。当桂军崩溃撤退时，人民就自动起来截击桂军，甚至将桂军头目加以痛殴，以泄愤恨。往往有些不是桂军头目的广西人也遭到波及。我曾动员桂军唐伯珊旅的营长蒙廷楠，叫他战时撤出火线不打。他的部队是驻扎东江前线的，我托人和他接洽，他答应了，后来撤到广州时，蒙廷楠就将全营士兵撤退不打。可是全营都被群众包围缴械，蒙被搜身搜出金表、金链、金戒指之类金器，知道他是官长，就拿来杀了。

莫荣新逃走後，其子莫正聰也跟着撤退。莫正聰部的統領黃

雁宾潜逃无踪，部队由帮统黄韬带领。黄韬果然依约将部队人枪400余带到广州，驻扎旗下陶街，通知我前去收编。我到陶街和黄韬及部队见面，用粤军挺进队的名义又将部队收编了。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他也曾指示我，有机会抓到部队的话，就自己带一支军队。我问他用什么名义，他说名义由你自己取。我又问他印信怎样颁发，他说由你自己刻用。“总之做了通知我，我承认就是了。”在漳州时我也曾对陈炯明谈过，假如我能运动桂军接受改编，我要组织军队，组成之后再呈报你。陈炯明口头答应说：“你组织成功通知我，我一定承认。”因此我用粤军挺进队的名义，自封为粤军挺进队司令，并出布告及发电报告陈炯明和魏邦平、李福林诸友军。收编军队之后最急需款项维持他们的伙食。这时粤军的主力未到达广州，魏邦平、李福林的部队则在河南，广州河北市区成半真空状态。魏邦平、李福林、胡毅生常在白鹅潭军舰上聚会。我到舰上找到胡毅生，要他替我设法找钱维持所收编的军队的伙食。莫荣新出走后，魏、李等人推原军政府海军次长兼海军舰长汤廷光代理广东督军，胡毅生领我去找汤廷光想办法，领得1000元暂时维持伙食。这1000元仅能维持三天。幸得这三天粤军主力已经到达广州了，陈炯明也随军到达了。我赶紧去见陈炯明，他说我的通电已经看到知道我收编了一部分军队，他予以承认。问我收编了多少人，我说约500人，但是明天就没有伙食了，到时没有办法部队就会走散，甚至做出骚乱社会治安的事。陈立即叫副官长来和我商谈伙食费，结果暂领得4000元，十天内吃饭问题是解决了。但这部队军心很不稳定，虽然驻扎在陶街，但在街上筑有炮垒，怕粤军来缴枪。陈炯明知道情况，赶忙叫我去询问，我说这支军队军心很不安，最怕粤军寻仇报复，所以在街上筑炮垒自卫。陈说赶快叫他们拆去，我已通知粤军，不得寻仇报复，也不得去缴他们的枪，通知他们安心好了。

我的胞弟潘乃茂（又名潘勤生）前已说过在刘志陆部当连长，驻防汕头前线，接受我的劝告，在战争开始失利时就扯白旗反正，响应粤军。但他只能掌握一连人，粤军叫他跟在后面，收容溃散的桂军，结果连收容的加上原来的共是 200 多人枪，这时也随粤军到达广州，我将之扩编为一营，并入我的粤军挺进队建制，但另住一处，不与黄韬部住在一起。

11 月下旬，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我和黄大伟去看他，他对我说：“你现在掌握了军队，虽然数目不多，规模也不大，但总算有了个基础。你是个知识青年，千万要记着：第一不要包烟，第二不要包赌，第三军队不要住民房。认真要做到不骚扰老百姓，凡是骚扰老百姓的军队，都会被老百姓打的，桂军的下场就是一个教训，你们都要好好记取！你看那些旧军官哪个要得？你们尤其不可学他们的榜样。”

陈炯明在广州将军队整编为八路，我的粤军挺进队编入粤军第三路，我当副司令，部队则开去高州、水东、梅录一带驻防。这八路粤军及其负责人是：第一路黄大伟，第二路陈炯光，第三路陈觉明、副潘乃德，第四路黄明堂，第五路钟景棠，第六路陈小岳，第七路黄强，第八路翁式亮。

至此旧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势力完全被打倒了。但是旧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退回广西之后还聚集力量，企图反扑广东，夺回失去地盘，于是引起粤军援桂，第二次讨伐陆荣廷，我也率领部队入桂。

孙中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取陆荣廷，而陆荣廷对孙中山先生则报之以捣乱和破坏，最后甚至要消灭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后快，终于使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加以讨伐，将之打倒。

（1965 年）

孙中山组织粤军援闽经过概况

杨启明 陈视斋*

我们曾随杨坤如部援闽，兹据亲历见闻的回忆和一些同志提供材料写成本篇，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一、组织粤军援闽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后，当时广东省完全被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盘踞控制，对孙中山先生护法大计阳奉阴违，从中阻挠破坏。孙中山先生为了扩充革命武装力量，遂乘驻闽北洋军阀李厚基侵粤之机，提出组织粤军援闽。其时桂系军阀仍诸多梗阻，在孙中山先生坚持下，桂系终于不得不同意，决定以省防警卫军 20 营为基础成立援闽粤军，以陈炯明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17 年 12 月中旬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暂以广州市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当临时办事处（后改为后方办事处，以兵站部长黄强主持），所有总司令部高低级干部均经孙中山先生同意选用，邓铿（字仲元）任参谋长，叶举任参谋副长，翁式亮任副官处长，吴小铭任军需长，张国华任秘书长，黄强任参议兼兵站部长，张友仁兼任兵站部科长，钟秀南任前方兵站站长。援闽粤军部队一律集中粤东边区，限期三个月扩充整训完毕，总司令部在广州将拨来警卫军 20 营及各项手续在两个月交接完妥后，即重饬所部陆续开往指定地点集中整编训练。

* 作者当时均为粤军援闽部队杨坤如部属。

二、屯兵粤东扩充筹饷

1918年1月间各部队按照指定地点陆续开到的时候，有驻潮属地区警卫军第五营营长杨坤如自动率部请求参加援闽，后经上级批准加入，故此拨来援闽警卫军共21营，因此杨坤如编为第二十一营营长，适各部队集中完妥屯驻大埔、梅县松口各地，总司令部行营随即设在汕头奇碌，部队不仅人数不足，枪支不过五千且品种复杂，子弹短缺。当时陈、邓担心力量单薄难当援闽重任，以此实际情况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后经指示目前解决扩充筹饷问题，必须先惠潮梅各地着手，当地不少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相信一定会积极支持的。于是决定选派人员分投招募，约略记设在惠阳方面叶柏质募得一营，李绍金募得一营，田桥募得一营，钟祝树募得一营，合共四营，以上列四人为营长。龙川方面，张化如募得一营，以张为营长。海陆丰方面，由黄凤伦募得陈炯光一营，陈小岳一营，以上两人为营长，黄凤伦为统领。潮州方面，纪泽波募得一营，刘学修募得一营，共二营，以上两人为营长。在兴梅方面募有一部分，但招募人员和所募人数未详。其招募方法略述如次；能募得400人以上者为统领，200人以上者为营长，70人以上者为连长，30人以上者为排长，所借枪支子弹如有损失的规定赔偿（详细办法遗忘）。这次扩充能够取得成就，表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全部集中以后加紧整编，很快就绪，其时支队番号和支队司令人选略记如下：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步兵三营，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辖步兵四营，第三支队罗绍雄辖步兵三营，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步兵三营，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步兵三营，预备队司令熊略辖步兵二营，游击队司令徐连胜辖步兵二营，其时还有编组卫士队、运输队等，从此革命武装力量壮大起来，不久开进闽西闽南择要驻守，作好进攻准备，总司令部亦同时从汕头奇碌移至大埔三河坝以便指挥。当时军饷是很困难的，闻系从三方面筹来：

①向省方面领取一部分；②是在各地筹集一部分，以东江钨矿税为大宗；③是由孙中山先生在海外运筹一部分暂为解决的（数目多少我们不知、故未详评述）。设枪弹厂于海丰，翻抄子弹。援闽粤军扩充完妥，陈邓即具报孙中山先生，请示等候命令出师攻闽。

三、孙中山先生亲临三河坝经过

孙中山先生得知援闽部队已经扩充就绪，为之大喜，以组织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已达到初步期望，同时预知桂系军阀将必叛变，因此于1918年5月4日毅然辞去大元帅职务，于5月26日亲临大埔三河坝会晤陈炯明、邓铿面授机宜。其时随孙先生同来的有朱执信先生，当抵达时受到军民热烈欢迎，随即召集高级军官到三河坝举行军事会议。在会议中指出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伟大革命重要意义，要求大家上下一致、绝对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在行进中尤须预派宣传人员于所经地方向群众说明这次粤军援闽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的残酷压迫，解除闽人被残酷剥削的痛苦，鼓励和联络他们起来帮助，期使军民更加团结，一定要旗开得胜。会议后孙中山先生又亲至梅县松口各地视察，更加鼓舞了当地人心和士气。孙中山先生约住一周启程返沪，离开松口时，陈炯明、邓铿同军民热烈欢送。

陈炯明、邓铿接着按照孙中山先生面授机宜召开高级干部特别参谋干部会议，订出进攻作战计划，约略记得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兵力约共20营，以许崇智左翼指挥率第二支队四营集中蕉岭，向武平县上杭县进攻；叶举任中路指挥率第一支队李炳荣部三营、第四支队邓本殷部三营，另杨坤如为一营共七营，从饶平进攻松柏关监视平和之敌；右翼邓铿参谋长任指挥，率第五支队洪兆麟部三营、熊略预备队二营、游击队徐连胜部二营，集中澄海、黄冈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还有新编的

叶柏质、钟观树、陈炯光等营作为补给部队跟着前进，各路部队按照计划集中，候令出发。

四、全线进攻战斗始末

1918年5月中旬，援闽粤军第一阶段进攻开始，左翼许崇智部顺利攻克武平，中路叶举部顺利攻克松柏关，右翼邓铿部进攻永定被敌顽抗，猛攻四天相持不下，陈炯明急令许崇智、叶举派队协助。其时许崇智亲率谢文炳、徐军雁两营并叶举加派杨坤如一营前去增援，合力向永定城进攻，经过苦战一天一夜，遂将永定城攻克，是役敌军伤亡惨重，迫使敌军某师冲围狼狈逃遁，我军也有伤亡。在克服永定时由于许率所部首先进城，所以该部缴获武器、弹药、服装、粮食不少。陈炯明接到捷报大喜，即以战役有功立即提升，以许部缴获枪械给予扩编的三营，升谢文炳为统领，杨坤如缴获枪械400支，给予扩编一营，升杨为统领，大大鼓舞了军心。其时闽督李厚基因前方失利大为震惊，急向北京请援增兵企图反攻。

我军进行第二个阶段攻势，分为左、右、中三路。左翼许崇智任指挥，率第二支队4营新扩编3营兵力，分两路前进，一路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一路从长汀进攻清流、归化、将乐以取顺昌，得手后会攻延平；中路叶举任指挥，率李炳荣第一支队三营、熊略支队两营、徐连胜支队两营、杨坤如统领两营兵力共九营，进攻龙岩、南靖，右翼邓铿任指挥，率邓本殷支队三营、罗绍雄支队三营，兵力共六营，助攻南靖进取漳州；另派洪兆麟支队三营进攻云霄、漳浦，从西会攻漳州，各路得手后即乘胜会攻福州。当我军开始进攻时候，敌军增援已到，就全力向我军反扑，恶战数天，只因敌众我寡，左翼上杭被敌军周永桂旅攻陷，退守蕉岭岩前，中路永定被敌军王永泉旅攻陷，并且逼近大埔，三河坝总部大受威胁。是役我军损失很大，游击司令徐连胜在下洋阵亡。但是敌军也损失不少，未敢轻进。陈、邓获悉两路虽然

小挫，但是官兵斗志非常旺盛，立即挥军大举反攻，于是又夺回大埔、上杭、永定等地，遂乘胜疾进龙岩跟踪追击，正在这时浙军童葆暄部陈肇英团反正响应（闻系孙中山先生事前策动的），敌军在此重大影响下，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我军乘胜进攻，于是全线得到胜利，遂将漳汀两州先后克复，总司令部同时进驻漳州。是役以洪兆麟、熊略两部战绩极佳，当即提升洪兆麟为漳汀镇守使、熊略为漳汀道尹。其时闽南江东桥同安方面，闽西沙县顺昌洋口方面为敌顽抗，经战约两个多月不能攻下，以致进攻福州受到阻滞。正在相持之际，适南北议和已成，闽督李厚基根据南北议和停战协定，提出与我军协商，1919年8月向南方派出代表（姓名忘记），我方派出代表叶举、黄强，双方在江东桥附近会议，决定划界停战，协定经过双方签订即日宣布实行，于是援闽战争遂暂告结束。

在此停战期间，孙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先生提款前来漳州慰劳和接济，解决暂时困难，军心受到很大鼓舞。陈炯明、邓铿趁此停战期间亟将所部重新扩编，以便进行训练。由于此次战役中缴获枪械子弹不少，沿途志愿参加官兵又多，根据上述情况立即召开高级干部和上级军官会议，决定进行重新整编。整编结果，全军编为两军，第一军长陈炯明兼，辖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各支队以及梁鸿楷、黄凤伦、丘耀西、陈炯光、杨坤如各统领等所部，许崇智为第二军长，辖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等各支队所部。当时第二军司令部设永安办事处，两军部队分驻闽南、闽西十余县进行训练，从此粤军兵力增加约至二万人，革命基本武装力量果然壮大起来了，为后来回师讨伐桂系军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6年）

孙中山先生组织护法政府的经过

沈太闲*

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策动督军团倪嗣冲等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遂使张勋得乘机扶持溥仪宣告复辟。当时中山先生住在上海，认为国会之产生，是根据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即是撕毁约法，乃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作护法运动。与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连同他所统率的驻泊在黄浦江、青岛等地的舰队，开往广州，通电号召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南下，组织护法政府。我是由华侨选举会选出的参议院议员，在清帝复辟的第二天（1917年7月2日），就响应中山先生号召到了天津。当时津浦铁路已不通车，在候车南下期间，张勋军队已遭到惨败，段祺瑞于7月12日回到北京，重组内阁。他为了羁縻议员，阻止他们南下，首先宣布补发议员岁费（议员岁费依照规定为5000元，在开会期间，已发了1000多元，每人尚欠发3000多元），接着又成立了所谓“经济讨论会”，凡议员加入的每月津贴夫马费400元，当时属于研究系及其附属小派系如讨论会等的议员，根本就不想南下，而属于民党的议员（包括益友社、丙辰俱乐部、政学会及孙洪伊派），多打算南下。但有部分议员，已经到津，听到这个信息，又折回了北京，候领岁费的补发。那时许多朋友都劝我暂时回京，被我拒绝。又有人要我把图章留下，由他代领岁费，我也没有答应。

我到了广州之后，即搬入南关回龙社招待所里，这是中山先生到达广州后，特为招待南下议员而设的第一招待所。这是一幢旧式的大房子，厅房很多，床板桌椅都是新置的。广州多蚊，且

* 作者时为国会议员，大元帅府参议。

为每人备置一顶蚊帐。供给饮食，照料特别周到。直隶的王法勤、广西的马君武、湖南的周震鳞、河南的凌钺、福建的丁超五等已住在这里。那时到达的议员共有 20 多人，因为按照国会规则，必须有全体议员的半数以上出席，才能开会，现在到广州的人数，相差太多，还不到议员总额 1/30。

应如何使国会复会及护法政府如何产生，各议员议论纷纷，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中山先生主张：“在段祺瑞公然破坏约法时期，国家已经处于非常状态，我们应当以革命的非常手段对付之，不应斤斤计较法定人数问题。”大家根据中山先生这项意见，拟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主要内容是：以省及其它选区为单位，原来是那一省或其它选区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不论来广州的人数多少，都以原选的省或其它选区作为一个单位。按照全国选区计：内地 18 省、东北 3 省，加上西藏、蒙古、新疆、青海、华侨及中央学会等共有 27 个单位，只要有过半数即 14 个单位以上的议员到达广州，不论每个单位人数多寡，即可开会。由华侨选出的参议员，当时只我一个人到达广州，也算一个单位，恰巧到达了原来拟定的 14 个单位即可开会的数目（当时北京国会参议院共有华侨议员 6 人，众议院无华侨议员名额）。

开会时是由南下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主持，借广州省议会（旧咨议局）会址开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规则和护法政府的组织法，接着选出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二人为元帅，护法军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大元帅有任免中央部长及各省北伐军总司令之权。非常国会开会后，国会议员又有四五十人陆续到广州报到。在举行大元帅就职典礼时，参加典礼的议员，已有七八十人。

桂系对于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以为是在他们的卧榻之侧，恐怕妨碍他们的势力发展，实不欢迎。但见中山先生既有

海军及国会议员的拥护，又有全国广大群众的响应，也不敢说什么，只在态度上表示异常的冷淡。所以在孙中山根据国会非常会议的选举，于1917年8月在国会非常会议议场举行宣誓就任大元帅职位时，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则在政治上另有企图，既未就职，也不表示辞却，只是淡然置之。而陆荣廷及广东督军陈炳焜在大元帅就职时，不但未曾派员参加观礼，并且未发贺电，桂系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位后，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在唐未到任前代理部长职务，程璧光为海军部长，黄大伟为参军长，我亦被任为大元帅府参议。这时陆荣廷以陈炳焜性情急躁、倔强，恐引起广东人民的强烈反对，调陈为广西督军，以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任。莫到任日，以参议员郭椿森为督署参谋长（郭为政学系干事）。

在姗姗来迟的议员中，有广东议员杨永泰、徐傅霖二人（都是政学系干事）。他们先后抵达广州时，都揣摩出桂系不欢迎中山先生的心理，为了迎合桂系，都宣传这种论调：“我们既然反对段祺瑞毁法，而南来护法，我们必须守法，如果开常会，我们一定参加，因为非常会议也是非法的，我们决不参加。”这种论调得到桂系莫大欢迎。通过郭椿森给他们联系之后，不久莫荣新即发表杨永泰为广东财政厅厅长，徐傅霖为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当时广东的实权仍操在桂系手内，护法政府无权过问，陆本人对中山也是抱着敬而远之态度。）

1918年，吴景濂、褚辅成等一度赴广西与陆荣廷晤面，回到广州即与桂系、政学系等勾结在一起，企图排挤孙中山先生并拥护岑春煊上台，再开非常会议，改组护法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中山先生虽当了总裁，但未就任，随着去了上海。

在这次开会时，吴景濂号召，准备召开第三次常会，限各选

区议员依法在三个月期限内来广州报到，逾期则依法解除其议员职务，由候补议员依次递补。因此议员来的很多，也有一部分是新递补的（这部分议员都无当选证书，只由同乡议员三人出具证明，即准其报到出席），所以出席人数已达 200 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反对改组的。杨永泰、徐傅霖一则为了给桂系捧场，二则恐怕改组政府案通不过，都出席了会议。我在会场上遇到了杨永泰，向他问道：“你们既认为非常会议是非法的决不参加，现在你们为什么又来出席呢？”杨向我笑了一笑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久，杨永泰即被任为广东省省长，徐傅霖被任为最高法院院长。

(1966 年)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部分议员政见的分歧

张少甫

张勋复辟段祺瑞击败张勋后撕破约法，中山为保护约法，号召国会议员，一同入粤护法，当时中山与国会议员的政见是完全相同，一致的。照约法的规定，国会议员须有过半数出席，方得开会。但当时议员中有一部分被安福派拉去当安福的伪国会议员，所以广东护法政府每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如此拖延两三年之久，中山二次回粤，认为护法政府如此情形，势难打开局面，乃组织非常总统。事先在双门底财政厅延请议员聚餐，酒至半巡，中山起立说话谓：“兄弟此次来粤，非为护法而来，乃为革命而来的，诸君如与兄弟意见相同，则始终与诸君共事，如其意见不同，则今日即与诸君分手！”中山未及说毕，议员吕复起立质问谓：“吕复追随中山先生十有余年，中山先生指导没有一次不曾服从，但今闻先生不为护法而为革命而来，试问中山先生：以革命为手段，还是以革命为目的？”中山无言可对，气而双手发颤。张继乃起立骂吕复说：“吕剑秋是什么人！我揍你一顿。”彼此即起冲突，座中劝吕复离席，张继继续发言谓：“国会来粤如此之久，始终不足法定人数，不能选举总统，不能制定宪法，尤其国际上无法取得地位，为今之计，唯有采取比护法还要高尚的手段，方足以推进我们的事业。”一部分议员认为共和国既无帝王，如此不守法律，则国人手足无措，于是吕复乃与议长吴景濂、褚辅成等，当晚离开广州，而留粤议员在三日内组织非常国会，选举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61年)

孙中山在广州越秀区的活动与遗址

黄汉纲*

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毕生从事革命活动，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这些革命活动，有不少是在广州市越秀区进行，在越秀区留下了不少革命史迹。特选其中较重要的介绍于下。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起点——博济医院

博济医院在今越秀区沿江中路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博济医院附属的医学堂，是我国第一所西医学校。1886年夏季，20岁的孙中山，抱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以孙逸仙名字进入这所学堂学习医学，便于后来“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开展革命活动。他在该学堂学习了一年后，看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教学质量较优，且便于发表政治言论，乃转学到该西医书院就读。

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学习期间常对人抒发爱国情怀及革新中国政治的意见。他关心人民生活，对清政府统治下的官场非常不满。他结识了与会党有关系的同学郑士良。郑士良热烈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们两人积极联络更多的人参加革命。这所医院便成为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起点。为了纪念孙中山在这里开始学医和进行革命活动，广州人民在这里用花岗石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碑的前后分别用中、英文镌“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活动策源地”，左右分别用中、英文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

* 作者是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本稿系经调查访问写成。

十一月二日纪念大会立”，1937年把这间医院改名为孙逸仙博士医院，近年又改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圣教书楼

圣教书楼在双门底上街（该楼已毁，原址在今北京路白沙居），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开设，专门售卖《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万国公报》等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书刊；孙中山于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到澳门行医，遭澳门西医刁难，乃于1893年转到广州行医，以同教关系，假该楼为医务所（另一医务所在西关洗基），诊治贫困者，概不取值。由于孙中山医术精明，诊治病人，无不着手成春，人皆德之，尊为“国手”。他广泛结交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革命之运动。又假该书楼后座为密谈时政之所，常在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区凤墀、左斗山等人聚会期间，探讨救国方略。由于其名高学博，当时清政府官吏，尚无疑之者。

1893年冬，孙中山弃医由广州回到故乡香山县翠亨村，草拟上李鸿章（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书，从此弃医人而医国。

孙中山在圣教书楼进行革命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为两年后的乙未（1895年）广州起义打下了基础。孙中山筹备及策划乙未广州起义时，这里又是贮藏秘密文件、容纳往来广州的同志的机关。

乙未广州起义的指挥机关—— 王氏书舍和云岗别墅

乙未（1895年）广州起义，是孙中山亲自组织和指挥的、用革命手段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指挥机关设在双门底的王氏书舍和云岗别墅（均在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内）。其后复添设分机关于圣教书楼、东门外咸虾栏张

公馆等地。

1894年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清政府腐败无能和投降卖国真相，更加暴露无遗，国内人心愤激，革命志士跃跃欲动。孙中山即从檀香山赶回香港，准备利用时机起义。在香港，孙中山与昔日鼓吹革命的同志，联合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成立了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夺取广州为根据地。随后，孙中山即偕同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赴广州，在双门底王氏书舍（通称王家祠）及云岗别墅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外假农学会之名为掩护，由孙中山坐镇指挥，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勤及运送人员、械弹和办理财政工作。

在起义的人力调配上，孙中山除派人联系广东各地会党及广州防营、水师等数千人外，还从香港、潮州、海陆丰、宝安等地会党中选拔了一批人为冲锋决死队，作起义的主力，加上兴中会自己的干部，动员人数较之后来的黄花岗起义还要多。为了避开清政府官吏的耳目，通令各路起义队伍一律乔装扫墓人，于重九（农历九月初九为粤俗扫墓节）前一天乘木船或拖渡至广州，埋伏在广州河面或城郊附近。香港方面的冲锋决死队于同日乘船赴广州，预定于农历九月初九日黎明登陆，凭响号与埋伏广州河面及城郊附近各路起义队伍联系，分路向清政府的广州重要衙署进攻，举义口号为“除暴安良”，用红带缠臂为标志。

初八夜（阳历十月二十五日）各事准备就绪，专候香港的冲锋决死队到广州起事。初九日天未亮，集中广州参加起义的会党、防营、水师等首领，纷纷到王氏书舍领取命令、口号，但香港的冲锋决死队却无影无踪。原来他们在分配枪枝方面发生矛盾，冲锋决死队不肯如愿赴广州。初九日早上八点，孙中山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说冲锋决死队须推迟二日出发。陈少白怕改期风声泄漏，主张解散，候机再起。孙中山同意这个办法，并电止冲锋决死队来广州。这次起义由于兴中会在保密工作上存在缺点，到起义计划前夕被兴中会会员、负责起草讨清檄文（供起义时张

贴公告之用)的朱淇泄露给其兄朱蕤生(省城清平局委员),朱蕤生即向清政府告密。香港冲锋队赴广州日期又由于杨衢云措置失当,致风声外露,为清政府驻香港密探侦悉,向清政府两广总督密告。清政府据报,于初十日(阳历十月二十七日)在王氏书舍拘捕了在广州革命党人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等人,起获械弹军衣等物。香港的冲锋队二百多人,又在接到孙中山电止其来之前,已先于农历初十日由朱贵全、丘四率领,乘保安号轮船赴广州。第二天一到码头,就被清政府捕获40多人,其中朱贵全、丘四在农历九月二十一日与陆皓东同时遇害。事发后,孙中山从广州转移到香山县(今中山市)小榄镇,后经友人协助,登上伪装运鱼草、饲料的小船抵达澳门,脱离险境。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封闭了起义的主要机关所在的王氏书舍。抗战期间,王氏书舍被日军飞机炸毁。1948年,东莞王氏族人在这兴建游乐场。为了使这个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不致因修建游乐场而被淹没,特刻立石碑一方,记载孙中山在这里策划、指挥起义的经过。今天,这方石碑虽然也已不存在,但当年王氏书舍的照片仍在,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当年风貌。

孙中山为六榕寺题词——“自由平等博爱”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离开南京,于1912年5月到达广州时,广州的佛教徒即以中国佛教会广东分会名义,在六榕寺开会欢迎。孙中山与随员胡汉民等出席了欢迎会,并给六榕寺题赠了“自由平等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宗教活动。“自由、平等、博爱”这六个大字,既体现了孙中山“登斯民于衽席”的伟大政治抱负,和建立完美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也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精义,故曾长期悬挂在寺内,供人景仰。

会后,孙中山登上寺内的花塔,一面欣赏花塔的中国古建筑

艺术，一面观览广州全貌，并与参加欢迎会的僧俗人等，一起在花塔前摄影留念。

孙中山为精益眼镜店题词——“精益求精”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期间，曾到广州双门底精益眼镜店（铺在今北京路北段）配了一副眼镜，感到满意，遂应店主人请求，为该店亲笔题赠“精益求精”的四字横披一幅，下款署“孙文”，并盖上印章。店主人把这幅题词视为至宝，挂在店堂中央，吸引不少人前来观赏，使该店生意也兴旺起来。后来，上海精益眼镜总店得知此事，立即通知广州分店将这幅题词送去，配上镜框，挂在营业厅上。

1924年冬，孙中山离粤北上，筹划召开国民会议，途经上海，到上海精益眼镜总店配了一副老花眼镜。他看到自己的手迹被挂在店内，频频点首。宋庆龄解放前又来看过，微笑着对该店的职工说，这幅手迹你们还挂着，很好。孙中山的这幅手迹，虽是应精益眼镜店的请求而写的，把它挂在公开的地方，其意义不仅是对精益眼镜店光学技术人员的赞扬，也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科技人员的勉励和鼓舞。解放后，这幅题词就被陈列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供广大群众瞻仰，并由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仿作复制本还赠该店。

孙中山倡建广州第一公园和越秀公园

号称华南最大城市的广州，在1918年以前，是没有公园的。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军政府大元帅时，倡议在广州前清抚署旧址兴建一座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揭开了广州公园历史的第一页。这座公园由广州著名建筑师杨锡宗设计。原来计划，公园面积前到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后到德宣路（今东风中路），左为吉祥路，右为莲花井，为现在人民公园面积的两倍。园内除广植大树、花卉外，还有喷水池六座、石像四个，大礼堂（兼作

剧场)、古物陈列馆、餐厅、射击场等设施,实为一综合性的公园。但是,由于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后,这座公园便长期停留在设计阶段,直到1920年4月才开始平整园地,以后时建时辍,一直到1921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才得以建成。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园地不断被有势力者蚕食,面积不断缩小,不得不将计划建造的大礼堂、古物陈列馆、射击场等删去,计划中的六座喷水池也只保留一座。

由于这是广州最早的一座公园,故命名为广州第一公园。后因公园位于市中心,又易名中央公园。孙中山倡建的这座公园的诞生,揭开了广州公园历史的第一页。

位于越秀区越秀山的越秀公园,是孙中山于1923年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下令辟建的。越秀山是广州历史上的著名风景区,相传南越王赵佗每年三月初三,都在这里登高,所以又称越王山。山上蹬道,传说是西汉征和年间(公元前92—89年)遗物。明洪武十三年,朱亮祖在山上建造镇海楼(又称五层楼)。越秀山是人们游览憩息的好地方。可是长久以来,却被地方军阀、官僚霸占着。军阀龙济光曾在德宣路(今东风中路)他的督军署,筑一条天桥直通越秀山,严禁行人登山。以后,陈炳焜、莫荣新等军阀,也把越秀山据为己有,人民休想登山游览。直到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于同年3月26日以大元帅训令第44号,命令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李易标,将驻扎在越秀山的军队移往别处,并令行广东省长出示通告群众将越秀山开放为公园,以后不得驻扎军队。从此,越秀山成为中外游人憩息的公园,为后来的开发提供基础,成为今天广州市区面积最大的公园。

孙中山在广东省长公署郑重宣告： “吾国必须统一”

1920年,孙中山指挥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盘踞广东

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后，于1920年11月28日偕同伍廷芳、唐绍仪等自上海抵达广州，宣布恢复军政府。当时，中国各地军阀正在借口联省自治，实行割据，连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有这种想法。当晚在广东省长公署（今越华路）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以大元帅名义郑重指出“吾国必须统一，惟民治为统一之方法，然后可期永久……吾辈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1921年4月14日，孙中山又在广东省财政厅（今北京路北端）开茶话会款待国会议员，出席议员200多人。会上孙中山致词，谓“国民望真共和，已如饥渴，吾人应竭力以应其要求，希望大家少做官，多做事”。

孙中山提出中国必须统一，和为了实现统一，要求人人都革命，多做事，而不是抢着去当官，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民主政治，加速经济建设，培养国力，推动全国统一的主张和办法，在当时确是切中时弊，显示了孙中山“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不断进步思想。

一载总统，千古名垂

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在越秀山南麓原广东督军公署（今东风中路中山纪念堂）。5月5日，孙中山于非常国会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仪式后，即赴北校场（今北较场路）阅兵，以示整军经武，以革命武力为推动全国统一的后盾。受检阅的是当时革命军的精锐部队——粤军第一师，邓仲元师长陪同检阅。

为求中国统一，孙中山以合法政府首脑名义，在外交上，于1922年6月6日发表对外宣言，警告列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在内政上，于1922年6月7日发表“工兵计划宣言”，主张解决国内问题之途径，在于恢复约法，而对裁遣军队之安置，则宜实施

工兵计划。宣言要求把持北京政权之直系军阀，“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编为工兵，以作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依次改编”；如能履行此条件，“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否则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宣言发表后，深得人民拥护。

孙中山虽然身为日理万机的非常大总统，但平易近人，老百姓要见他，他也从不拒绝。有一天，台山归国华侨陈宜禧（在美国火车站当工人，未读过书，但有铁路经营管理经验）听说广州有了大总统，就到广州求见。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内热情地接见他。他一见孙中山就说：“大总统原来就是你孙文。大总统名义不够好，大元帅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位，做个真命天子。”孙中山听了不仅没有半点不愉快，还把总统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公仆，与封建帝皇完全不同的道理，耐心向他解释。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包括总统办公室的越秀楼在内的总统府建筑物被毁。广东人民为了纪念孙中山不朽的革命功勋，于1931年10月在总统府遗址上建成了一座宏伟的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正面前檐下横匾，嵌上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孙中山在越秀山痛惩沈鸿英叛军

1923年4月，桂军总司令沈鸿英受北洋军阀收买、指使，背叛孙中山，以移防西江为名，把所属驻北江部队集中花县及广州北郊一带，4月16日，突然由广州郊区白云山向广州进攻。孙中山事前得到情报，命令滇军二军长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郊及大北门、小北门、越秀山一线。他还亲率卫士数十人，乘汽车直上越秀山镇海楼督战，沿途见驻守小北门、大北门、越秀山的滇军并无作战准备。孙中山直入镇海楼，见范石生正在吸食鸦片，不禁赫然震怒，指着范石生厉声说：“范军长，我命令你警戒这一地区，现在敌人已经迫近，你不但全无准备，并且绝不察觉，置

军法于何地？”范石生见是孙中山亲自到来，手足无措，慌忙起身作立正听训姿势。

孙中山随即指挥卫士取了滇军轻、重机关枪五挺，在镇海楼西边至大北门一带布置好阵地。孙中山步出镇海楼，在城墙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范石生的部队知道大元帅孙中山亲临督战，都配齐全副武装，赶到阵地，参加战斗。不久，孙中山在望远镜中看到沈鸿英前头部队以散开战斗队形快步逼近城墙，在到距离城墙800米，便纷纷蹲下，向城墙放枪射击。敌人放了一轮枪后，见无反应，便向城墙扑过来，到进入约400米距离有效射程时，孙中山才下令“快放”，顿时孙中山的卫士和滇军的步枪、机关枪一齐向敌人发射。把敌人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敌人的后续部队也惶惶溃退。孙中山看清楚这些情况，遂不失时机下令范石生率军乘势追击，不让其有喘息机会。不到两小时，范石生以军用电话来报，克服石井，毙、伤、俘、降敌人甚众，并继续向北穷追。

孙中山痛惩沈鸿英叛军后，遂率卫士返回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在“南堤小憩”发表“勉励国民”的演讲

孙中山生平虽然作过多次演讲，但由于当时录音设备还很不普遍，经录音而又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只有《勉励国民》一篇。

孙中山的这篇演讲，是应上海《中国晚报》的要求，1924年5月30日在长堤“南堤小憩”（今沿江中路195—197号）内进行的。《中国晚报》特派录音技师沈卓吾偕同助手陈以益，携同录音设备从上海到广州录制孙中山的演讲，分别用普通话和广州话讲述。以适应在广州及全国宣传使用。孙中山演讲声音洪亮，内容为勉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革命，努力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富强、康乐的国家。

讲词收录后，由上海亚洲唱片公司制成唱片（录音片），公开发行。由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唱片的发行

甚广。解放后，在广州、香港、中山、上海、昆明都有发现。

孙中山爱护儿童的几件事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到广州，应主持广东女子教养院儿童部工作的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等革命党人的请求，为该部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的横批一幅。这幅横披，体现了孙中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留下了几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佳话。

1924年初，孙中山经常由河南（今海珠区）大元帅大本营乘小轮船过河北，在南堤天字码头登岸，步行经永汉路（今北京路）转文明路，前往广东大学演讲三民主义。一次，孙中山步行出天字码头，前往广东大学，见一妇人抱着一个衣衫破烂，面黄肌瘦，年约六七岁的孩子在路旁哭泣。孙中山立即走上前去看她。原来这个妇人是因为孩子病得快要死了，没钱医治，所以哭泣。孙中山便伸手替这个病孩诊脉，又注意这个病孩的呼吸，诊脉后，对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子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搏、呼吸还好，不会死的。说完，命卫士马湘用电话通知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派十字车把这个妇人和病孩载往留医。

孙中山在广东大学演讲三民主义后，通常都是循原路步行到天字码头，乘船返大本营。由于孙中山来回都是步行，而且时间和路线都有一定，因此每次都有很多人站在路旁，瞻仰孙中山仪容。有一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满身肮脏，不穿裤子，也趁着人多热闹，在孙中山面前转来转去，阻碍了孙中山行进。一个随身的卫士马上上前把孩子推开。孙中山当时面上露出不高兴的颜色，回到大本营，便把这个卫士叫来批评道：“刚才回来时，你把路上的孩子推开，这是极不好的。我自然会让开这个孩子，孩子怎能阻碍我走路呢！他年幼无知，倘若把他推倒了，反而使我难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你可把我的话报告队长，叫他命令全

体卫士注意。”

1924年4月4日，孙中山亲临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越秀山南麓积厚坊）庆祝建校十七周年大会，他在演说中恳切地指出：“要孩子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而且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见孙中山关怀、爱护儿童，是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他发展儿童教育的宏伟构想，则是本自他解放全人类于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政治理想。

孙中山关怀航空事业的发展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其革命家的天才，思想家的远见，和科学家的敏锐眼光，从当时有飞机的发明和使用情况，看到飞机必将成为新式的重要武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讨袁、护法、援闽而组建的部队，都有航空队的编设。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军政府大元帅时，组建了由大元帅直辖的航空处，1920年又把航空处扩充为航空局，使航空部队实际上成为与陆、海军并立的一个军种。

1923年10月，原设在大沙头的航空局因火灾焚毁。孙中山命令将航空局迁设于今沿江中路229号（该建筑已拆毁）。由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大本营设在珠江南岸，孙中山常乘船过江，在天字码头登岸。在沿江中路229号设立航空局，与天字码头距离较近，便于孙中山经常到局视察和指导。为了提高群众，特别是航空人员认识航空事业的重要性，孙中山还特地为航空局题写了“航空救国”四个大字，悬挂局内，以示勉励。

航空局在孙中山的直接指挥和支持下，业务进展顺利，不但扩充了所属的飞机队，而且培训了自己的飞行和航空工程人员，奠定了我国革命航空事业的基础。

孙中山在西瓜园公祭列宁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56人。这些代表一半由各省推选，一半由孙中山指派。被指派的代表有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人，在各省推选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等人。主持大会的主席团由五人组成，李大钊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充满了加强中苏友谊团结的精神。当列宁于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孙中山立即到会场沉痛地发表演说，着重指出列宁的身体虽然不在，但精神仍在，并提议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

1924年2月24日，追悼列宁大会在西瓜园（原为一广场，遗址在今人民中路同乐路以南，操场前街名以东，现为商业及居民区）隆重举行。祭坛上高悬孙中山手书的“国友人师”祭帐，由孙中山主祭。孙中山在致悼词中说，与列宁“……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共轨并辙。敌其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表达孙中山和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革命领袖列宁的革命友谊，和坚决实行三大政策的决心。

（1965年）

潮州金山中学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回忆

张淑岱*

我少时，即景仰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后于潮州金山中学读书时，适先生道经潮安，得睹其言论风采，毕生难忘，兹特回忆，记述于下。

1917年，段祺瑞擅权，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酿成清帝复辟。中山先生为维护约法，乃集合国会两院议员、海军舰队，及西南三省，兴兵护法，于是年7月，护法南行，自沪抵汕头。旋由汕头乘火车到达潮安。潮安各界闻讯，齐赴西门外车站迎接。在军政人士的欢迎下，先生和随员驻跸县署，往谒者络绎于途，莫不欢欣鼓舞，表示对先生的景仰。

翌日，潮州金山中学和各阶层人士，在金山中学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校内遍贴欢迎孙中山先生标语，并悬挂紫红布帷幔，书写欢迎孙中山先生字样。走廊石架上，放置一盆一盆的青松和各种颜色的鲜花。是日早晨，员生均精神奕奕，列队在校外鹄候先生。约8时左右，孙先生和随员，已到达校门，遂由员生向先生立正行礼。随后，由校长郑宗惠、学监廖廷珍等，陪同先生拾级登阶，观览校内藏书楼、玻璃厅、红棉书舍、金山古井等处，并在山坡凭吊民族英雄马发将军墓，后至校务处憩息。9时左右，设在礼堂的欢迎会场，已座无虚席，除学校员生外，潮安上中层人士，汕头等地的军政人员，不少赶来参加。这说明当时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坚持革命的精神，是衷心

* 作者当时系潮州金山中学学生。

拥护的。

欢迎会开始，由到会的人，向先生立正致敬。由校长郑宗惠致欢迎词，大意是说：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二百余年，专制淫威，残害人民。清朝末叶，鸦片战争后，列强相继侵袭，内政腐败，外交失败，更觉江河日下。先生感时局艰危，国事微弱，奋起革命，立誓推翻清朝，屡败屡起，再接再厉，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脱离专制淫威，举国称庆。不意民国建立之后，民主革命，未臻巩固，以致军阀窃国，毁灭约法，民怨沸腾。先生俯顺民意，不得已护法南行，头次道经潮安，我们应该热烈欢迎，表示隆重的敬意云云。

随后，先生从容讲话，因时间相隔已久，记忆所及，仅能记其崖略，挂漏之处难免，但其扼要关键，尚觉记忆犹新。其时先生首先向欢迎群众表示谢意。接着，谈到内忧外患，苦难重重的中国，唏嘘叹息。勸勉员生，跟上形势，学好本领，应以科学结合政治，共负披荆斩棘责任，协力建设祖国，完成革命事业。并斥责军阀窃国，弁髦约法，和贪官污吏的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保卫民主革命果实，维护约法神圣，为国家民族光荣，为祖国兴革出力。其讲话热血沸腾，语语动听，听者莫不鼓掌欢呼，经久不息。

回忆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导师，也是中国革命先行者。他当年的这场讲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段回忆录，仅是先生革命事业的一鳞半爪，在先生的革命史中，聊作为补白之用。

(1964年)

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琐记

张叔俦*

1921年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内分为两部分，一为参军处，一为秘书处，参军长林修梅，参军为吴铁城、徐维扬、林树巍、胡毅生、李天德等，另副官若干人；秘书长谢持（当时秘书长原为马君武，因马与秘书陈群意见冲突，几至动武，中山先生乃调陈群任总统府谘议，调马君武任广西省省长），秘书10人，为杨熙绩、周仲良、但焘、连声海、陈逸川、徐苏中等，另科员书记若干人。是年10月15日，中山先生北伐，随同出发者，参军处有胡毅生、宾镇远、司徒非、邝石等，秘书处有杨熙绩、周仲良、于若愚、彭晟、陈海瀛、陈似、侯腾及我等，拟定先赴梧州，再往桂林，会师武汉。行前参军长林修梅因牙患逝世，中山先生仍如期出发，抵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后，率各处人员乘抚河民船出发，其时有船百数十只，鱼贯而行，中山先生与胡汉民及各侍从副官同乘一船，其船稍大，能睡五六人，尚能直立。开船前一晚，由参军处预先指定翌日宿营地点，并发出口号，其口号为四字。每日未到黄昏，各船即到指定地点停泊，由参军处分发给养与各船自行弄饭，我与于若愚等分任其事。中山先生不喜舟居，每偕侍从副官黄惠龙、马湘二人上岸步行，俟船停泊后，始返船休息。船抵昭平时，县长曾亲来邀胡汉民到县城演讲（按：胡汉民未北伐前，曾在广西梧州各处任教师，故多闻其名）。有时船停之后，中山先生即命副官开饼干，分与各人共啖。一日，我随陈策、招桂章上岸步行，忽闻远处有喇叭声传来，陈策讶

* 作者又名张铸铁，当时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

曰：“此紧急号令也，胡为乎来？不如返船为妙！”及后查悉，知有桂军散兵，潜伏于此，警卫军拟将之剿灭，免生后患（按：中山先生由梧州赴桂林时，由警卫军两团右岸上护送前行，一团为许济，一团为何梓林）。笔者返船后，闻隔船胡汉民向左右曰（胡汉民当时亦有随从二人，一为杜松，后升至团长阵亡，一为黎乐思，后升至旅长，在广东增城附近阵亡）：“先生何往？”左右曰：“已偕黄惠龙、马湘上岸步行。”胡曰：“此地萑苻正多，岂宜轻易步行？”遂偕随从二人上岸，邀中山先生返船，中山先生对于胡汉民言听计从，即此一端，已可概见。翌晨，经平乐之大圩，我与秘书李禄超上岸步行，至圩场，李禄超与我各买一鸡，以手杖挑之，因步行较速，故先到龙门码头候船开来。二人方在码头上闲坐，而中山先生之船已到。先生正欲偕副官二人上岸散步，忽见我等二人以手杖挑鸡，乃微笑曰：“禄超偷鸡呀？”我答曰此乃在大圩场购得，预备返船作晚餐之用，互相一笑而罢。船抵桂林，入城，寓独秀峰下之皇城中，中山先生派胡汉民为文官处处长，吴醒亚与我同任收发及办稿事宜。中山先生与胡汉民、陈少白、曹亚伯、李禄超等同居楼上，李禄超、陈群及我，每好外出寻乐，倘遇搓牌，必深夜始返大本营秘书处，守卫部队见我等归来，例必大呼立正，每每惊醒中山先生。一日先生曾问我曰：“此间深夜，何以尚有人出入？”我不好意思直说，扯谎答曰：“或系警卫队长出来，查视值班者之勤惰与否耳。”此为我第一次向中山先生说谎话，但我外出游事，亦终瞒不过中山先生（胡汉民说的），因自广州来此不久，胡汉民即派张子丹管理电报，张一次欲告假返广州，对胡汉民说，在他请假期內，拟由我专理译电事宜，胡答张曰：“他（指我）好交际，夜间恒外出，一旦有紧急电报，如何处理？”张子丹之请假乃作罢。

一次有美国华侨送蛋糕来，赠与中山先生。该蛋糕径约两尺，高有尺余，中山先生召集各处人员，分尝其味，并当众宣布

曰：“此蛋糕为美国华侨所制，共有两件，其一送与现今美国总统罗斯福，其一则由华侨远道送余者，盛意可感。”语毕，由其夫人宋庆龄切开，请各人吃，并由侍从副官黄惠龙、马湘分送。时粤军师长关国雄卧病不在座，中山先生特叫人捡一件送关，各人得尝中山先生所赐，深以为快。

中山先生初驻节桂林皇城楼上时，原与胡汉民一房间居住，后电召宋庆龄由广州来，胡汉民曾经反对，谓妇人在军中，于军事不利，经先生说明，宋来不是为自己料理私事，胡乃不再反对。孙夫人到后，即将楼上之右边另辟一房，俾胡汉民、陈少白、李禄超同住是室。黄惠龙每言，中山先生每早起床时，头发直竖，许久始平复，由此可见中山先生之体力过人。

某次接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来电云：“大本营军费每月可筹200万。”适张子丹不在，我代译毕，送由胡汉民转呈中山先生，先生阅已微笑谓胡曰：“仲恺魄力大，又肯动脑动身，大本营军费无忧矣。”盖广东后方，最拥护中山先生者，一为参谋长邓铿，一为廖仲恺也。

中山先生驻桂林时，稍暇即召集各处军政长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由党务处长陈群，秘书处科员陈海瀛、陈似分别记录。演讲毕，各人将记录呈中山先生核阅，修改付印后送各军政长官传阅，原稿由陈群保管，送余的由我存贮。不料到韶关后警卫军之副团长华某叛乱，陈群所保管的三民主义演讲原稿，不及携带失去，已印发的亦因辗转行军，未有好好保存。后来出版的三民主义等书，乃系后期中山先生讲述，黄昌谷笔记，胡汉民及林云陔等遵照中山先生所改正编成，而非中山先生初期所述者。中山先生于暇时辄好靠在帆布椅上阅书，书架上英文书籍亦不少。

大本营在桂林未改道北伐以前，所有电报密码，原由秘书李禄超管理，李常交我翻译。及胡汉民介绍张子丹来秘书处工作，

张乃代李禄超管理电报密码，并指定我同负译送之责，盖我好冶游，张子丹则极少外出，二人合作，如遇紧急电报，至少有一人在，可随时翻译呈阅，不致误事。在桂林时，因李禄超亦好冶游，见其每日必将大衣存放收发处。翌日，瞰胡汉民外出，始将大衣携回楼上，恐中山先生及胡汉民查知责备。同事素知李禄超惧内，有意捉弄之，乃伪造密码（总密）电报，放在李禄超桌上。该电报云：“闻兄在桂林纳妾，尊嫂闻悉，拟来桂，弟阻止无效，特闻。”下署一“中”字，李禄超一面译，一面心惊，及后反复细阅，觉此电报无拍来地址，又无日期时间，知系伪造取笑，心始释然，后知为我所伪造，相与一笑。嗣禄超将此伪电寄与徐苏中，附函谓有人冒兄名字，假以一电报与弟，后查知为伪，胡将寄兄，以博一笑。乃徐苏中竟小题大做，拍电与大本营文官长胡汉民云：“中山先生密码，应如何慎重保存，乃有人视同儿戏，请彻查究办。”等语。我译毕，送胡汉民，胡即交与李禄超，并问此事何人所做，我不敢隐瞒，直认不讳，胡汉民亦无所表示，事遂作罢。

中山先生曾命胡汉民将大本营条例略予修改，并设幕僚处、党务处、供给局，及国民银行等，以蒋作宾为幕僚处主任，陈群为党务处主任，李纪堂为供给局局长，伍于簪（此名或有记错）为国民银行副行长。我奉派在大本营文官处照办原有工作外，兼办该处会计事宜，故与国民银行人员，接触颇多。当国民银行创办之始，伍氏拟具该银行章程，送呈孙中山先生核示，依公文程序，须经大本营文官处先阅，有时加具按语，方呈中山先生核办。文官处对该银行章程薪给一项，认为过高，曾有“行长之薪给多过部长，职员之薪给多过部内职员”等按语。事后伍氏知之，大不高兴，因此辞职。伍为陈少白介绍，陈对胡汉民原有意见，竟因此亦辞去顾问一职，中山先生留之不获（陈少白在晚清时与中山先生及尤列、杨鹤龄，同称四大寇，时中山先生聘陈为

大本营顾问)。中山先生乃在皇城楼上为陈钱行，并邀胡汉民作陪，中山先生当时因不知陈胡互闹意见，因有此举。而陈少白愈不高兴，翌日遂偕曹亚伯由桂林返广州。

未几有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派代表姜登选来，与中山先生接洽，相议机密事宜，并携张之相片，送与中山先生。该相片我曾见过，是穿上将军装，佩剑，两撇胡子，中山先生当时即派姜登选为参军。不久，姜登选返东三省复命，旋段祺瑞亦派徐树铮来与中山先生联络。徐别号又铮，虽为武人，然对于文艺，夙有研究，其返至广西平乐时，曾以一明信片寄胡汉民，大意致谢其招待殷勤，内附七绝一首，我犹忆其末句云“又抱残花过一年”。盖当时树铮由水路返梧州，舟经平乐，因宿娼而停留一晚，故有此句。

陈人鹤亦好冶游，在桂林市库街，见一店有女子坐柜面，惊其绝艳，不断前往该店购皮箱，久之，皮箱堆满楼上。一次，女子笑问人鹤曰：“君何以用许多皮箱，即使富有，亦不能用如此之多，岂代人购耶？”陈人鹤直白购皮箱实图晤叙之意，女子感其诚，竟以身许。陈即纳之为第五妾。一日，人鹤妙想天开，携皮箱两个，送与中山先生，并曰：“送与先生盛银纸。”先生笑却之曰，余哪有许多银纸存放，人鹤改口云：“送与先生盛三民主义。”中山先生一笑纳之。

(1963年)

孙中山先生北伐随军记要

张铸铁 陆壮游*

我癖好近现代史，辛亥以来参加历次重大事件，稍有纪述。孙中山先生 1917 年的初期护法及 1925 年的北京治丧，尝参与其事，著有《天南护法记》及《孙中山先生辞世记》各 4 卷，凡 30 万言，当时事实，不计其大小，以至图表摄影等搜罗无遗，未及印行，遭倭寇之酷，片纸不存。30 年前在白下，遇当时大本营秘书汕头张铸铁君，他始终其事，日夕随孙先生左右，目睹一切，当请其笔录大概，我为之润饰并加注释，因张君是党员，故以总理称孙先生，不为改削。原记中亦有极微细之点，好像与军政无关者，但亦可以看到孙先生的真正生活，均一字不遗的录出，供治史同志参考。以下均张君之所述。

民国 10 年（1921 年）10 月 15 日上午，当细雨霏微、军乐悠扬声中，在广州市总统府随总理乘汽车赴天字码头（按我于 1917—1918 年在广州时，全市无一汽车，仅长堤有马路一段可行人力车，其余城内外各街，路上交通仅有轿子。彼时孙先生外出，亦乘便利的藤轿。乃不及数年，在军府主持下，建设猛进，全市可通汽车矣），登宝璧舰，取道梧州桂林，誓师北伐。舰上职员分文官处及参军处两组，由参军处负责处理一切事务。舰行未久，忽然发现舰上有人混入，众骇然，后由参军处严查，始悉有党员欲乘舰赴梧，事前未通知参军处，故发生骚乱，旋告宁息。是日参军长林修梅（湘人）因牙患逝世，说者以行军折将非好征兆，颇以为虑，然此不过惑于谶纬术数之学，殊不足以动摇

* 张铸铁，即张叔俦，北伐时任大本营秘书；陆壮游，本文笔录者。

总理大无畏精神也。按国民党办事，纪律秩序，向不甚佳，至主帅舰上，有人混入。至于少数党徒之欲趁舰赴梧，并非贪小便宜，实因缺乏川资，不得不如是。据我目睹，国民党旧党员之最初加盟者，大都抱救国之愿，艰苦卓绝，在清末时躬冒万难，出生入死无论矣，二次革命后（1913年）以至民国16年（1927年）以前之数十年间，亦大多过非人之生活。在上海工作之人数最多，西炮台之碧血已成渠，其幸存者莫不面有菜色，隆冬出门，往往仅穿单长衫一袭，相嘲曰“扯旗杆”。即高级中坚同志，困苦亦同。沧州张溥泉（继）曾位至国会议长，及亡命东京，亦每日汲水自炊也。当护法初期，军府初立，收入毫无，四方党员之赴义岭南者，限于环境不得效力机会，伏处客舍，困顿万状，竟至数人仅得一粥。后曾任南京市市长之何民魂，笔名啼红，某日由人介绍以所编剧本托我售于报社，一日乘道过访之，何在床上揖余曰：“对不起，无裤不能起身也。”又前任甘肃行政监督专员之胡抱一，当时因在穗落魄，单身步行至湘之衡州，复不遇而归粤，中途遇盗，一物不存。这样遭遇，几乎每个党员都碰到过，不胜枚举。

舰抵梧州，总理驻节于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所建之耀武上将军行署，随行人员亦同居署内。总理即电南宁陈竞存（炯明）来梧商议出发事宜，待之数日未来，总理以军事重大，不便久延，即亲自赴南宁，同其返梧。抵署时，见竞存衣绒单衫，戴眼镜，持手杖，昂然并总理肩直入。说者谓竞存之跋扈，早酝酿于征服广西时期矣。孟子主张观人由于眸子，证之于陈炯明而益信。我于1917年秋某日乘军政府之专轮往黄埔见孙先生，适与陈炯明同舟，时陈方失职闲居，孙先生颇奖掖之。舱中仅我与陈二人，因与纵谈时事，见其阴鸷深沉，与其他同志之豁达开朗大不相同，御蓝色之眼镜，眸子异人，一望既知为非易与之人物矣。故我所制荔枝词中，有“枚叔（章太炎）谈兵常跣足，溥泉（张

继)读史发如蓬,珠江月夜烟波上,早识竞存志不同”之句。

总理赴南宁时,适容县县长赠总理沙田柚两大箩,各同寅以总理外出,该柚弃置可惜,争欲一尝土特产为快。诂柚性过寒,同寅多食者均感腹痛。而当时赠与孙先生的私物,同僚敢擅自分食者,足见孙先生对僚属之宽容及上下之融洽也。

总理驻梧时,曾得张雨亭(作霖)函,表示愿与总理联络并附照片,并派人来桂接洽一切。按处大事者,必包容万方,当时北方军人如张段等皆来归,孙先生优容策勉之是也。及1925年孙先生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梁启超即据此指责孙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大书特书于《晨报》。翌日梁来行辕致唁,我时任治丧处接待,当时以此严诘之,梁面红耳赤,俯首无言,时我年少气盛,加以观者如堵,人人皆称快。梁狼狈不堪,汪精卫出任调解,始得退出。

总理与竞存商议毕,即向抚河出发,由警卫团长许济、何梓林二人担任警备事宜。每日宿营地点暨特别口令,先一晚通知每船,给养预日分发。大小船数百只,均由参军处指定。与我同船者为于若愚(哲士)、彭晟(藜青)、谢启(尹先)等三人。船甚小,除船夫外,仅可带杂役一人供炊饭,杂役殊钝,乃约哲士分担工作,每人炊饭一天。我于工作完毕,即取衣箱暂作小桌,推篷透光,草随军日记数百字。

船行时,各同寅以蛰伏船中,殊觉苦闷,当清晨船未起碇时,即登陆沿岸行,领略山景。总理暨文官长亦均舍舟而陆,参军处派警卫团一部分,先行警备,复派一部分在后拥护,沿途安逸。至抵达参军处所指定宿营地点,即暂事休息,待船到始下船。因溯江而上航,经各滩由船夫牵缆引,船比人行为缓,故陆行者每在指定宿营地点待船来也。

船抵昭平,县长暨民众开欢迎会。胡展堂(汉民)先生在县城购布鞋,折枝作杖,有时在岸上小憩,取饼饵作午餐。一日,

余偕陈策（酬硕）、招桂章沿岸行，忽闻在后有喇叭声甚急，酬硕愕然四瞩，余骇询之，云系紧急号令，后方似有异动，嘱余缓行。未几警卫团至，始悉乡人报告附近有土匪蠢动，经军队沿途搜索，已逃窜无踪。

总理沿江而上到达泊船地点，即偕副官黄惠龙上岸巡视，借查民众风俗，顺便浏览风景。时平乐一带，以地方甫定，土匪仍出没无常，总理船先泊岸，乃上岸巡行未几，展堂先生船亦至，得悉总理已上岸，遂邀之返。

连日陆行，颇有倦意，因卧船中。将抵平乐时，舟子忽指沿岸峭壁谓余曰：“此马山也，在粤西极为有名。”余仰观之，船之右岸，峭壁寻丈，平坦如雷劈，洵为巨观。壁中有石凹入，成一马形，若伏时将起状。舟子云：“山壁共有八骏，此不过八骏之一耳。”

徐又铮（树铮）于民国10年岁杪，曾赴桂林，与总理暨展堂先生有所商榷。濒行时，舟经平乐，有明信片寄展堂先生，附岁暮书怀二绝，余当时曾录存，现尚记末句云：“又抱残花过一年”。又铮于军事倥偬中，不忘韵事，亦足述也（原注：沿抚河一带，仅桂林与平乐有妓馆）。又按旧社会不以挟妓为可耻，而反视作风雅，徐树铮日必御二女，对客赋诗，以此为自豪，奉使欧洲时，还挟姬人以周旋于宾客间。其实人之立身，非但不应腐化，就是诗，亦不足留恋。

舟经大圩时，余偕蒋作宾（雨岩）、孔庚（雯轩）等约十人同行，时用早膳已久，各人均感腹饥，因赴圩集小馆觅食充饥，霎时盘罄。行经龙门时，余约李禄超往圩集采购食物，以备晚餐。至圩无物可购，仅各购鸡一只，用杖挑之，徐行至指定宿营地点码头上待船。未几，总理船先至，总理立船首，见禄超与余各手持鸡一只，微笑云：“禄超偷鸡呀！”余即答曰：“在数里圩集所购得，用以作晚膳者。”相与一笑。孙先生的风趣，于此可

见一斑。

抵阳朔时，渔舟错杂，鸬鹚满滩，斜阳倒影水上，幻作片片金鳞，绝好一幅画图。舟泊阳朔城畔，城近水处，有削壁寻丈，壁上擘窠大书二字，笔画遒劲，陈无竞曾经有诗咏之，惜已忘却。

城内有山极大，山下有岩，俗名仙人岩，余同黄惠龙、马湘等往游。岩内深邃绝黑暗，可容千人，洞高七八尺或丈许，石钟乳倒下垂，触目皆是。惠龙以电筒为导，行数十丈，咸有戒心，遂折回，当时未穷其境，颇以为憾。昔人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时尚未到桂林，不能引为比较。然山势奇绝，嶙峋怪状，他省诚不易见也。

抵桂林，寓皇城，布置颇整洁。当筹备时，系由王乃昌集议发行铜元若干作筹备费，总理颇赏识之，派作大本营参议。大本营即设于皇城，城内建筑广逾数亩，余与薛青寓于楼下，总理与展堂、少白诸先生寓于楼上。未几，孙夫人由粤来，总理遂辟楼上右边余地作卧室，由副官黄惠龙、马湘每夜轮值。黄对余言，总理体质强健，精力过人，倘清晨见头发竖起，如怒发冲冠状，即知其工作之忙矣。

展堂先生与少白先生因组织国民银行事，颇持意见。嗣国民银行成立，总理派伍某为行长，是少白先生所介绍，当拟具该银行章程，呈报备案，各职员待遇，比较其他职员为优，展堂先生在预算表上批云：“行长俸给高于部长”。事为少白先生所知，认为有意挑剔，怫然不悦，折返广州。总理挽留无效，遂与钱行，而曹亚伯亦相率离桂矣。（按：胡汉民察察为明，器小不能容物，对于患难之交的陈少白还不肯放松一步。）他最讨厌政客孙洪伊等日扰孙先生左右，先生每避汉民而容合众流，汉民不悦也。他自己亦纵容家人胡毅生辈贪污作恶，对别人决不宽容，刘基所谓有相才无相器，汉民即明初胡惟庸之流亚欤？其专断骄横，甚至

可比杨秀清。至于陈少白既不接受别人批评，更不知自我批评，意气用事，一盘散沙，甚可慨也。

在桂林各军队，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辖李明扬、赖世璜两师），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一时军容甚盛。

展堂先生时为文官长，每日，天未明即起，洗漱后，作柔软运动，再进牛乳鸡蛋，旋赴办公处披阅公牍，每朝必拟密电报告若干纸，交余译发。午饭后，屏却随从，往粤军总司令部与许汝为总司令下棋，弈毕返部，下午略有宴会，每日率以为常。

除夕，桂林下雪颇大，余晨起登楼，开窗远眺，独秀峰、叠綵岩、观音岩诸山，均为雪盖。顿成银世界。桂林地处南方，御寒设备甚简单，卧室内亦每为朔风透入，寒气砭人肌骨。未几，太阳当空，积雪全消，曾有除夕咏怀绝句四首，仅记末句云：“一天风雪压吟肩”，盖纪实也。

陈人鹤（群）奉总理派为党务处长，前期出发桂林，寓凤凰街5号楼上，与吴醒亚、费哲民同居，地方轩敞，余时过从并立独秀诗社。休沐日，即约同寅在寓唱和，多作闽派诗钟，极一时之盛。与会者，均属各省名士。事后诗社扩大，或迁往越台酒家，或叠綵岩，与会者众。4月返师时，此会遂无形取消矣。

独秀岩在城东明靖江王旧邸后，旋改贡院，山前原有宫墙，东华门、西华门分列左右。从棘墙右转北数武即山麓，平地孤拔，树木苍秀。旁无坡阜，周围约数里许，高数十丈，距余室后仅十丈余，为桂林名胜之一。时从总理登临也，寻石级登50步小憩，鼓勇而上，又50余步，汗浹气喘，而总理反安然若无事，足见其精力过人。半山有庙宇可息足，憩石磴，俟喘止即再登，每十余步一息，螺旋而上。石壁皆有题诗。历320余级，至其顶，眺城内诸峰林立，莫可名状，真奇观也。

秘书李某甚惧内，在桂林时，颇好冶游，有所暱，每于清晨

返时，即将大衣存余室中，旋上楼，俟饭后再下，盖防展堂先生察觉也。一日，余造密码电报，放在李某桌上，电报云：“尊嫂闻兄在桂林纳妾，拟来桂，弟阻止无效，特闻。”下署一中字。李某返公时见桌上电报，即行翻译，译时脸红不已，余在旁暗察，盖知其已受刺激过度也。旋将电报细察，觉电报上无有效日期及发电报地点者，始悉伪造，并知为余所假也，相与大笑，即将电寄徐苏中云：“有同事拍余一电，时余颇骇，后察其伪，故寄兄同付一笑。”未几，展堂先生举以付余，并询此事，余自认为与李某开玩笑，事遂寝。

在桂林时，美洲华侨馈总理以蛋糕，径约二尺。总理即柬约文官处、参军处同志聚食，由总理报告赠送之经过并由孙夫人持刀亲剖，交由副官分赠各同志，聚食一堂，备极一时之盛。时关杰卿师长以卧病不克与会为憾，嘱余将糕交吕春荣带返。当时文官处同寅陈无竞、林轼，均有赐糕之咏。

总理于军事余暇即召集各同志在礼堂讲三民主义，当时笔述者为陈人鹤、陈海瀛、陈似。述毕，呈由文官长传呈总理，加以修改。乃取陈人鹤所述者，即批付梓，分赠同志。韶关之变，书遂遗失，不可复得矣。

办公室下，有卫士数名，出入必呼口号，立正敬礼。卫士站立地点，距总理室甚近。余每于文官处同寅出外宴会，深夜始返，卫士呼口号时，声颇宏壮，当总理熟睡，亦为警醒。总理向副官查询，何以深夜尚有许多人往来。余深自惭愧，此后夜返时，先嘱卫队勿呼口号，致扰总理清梦也。

总理赴桂林时，带有象牙棋一副，暇时即邀同志弈一局。余每与陈少白先生弈，多数负局。嗣少白先生与展堂先生发生芥蒂，偕曹亚伯匆匆返粤，余弈棋亦辍矣。大本营经费，全恃廖仲恺先生在后方策划，接济无缺。然仅为普通一般费用，倘至战争时期，费用尤多，即仲恺先生一人亦未易肩此重任。时竟存于北

伐颇不赞成，此间对于筹拨经费屡电竞存协商，均未得要领。一日，忽有电来，云允代筹军费 1000 万，军械若干。总理阅电颇喜，然竞存终为金壬所挟持，遽而反悔，此不独为竞存惜，亦为党国前途惜也。

时湖南督军赵恒惕，事前与总理颇有接洽。总理莅桂林，即屡电赵先行出师，收复武汉。赵复电，每以饷械支绌为辞。嗣派参军胡毅生，副官宾镇远、王文翰与赵接洽，胡参军等至衡阳，先用电报往返磋商，亦无结果。嗣悉其实与北方政府勾结，虚与大本营委蛇，总理毅然回师，取道韶关北伐。

在桂林未改道北伐之前，先派粤军一部分分赴柳州一带巡防；总理在桂林处理完毕，即下令改道北伐。

由桂林沿漓江自下，师行极速。忆从梧州抵桂林，为期 22 天，每日登陆旅行，殊感兴趣，并可随意赏览各处风光及名胜。此次由桂抵梧，船行仅四天半。余与展堂先生、李禄超、彭蘅青同船，展堂先生除阅书外，即邀禄超与余弈象棋。一次展堂先生与余对弈，禄超在旁观局，余连输两局，第三局余占优胜，展堂先生势将败北，乃连吸纸烟，苦心焦思。余偶大意，展堂先生转败为胜，色然喜。弈毕，余与禄超在鹞首闲谈，禄超谓余曰：“汝完全无心弈棋。”余笑曰：“弈棋属游戏事，似不必在此争胜负。”相与一笑。吴稚晖每对人说，成大事者，得陈平张良不难，惟萧何则不可多得，萧何必代主人负责，有雅度而无野心，故能成吐哺之功。胡汉民居萧何之位，而襟怀不称，事事认真，不肯吃亏，弈棋小道，还不肯让人。他自后卒殉于一局之棋，棋局未半，棋手已寒，亦千古棋史的奇闻。说者多惜孙先生之中道崩殒，不及身见统一之业者，胡汉民当负过半之责任。观本文所记，彼对陈少白的微小处还不相容，平日对陈炯明可以想见。所以，人的立身，应该绝对的牺牲小我，服从整体利益，才是正道，汉民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也。

船抵梧州，魏邦平（雨堂）等来谒文官长，在船上作一度之会议，旋决议回师肇庆。师抵肇庆，禄超介绍姚观顺来谒总理，同寓船中。总理即电竞存，着其来肇。旋得复电，准一日来肇。余译电后即呈总理，阅后色颇愉快。余以为经一度会晤后，纵有误会，亦可从此释然。乃逾期不至，嗣悉为洪兆麟、叶举所挟持，迄未果行。总理见竞存不来，乃亲赴广州，而竞存已避匿惠州矣。乃免竞存省长职，而以伍秩庸先生继之。余等均赴观音山办公；盖总统府于出发时毁于火，故假观音山学海堂故址，以为临时办公地点也。

总理在广州部署稍毕，于5月6日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向韶关驻节。时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子荫）由粤西赶至，匆匆上车晤总理，副官司徒非与黄司令素来未谋面，未悉为何许人，制止登车，黄司令盛怒之下，遽批司徒颊。适胡参军毅生赶至，声明从前未见过司令，故有此误会，偕同登火车。（按：黄大伟非常骄诈自大，目中无人，忆1917年在广州，他任大元帅府参军，自觉了不得，江苏众议员茅祖权在后呼为“黄大伟人”。）司徒副官颇能尽责，竟打击之。黄大伟不久在北伐失败后，叛离军府，通电斥孙先生不如张角王朗，及1925年北京治丧时，始敢来唁，同志皆鄙之。

抵韶后，余与谢心准同一卧室。心准嗜酒，谈风甚劲，且好看相，并决余十年后在社会上当有建树。

总理组织大本营时，参军长一职，尚乏相当人选。毅生颇思此席，迄未实现。适吕超（汉群）由湘转韶，趋谒总理，即以参军长一席畀之。

总理抵韶后，派姚观顺参军兼卫士队长，将卫队加以训练，由姚参军每日抽调一部分，实施射击。时各军奉命，陆续集中于曲江、南雄、仁化等处。集中完毕，分作三路，同时向江西进攻。许汝为率领第二军全部暨第一师梁鸿楷部，福军李福林部为

右路，由南雄进攻信丰。李协和率领滇赣军为中路，由南雄经大庾岭向南安进攻。黄子荫为左路，率领全部由仁化向崇义上犹进攻。三路均向赣州进攻。时左路军进攻颇疾，子英略受伤。守赣州者陈光逵，我军未两旬，遂克赣州，陈光远弃城逃，我军获辎重饷弹无数，同时复得竞存与陈光远往来电报，密告我军状况。我军克复赣州后，军威大振。时广东银行所发行之毫券，在赣军事区通用者，其价格高于大洋。当捷电纷来时，余译后即呈阅，展堂先生阅毕，色然喜。盖军行迅速，常未及于定计划时间，足征各军长之指挥若定，暨各军之奋勇也。

总理嗣悉竞存与北方军阀暗通消息，恐阻挠我军后方，乃决定先克复南昌，再定应付方法。时张惠长、陈庆云等带回飞机来韶，参加北伐，以飞机四架，编为一队，由韶关进发赣州，当时飞机尚属雏形，担任侦察敌情工作，然敌军一闻我军飞机至，即相顾失色。

总理以北伐军入赣，迭获胜利，然广东情况恶劣，闻竞存令驻广西叶举等部悉调回粤，叛迹渐著，乃返广州，借资震慑，并以展堂先生代以大元帅职权，即率秘书李禄超、参军姚观顺、副官黄惠龙、马湘等乘车返。展堂先生与总理每日必有电报往返，诂16日电报终未到，展堂先生心中甚急，绕行办公室内，心境不宁，诂料于此时间内，竟起非常的大变耶。

当总理驻节广州时，即有人密电竞存对总理有不利消息，总理毅然答曰：“竞存敢害我么？”迨15晚，天气盛热，参军林树巍（号拯民）与参军长在韶关开会时，意见未能融洽，因请假返省，时在寓方跣足踞榻卧，忽有同乡来报告（在竞存处充某师连长，派定在发难时期充当某一路者）云，是晚即围攻总统府，以某部向观音山进攻，某部向观音山后警戒，并出手令示拯民。拯民阅毕骇极，外衣及袜不及着，仅服内衣，并约林直勉赶赴观音山，径入总理室。时总理方酣睡，拯民遽挟之起，仓卒报告。总

理犹未深信，乃出手令呈阅，知观音山后警戒略懈，乃循小道下山，直勉即将眼镜加诸总理脸上，沿途警戒部队禁止通行，拯民云：“家人患病甚重。”旋指总理对军队曰：“兹特请医生回家救治，望予通融放行。”军队允之，经过三次驻兵地点，均以此语应付，始克通过，由观音山经城隍庙，乃往海军总司令部，旋上永丰舰，开炮击叛军。时叛军攻观音山甚急；参军姚观顺率卫士队极力抵抗，并伤副官黄惠龙，马湘保护孙夫人下山。姚参军足中弹，仍抵御不已，叛兵进攻许久，忽闻海珠方面有炮轰入，知总理已离开观音山，乃相率作鸟兽散。总理即以永丰舰为临时司令部，分电各军长官，率兵讨逆。

时北伐军占赣州后，继克万安、泰和，距吉安甚近，忽奉总理密令回师讨逆，旋开紧急会议，以一部分回师，向南雄疾进，以一部分暂驻赣境，归李协和指挥。返抵韶关，即行接触，与敌军相持旬间，嗣得湘军由乐昌加入，协同攻韶州，血肉相搏，昼夜不息；未几，突破敌军阵地，全阵动摇，敌相率败退，敌军钟景棠已登火车，预备窜匿。诎敌军陈修爵率队增援，沿粤汉铁路北进，至马坝即向我左翼进攻，我军以作战日久，未免困乏，相率退却，至始兴从事收容整理。我军陆续退至始兴，以江口殊难作战，遂令各部向南雄转进。嗣许汝为、李登同、黄子英等部退延平，李协和部拟假道湘边退桂，为赵恒惕所拒，所部赣军，全军解散。时展堂先生在韶，尚未知此严重事件发生，仅以电报不通为虑，坐立不安。迨是夜11时，电信队长麦萼楼来电告余曰：“电线在清远落地，屡叫不通，省垣恐有变故。”余即商诸杨少炯同叩展堂先生寝室，陈明此事，展堂先生答余曰：“此事颇可虑，倘有事故发生，即将大本营迁往南雄可也。”语毕，余等退出。17日下午，何克夫由广州赶至韶关，在密室谈数小时，旋出。未几，展堂先生交余手谕，系赴赣与许司令商晤，军务由参军长吕超代行，尚未知其启行日期。18日早，天仅明，即见文官长

室行李搬运下船，余偕张子丹前往握别，时金库长林云陔亦同船赴赣，并请示日后机宜。展堂先生云：“文官处于必要时，可迁往南雄。”语毕，与余握手为别。余兴辞回文官处，觉大本营内，秩序颇形混乱，倘一旦迁移，关于给养及迁移费首宜预备，乃往金库与伍哲夫商量酌拨若干，哲夫允拨 1000 元至 2000 元。是日下午，局势愈恶，秩序愈混乱，许多部分向金库索款。余知韶关难再维持秩序，决定迁南雄，向供给局取两船只，拟昼夜移动，值天大雨，雇夫不得，即督率各勤务，将重要文件，迁至船中，另给以重赏，稍笨重者，均弃置之。文官处同寅分乘两巨艇，并载各物，用大三元小火轮曳之行，逆流而上，航行极缓，穷一日航行，仅达十数里。翌晨 19 日早，余起后，站在船首，忽见远处岸上有白烟数点，旋闻拍拍声，知叛军已跟踪追至，余急返舱中，而船夫已为枪伤，余即喝另一船夫，速解缆离开小火轮。未几，枪声愈密，小火轮之卫兵亦还枪，双方子弹纷飞，余船适在当中，急飭船夫将船靠岸，叛军赶追小火轮，余船获免。叛军继续来，幸河阔，且船靠对岸，不为叛军所注意。余以电报密码，最为重要，一旦被敌人所得，危害匪轻，乃将总密、恺密、智密、大密置诸怀，其余悉加毁坏，投河中。叛兵与轮上卫兵剧战时，余乃挟密码电本，偕同张子丹、马如坚向岸上丛山逃避。当风雨交加中，子丹误坠岩下，几毙。奔越数高山，甫得一小村落，向乡人借宿，均不允，旋遇一老妇，操东莞音，允为留宿，将厨房辟为睡室，地下泥泞逾数寸，仅借稻草少许为荐，乃给钱挽老妇弄饭，饭毕，商议行止。余欲往南雄，仍随展堂先生。子丹、如坚以路途艰险，有难意，乃决定返广州。余等抵韶后，即赴车站，乘车抵广州，后转赴香港。其时同寅分散，无法寻觅，闻总理已赴沪，乃复至沪，寓西门路 80 号。以无事可办，复返港，未几，得展堂先生来函，速赴沪，而展堂先生又返粤。总理嘱林焕廷飭余往谒，并嘱速返粤，助展堂先生，给旅费 400 元。

翌日，即乘轮返抵粤，往二沙头晤展堂先生，承询在沪状况，并嘱余同赴省府。

张君随军的笔记已止于此。兹我有两种补充资料附列如下：

第一，陈炯明的阴贼卑怯，诚如民国 11 年 8 月 15 日，孙先生宣布粤变颠末所云：“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利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这确是陈炯明此次叛变得主因。至于当时的叛变近因，则为他们的情报的错误。孙先生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谈话，有云：“君当知陈之目的，业已失败。彼料我军败于江西，有人妄告陈谓北伐军全军覆没，彼之决策，盖根据北伐军即未尽败，而返粤亦必遭敌军追击之说也。”陈氏正在徘徊苦闷，思想动摇，无所适从之际，还未敢决策发动，忽接到北京蔡元培领衔劝孙先生放弃政权一电，反意遂决，时蔡氏任北京大学校长，为一国学术界领导，虽仕于北庭，而群伦仰望，其时有所谓“好政府运动”者，主张幼稚可笑，还远甚于公车上书时的改良派，寄建国希望于北洋军阀，比之寄救国希望于爱新觉罗载湉，尤为痴愚幻想。主持这盲目运动者皆所谓学术权威，胡适为之中坚。当时因黎元洪已复位，他们主张全国统一，劝孙先生中止北伐，此电由蔡元培领衔发出者。陈炯明满腹封建思想，平时最拜服偶像，见此电大大感动，以为蔡先生贯通中外古今，一国重望，眼光决不会错，其主张尚如此，足以反证孙先生的行动全非，一定失败无疑，他经过这样重大的一激，于是叛国之计决定，使中国的历史重写了几页。蔡元培称为近代学术界完人，其受命北庭，作曲线的救国运动，人皆谅之。惟此次阻挠北伐之一电，则一言丧邦，对于国家民族损失者太大，当时颇为时论所痛责，今事隔数十载，已无人忆及矣。蔡氏卒成大名以去，陈炯明则一大半因此为万古之罪人。甚矣，人之一言一行之关系国家大计有如是者！凡是旧意识重的，无不喜

谬采虚声，崇拜偶像，结果鲜不失败。陈炯明不但对盛名之下的蔡元培如是，对于淡于名利的党中前辈如张溥泉、吴稚晖等亦衷心尊敬。1917年孙先生坚向广东督军桂人陈炳焜索还20营地方军队，以付陈炯明率以援闽，一时陈氏漳州的新政，举国属望。张溥泉有沧州族人张毅者，流落不堪，偶书一条给陈炯明，陈视作谕旨，重用张毅，毅屠杀搜刮，闽人受害极深，且复反复叛国。吴稚晖亦偶荐一人于陈，结局不佳。这都足以说明旧书生的无助于新政也。

第二，陈炯明虽神奸巨恶，但孙先生始终希望他悔悟。陈之贰于其党，始于民初，孙先生始终羽翼之，使成军回师，以至底定两广，及叛变之后，亦未绝其悔改之路。以我亲闻于吴稚晖者，可以一述。忆甲子年（1924年）秋，我因于役欧洲，待舟沪上，一日，见衣冠甚不整齐的吴老师忽市新呢帽一，问何为，曰受精卫之托，将赴粤东劝阻陈竞存勿妄动下去，使孙先生得专力北伐，因陈氏自称平生最佩服区区也。过十天，吴回上海，问此行结果如何。曰在韶州匆匆见孙先生，先生甚宽大，言仅需陈竞存写悔过书来，便以两广与之。而陈则意气甚傲，还自吹尽有回师广州之武力，而固示优容，今日之不取广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陈固执如是，自绝于国，因无结果。等到陈贫死于香港，吴特以联唁之，上联赞他不留一文钱，毕竟英雄有价，下联为“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就是指南行调停未成的遗恨。邹鲁的回忆录亦云：“当总理北伐驻韶时，吴敬恒先生适到广州，见我说：关于陈炯明的事情，总要设法补救，总理北伐，才能无后顾之忧。我们最好到韶关去，面请总理恕陈炯明以往之罪。我表示同意，即与同往，在韶关车站总理驻节之所，谒见总理。吴先生申述来意后，总理非常愤怒，并且说：‘陈炯明叛变，要杀我，人人可恕，陈炯明不可恕。’吴先生立刻向总理跪下，对总理说：‘这事关系北伐前途很大，先生不

答应，我就不起来。’总理一面拉他起来，一面说道：‘快快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吴先生见总理这样宽大，非常高兴，就立刻起来。哪知吴先生到汕尾叫陈炯明写悔过书，陈不允，以致自取灭亡。由这事看来，可见总理胸怀之宽大，与吴先生之高义。”关于吴稚晖苦劝陈炯明悔改的经过，当时他一一详细的告我，曾笔录对话，惜已完全被毁，年代已久，脑力锐退；十不记一二。似吴尚以一长书寄陈。陈炯明的亲信莫纪彭者常与吴往来，迄至解放军渡江时，莫之家具，还寄在南京的吴寓，足见其关系之不浅。实则吴之一生，以感情用事，看事太易，以为至诚可以动人，他平生向人跪求，据他告我，还有两次。一在北京坚求瞿鸿禨代呈请慈禧撤帘归政之奏，雨中长跪于半截胡同，瞿坐轿车上，正襟读奏本，言一定代奏，请你回去，不必送刑部（清制，凡小臣奏事，不管对不对，先送刑部以待处理）。二民元在上海，目睹全国保皇党将大结合，助长恶势力以危害民国，他向皇党巨头熊希龄下跪，求彼党勿以私害公而终将自害。结果则瞿鸿禨决不会代奏，熊希龄非法大借款来打国民党，绝不因其一跪而改变已定政策。只有孙先生豁达大度，又敬吴之无私而怜其衰老，才肯允其请求，陈炯明绝不为其所动，吴就是自杀于陈之前，亦决不会促其回头也。

（1961年）

中山先生北伐改道前后军政点滴

梅放洲*

当1920年粤军回粤发动之前，先生督率党属明援暗助，凡于敌我之间有所交结者，策而动之，无微不至。此时先生已代我向美领事署取得入美执照，前往纽约任《民呼报》记者，整装待发，行将启程。而粤军回粤筹备甚急，我因与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所部炮兵营营长余赍予有同学之谊，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以告先生。先生立即终止我往美之行，命我潜入汕头密谋响应，我责无旁贷，亦乐为此，乃欣然奉命，曾于汕头旅次探得潮汕详情，一连数通向先生函报，并曾迭接先生墨函详细指示。不久由组织传来密报说：我军某月某日由漳州动程分南北两路进发，北路由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领，由龙岩经三河坝向五华、兴宁进发，南路由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率领由诏安经黄冈、潮汕向惠阳进发，预计我方自发动之第三日可能到达汕头，嘱各有关部门准备响应。不料动程才两天，前锋已赶到汕头。我闻讯立即走访前锋，表达欢忱，而第一所见到者适是我素所欲见的讨龙时共事有年的好友薛岳、张发奎两个特遣委员，询悉余营已在竹篙山响应就编，并已投入前方行列中，我一时为之大快。

及午参谋长邓铿赶到，会见后得悉余赍予已就任新编炮团团长，向观音阁前进，随并探悉余原日所部梁士峰连在高陂跟北路向兴宁前进，实力分散颇觉美中不足。翌晨邓及所部统已离汕，向前方观音阁迈进。汕头各临时成立的民军司令部，除姚雨平的卫戍司令部外，统已消散净尽。此时我的任务业已完成，留汕已

* 作者时在黄大伟部任秘书，后又任县长、石井兵工厂总务处长等职。

无聊赖。乃偕友李寅钟前往兴宁访问梁连，希图得间为谋改隶，以回复其旧观，旋由潮安沿水路往三河坝转轮到松口起岸，向兴宁进发，经两天之行程，才于天将黑时到达许军临时军部所在的河源城。即晚军长亦乘兴赶到，这时我以所来目的一无所知，无与军长会面之必要，只好在军需处与处长陈永惠畅谈，以消永夕。

及寝，询问便溺所在，才觉整个军部无论大堂、走廊全无灯火，大门前亦无岗兵，深以为怪。次晨天甫晓，闻厨房人说厕所旁边有炮弹破片降落，随有探兵回报敌已到达对岸。旋即有俞副官长由前方赶来向军长面报，随即仓皇回去。未几更有探报说，敌已渡河，随又有探报说敌已到达竹桥对面——我方预先架设的军用竹桥。军长均说顶住，而军长跟前和整个军部只有驳壳枪一杆、残毁步枪两枝与派往竹桥扼守的军长护从连长吴泽理所部机枪两挺，士兵十余人而已。所云顶住，实则顶无可顶。乃一报去而一报来，才说渡河，继说抵岸，而军长面不改容，安之若素，迨探报敌已登岸才率军部余众从容退出。尝曰镇静，未免冒险太过，计退出时只有军长亲近许龄筠及军需处长陈永惠和全体官兵和我们两个来客共约 20 余人。所资以为护卫者只上述驳壳枪一杆，其无抵抗能力，自不待言。乃离开城垣不到两里，随即缓步慢行，四处张望，据说要等待吴泽理。见路旁有两小岗可资屏蔽，乃在岗下驻扎候援，以若许之众固无须乎部署和警戒，我至此汗乃涔涔下，盖庆军长之得免于难也。

当我们自军部启程退出，以迄军长缓步慢行时，相隔不过半点钟，而敌人登岸之处距城至远不过五里，半点钟之久可能到达，计军长缓步慢行时，敌已入城。而我们乃裸露于一望十里绝无遮蔽的平岗之中，假使敌方偶有一兵一卒登城张望，我们便一目了然，同被发觉，况登城守望或侦察，又为占领过程之所应有，是我们之被发觉为当然，不被发觉为侥幸。果被发觉则我们全体官兵 20 余人，其不为俘虏或战殁者几稀！今竟能安抵此间，

不綦幸之又幸。该地距紫金城不远，军需安顿后，立须前往采购，我得机偕李君跟随军需前往紫金城浏览，觉甚舒适。比及回抵驻次，各人呆坐山坡如故，而夕阳已下，皓月寻升，时届中秋，月明星稀，在月光下的坦平岗上，益觉景色宜人，不自知其身在大敌的虎瞰中也。入夜 10 时许，闻旅长许济率领士兵两营到达，更闻已分置于前方准备反攻，同伍心神为之一振。次晨炮声响处有担架兵扛伤者向后跑来，我知双方已在交战中，即以观战的心情偕李君向前跑去，翻过驻扎所在的小岗即见另一岗上架着山炮一门，我和李君赶向炮位攀登果见炮连长梁士峰坐在炮次，我们立即跑前与梁同坐炮旁谈所欲谈，不久即有炮弹从头上飞过，当场爆炸。他们不以为意，我们自然也处之泰然，不一瞬即闻沥沥之声，知是炮弹在近，他们立即拉我们就地伏倒，该弹即在距我们叙谈所在的炮位右边后方约二丈许爆炸，炮旁只有破片射到，诸人幸无受伤。

谈次探知他所掌的区区七生半山炮两门，而效用之大不啻擎天一柱。心知改隶之私，万无可能，来意已僵，归心立萌，乃即下山退回驻次，见各人正在繁忙准备退却，询知另有一股海疆军向我后方包抄而来，立须退避，此外更闻朱执信先生在虎门被刺毙命。原先我于虎门军事略有周旋，骤闻噩耗，一若晴天霹雳，回港之念乃益急。未几各部撤退已排成队列，此时我和李君杂在军旅间，只好如鱼群般舍尾随行而已。行不多时，即走进阿婆径——山经该径蜿蜒几十里，两边高山壁立，整条山路都是从擘山凿崖中开出，路面极小，而崎岖特甚，迂回曲折，一如画图中的栈道，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行约二时，才得走出径口。出径未久，便到平湖，大军至此相将停留，分别驻扎，想已到达后退的目的地了。

这时日已偏西，计鼓胫前行犹可能赶到灯塔，我和李君登即脱离队伍，赶向灯塔迈进。迨天已深黑才得走进旅店，经过简单的晚膳和沐浴便即入睡，睡至深夜 12 时许，为蒋介石投店的仆

从惊醒，知其必是向许方前进，内心颇有应将前方情形向他报告之意念，随见扛他的轿辮是许的“千里马”（轿辮混号），知他必系由许派该扛辮们前往老隆迎接而来的，前方军情定必比我更为明了，无报告之必要，乃复就寝。凌晨即向老隆进发，及到老隆，登即走访军需处长李钟岳，拟由他介见陈老总报告一切。据说老总正在纳闷，在厕中踱来踱去，无特要事情不应扰他。李又向我追问前方详情。经我概括道达后，李说这里所得情报与你所说无二致，且更详尽，无须再报。我和李君乃赶向松口，沿原来路程回汕，到汕后正在候船回港，适有军需处人从平湖来，据说当我们队伍从河源退到平湖时，军部设在圩内当铺中，即晚深夜12时敌军突然闯进过了石桥入到露天圩场，军部方才发觉，惊惶中首由龄筠、泽理扶军长从后门出走，但为竹基所阻，行走不通，仓皇中由泽理将军长举起向竹丛间抛掷过去才得脱险。余人随将箬竹撬开，逐个逃出，惊惶无似，说时犹有余怖。我闻之愕然，不禁发一大噱。回思平湖是交通孔道，亦是当地要镇，为行军所必争，平湖圩坐落在大道旁边，大道和圩外露天圩场之间有大石数块，平铺在浅涧的水面上，这便是平湖石桥，去当铺不过一箭之遥，今被敌军闯进露天圩场，军部方才发觉，是则不特军部门前无岗兵，并外围冲要地点亦无哨所，且并军部周围也无警戒，不厕身其间，安知此中奇妙之若是其甚。

计我自走进前方与军部官兵杂处前后，总仅三天，而所闻所见，激荡心弦，时而摇头懊恼，时拍掌称快，时而捧腹苦笑，时而脑筋迷惑，莫名其妙，事后回顾，犹百思不得其解。由所闻平湖事故，联想到河源军部之无岗兵、无灯火，乃知此等颓废状态，不是偶然，而是其一贯作风。噫！军部何要，军长何重，而可门无守卫，冲要无哨所，周围无警戒软？乃竟无之，一任敌军走到面前方始发觉，此岂真的兵不厌诈，波诡云谲，权奇应变之所应为耶？亦由其耽于鸦片，为烟毒所迷，检点不到，有以致之。平湖之被抛是其自召，亦其不失检之所应有。人言许汝为吸

烟拼命，作战亦拼命，我于此语有深契焉。他如河源退出前之忍耐坚持，临危不走或系因有所待，要作一分一秒之争未敢厚非，至若城郊之慢行，则预知敌已入城，追兵且至，何尚迟延轻忽至此极，是直狂妄糊涂，不知死活耳。

翌日，我和李君乘轮回港，抵港后走进总部见各人，兴高采烈地说粤军回粤胜利，说得热烈如火，不知其中尚有如许挫折。我闻之不便将前方实情坦率说白，向各人泼冷水，只好摘要略述胜利在望而已。总部设于日本人所开设的东京旅店，是李绮庵、陈策运动四江起义时遗留下来的小机构，继而我也假它以为向港沪联络之枢纽，初尚守秘，往来同事无多，及我由汕回来，则已派出徐固卿为总指挥，而以吴铁城佐之，该机构已成半公开的后方军事枢纽，同事往来甚闹，称为总部矣。

回港后滞留未久，前方军事遂渐扩张，指向省垣的包围圈亦逐渐缩小，各同事先后分往内地工作，以图响应，我亦于此时偕朱卓文乘由省逃来的宝璧舰驶进内地，组织航空司令部于虎门。组织之初，只有陈庆云所驾的飞机一架，继以二万元之资向澳门政府买得旧机一架，由张惠长驾驶，该机吃油多而声威大。两机更番飞腾于观音山一隅之地，或联同翱翔于督军府的高空，桂酋早晚受飞机威胁，忐忑不安，而前方军事压迫又复日甚一日，加以四乡民军乘时响应，民情汹涌，军心动摇。桂酋于此不能无所顾虑，因而不敢作孤注之一掷，而萌退守老巢，保全实力之私。忽一日省垣守军撤防，我们的宝璧舰随而推进到白鹅潭外围河南岸旁。

次日凌晨即闻桂军撤退，但我军未到，一切军警残余，仍由桂军控制着秩序未乱，及晚同志中有陈泽南混号泵叔者来对我说，现有经他接头的马济部石井兵工厂守军两营，不愿跟桂军离粤，留驻厂外，彷徨无主。我立即偕朱卓文乘宝璧舰向石井驶去，打算乘机收编，驶至离厂不远为竹桥上哨兵拦阻，不予通行。朱已令司机转舵后退，我对朱说，哨兵无恶意，不妨泊岸步

行上去，和他交涉。朱随即和我步行前进，向哨兵说明来意，哨兵不阻，乃即转回舰上驶近厂旁，见已散开的士兵放下枪支，坐满山头。时已入夜，经过相当时间之通传，才由朱和军方负责人相与协商，作概括的约定，该军两营统由朱收编，归总指挥部直辖，明朝点名给养。随即驾舰驶回省河，仍旧驻扎。翌日晨起朱已外出，不久夏重民跑到舰来厉声咆哮，谓该两营士兵是经他运动而来的，应归他收编，怪我侵越。我说何去何从，是尔与卓文之事，于我无干，此等勾当，我亦不干。正在争吵中，朱从外面怒气冲冲说：那两营士兵已由粤军总部拨归黄大伟统辖。夏闻言嗒然若丧，无他言，寻便退出。我于虎门之行，至此终结，嗣后朱奉委为粤军航空司令，是另一回事。

黄大伟自得到桂军归顺士兵两营后，立即编成王懋功一营、邱鸿钧一营，嗣又由总部拨来陈得平一营，合共三营，成立粤军第一路司令部于城内西横街，着手训练，上下一致，遂成人桂时的粤军劲旅。这时粤军前方各部陆续抵省，以转战时间已长，疲劳过甚，伤亡复多，必须休养补充和整编之故，于桂军溃退未遑穷追，使得从容退回广西，负隅自固。不免有得鱼忘筌，顾此失彼之憾。而粤军整编后，势力突增，声威显赫，北洋军阀为之侧目，南北对峙之势，因而有所增长。而先生自大元帅府解散退回沪滨，待机重来，迄兹已整整两年。此两年之中，固无日不以北伐为念，此时应滇黔湘粤各将领之电，邀返于广州，成立总统府于现纪念堂所在的前盐运使署，重整军旅，准备北伐。惟北伐之荆棘横在面前，必芟夷蕴崇之而后可。

诚以桂军败回广西，实力尚存，以建瓴之势，虎瞰于旁，随时均可拊北伐军之背，故北伐必先伐桂，势所必然，以故先生于组府后即以粤军入桂为第一要著。而掌握军政大权的陈炯明则另有其素抱，此时为胜利冲昏头脑，意志昂扬，气势磅礴，每有别先生而另辟蹊径之野心。适值西南军阀提议联省自治高唱入云，此所谓联省云者，割据一方云耳。陈炯明以其暗合私怀，乃密应

之，始而密电往还，继而公开酬和。以此之故，则其阴谋据有两广地盘，增大其声价，以与吴佩孚作势均力敌之对峙，企以售其南北两秀才统治华夏之私。于先生所持举兵入桂之主张与其妄念吻合，意气相投，若中肯，由是协同筹备，不逾月而布置就绪。计分南北中三路进发，南路则由黄大伟、钟景棠负责，并肩前进，取道高雷钦廉向南宁进发。黄邀我任秘书，我于讨龙时在高雷工作有年，与地方人士甚洽，义不容辞，答允以客卿名义，从旁帮助，不任专责。

黄乃于所部出发后偕我乘宝璧舰驶往水东，所部各营亦已相继到达电白，因即转往化县设临时司令部于县城，以部署一切。未几军粮到齐，其他所需亦已筹备完毕，乃下令所部由电白开拔，取道公馆袂花向高州城攻击前进。各营先行，司令部殿后，动程前曾向地方取得充分犒力，以故军实虽多，仍能依照序列陆续启程，军行有序，阗阗不惊。路程中见有肩犒气力不胜，似系由地方强迫拉来，我于憩息时将他所挑物资分置于司令官及各人轿底，将该犒释去。各轿夫虽加重负担，而以我关心同侪，亦无异言。及到达目的地，又能依约给资，将原来犒力悉数遣返。当地居民见我们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安居乐业，全无惊恐，以故所至均能取得相当犒力，进行无阻，颇以为慰。军行中曾于袂花歇息时，前方士兵突然如潮般向后退来，司令官开枪拦阻亦不生效。我急忙走出探望，见面前士兵仍在汹涌后退。我立即抢前追问原委，后退者见后方有员司赶来，随即停足，和我谈话，对岸退跑者见我和后退士兵停在路旁，乃亦停足观望，一场大风波一息便停。随探知前方原无敌人，这场风波虚惊从何而起无从断定，不久后退者见安静如常，寻即各归原队，依次前进。

我非军人，于行军亦无经验，乃于无意中得此效果，想来堪为一噱。计军行程系从电白直指高州府城，行至高城前沿笔架山为敌所阻，战争乃即展开，双方对垒攻守凡三昼夜，后由王懋功营和陈得平部梁国一连鼓勇猛攻，将对方主力击破，向前冲进，

笔架山阵地才被我们占领，乘胜追击，进抵瓜棚，高城同日克复。守军黄汉卿投诚就编，编后，随与地方商定善后事宜，便即统率所部由高城向石鼓经南盛进驻梅菪，在梅菪再作一番部署，确定进程才从梅菪取道安铺公馆直奔合浦、北海，经两天之行程到达总江口。合浦城敌军弃城逃遁，北海亦不守，我们至此遂告一段落，乃在总江口作大规模之整编。这时友军钟景棠亦已控制遂溪、海康、徐闻，整个高雷钦廉地区不一月而尽为我军收复。计我们自高州克复以来，声威大震，所向披靡，沿途无剧烈战争，损伤无多，加以沿途吸收零星杂军为数不少，估计尽可编成三旅。

黄于此时特派我乘宝璧舰专程回省向先生作机密之请示，抵省后立即晋谒先生，将前方军情向先生报告一切。先生大喜，随鼓励我们说我一个人就开炮打莫荣新，你们掌握着这么多兵力，尽可鼓勇前进，尽革命之能事。我俟先生说毕，随说子荫（黄大伟字）拟举兵回省，特著我回来请示。先生闻言默然良久，不发一语，我自不便再说，只好另作其他报告，报告毕，肃穆而退。退后随即去电前方作心领神会的简短报告，留省暂住。计留省不到半月，及我再度回去时，他们已由合浦动程经钦县上思到达目的地南宁了。这时先生北伐大计业已发动，桂林大本营前行人员来邕者不少，连日与各人谈笑甚洽。寻接先生随从电报说先生由梧乘轮来邕，明晨到达。我们例应郊迎，子荫和我乃于深夜乘专轮驶出郊外迎驾，待来轮驶近，立即登上先生的坐驾轮，走进厅间见秘书、参军和其他随从等坐满，先生随即出见，谈话无多，便即拉子荫到睡房去，子荫拉我同往，及抵房门前，先生用手轻轻向我一拂，适拂中我的手背，我乃停止不进。先生对我此一拂命意何在，我已明了，即房内所谈何话我也心领神会了。谈不到半时，子荫退出，我和他返回我们的小轮憩息，见子荫神态沉重，似有不愉之色，我会意而已。

我们退回小轮后立即通知舵工领水缓缓而行，延至凌晨7时

才泊岸，到岸欢迎者略众。先生登岸后，由来迎者引道前进，各人尾随而行，到达临时总部的大堂，先生随即跨过大堂，走进憩息室，无若何仪式举行，欢迎者寻即散退。子荫和我也回到司令部来，及晚先生来邕事毕，即驾原轮回梧，转驾别轮溯大河而上，向桂林大本营去了。先生去后，继先生而来者络绎于途，统系预往桂林服务而绕道来邕浏览的，中间陈少白、李纪堂两先生亦曾联同到达。此时陈炯明向所部及友好放出先生北伐只好在桂林坐观山水之言，已传遍邕垣，陈、李两先生亦曾语及，惟尚无其他反动言论，亦只以所言逆耳，不快于心而已。

无何子荫要筹集军粮北向桂林进发，我也检点行装南向靖西莅县长任而去，我于此与北伐行伍乃作暂时之脱节。溯先生此次北伐如此之急，其原因所在：一则乘机铲除桂军实力，使不得潜滋暗长；二则展开军事以压止陈炯明联省自治之妄念，而其实际的主要目标则侧重于反直援湘，时机迫切，急不及待。盖是时谭延闿所部在湘北为直系压迫，危在旦夕，求援甚急故也。凡此种种，陈炯明自必了然于胸，其所发先生北伐只好在桂林坐观山水之言，系其对先生北伐之谋蓄意抗阻，而故为是言，以作警告；是陈之目无先生，早已暴露于字里行间，而先生亦不待其自暴而早已知之。陈以一身兼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四大要职，坐镇后方，一切税收据为己有，于北伐军饷竟作决绝之截留，锱铢不解，函电催促，置若罔闻，一月、二月乃至三月，仍然如是，是陈之自绝于先生，自不言而喻。先生呆在桂林，携来饷粮早已净尽，就地筹措，亦已竭泽而渔，而大军给养急如星火，一忍再忍，无异束手待毙，迫不得已，乃作断然之处置，改道北伐。发动之先，预为绝周绝密之筹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推进，竟能于两天之内，由桂林赶到苍梧，当日陈得谢文炳之告密，已电调浔州叶举、杨坤如各部数十营集合梧州，不惜以武力拦阻。无如远水不能救近火，他们尚未集中，而我们已抢先到达，梧州遂为我们据有。

此时枢要廖仲恺大不谓然，挺身而出，厉声疾呼，制止冲突，企图居间调停而黄大伟附和之，乃不崇朝而有所谓黄大伟“三不打”之语。黄原有“三不骂”之徽号，即黎元洪、孙中山、陈炯明三人皆是他上司，故不骂，今所谓的“三不打”亦如之之言，宣扬于孙、陈两军之间，几遍桂粤。盖黄之附和为陈所乘，特假之以挑拨孙、黄之恶感，并以动摇其军心故也。黄当日为保存实力计，企图避免独当一面之冲突，曾为不打之言，容或有之，若谓其坚决肯定作壁上观，我期期以为他决不敢。盖事势所迫，不孙则陈，无中立之可能。噫！黄以一时利害之私，而轻发此言，嗣后竟以此自没其顶，士大夫利害当头，临危抉择，其能顶天立地，不以私害公者，盖亦寡矣。

我军到梧后，旋即跨进粤境，寻且到达肇庆，更且分兵直指韶关，以拊陈之背。陈孤立穗城，危在旦夕，不容不走，乃督率近前部众退驻石龙，以候叶、杨反攻。廖仲恺以鲁仲连自居，随即赶到，希有所调解，乃竟被扣留。盖陈退到石龙时，已电叶、杨等赶向惠城以期背城借一，因将廖扣留以防其军事之失漏。未几，我军已到达广州，掌握一切。陈以时机未熟，退守惠城多所策划。此时我在任次接得子荫由梧电报，知他已以北伐改道之故，领队回梧，行程如何，总未说及。而我们则以事势已在演变中，不能不回省一行，以明底蕴，乃去电请假，不待指复，即假道安南经牧马、谅山、河内、海防乘轮回港，到港转省。不料我到省之晚，即陈炯明率众退出之时，隔日我又要偕新任石井兵工厂朱卓文就任该厂总务处长去了。这是职责所在，推卸不得，不能不舍弃原有职务而勉应之。不久先生由韶关回省行营回抵广州，连日省垣外围每有不明番号的队伍开到，说者多谓陈军回省，省垣气氛顿觉沉郁，市内行人杂遝之中，亦觉有些差异。随从多劝先生回韶暂避，先生则谓正因如此，该在这里镇压。这时我在厂忙个不了，不获来省已一星期。一日方晚，本厂卫兵营营长黄镇来说，据探报有徒手暴客数十人潜进厂邻某村，似有所

图。我因即来省面报一切，但因周身衣服污垢不堪，不便入府，但到厂后方办事处向厂长朱卓文报及之。朱说连日均有此类事情向先生报告，劝他回韶，他均谓无妨，刻正由府回，无须再报。我即回家休息，即晚深夜 12 时有赖达者，跑到惠爱路西贡厂欧阳磊家，勿说陈方派兵围攻总统府，他在被派之列，膳毕动程，我才将饭碗罢掉来报，说毕立即回去。欧阳赶速走报参军长林拯民，林拉同居陆志云偕行并即约同秘书林直勉直奔先生寝室——现观音山孙先生读书处。到时先生正在解衣就寝，林等不暇详报，只说事急，催先生立即离开。先生犹说才接丽堂（魏邦平字）电话，说外间安静如常，你们可即安心回去睡觉。林等不由分说，即拉床边壁上所挂长衣披在先生身上，穿起鞋袜，便即拉他奔逃。夫人尚在穿衣，迫不及待，特留近卫黄惠龙、马湘护从，随后出走。林等走到总统府门前，已觉有异动状态，乃即转入莲花井，循内街行走，迨走到惠爱路雨帽街口，突被哨兵喝止。随由林直勉对哨兵诈说母亲病危，延医诊治，须速回去，说毕即跨过马路走入桂香街，辗转走到长堤海珠旁海军码头，登艇驶到舰上，幸免于难。余详我所写中山先生广州脱险记，不赘。此时所应说者赖达之所自来，赖和我与欧阳及上述林、陆诸人同系讨龙时高雷两阳恩开台赤区司令部的干员，讨龙事毕，各自分散。赖为衣食所驱，入粤军李云复部当连长，他处境与我们相殊，不与我们往还，迄已数载，往时关系已不复记忆。此次北伐军兴，赖跃跃欲动，拟拉李部某营和某营参加北伐，因此才访得欧阳的住居与欧阳商量，而我于就任兵工厂总务处长之前夕，拟拉欧阳为厂卫兵营营长，曾往访征求同意，欧阳才知我已回省。及赖与欧阳谋，欧阳以朱卓文系先生亲近成就较易，拟推朱为司令，因偕赖来就商于我。我们相失数年的旧好，才得往还如故，而此事又正在磋商中，赖因此与欧阳和我往还甚密。此次紧急事变之来，赖才有门径得以走报于欧阳，由欧阳转报于参军长林拯民，先生乃得脱险，这是出于事之凑巧，而冥冥中一若天然成就

之者，否则不堪设想。人但知先生之脱险由于赖达之报密，而不知其中尚有一番经过，以导引之也。脱险之夜，天甫晓，省河各炮艇上下梭巡汽笛极促，马路两旁士兵三五成群，持枪围坐甚密，每一电线柱都有请孙下野之小字条贴上，市内秩序大乱。翌日先生纠集省河大小舰只永丰、永翔、海圻、海琛、楚豫、同章和江巩、江固、江大、宝璧等，除留永翔移驻白鹅潭以资遥应外，余悉驶往黄埔，在黄埔内河沿岸择地停泊，随并葺理黄埔原有残旧建筑物，以为随从员司临时居住之所。不数日即有炮弹自鱼珠炮台打来，该残旧建筑适被打中，因而塌下，总统府秘书李禄超被伤。嗣后每日都有一次或多次的同样炮弹打来，各人以司空见惯亦安之若素，盖陈特意饬属进占鱼珠炮台，在炮台上架设山炮向我轰击故也。我军以其威胁不大，置之不予还击。

忽一日，友好冯子权来对我说：陈已暗遣飞机轰炸永丰舰，说得甚为翔实。冯曾参加过空军工作，与空军素有往还，所说不为无因。先生在黄埔中虽有密居，但常在永丰舰与各有关员司或来客会商，我骤闻此言，急得若热锅上的蚂蚁，立即赶往沙面请驻白鹅潭的永翔舰设法通报。由沙面雇艇往舰时，我沿习惯坐在艇头，而站在舰上的海军陆战队队长孙祥夫遥见我，立即饬属放下吊桥，将我接上。我急达来意，孙旋即拉轮机长某对我说无可能，我以其说得很实在，立即离舰另寻别路，随又赶到我们从秘密中维持交通的小火轮去。我到时该轮适在准备开行，我心为之一宽。及我到达永丰时，先生与海军员司正在会议中，议毕我即将所闻直接向先生汇报，先生虽疑信参半，而事有可能，不能不有所警惕。报告毕我随即分向舰上各人探询前方讯息，乃闻驻舰同事前讨龙军高雷司令陆任宇在城内某秘密机关一连五人被捕，并已一同被害，我为之默悲者久之。距此不久，先生以各舰裸露黄埔时受炮弹威胁，认为非计，乃有率舰回驻白鹅潭之议。盖以白鹅潭旁有英美德法日等国领事馆所在的沙面横亘于前，逆军炮弹和飞机之来，不能无所顾忌，可资屏蔽故也。此行如循旧路回

去，则须经过省河，势必引起交战，徒滋纠纷无益，因拟取道内河，由内河绕到南石头，然后从南石头长驱直进。随即以此商诸于领水有关的海军员司，各员司闻之均愕然，无以为对。惟先生则持之甚坚，徐向各员司详细指示，由某处到某处河面宽若干，由某处到某处水深若干，口若悬河，了若指掌。各员司仍以未曾经历未敢遽断，随罗致省河带水共同参商，各带水亦以为难行，金谓以偌大舰只向内河行驶，纵使水位相符，但偶尔失慎，即被搁浅，危险实甚。以是之故，海军全体员司无分上下，均有难色。但先生则独不以为然，持之甚坚，寻且加以断然之处置，将各舰启行序列作详细之安排，并指定某日晨某时某刻水涨至某时立即起锚开拔，不得有误。各员司至此乃以先生坚定如此，必有特殊之见地，唯唯听命，开拔令乃下。届时依令开拔，鱼贯而行，果也一一都能通过，安抵南石头，随俟各舰齐集，即向白鹅潭长驱直进，及晚即全体到达。到达时除各大舰依照预定地点按次抛锚驻扎外，余各自行择地停泊作暂时之安顿以俟前方军讯，此行除同安舰由南石头前进驶经车歪炮台时被岸上逆军炮轰，副舰长欧阳格受伤外，余均安全到达无误。先生于此为何如此详确，想读者必引以为怪，此因先生著开辟黄埔计划时，搜罗中西著作中有德国人所著与此有关的秘籍，先生援以为据并曾加以周密之调查，更曾于计划中立下断定，故能有如是之准且确也。泊驻后先生本以为暂时可以苟安无虑矣，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抛锚未久，即于永丰舰底当场捉获香港船坞巨商之子徐某密谋在舰底放置水雷，企图爆炸。于此足见我前此所闻遣机轰炸之非虚，盖陈对于危害先生之动作，无所不用其极也。自此而后，虽暂无惊天动地之风波继之而起，而坐困舰上一筹莫展，亦非无刻不忘北伐的中山先生之所愿，乃于无可如何之中，权且接纳英领事之献议，自由退出广州，返回沪滨，候机复出，南来之目的，至此乃匿迹销声于无可如何之中，有待后来之演变了。说至此，想读者必急欲闻北伐军的前方讯息，兹为坦率略言之如下：

当改道北伐军到达肇庆时，先头部队已赶赴韶关，前已述及迨陈逆退出穗城，北伐军的留后部众，无论许、黄或其他，除遣少数进入穗城外，余均向韶关集中，到韶后随即取道南雄入赣援湘。当总统府被攻，先生退驻黄埔，下令回师讨伐之令到达前方时，北伐先锋黄大伟部已通过赣州逼近吉安，那时许部尚在赣南，以故回师程序，许先而黄后。那时南雄、仁化尚归我有，黄回抵南雄会合李福林部，齐向韶关进发，经过相当之探索前进，随于乌石与逆军陈修爵部接触，双方展开遭遇战失利，次日再作孤注一掷之猛攻，又遭惨败，收容后残余无多，不敢再战，因而纠集残余向东江五华兴宁逃窜。据说落荒队伍黄、李两部并计官兵共约千人，枪械不过五六百杆，以如许之众，落荒奔逃，前路茫茫，不知所适，但于颠沛流离之中，小心翼翼探索前进，经过无许艰难险阻，才得进入闽境，企图在闽取得一安顿之所，暂资养活。至9月而有攻打福州之役。不料沿路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行行复行行，不觉行到福州近郊，始遇闽军李厚基部拦途抗阻，而我黄李两军乃分两路同时应敌，以疲弱垂危的远来队伍，突遇强敌当前，不免多所周章，在猝尔遭遇之初，对方军情虚实一无所知，为保实力计，不敢轻于冒进，自属当然，以故于取舍之中，多所犹疑，而友军李方之心意情境亦复如是。但李方益决定退却，而黄方亦已萌退却之念，时间已迫，急不容缓，不图于此间不容发之一瞬间，突来极端巧妙不可思议之奇机，李方号兵于得到退却指示时，惊惶失措，竟将应吹之退却号，反而吹出冲锋号来，黄方于预备退却而尚未退却之顷，忽闻友方高吹冲锋号，黄乃不假思索鼓起勇气立即冲锋。黄冲而李亦冲，在此千钧一发的急促期间，黄李两方竟能于盲目中猛冲过去，在冲抵敌阵时，见敌方正在架起一长列的水龙机枪，子弹带亦已装起，所差者尚未打开保险击发而已，倘若迟了半分钟才冲到，我军便全军覆没无一幸免，危险实甚，当敌阵被冲破时，守军弃械狂奔，争先恐后，我仍不顾一切，跟踪直追，左冲右撞，竟然闯进城里，影响

所及，秩序大乱。闽督李厚基以我们来势汹汹，猝不及防，惊惶失措，无以为计，迫得弃城逃遁，福州全城遂为我军占领，以偌大的福州城垣守军逾万以逸待劳，以众御寡，我以残余疲弱之众而欲攻取之，势力悬殊不啻以卵击石，乃旋踵而被我占领，事功之成殊属出人意表，顾此次获胜之所由，始则系于号兵之误吹号角，以预备退却之颓师突转而为冲锋陷阵之劲旅，已属奇之又奇；继则系于半分钟之夺得化战俘而为勇士，更是怪之又怪，而我乃于同一时间而两得之。挽狂澜之将倒，反败亡而为胜利，成败利钝之间非人为之所能想而乃成之于偶然之调合，谓非侥幸又从何而名之。此次幸胜黄属陈得平部所得军实特多，枪械堆积盈廊，枪弹累累满室，闻李属某部得到钞票（福建钞票面额系用笔写如当票然）一箱，以不知其为银票，付诸一炬，是亦军中之笑话也。占领后经过相当之安抚和休歇，已随即从事整编，计黄除已编成完整的四旅外，余在整编中者尚可成团。李则亦已编成一旅。

此时许军行踪始见于建瓯，建瓯去福州相距尚远，及他开到城垣而黄李两军已整编完毕，并已在训练中，治安秩序早已回复正常，市民安居如故矣。许到城后随将总部展开，蒋介石亦由沪赶到，未几随即从事军纪之整肃，限令所部上下一体列席大堂联桌办公寅入卯出，不得违忤。当时各人习惯自由，突被限制，莫不面面相觑，怒形于色。副官长李章达虽出身军校，亦悻悻然有所不满，此虽小故，亦足见当年风尚。当在我军自韶关动程取道南雄北伐当中，向有三不骂徽号的黄大伟，怪僻成性，无论应酬交接大小事故无所不骂，于许自不能除外。从而黄许之间意见不一，抵忤时闻。黄对许自然多所不满，苟有摆脱归许指挥之可能，定必抓紧时机坚持勿失。计此时他的兵力已远胜于许，由是而野心勃发，竟然挂起国民军总司令招牌，企图避免受许指挥。许知此侷无协商之可能，只好尽己之能事，除暗勾外从而作有计划之暗斗，随即依照陈炯明之故伎提出三不打的前言，往行向先

生作绝无保留之强烈攻击，更且提出意志决绝势不两立之要挟。

许唱之蒋和之，声势汹汹，先生于两雄之间，不能无所抉择，而只知骄器暴躁形同野豕的黄大伟，孤立于网罗陷阱之中，自不能免于被擒，是亦势所必然。当许首次电报到沪之初，先生急派汪精卫、居正往福州调停，此时我知两老此行之任务，而不知其内蕴，乃自动随行。翌晨即便到达，到时许、黄分头应接，各自挣扎，黄自忙个不了，只将行军日记给我观看，未暇与我闲谈。我此时仍坠身于五里雾中，驰心于开云见日，于此不急之务，哪能看得入眼，只好躲在角落里作壁上观，以明我之不苟从。及晚召开联席大会于许的总部，公开商讨，双方固执不让，愈争愈烈，而黄怪僻成性，咆哮谩骂，自不能免，不图竟于此间闹出大风波。孙本戎、许济同时拔出枪来，倘无汪、居在场，使拔枪者有所顾虑，则真个开起枪来，黄的性命行且不保，这个调解大会遂不欢而散。翌日亦不见汪、居有奔走骇汗之往还，料或认为已无调解之可能了，次日居于候船回沪之余间拉我闲游石鼓，我于交谈之间，廉悉居之于黄颇有违言，而我于此事之疑估才如有了定风之舵，知所向背。

不料汪、居去后才两天，先生突然来电召黄回沪，一日两通，同日复接居及马君武先后来电，阻他勿返。他彷徨于两者之间，犹豫莫决，乃决意遣我先行回沪，从旁探听一切，及面谒先生，查看先生情绪如何，应否回沪，待我回电报明然后决断。我于此推知他于居、马之电阻，未肯听从于先生之迭召，更不敢轻犯，加以我在石鼓寺所得之启示，脑海中饶有主张，因举我之所欲言坚决无疑地对他言之。乃曰先生心广体胖，至公无私，只有面前之原告，而不知有背后之被告，甲说某不是，先生信之，因甲乙均系先生左右，且系党中机要，系毫无疑于两者之间故也。迨某面向先生道达经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先生亦必信以为真，以某亦系先生素所信任向无芥蒂于其间者也。今对方向我攻击的焦点，断定其必系在于三不打一语。顾我是不是果真三不打

呢，回溯过去，试问我由总江口回府向先生请示时，所说何话，你南宁郊迎时在睡房里与先生所说何事，我们回师讨逆之初，在乌石交锋所打者何人，何人打垮了我，使我流离失所，怀恨在心者更是谁属，口血未干，实事俱在，自能打动先生心弦，但你在梧州所蒙三不打之流言，除解释外还要认罪，先生溯前顾后定必坦然无疑，对你回复信任，更肯为你护此小短，以期相安。抑犹有说者，先生于敌人之骂他杀他他恬不为意，若他的部属反他他则恨之入骨，尤其他的亲近绝对不容有丝毫意见与他相反。我们在大元帅府时，先生所深恶痛恨者不是陆荣廷、莫荣新，而是李耀汉、钮永健，以此两人均是他的部属故也。先生之看重于你，比父母之于儿子尤切，自不容有丝毫之背违于其间，你更不闻先生之对于朱执信先生吗？先生于重组中华国民革命党时要党员签证发誓服从总理指挥，朱于此雅有违言，先生对他就靳不与他以任何任务，必俟他亲到东京签了入党证，然后给他以讨龙军广东总指挥之职。过去事迹历历在，我们目前不可不察。他闻之怵然几于下泪，我暂停口不语，适弁兵来请就膳，后他拉我陪往访蒋。当会面之顷，即便说出愿意回沪，随闻蒋说，我陪尔回。我闻此言初不以为意，及回抵司令部，顿觉晴天霹雳，胆战心惊，一若脉搏也都停了，盖我忽觉先生有原告无被告已如前述，若黄单独回去，尽可尽情吐露，言所欲言，则上述云云不为无补，随复加以居、马之从旁疏解，先生未必断然拒绝，不绝则自有权宜之策划，以期相安。若蒋、黄同时回去，则蒋为原告，黄为被告，蒋之指责为仗义执言，黄之理直气壮，事势使然，而先生已先入为主，是则电召之旨不因黄之表白有所改变，反因蒋之面诉的更加固执，黄必败可想而知，这是我败之也，焉得不惊。

我于此时其将我之疑虑向他吐露，劝他归欤，抑明知其必败而置之不顾欤？此我左右为难，栗栗危惧之所由生也。但他果不回去，则事势之演变不知伊于胡底，劝他不归亦属非计，况我若为此则我于先生为不忠，难免有背叛之诮，这于我之人格有妨，

自不肯轻于牺牲，幸我明朝就要启程，而下次船期之来临尚有数天之等待，我可于回沪后将此事告之于居、马两人，究应如何应变，由他们酌夺，未始非计。

翌晨我乃以忐忑心情将命回沪。抵沪之晚，须要先向留沪之素有联系者探听底蕴方好和居、马见面，或向先生直接报告，以故即晚未及晋谒先生及居、马两老。翌晨起来而蒋、黄两主角已一齐到沪，各自回寓去了。我于此备极惊奇，尤可异者，黄一直回到家里，匿迹销声一言不发，亦不往见先生，先生厅里亦不见有居、马踪迹，一场大变故，竟若一无其事者。然我百思不得其解，此岂我离闽之日，黄已接到免职令，不容不走耶？二者必有一于此，而以前者为尤当。果尔则置而不宣，容或有之，我之偶尔不知亦固其所。自此以后黄所编四旅一团和李所编一旅统归许直接指挥调遣，连同许原有和增编，为数之大，已与粤军回粤时之总数相差不远，再经相当之休养生息，和时势之转变，自可兴问罪之师，以与陈逆相见于疆场，此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无或异者。而陈逆自回复其原有的广东地盘后，更欲兼并广西，复发其联省自治之大梦，顾此时桂局混乱非常，几于每一小将领都据有一小地盘，负隅自固，陆荣廷欲出而领之犹无可能，陈不能凭空遥领，自属当然。乃抽出林虎来促助以相当兵力，使他回桂从事吸收以为群龙之首，林亦以陈之计划为可行，而允许之。

盖是时湘赵以军饷支绌必须裁兵，先前曾与陈逆商定将湘军中之桂籍将官叶琪、李品仙两部拨归陈辖，陈乃促使林往湘接管，因程途之便带回桂林，复由陈将林旧日所领各部及陈军之现尚留桂者一总拨归林辖，军力自厚，桂系旧部星散势孤，自然归附，是则林据有广西之局势可成，从而湘粤桂联省自治之目的可达，陈之为此未始非计。无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滇黔赣军和非陆系的桂军之留桂者为数不少，均不满于陈之倒行逆施，时有连同倒陈之谋，加以在闽许军羽毛已丰，前有鹰瞵，后有虎瞰，陈自不能高枕无忧，以故林虎之势未成，而滇黔湘桂联合讨

陈之师已起。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共同组织讨贼联军，相约同时并举，指向梧州。陈军以变起仓卒，调防不及，以故联军未遇抵抗而梧州已下，继即东向入粤，而原驻西江的陈军之不直陈所为者，相率倒戈相向，起而应之，由是而讨贼联军得以长驱直入。旋而肇庆失守，广州震惊。陈虽纠集残余拼死挣扎，而广州已危在旦夕。

回溯当年先生接纳英领事献议离粤回沪时，所遗北洋海军其饷粮之供给，仍由地方负担，陈虽或有所不欲，而责有攸归，亦不容辞，抑陈正欲以此壮其声势，姑与敷衍。而陈的军需捉襟见肘，自属当然，对海军之供应自不能有求必应，或竟靳而不与，海军于此自然多所不满。此时海军中有部分舰只又海圻率领抛锚汕头，海圻舰长盛延祺欲乘驻闽许军发动回粤与陈军相持之机，有所动作，特派所属文澜到沪向先生请命，由湖南老同盟陈家鼐引他到我处托我导他晋谒先生。我即欣然引文往见，经文表达来意，先生即派我为代表偕文往汕与舰长面商一切。留沪友好闻悉此事，谓我与陈军人员太熟，在在有与熟识相值之可能，危险实甚，劝我勿往。我则谓陈方友好之和我相善者，虽明知我有所为而来，亦不害我；其与我只属面善而素无往还者，虽认识我而不知我所为何事，自不见疑于我，何碍？以故对友之劝无动于衷，怡然以行。及入谒先生，先生则谓有人来说尔与汕头陈方人士太混熟，恐有危险，光棍不吃眼前亏，尔须小心。我笑说无妨，先生除将任务对我说明外，随说如要电报可由哲生（孙科字）转来，我便辞行。先生致力革命数十年如一日，于革命动作只说鼓勇向前，不顾成败等类的慷慨激昂、令人振奋之言，至若顾虑小心、光棍不吃眼前亏等话，则从未闻他说过，今对我如是说，直破天荒第一遭、闻所未闻，是亦足引以为怪者也。

及抵汕随偕文登舰与盛会面，盛只说除饷粮外无他求，只要先生对我们负起饷粮之供应，则发动和响应均可听先生之指示，至饷粮之给予如何，先生定然成竹在胸，无须我们提出什么要

求。我说这是双方义务之所应为，先生定然答允，至动作如何，当由先生策应时机之需要预为报达，双方辞意协洽，随于和悦中握别而退。及我回抵香港之晚，又适值陈逆退出广州之期了。陈逆退出后，讨贼联军相继到达广州，各机关及各公共场所多被占住，各粤籍友军相率退驻河南，形成主客对峙之势，秩序治安均极混乱。此时许崇智由闽回粤之师进抵潮梅，为尹骥所阻，不能前进，先生复电令李烈钧督率尹骥所部开入闽南，使许军得以进占潮汕，随由潮汕出击经过多次之大小战争始得回到广州，后复与陈逆大举反攻之师大战于市郊，将陈击溃，粤局始告奠定。

(1965年)

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

李任仁*

1921年12月，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进驻桂林。这时我在桂林任广西省立第三中学校长。由于我是同盟会员，又是桂林文化教育机关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因此有机会和孙中山先生接触。现在就记忆所及，将我所知道的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的情况，略述如次。

1920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援闽粤军班师回粤，讨伐盘踞广东多年的旧桂系军阀。由于旧桂系军阀在广东无恶不作，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粤军回师时民众自动起来截击桂军，协助粤军。旧桂系军阀很快就溃败了。桂军全部退回广西。孙中山先生于1920年11月下旬到广州。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旧桂系军阀被驱逐出广东之后，不甘心失败，回广西聚集残余力量，于1921年出兵向广东反扑。孙中山先生为着消灭旧桂系军阀，以便率师北伐，令粤军援桂，再次讨伐旧桂系军阀。粤军入桂时，旧桂系军阀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一触即溃。粤军除了在藤县打了一次较激烈的仗外，其余都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把旧桂系军阀打垮，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谭浩明等宣布下野，逃离广西。当粤军未入桂时，正是暑假将近开始，我和桂林法政学校校长胡家义、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廖延素等三人从桂林出湖南，至北京、山西、上海、杭州等处考察教育，9月下旬回到广州，那时旧桂系军阀已垮台，粤军已经占领广西几个重要城市

* 作者时为广西立省第三中学校长。

了。我在广州见到旧朋友王季文，他和马君武、邓家彦等广西人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马君武奉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广西省长，邓家彦奉派为国民党广西支部长，已经回广西去，王季文也奉派为广西安抚使，因事还留在广州，我和他会晤后，在广州不住多久，就经梧州回桂林。

解决旧桂系军阀之后，孙中山先生着手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孙中山先生北伐的路线决计由桂林出湖南，攻取武汉。但是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已经和北洋军阀勾结，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北伐主张。当孙中山先生宣布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却躲在南宁，表面上不予理会，暗中则加以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10月从广州起程来广西，准备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督师北伐。10月17日到了梧州。但是为着挽救陈炯明，劝他赞成北伐，不要和北洋军阀勾结自取灭亡，孙中山先生特地由梧州转南宁一行，与陈炯明会晤。会晤后回到梧州，转上桂林。

桂林各界听到孙中山先生来桂林督师北伐的消息，非常高兴，立刻由76个机关团体的代表200余人组成了“欢迎孙大总统筹备会”，推“改造广西同志会”的成员王季文主持。王季文是桂林西乡人，国会议员，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或国民党的党员，原来参加共和党，是一个投机政客，由于参加国会的小孙（洪伊）派反对段祺瑞而到了广州，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之门，孙中山先生以他是广西人，旧桂系军阀崩溃后的广西，散兵游勇很多，长期处于旧桂系军阀黑暗统治的广西人民也困苦不堪，王季文既是广西人，回到广西可能起些作用，就派他为“广西安抚使”回到桂林。

“欢迎孙大总统筹备会”内设总务、文书、宣传、采购、交际、陈设等处，推吴肇嘉为总务处长、谢仲惠为文书处长、石孟涵为宣传处长，其余三处的负责人姓名，现在忘记了。指定谘议局旧址为大总统行辕。谘议局旧址在独秀峰下，风景优美。“欢

迎筹备会”还将谘议局的房子大加修理，向桂林的旧世家借来很多家具、字画、盆景，布置得焕然一新，并在独秀峰后的月牙池修建水榭，以备孙中山先生和夫人游憩。布置和各项筹备工作在10月中旬已经完成了，可是孙中山先生到了12月初才莅临桂林。

当年桂林各界人士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盛况，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孙中山先生是乘小电船溯抚河而上的，当时已届冬令，抚河水浅，小电船不能直驶桂林市区，到拓木圩停泊，孙中山先生在拓木圩登岸，换乘汽车来桂林。拓木圩和桂林市区的主要街道都搭了欢迎的牌楼，桂林市区的欢迎牌楼，每隔数十丈一座，商家和住户家家户户都悬国旗，张灯结彩，如像过喜庆的日子那样表示欢迎的热忱。在将军桥又搭了一座欢迎彩棚。那时桂林城里还没有开辟马路，汽车不能驶入，到将军桥就要换轿子入城。除了少数“欢迎筹备会”的人员到拓木圩欢迎外，各机关、学校、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代表都齐集将军桥彩棚欢迎。而欢迎的群众，包括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各界人士、城市居民，不下3万多人，则分列在大路两旁，从将军桥一直排列到南门城内大街上。那时桂林不过是8万多人口的城市，而欢迎的群众达3万多人，真可说是盛况空前的了。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女士（按：孙中山于12月4日抵桂林，宋庆龄则于21日方抵达。——编者）乘汽车到将军桥彩棚下车，与欢迎人员一一握手为礼。我在欢迎行列中，看见孙中山先生那样和蔼、谦虚、朴素和平易近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在彩棚稍事休息后，孙中山先生即乘八人大轿入南门经正阳门入皇城，至大总统行辕下榻。随来的人员我记得有：总统府文官长胡汉民、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黔军总司令谷正伦、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等等。滇军、黔军、赣军和本营的警卫团有陈可钰、李章达等也同时到达。

孙中山先生是12月4日到桂林的。12月7日桂林76个团体开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先生在欢迎会上说，振兴中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又说：广西本来不穷，宝藏甚多，都埋在地下，倘加开发，广西就不穷。因此，就要发展交通，多办教育，开采矿藏。除了76个团体联合开欢迎会外，教育、妇女、工商各界以及广东旅桂同乡会还单独开了欢迎会。教育界的欢迎会就是由我去谒见孙中山先生致意的。那天，孙中山先生在会客室接见我，他的精神很好，我代表桂林教育界向他致意，我大意说桂林教育界对孙大总统的莅临很兴奋，教育界人士中很多是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主义的，因此准备开一次教育界的欢迎会，请他莅会加以训诲，他听了很高兴，一口就答应了。他还向我垂问桂林教育界的情况，诸如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他都问到，可见他对教师和学生的关心。我见他很忙，虽在会客时间，秘书还拿出许多文件电报给他过目，回答他的垂询后，我就告辞了。教育界欢迎会那天，孙中山先生莅临讲了话，对于革命的道理作了扼要的说明，并说坚持革命者一定胜利，反革命者一定失败，陆荣廷、谭浩明就是一个例子。与会者数百人，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感动。

孙中山先生在桂林，除了主持北伐军事外，还做了很多重要事情。

在政治上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和苏俄专使马林的会见。马林到达广东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进入广西。他到桂林后才知道马林到了广东，就电留守广东的亲信人员，护送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先生和马林会见的情况，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一位秘书透露说，马林在桂林住了一星期左右，孙中山先生向马林详细询问了苏维埃的组织，和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及联共（布）的情况。马林也向孙中山先生询问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马林特别详细地向孙中山先生介绍了联共（布）的党的组织和红军

的组织。这次会见给孙中山先生很大的影响，使孙中山先生对列宁所手创的苏联的革命路线、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组织和党的组织，都有进一步的了解，奠定了“以俄为师”的信心。后来在1923年与苏联特使越飞联合发表宣言，以及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中国国民党，都与这次与马林会见有密切关系。

在经济方面，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着手进行货币改革。当时桂林的货币非常紊乱，除了几乎等于废纸的陆荣廷、谭浩明所发行的钞票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银币和铜币，银币有龙洋、袁头、孙头、法光之类大洋。龙毫、东毫、港毫及各省所铸的小洋，铜币有铜元和铜钱。五花八门，比值不一，使用非常不便。孙中山先生实行他的货币改革的主张，发行一种新货币。这种新货币是不兑现的，但是缴纳政府的税款和购买政府所开设的贸易机构的物资，必须用这种新货币才行，别的货币是不收受的。为着新货币的发行，在桂林开设一所规模宏大的贸易公司，拥有充足的物资，以便持有新货币的人来购买。以此来推行新货币，收换旧币，实行币制统一。可惜后来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先生离桂回粤，入桂的革命部队也随之撤退，桂林又为反动部队所盘踞，以致孙中山先生所实行的币制改革，不得不半途而废。

在交通方面，孙中山先生命令修筑的桂林到全州的公路，亲临主持破土典礼。

孙中山先生很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在军队政治教育方面，他亲自对桂林驻军演讲“军人精神教育”，全部课程包括精神教育、智、仁、勇、决心等五课，每天都是不辞辛劳地去讲课。当时正在整编北伐部队，整编工作由参谋长李烈钧主持，孙中山先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对于军队整编工作的推进，官兵政治觉悟的提高，士气的激励都起很大的作用。在政治宣传工作方面，他对群众作公开演讲多次。地点在谘议局

旧址的大会议厅，讲题为“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演讲的内容和后来在广州所讲的“三民主义”及公开发表于“孙文学说”的“知难行易”一节大致相同。他说到民生主义时，明白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准备。可见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有重大的转变，提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

孙中山先生的生活、作风很是平民化，除了公开对群众演讲外，人民团体有什么集会请他参加，他从不推辞的。他还经常轻车简从地游览桂林的风景名胜，访问市郊的农村和市内的街道，每到一处必定亲切和蔼地和群众谈话，垂询群众的意见，现在桂林还有许多老人记得当年孙中山先生亲近群众的动人情景。

关于北伐军事，孙中山先生于1922年3月15日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原文如此。——编者），并派谢文炳旅进驻全州。正待大举入湘，进攻武汉，谁知邓仲元将军在广州被狙击殉国和陈炯明将有异动的消息传来，群情大愤。孙中山先生决定先行回粤，再改道北伐。于是就在4月11日离开桂林，从抚河经梧州转回广州去了。孙中山先生虽然离开了桂林，但是桂林人民一直怀念着他！

（1965年）

孙中山先生率领海军进攻陈炯明叛军

吴 迺*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密电所部叶举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在林直勉等人的陪同下，辗转到了永丰舰，17日率领海军舰队，开到黄埔河面停泊。当开往黄埔时，曾还击岸上叛军的射击。我当时在海防司令部当少校职员，海防司令为陈策。所以当时的情况，本人是亲与其事，现就个人记忆所及，陈述如下。

一

孙中山先生到了永丰舰（舰长为冯肇宪），着广东省长伍廷芳通告各国驻粤领事，照会他们政府决心讨逆后，即率领永丰、楚豫（舰长为招桂章）、豫章（舰长为欧阳格）、同安（舰长为欧阳琳）、广玉（当时还未派出舰长，后着张德恩负责）、宝璧（舰长为卢善举）开往黄埔，永翔（舰长为丁培龙）仍留在白鹅潭。在开往黄埔途中，省河两岸叛军，曾向舰队射击，中山先生下令放炮还击。因而有人误会以为中山先生率领舰队攻击广州叛军。

当时，长洲要塞司令是马伯麟，和停泊坪江河面的舰队，成为犄角之势。那时鱼珠、牛山炮台已落入叛军手上，对舰队威胁很大。加以停泊在长洲外的三大舰——海圻、海琛、肇和，已为叛军收买，投向叛军，控制了出海口。而叛军洪兆麟部又节节向长洲推进，三面包围了长洲要塞。那时，叶举还以恐吓手段，发给海军人员一个电报，说：“东西两口，密布水雷，善保元首，勿蹈危险”。但经过我们海军人员研究，叛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布

* 作者时为海防司令部少校职员。

下水雷，因水雷用药，要晒干才能装水雷。因而没有理他。

在坪江停泊了几天，一天傍晚，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突向舰队发出讯号，舰队知道要塞已危急。孙中山即在永丰舰上召集陈策等开紧急会议，商讨舰队行动。当时在会议上，曾有人主张乘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不备，冲出去。但更多人主张将舰只转往新造，以免长洲要塞失陷，成了瓮中鳖。经过讨论，认为这些小舰，要乘三大舰不备冲出去，相信很难逃脱，因为这些小舰速度不及海圻、海琛、肇和三舰，而且冲过了三舰，虎门要塞已握在叛军手上，也不易冲出虎门。因此，中山先生决定将舰只转到新造去。但从坪江转到新造，要通过一条小河，在潮退时，河水只有四五尺深，担心舰队不易通过。而叛军方面，亦相信舰队已无法逃脱了。中山先生即召集各舰上老海员，征询他们有关河道的情况，根据那些老海员的报告，从坪江入深井转新造，所经那条小河，平时水深是不够舰队通过，到潮涨时，就够水位行驶。

当晚，等到潮水涨定了，舰队卫护着永丰和宝璧两舰，由坪江入深井，由深井转到新造，到了新造，连夜又在舰上召开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在会上，也出现了两派主张：一派主张直驶上西江，和当时驻防广西的关国雄汇合，然后再配合许崇智部回师广州，夹攻广州；另一派主张，舰队单独攻回广州，一来是扰乱叶举叛军的后方，阻击叛军北上狙击许崇智部，二来等待配合许崇智部，采取水陆夹攻，平定叛军。中山先生的看法是同意后一派意见的。

舰队于拂晓前到达了车歪炮台，当时叛军守车歪炮台的是野炮营，舰队受到炮台上炮火威胁。中山先生所乘坐的永丰先行放炮轰击车歪炮台，双方炮战激烈。永丰舰中了六弹，死伤也很重。初时，中山先生也站到指挥台上指挥，后舰上人员认为太危险，强迫地把他拖回餐厅，并对他说：“你老人家要做工作，那你就做救伤员吧，反正你是懂得医术。”

舰队在上午九时左右由孙中山先生下令向前冲，直驶入白鹅潭。中山先生立即又下令轮番炮轰黄沙车站，但没有攻下，只得退回白鹅潭停泊。

二

当时白鹅潭计停泊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外国炮舰，中山先生的舰队就在芳村附近停泊。有一天，正值吴迺值勤，突见在美国舰和永丰舰之间，爆炸了一个小型水雷，永丰舰和美国舰都没有受创。据说各国领事曾在这一事件后，向叛军提出抗议，不得再有此野蛮行动。而中山先生也命令各舰加强警卫。

当时，叛军陈炯明所部叶举，曾通过陈廉伯商团托人贿赂舰上人员，说只要他们离开舰只，可以送给海军人员一百万港币。但当时海军人员不为所贿。

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不畏叛军威胁，坚持要等待许崇智部从韶关回师广州，以便水陆夹攻广州。在这些日子里，舰队的补给，完全靠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供应，运输则由岭南大学的电船，因该电船悬挂美国旗，叛军不敢搜查和截留。

当时，叛军是企图用小轮船袭击舰队，特别想袭击中山先生所乘坐的永丰舰。因此，中山先生函香港有关方面，购买两大木箱手枪和子弹运到广州。记得有一天，见一艘行走广州和香港间的外国商船，进入白鹅潭就放慢速度，接着见船上抛下两个一米立方的大木箱入潭内。当我们正在惊疑时，就接到了命令，着一些人前往去打捞。捞回来后，拆开一看，只是手枪和子弹，中山先生对我们说：“这是我叫人香港买来的，你们每人配备一支，以便保卫我们舰队。”舰队人员还在各舰准备了蒸汽喉，准备用蒸汽水迎击来袭叛军。

在白鹅潭停宿了一个多月。后来接到许崇智从粤北来电报，说粤军已向龙南撤退，准备转往福建，再从潮汕回攻广州。于是

大家劝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免得冒危险。当时各国领事也希望中山先生离开，以免影响沙面外国人的安全。英国领事还声言：如果中山先生愿意离开广州，他可以派炮舰护送他到香港。在一天中午，见中山先生由电船从永丰舰过了 TRANTOLA 号英国炮舰，随即见该舰升火驶向香港去。（当时在白鹅潭的英国战舰共四艘，它们是摩汉、摩夫、太伦吐那，由于 TRANTOLA 炮舰和摩汉炮舰相似，有人说中山先生坐的是摩汉，这是有原因的。）

在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的当天下午，各舰都通传中山先生已离开，着令舰上人员放弃舰只，化装逃走。当晚，有一部分海军人员上了芳村，转往大涌口太古仓。并推举一个姓戴的（忘其名，是一个海员）和当时行走广州、上海而停泊在太古仓码头的升华轮交涉，要求准予乘搭往港。那个美国人舰长答应说：“我同意搭你们，但我这船是货船。不能搭客。所以要等到我船开行前，你们才能上船”。因此，这部分海军人员在太古仓码头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上船开往香港。

不久，大家就转往澳门，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宿舍，中山先生着当时在香港办事的人每月拨给港币 1000 元给逃亡到澳门的海军人员作生活费（1000 元中，指定拨出 30 元给邓三伯即邓荫南作生活费）。

中山先生到了上海，知道我们海军人员大部分逃到澳门，又知道我们海军人员离开时没带衣物，着胡汉民按我们实际人数，每人发给 1000 元港币作为购置御冬等衣物之需。后来听说在上海接近中山先生的人说：“当时胡汉民是不同意的，说是我们海军人员都是世家子弟，不必挂心。但中山先生认为一定要发。”蒋介石在整理广州蒙难日记中所说，由林直勉和李章达参军办理善后，每人发给一月恩饷，可能是指这一次。事实上，在逃亡前，谁也没领过钱。

三

中山先生当时为什么不坐海圻、海琛、肇和等大船，而却坐永丰舰呢？根据我所知道的，是有下面原因：

北洋舰队在当时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下，南来护法，后来程璧光被刺，就由林葆懌代理总长。这位林代海军总长，对于总统府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成为孙大总统的一个头痛问题。

中山先生对于接收北洋舰队，早就有了考虑。碰巧黄埔海军学校第14期毕业生陈策，通过吴铁城的关系，认识了孙科，由孙科引见，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知道陈策是黄埔海军学校第14期毕业生，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北洋舰队接过来。陈策当时答应了中山先生去想办法。

陈策随即积极联系一些同期同学和一些外省籍的海军人员（包括温树德等人），特别是到黄埔海军学校第15期、16期两期同学会的海庐和澄庐联系（按黄埔海军学校15期同学在珠光路石基里搞了个同学会叫海庐、16期同学会在麦栏街搞了个同学会叫澄庐），经过大家研究讨论，认为可组织人力进行武力接收，具体办法是：一部分人先控制鱼珠、长洲各个炮台；一部分人则到各舰强行接收。

陈策把武力接收的办法告诉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认为可行，并对陈策说：“如果抢收成功，记你们的功，如果失败了，我就下令通缉你们，说你们意图叛变。”陈策为了充实人力，要求孙中山先生派些人手协助。当时，孙中山先生指派民军李天德部派出铁血团一些人协助。按计划把全部人员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负责监督各炮台长，一部分负责乘火轮到各舰强行接收。

布置就绪后，先由总统府下命令，委派陈策任长洲要塞司令。在陈策接任的当天，原先配备的人员，一律穿着长衫，内藏武器，到长洲给陈策祝贺。在饮宴后，大家要求陈策让大家去长

洲各炮台。陈策就吩咐各炮台的台长，每人带三、四人去参观各自的炮台，其实这三、四人就是事先布置好到各个炮台去监视台长的。在前往各炮台参观的人走后，另一部分人员就分乘火轮船，前往接收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舞风几艘北洋舰队的小舰（本来停泊在长洲的还有海防舰队的宝璧、广玉、广金等）。这几艘小舰并没有什么反抗就被接收了，但当接近四大舰——海圻、海琛、肇和、飞鹰时，情势就紧张了，火轮船绕着海圻三匝，海圻不许接近，火轮船就立即打讯号给港上的各炮台，要求向海圻开炮，迫使它就范。当海圻准备升火逃走时，炮台开来的炮火，三弹中了，海圻只得挂白旗，宣布投降。其他三艘大舰也俯首听命了。

在接收了北洋舰队的舰只后，黄埔海军学校 15 期和 16 期的毕业生，要求孙中山先生派他们到四大舰上去。但孙中山先生答复说：“你们还年轻，没什么经验，大家要安心工作。”那时大家很听孙中山先生的话，都服从他的分配，绝大部分广东籍的海军人员，分配到永丰舰上。这就为孙中山先生在陈炯明叛变时移驻永丰舰上布下有利条件。因为舰上人员都是广东籍的，是较为可靠的。

接收后，陈策升海防司令，永丰舰由广东黄埔人冯肇宪任舰长，其胞弟冯肇铭则任海防司令部参谋长。海军司令一职委温树德担任。

在这一段时间，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政局，是要两面派手段的。特别是英国人。当他们看见中山先生率领舰队深入白鹅潭，又看见中国的海军人员那种英勇精神，担心和叛军打起来，不但直接影响了居住在沙面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而且间接影响了他们的通商，所以他们极希望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看见叛军要袭击中山先生的舰队，他们怕波及他们的舰只，又向叛军提出抗议。后来，听说中山先生要离开，英国领事就用

炮舰护送中山先生到香港。对于我们海军人员，相信升华号商船也是得到英领事同意载搭我们的。但英领事却又通知叛军叶举说：“叛徒（指我们海军人员）已乘升华轮逃走”。这是叶举手下人逃到香港，见面时说起的。

(1965年)

对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的回忆

李毓藩*

1922年夏，正当孙中山先生出师北伐的时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举兵叛乱，随后又勾结海军司令温树德叛变，以致孙先生困在永丰舰上达50多天之久，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中山先生广州蒙难。作者对此事曾亲历亲见，现将所经过的实际情况直书以供研究者之参考。

1922年6月16日，我由北方招募官佐士兵回到广州，约午后6时许到海军部见司令温树德。我问他说：“现在局势如何？”他说：“消息不好。”我去北方之前，曾请温树德建议孙先生，如看局势不好，就把炮台炮栓卸下，交给海圻，倘若陈炯明的军队叛变，即使我们陆上一个兵没有，也不怕他。所以这时我又问他：“虎门及鱼珠炮台炮栓事怎么样？”他推脱说：“先生说临时再卸。”我说：“临时卸，恐怕来不及了！”他说：“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再谈。”

第二天午前4时左右，同安舰上来人对我说：“昨天晚上10点多钟，总统到达海军部，旋即听见观音山枪声四起，海军部人员全体撤到各舰，司令护送总统上楚豫，命令各舰开赴黄埔集会，留下同安，候你上船，即开赴黄埔集会。”当我乘同安舰赴黄埔，经过车尾炮台时，见炮台上也没有什么动静；到了黄埔，回到海圻，孙先生、温树德和海圻副长赵梯昆都不在舰上。我问值日官：“司令在哪里？”他说：“今天早晨，司令回舰，坐了一会和副长下了小火轮开走了，现在哪只舰上不知道。”我问：“大

* 作者当时系海圻号军舰协长

总统在哪里？”他说：“听说在楚豫舰上。”我就到楚豫舰上，见先生一人坐在官厅里，别无他人。我问孙先生：“陆军怎么样？”孙先生说：“陆军有魏邦平第三师。”我说：“听说魏邦平靠不住。”孙先生说：“靠得住。”我说：“不管他靠得住靠不住，我们海军，先生要怎样就怎样。”我敢说这话是因为当时我认为第一，温树德当舰队司令是出自孙先生一手栽培，维护孙先生该是没问题的；第二，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的实权是掌握在改造海军敢死队员的手里；第三，肇和副长盛廷祺和我都是一心维护孙先生的。

孙先生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好吧，我为国尽忠。”言辞有作战之意，我即辞别先生回海圻。当日午后约2时，在海圻上听见城里炮声响起，就知道舰队进攻省城了。事后得知先生由楚豫转到永丰舰，命令温树德率永丰、永翔、楚豫、同安、豫章五舰进城炮击叶举叛军，可是叶举的部队埋伏在各商家楼上或各巷内；各舰见有穿军装的即开炮轰击，没有一定的目标，敌人则用机枪、手枪和来复枪还击。舰队行驶先施公司旁边时，敌人的手枪都能打到我们舰上，因此楚豫舰上阵亡士兵3人。而在敌我两方互相对打时，魏邦平的三师一枪未发，撤出省城。五舰驶赴省河，经过中流砥柱、海珠、白鹅潭、车歪炮台等处，边航行边还击，绕回黄埔。随后孙先生又亲自率领五舰驶赴省河，炮击叛军一次，仍返回黄埔停泊。这天温树德和副长赵梯昆都未回海圻，该舰由我（海圻协长）负责，这是先生蒙难第二天的经过情况。

6月18日午后1时许，孙先生亲自派人把黄埔炮台炮栓送上海圻。我说：“现在没有必要了。”孙先生说：“不要叫敌人抢了去，威胁我们。”我引导孙先生到了大官厅坐下。我正和孙先生谈话时，岗上报告：“有英美两舰长来拜访大总统。”孙先生说：“叫他们上来。”我到船面把他们引进官厅，他俩坐在孙先生两边，我立在先生身后。我见孙先生态度从容，气魄伟大，英语流

利，谈话合乎逻辑，有问必答，两舰长无理可说；虽然心犹不甘，但只有摇头而已。孙先生和两舰长谈话的情况是这样谈的：其中一个说：“你们海军进城炮击老百姓，这是不对的。”孙先生驳斥：“我打的是叛徒陈炯明，不是老百姓。”这位舰长又说：“你们打不着军队，可是打着老百姓了。”孙先生答：“军民混杂，难免波及。”这位舰长提出：“你们不但打老百姓，并且把炮弹打到我们沙面来了。”孙先生声明：“我不但不打沙面，我还叫舰队保护你们。”这时候，另一个舰长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炮弹头给先生看，说：“这个炮弹头，除了你们海军，陆军是没有的。”孙先生指出：“这可能是流弹。”有一个舰长又提出：“你们海军好不好不再进城打了？”孙先生说：“可以，只要叛军不打我，我可以暂时不打他们。”这位舰长又说：“我们回去告诉陆军不要打你们。”说到这里，两舰长站起来向孙先生告辞，我送他们下船坐他们自己的小火轮开走了。英美两舰长走后，先生也就回鱼雷局方面去了。先生不住海圻，我们也没有让先生住，因为海圻离鱼珠炮台只有二三百码的缘故。先生走后不久，约4时左右，岗上报告说：“来了一只汽艇，让不让他停靠。”我跑上船边，见汽艇上，除开汽艇者外，艇上有两人，一男一女，我问：“你们是哪里来的？”男的说：“我是伍朝枢（外交部长），送夫人来找大总统的，大总统在船上吗？”我告诉他：“在鱼雷局那方面。”汽艇掉头就开走了。这是先生蒙难第三天的经过情况。

6月19日午后2时许，海琛炮手孙玉哲是改造海军敢死队员提升的。来到海圻前舱大叫大嚷说：“我们不能对不起大总统”等语。当时认为有人挑拨孙玉哲在我们内部捣乱，以便从中渔利。事后得知，他到永丰舰去见先生，先生为鼓舞士气，替他改名孙勇。有人告诉我，我到前舱问他：“谁对不起大总统？”他答不出。我说：“没有人对不起大总统，你回你海琛去吧！”他就走了，过了一小时后，肇和来人告诉我，孙玉哲又在肇和同样大叫

大嚷；我又到肇和劝他回了海琛，他很不高兴。从他的行动来看，他可能已看到我们海军是有问题的；他表明各舰士兵维护孙先生的心情。傍晚副长赵梯昆回舰后，关于孙先生和温树德这两天在鱼雷局那方面的情况及温指示他做些什么事情，他都未谈，只说：司令坐着楚豫率同安驶赴白鹅潭停泊；当时我认为温是和孙先生商量过的，也不多问，同时这两天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未向赵及温报告。到8时许，肇和副长盛延祺到海圻上质问赵梯昆说：“听海琛上的人说，海圻、海琛要移锚位？”赵说：“不错。”盛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肇和不能动么？”（但外人不知）赵说：“司令的命令。”盛说：“好啦，8个俘虏应该放在你海圻上，我把他们送上你海圻，你们要开走，我肇和就开炮揍你们。”赵说：“我们的炮不见得比你的少，也不是摆着好看的。”于是两个就吵起来了，当时我想海圻、海琛如移锚位，肇和就成了鱼珠炮台的“死靶子”了，肇和是一定不答应的，并且也失去了孙先生座舰外围的保护，因此，毅然说：“肇和不要把俘虏送过来，我们海圻也没有地方放他们，我们暂时也不移锚位，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海圻拖着你肇和走就是了。”他未再说什么，而盛延祺怒气冲冲的走了，结果两舰就未移锚位。这是先生蒙难第四天的情况。

6月20日，午后4时许，肇和舰长田仕捷（江苏人）打旗语叫我过肇和，我到肇和和他见面时，他说：“鱼珠炮台总台长吴礼和（安徽人）昨天午后来我舰找你，岗上对他说你已不在肇和上了，他说要见我，我让他上来和他见面，他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造海军时，他怎样帮助你对付海琛舰的事，对我也谈了一些表示好感的话。现在他来了一封信，你看。”我接过信来一看，信内大意说“我们本是一家人，无论如何不能起冲突，请你来炮台，我们谈谈”等语。当时我想田的意图，是要我和他分担责任，便对他说：“肇和离炮台不过百余码，船又不能动，打起来

对于肇和舰是不利的，你可以去看看。”我回海圻，他就去炮台了。

次日（6月21日）田又约我到肇和，他对我说：“吴礼和约我进城见了叶举（陆军总指挥），我又去楚豫见了司令，司令说，叫你进城，你不要回海圻了，拿我的小火轮送你进去吧！”至于他和叶举怎样谈的，他一字不提，我也不问。我认为陆军叛变，先生上了海军船上就安全了；温树德虽然率领楚豫和同安两舰开往白鹅潭，孙先生方面还剩有飞鹰、永丰、永翔、豫章四舰，外围尚有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保护；当时我急于知道温率楚豫和同安驶进白鹅潭停泊的意图，于是我就坐肇和小火轮进城，到楚豫上见到温树德，他对我说：“楚豫在此抛锚，北面是沙面租界，停有英美两军舰。南面车歪炮台要是打我们，炮弹就打到沙面租界去了，他是不敢打的。”我没有吭声。从此我白天上楚豫，晚上回家。这是孙先生蒙难第五六天的情况。

孙先生在船上共住了55天，在这6天以后，发生了一些情况，时间就记不清了，只能说有那么一天发生那么一件事。

有一天居正到楚豫舰上和温树德见面，探听温的态度，谈话间，温未表示意见，海琛副长张汉说话最多，总的说来，大意是说大总统不相信海军，我也说：“可惜没有把炮台炮栓给他卸下来，现在受他的威胁。”居正回去还不据实报告先生么？我们是因为没有办法对付敌人，心中焦急才说这些话的，但孙先生听到当然心中很不愉快。

7月10日午后2时许，海水涨潮最高时，我们在楚豫上，听见车歪炮台那边炮声响得很激烈，等一会炮声停止，见豫章在前，永丰在后，徐徐驶进白鹅潭，永丰单独抛锚，豫章直靠同安而后抛锚，英美两舰一见永丰和豫章两舰驶进白鹅潭，立即准备作战，放倒栏杆，站炮位，把炮口指向永丰、豫章两舰，我们没有理他们，英美两舰旋即恢复正常。同安舰长田炳章和豫章大副

吴煦泉不愿和欧阳格一致行动，离舰上了楚豫。据吴煦泉对我说：前几天蒋介石由上海来黄埔永丰舰上，和孙先生谈了几天，先生很高兴，蒋介石和欧阳格也把永丰和豫章两舰驶赴白鹅潭停泊，孙先生同意，当即委欧阳格为临时总指挥，蒋介石为参谋长，吴煦泉为副官长，趁潮水涨潮的时候，拔锚起航，经过车歪炮台时，敌方炮击我们，我们边航行边还击，没有伤亡。待至永丰舰抛锚后，海关英人上永丰对孙先生说：“你们的船，不能在此抛锚。”孙先生问：“为什么？”英人说：“此处离沙面太近，你们两方如打起来，危害我们沙面。”先生愤慨地说：“我沙面租给你们，这水没租给你们，我舰有权在此停泊，你们没有权干涉我。”这位英人还喋喋不休，先生理直气壮地说：“你不要多说，你不服气，你可以叫你国里的兵舰来打我。”再不让他多说，就把他轰下船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上楚豫，到沙面一看，楚豫开走了。当时我想温树德怎么这种干法，再回想我们改造海军时，多少人劝阻孙先生不要答应我们，理由是改造海军成功固然是好，不成，政府在广东就站不住脚了。可是孙先生说：“假如不成，我离开广州就是了。”待改造成功后，因内部的人争权夺利闹矛盾，孙先生左右为难，司令和各舰长的命令，一时未能发表；后经我向孙先生说了话，孙先生才发表温树德为舰队司令兼海圻舰长。现在孙先生蒙难，温树德竟日益离心离德，不和先生见面。孙先生座舰永丰在黄埔，他坐楚豫来白鹅潭；待永丰开到白鹅潭，他又把楚豫开回黄埔。我见此情形，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处去，只好回家，不久有人到我家告诉我说：“司令在西堤亚洲饭店。”我到亚洲饭店，一进他的房间，见有一人坐在里边，温对我说：这是何子奇（江西人，听说做过韶关要塞司令）。何当即对我说：“我和子培（温的号）是老朋友，是来帮他的忙的，也是来帮你们海军忙的。”当时，我还认为是真的，不疑有他，实

实际上他是陈炯明的代表，早已和温有联系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在另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公开的代表刘大同（山东人）和他儿子刘次彭，还有一个替他跑腿的孙尧夫，我和他们以前都相识，他们是新从外地来广州的。刘大同和我一见面就说：“一定要把孙文撵出广东去，你们不能让他住在你们船上。”过了几天，刘次彭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老陈真毒辣，他先想使叶举部队回师广州，要求孙文恢复他的本兼各职，达不到目的，他就最后决定由李云复（李是湖南人）这一旅围攻总统府，打死孙文，待他得知孙文死后，就赶回广州，假意伏尸痛哭一场，然后装模作样的假查一阵，将李云复枪毙以谢天下。”这是陈炯明第一次想致先生于死地的阴谋诡计；由于孙先生事先得知叶举的行动计划，陈的阴谋未能得逞，李云复也免遭一死。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前海军总长汤廷光说：“李毓藩是海圻协长，在岸上干什么？”我说：“他管得了我！”这个人说：“不是管你，因为我们舰队攻城第二天，叶举找他设法要海军投降条件，汤廷光就和李国堂、何海澜等商议派何海澜向叶举要求每月发给海军多少款，多少煤炭，叶举都已答应，现在叶举不和他接洽了，他很恼火。”（蒋介石他们写的先生广州蒙难记里有海军败类何某等字样，就是指何海澜说的。）

温树德住在亚洲饭店时，一天我见何香凝女士去找温树德，据说，是想法营救廖先生的，他们怎样谈的，我不清楚，但过两天，廖先生释放出来了；叶举一方面释放廖先生，一方面报告陈炯明，及至陈回电不准，而廖先生早已离开省城，叶举亦无可奈何。

7月19日永丰附近发现水雷，企图轰炸永丰，致先生于死地，经永丰舰上的士兵打捞上来。我们大家认为这是陈炯明奸细勾结海关上的人，利用海关查私舢板施放的。当时温树德对先生的态度已很暧昧，引起永丰全舰人员心地惶恐。这时候孙祥夫

(陆战队司令，陆战队未成立) 避居沙面日本领事馆里，我闷极无聊，到他处闲谈，韩恢（江苏人，后被江苏督军齐燮元所杀）也到孙处，我们偶尔遇见，他对我说：“孙先生叫我设法找你。”（他们是不敢上岸的）我说：“我想去，但因船上戒严，我去不了。”他说：“我带你去。”于是我俩雇了一条舢板驶到永丰船边，永丰梯子整天拉起来的，我们由船尾爬上去，他一进官厅门对先生说：“屏华（李毓藩的号）来了。”孙先生站起来把手一摆，蒋介石等四人就出去了。孙先生回头把门关上，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海军情况，现在怎么样？”我说：“外边谣言很多，但不管怎样，实权在我们手里，他们当不了家，先生尽管安心，等着许军长（许崇智）的军队快打回来，我们就开炮响应。”先生拍拍我肩头说：“走吧！好好干。”我离开永丰到了沙面，心中非常难过，低着头一路走一路想，我想到亚洲饭店和温树德谈谈。于是我到亚洲饭店，一进温树德房门，见有何子奇、温树德和海军部秘书副官长以及其他各处长，海圻副长赵梯昆也在座，围坐一个圆桌子谈话，见我走进，半天没有一个人讲话，我看风头不对，就不客气地说：“你们有事怕我，我走开。”海军人员没有一个讲话的，惟何子奇说：“屏华你不能走，我们有事商议。”我回过身来，有一个人让了一个座给我坐下，我对何子奇说：“有什么事，你说吧！”何说：“孙文不走，陈总司令不能回来。”我说：“那有什么法子，他不走，我们又不能撵他走。”何说：“叫永丰归队。”我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叫永丰归队，因为孙先生在船上，我们不能下这样命令，况且孙先生在船上，你就是下命令，他也不会听你的。”何说：“把肇和开进来。”我说：“把肇和开进来干什么？”何说：“把肇和开进来，命令永丰归队。”我说：“他不归队呢？”何说：“开炮打。”我说：“打死孙先生怎么办？”这时他变了脸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打死不就打死了么？”我站起来手指着他的脸也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说的不能算数。”我开了门，把

门一摔，走出亚洲饭店，到了海军部无线电台打一电报给肇和副长盛延祺，电报说：“温司令一切命令，我们都听，惟有叫肇和开进白鹅潭，这道命令我们一定不听。”电报发出，我就回家去了，再未去亚洲饭店。第二天我接到盛延祺的来信说：“电报收到了，我和张汉（海琛副长）一定和你一致行动，你放心大胆的干吧！”同时有人来我家告诉我说：昨天无线电官见你走后，立即把你的电稿送给温司令看，司令看完，放在桌子上，何子奇拿起来看完说：“子培怎么办？”司令低头不语，何子奇站起来就走了。此后我们海军再不见何子奇的影子了。叶举方面只剩下刘大同父子三人。这时候我这个幼稚人才明白，永丰舰自7月10日驶进白鹅潭，至19日永丰附近发现水雷，在这九天期间，何子奇、刘大同和温树德在亚洲饭店，终日无事，谈笑自若，原来是有所等待，企图暗害孙先生，因放水雷没有生效，又想开进肇和击沉永丰舰，这就是陈炯明的党羽，伙同一些叛徒，一而再再而三的企图暗害先生，但终未得逞。

何子奇走后，他们暗害孙先生的方法都用尽了。于是刘大同天天找温树德想办法驱逐孙先生。最后温对刘说：“你找屏华商量去吧！”刘大同找我，我说：“好吧！你对叶举说，让我们海圻、海琛、肇和三舰驶出虎门外停泊，而后我们再想法请先生离开永丰舰。”当时我们并不敢指望能得到叶举的许可，据说，刘和叶力争，叶才许可的。当刘告诉我说：“叶举许可你们三舰开出虎门炮台去。”我立即到亚洲饭店告诉温树德，温当即电令海圻副长赵梯昆率领海琛、肇和尽快开往赤湾停泊。叶举一方面许可我们三舰开出去，一方面电告陈炯明，及至陈回电不准，而三舰业已驶到赤湾了。三舰开到赤湾，我们自由得多了，不料三舰开出虎门以后又给温树德投靠吴佩孚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圻、海琛、肇和三舰开往赤湾以后，我两三天没有去和温树德、刘大同见面。后来有一天，刘大同派孙尧夫找我说：“刘

先生叫你。”我未去，到第二天，孙又来找我，怒气冲冲地说：“刘先生叫你，你到底去不去。”我这天故意没有去，我也想不出好方法来对付他，正在作难。有一天（约8月10日）听说孙先生已离舰赴沪。（8月19日）说是搭日舰走的。离舰原因是因许崇智的军队已退往福建边区，孙先生再在舰上住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并且海军各舰煤炭、伙食都成问题。这才决计赴沪。

孙先生赴沪以后，我要赴沪探望先生。温树德同意我的意见，我到上海孙先生对我说：“我六个月以后回广州，你回去吧！”至1923年1月间，滇桂军首先攻进省城，陈炯明的队伍溃退惠州。我代表海军赴沪欢迎孙先生回粤。孙先生对我说：“英国政府向来不准我在香港逗留超过24小时，我这次回广州，想在香港多住几天，已电令伍梯云（外交部长伍朝枢的号）向港督交涉，现在尚未回电，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去。”我回香港第二天，先生也到了香港。住了几天，至2月21日回广州。

（1966年）

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时二三事

郑砺石*

1922年6月16日夜，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他的部下叶举充任叛军总指挥，洪兆麟部下旅长李云复则担任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先生于死地。当时中山先生几次得到警报后，始于深夜11时化装为医生，由林直勉、林树巍等护卫出险，直登永丰舰，和叛军相持50多日，才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去。这一次战役，表示着孙中山先生的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历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后来有许多著述当时中山先生艰苦卓绝的精神，两军交战情形和广州市的混乱状态等，但其中仍有片段的事实，未曾提及者，兹特补充如下。

1. 孙中山先生在当夜能通过叛军的重重步哨而出险，实赖在吉祥路放哨的一个粤军连长赖达之力。赖是高州人，在未发动之前，走报他的同乡陆耀文。耀文得报后，即引赖达往见孙中山先生的亲信林直勉、林树巍等，两人遂急忙上到观音山，将紧急情形，向中山先生告变。因得赖达之力，故中山先生和林直勉等，在深夜时间，有可能穿越过戒备森严的重重步哨，安然无事而登永丰舰。

2. 陈炯明未叛变之前，中山先生督师桂林的时候，曾和苏联代表马林商谈多次，当时有两个电报给与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恺，促他赶快进行联俄。这两个电报保存在总统府财政部金库的铁箱里，陈炯明叛变后，打开了金库，两个电报，遂被叛军取

* 作者于孙中山蒙难时在广州。

去，献给陈炯明。未几，陈炯明竟把这个制成电版，在香港报纸上刊出，他的用意，无非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向外宣布，去献媚帝国主义者和北洋直系官僚军阀，以为互相呼应之计。

3. 在永丰舰的时候，与陆上交通已尽行断绝，关于联络和伙食给养，极成问题。幸当时有一海员工会的工人名朱克勤者，特向航商李达朝，借得小轮“鸿信”号一艘，和联义社赵植芝、黄林等，冒着万险担任与各方联络交通及往各属圩市采购粮食。因此，永丰舰坐镇在白鹅潭，不怕被敌人封锁。

又当时陈炯明部航空处长陈永善（港商陈席儒的儿子）力荐港商徐直充任港南船澳局长，叫他敷设水雷，以便撞炸永丰舰，而永善则驾机在上空轰炸，以成上下夹攻之势。不料永丰舰防备周密，无法得手，徐直且被海军捉获，杀之于楚豫军舰。陈永善图炸永丰舰的计划，至此人为失败。

4. 陈炯明叛变之后，广州的报纸，不少向陈炯明献媚，任意歪曲事实，向孙中山先生大肆攻击，以为到了立即升官发财地步。好像陈公博等主办的广州《群报》、政学系容伯挺、冯春风等主办的《中华新报》，无日不著论向孙中山先生肆意污蔑攻击，女界又有黄璧魂、胡良玉等则发起“广州各界请孙下野同盟”为叛军撑腰。一时舆论，类多盲目附和。同时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受了陈炯明巨额贿赂，把泊在黄埔港前的几艘军舰，驶出虎门，表示不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而长洲炮台守将孙祥夫又把这座要塞献给陈军，表示投降。在这个时候，形势渐呈恶劣，正是进退两难，而中山先生处之泰然，并不因此而畏缩灰心，反而因此而加强联俄联共的信念，为将来削平叛乱，完成北伐打下良好的基础。

5. 广州在叛军动乱期间，永丰舰和叛军正在双方炮战，整个广州市正处于混乱状态中，朱克勤等乘机运动工人总罢工。当时有部分工人不敢发难，恐遭叛军屠杀，只有广州市电灯局工人

不畏强暴，竟于某夜总罢工，又把灯厂的机件破坏，令到全市都为之黑暗。他们不怕厉害，以正义支援永丰舰作战，充分表现革命精神，可惜处在叛军淫威下，卒被强迫复工，工头邓本遭到捕杀。

6. 叛军围攻观音山的时候，总统府卫队扼守越秀楼，奋勇拒敌，以寡敌众，使得叛军伤亡惨重，后来因子弹不继，始退出。战事结束后，中山先生迁居上海，至民国 11 年 12 月中滇桂联军东下，讨贼胜利，始重返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参军长以当时卫士队拒敌得力，请予奖励，于是在 13 年元旦，由中山先生亲自向卫士队发给奖牌奖章并致训词鼓励，领奖者计有官长 5 人，卫士 57 人，一共 62 人。

(1962 年)

孙中山派我策动飞行人员反陈炯明的经过

胡汉贤*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登上永丰舰，指挥讨逆，并电已攻下赣州的北伐军回师靖难。北伐军与叛军激战于韶关附近帽子峰、马坝一带。因梁鸿楷第一师陈修爵团投入叛军，倒戈相向，北伐军遂失利，退至南雄；本拟再部署进攻，旋接香港来电，获悉孙先生已离开永丰舰赴上海。北伐军乃分两路撤退：一路由李烈钧率领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的赣军和陈嘉祐的湘军，进入湘南；另一路由许崇智率领粤军和李福林的福军和黄大伟督率大本营亲军一团经江西三南、瑞金，转入福建，后协同皖系王永泉部攻占福州，改组成东路讨贼军。

我当时在北伐军飞机队任飞行员，也随许崇智那一路进入福建。飞机队在北伐军回师失利后，在始兴都塘铺机场将全部飞机6架及弹械销毁，免为叛军所用。由飞机队正队长张惠长率部分员工，随李烈钧进入湖南，后张转赴上海见孙先生，另由副队长陈庆云率全部飞行员随许崇智到福建。

行军途中，备尝艰辛。飞行员陆露斯因病死去。周宝衡、余启成等在筠门岭跟不上队伍，为农民收留，后到汕头转香港。我和蔡斯渡等抱病行军。我军抵福州，我即转沪就医。到沪后，先见到胡汉民，后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询及华侨飞行员情况，我据实以告。孙先生见我有病，即叫张惠长送我入虹口医院疗治，住院差不多一个月，身体恢复健康出院。

这时，恰好杨仙逸自美国抵沪，带有在美学成飞行员黄秉衡、林伟成等十余人，其中并有两个飞机制造家，还在外国购有

* 作者曾为强华飞行学校校长，北伐军飞机队飞行员、飞机联络专员。

一批制造飞机材料回来，准备自行制造飞机，随后制成轻型轰炸机。

孙中山先生因见上次委任朱卓文为航空局长、张惠长为北伐飞机队长，两人均不称职，又互相倾轧，对队员不能团结，出发时又败坏军风等，决定不再任用；乃在沪另特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配合东、西路讨贼军，回粤讨伐陈炯明。孙先生并对杨仙逸指示，前留粤第二飞机队队员，因受朱、张排挤，现为陈逆所利用。彼等均是在外国学成飞行归来的，其中有数人属加拿大强华飞行学校学员，系中华革命党党员，曾参加讨袁华侨敢死队，都属热心党国同志，现虽误入歧途，可设法策动他们反正讨逆；其次，广东尚有飞机十余架，如能令飞行员将机队就地起义，无论对我们回粤军事还是发展航空事业，均有莫大好处。

孙先生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后，又亲书“特派胡汉贤为飞机联络专员”手令，叫杨仙逸带给我，要我回粤策动飞行人员反正讨逆。因我曾任过强华飞行学校校长，与留粤飞行员熟悉。杨同我去见孙先生，请示回粤机宜。孙先生指示说：你此次回粤，专为策动飞机队反正，责任重大，宜秘密行事，杨局长现在未能回粤，你可先到港与卢师谛联系，我已有电着他接济。在杨局长未到港之前，各事可直接向卢同志联系请示。

我奉命后，于1922年10月底（或11月初）离沪到港，先到大东酒家见到卢师谛（卢当时被孙先生委为策反讨陈专员驻港），打听粤省情况后，即返广州。先到东堤荣利新街林安家里，找到强华飞行学校同学，留粤飞行员林安、余百炯等，以同学的情谊和他们谈话，互诉别后情况。发现他们还是拥护孙先生，从逆是迫于不得已。我问及前留粤飞机队长，现为陈逆任命为航空局长的陈应权的情况，他们反映陈应权也是拥护孙先生的（因陈是华侨出身，过去曾受孙先生的培养），但很仇恨朱卓文对他的

排挤。我见各人情况如此，即开门见山，说明孙先生派我回粤策反。林安等人表示响应，并提议找陈应权商量。于是我们便到陈应权家。适是日星期天，陈应权在家，见到我非常诧异，问我从何而来。我答经沪回。他又问孙先生情况如何。我据实以答。再问朱卓文和张惠长的情况。我说孙先生极不满意他们两人，以后不加任用，现杨仙逸带领一批在美学成飞行人员到沪，被孙先生任为航空局长，我们发展航空事业，将有一番新气象。林安即将我来意剖白。陈云我航空界同属一家，将来无论何人居首，我都赞成，惟朱卓文我则反对，你既负此责任回来，不妨与我和各华侨队员见面。我说恐怕泄漏消息。陈云，我们是患难同志，担当决不负你。次日陈邀同亲信队员十余人到他家吃便饭。商谈之后，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孙先生，愿为革命效力。我告以各人原有职位不变，于是各人满意告别。我顺路到竺横沙探望由福建北伐军归来的航空局机械工人向日葵，随后我同向日葵回港，向卢师谛报告回穗初步情况，并电杨仙逸转报孙先生。11月间，奉到孙先生密电，说广西滇、桂联军正东下讨伐陈炯明，驻江门、西江一带的粤军中，亦有一部分拟乘联军东下反正响应，四处民军也已运动成熟，就地起义，共同讨逆；要我加紧进行策反飞机队工作，最重要是保存原有各机勿令损失；并说杨仙逸不日到港，最后叫我再回穗主持策反工作。

我接密电后，恐频频来往港穗之间，为陈逆所部获悉，改饬同我来港的向日葵回省，邀同林安、余百炯等来港，商定最后进行步骤。隔天，向日葵与林安、余百炯、胡荣焕等来港，我即同他们往大东酒店见卢师谛。卢说：粤军与海军一部分，已集中江门，由古应芬主持，一俟滇、桂军进入粤境，即在江门联同各处民军起义响应。你们飞机队，最好能起飞向陈逆总司令部轰炸，如不能，需将各机飞往江门。我现在联络海陆军，对于飞机队反正事，你们可与胡汉贤具体联系，但事情切勿泄漏，以免影响全

盘作战计划。又说昨接杨仙逸电知，他日间亦到港，你们需要各物，我当尽量接济，并嘱我带林安等回寓，商定一切后，即刻回省，不可逗留。

我同林安返寓后，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反正计划如下：（1）认为起飞轰炸陈逆司令部一事，在联军未进入广州时，机队单独行动，过于冒险，不宜进行；（2）将所有飞机飞往江门，因江门只有水机场，没有陆机场，决定只将水机飞往，陆机将重要机件拆除，假作修理，存放机库，运动可靠的掩护队予以保护，剩下的飞行人员到时躲藏起来；（3）在叛军逃跑时，可看情况起飞侦察，必要时跟踪追击。

反正计划商定后，林安等即回省按计划行事。我则往江门见古应芬，说明来意，要他准备接应水机来江门。我碰见朱卓文、陈策也在江门，他们问我来干什么。我因事属军事秘密，又孙先生已不再任用朱，故对他们伪说是返乡（开平）探亲，顺道经此。接着我转到广州秘密策应，发现飞行员陈炎长近日与陈逆总司令部来往甚密，恐有破坏行为，着陈应权设法加以羁縻。我则在竺横沙向日葵家里躲避。幸陈炎长素有神经质，口不择言。他对陈应权说，陈老总（陈炯明）近日拟委我为飞机队第二队队长，你是否同意？陈应权伪装赞同，并伪为他调编队员。他非常高兴，对陈应权说，我们是兄弟，又与陈老总同县，他决不有负你我。陈炎长又要求陈应权往总部催发委任状。陈应权伪予答应，以安其心。

1922年12月下旬，滇、桂、粤联军克梧州，粤军第一、三师等起义响应。叛军节节败退。1923年1月初，滇、粤联军占领肇庆，广州震动。陈逆总部命令飞机队派机前往侦察，由队长余百炯与陈炎长分驾水机两部飞到西江一带侦察。原拟不携带炸弹，陈炎长坚持要带炸弹。当时逆军总部军官在场，同意陈炎长意见，但吩咐不能乱炸，因怕军队未能识别，恐有误会。陈炎长

飞到肇庆，见联军东下，竟投弹一枚而回，非常高兴，向逆军总部报告。逆军总部也因此不怀疑飞机队有变。

这时，讨贼联军已攻占三水，直逼广州，大约是1月13、14日间，我即令林安、余百炯带领水机6部与飞行员10余人，伪托以侦察为名，向西江飞去，转到江门北街水面降落。陈应权为对付陈炎长有异动，未有飞去。叛军纷纷逃命，退往东江，无暇顾及飞机队之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策反计划。是晚桂军沈鸿英的李易标部最先进入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于一两天后始进入广州。

克复广州次日，卢师谛、杨仙逸带同一批由美国新回的飞行员到省，杨即同我和陈应权往大沙头航空局接收。当时部分飞机已拆卸，部分水机则在江门尚未飞回。杨仙逸即派我与陈应权同往江门将6部水机及人员飞回广州。但当我们到达江门北街时，朱卓文用前航空局长名义，将飞机加以接收，并和陈策拟扣留陈应权。我与之交涉，拿出孙先生委我为联络员手令，并说明孙先生已另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大家闹到古应芬处，古偏袒朱卓文，不给我接收，托词须再请示孙先生。我即电知广州杨仙逸转电上海孙先生让古应芬照办，旋即接孙先生电示古应芬说：航空局长已另委杨仙逸继任，所有飞机及人员全交杨接收，朱卓文不得干涉。他们至此才没话说。但陈应权因此惧怕朱卓文等仇视打击，连广州也不回，即逃到香港，脱离了广东航空事业。我和飞行员周宝衡、陈秀、张同发等，将6部水机飞回广州大沙头交给杨仙逸接收。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第二次任大元帅，而命杨仙逸召集反正的飞行人员加以慰留，一律委用。但经此次变故，这些人多有惧怕心理，恐有类似朱卓文的人，以“投逆”罪名加以打击。同时杨仙逸又经美国带回一批亲信飞行人员，人多机少。于是这批曾依附过陈炯明的飞行人员各散西东，其中有

强华飞行学校学员一批也离去，各谋出路，如李仲唐往云南，林安往上海，余百炯、余启成往厦门，黄家达返乡（台山）务农，黄荣臻、胡汉臣、马少汉、甄健民、陆求胜等返回美洲谋生。我则继续任航空局飞行员，旋被孙先生委为开平县长，筹措军费支持当时驻开平、恩平一带的梁鸿楷、黄明堂、林树巍等部队对邓本殷部叛军作战。

(1966年)

陈炯明叛变后我奉中山先生之命赴越南工作经过

张 猛*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从江西回师讨陈的北伐军失利后，中山先生旋即离粤赴沪全面筹划革命大计，在这一时期中山先生对国内重大问题作了如下部署：（一）军事上主要迅速讨平叛乱，巩固两粤革命根据地；（二）政治上对北方段、吴采取暂时妥协，尚望谋求和平途径，实现一贯主张的兵工政策；（三）党务方面鉴于此次陈炯明叛党教训，认为非“以俄为师”大加改革不可；（四）财政方面即命邓泽如在上海成立筹饷局，向国内外筹募军费，等等。这些重大措施除分头派人进行活动外，对安南（越南）方面有关讨陈及筹饷等工作，中山先生即派我前往担任，由于先父张云田早年参加同盟会，是中山先生的忠实战友，受先生委托，在越南海防借设馆教书为名，掩护同志进行革命活动，故先母越南籍，我也生长在海防，因此我在越南有一定历史和社会关系。迨至先父在镇南关（即现友谊关）起义殉难后，我得到革命前辈的栽培，回国升学，旋即追随先生从事革命工作，乃蒙先生爱护有加，先后派我充任副官、咨议等职务，经常担任与各部队将领联络、接待、传达以及慰劳官兵等工作。当陈炯明叛变事发生后，我曾一度奉命往柳梧一带，策动滇桂粤军东下讨逆，任务完毕后，又奉命转赴越南工作，兹将赴越南工作经过，追述如下：

* 作者时任孙中山的副官。

一、中山先生对越南工作的指示

1922年10月间（约中秋节后）我从柳梧联系滇桂军任务完毕，回到上海向先生复命后，许崇智部虽已胜利攻占了福州，但部队急需御寒冬服，一时无法应付，先生得悉后即将上海临时筹募的第一批棉背心及卫生衣等慰劳品，命我兼程送往福州先予补充。我抵闽后在许部停留一个时期，复得先生电召回沪，约在1923年1月下旬返抵上海后，先生即命我前往越南工作，在行前先生对我作了如下的指示：（一）向越南本党同志和侨胞宣传陈炯明叛变的真相，并发动他们讨贼；（二）发动他们捐募军费，以便早日平定粤局；（三）陈炯明与云南唐继尧有勾结，到越南后就近打听云南最近动态。先生再三面嘱抵越后，协同当地支部，务必将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及破坏北伐的叛党叛国的罪行，多多向同志和侨胞宣传，并嘱他们不要灰心，终必将此贼讨灭，言下情绪激昂，极其愤慨，并嘱将印好的《和平统一宣言》及《致本党同志书》一捆，和海防、河内两处新成立的两个国民党支部长印章两颗，以及致两个支部长阮其昌、梁耀池亲笔信两件交我一并带去。

二、在海防工作情况

我奉命后随即取道香港，乘轮转赴海防，约2月初到达海防后，即与海防党支部长阮其昌、财务钱显章，以及与我父亲生前有密切关系的老同盟会员黄隆生等会商一切。他们接读先生亲笔信及阅读两个重要文告后，情绪极为振奋，表示要以身作则，发动同志和侨胞拥护讨贼，尽量捐献款项报效祖国等语；并决定次日晚上在我的同宗兄弟张南生开的茶楼——如意楼为开会会址。届时到会的共有百余人，多是中小商人和工人，大商家因有所顾虑，很少出席，黄隆生因事未参加。大会由钱显章主持，首先宣

读中山先生亲笔信，并介绍我与大众见面后，继由阮其昌讲话和分发《和平统一宣言》，再由我报告陈炯明叛变经过及中山先生蒙难情形。我根据宣言主要内容，着重讲述：此次叛变主谋者陈炯明，指挥者叶举，首先围攻总统府的祸首洪兆麟，包围总统府，以枪击、炮轰、纵火等等恶毒手段，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欲置先生于死地，陷北伐大计于功败垂成。并指出陈炯明叛变以后，纵兵奸淫抢劫，省会人民悉遭蹂躏，近省各县也洗劫一空；不仅护法以来，各省之兵灾，从未有如此之酷者，而且是自明末以来 270 多年无此惨劫者；万恶军阀龙济光、莫荣新所不敢干的事，陈炯明竟然干得出来。侨众得知陈炯明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后，群情汹涌，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拥护中山先生讨平叛逆。对于筹款方面，首先由阮其昌、钱显章带头捐献各 1000 元，其余到会各人也纷纷认捐，当场捐有法国货币约 2 万元（即东方汇理银行货币），尚有更多未到会者，随后也陆续捐献。当时在会场上还有些工人签名志愿回国参加讨贼，如海防杂货店工友黄作兴首先回国充当先生的卫士。会场一片热情洋溢的盛况，充分表现出中山先生在爱国华侨中具有崇高威望，以及华侨对祖国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由于我缺乏工作经验和政治警觉性，开会过于暴露，引起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当地“绿衣楼”的注意（华侨称警察局为“绿衣楼”，称警察为“绿衣鬼”、“暗查头”、“金边鬼”等等），开会的第二天，便有一个过去和我相识的“绿衣鬼”找我谈话，向我问长问短，但态度一如往者，并以吕宋烟相招待。我仍以为一般交往，不虞有他，不料该“绿衣鬼”已注意我的行动，正在侦查我的活动情况，而我却还未发觉。

三、在河内工作情况

越数日海防工作初具端倪，随即乘车转赴河内，抵达后即与河内党支部长梁耀池、财务胡子超等会商一切，梁系河内机器厂

经理，颇有政治头脑，对革命事业深具热忱，当接读中山先生亲笔信后，非常激动，并对中山先生关切备至，一再详问国内讨陈情形。会商结果，决定次日晚上在梁耀池家中开会。届时到会人数约有 200 多人，比海防更为踊跃，开会盛况大致与海防相同，除当场捐献外，并推选劝募委员数人，以便分派前往义安、南定、富良江等各小埠分头劝募，会议开至深夜始结束。我并预定日内随同劝募委员前往义安、南定等埠进行宣传及筹募工作，不料事机不密，当我由海防动身到河内的情形，已经海防“绿衣楼”密告河内“绿衣楼”当局，密切注意我的行动，而我在河内开会活动情况完全为法帝当局所洞悉。故在第二天暗查楼即通过华商会馆，传我去暗查楼，审问我来越南活动情形（当地有个烂颈的法国人暗查头，故华侨称之为“烂颈鬼”），烂颈鬼对我纠缠盘问达两小时之久，而且对我诸多诬蔑和恐吓。我也据理力争，认为华人向自己侨胞捐募公款，系属国际惯例，并无非法行为。无奈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向仇视中国革命事业，借以巩固他们的殖民地和在华利益，故对中山先生革命活动，蓄意阻挠破坏，于是蛮不讲理，矢口咬定我到越南“招摇撞骗”、“妨害安南治安秩序”，勒令我三天以内离开越南，并将我的入境护照没收，改发一张所谓“出境证”给我，并在证书上注明有效期为三天，逾期作废等字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这样把我“驱逐出境”。

四、离越回国复命情形

我受到帝国主义无理逼迫，不得已仓促离越回国，而重要任务又未完成，感到无比愤慨与忧虑，只好面请当地两位支部长及其他热心赞助革命的同志，于我离开后继续进行工作。梁耀池及侨胞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刻骨仇恨，我们从华侨平日对“绿衣楼”和“暗查楼”的“金边鬼”、“烂颈鬼”这些称号中，可看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仇视与愤恨。因此他们对我的请求，慨然应

诺，并表示绝对不会辜负中山先生的委托与期望。并由阮其昌、梁耀池写好两封信，交我带呈先生，报告在越情况。事后也得知他们继续进行劝募，除在河内、海防两处捐有五六万元外，其他各埠也捐有数万元，总共不下 10 万元左右。先收到一部分托黄隆生随后带回面交中山先生，其余陆续劝募的，也由他们直接汇到国内，还有西贡、堤岸、金边各埠未详，并悉这些捐款中多系革命同志和中小商人及工人捐献的，他们本身生活尚有许多困难，还能挤出钱来捐献祖国，也充分说明他们爱国热情了。而那些大商家除个别先进人物外，对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害怕，对国家大事极为冷淡，有的甚至采取反对态度，这又说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我约在 2 月底 3 月初返抵广州，将阮其昌、梁耀池的复信向中山先生复命，先生也于 2 月间由上海返粤组织大元帅大本营，我将在越活动经过和在越同志侨胞热烈拥护讨贼，以及被法帝国主义凌辱压迫情形向先生报告后，先生对越南革命同志侨胞赞助革命的热情非常高兴，他说：“捐钱多少不成问题，他们能够捐出一片爱国的热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并说：“至于那班外国侵略者，凌辱压迫我们已非一日，我们三民主义的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语重心长，从这些简短讲话中，也足见先生毕生尽瘁革命事业，未尝一日忘怀。

(1965 年)

孙中山蒙难后在上海筹款纪实

何 侠*

孙总统在广州蒙难后于8月赴上海，由法租界南头码头登岸，乘汽车至法界环龙路孙总统的公馆，随从有黄惠龙、马湘、陈兴汉、邓彦华。至后中国国民党上海支部主任林焕廷率领一班高级职员觐见，后胡汉民、邹鲁、陈树人、何侠、姚雨平亦同时进谒。是夜由林焕廷将职员宿舍腾开，预先将各随从人员行李安顿好，次日由上海支部长林焕廷召集在沪党员开欢迎大会，请孙总统出席讲话。此次蒙难，事出仓猝，陈贼不讨，不共戴天。其时孙总统初至上海，经济缺乏，无法支持大局，旋与各人商议在沪筹措军饷之法。由邹鲁献议，首先派人向沪各机关团体分头行事：上海商会由冯会长少山担任，大埔同乡会由蓝会长担任，并派邹鲁为驻香港办事处特派员，何侠为总统府军事咨议，蓝仁为上海大埔同乡会筹饷委员。因邹鲁在辛亥革命时期向大埔同乡募过巨款，他做财政厅长及两广盐运使时各种革命捐款未有清还，自己不便出面。旋请孙总统派何侠与蓝仁向大埔同乡募捐。蓝仁系大埔同乡会蓝会长之子，及在倚虹西餐馆出钱遍请在沪经商有名同乡约数十人。由何侠宣布：此次请各同乡到来开会，系孙总统委托。因此次蒙难，仓猝赴上海，一时军饷无法筹措，特委鄙人与蓝仁同志前来向各同乡筹款接济军饷。蓝会长辅臣首先捐献1万元，杨虎臣、杨子臣、杨富臣各捐1万元，杨干臣捐5000元，蓝璧如捐5000元，大埔同乡会全体同仁慨捐助5万元，共10万元由何侠与蓝仁亲手收妥，同邹鲁一同晋谒。孙总统甚为

* 作者时为总统府军事咨议、前敌司令。

嘉喜，旋派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姚雨平为中央直辖警备军军长、何侠为中央直辖警备军前敌司令职；与邹鲁拨5万元先行回港筹备一切讨贼事宜。后即入穗，召集旧部，总统并赐“预备杀贼”四字，嘱报此仇，勿负期望。孙大总统命驾回粤，开府河南士敏土厂，改就大元帅职。姚军长亦同时回穗就惠州安抚使之职。陈遂逃港，未得天诛。及杨坤如盘踞惠州，孙大总统亲自督率滇桂军讨伐。

先是，上海大埔同乡会在虹口靶子路新建会所，将近开幕，孙总统闻知特派谢良牧与何侠致送“天下为公”横额，大家捐助极为踊跃。

上海大埔巨商杨富臣、蓝璧如母亲古稀寿，曾蒙孙总统派何侠送寿字一幅，以资祝嘏。于是各同乡因此均慷慨捐输，以为之倡。

(1965年)

奉孙中山命赴柳梧策动滇桂军讨陈经过

张 猛*

一、中山先生派我赴桂

1922年6月19日（即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的第三天），中山先生在永丰兵舰接到由沙面转来滇军代总司令张开儒电报，略谓：“率领滇军杨希闵、杨池生、范石生等部，到达庆远、怀远一带（即宜山、独山）候命行止。”该部滇军原系顾品珍所部，因与唐继尧所部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剥隘一带作战失利，顾品珍死后，改由张开儒代领其职。该部退入桂境时，尚不知陈炯明在粤叛变，故有此电。此时中山先生已派员赴韶关，命令在赣北伐军回师讨逆，今得张开儒电报，以增加滇军一部实力，讨逆军事更加有利，而且广西方面尚有粤军关国雄师及桂军刘震寰、刘玉山等部可资调遣，故决计派员前往梧州一带，策动滇桂粤军东下讨逆，以便协同北江北伐军夹击叛军。我原在总统府警卫团新近调升机关枪连少校连长，自总统府突围出险后，奉命改派在楚豫舰上参加作战，与警卫团团附李章达一道工作。李知我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并在滇军部队有些人事历史关系，即向先生推荐我往柳州一带担任策动滇桂军东下讨陈工作，先生立即应允，并为工作利便起见，亲自下一手令，“委派张国森（即张猛）为大元帅副官，此令。”下署“孙文”。一面饬秘书林直勉写了六封信致柳、梧各将领，交我亲自带去面送。其中致张开儒一信，致粤军第四师师长关国雄一信（内附关所部团长吕春荣、杨锦龙共一

* 作者时任总统府警卫团机枪连连长，孙中山的副官。

信)，致桂军军长刘玉山一信，另有三封未曾落款，备为在必要时临时填用的。信的内容略谓：“陈炯明蓄谋叛乱已非一日，迭次晓以大义，不仅毫无悔祸之心，今复变本加厉，竟于6月16日嗾使叶举、洪兆麟、陈炯光等部公然叛变，围攻总统府，欲置文于死地而后快，并勾结江西陈光远，实行南北夹击，陷北伐军事于功败垂成，叛党叛国，纵兵殃民，罪恶贯盈，难稽显戮，除勒令北伐各军克日回师入粤讨逆外，务希会同在桂各军指日东下讨逆，以收夹击叛军之效，余由张副官国森面达。”先生面嘱国森对其他桂军亦可适当与之联系，并由马伯麟给我旅费3000元，命我即日起程。

二、在梧州会见吕春荣、莫雄

我于当日（6月19日）傍晚携带先生亲自签署的六封信和密码电本等，趁省港轮船经过黄埔时，由永丰舰派一小艇送我登轮（省港轮船经过黄埔不泊码头，只是慢车候小艇送客上船）。该船船员见我是永丰舰上的汽艇送来的，知我是中山先生部属，不但毫无阻挡，而且免我买票，还招待吃饭和夜宵等。这是海员工会和联义社同志给予的协助与支持，使我能顺利地到达香港。当船靠码头登岸时，我才发觉随身带的3000元全是程天斗发行的纸币，身上一毫港币都没有，便不敢乘车，只有步行至南北行街海兴祥米行，找到前国民银行行长梁长海（海防米业巨商）设法借用50元港币后，随即赶搭港梧轮船转赴梧州。经过三水河口时虽有叛军检查，但我已化装成商人未被发觉，故得以顺利过关。6月21日到梧州后，因不明当地各军实际情况，不便贸然露面，故先到美国人开设的思达医院，借医痔疮为名，向该院商得单人病房一间住下，然后再去粤军第四师司令部找关国雄。不料关尚在广州未返，于是改找关师第二团团团长吕春荣。当我进见时，吕和他的中校团附陈国谋正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彼此略叙

寒暄，陈国谋知我找吕商谈公务便辞出。我即向吕告知来意，并将中山先生写给关国雄、杨锦龙、吕春荣三人联名信交阅。吕见信后两眉直竖，为之一怔，脸容带有几分难色说：“关师长尚在广州未返，此信务请秘密收存，不让第二人知道，因关尚在广州安危未悉，恐此事泄漏风声，对关极为不利。”我再问及第一团团长杨锦龙的情形，我原打算再去和杨联系，吕春荣立即阻我往见，并小声告诉我：“杨锦龙靠不住，可能受了陈炯明收买，现正在秘密活动谋取关的职位。”并一再叫我不让杨锦龙得知此事，否则连我的性命也难保。我与吕会见后，得知关师内部复杂，颇为踌躇。此时忽又想起在永丰舰上临行时，薛岳告诉我在到梧州后，在必要时可往见莫雄营长，谓此人富有义气，肯帮助我们。于是我马上前往莫雄营部，相见之下，承莫关怀备至，我即将来意和会见吕春荣得情形一一告知，得莫热忱相助和从详计划。莫认为吕、杨均不可恃，吕系胆小怕死鬼，而且关系复杂，不能成事，嘱将致关国雄的信交他去申说，谅可达成任务。因此我便把在梧州联系粤军任务，托由莫雄营长办理。后经莫雄游说，关国雄果然坚决表示拥护中山先生，但因事机不密，关本人卒被陈炯明毒死。

三、刘达庆玩弄两面手法

我在梧州停留了几天，便急欲前往柳州找张开儒，不料梧州以上浔江一带，均为广西自治军土匪部队所占据，旅途安全毫无保障，旋查悉戎圩至桂平一带系桂军刘达庆所缓的防地，驻戎圩的为刘部自治军司令吕定祥，我为了通过他们防区，必须与刘达庆取得联系，因此将未落款的信填上刘达庆司令官一份。当我到达戎圩时，即往见吕定祥，于将致刘达庆之信见示，并告以有要务往桂平与刘达庆面商。吕见此事关重大，系大元帅派来要员，不敢有所怠慢，除转电告刘达庆外，并专派电船一只和一位李某

陪同我前往桂平。次日，当我抵桂平时，刘达庆即派员引我到桂平警察局，并嘱我以路途辛苦，暂行休息一两日再行约会，便由警察局殷勤接待，顿顿好菜好饭，并告我外间谣言很多，嘱我暂时不要出外露面，以免横生枝节。这样既不是以宾客接待我，也不是以人犯扣我，一直过了五六天之久，弄得我啼笑皆非，莫名其妙。直至第六天刘达庆才把我接到他的司令部，见面时堆满笑容和我握手，一开口便对我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特备土产数味为你洗尘，并致歉意。”并约同该部的一些高级人员准备举行宴会，在未入席之前，我将填好的文件当面送交，并简略谈了几句，我说：“此来系奉孙大元帅面谕前来慰问几位将领和全体官兵。”话还没说完，他只把信看了一各上下款，立即打断我的话说：“你的来意吕司令已向我详细谈过，我很清楚，孙大元帅已有命令前来，本来应马上东下讨贼，但连日以来我部曾一再开会商讨，均认为内部和外部还有很多困难问题。第一是广西财政困难到了绝境，不但员兵饷项无着，连维持两餐伙食，都有困难，只靠烟赌花捐等一些临时收入，这样怎能动员呢？第二是弹药非常缺乏，现在广西自治军总计不下四五万人，平均每人不到三发子弹，这样怎能打仗？第三是梧州粤军态度还不明朗，究竟能否拥护孙中山先生尚成问题，梧州一关如果通不过，我军则无法行动。第四是柳州以上的滇军也尚无表示，如果滇军能入粤讨贼，地方税收交回我们，我军当协同滇军一齐入粤讨陈。”谈了一大堆困难问题后，最后向我提出建议，要求我转电孙大元帅，请委派林俊廷为桂军总司令、刘炳宇为广西省长，以便统一军政财政，使各部行动一致，才能作战；最后还向我解释：“连日内部开会研究，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所以耽搁了阁下几天的时间，真对不起！”我明知他要饷弹、要地盘为先决条件，但我仍然以婉言相商。我说：“关于饷弹问题可电请孙大元帅通盘筹划，或多或少总可得到补充，关于广西军政人事问题，事关重大，最

好请派员赴港与谢持、古应芬、邹鲁等面商，他们在先生面前比较好讲话，至于林俊廷、刘炳宇两公处，可由我填写用孙大元帅名义的信，先行联系，以便进一步协商其他问题。”刘立表同意，并允马上派员将信送往南宁与林、刘会谈后，再行派员赴港。事后我才得知当我到桂平之日，陈炯明亦派代表陈某某（陈仲宾的儿子）到桂平收买刘达庆，陈允给刘港币10万元、子弹10万发，要刘达庆通电请孙下野，连日正在商谈条件，所以把我滞留在警察局，以免被陈炯明代表所洞悉。刘达庆脚踏两板桥，其目的不仅在骗钱骗弹，而且企图乘机入粤，卷土重来宰割广东这块肥肉。他对孙对陈都是不怀好意的，而我当时也只好与之虚与委蛇，互相利用耳。

四、刘玉山颇有正义感

在桂平与刘达庆会谈后，由刘派员乘电船护送我至宣武桂平军长刘玉山防地，再由刘玉山转送至柳州。当我往见刘玉山时，随即将中山先生信件递交后，照例代孙大元帅向该部官兵致以慰问的话，不意得到刘玉山极其热忱的接待。在交谈中始知刘玉山平素对中山先生极为仰慕，一再关怀先生安全以及北伐军行动情况，并对我表示准备卖田补充枪械，随时听命入粤讨逆，且大骂陈炯明忘恩负义，祸国殃民，言词间颇示义愤。当我向他告别赴柳时，他亲自送我上船，并再三要我代向滇军表示拥孙决心，如滇军发出通电讨陈时，他当立即响应，并协同滇军一齐东下讨逆，其侠义之气，使我深受感动。

五、张开儒一筹莫展

约在7月中旬，我到达柳州时，张开儒亦进驻柳州，随即往见。我原以为张追随先生从事革命有年，亦为先生平日所器重，估计此行当获得良好反应。不意我进见时，他仍然躺在鸦片床

上，态度极其轻慢，当我把中山先生信件递交他看了之后，他表现得冷冷清清的，经过沉思半晌，才慢吞吞地对我说：“关于滇军东下讨逆的问题，经过开会多次，还没有作出具体决定，此事还要各将领详细协商，再看大家意见如何而定。暂且住下，从长计议。”既未派员接待，也未指定住宿地点，我只得告辞自行找旅馆。当时柳州到处驻满了军队，乱哄哄的，不知从何去找。即向总司令部一位少校副官问及旅馆情形，相谈之下，始知彼此都是云南讲武学校先后期同学，据告旅馆驻满军队，不易找到，不如往访讲武学校老辈同学朱世贵团长，定可设法照料。旋由他偕同往见独立团团长朱世贵，承朱热情招待住宿，供应饭食，备极周到。连日与朱世贵商谈中，得悉朱是一个有血性的热情军人，深明大义，积极主张拥护中山先生，东下讨伐陈炯明，并得朱世贵将滇军内部意见分歧见告，始知滇军内部形成三派：蒋光亮、朱世贵力主拥孙克日东下；范石生则极力反对东下，深怕进退两难，认为应待时机，随风使舵；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等则要求饷弹为先决条件。意见纷纭，各行其是。张开儒名为代理滇军总司令之职，实权落在五巨头之手，空头总司令无能为力，有如哑巴吃黄连，叫不出苦来。我在柳州耽搁七八天，见张开儒一筹莫展，张亦未召我再谈，我深感留此毫无意义，坐失时机，决心回梧州会商于莫雄营长再想办法。但柳、梧之间没有船只直接往来，沿途治安也很坏，我急于求去，临时搭上一帮杉排，顺流而下，经过十多天才到达梧州，是在8月初旬。适林直勉、林树巍、廖湘芸、周公谋、薛岳、范其务等均到梧州，在莫雄营部会面后，他们正在研究打通滇桂军的关节，组织联军东下诸问题。据莫雄告我，谓各方游说颇有进展，现正在着手计划具体行动中，驻梧粤军第四师师长兼陆海军总指挥关国雄，经莫雄申说后，已经回梧积极行动，并约定廖湘芸、林直勉、薛岳、林树巍、周公谋、范其务、张国森（即张猛）等七人于某日晚上到梧

州中筏翠花艇准备大排筵席，宣布独立东下讨伐陈炯明。正在此时，美国雄忽接到派往韶关密探陆领的密电称“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等部进攻韶关失败，已于两日前退往江西三南，中山先生亦已离开永丰舰改乘英国兵舰往香港了。”得此消息后，诸人为之震惊，咸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得离梧返港，再作计议。旋得莫雄营长大力协助，打通大明轮船关系，我们七人化装轮船伙计，搭该船至香港，沿途经过几度检查，均未被发现，得以安全过关。而我随带之旅费均系纸币，被陈炯明所禁用，所需费用多由莫雄同志接济，始无困乏。我在香港稍事停留，即转乘招商局轮船赴沪，向中山先生复命。此后滇军组织联军东下讨逆详情，已见莫雄同志撰写《白马会盟》一文，不再赘述。

再补充有关滇军内部分化情况：

关于滇军内部意见分歧已如前述，当我离开柳州后，其内部分化为拥孙与联陈两派，多数将领推举张开儒为代表，前往香港与谢持、邹鲁、古应芬等会谈，表示拥孙，并请孙中山先生接济饷弹。另一部分却推范石生为代表，往广州见陈炯明，表示“联陈”。张、范两人均分途出发活动，当张开儒抵港，得到古应芬一笔活动费后（据说港币十万元），随即在港发出讨陈通电，由张开儒领衔，有旅长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附署。张本人领到生活费后，却留连香港生活，不愿回广西。此时范石生尚住在广州大东酒店，正与陈炯明商谈“合作条件”之际，得知张开儒发出通电后，惶恐万状，连大东酒店也不敢回去，悄然逃回香港，对张深为不满，便乘机酝酿驱逐张开儒改由杨希闵继任滇军总司令之职。迨后形成“白马会盟”组织联军东下讨陈，范石生迫于形势才参加讨陈，后来在石龙击溃洪兆麟部卓著战功，中山先生对之备极嘉奖。

（1965年）

孙中山先生肃平沈鸿英叛变的经过

林 祥*

一、沈鸿英参与讨伐陈炯明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仓卒避于永丰军舰。当时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师北伐克复赣州，正拟向北前进，闻陈叛，回师靖难，许在韶关与陈军激战失利，转进闽省。孙中山先生在永丰军舰与陈炯明叛军相持至8月9日离永丰舰赴上海，召集同志勉以再接再厉，继续积极革命，因而派同志策动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等部，及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滇桂两军均愿拥护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讨伐陈炯明，在广西平南县之白马圩会盟，声罪讨伐陈炯明，孙中山先生遂任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滇桂两军合称为西路讨贼联军。许崇智自韶关转进入闽，1922年冬驱逐闽督李厚基，进驻福州，奉中山先生任命为东路讨贼军司令，准备回师入粤，革命力量又是蓬蓬勃勃。西路讨贼联军军事将兴，旧桂系莫荣新旧部广西师长沈鸿英拟乘时加入西路讨贼联军东下，混水摸鱼。但沈系陆荣廷、莫荣新的亲信旧部，于1920年秋粤军自漳州回粤驱逐桂系，沈随莫荣新撤退广西，乘间坐大力量，想运用手段，重逞其残害广东人民的大欲，沈一向极端反对孙中山先生，于是玩弄其政治的手腕，投入岑春煊的政学系，将其一套假参加革命随西路讨贼联军东下占领广东地盘，借以破坏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奸计告岑。岑本

* 作者时任粤军第一师独立团机枪连连长。

是一个无聊政客，闲居上海，闻沈所献奸计，于他在政治出路，亦是一个机会，岑乃往见孙中山先生，为沈疏通，并诡称沈表示真诚服从孙中山先生，请求准许沈加入西路讨贼联军东下讨伐陈炯明以赎前愆。孙先生以沈既能幡然觉悟，改过自新，自当诚意收容，因是准许沈加入西路联军，即密电广西杨（希闵）、刘（震寰）与沈联系。岑知奸计得逞，即将沈之欺骗孙之阴谋，转告北京政府及吴佩孚，北京政府即密任沈为广东军务督理。吴佩孚虑沈入粤后力量薄弱，作反不成，反遭危险，因而命令江西军务督理陈光远及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切实助沈，以破坏孙中山革命事业。陈光远、方本仁承吴佩孚之命，即派北军第九旅及谢文炳师屯于粤赣边境，俟机策应沈之叛变，沈鸿英之反动阴谋预行布妥了。其时西路讨贼联军，尚未誓师东下，而祸机已伏。

二、西路讨贼联军东下入粤

1922年12月26日西路讨贼联军誓师东下，28日会师于梧州，1923年1月15日，西路讨贼联军及广东第一师响应，直下广州。陈炯明部撤退东江，以惠州城为据点，滇、桂、沈军人粤后，各占地盘，但沈于年前莫荣新据粤时曾任南韶连镇守使，对广东军事地理形势及重要据点，比较滇、桂军为熟识，且沈存有叛变的阴谋，故其种种措施与滇、桂军各有不同，沈所占的地盘，以配合将来叛变时能与北军联系为原则，沈首先占领粤之北江粤汉铁路广韶全线，伸入广州市区。广州市的观音山（现称越秀山）形势居高临下，俯瞰全市。沈认为有占据的必要，乃于1月23日，突然派兵袭击观音山，将先占驻该山的谭启秀部缴械，强行占据。沈在地理上占有军事优势，从而再进一步，用其挑拨离间的阴谋，对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谓粤省党政军将有不利于客军，尤魏邦平为甚，怂恿杨希闵、刘震寰出各函约政要及海陆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以免隔膜。岂料沈

别具用心，预伏卫士于会场，拟将与会之人中于所欲杀者杀之。于预伏者发枪时，幸各人于乱枪中逃出，海军陈策伤足，魏邦平为沈之团长李易标所执，桂军刘震寰本为沈指定射杀的对象，想把刘杀却，并其部，幸刘逃出免于是难。魏邦平被扣十余天，勒令将所部枪械缴清释放。滇桂军经临是变，怵然忧心，尤以桂军刘震寰愤恨之极，为避祸计，全部开驻于东莞、虎门、广九铁路一带。滇军则提高警惕，人不离枪，实弹枕戈时刻戒备。粤军第一师原有兵力4团，陈炯明自广州撤退时，第三团陈修爵不肯响应参加讨陈，随陈撤退东江，第一师实力只得三团，师长梁鸿楷，为一首鼠两端之人物，对讨伐陈炯明，实无动于衷，悉由参谋长李济深及下属部分军官起而参加响应。第一师当时实力薄弱，为避免与客军冲突起见，分驻于新会、鹤山、江门一带，重新编整，该师思想前进的军官，以梁鸿楷对讨陈态度暧昧，又不忍对梁以兵戎相向，遂拥前第一师参谋长调任总统府警卫团团团长陈可钰为师长，陈以病极力恳辞，举贤以代，任李济深为第一师师长，推梁鸿楷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使梁不能掌第一师全部实力，只有第一团梁鸿林是梁鸿楷的嫡系，此后第一师由李济深领导。自沈鸿英江防会议事变后，广东军政庞杂，互相猜忌，已成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三、孙中山回粤任大元帅

自西路讨贼联军1月16日入广州后，军政两面各自为谋，争防吞噬，盘踞要津，有力者肆意为之。东路讨贼军许崇智尚在途中，粤中又无最高统率机构，于是粤省政要及在粤之海、陆军将领联电上海敦促孙中山先生速回广州主持大计。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2月21日回抵广州，下车伊始，首先宣布取消他的大总统名义，鉴于粤省军队庞杂，军事方面应有一个最高统率机构以掌领之，遂即成立大本营，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统率军政。鉴

于当时粤省军队，均无指定防地，自由行动，争肥并弱，不一而足，孙大元帅乃于2月24日颁布划分防地命令，内容大致严令各军，自划分防地之后，非奉本大元帅批准，不得擅自移动，免滋纷扰。在当时的军政人士皆觉得孙中山先生于21日抵广州，即成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职，至24日头尾不过四天，就颁发划分各军驻防命令，多估计以为先使各军就范，然后徐布新猷。其实划防内容更有重要的原因存在，此非一般人所知者的。岑春煊、吴佩孚、沈鸿英等积极破坏粤方革命事业的阴谋和布局，已为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探悉，因此回粤急切先行调动沈鸿英离开北江，断绝沈与江西陈光远、方本仁的联系，然后对沈徐图控制瓦解，故调防命令中区分防地，指定沈鸿英部由北江调驻西江北岸以迄梧州附近，所遗北江防地，着由滇军杨希闵接防，桂军刘震寰仍驻东莞虎门一带，粤军第一师仍在原防地不动，这样防地区分，只是滇军与沈军调防，是明显地把沈军调虎离山。沈知阴谋被拆穿，表面泰然不动，既不表示服从，又不提出意见反对，暗中布置军队，密谋叛变。

四、沈鸿英举兵叛变

沈鸿英接到孙大元帅调防命令，自知阴谋揭露，势不两立，实行举兵叛变，于1923年4月16日在花县新街宣布就北京政府所委的广东军务督理伪职，并密令驻广州市的沈军突然分头袭击滇军，以图先发制人。这样出人不意，攻其无备，照理滇军本来会措手不及，受沈军之摧毁无遗。但自沈鸿英江防会议事件发生后，滇军受到危险的教训，知沈军终将对其不利，因而无日不实弹枕戈戒备。沈军当日向滇军袭击，一触即受反应，滇军各部闻变一齐出击，滇军服装戴红边军帽，敌我兵员分辨，一望了然，各街滇军齐出，凡见不是红边帽之军队就打，并且异常勇敢，将沈军击出郊外，沿铁路向北追击。沈知市内军事失败，亲率主力

部队自新街南下，滇军集结重大兵力向沈军猛攻，沈不支败退。沈鸿英之子沈荣光将所部军队，以一部在英德亦策应其父退却，另以一部由三水、四会出扰，均告失败。此役在沈鸿英叛变时，假若滇军被沈军解决，则孙大元帅的安全，极成问题，最低限度也要走避待援。幸此役大获胜利，当时广州市市民也受虚惊混乱数小时，当晚归于宁静，多歌颂滇军靖难有功。孙大元帅以沈逆勾结北洋敌伪叛变，应予重惩，务期根本肃清，乃即檄令各军讨平之，嘉奖滇军能仓猝应战，击溃叛军，有功党国，分别奖叙有差。孙中山先生由此对滇军异常器重，视同禁卫之托，滇军因是又成为天之骄子，在广州市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民大受其苦。

五、粤军第一师参加追剿沈鸿英

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奉大本营命令，率驻江门及西江部队出发肃反，于4月27日与沈逆部队战于清远一带，沈部被击溃，弃清远城向北逃窜。5月2日我军克复清远城。沈自清远败后，急调桂省其所属部队张希栻旅、黄振邦旅，乘我西江防务空虚，袭入我肇庆城，以图牵制。大本营闻耗，即令李济深率第一师会同郑润琦第三师急赴肇庆攻之。李济深率部转趋西江，令第一师第一团梁鸿林部由水路三水直薄肇庆正面，第三师由四会前进以据肇庆之背，5月5日，第一师前头部队到达肇庆峡与敌前哨接触，敌即溃走退回肇庆城，作负固的抵抗。第一师当日围攻肇庆城不下，以邓演达第三团围攻东门，不能毁敌之一堞，城坚不可摧。攻坚围固，旷持日久，徒坠士气，于是又重新部署，令第四团戴戟攻西门，第二团卓仁机攻北门，第一团梁鸿林为预备队，敌凭坚顽抗数日仍不下。因是又改为爆攻战术。第一师第三团团团长邓演达，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工科出身，以其熟知爆炸技能，适邓围攻东门，在形势上有利于施行爆炸，潜于东门城根挖穿地

道，放置炸药，从而鼓励士气，选出敢死官兵数十人，编成一队敢死队，俟城垣爆炸后，即冲入城中。敢死队预伏于东门城外，派营长张发奎为督冲官。部署后，依计划行动，5月18日凌晨，炸药爆发，城垣崩塌十余丈，敢死队冒烟冲入城里。邓演达率第三团同时于纷乱中一齐争先冲入，敌惊惶失措，无地藏身。在城之敌几全部俘虏，仅有西门一小部突围逃走。是役将敌军械辎重全部俘获，俘敌旅长张希棫、黄振邦。张发奎于是役有率敢死队冲锋之功，提升为第一师独立团团长。

六、北江马坝乌石之役

第一师在肇庆攻城之时，敌赣南方本仁派北军第九旅及谢文炳师支援沈逆，入扰曲江，大本营闻讯，急电肇庆令李济深即率第一师全部驰赴北江抗击敌军，于6月5日出发，12日师次乌石与沈军遇，击溃之。追至马坝附近，敌北军第九旅及谢文炳师增援掩护沈退，双方展开激烈大战，我军转进退至乌石，占领山地对抗。战斗又复不利，入暮撤退，时值大雨沱滂，由铁路以东大山绕出南面，作一大迂回转回铁路，夜间撤退，在山地混行，山势陡急，不良于行，茅草落枝，绊脚难走，满山遍野，电筒闪闪，狼狈不堪，在高山绕行一夜，才绕出大坑口，循铁路南行至翁英江口之铁路花桥。师部已在铁路花桥南端构筑工事收容我军，师长李济深率师部已先渡北江河右岸，经英德城不作停留，各部队入黑随师部行进，用浮桥过北江右岸，因大雨之后，夜间行动，满野泥泞，不分道路，作成几十路纵队形式行进，毫无秩序，无法掌握，队伍均未食晚饭，拂晓到达连江口，踏过浮桥，到连江口右岸，各部陆续归队，始回复掌握。经此连日败绩，官兵精神颓丧，锐气坠落，此役是战斗中一个极大考验和教训，变为广东第一师兴败一个最大关键。追溯乌石致败的原因，讲起来，成一大笑话，不过因一最轻微之事误会，弄致这样丧气狼

狈。当乌石之战斗进攻前，师部作战命令中，在附注上注明以食饭号音来代表退却号音云，在作战中凡闻到食饭号音即是却退的指示。我军于乌石战斗展开向敌攻击，在山地作战运动，南方人向来最为优长，乌石山地战斗于最酣之时，我军逐渐占了优势，向敌压倒。忽而左翼陈济棠方面，于薄暮时，吹起一个吃饭号音，各战斗单位闻吃饭号音，认为退却的示意，于是彼吹此应，全线都一齐吹起震天动地的食饭号，战斗人员均仓惶失色，以为有什么严重危险或被包围的紧急状态，于是全线争先恐后放弃阵地，一齐退下山麓；又不知真实情况，退走时形成狼狈乱窜的状态。敌军见我军方在进攻最盛之时，突然急行退却，也不敢冲出，时值夜间，敌不敢追击。此役之败，实在荒唐。为自有战史以来一大笑话，幸而此一退却，军械均无损失，不过搞到人马惊惶疲惫而已。集中连江口右岸收容整理时，各将领集于师部，向李济深请示机宜，并询陈济棠因何吹起代示退却的食饭号音，引起全线退却，语涉责难和不满。陈则诿诸号兵忘记暗示规定，致有此绝大错误为辩。师长李济深常以师克在和为怀，豁达大度，承认自己部署不好，指挥不当，致有此败，与各人无关，不必介意，唯有亡羊补牢，再接再厉。各将领闻李谦和引咎，蔼然有霁色。李济深战败不馁，反攻意志坚决，遂下令各部即过连江左岸，向英德之敌反攻，各部依令过连江口浮桥向英德城方向前进。

七、英德独石下之战

按英德独石下三个字，不是地方的名称，而是地形上的名词，英德城外西边，约行 20 里，有一个平地起峰的大石山，独立在地平面上，故名之为独石山，以独石山之环近名曰独石下，这个独石山可以瞭望很远，但山形不大，山石岩巉，登上不易，孤峰独立，在战斗上为炮兵射击有效的目标，故敌不以独石山为

据点，乃在独石山下构筑工事布防。故标题为英德独石下之战。

第一师于6月23晚在马坝、乌石间之大山因误会号音撤退，至25日下午全部在连江口右岸收容各归建制掌握。敌人自乌石亦稳步探进，至25日到英德城，徘徊不敢前进，知我军在北江右岸，敌故推出英德城西之独石下布防警戒，构筑工事。我军探悉敌之据点，于6月26日过连江口左岸反攻。其时大本营调滇军一部及杨锦龙团参加作战，归李济深指挥。兵力增强，军心复振，6月27日向敌攻击前进，将至独石山约数里，与敌前进阵地接触，敌即退回独石下本阵地抵抗，以盛炽火力阻止我军进攻。我军接近敌阵时，所占的阵地，均属一片平坦田畴，身体暴露，惟有利用低小田基以作掩体，在不良条件的地形下暴露进攻，死伤甚多。我之左前方有一丘阜土山，敌我双方不惜任何牺牲，拼命争占，双方将达顶界线，敌之抢山兵群，比我军之抢山兵群占高数十步，我军全线侧望，全神贯注，心急紧怯，莫不大呼：“冲呀！冲呀！快点，快点！”全线震动，双方不期而停火注视，有如运动会的拉拉队，从傍高呼，大声打气。敌将到顶界线，我军极度失望，觉得此山将必为敌所占，意气低落，以为无法挽救这个颓势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忽而我滇军向敌方抢山兵群发射一炮，准确命中，霹雳四射，敌人死伤甚多，即散乱四窜，我抢山部队乘机抢占土丘。我全线欢声如雷，松了一口气。这个土山之得失，为是役胜败寄托甚重，土山占领，俯瞰全线，有利于俯射敌阵，于敌以最大之威胁，亦是此役掌握胜利命运之最大因素。战至第二天，我军的预备队皆进入阵地作战，兵力使用殆尽，官兵体力疲惫。沦入三鼓的气势。卓仁机旅所属之营长洪某（佚其名）安徽人，挺身而出，暴露于散兵线上，手持驳壳枪，大声喊道：敢去冲锋的随我来。鼓起散兵线有二三十人随洪向敌猛冲，纵横驰骤，视死如归，虽未突破敌阵，一天之内，向敌猛冲数次，我全线官兵大声喊杀助威，此一个最大打气，鼓舞

全线官兵勇敢兴奋，又回复初入战场的锐气。我军冲锋数次虽不得手，但因此压倒敌人不敢出击，已推知敌人恐怖心理极大，我军不怕任何艰苦困难，决心坚持下去，战斗到底。双方作一个体力消耗的比赛的持久战，某一方体力支持不下就是某一方的失败。战至第三天，第一师弹药消耗殆尽，是战场上一大危险之事，商之滇军拟借子弹，滇军敌忾同仇，休戚相关，视同一体，慨将子弹拨借第一师补充，士气为之一振。敌本客军，劳师远战，深入重地，遭我顽强打击，并且敌是江西临时派遣军队，后勤补给钱也不周备，一气苦战三日三夜，处此恶劣环境，体力与精神无法捱得下去，最后五分钟胜利，属于我军了。当29日薄暮时，敌北军派军使持白旗而来，伪称投降，请求先行停火。我知敌之战斗环境的恶劣，比我军尤甚，它确实挨不住这种持久顽强苦战，行要退却，怕我军衔尾追击，故假称投降，我军也觉得连天苦战，自己队伍也有部分，打得七零八乱；利用片刻停火为之整理，姑答应之，以区分整理各部战线，以图再接再厉。于是全线对敌监视，以观其变，至夜半我军枪声仍疏疏落落向敌阵射击，对方不见还枪，顿成沉寂景象，判断敌人乘黑夜逃走了。夜深不便摸索追击，6月30日凌晨，向敌退路猛追，跑步追至20余里，遥见敌之后殿部队，相距甚远，我方官兵因连日苦战，均饥疲交加，体力不继，无力追上，只有向敌鸣了数百声枪，促其快走，我追击部队转回英德城。北军退却，沿来路而归江西，经过北江各地，为当地人民截击，遗失枪械也有不少，后来转入盗匪之手，弄至地方不清，是亦一个原因。按英德独石下之役，我军死伤甚多，敌人黑夜退却，敌械无所得，只获得胜利的战果而已。经此数天之激战苦战，官兵体力疲甚，大家心理都盼望就地休息数天，饱食几餐，宁睡数晚，企图回复过量消耗的体力。师长李济深忽接大本营急电，谓沈逆残余自广西入扰西江，图犯肇庆，着电到即行出发，兼程驰赴西江肃清逆部，不得延误。李

济深于是又率第一师从英德城仓猝开动，向西江进发了。

八、西江封川江口之役

敌沈逆残部，北军第九旅及谢文炳师等三部，自英德城独石下败后，向韶关方面逃窜，它们三部原是各不相牟，不过因利而聚，无利可图，则各自散伙瓦解，各走各路。北军第九旅及谢文炳师退回赣州整理，以后不敢向广东问鼎，沈鸿英残余亦自行逃散，已成日暮途穷之势，无法翻身，只有小丑跳梁的行径，对革命政治不起破坏性了。它知我原驻西江之第一师，在北江与它作战的时候，乘此空闲时间，调其在桂残余，乘虚袭我西江，扰近肇庆，刚在第一师报捷之时，大本营闻讯，电令李济深率第一师遄回西江肃逆。以时间而论，十分配合，第一师在英德独石下于6月30日将敌击溃，7月1日入英德城，官兵疲劳体力未复，7月2日下午由英德车站乘敞车南下，薄暮开车，时值大雨滂沱，老年机车，拖行甚缓，一切军械行李尽湿，官兵经一夜的大风大雨，彻头彻脚，浑身是水，长夜漫漫，火车速度与黄包车相等，官兵多冷病，在车上呕吐甚多，翌日（3日）晨始到广州黄沙车站，即行转船，以轮船拖带向西江进发，比抵肇庆，据探报，敌已进至肇庆之禄步圩，闻我第一师回防，惊向上游封川退却，据封川江口之虎皮山凭险布防，并于封川江口架设浮桥，其部署形势，略具军事价值。我军得到情报，部署计划，攻击地区如下：以第一团梁鸿林部任右翼，第四团戴戟部任左翼，第一旅旅长兼第二团团团长卓仁机部及独立团张发奎部任正面的攻击，第三团邓演达部为预备队，于7月16日晨向虎皮山之敌进攻，同时西江河面派江防兵舰两艘用排炮向虎皮山之敌射击，以协助我军向敌冲击。是役战斗经过不及半天，即行解决，敌不敢向梧州方面退却，沿贺江狼狈溃走。当时情况之判断，敌怕驻梧州桂军黄绍竑以地盘关系，会拒绝收容，并怕乘机缴械，故走贺江逃入连阳能

与沈逆残余会合，我军于封川江口战胜后，于翌日（17日）乘胜追击至三汊河，直向梧州方面前进，因梧州为桂省咽喉，比重极大，故暂舍退贺江之敌不追，一意转向梧州前进，其原因当有利害轻重之别，目标转移，则以克复梧州为目的，不在沈之残余了。18日迫近梧州，准备与梧州之桂军作一个激烈之战斗，驻梧桂军黄绍竑、冯葆初，向我表示输诚，愿服从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李济深师长本广西人，实与黄绍竑早有默契，不愿战事祸及广西，故以和平方式，兵不血刃，顺利地光复梧州，派张发奎独立团进入梧州，以示有兵进入，才是光复，余部回西江原防。8月初旬，黄绍竑火拼冯葆初，先得李济深的同意，在拼冯之前夕张发奎已作不对外公布之戒备，梧州防地遂为黄绍竑所专有，此系广西服从孙中山大元帅参加革命之始，但大本营对广西军事政治，还是放任主义，暂时不加干涉。寻亦张发奎团由梧州开回广东驻扎江门，奉命解决首鼠两端之陈德春全部。

九、陈天太勾结沈鸿英残余偷袭梧州

1924年3月，桂军第七军长陈天太部进驻都城，勾结沈鸿英退回广西的残余，企图偷袭梧州，被发觉，广东第一师及梧州黄绍竑部，将敌包围缴械，沈之残部包括在内，俘桂军军长陈天太。黄绍竑推情于驻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释放陈天太回广州。自此役之后，沈逆部队，彻底肃平。沈逆鸿英本人，自失败后，逃亡香港，丧气惭愧，杜门佞佛，终于抑郁而卒。

（1965年）

孙中山 1923 年春回粤前后

罗志铸 罗平*

1922年夏，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州移住上海。广州周围各要地一时都被陈逆军队占据，原定北伐计划遭到严重挫折。当时距广东较近的滇、桂两系军阀还有一定的实力，且与陈炯明有一定矛盾，打起了滇桂联军讨逆的旗号。于是孙中山先生密令先父罗良斌去广西平南，会见滇桂联军讨逆总司令张开儒，传达孙中山先生旨意，督促滇桂联军早日东下讨逆。张开儒即派参谋长叶夏声同赴濠江策动驻扎在当地的滇军杨希闵迅速东下。张开儒任命先父为滇桂联军讨逆第一路司令，作为讨陈的先遣指挥。

当时，滇军慑于陈炯明的势力，正派代表在广州谈判条件，准备投靠陈逆。为了取信于陈，已将孙中山先生派去的李文斋、李树山两同志枪杀于濠江。先父再去策动滇军讨陈，是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的。这次由于联军张开儒总司令比较坚定，杨希闵深感滇桂两军的唇齿相依关系，加以先父和叶夏声的说服，杨的态度才有转变。

滇桂两军内部思想基本取得一致以后，张开儒就在1923年1月3日发出江电讨陈，并派先父先期秘密与国民党留在香港的廖湘芸同志联络，策动驻扎在广州市的洪兆麟部队和李云复师的一部起义。于1月15日占领了广州市财政厅。当时罗良斌就以滇桂联军讨逆第一路司令的名义贴出了安民布告，并急电孙中山先生报捷。这时，陈炯明正在广东三水前线督师与滇桂联军作战，

* 罗良斌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护法、北伐、驱陈等，本文是罗平根据其父罗志铸遗留的回忆资料整理而成。

听说他的后方广州已被占领，军心大乱，无力恋战，就带着残部溃逃石龙。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接到电讯后，即通知在香港的胡汉民、魏邦平、李烈钧和古应芬等人为广州善后委员会委员先去广州，并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杨西岩为省财政厅长、伍学焜为省盐运使。当时，桂军沈鸿英部自以为首先进入广东有功，竟自派员接收广东行政、财政各机关，妄图造成既成事实，据为己有。在江防司令部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桂军将领李易标竟将孙中山先生所派的魏邦平捆绑囚禁。胡汉民、杨西岩等见势不对，当即逃避到香港去了，广州市变得群龙无首，局势混乱。而陈炯明屯兵石龙，正在待机反扑广州，形势又很危急。

在此紧急关头，先父回想孙中山先生“干革命要有大无畏精神”的教导，于是不顾个人安危，鼓足勇气，找到了与滇桂军副官长夏声素有交情的刘希天，与他同去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滇桂军司令部会见了夏声。先父问夏：“江防司令部的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夏气愤地讲：“我们的军队在濠江没饭吃，打到了广州还是没饭吃。就是佣人给别人打扫房子也该有碗饭吃，我们的军队连佣人都不如。胡汉民这帮人把孙先生筹的款项宁可拿到江门去收编陈炯明的残部，却不顾我们的死活，我们就是为此枪杀了刘达庆，囚禁了魏邦平。”先父婉言劝说：“魏邦平是孙先生派来的善后委员，孙先生的行李在上海本已上船，准备马上回广州，你们这样一来，他接到香港的电报，就不会回广州了。陈炯明的军队有五六万人，你们只有一万多人，你们能够驱逐陈炯明是孙中山先生主义的力量，人心向背的结果，绝不能认为有武力就能解决问题。”先父见夏声还在认真地听，就进一步劝导：“陈炯明的残部还在石龙，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如果孙先生不回广州，搞得不好，你们也会步陈炯明的后尘。当今之计，你不妨和杨希闵司令商量，建议他与全体滇桂联军将领表明态度，欢迎孙先生迅

速回广州主持革命大计”。谈到这里，夏表示要请示杨司令，请稍坐一下。夏声去了一会，回来答复说：“杨司令同意这个意见，派我与你先去香港见胡汉民。”于是先父与夏声连夜赶到香港会见了胡汉民，说明了情况。胡当时感情用事，表示不将桂军赶走，他们不回广州。夏声见谈话没有结果，气冲冲地对先父说：“胡汉民这一来，只好激起我们（指滇军）与沈鸿英（桂军）一致行动。”并要立即回广州。先父劝说：“孙先生现在上海，当然只听信胡汉民等人的电报。我打算亲自去上海介绍广州真实情况。希望你回去再和杨司令商议，速即派代表直接去上海欢迎孙先生。”

先父罗良斌在香港约同了孙科、伍学焯、张启荣等同志乘船去上海，会同陈少白先生，到莫利哀路晋见了孙中山先生，报告广州情况，请孙先生迅速回粤主持革命大计。开始，由于孙先生已听信胡汉民等的电讯，他对桂军的行动也很气愤，表示：“不把桂军驱出广东，我不能回广州。”于是先父又劝说孙先生：“现在不是消灭桂军的问题，而是如何团结他们的问题。如先生回到广州，他们不听命令，那时义正词严，随时可消灭他们。否则，操之过急，有可能激起滇桂军的一致行动，甚至迫使他们与陈炯明三方面合作，对革命带来不利。为了不致使广州革命根据地再陷敌手，免使广东人民生命财产再遭混战损失，先生最好迅电广州安慰人民，并电滇桂军声明先生本人不日回广州主持一切。同时先派一宣抚使到广东，更换省长以安慰滇桂军心。先生千万不要听信个别人感情用事的意见，以免耽误大事。滇军代表也将来上海欢迎先生，到时先生就可回广州。我们的愚见，请先生采纳。”同去的伍学焯、张启荣、陈少白等同志也相继分析了利害，孙中山先生口气有所松动，沉思一会之后问：“那么，谁当省长最合适呢？”先父建议：“像徐固卿先生是广东革命之元老，他的声望可以安定人心。”孙先生当时未表态，说：“等休息一会，再

从长计议吧！”

这时，恰好滇军代表夏声也赶到了上海，更促成了孙先生的决策。第二天，孙先生召集先父罗良斌、伍学焜等人谈话，表示同意先父等人的建议。宣布派杨庶堪为广东宣抚使，徐固卿为广东省长，即日回广州到职。孙先生随即经香港，回广州。广东大局由此转危为安，为以后北伐胜利打下了基础。（至于滇桂军后来在广东闹事被解决，那是后话）。

1923年，先父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游击司令，带领军队东征石龙、增城一带，继续参加剿灭陈炯明残部。不幸，先父于军中患重病（牙出血不止），只得回广州住院治疗，所部改归第七军军长刘玉山指挥。

（1986年）

1923年冬孙中山先生在石龙、广州指挥作战

施惠之

1923年10—11月间，陈炯明叛军林虎、洪兆麟、叶举、杨坤如、李易标等部分数路由惠阳、博罗、樟木头、增城大规模向粤、桂、滇军猛烈攻击，粤、桂、滇军屡屡失利，节节败退。当时孙中山先生令粤、桂、滇军在石龙布防，迎击敌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在右翼，滇军杨希闵部在左翼，桂军刘震寰部和大本营直属第七军刘玉山部队在中路，吴铁城指挥三个支队在增城（吴铁城因事以梁国一代理指挥官）。孙中山先生和参谋长李烈钧，副官马湘、黄惠龙由广州乘专车抵石龙防线督战。孙中山先生刚抵石龙防线，中路刘玉山第七军由前线败退，影响了整个战线。未久左右两翼许崇智部和杨希闵部，也相继退却。敌人见各路军败退后，蜂拥而来，势不可遏。孙中山先生认为当时形势险恶，迫不及待，就坐原专车返广州，指挥布防。参谋长李烈钧，副官马湘、黄惠龙等因为时间急迫，不及同孙中山先生坐专车，改坐大南洋电船返广州，大南洋行至右滩搁浅，全船官兵几乎被俘。

敌人李易标部向增城进攻，来势凶猛。梁国一指挥三个支队防守增城，因众寡悬殊，梁国一阵亡，其部队向广州方面退却。

各路军由前线失败后向广州退却，军纪废弛，东奔西跑，退到石滩时，队伍尤为凌乱。在石滩既无预先架设军桥，又无准备充足船只，人马拥挤，自相践踏。敌人由侧面及背后急追，各军官兵成千上万沿着铁路溃退，过桥时，火车由后方推进，桥上人山人海被火车碾压，身头碾断者有之，手脚碾断者有之。有被碾死落于河中，有被碾未死挂在桥梁上，哭声连天，惨绝人寰。还

有些部队坐船渡河，因没有好的安排，人马过重，沉于河中者不知多少，兵夫饥饿疲劳，枪弹行李沿途乱抛，经走了一昼夜，始抵达广州。各部队抵达广州后，好像一盘散沙，由沙河至石牌，满地散兵，连排长找不着士兵，士兵找不着连排长，经过相当时间，各部队才把队伍集中起来。

在此混乱危急的形势下，孙中山先生为了加强兵力，击败敌人，保卫革命根据地广州，急令川军熊克武部、湘军谭延闿部、豫军樊钟秀部等星夜兼程赶到广州，参加作战；又令由石龙退回广州各部队，迅速整理队伍，准备迎击敌人。孙中山先生经过数天调度军队，由白云山瘦狗岭以至珠江河边，布置防线，未久，川军、湘军、鄂军、豫军相继抵达广州，军威大振，人心奋发。

不数日间敌人李云复部和尹骥部沿着火车路先向东路讨贼军第二旅陈得平和第八旅张民达部进攻，两军接触未久，豫军樊秀部队由龙眼洞包过敌人后方，因之敌军全线摇动，东路讨贼军第二旅和第八旅、滇军、川军、湘军、鄂军、桂军一齐向敌攻击前进，敌因腹背受攻击，损失惨重，狼狈窜逃。

各路军在石龙失败后，广州形势万分紧张，人心恐慌，人人以为广州危在旦夕。但孙中山先生心中有数，指挥若定，从容调度部队，各省大军云集广州，击败敌人，保卫广州。此次战役，关乎国家前途非常重大，如果此次战争失败，广州被敌人占据，就没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也没有第二次北伐的成功。

(1965年)

关于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见闻

林丛郁*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先生为了阐明他的革命主张，于同年1月27日开始重新讲述他的三民主义。

孙先生讲述三民主义的地点是高等师范礼堂，即后来的国立广东大学礼堂（高等师范、公立法政、省立农专和广东公医四校是年11月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以文理学院——旧高师为校本部），亦即现在文明路的鲁迅纪念馆。那里地方很小，座位不多，无法容纳广大的听众；但在当时的广州市，已找不到一间更大的集会场所，因此只好把观众分批轮流听讲。主要的听众是革命政府在广州市的军政人员、国民党干部、民众团体骨干、中上七校教师学生、湘军教导队、滇军教导队，以及黄埔军校学生（黄埔军校是1924年开学的，他们只参加了听讲民生主义）等等。那时广东大学正在开始筹备，高师、公法、农专、公医还是中上七校成员（其余三校是：省立中科工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按照规定是要轮听的，不过讲坛在高师，高师学生以近水楼台，他们喜欢听的每场都可以去听。由于公法同高师距离不远，而且并校正在进行中，学生喜欢听的，即使不是轮值，也照样可以去听。当时我在公法念书，每次都到场参加。其实听讲的人并不踊跃，空着的座位很多呢。

1924年1月起至8月止，孙先生讲三民主义一共讲了16次。演讲时，除偶然有一两次戴帽子，穿长衫之外，都是戴淡黄色的通帽，穿企领西装的。这种企领与普通的不同，它是像衬衣领那

* 作者当时是公立法政学校学生，曾听孙中山演讲。

样向外反出的，因而大家都把这种服式叫做“中山装”。他每次演讲，都由夫人宋庆龄女士陪伴到场。当他登台讲演的时候，孙夫人就坐在礼堂前面第一排路靠东边的椅子上，静静地跟大家一样聚精会神地倾听孙先生动人的讲话，待他讲完后才一同离开。

“动人”这个形容词，我想凡是听过先生演讲的，都不会说我是夸张，即使没有听过的人，只须把《中山全书》里的《三民主义》翻看一遍，也还可以体会得到的。《三民主义》是根据黄昌谷的记录稿编印的，其实在语言技巧上，记录文字远不及孙先生现场讲话那样生动活泼。他是一个演说大家，他的演讲内容和声音姿势都是富有吸引力的。经常是，初讲时声音比较低，渐讲渐高，讲到慷慨激昂，或者要人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声调就更坚强有力；但不论高声低声，语音都十分清晰明确，那时虽然还没有扩音机，全堂听众都听得清清楚楚。演讲开始时，他一般是站在讲台后面，偶尔也站到讲台左侧，以右手按着讲台，偶尔也站到讲台左前方，都表现得精神饱满，姿势优美，举动十分自然。他逝世后，后来汪精卫说：“他近年肝病加重，演讲时常将腹部靠在讲台边旁，以减轻疼痛。”^①在讲三民主义时，我觉得孙先生很少出现这种姿态。

孙先生的演讲辞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这点，大家在《三民主义》里，随处都可看到，无须我再多说。现在只把我所记得孙先生曾讲过，而《三民主义》书里没有的，在这里大略谈谈。

“车大炮”这句话，在广州话里是含有讥讽人说话不老实，或随便胡扯不负责任的意思。由于孙先生长于演讲和说话雄辩，广州有些人给他一个绰号，叫他做“孙大炮”。这当然是对孙先

^①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从北京回到广州，一次在广大礼堂集会上所说的。

生的一种诬蔑，追溯源流，可能还是当时反动派害怕人们听信孙先生宣传的革命理论，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孙先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并不介意。记得有一次在讲民族主义时，他曾坦率地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接着，他就列举事实，指出帝国主义怎样用政治、经济侵略中国，中国如何危险，中国人民因怎样努力，滔滔不绝地像连珠炮那样“轰”下去。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他不否认自己是“大炮”，只用事实说明这“大炮”是打帝国主义的。这就使听众心理上起了变化，觉得这样的“大炮”不仅不惹人憎厌，反而可爱，多一些，对国家民族更有好处。当时博得听众，尤其学生们热烈的掌声。

1925年“六·二三”沙基惨案发生时，在工人集会中，我还听过这样的话：“可惜孙大炮死早了，如果他还在的话，帝国主义是不敢开枪的。商团事变时，英帝国主义驶进白鹅潭的战舰，它的大炮不是都卸了炮衣指向广州市吗？可是它，屁也不敢放一个。”尽管反动派用“孙大炮”这个绰号来诋毁孙先生，可是在群众心目中，“孙大炮”却变成了光荣的称号。

孙先生认为提出一个革命目标要大家去奋斗，这目标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身关系，人民才会热心拥护。因此，他在讲民权主义说到自由平等就指出：欧洲人从前因受政府专制和社会不平等的痛苦太深，所以一倡自由平等，就万众赞成，牺牲身家性命去争取。中国情形不同，不能人云亦云也拿自由平等作号召。关于自由部分他拿外人讥笑中国是“散沙”一点加以说明，《三民主义》里已有详细记载。对于平等部分，当时他曾另举一例。他说：我们仅从人民的互相称呼看，便可看出中国同欧洲国家有显著的不同。比方对佣人的称呼，英国人叫家庭女工做“女仆”（maid）就不像我国北方称作“姨娘”那么客气。我们广东人的习惯，一般称为什么婶，什么嫂，或者什么姊，什么妹，亲如一

家，根本没有把她作佣人看待。又如酒楼旅店的侍者，欧洲人称为“杯”（boy）。“杯”的意译是“小孩子”，把侍者当作小孩，显然是瞧不起人。我们北方人称之为“茶房”，这是根据工作来称呼，并无贬低别人身份之意。广东人叫做“伙计”，就更客气了。大家知道，“伙计”不是对佣人的专用名词，我们朋友之间也互称“伙计”——合股经商是“伙计”，共同干革命也是“伙计”。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拿平等去号召革命，怎能获得群众欢迎？说到这里，他稍微停了一下，随即提高音调说：“伙计，我们中国革命应拿三民主义去号召，三民主义实行了，人民就自由平等了。”这个例子，从阶级观点来看，孙先生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厂主与工人之间，无论你怎样称兄道弟，也一样是不平等的。揭露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未必不受群众欢迎。但在当时，一方面因为人民的阶级观念还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另一方面也因孙先生讲得那么巧妙、通俗、具体、有趣，一般人听来，就觉得津津有味，合情合理。孙先生演讲时称呼群众，一般都是叫“诸君”的，这次因讲到“伙计”这个名词，就顺口叫大家做“伙计”，大家听来觉得特别亲热。

上面两段话，在《三民主义》里我都看不到，不知是记录人疏忽，还是有意删去了。

民族、民权两部分都讲了6次，我以为民生主义也是分6次讲完的；因为民生主义第一次讲学理，第二次讲办法，第三次讲吃饭问题，第四次讲穿衣问题，若是按照食、衣、住、行4个问题顺序讲下去，最少还得讲两次。在8月24日讲完穿衣问题之后，孙先生因出师北伐去了韶关，演讲就停下来了。当时他很忙，时局也不很安定，暂时停讲是不足为奇的，4月26日他讲完民权主义之后，中间因军事影响也曾停过3个多月，直至8月3日才开始讲民生主义，因而这次停顿，大家也还认为只是暂时的现象。不料这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变，接着北京政府曹

(馄) 吴 (佩孚) 倒台, 孙先生 11 月应邀北上, 途中肝病发作, 1925 年 3 月就在北京逝世了。因此, 民生主义就只讲了 4 次。后来报纸上载孙夫人的谈话时曾讲到: 民生主义除衣、食、住、行四大问题之外, 孙先生本来还打算讲“乐”、“育”两个问题。这样看来, 民生主义似乎是还没有讲完。

1925 年七八月间, 我在省港大罢工食堂任招待工作, 凑巧遇见了孙先生早年革命的老战友夏百子。他是一个檀香山归侨, 当时已 67 岁了。因同孙先生搞革命, 他倾荡了家产, 并被清政府通缉。他把清政府通缉孙文、夏百子的布告照片给我看, 说孙先生搞革命被通缉, 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孙先生早年在海外宣传革命, 他说: “那时的三民主义学说还不完整, 宣传的主要内容不过是: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推翻帝制, 建立民国; 以及民治、民有、民享等一类话而已。”

夏百子很恨孙科。他说, 因搞革命破产, 晚年无法谋生, 回到祖国又适遇孙先生逝世, 特投奔孙科 (当时任广州市市长), 请求设法, 但孙科不理他。后来找吴铁城 (当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才在广州市公安局督察员的名义下, 每月领到几十元生活费。

(1965 年)

关于孙中山先生遗稿的一次意外发现

庞镜塘*

1945年冬（约12月初），我才从南京转往北平不久，有天津某商业银行的经理韩某^①（名字忘记，他所从业的银行名称也回忆不起）由伪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介绍来见我。他说，他有一个日本朋友，日本大政翼赞会秘书某，在该会资料室里看到过孙中山先生的遗稿多件，长时期并未受到负责人的重视。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人认为这是日军侵占上海时候掠到的，中国政府将来可能追查到这批东西，由这位秘书已经特别保管起来。如果得到我们的同意，他便可以设法带来交还中国。

我问是些什么内容，这位日本朋友是否告诉过你？韩说，并没有谈到这一点。我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便打电报到重庆，向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报告这个消息，并请他指示处理办法。张复电让我进一步和韩商洽，先将这些东西弄回来，作为收购或接受他捐赠，给以精神和物质的奖励均可。

约过两星期后，韩某送来木制日本点心盒三个，在夹底木板下层藏有大小篇幅不等的稿子61件（或是60件，记不清楚），其中有孙中山先生手稿50多件，包括非常大总统时期和大元帅时期（都是用印有当时机关字样的稿纸或信笺写的）的委派工作人员的手令或训令的稿子，致林森、邓泽如等的书札稿子，批示下级指示文件和给胡汉民、汪精卫等的手条的稿子。特别重要的是民生主义一部分的缮正稿件，单这一件就有37页，全是用日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官员，亲历其事。

① 沈醉审阅该稿时指明韩某系作者误记，应系郭镇华。

本美浓纸写的。主要是发挥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论点，文字及结构极严谨，和社会流传的三民主义讲词，显然不相同，应该说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种^①。此外还有林、邓等来信或报告的原件，这些散篇或稿本，虽没加装潢，却是都保存得相当完整。

我得到这些文件之后，稍加分类整理，便携往重庆，首先送给张继看。张说：“这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保存的总理（指孙中山）遗墨以外的文件，非常宝贵，应该交由党史会保管。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去报告的时候，不必把原件带去，特别是其中还有他（指蒋介石）给宋庆龄的两封信，是在打笔墨官司，他看到了非收回去销毁不可。假如他见到这些文件，硬要留下来，那就石沉大海了。我想连夜把全部文件都照成照片，你明天带一份照片去见他，他即会把文件非要去不可，我们还可以控制底版，再冲洗也还有办法。”

于是我便照张继的意见，连夜把文件都照成10寸大的照片，仅把洗出来的片子拣选了若干篇送给蒋介石，原件全部都交由党史会接收保管了。事后由张继根据我的书面报告，提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对韩某和日本大政翼赞会的秘书某都给予书面奖励，并各发酬劳金若干万元（法币），以示酬谢。

（1962年）

^① 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原稿在1922年夏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叛变后炮击观音山时，全部被焚毁。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大学和其他地方讲演三民主义多次，都是由黄昌谷笔录的。就是今天所流传的本子。这民生主义稿是当时的一部分原稿，应该是讲演以后写的。由于原稿上没有著明年月，无从考证。但从笔迹核对，确是孙先生的手迹无疑。

孙中山先生保护广州回民坟场

杨绍权*

1924年，孙中山先生对广州回民公共坟场永久保存一事，深为国内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人民所赞许。但是，这一史实，在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载籍中，则未尝见诸记述。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广州回民团体所护有的文物档件，也毁失殆尽，所存留的，只是只爪片鳞。经过回族中老年人陈锦棠、马智贤和杨汉光阿訇（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发掘会议的资料，记其始末，以补历史之不足。对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主张，早年即已确定，而这种主张在这一事件中更为鲜明。

一、广州回族坟场的位置及其历史

从辛亥革命至解放前的38年间，广州回族居民虽然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流徙和胜利后的复归，人口数字曾经有所波动，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最高额约有2000余人。在这约2000余人当中，多数是由西北、东北和华北等地区迁移来市的。其祖先的坟墓，从迁来之时开始，即按照宗教上的习惯和仪式，卜葬于广州大北门外的桂花岗的清真先贤古墓附近，形成一个自然的公共坟场。这个坟场，在1924年之前，没有得到正式的保护管理，完全陷于荒芜与凌乱的状态中。那座具有千年历史远从唐初年间遗留下来的清真先贤古墓，更是荒凉不堪。这座古老的坟墓，是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人阿布·宛葛士的坟墓。他奉穆罕默德的命令东渡中国，自广州经过了泉州和杭州，而至当时的首都长安城。

* 作者系这一事件的调查研究者。

所过之处，都留遗迹。在广州建立了怀圣寺及光塔，还在泉州和杭州，建立了麒麟寺和凤凰寺，是把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第一位使者。后来他经原路回来，病歿在广州，葬于此处，留下了千百年来中阿友好和伊斯兰教文化交流的遗迹。在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当中，他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尊敬。特别是广州回族的居民，更尊他是“大人”，每逢回历 11 月 27 日宛葛士的诞辰，都很隆重地举行纪念会，诵经祈祷甚诚，叫做“大人忌”，这座古墓在历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

二、大振公司的图谋

1923 年 2 月，孙中山先生于驱逐陈炯明之后，自上海返抵广州，复任大元帅职。其时，孙科也自美洲归来，出任广州市政厅长。是年秋，广州市政厅公布了一项《管理市郊公产条例》的法案，规定要缴交上手契据呈验。由于附葬于清真先贤古墓附近方圆 19 个岗头（包括大蛇地、小蛇地、桂花岗、天平架、大岗头、走马岗、松柏岭、升斗基、西村口、中心岗、马屏岗、头堡岗、花生地、前园岗、聚龙岗、埕岗、石榴岗、九龙庙后岗、横海头）全部面积 576.845 亩的所有回民坟地，来源年代已久，缴交不出上手契据凭验，亦被列为“公产”之一。广州市政厅即命令财政局，将这一地段全部招商承投，兴建房屋以扩展市区的范围。

有大振公司者以包承建筑及套购土地为业，其经理名叫梁六，首先以 1 万元的代价承投了桂花岗、天平架并包括清真先贤古墓在内的一幅地段。而上述 576.845 亩全部土地的最低拍卖总值，则共计 4 万元。此时还没有完全被其承投。因为这个大振公司的股东，是由几个投机商人勾结市政局一批留职人员，共同临时拼凑而成，专搞投机的勾当。梁六也是一个假人名，实际并无其人。因为有这一批财局的旧科秘人员在内，消息比较灵通，认

为承投之后，用以兴建房屋出售或出租，便有大利可图。但集资不多，故先承投一部分。

三、回族各界人士的对策

大振公司承投桂花岗提案公布之后，广州回族各界人士都大为震惊，都认为祖先古墓在此，一旦土地被投，都将起尸露骨，遂群起反对。回族代表人士一致宣称：（一）这片墓地，有的远自明末清初，即已有其祖宗的坟墓安葬在此，具有墓碑的年月可据，借口追查上手契纸，显然市政厅是故意刁难；而且清真先贤古墓是历史著名古迹，一旦被摧毁，对于民族上、宗教上和文化上都有影响。（二）回族葬礼与汉族风俗不同，他们既无棺材盛殓，而又为习俗所忌。发墓迁葬，是所不愿，政府应该根据宗教上和民族上的实际情况^①予以照顾，希望广州市政厅从速收回成命。

这时，广州回族上层人士马伯年是日商台湾银行的华方经理，他与广州市财政局长陈其瑗友谊颇笃，便自告奋勇，出面和陈其瑗局长协商解决的办法。陈其瑗说，政府因筹备军饷，急如燃眉，想妥善解决，必须有官民兼利的方式。马伯年就提出：由他协助政府，向台湾银行借款4万元以济燃眉急，暂时不动承投坟地，则官民双方都有利。陈其瑗允其所议。

但是，大振公司的人，看到业已到口的肥肉，被人夺走，有所不甘，便向孙科积极疏通，愿意凑足4万元，顶回向台湾银行

^① 回族以土葬为主，其棺材或以石，或以坯，或以木制成，都无底部，长期将这种棺材（其名叫做“金井”）埋在坟内，另从公用盛具运送尸体至坟墓埋葬。一旦发墓，打开“金井”盖，则尸骨暴露，无法搬迁。而且，习于迷信，认为迁葬以后，会对家运带来不祥，习俗相沿，咸有禁忌，迁葬的观念。当时回民的思想比较闭塞，对于丧葬习惯，颇多迷信之举。

的借款，将全部坟场所有 576 亩投承下来，以免拖着向台湾银行的一笔借款。孙科受其包围，不顾回族人士的愿望，同意了大振公司的要求。这样一来，便更激起了回族各界人士的反感。

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的委员，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主张民族平等和信仰自由的，对于宗教历史文物保管，不会置之不理，就撇开广州市政厅直接上呈文给大本营和广东省长公署。同时，还向滇、湘、桂各界的军法处呼吁，请求给以援助。当时，滇军军法处处长保廷梁，亦是回族上层人士，希望他们能把具体情况上达孙中山先生。

四、孙中山先生的亲笔批语及大本营训令

孙中山先生接到回民呈文后，见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支部的代表马云亭阿訇（云南人，年已 70 余岁，是南胜里清真寺的以摩目，即教长）等数人，亲切地面询了具体的经过情况，加以慰勉。同时，亲笔在呈文批示栏上写了“回教坟场，永远保存”八字的批示（一说没有接见代表就批示了这八个字，是由保廷梁在大本营探知的）。接着，于 1924 年 6 月，接到大本营发来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训令一件。现将全文录下：

大元帅训令（第 187 号）

为训令事。查广州流花桥外桂花岗一带，原系回教人士聚葬之所，其地又有先贤古墓为唐贞观年间古迹，史册昭彰，民咸景仰。乃有大振公司呈请广州市政厅承投该处土地约五百余亩，用以建业。兹据广州回教马云亭等具稟大本营乞请飭属撤消原议等情前来。大元帅念建国之基本，革命之奋斗，悉以民族平等信仰自由为宗旨。该处回教公共坟场应予永远保存。除分令外，合行训令有各机关团体一体周知，仰即遵照。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
大元帅孙文

这一文件曾由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刻成石碑，放置于清真先贤古墓东西厅堂的南墙根，高约7市尺左右，为广州回教书法家马永宽楷书。在广州沦陷时期，有日寇一个连队驻扎于先贤古墓附近，敌军经常入该古墓内骚扰，因发现这个训令是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发布的文件，竟将碑石砸毁，击成数截之后抬走，自此不知残石的去向。最近，经香港金逸卿阿訇（已故）的后人将这抄件寄来，殊足珍贵。

五、廖仲恺省长的布告

和孙中山先生发布上述训令的同时，广东省长廖仲恺先生，亦根据香港回族礼拜堂牧师^①金逸卿的要求，发出批准该回族坟场，永远保存。原来香港回民，大部分是由广州迁去的，其祖先坟场也在广州流花桥的这片地段之内，因而也异常焦急，集会决议电呈广东省长公署收回成命，撤销大振公司的承投。廖仲恺先生根据孙中山先生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的政策，应金逸卿等的要求，作出决定。以省长公署名义，发出布告如下：

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第五号）

为布告事。查大振公司承顶流花桥外桂花岗，系回

^① 按照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宗教传道者，称为“阿訇”，其首席称为“以摩目”即是教长之谓，本来不叫做“牧师”，但是香港英国统治，对伊斯兰教诸多限制，不准使用阿拉伯语的译称，始改以“牧师”的名义备案，同时，“清真寺”也只准许作“礼拜堂”，后来，又改为“回教博爱社”的名义备案。

族人士聚葬之所，应准保存为回教公有坟场。拟飭财政局特将大振公司承顶原案撤消，并派员勘定界址转飭该教会依界勒石以资识别等情前来，经核准照办在案。除令飭俟勘定后发给永远保存证书外，合行布告，仰回族人民一体周知。此布。

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长廖仲恺

以上《布告》的全文，亦经泐石刻成碑文，放置于“清真别舍”（现改为中苏友好大厦的附属建物）对开的麻石路旁，即是由双井街入三元里的无名大道旁边。1961年越秀公园修建“兰圃”，曾将这块石碑迁入圃内，现在这一文物仍暂时存放在“兰圃”之中。原碑高197公分，阔92公分，楷书，无书丹人姓名，石质为幼古石。

这样广州回民坟场就保存下来，给广州回民极大的欢欣和感念。

六、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当孙中山先生而后廖仲恺先生分别批准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回教坟场，永远保存”后，广州市政厅碍于上级指示，不得不予遵从，但是市政厅长孙科，心犹不甘，便从坟场的土地面积，另有图谋。他说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代表马云亭阿訇所缴呈的坟场面积全图，有所不实，与市政厅所掌握的图纸相差甚远。企图抹掉其中的一部分，仍做充公之用。孙科命令广州市财政局局长陈某（根据文件所述，仅为陈局长，但考其年份，应该是陈其瑗任局长的时期）仍照市财政局所绘图纸为据。所谓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马云亭又将这一情况，向广东省长公署反映。是时廖仲恺即又以广东省长公署第482号指令批示：“原具呈人

回教代表马云亭等呈一件，松柏岭、马屏岗等处各地段，确系回教坟，应由广州市财政局一律给证保留，特此命令广州市政厅转知市财政局遵照。”可见廖仲恺先生对于保护回族坟场完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政策执行。这个时候，适值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1924年11月13日），以胡汉民为代帅，廖仲恺先生离广东省长职。陈其瑗也调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由王棠继任。1925年2月11日，王棠根据前任未完案件，遵照前省长廖仲恺先生的命令，以广州市财政局第2134号布告，根据马云亭呈缴的图纸开列各个岗头的详细面积数字，绘成“广州回族永远保存坟场面积图”并附这个布告的全文、由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刻成石碑，嵌在清真先贤古墓东厅正中墙内，幸而原石至今无恙。到此，遗留下来的枝节问题，乃全部得以解决，这都是廖仲恺先生执行孙中山先生民族政策所致。^①

现将各岗面积数字录下（单位：亩）

大蛇地	34.353	马屏岗	1.257
小蛇地	11.280	头堡岗	15.833
桂花岗	120.791	花生地	1.363
天平架	164.831	前园岗	0.725
大岗头	39.757	聚龙岗	19.021
走马岗	71.719	埕岗	84.360
* 松柏岭	3.041	* 九龙庙后岗	0.566
* 升斗基	0.702	* 石榴岗	2.771
* 西村口	0.954	* 横海头	3.063
* 中心岗	0.457		

共计 576.844 亩

^① 根据王棠所发布告的年月日，是时广东省长已由胡汉民继任。这个布告的发出日期虽在胡汉民任内，但文中所说接到广东省长公署批示等语，实质廖仲恺先生在任时所办，不是胡汉民继任时的批示。

以上有“*”符号的，是孙科所企图抹掉的部分，都是面积数字不大的。他用意之所在就是计谋抹去这一部分则将这些岗头的全部民田及坟墓占用。上述数字，除依照清真先贤古墓东厅石刻抄录外，并根据广州回族“四坊箱”所存旧图纸核对，现在这图纸仍保存于小东营清真寺马季显阿訇处。

七、广州回民的称庆

在广州回民公共坟场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广州各界人士莫不举额相庆，都歌颂孙中山先生对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所施行的政策异常伟大。遂在1925年2月于清真先贤古墓内举行了全市回民大会庆祝成功，并邀请港、澳回族人士和广西、云南等省的阿訇来市参加。是日，又值宛葛士的诞辰，典礼隆重而严肃，并举行盛大聚餐。

在回民大会上，一致通过将大本营训令、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等文件刻成碑式的标志，上写“回教公共坟场奉大元帅手谕永远保存”字样（这种纪念碑式的标志，除了这项文字之外，还有上写“回教坟场奉总理谕永远保存”及“回教坟场永远保存”等字样的，则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所立的），由广州回族“四坊箱”出资修建。在抗日战争以前，出流花桥外即可触目皆是。到了广州沦陷，敌军每天在这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认为这项纪念碑式的标志，有碍于远射程的射击，将其大部捣毁，现在在天平架地方，还保留着一件。

（1965年）

孙中山 1924 年秋在韶关

吴宗泰*

孙中山 1924 年 9 月在韶关誓师北伐前后仅一月左右，然亦有可记者。

孙中山当时住在韶关车站北侧一间二层楼里。警卫部队仅有黄埔军校学生一队和吴铁城警卫军一团三营梁朴园部三个连，我当时任十一连中尉排长。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野地临时用竹棚搭盖的营房，因为韶关所有庙宇给驻在韶关的滇军第三师赵成梁部占住了。并且当时的赵成梁是完全不听孙中山指挥的。正是因此，孙中山个人当时也不得不暂时住到车站里来，那间二层楼房是属于车站的。孙中山住地，没有什么警卫，进出车站来往的人很多，人们不会想到在这间小楼房里住有一位革命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亲自到韶关布置北伐，手里到底有多少部队呢？当时所谓粤军、滇军、湘军、赣军、鄂军、豫军等，总司令很多，能听孙中山指挥者则极少。以我所知当时愿北伐者仅樊钟秀之豫军 2000 多人。

孙中山双十节曾在韶关阅兵和训话。是日上午在韶关飞机场受检阅的部队，如今回忆一下，至多不过 2000 人，而警卫军梁朴园营是全部参加的。我记得当时受检阅的部队，可能是樊钟秀部，滇军是没有参加的。

随他检阅部队的有宋庆龄，他们是坐轿来的，到检阅场附近才下轿步行。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衣，下身穿着黑色裙，手里还持一把布伞，看来很朴素大方，而孙中山和平时一样，穿着一套

* 作者时任孙中山警卫队之中尉排长。

白色的中山装，他的随从仅寥寥数人，人们经常以“平民革命家”来称呼孙中山，确是有根据的。

下午孙中山在一间小庙里对我们训话。但是当时参加人数之仅三四十人。会场的布置是在小庙正殿搭一个小小的木台，木台后侧有一小门通往休息室。台前置了十多对长凳，在十多对长凳上疏落地坐着 20 多个穿着军服的军人。警卫军三营也派数人参加，我就其中之一。滇军仍然是没有人参加，而且上校以上的军官更没有一个参加，当时我们都佩带着肩章，还拖着指挥刀，什么官阶是一目了然的。

尽管人数是出人意表的少，会场空气很冷淡而散漫，没有一些严肃气氛，但孙中山从侧门出来时，态度还是那么从容、和蔼可亲，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快之感。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讲的是“国旗的历史”（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也就是当时的革命历史，并且着重地叙述镇南关这一次战斗的历史。当他开头说话时，没有什么特别使人惊奇，但他的说话是一步一步的深入，情绪是一步比一步高涨。正当他说到你感到最紧张的时候，最感痛快的时候，他的演讲也结束了。他的演讲的确能够启发群众的智慧、抓住群众的情感，群众给他感染了。黄昌谷后来有一篇记录稿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但所记比原来说话精神已丧失大半了。

我是第一次听他演讲，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真是难忘的一次会见。孙中山说完话后，随即退入休息室。然后是谭延闿出来说几句什么希望大家听大元帅的话，实行北伐等，作为这次会议的尾声。

（1965 年）

国民党东京总支部改组和欢迎孙中山

郭瘦真*

国民党早在东京设有总支部，散在横滨、神户等地的党员也统归东京总支。1924年前，东京总支为广东陈炯明实力派所把持。当时留日的官费学生，广东籍者很多，在西巢鸭设有广东留日学生监督处。他们多和广东现政府官员有密切的联系，如同乡、同学、亲戚等。有了这种或那种的关系，才能获得官费。官费生的条件是规定帝大、医大、高师等校的留学生，可是留学生反对现政府，就有不给官费或取消官费资格的危险。留学生监督的任务就是监督学生的思想行为的。当时监督陈季博（梅县人），原来是陈炯明盘踞广东时期派去的，陈炯明被驱逐后，他和邹鲁联系很密。国民党东京总支部就设在广东留日学生监督处，主管党务的是黄年华（龙川人，东京高师学生）。平时的工作不外是写“快邮代电”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不过年年一度的“双十”节，却在神堡町中华基督教会和一些拥护挂五色旗的留学生大闹全武行，成为通例。1924年东京总支部改组了，这是由4月间郭汉鸣到了东京，改组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谭平山曾对郭说：到了东京，注意下那里的国民党党务。彭湃也给郭介绍留日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东京支部林铁史。故郭到东京后很快熟悉那里国民党情况，并获得了官费生的待遇，他就积极地活动起来。那时广东留学生中拥护陈炯明的一派沉下去了；其他大部分包括曾有国民党党籍的（如杨建平）学生对国民党的改组和三大政策采取观望或反对的态度，因此在8月举行总支大会时，广东

* 作者当时系留日学生和国民党东京总支部成员。

留学生很少，但大会前已经联系好的非广东籍学生却大大地增加了。这次大会主要的议程是发通电拥护三大政策和改组总支部，把原来的合议制改为执行委员制，这都没有争论。因此顺利地选出了李人一、马念一、汤志先、郭汉鸣、费哲民、陈季博等七人（另一人姓名忘记了）为执行委员，暂设常务和组织、宣传、工人三部，分了工。常务委员费哲民（浙江人）住在广东留日学生监督处，和陈季博结成小集团，经常放出谣言，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有阴谋的等等。马念一、李人一、郭汉鸣跟费时争吵，费的脾气不好，一争论起来就拍桌子，陈季博住在楼上，总支部开会时，或到或不到，但一听见争吵，必然来排解一番。汤志先（山东人）任组织部长，站在中间，一面说做革命事业不要着急，一面制止费哲民的狂暴，不要给别人讪笑。但他毕竟穷于应付，就经常不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1924年10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派驻东京的公使汪荣宝早已发出通知，是日举行庆祝。关于悬挂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为留日华侨所关心。总支部讨论时有人主张去公使馆把五色旗扯下来，但没有作出决定，也没有实行。照往年例子在中华基督教会的集会上，国民党员约到了十余人，有学生，有侨商，有横滨来的侨商店员。平时素知的青年党员（多属四川籍）约五六个人好像也有准备，听说宁可挂国旗，但反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尤其改组后的国民党已是赤化的了。日本便衣警察也早已注意总支部的动向，每隔十天八天到委员住处聊天，头一句总说“亚罗，有好香烟吸没有？”10日一早便有许多穿制服的警察站在神堡町中华基督教会附近，可是这次没有挂旗，平静地过去了。

12月4日^①前接到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电，知道孙中山

^①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8日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烈钧商定经日本转往北京的行程，故此处回忆时间有误，此电当系18日后。抵日本神户日期为11月24日。

先生将于 24 日抵神户转往北京。费哲民又造出谣言说“共产党反对孙总理北上”。他企图让总支部仅派他自己一人代表去神户欢迎孙先生。但总支部执行委员会讨论派代表名额和人选时，选出了汤志先、郭汉鸣、费哲民、李人一等四人为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总支代表。四人到了神户，是下午傍晚时分，而孙先生和夫人等已先到达了，住在东方旅馆。孙先生穿浅灰色的长袍，在客厅里接见了东京总支的四个代表，一一握手，继亲切询问读书的情况，说：“你们要用功念书”，没有谈及党务的事。他显出疲劳的样子，那四个代表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沉寂一下，孙先生便抽身离开客厅。戴季陶还和代表们一齐站着，一位代表问：“广州情况怎么样？陈独秀现在是否是在广州？”戴季陶皱着眉，似乎不耐烦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暗示，四个代表也就辞退了。第二天上午，神户侨商以姓杨的一个广东人为首在中华商会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讲了话，并拍照。孙中山离开神户的登轮时间没有通知东京的代表。

从神户欢迎孙先生之后，东京总支部拥护和反对三大政策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了。特别关于吸收新党员问题常常争执不下。有一次广东留日学生监督处的勤杂员是姓廖的青年（大埔县三河坝人）申请入党，费哲民认为吸收他进来没有作用，也争得拍起桌来。廖知道了费哲民阻挡他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就不给费送信买物，连吃饭后也不给费洗碗。卒至同意廖入党。1925 年初，郭汉鸣、李人一和姓廖的青年先后回国。东京总支部在陈季博、费哲民把持下，成为西山会议派摇旗呐喊的应声虫。

（1961 年）

1924年孙中山经过日本神户时的情景

高仁绂*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由上海经过日本神户去北京。那时我在日本野战炮兵学校第一期学习完了，派到姬路日本陆军第十师团的炮兵第十联队当实习生，我在第四中队，同学刘翰东在第五中队。一天，中佐联队附（忘了姓名）对我及刘翰东说：“我同李烈钧将军在士官学校是同学。李将军给我来信说，他同孙大总统要到神户，孙总统是你们中国第一任大总统，你们是不是应该到神户去迎接？”我说：“应该去迎接。但是我们的长官张学良将军在国内对我们指示，在日本留学期间不准因私事请假。”联队附说：“你们到神户迎接孙总统，不是私事，我向联队长替你们请假去。”次日，联队附同我和刘翰东到神户码头，迎接孙先生。

中山先生所乘轮船才进入神户港湾、只能看清船头悬挂中国国旗时，我站在神户华侨三江小学师生队伍排头，三江小学师生便同我们带领欢迎群众，鼓掌欢迎。船靠码头，孙先生、孙夫人立在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群众见了面，我们一齐鼓掌，欢呼万岁。但未料想到，几个潜伏在欢迎队伍里的陈廉伯走狗，大喊：孙文还我们的枪，还我们的钱等反动口号，激起了群众愤慨，三江小学师生同我们把这几个反动分子驱逐走了。

孙先生及夫人到东方旅馆，李烈钧同中佐联队附及我等到田中旅馆。李将军对我们作了亲切谈话，其内容如下：

（一）讲述他参加护国军讨袁的经过

* 作者当时系留日学生。

李说：护国军第一军长是蔡松坡，第二军长是我，每军两个师。每师只有400支步枪，其余兵都是拿长矛大刀等土兵器。从日本买了四门山炮不会用，我亲到前线，教给他们定信管，头一发就在敌人阵地上开炸，全军鼓掌，士气大振。

（二）谈论北伐军情况

李说：北伐军是三鬼组成，滇军是烟鬼，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粤军是赌鬼，上前线带着赌博器具。赣军是嫖鬼，队伍后面跟着大帮的妓女。有很多军官未学过战术，因此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不出军事上的力量。

（三）谈论去云南讲武堂情况

李说：我在云南讲武堂担任过教官。云南讲武堂编的课程很好。但是初成立时，因学派的关系，教官不合作，对教育方面受了影响。从靳云鹏负责任后，对我们留东学生很好，教官不闹意见，合作了。所以云南讲武堂的学员成绩都很好。

（四）讲述他在辛亥革命任江西都督后轶事

他说：我在任内不贪污。但是江西士绅送了一件纪念品，此人用5000元，买了一块鸡血石的图章送给我，这是明代一个名御史的。上刻四个字“崇雅楼印”，他拿出图章给我们看。他说：国家统一后，我一定把这个图章捐献给国家博物馆。

接着，李将军说带我们觐见孙先生，聆听先生对我们的训示。他请我们喝了几杯葡萄酒，对我们说：“我带你们去见总统。你们是国外留学的现役武官，不能称总理，必须称总统。你们知道见总统的礼节不？”我说：“以前的陆军礼节，我们知道。革命军礼节，我们不知道。”李说：“见总统行鞠躬礼，须要30度。说完话时必须面对总统，退后六步，向后转走。”

李带我们到东方旅馆，见孙先生后，我们行礼如仪。室内有戴天仇、俞中将（穿便衣，忘了姓名。编者注：应系俞应麓）。

孙先生说：“参加革命救国，不能置财产。有了财产，对革

命就动摇了。你们东三省张作相督办，是不能革命的，他是大地主。你们黑龙江督办，也是不能革命的，因他也是大地主。你们当军官要守法。拿破仑曾说过：军人以守法为本，军人不守法，老百姓一定要受痛苦。”

“作革命救国事业，不能拿革命工作换取个人的利益，不能拿革命任务换取个人的政治地位。”

我同刘翰东接受孙先生这番训示，是头一次明白了革命救国的大道理，心中非常高兴。聆训完了，行礼如仪退出。

下午回到田中旅馆，李将军问我个人经历。我简单地把我从19岁参加山东护国军讨袁及参加刘冠三领导的，运动山东陆军第五旅在枣庄起义，响应北伐军，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失败的经过，报告给李将军。李说，那很好。你们有大礼服没有，如果你们有，下次来你们要穿大礼服，因孙先生由上海来神户，未带来侍从武官。招待外国武官，必须穿礼服。

我说，我们是穷学生，做不起大礼服，我们二人有常礼服。

李说：好了，你们二人再来，穿常礼服，必须佩军刀，佩勋章。你们二人担任总统的临时侍从武官，招待外国武官。总统此次不由上海坐中国轮船，直接到天津，恐怕在中途遭到军阀海军袭击，才来日本神户转赴天津。李说完了，又说：今天我写字送给你二位。拿出宣纸，写一横幅“良将”二字送给我，又写“英雄”二字送给刘翰东，盖的印章是“崇雅楼印”，名字底下盖的条汉印：“大将军印”。

刘翰东说，将军可否写一横幅送给日本炮兵第十联队。李说，可以，但我要想一想，写什么辞才好。约几分钟，李说，我想了四个字，用“共和良友”，你们意见如何？刘翰东说，很好。我说，不但好，而且有双关的政治意义，如果写“中华良友”只有一个意义。“共和良友”有两个意义。李说，我也是这样想。

我们回到了姬路，送给联队长，联队长及日本将校都很欢

迎。把横幅悬在将校集会所大厅正面。

孙中山先生离开神户那一天，我同刘翰东，穿常礼服，佩军刀（因无勋章可佩）来神户东方旅馆向孙先生送行。孙先生训话很简单，说我前天同你们说的话，你们听明白莫有？刘翰东说，我们不但听明白了，而且要永远记住。先生说好。

刘翰东说，李将军写了字送给我们，并写了“共和良友”送给日本炮兵第十联队。

孙先生说，戴天仇，你把高中尉、刘中尉两人的名字记下来，我到北京后写字寄给他们。戴天仇当时就我两人的名字写在日记本上。我们行礼如仪退出。

我们二人到神户码头，欢送孙先生及孙夫人的队伍，已在码头集合好了。

穿军衣的外国武官，只有神户日本宪兵队长一人。我们问他，你是不是要见孙先生。他说，我是来码头保护孙先生上船，没有别的事，不需要见啦。请你们转达好了。我们说，谢谢你。

有一位比利时尉官，还有一位暹罗尉官（姓名忘了）。我问他是不是要见孙先生。他们说，我系以个人身份来码头欢送，无要事，不须用见啦。我们说，谢谢你们。这两位武官是看见我们穿军衣，自动的向我们谈话，自动的介绍他们的身份。不过，他们穿西服，我们看不出他们是武官。

上午10时左右，孙先生及夫人莅码头，登上日本轮船“北岭丸”。孙先生穿长袍马褂在左，孙夫人穿灰鼠外衣，戴灰鼠皮帽，穿黑皮鞋在右，共立在甲板上，向欢送大众致意。

轮船启航，群呼万岁，欢送孙先生及夫人回祖国。孙夫人在神户的讲话，神户英文报登载出来，因事隔40多年，内容想不起来了。

孙中山先生座轮出港后，三江小学老师约我同刘翰东到学校去讲话。我们两人除简单地报告国内外形势，主要是谈论这次孙

先生由神户转北京，是北方人民盼望孙先生到北京，主持全国的救国大计。

(1966年)

回忆孙中山北上及逝世前后

鹿钟麟*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伟大的人物，我们这一代的人，直接间接都受过孙先生的革命影响，不少人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因此，今天我们纪念孙先生的时候，都不免会有所感触，追怀往事，引起回忆。

冯玉祥是受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的一个人，我一生追随冯的左右，知道得比较清楚。冯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缺乏足够的革命认识和必要的革命立场，以致对孙先生的革命学说并不能完全领受，正像冯自称：“就革命观点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孙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虽然如此，而冯的几次重大举动，莫不多少与孙先生的感召有关。例如：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11月在北方发动滦州起义；护国战争时期，1916年5月在四川谏迫陈宦脱袁独立；讨伐复辟时期，1917年7月在廊坊率军入京平乱；护法运动时期，1918年2月在武穴响应罢兵主和。诸如此类，无一不是。不过在此以前，冯与孙先生还没有直接的联系，直到1918年6月以后，我们从武穴开拔湖南，驻防常德，这时候冯与孙先生才通过国民党人蔡济民开始取得直接联系。1920年7月，我们又由湖南开至湖北，驻防谏家矶。冯曾派任右民代表前往向孙先生致敬，并请示革命方略。孙先生旋派徐谦及钮永建衔命前往向冯答拜，并赠以大批革命书刊。未

* 作者系冯玉祥部重要将领，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

几，我们为王占元所排挤，不容再在湖北立足。同年11月被迫撤离谌家矶，开入河南，驻防信阳。我们抵达信阳后，处境恶劣，粮饷无着，遭遇重重困难，冯一度表示消极。孙先生得悉这种情况，非常关切，嘱以“革命事业为重，不可稍萌退志”。冯在这一期待之下终于克服了困难，保存住实力。后来，1921年6月至1922年5月，我们从陕西再回河南，冯与孙先生始有信使往还，从未间断。1922年10月冯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率军开拔北京，驻防南苑，至此，孙先生与冯的联系，益趋密切，军中经常有孙先生的来使。当时孙先生以手书的《建国大纲》赠冯，征询意见，并嘱来使孔祥熙转告冯说：“这个《建国大纲》可增可减，不增不减就信仰这个也可以。”冯读后很受感动，曾对我说过：“我们干了多少年，不外就是要革命，我们过去自以为是革命了，其实差得远哩，甚至还没有摸到革命的大门，什么都不懂，只凭一股爱国热情，横冲直撞，焉能不失败么？现在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把革命的步骤和方法，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条条是道，句句至理，这叫我们是万万搞不出来的，如何叫人不信服！孙先生不愧是革命的先知先觉，今后我们要革命，只有归附孙先生的名下，才是正路，才有前途。”

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贿选窃据“大总统”职位，吴佩孚专横跋扈，割据一方，孙中山先生曾发出声讨，并派马伯援北上密向冯玉祥示意采取行动，进行倒直。当时，冯以个人控制的实力不多，尚难有所作为，遂通过马伯援回复孙先生说：“一俟时机成熟，定当遵命”，而冯即开始暗中准备。1924年9月18日，孙先生发表“北伐宣言”，提出打倒曹吴的号召，当时正值二次奉直战争的序幕揭开，冯认为时机已到，便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曹锟的直系军阀统治。

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以前，曾经在1924年9月的一天，乘在南苑举行新建的“昭忠祠”落成致祭典礼的时候，在义地一

座草亭内和孙岳谈出发动政变的心意，先得到孙的合作，后来由孙与胡景翼接洽，又得到胡的合作，胡并借口就医亲到北京与冯密谈一次，于是就在这样秘密酝酿中形成冯、胡、孙的同盟；而胡、孙也与孙中山先生都有历史渊源，因此，他们决定推翻曹、吴之后，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

此外，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的前夕，在古北口曾与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及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取得合作的协议。冯与张作霖约定二事：一、在推翻曹，吴之后，奉军不入关；二、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至冯与段祺瑞之间，当时冯曾向贾表示将来拟借重段的意思，贾向冯表示支持冯的行动，并同意推翻曹、吴之后，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后，曹、吴垮台，冯玉祥便派马伯援持亲笔函南下，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孙先生于10月27日电致冯玉祥表示庆贺。11月4日，冯电孙先生促驾：“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孙先生在敦促之下，11月4日和7日两次电告冯玉祥等决定北上。11月8日又电告北上日程和路线。11月10日，孙先生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1月13日，孙先生即偕同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30余人离开广州转经香港北上。

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主要动机是推翻曹、吴，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而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与冯合作，则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各自另有企图。段是为了东山再起，张是为了伸张势力，段和张的企图，都是与孙先生的一贯主张相抵触的，因此，他们的迎请孙先生北上，并非本意。当北京政变后，曹、吴垮台，在冯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的同时，段、张便对冯开始进逼，大施压力，迫使冯一再退让，逐渐失去主动。当孙先生尚在途中，即看出北方局面发生变化，经过上海时曾发表谈话说：

“我这次北上的方法，一定和他们（指段、张）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危险；但是我为了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作我的后盾。”路过日本时又曾发表谈话，说道：“国民军的行动初看来好像真有革命色彩，到上海后，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为别种势力所牵制，就不像革命的运动了。”

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张作霖已调出大军强驻关内各地，一个以国家元首自居，一个以拥有实力自恃，他们各自的企图，既都如愿以偿，同意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的诺言，早已置之九霄云外。因此，对孙先生到达北方，自然不会有何好感，不过又迫于当时孙先生在全国人民中具有至高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异议，一个采取了敷衍，一个采取了冷淡。惟有冯玉祥，对孙先生到达北方感到高兴，无奈北京政变的果实被人侵夺以去，自己处于失势地位，力不从心，有苦说不出，并感到见了孙先生愧不知如何谈起，且易遭别人的猜疑，所以一直没有与孙先生会面，先避居天台山，继移往张家口。孙先生病逝后，冯每谈及此事，认为是终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二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先生抵天津，冯玉祥曾派熊斌前往欢迎。孙先生到津后，因病延至12月31日始到北京。

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的前后，我正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当孙先生还在北上途中，冯玉祥便交给我以接待和警卫的任务，并且嘱咐道：“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孙先生的指挥。”当孙先生抵天津后，我曾致电孙先生：“时局革新，望公如岁。析津莅止，薄海腾欢。奠定邦基，伫望元老。都门咫尺，何日降临？鹄候电知，俾便警

蹕。”及至孙先生决定了来北京的日期，曾派于右任先至北京，和我磋商孙先生抵京后的警卫事宜，以及孙先生抵北京站时维持秩序的方法，务使欢迎的群众都能瞻仰孙先生。我便就磋商结果，作了一系列的安排。

12月31日，当接到电话，得悉孙中山先生已登车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了。这天，在古老的北京，虽是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乌云压得低低的，当我来到了前门车站，张眼一看，却有一番出乎意外的场面。数不清的学生、教职员和群众，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执小旗一面，上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有两面大标语，一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面写着：“北京各团体联合会欢迎孙中山先生”，迎风招展在欢迎的人群里。我这时想起我的职责，想起了冯玉祥要我保护好孙先生的殷切指示，我心中忐忑不安，担心怕秩序维持不好，出了事故，就立即驱车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提前在那里下车进城，免得在东车站下车因人多而有所不便。到了永定门车站，不一会火车进了站，刚一停车，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急忙登上孙先生乘坐的车厢。当我走进车厢里，使我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孙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侍在他的周围，从孙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说明了他的健康情况已是很不好了。我看到孙先生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正在拿着书看。他这种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使我增加了深切的崇敬心情。孙先生见到我，经过别人介绍，很吃力的伸手来和我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这一刹那的情景，使我到40年后的今天，还是回忆得很清楚，丝毫没有忘怀。我当时很婉转地向孙先生道及邀请他在永定门站下车的意思，孙先生听了之后，很理解我的用心，并一再表示感谢对他的帮助，但是，并没有接受我的要求。孙先生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的。我的抱负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

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的打算，而辜负了学生和民众的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我听了孙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表示很坚决。我不能打断他的高兴，也就没有再加劝阻，遂照他的意思，随车同到了前门东车站。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了站，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欢迎人群，立即就自动的把秩序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听到欢迎的人群中挥动着数不清的红绿色三角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这时孙先生早已从卧铺上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维护下走下火车，经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着答谢，和学生们民众见了面，谈了话，然后同孙夫人及随行人员分乘汽车多辆，直赴北京饭店休息。

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一生是如何热爱学生，如何热爱民众，也可以看到了当时的民众和学生又是如何爱戴和崇敬这位伟大革命领袖了。

三

孙中山先生抵京后，首先住在北京饭店，到1月25日因病势忽然转剧，即于翌晨入协和医院。当日下午施行手术，医生确诊为肝癌，表示无有效办法，乃又于1月28日由协和医院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仍由中西医进行抢救。但因病人膏肓，药石无灵，延至3月12日上午9时30分溘然长逝！

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冯玉祥对孙先生的病况非常关心，我每日均有电话向冯报告。此外，冯曾派他的夫人李德全来北京探视孙先生。孙先生当即以《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1000册赠冯。冯把这些革命书籍发给部队作为官兵的必修课。及孙先生逝世，我即用急电向冯报告。冯获悉噩耗，悲痛异常，立刻给我拍来一个回电，大意说：孙中山先生是

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当代的伟大人物，不幸逝世，党国遂失领导，伤痛不已，他自己远在张家口，不能亲来吊唁，闻已推选诸员治丧，由李烈钧主持其事，嘱我襄办，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等事，嘱我悉听李命等语。我因此天天要到孙先生治丧处联系一切。当时，我常听见到从张家口来北京的朋友们说。冯每谈到孙先生之死，就不禁一阵一阵难过，热泪瑟瑟而下。有许多接近冯的人全很诧异地说，冯与孙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会感情这样深厚呢？冯自己也常常是对人们这样表示，他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 20 年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使往还也有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遗憾的事。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从他的启发和鼓励中，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后来冯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死了，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冯还曾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梦中会见了孙先生，孙拉着他的手，十分亲热的告诉他一些革命道理。从冯的这些片段谈话中，可以知他如何景慕孙先生，而冯终于没有会见过孙先生，孙先生接受他的邀请北来不久即行病逝，这更不是冯料想到的事了。

孙中山先生 3 月 12 日病逝行轶，为了保存遗体，又移往协和医院，进行遗体防腐注射，延至 15 日才举行大殓。殓后，关于停灵和公祭地点，又成为一个极费周折的问题。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停灵，并举行公祭，没想到段和他周围的人则大不以为然，表示只可以在天坛举行。当时段派了内务次长王赓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轶，先和汪精卫接洽，说执政对在社稷坛停灵公祭不能同意。这时汪便找到李烈钧说：“总理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今应芝泉约来到北京，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属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以，没

想到执事政府竟反对，殊令人不解。现在段的代表还在这里，你可以再和他讲讲道理。”李听到汪这番话，怒不可遏，当时就把段的代表找来，由汪介绍，汪指着李向王末说：“这是李协和先生。”于是李就开门见山对王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首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宫苑，今总理为践应邀之约北来，不幸逝世，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当时王听到了李的这种强硬抗议，张口结舌，大为气馁，再说不出什么话来，仅仅答应“回去报告执政再说”，转身就走了。于右任听到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甚至跑到执政府找到段拍桌子大闹，可见当时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僵持到如何地步了。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我想到冯玉祥为办好孙先生的丧事在来电中对我提及的：“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的嘱托，为谋求尽快解决，我便独自去见段祺瑞。当走进段的办公室，我故意含笑向他表示道贺，段极愕然，不明究竟，连声问道：“有什么可道贺？”我答“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现在死了，这岂不值得道贺吗？”段哼了一声，未再说什么。我为了引到正题上去，接着又说：“孙先生究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生前有人怕他，现在死了还是有人怕他。”段问：“谁怕他？”我风趣地说：“执政，你不就怕他吗？”段说“怕他什么？”我说“既然不怕他为什么不让在社稷坛举行公祭呢？”段至此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没有什么，我怕学生闹事，去天坛祭不也是可以的吗？”我说：“我看学生们不会闹事，要想闹事，去天坛也会闹事。”段问：“你能保证学生们不会闹事吗？”我说：“只要执政答应在社稷坛公祭，学生们的要求就都满足了，还闹什么事呢？”最后段说：“只要你有把握学生不会闹事我就可以答应在社稷坛公祭。”谈到这里，我便告辞，刚走出门，又回到段的办公室，段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答：“还有事向执政报告。”段问：

“什么事？”我说：“执政这样做显得多么伟大，不过，我看执政还可以做得更伟大。”段说：“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说：“执政既然允许在社稷坛停灵公祭，如果执政再去亲临致祭。那岂不更伟大吗？”段连忙频称：“不行，不行。”接着我举诸葛亮吊周瑜的故事将他一军，段似有所动心。我接着说：“执政亲临致祭，昭示天下，与诸葛媲美，这是何其伟大啊！”段说：“我去致祭，恐怕学生会乘机闹事。”我说：“只要执政亲去致祭，学生们只有对执政越发敬重，何会闹事，执政的安全，我负全责任。”最后段终于答应了亲临社稷坛致祭孙先生。我回到治丧处，问题圆满解决，不过，关于经过的内幕，当时我却没有全盘托出，所以要如此，一则是为了要维护孙先生的尊严，一则还想暂时给段留点面子。

公祭地点问题解决了，治丧处即对移灵社稷坛公祭和接待段祺瑞亲临致祭和诸事作了安排，李烈钧并亲自撰写了一份答词，准备在段到场致祭时当场宣读。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手术大殓之后，因为公祭地点迟迟未能解决下来，暂停在协和医院，待公祭问题解决，治丧处决定3月19日移灵。这天，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经天安门，直到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沿途人山人海，不下十几万人。我则来往于协和医院与社稷坛之间，指挥警卫。警卫总司令部除派部队担任警卫外，并在前门以西城墙马路上鸣放礼炮，从中午11时开始，每五分钟鸣放一次，共放了33响，以志哀悼。在灵柩经过的地方，各界送灵的民众，许多人都争着向前摸一摸孙先生的灵柩，大家的心情是极为沉痛悲哀的，不少人都流着眼泪哀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灵柩到达中央公园，停在社稷坛大殿正中，安放妥当后，全体向孙先生灵柩前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又经过一番布置，并经治丧处决定公祭日期，规定3月22日党员公祭，24、25两日各

界公祭。每天有许多来宾和机关团体代表前来致祭，花圈挽联布满了整个灵堂，整个中央公园呈现着庄严肃穆气象。

在段祺瑞表示要亲临致祭孙先生那天，聚集在社稷坛阶前的几千名学生和民众，等待段能准时而来，谁料又忽发生变化。因为段的左右，对段亲自致祭孙先生，顾虑重重，恐怕万一发生意外，危及段的安全，关系太大，认为不可，纷纷加以劝阻。听说段的亲信朱深，竟至为此跪在段的面前不起，要求段打消原意，免遭不测。段遂临时又决定托词脚痛，不能亲临致祭，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致祭。李烈钧听到段已中止亲临致祭，非常气愤，他认为必须把“执政”的爽约失信，当众宣布。李便站在社稷坛阶上向学生和民众报告了段的自食其言，不肯亲临致祭的经过。接着说：“是的。因为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像这昏庸腐朽之辈，哪能主持国家大事，诸位青年今后应当改造时势。”他最后高声说：“死总理吓死活执政！”一时听者动容，群情激昂。等到段所派遣的代表龚心湛来到社稷坛时，守门的学生，立即给他了一个难堪，不准他走正中路阶，龚无可奈何，只好沿着侧路进入灵堂。他读完了祭文，即匆匆退去。因段要亲临致祭孙先生，李烈钧曾撰写了一个答词，答词的大意，首先是对段的亲临表示感谢，次述及从辛亥革命建国以后孙先生与段祺瑞的关系，对段备致颂赞。段既毁原议，李在龚心湛代段致祭时，并未宣读他的答词。随后梁鸿志来祭时，李便把这个答词交梁带到了段。听说段看后深为追悔，认为是失去了一个增加他个人光荣的机会。

孙先生逝世后，举丧的费用，殓殡的开支，完全为治丧处自行筹措，遵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旨，没有接受段政府的任何拨付。

(1966年)

中山陵陵墓图征集展览时见闻

陈于德*

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特查阅当年所记笔记，谨将孙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丧务筹备委员会征集中山陵墓图纸案在沪展览的史事，撰述见闻情况如后，提供参考。

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为国事奔走、病逝北京后，即由孙夫人宋庆龄领导家属及有关人士林焕庭、陈佩忍、杨杏佛等多人组设丧务筹备委员会，并在沪设立丧事筹备处，于5月中登载中外各大报纸，公开征求中山先生陵墓图图案，到中秋间陆续收到中外艺术家建筑师设计的应征的图稿近50件，聘请专家从事评选。

那年作者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并筹办通讯社。9月中旬，复旦中国文学科助教许蔚南知作者留心中山陵墓图图案的征集和揭晓，通知作者说，他的友好雕刻艺术家李金发和南洋大学（即今交大）凌竹铭校长等人已把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委员会向中外征集的中山陵墓图评选完成，复旦教授叶楚伦亦参与评议，即将在四川路大洲公司里陈列展览，极有意思，值得去参观一番。

作者就留心展览的时日，后见《申报》、《时事新报》等所载有关孙中山先生丧务等新闻消息，即知9月下旬在大洲公司陈列图稿，招待各界人士参观，为期6天，作者于9月26日星期六下午无课时邀同永安公司《天韵报》主编王瀛洲（浙江绍兴人）同到北四川路大洲公司三楼陈列室参观。

大洲公司三楼陈列着中山先生陵墓图图案和说明。第一名制图的作者吕彦直，奖金2500元；第二名范某，奖金1500元；第

* 作者系当时复旦大学学生。

三名杨锡宗，奖金 500 元（按当时沪市米价每石 6 元 5 角左右）。

这几份陵墓图案，庄严宏丽，各有特长，后来南京中山陵，据说基本上是按第一名吕彦直设计制作的图案建筑的。

当时除了头三名外，佳构甚多，又有名誉奖 7 名，其中有俄国人恩那与佛莱戈士登达及俄人开设的孚开洋行、士达打样建筑公司等以企业单位制图应征。还有美国人恩开斯及华人赵深亦列入 7 个荣誉奖，他们大都是建筑师和艺术家。据陈列室书面说明及管理人员说：各国人士景仰孙中山先生，追悼孙先生，故对制作孙先生陵墓图案踊跃应征。尤其是俄国人同情中国革命，佩服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寄来了很多精致的图案，美不胜收。中选得奖的图案，是从近 50 份应征图案中精选出来的，通过孙先生丧务筹备会根据评判顾问凌竹铭、王一亭（上海国画家）、李金发（雕刻艺术家）及旅沪德国建筑师濮士等几位意见，并经孙夫人、孙哲生、林焕庭、陈佩忍、杨杏佛、叶楚傖等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名次。至于 7 个名誉奖的应征人，各赠中山先生的手迹相片及著作等书籍，以志纪念。

中山先生陵墓图图案陈列在上海大洲公司，展览了 6 天，各界人士及旅游华侨纷纷前往参观，称赞为中国过去所未见。中外应征人的各种设计，各具特长，可谓世界上难得看到的一次陵园图案展览会。作者去参观访问时，是星期六下午，人尤众多，足见中外人士都关心中山先生的丧事，时隔 40 年，记忆犹新。

（1965 年）

西山碧云寺护灵琐记

马 湘*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在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逝世，是日正午12时用红十字病车载先生遗体至协和医院，经医生施用防腐手术和药剂以求永久保存，又有美术雕刻家用石膏制先生遗型，准备将来制铜像。然后殓入协和医院储有的美国棺材。19日先生灵柩迁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移灵时由黄惠龙、徐绍桢、赵超、马超俊、李仙根、吴雅觉、邓彦华、池博等人傍着灵柩两旁，沿途守护。过了几天，开始举行吊唁，一连六七天，来祭的人，日日都是人山人海。吊唁完毕后，孔祥熙又在北京买到一具上好楠木棺材。先生之遗体便从协和医院的美国棺材里，移到楠木棺材了。4月2日恭移先生灵柩至西山碧云寺，移灵的仪式和送葬的人，真是一望无际。灵车是黑色的，用黑马牵挽。灵柩放在车厢中央。我和李荣分站在灵柩两旁。由上午11时发引开始，一直站到下午4时，才到达碧云寺。这时我心里十分悲痛，站了许久都不发觉疲累，到了下车时，才发觉两腿运动困难。灵车到了碧云寺，又改用轻便灵车，放在新架搭的木桥上，用绳牵上，直至石塔前。石塔里就是灵堂和奉置灵柩的处所。到了5时又举行公祭。公祭完毕之后，各人都散了，只留下我和谭惠泉、李仲英、丘有、陈汉、丘时6人，担任护灵职务，由我担任护灵队长。我们住在一座小殿里，从这里上五六十级石阶，就到石塔。小殿里还放着俄国送来的玻璃盖棺材和协和医院送的美国家材。我虽然在这里住，但我却喜欢用

* 作者系孙中山副官，孙中山遗体暂厝碧云寺时任护灵队长。

帆布床睡在先生灵柩的旁边。我们由 1925 年 4 月 2 日起担任护灵职务，一直至 1929 年 5 月 22 日，先生灵柩奉安南京紫金山，一共在这里住了 4 年零 1 个多月。

我们在这里，每天都是向先生灵前献花，接待瞻仰灵堂的来宾和洒扫灵堂。每逢星期假日，来的人特别多了。占最多数的是工人和学生，最少数的是大小官僚、大小军阀。外国人也常常有来，日本人却比其他外国人来得特别多了。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等是来得最多的。在这 4 年多时间，来宾签名册也用了几十本。

每逢先生的诞辰和逝世这一天，必定有很多人前来致祭，来得最早的是周震鳞、叶恭绰、池博、祁耿寰、石青阳、罗文干等人的连同公祭，日本人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等倘若在北京时，也必定参加的。除日本人穿洋服，他们都是长衫黑褂的。周震鳞还披上一条黄色绢带，从右肩上挂到左肩下。每次公祭都是周震鳞主祭和献鲜花，池博司仪，谭惠泉答礼。其后约两年多，祁耿寰被仇人杀死，来公祭的人就少他一个。及至北伐军攻入北京，商震任北京卫戍司令，来公祭的人又多他一个。他来过大约有二三次之后。先生灵柩就奉安南京紫金山的新建陵墓。

先生灵柩权厝西山碧云寺石塔之后，大约经过了两年多。有一天早上，忽然接到熊希龄电话，找护灵的长官。我接电话后，他首先问：“你是孙先生灵堂的长官么？”我说：“我是护灵队长，此外更没有什么长官了。”他又问：“你们有多少兵？”我说：“我们只有六个人，没有兵。”他接着说：“山东张督军（宗昌）到北京，昨天谒见张总司令（作霖），我适在座。他辱骂孙先生，声言要派卫队一连往碧云寺，烧毁孙先生遗体。经我和张总司令极力劝阻。但未知他听我们劝导与否。你们既没有兵，自然不能劝阻，但仍须设法保存孙先生遗体为要。”我听了之后，吃惊非常，熊希龄是个老头子，虽然是个旧官僚，但也有点老实，是不

会撒谎的。张宗昌是个野蛮军阀，声言要烧毁先生遗体，当然可以做得到。我急叫齐了谭惠泉各人，商量如何保存先生遗体。他们都默默无言，束手无策。还是我作出决定：六个人一齐起誓，替先生保存遗体战至死亡。又把先生遗体移到秘密地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六个人起誓之后，即捡齐长短枪 12 支，子弹 1200 多发，此外更没有其他武器了。这时北京是个官僚割据的地方，已无门路可以求援了。我们一齐动手，把先生遗体从楠木棺材里，很恭敬地移到协和医院的棺材里，然后搬到小殿外面约数十丈远的草莽丛生的地方，把草莽拨开之后，才移进里面。这事作毕之后，六个人都配足子弹，轮流放哨，日夜不停，准备战死。如是者过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张宗昌的卫队进来。我用电话问熊希龄，才知道张宗昌已回山东去了，他忘记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得了这消息，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再把先生的遗体恭恭敬敬地放回灵堂内的楠木棺材里。协和医院的美国棺材，仍旧放回小殿里的原来位置，一场虚惊算是平安度过了。此事后，一直到奉安南京，再也没有有什么特别事故发生了。

(1965 年)

孙中山先生灵柩南运经过

田象奎*

1929年，国民党决定将总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运往南京紫金山陵园安葬，即派林森、孙科、吴铁城、郑洪年四人为迎榭大员，乘专车从南京到北平，与各界有关人士协商一切办法。起灵前三日由北平党政军学等单位分批到碧云寺祭奠。灵榭由84人（或120人）分三组抬大杠从碧云寺起行，傍晚到达西直门处停下，次日早晨进入西直门内。沿途军警保护，从西四大街向南缓步前进，行人车辆停止通行，人民大众立站路两旁观看敬礼。最前列依中国旧民俗由鼓吹乐队引导，次则为幡帐旗牌等仪仗，再则为僧道喇嘛，均穿着传统服装随行。后则系军乐队、陆海军仪仗队，全副武装枪口向下，由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骑一骏马任总指挥。再则由北平各高级党政军学首长执绋挽车。由孙科列首位，次则迎榭大员及各界人士。孙夫人宋庆龄及女儿媳妇其他眷属分乘数辆汽车在灵柩后随行。执绋人士分左右两旁以黑色布料作长带，相继牵连缓步前行。灵前由一熟练老扛工手拿一横木敲打，形同号令，整齐稳妥缓步前行，甚为壮观。行到天安门前，稍息片刻后，转入东边大道经邮政总局、东交民巷西口从前门楼东口，到达东火车站。将灵柩安放在停在站台上之专车之一节华丽车厢内。该车厢内外用黑白二色缎带结成各式球带悬挂，车厢内悬挂孙中山的遗像及各界挽幛等。由军警保护，停留一夜，次日即开车南行。经过铁路大站时，均由各地行政大员祭奠。灵车

* 作者当时任职于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

到浦口，由专轮渡江运往紫金山新建陵园安葬。由北平南行，本人未随车，一路情形及奉安大典不知其详，不克记述。

(1986年)

参加孙中山奉安典礼纪略

林 泽*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其时北京犹为北洋军阀所盘踞，灵柩暂厝在西山碧云寺。1927年春，蒋介石在南京定都，组织国民政府，即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决定，在南京东郊紫金山（一名钟山）南麓动工营造中山陵，以为国民党故总理孙中山安葬之所。

（一）陵墓的设计与建筑

中山陵的设计图案，在广州时就向全国范围登报征求，经过评选，以青年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为最佳得奖。吕是美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不久，他的图案雄伟开阔，气势磅礴，运用中国传统的优美建筑艺术，结合外国结构方式，斟酌损益，大胆创新，以使适合于时代要求，现在我们看南京中山陵，群山环峙，林木葱茏，予人以无比壮丽的感受，成为东南著名的风景胜地。但在50余年前却不是这样，山上没有树木，山脚没有道路房屋，风烟衰草，一片荒凉，中山陵就在这光秃秃的山上兴建起来的。

开始动工之时，挖土平地，凿岩叠石，用钢筋混凝土修筑祭堂墓室，是与砌造白石台阶同时进行的。台阶依山势而筑，分左、中、右三道，自山腰祭堂前面平展展地通至山麓，距离颇长，工程较大，几经两年时间，这些主要工程才初具规模。国民党又在营造中山陵的同时，修建自挹江门起，经鼓楼、新街口向东出中山门，以达紫金山下的公路，即今南京城内之中山北路、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交通部科员。

中山路、中山东路就是。这条公路两旁，那时多空地，就是热闹地段北门桥、新街口一带，也不过是鳞次栉比的矮小房屋，比不上今天的繁华景象。

这些工程建设都是为奉安典礼打算，不过到奉安时，中山陵仅“民族”、“民权”、“民生”三扇门的祭堂，和安置灵柩的复圆形墓室落成，几百级的石砌台阶初步铺好。此外如陵墓大门、碑亭、祭堂正中的孙中山坐像，祭堂四周大理石壁上的《建国大纲》镌刻，以及池塘亭榭、花圃栏杆，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许许多多美丽点缀，当时都还没有来得及施工，是在奉安以后陆续兴建的。由于台阶又高又长，灵柩怎样抬得上？怎样抬得稳？那时就做了一具同样大小的木板棺材，中置石块，穿上竹杠，采取偏斜形横抬方式，缓步移动，在台阶上足足训练了两个月。

（二）移灵致祭 瞻仰遗容

1929年国民党要举行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了。这年3月1日，从北京西山碧云寺启灵，把灵柩运回南京，安放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然后组织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团体单位人员轮流郑重致祭，瞻仰遗容。笔者当年还未满25岁，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当科员，国民党向有等级观念，科员是排不上号参加瞻仰的。由于当时机关里国民党员尚少，交通部（部长王伯群）设在慈悲社，工商部（部长孔祥熙）设在马驾桥，还有审计部也在邻近，三个部的国民党员合组一个区分部，被命名为南京市第七区分部，上面并无区党部，由南京市党部直辖。我是第七区分部的宣传委员，因此关系，随着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安排，得在一天上午集队去丁家桥祭灵，祭后大家绕灵柩一周。

祭堂布置简洁，堆满花圈、挽联和松柏枝盆花，灵柩放在礼堂正中平台之上，前面围以布幛。我看到的灵柩是铜制的，没有普通棺材那么宽大，仅能容死者一身，上面是厚厚的玻璃盖子，

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孙先生安息在里面，遗体穿黄缎盘花马褂蓝缎云块长袍，足登白底圆头鞋，头戴黑色瓜皮帽，双目紧闭，短髭依然，右额旁有一小块白斑，面部微现皱纹，容貌与一般印行的遗像无异，但要老颜得多；可能遗体经过医学处理，看去要比活人干瘪缩小些，遗体四周衬以白缎，有凹有凸，恰如体形。整个来说，死者的形貌显示出静穆端庄、从容慈祥，足以引起瞻仰者的肃然起敬。于今时间经过半个世纪以上，我对这次瞻仰的印象记忆犹新。

（三）举行奉安典礼

1929年6月1日，是国民党举行孙总理奉安大典的日子，那天天气清明，朝雾初散，阳光淡淡，并不那么热。我跟着交通部的队伍，于天蒙蒙亮就到鼓楼以外的中山北路指定地点集中，听候调度排队。事前规定：送葬人一律穿着白衣白裤，臂缠黑纱，胸佩机关证章，不戴帽子，交通部是有钱的大单位，每人一套的白帆布中山装制服统是公家免费制发的。

这天上午7时，奉安典礼开始，礼炮齐鸣，从丁家桥出发，灵柩在前，导以大队军乐和遗像，花圈花环、挽联、悼文彩车，无数白色横幅标语与机关单位名牌穿插飞舞。国民党中央委员、外宾，以及各院部会高级官吏紧跟在灵柩后面执绋，从灵柩两边，分开左右，拖出两条束带状的白布，由走在边缘的人手执着，一直伸延到送葬行列的末尾，估计总有十公里长，送葬行列密密层层，按一路纵队行进，有指挥，有纠察，秩序不乱，严肃无哗。马路两旁默立悼念的，观看热闹的，也人山人海，不计其数。全市下半旗，军警岗哨林立，灵柩行列经过时，车辆行人交通完全停止。中午1时左右，我们的队伍才到达紫金山下，但见灵柩已在中间一道台阶上徐徐向上移动。谁可以跟上台阶石级，进入祭堂、墓室，是有严格规定的，绝大部分送葬人都在山脚就

地散开休息。这时人语喧阗，人声嘈杂，人人疲劳不堪，便不见得有秩序了。各自吃着由机关单位运送来供给的面包、点心、开水，有坐有卧，有谈有笑，一眼望去，从孝陵卫至灵谷寺都是人群。我们后来就乘坐交通部的货运汽车回城了。一场精心筹备，庄严隆重举行的奉安典礼结束了。

奉安以后约三个月，我收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转发的一块铜合金奉安纪念品，圆形，正面是孙中山遗像，背面是陵墓图案，用凸版铸刻，直径约9公分，厚约半公分，像碗口那么大小，装以锦盒，相当精致美观，可惜我没有保管好，而在时势动荡年代中遗失了。还有薄薄一本的奉安邮票纪念册，两页有封面，分贴四张纪念邮票，图案记不得，盖上专为奉安特制的邮政日戳，可以在各机关登记由自己出钱购买，我也买来一本，后来也遗失了。

(四) 后语

奉安告毕，而陵墓工程仍继续进行，据说现在陵墓面积达80000多平方米，占地3000多公顷，那是逐步扩建、不断整修的结果。抗日战争以前，我每到南京，总要上中山陵去游览凭吊一番，如果碰到国民党节日，还可以进入墓室凭栏看看灵柩安放的所在，此时灵柩已合上棺盖，覆着国民党旗，不可能瞻仰遗容了。葬孙先生于虎踞龙蟠之地，钟山巍巍，气象万千，是可以体现孙先生一生的伟大事业和广阔胸怀，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1981年)

拱卫中山陵的回忆

张 猛*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20日因患肝癌逝世于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五号。其遗体移往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后，用楠木玻璃盖棺材停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当时的治丧委员会决定，赶在四年内依据孙先生生前所喜爱的南京紫金山，在第二峰腰腹中择地修建陵墓（即今之中山陵），待陵墓建成，再行南下奉安。

在南下奉安之前，长江以北仍在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内。1926年7月1日起，北伐军从广州誓师出发，势如破竹，不足半年打到南京。张宗昌在徐州被击败后，逃到北京，在碧云寺见到孙先生的灵柩，不禁怒火中烧，指着孙先生的灵柩大骂说：“不是你孙文搞革命，我张宗昌就不致有今日之失败，我生前不曾与你打过仗，你死了，我今日就要毁灭你的尸体，以泄我之积恨。”当时孙先生停棺处只有几个侍卫守护灵柩，见到张宗昌气势汹汹，并强迫附近乡民搬来柴草，意欲放火烧先生的棺材。几个卫士便分头找邻近各乡亲父老帮助向张宗昌讲情，父老都说：“张大帅是没有人情可讲的。如果你讲的话不合他意，他就要杀你的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少帅（张学良）已入关，你们即刻去向他求救讲情，或者可以解救。”卫士们即跑步去找到张学良报告此事，张学良听了就大不以为然，并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是我国的伟大事业，是世界人民所共知的，我不能为争夺权势而做历史上的罪人。”张学良即下令骑兵赶去制止，但这时在孙先生的灵柩旁已经堆起十几担柴草，张宗昌正着人去找火油准备

* 作者当时任孙中山副官，后又任南京中山陵拱卫组副组长。

放火。张学良的骑兵已赶到，同时惊动了邻近父老也赶到，这才制止了张宗昌放火烧孙中山先生棺材的罪恶行为。本来孙先生的遗体经过药水注射，面容如生。但自此之后，孙中山的仪容日变，过了一个多月，卫士们才去协和医院请医生来检查，据医生说：“灵柩上玻璃盖的四周有些地方已脱去油灰，空气已浸入遗体，因时间过长，已无法挽救。”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遗容变黑，不能供后人瞻仰，当时的治丧委员会便决定把孙先生遗体土葬，在南京中山陵墓的灵殿构筑灵穴，并在棺材的用料问题详为讨论。大家认为如用木料容易受白蚁之害，只有用五金，五金中最适宜用铜质。但国内铜料都会生锈，不能耐用，世界上只有意大利的紫铜最好，即特派专员李石曾到意大利购买一具紫铜棺材，把孙中山的遗体换上长衫后重新放入，而孙先生原穿的中山装仍放在楠木玻璃盖棺材内，埋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面的高堆上。供后人瞻仰的是“孙中山衣冠冢”，有孙夫人宋庆龄亲笔题字的石碑。至于苏联所送赠的白铝架玻璃棺材则放在碧云寺中供人参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放在紫铜棺内于1929年5月初南下奉安，择于6月1日12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墓灵堂后面的陵寝内。陵寝内有圆形陵穴，穴深5公尺，直径3公尺，上盖钢筋水泥。今人前往参观，即瞻仰先生的大理石棺材模型上的石膏卧像。这个卧像是日本友人高桥所制。高桥是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30多年的国际友人，是个有名的印刻家，故这个雕像印刻得如同生前安睡一样。在陵寝前面的灵堂有孙先生的意大利石坐像，这石坐像是一个波兰有名的电刻家所制，这个波兰人跟孙先生革命也有几十年。在雕塑这个坐像时，就是把他对孙先生的诚挚友谊浸透在他精湛的技艺里，所以这个坐像不但面容栩栩如生，连孙先生的长衫马褂上的花纹也刻得玲珑别致。在坐像脚下还有六幅意大利石浮雕，前面一幅是孙先生行医时为小孩看病之像，后一幅是孙

先生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国会议长林森向孙先生授印之像，左边两幅是孙先生在国内外向群众宣传革命之像，右两幅是孙先生于民国元年从海外回国时在上海和南京受群众欢迎之像。在陵堂四壁是大理石雕刻的孙中山先生生前手著和手写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全文。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除决定在南京紫金山建筑中山陵墓外，还在广州德宣路的总统府建筑中山纪念堂。当时一面派出专员到海外向华侨筹募巨款，一面在国内征集设计方案，从征得的一千张设计图中选取一张建成。这张设计图是安徽人吕彦直所设计。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为设计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他极度呕心沥血，在工程还未完成，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终年才29岁。未完成的部分工程，由于别人看不懂他的设计图，无法完成。本来在中山陵的设计图上还有两个大厅，准备把孙先生生前手著和手写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全部放进去，并在这两个大厅里招待宾客，因吕彦直去世，这两个大厅就没有施工。后来中山陵建筑工程完成，全得一位老工程师60多岁的同盟会员刘梦锡监督施工建成。吕彦直这位设计工程师为此事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生命曾传颂一时，当时奉安的哀思录也记载了此事。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南京中山陵堂整日关起大门，禁止人民群众瞻仰。抗战期间中山陵墓更受日军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借口日军破坏陵墓，需要派员到海外华侨筹募巨款以为修理，特派募捐专员陈庆云到美国及南洋各埠筹募，曾筹得巨款回国，但中山陵却未重修过，据说，这笔巨款就由他们几个所谓要人私分了。吴铁城在南京竹林寺建筑一间皇宫式用玻璃间隔的大观园房屋，陈庆云在南京颐和路建造一间有大花园的旅馆大洋楼。宋美龄所得最多，她从美国买了几百头奶牛在南京孝陵卫开设一间奶牛场，而中山陵却依然破烂不堪。解放后我担任南京中

山陵拱卫组副组长，亲眼看到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重新修理，而且年年修理，陵堂陵寝亦整日开放，接待国内外人士参观瞻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来我国参观访问者亦络绎不绝，他们到南京时多到中山陵向孙中山先生灵前献花致敬。我于1955年曾作过计算，自解放后到1955年，国际友人来谒陵者已有9448人（据陵墓每日记录），1956年到1960年底就增到两万多人。国内各界人士以及边区各民族团体，来谒陵的由1950年至1952年年约30余万人，1953年后每年增至100万人以上，足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感动中外。1955年夏民主德国总理来谒陵献花致敬后，就向报界发表讲话，谓孙先生的学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得不到发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而他所献的花圈又极为美丽。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体代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人士来谒陵时，都说中山陵比国民党统治时期修整得更好，陵园景色更加美丽，灵堂、陵寝分外庄严。我所接待过的国内各族人士以及世界各国友人，至1956年12月止大约610多万人（也是根据陵墓记录）。自此以后，到1960年底，这四年不少于400万人。国内外人士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谒陵，所献花圈花篮至1956年已达1000余个，束花无数。1956年9月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问中国到南京时，下机后已天将入黑，又是小雨蒙蒙，为了表达他对我国一代革命伟人的崇敬，他与随员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的陪同下，首先驱车到中山陵，走上342步石阶到达陵堂。他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花后，又在陵寝外像前祈祷，并遍阅壁上碑文，殷勤向我们询问陵墓情况，当即在灵堂对新闻记者说：“孙中山先生是你们的国父，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国父，印度尼西亚能够有今日的独立，全得孙中山先生当年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使印尼人民得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感召而有今日。”国际友人对孙先生革命精神的崇敬可见一斑。1956年11月12日

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当地的人民群众在这个纪念日的先后几天都争先涌到中山陵，或分批列队，或携男带女穿着节日盛装来到中山陵墓孙中山坐像前鲜花致敬。纪念日那天下午，以朱德副主席为团长，李济深副委员长为副团长的中央谒陵代表团，加上中外人士共 100 多人乘专机从北京到南京。他们步上中山陵墓，在孙先生坐像前隆重地献花行礼表示敬意，在陵堂里摆满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各中央首长所献的花篮和花圈，真是盛况空前的。

我和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几位卫士在中山陵墓工作时，经常接待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中央首长来巡视。他们都关心陵墓的修理情况和我们的生活情况。记得陈毅同志一上到陵墓见到我们时首先说：“同志们！你们好吗？你们的生活过得去吗？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们说嘛！我们帮你们解决就是。”我们总是说：“我们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对我们以前跟随孙中山先生的人比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好得多了。”他们来时都是勉励我们，叫我们好好安心工作，说明共产党一定会对我们照顾到底的。就在 1955 年底，国务院指示南京人民政府对我们特别照顾，不但工资成倍增加，还特制了厚、薄呢绒中山装大衣、皮鞋等物发给我们。南京市长彭冲还亲来向我们慰问。

我在中山陵上负责接待国内各族人士和国外友人，向他们讲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他们都因为尊敬孙先生因而尊重追随孙先生革命之人，所以我经常在陵墓上与国内各族人士和国际友人亲切握手，并接受他们的殷勤慰问。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一起拍照以示留念，有些外国代表团还向我送赠纪念章，并亲手把纪念章挂在我的胸前，使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1979 年)

戴季陶谈孙中山先生的事迹片断

陈强立*

戴季陶，同盟会会员，曾随孙中山先生担任日语翻译和机要工作，长期在孙先生左右。1938年我曾同他到甘孜致祭班禅，后来他在成都小住，我常去他家里帮他办些小事。接触时间长了，摆谈的往事也多，其中曾谈了一些孙先生在日本和广州的事迹片断。虽事隔多年，尚能有所忆及。

戴季陶说：他接近孙中山先生是以担任日语翻译开始的。有一次孙先生在日本作公开讲演，由戴季陶作翻译，翻译完毕，听众反映很好，孙先生也认为戴的日语准确而流利，就要他专任日语翻译工作。戴说：孙先生博学多文，不但革命道理使人心悦诚服，而且讲话的声调抑扬有节，词句精练动听，感情激昂慷慨，在日本被公认为“最好的演说家”。要当好他的翻译很不容易，戴曾几次恳辞不干，后经孙先生谆谆教诲，才使戴感动得无法推却。

戴季陶说：孙先生常说，一个革命党人要有扶危济急、助人为乐的胸怀。一次，一个日本人向孙先生求乞，孙先生给他5元，那人还不走。孙先生又给他10元，在那人接钱时，孙先生发现他面带病容，就热情地为他摸症诊断，并取出药片倒开水叫他立即服下，那人感动得流泪。

戴季陶说：孙先生平易近人，对任何人都不摆架子，但对有

* 作者曾与戴季陶有接触，此稿系忆述戴的亲历和亲闻。

妨碍中国革命言行的日本人，不管他是在朝在野、权势多大，总是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因此在日本有“孙大炮”之称。

戴季陶说：“孙先生给人题字总爱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在孙先生的日常生活小事中也都处处体现大公无私，孙先生对革命事业表现出大智、大仁、大勇，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师，令人十分敬佩。孙先生曾经给戴季陶写过一张条幅：“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吾人应知天地大公心，日月大明之德……”。后来戴把这张条幅给了蒋介石，蒋就自编了一副对联挂在条幅两侧，对文是：“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生活之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孙先生看了点头说：做人就应该有此理想。戴季陶说：孙先生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他每天从早起床到晚就寝的时间安排得很紧。看报、读书都有定时，如果遇到意外耽误，他必须想办法把它补起来。

戴季陶在政治立场上与孙夫人宋庆龄有分歧，但在私人闲谈中，他对孙夫人还是很尊重的。他说：孙夫人在其姐妹中最为贤淑。她除了帮助孙先生处理公私事务外，还勤奋地读书，几乎是古今中外，无书不读。由于她的博学多才、贤德、美丽，当时就被日本舆论誉为“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

戴季陶说：日本有个叫头山满的人，他拥有像中国帮会一样的下层势力。他因听过孙先生讲演，同情中国革命，成为孙先生的好朋友。有次一个日本浪人受人支使，准备对孙先生进行谋害。头山满得到情报，立即通知孙先生，要他深居简出以防意外，但孙先生听了毫不畏惧，照常公开场合进行革命活动。头山满对孙先生这种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非常敬佩，以后每次孙先生在国内革命遭受挫折到日本时，头山满总是以同志一样的热情予以支持，并且于情况危急时派出他的人马从

各方面对孙先生进行保护。^①

戴季陶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大本营他也随时在侧。他说19世纪20年代，孙先生先后与苏俄代表马林和鲍罗廷会晤，讨论由苏俄帮助建立一支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彻底摆脱旧军阀利用武力来控制革命政权的局面，于是决定建立黄埔军校以训练革命军队的下级干部。

戴季陶说：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孙先生拟委派程潜为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副校长。因孙先生认为程潜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士官学校，对革命事业有信仰，又曾任过高级指挥官，是个能文能武的将领，由他来主持黄埔军校一定能办好。当时蒋介石一听到要他在程潜下面当个副职很不高兴，他向戴季陶说：程潜曾当过满清的标统，他（蒋介石）不能与一个封建奴才合作。发了一通牢骚后就不辞而去了上海。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和上海都是同吃同住的好朋友，戴趁孙先生还没有发表任命程潜的命令，赶紧拉着张静江、吴铁城去向孙先生力陈蒋介石年轻有为、忠诚可靠，在日本士官学校（按：原文如此，实际上蒋未入士官学校。）时，成绩超群，定能肩负校长重任。当时孙先生在革命队伍中却也苦于找不到更适当的军事人才，于是就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决定把黄埔军校校长委了蒋介石，并派戴季陶去上海接蒋介石回广州。

戴季陶说：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孙先生任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虽是校长，但一切问题都需经党代表签署才有效。戴季陶先任总政治教官，后来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任军事总教

^① 头山满（1855—1944）早年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但从19世纪80年代后，致力于国权主义运动，极力策动向亚洲大陆扩张。他虽曾对孙中山提供过帮助，但主要是企图操纵革命力量，为其侵华服务。此处戴季陶所述，对头山满作为诸多美化，有失真实。

官，邓演达先任训练部主任，后来任教育长。共产党派有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聂荣臻等为政治教官（周恩来后来当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担任实权工作。

戴季陶说：自从廖仲恺被刺后，胡汉民和许崇智被逐出广东，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就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分裂。共产党组成一个“中国青年革命联合会”。在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军以后，蒋介石就叫戴季陶负责筹划支持另一批学生组成反三大政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以后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内就运用组织开始了公开的对立。以后两党斗争愈演愈烈，终归破裂。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右派，从黄埔军校开始就一直是蒋介石反人民的谋士，蒋介石叛变革命、窃据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后，就安置戴为考试院长、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一直到解放前夕，他服毒自杀。

戴季陶虽然在政治工作上背叛孙中山先生真正三民主义的叛徒，但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人格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981年)

孙中山与复旦公学监督李登辉博士

陈于德*

李登辉博士原籍福建，生长海外。清光绪中叶，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数年，毕业后在南洋爪哇等地办学，主持中华学校，培植华侨子弟。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宣传革命时，李与其他华侨代表欢迎接待，从而认识。他常听孙先生谈论国事，深为感动。那时李尚不能用华文写作，就在南洋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孙先生的革命学说和反清的道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李回国到沪后，基督教青年会请他演说，语多爱国之道。他讲到末了说，祖国各大城市，多由外国教会设立青年会做了些有关青年德智体三育的工作，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应该而且可以组织起来，作些帮助青年有利和有益于他们出国学习的准备工作，例如介绍各国著名的大专学校、入境手续、生活风俗，使他们有些了解，并可以给他们代办出国手续等事情，为前往留学的青年服务。他这主张，不久就获得当时的爱国人士颜惠卿等赞助，协同发起。集议之后，这一新组织定名为“环球中国学生会”，民初筹设在上海卡德路。李向孙中山先生函告该会的宗旨和进行的事业，孙先生复书赞同，愿予支持。后来“环球中国学生会”成立时，发起人和赞助人颜惠卿等，公推李登辉为会长，朱少屏为总干事，该会对于有些预备出洋留学以及在国内研究学术的青年，予以帮助之外，并附设日校夜校、图书馆、文娱体育室等等。1919年，孙中山先生旅居沪上，曾应李登辉及上海学联的邀请，视察该会，并作演说。孙先

* 作者当时系复旦公学学生。

生知道李还刻苦自学中文，从回国时的小学程度已达到中学以上，写文章不必再用英文了，表示赞赏（这些情况，是1926年间笔者为“复旦通讯社”编辑时，由李登辉的秘书季英伯谈及的）。早在辛亥革命前，李登辉已为复旦学监（即教务长）。后来马相伯辞职，由李主持，于是李升任监督（即今校长）。到了辛亥革命时，复旦因校舍驻扎军队，只得停学。不久，清王朝终于为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各方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李登辉就将复旦的校舍问题报告孙先生，要求照顾，予以解决，并委托“复旦”开办时（1905年）的第一班学生于右任，向孙先生汇报情况，提出请求。孙先生即命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教育部将上海徐家汇李公祠所有房地均给复旦为校舍，并拨给临时补助费银洋一万元，作为迁移校舍及充实设备的费用。

由于孙先生这样的关怀和照顾，复旦公学才得顺利地迁入徐家汇李公祠，继续开学，时在1913年间。李校长遵照当时的新制，扩充校务，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并充实校董组织，聘请孙先生为董事长（即校董会主席）。当时校董有伍廷芳、唐绍仪、颜惠庆、王宠惠、简照南等，大都与孙中山先生熟识。自从孙先生允为董事长以后，大家对复旦更关心爱护，使校务日趋发展。1919年月10日，复旦学生会兼上海学联领导干部朱仲华（浙江绍兴人）通过李登辉到孙寓向中山先生报告复旦和各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等情况，孙先生即提“天下为公”的横幅，以示奖励。（这幅手迹已由朱仲华献给绍兴文管会）

民国初年，上海“商务”与“中华”两大书局以国人自编的英文读本极少，而外国的英文课本大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青年的学习。中华书局争先请李登辉博士编著一部（并特邀他为英文总编辑）英文读本。李忙于复旦校务，为了当时文教界和出版界的需要，挤出晚上的时间，花了一年多的功夫，终于编成大专教

材《高等英文读本》分为四册，由中华书局发行（在这以后，他所编的《李氏英文读本》《李氏英文文法》等数部。由“商务”及“中华”出版）。不料他首次编著的那一部《高等英文读本》发行后，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指使教育部密令各省教育厅，暗中通知大专各校长不准采用。原来李登辉这部英文读本第二册第一课是“孙逸仙博士”，实事求是的叙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和故事。袁世凯对孙先生的继续革命，非常害怕，恨得要命，随后更公然胡说李登辉这部英文读本，有“异端邪说”、“贻误青年”，飭予禁止。

20年代初期，李登辉为“复旦”到南洋各国，以董事长孙中山先生及校长（李本人）的名义，向广大爱国华侨募捐。年余回国，就在江湾购得荒地数十亩，披荆斩棘，建造校舍。落成后，把大学迁入新址，原有附属中学，仍留徐家汇办学。后在大学内又附设实验中学。于是整个复旦，规模宏大。

总之，自从清末民初直到20年代上半期李登辉继续不断的发展复旦的校务，一再充实院系和各科师资，增添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继续为祖国培植了大批人才，实与孙中山先生的关怀照顾、帮助爱护是分不开的。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在北京病逝后，李登辉泪痕满脸，带领全校师生们沉痛追悼，深切怀念。上海寰球学生会也紧急集会，悼念孙先生。

（1980年）

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和见闻

张 猛*

一、两代追随孙中山先生

我于1894年1月20日生于安南（今越南）海防。父亲张云田，原籍广东新会，是晚清秘密组织三合会、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会员，他蓄志革命，在海防设云天书塾教学，以集中华侨志士，宣传革命道理。这间书塾是孙中山先生在海防的联络地点。我自小听父亲谈话，经常听革命故事（如史坚如、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事迹），知道封建王朝必须推翻的道理。1907年10月，我父亲率门徒10余人，参加了著名的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战役，当时，我父亲率领的敢死队隶属黄明堂指挥，他就是在10月26日攻打西炮台时牺牲的。这场战役是孙中山先生亲自督战的。孙先生于此战役后退入越南，后因清廷行文法殖民地政府被勒令出境。

我父亲殉国那年，我仅14岁。我生母阮氏是越南人，从小被卖给海防一个华侨商人作婢女，习惯了勤劳简朴的生活。父亲死后，我母亲靠做小买卖和洗衣服度日。我就是凭同乡长发的介绍到河内哥打（COTA）洋行所附设的缝纫工厂当学徒，饱受拳打脚踢的苦难。我对这种洋奴生活，不能忍受下去，便逃返海防。那时我母亲已在瘟疫流行中死了。我为了谋生计，在华商会馆一间皮鞋店租一间铺面，踏衣车、为人车衣服。当时刘岐珊管海防党务，见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应予以照顾，就由党部每月

* 作者当时系孙中山副官。

给我六元，要我复学。我因生活困难，只读夜学，日间仍做车衣。如此独立生活了三年多，已经是20岁了。同盟会已改名为中华革命党。我就再没有接受补助，由刘岐珊介绍我到华商会当巡丁。

到了1915年秋，朱庆澜当广东省长时，派人到国外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准备培养他们为华侨学校教师，我就被招回广东高等师范华侨升学班，读了一年，因文学程度差，不能升学，我便返回越南。这时讨袁军兴，我便决心继承父志，投笔从戎。正值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招收华侨学生，信从孙中山先生的张维扬、张杜鹃等人到国外招生。1916年我考入该校十三期骑兵科。于1919年秋毕业，即派到云南军事教导队当见习员，并代排长。至1920年冬天，顾品珍从四川率领大军回滇，唐继尧出走。1921年3月我跟唐到了广州，那时广东军政府，唐是五总裁之一，孙中山先生接待唐和随员（武校学生只有我和符昭骞）住在亚洲酒店（即现在的南方大厦）。本来孙先生希望唐到广州一同北伐，给唐任元帅职位。而唐继尧与陈炯明却相互勾结，1922年初陈补充足了唐的军械、被服、钱粮等，唐便离开广州到广西率领滇军回滇。我因见唐勾结陈炯明，便不愿跟唐走。适遇军政府副官长何克夫，他是我父亲的战友（在镇南关战役生存下来的人），知我是张云田烈士的后裔，便鼓励我跟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于是我就决心留在广州干革命，而没有跟唐走。当时我生活无着，何克夫安慰我，并先给我50元生活费，随带我去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训勉我说：“你是革命后代，你的先父牺牲生命财产来为革命。你学军事，应该继承父志，跟我继续革命。”并对我说：“和你一同学军事的华侨同学现在广州赋闲的有多少？可约他们来参加革命。”因此我便跑到大马站一间东江学舍——圣宗公祠内，找着先毕业回来的同学叶剑英、邓焯、邓其渊、梁朴元、符岸壇、史可斯等20余同学联名请缨北伐（用快邮代电

寄出，电文是叶剑英起稿、邓焯抄写的)。

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先生被南下国会议员选举为非常大总统，于同年5月5日在广州总统府就职。5月7日，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约见我们谈：“你们这班华侨学生，热心爱国，来电请缨北伐，经孙大总统批准全部录用，交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仲元安排你们的工作。”现在传达孙总统的训示：“你们好好的到第一师训练部队，准备立功。”从此我就一直跟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

二、孙中山的警卫团与梧州风波

1921年粤军最后在北江讨平叛军沈鸿英残部后，孙大总统积极计划北伐，原定粤军第一师邓铿部扩建成一军，与二军许崇智部为北伐军基干部队，并叫邓师长将北江游击司令李安邦改编为总统府警卫团。邓以李部装备不好，必须补充后方能胜任，报请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予以补充。陈炯明当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阴谋割据，不主张北伐，与孙中山先生同床异梦。故对将李安邦所部改为总统府警卫团之议大为反对，只答允另派一团人为孙先生警卫。不答应补充李安邦部。邓即转告孙先生，孙说：“这样亦可以，但派何部队呢？”邓又再请示陈炯明，陈提议将陈炯光全部改编（陈炯光是陈炯明的堂弟，任第四路司令，刚招募两营新兵）为大总统警卫团，并指定以陈炯光任团长，将张发奎的游击营加以补充后加入警卫团为第三营，属陈炯光团长指挥，调李安邦当团附。实际就是想借警卫团来监视孙先生。孙先生不同意用陈炯光，经邓师长往返多次与陈炯明磋商，陈才答允由第一师拨一团人为大总统警卫团，并按照邓师长意见调该师参谋长陈可钰担任团长。

本来邓师长最初拟以邓演达之独立营扩充为警卫团，并以邓为警卫团中校团附，但邓演达不愿意，后来邓师长就改变计划，

先将薛岳之机关枪营改为警卫团第一营，仍以薛为营长、邓树勋为营附，缪培南、梁世骥、梁公福分任连长，又以李章达之工兵营改为警卫团第二营，李任中校团附，升原工兵营少校营附叶挺任第二营营长，梁瑞寅任营附。李扬敬、李振球、简作楨分任连长。另将张发奎招募新兵补充北江游击营改为警卫团三营，仍以张任营长，李步瀛任营附，陈瑜、韦就、王伸根分任连长。又派师部少校参谋邓完远任少校团附，调我（张国森）任团部上尉副官，派陈劲节当中尉差遣委员，帮助我成立团部工作。后又调总部少校附员蒋光鼎任少校副官，李澄之任团部上尉军医，陈可钰的侄子陈聘寰任上尉军需，邝柱华任团部中尉书记。团部设在第一师师部（长堤官铸局）楼下办公。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先生乘宝璧炮舰赴梧州，准备在桂林集中各路大军誓师北伐。当时，孙先生拟乘军舰赴南宁，计划由南宁上行经柳州移桂林，但因南宁附近尚有残余敌寇未清，故孙先生才转返梧州从抚河上行。因此迟了很多天才到达桂林。警卫团第一、三两营队伍是由陈可钰团长率领出发到梧州，因要征募抚河船只，故在梧州逗留的时间较长。

当时驻梧州的陈炯明嫡系部队包烟、包赌、走私漏税，无所不为。有一天，警卫团第八连的士兵跑到三角嘴去收番摊数（这些番摊是梧州警备司令黄昭荣包庇的），被梧州警备部队保护番摊的守兵打伤了，还将该士兵所佩带的刺刀都缴去了。这两个士兵回连部报告连长韦就。韦不分是非黑白，直跑到营部报告营长张发奎，说警备司令黄昭荣派兵缴他们的枪械；张也不分青红皂白，即集合全营兵力去包围梧州警备司令部，声讨黄昭荣。警备司令部值日官见来势汹汹，也集合起驻司令部的一连守备部队与张部对抗，互相射击，互相冲杀，结果是张发奎率全营官兵焚毁了梧州警备司令部，打死了警备司令部不少的士兵。当时陈可钰虽责备了张发奎，但事情已经扩大，黄昭荣立刻回广州向陈炯明

控诉张发奎。陈炯明大怒，要杀张发奎，当叫邓师长电令陈可钰将张发奎撤职治罪；并派蒋光鼐接替警卫团第三营长职务。陈可钰平时就有些包庇张发奎。在这样情景下，不能不袒护到底，借口该团是大总统警卫团，须听孙大总统命令处理，并一面将黄昭荣在梧包烟包赌情形及事情发生经过以及陈总司令的来电一起立即电桂林叫李章达向孙先生报告，请求转圜。一面加速征集船只，将部队开拔西上。孙先生在桂林知道此事后，即命胡汉民以文官长名义电陈炯明说已将张发奎记大过一次，仍留职跟随北伐，戴罪立功。

陈炯明既不能按自己意愿派陈炯光当警卫团长，现在又连一个张发奎都处置不了，不仅益增了杀张之心，同时也更加对邓仲元不满，后来邓之被暗杀，虽不以此事为主因，但与此事亦有多少牵连的关系。

三、孙中山在桂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总统府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成立警卫团，我便由粤军第一师的上尉副官兼军官教育班教官职调到警卫团任上尉团副官，拱卫孙中山先生北伐。

1921年秋，筹备出师北伐的各项补充工作妥善安排以后，12月15日，孙大总统誓师桂林，组织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秘书长胡汉民、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赣军总司令彭程万、黔军总司令谷正伦、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各路大军齐集桂林，在桂林皇城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筹备北伐。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夫人住在皇城内独秀峰下的楼房，我们警卫团全团驻在皇城拱卫。

孙中山在桂林的时间约半年，即1921年10月底至翌年5月初。1922年的春节，孙中山先生是在桂林渡过的。我现在将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的几件事情略为忆述。

（一）美国加纳顾问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时卫士队

的卡宾枪和探照灯都是加纳顾问代表美国送给孙先生使用的。探照灯的直径有一米大，可以旋转，安装在独秀峰的山顶上，探照全桂林，使警戒守望便利。

(二) 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时，经常向群众演讲，内容大意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收回租界，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向群众演讲时，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没有讲稿，出口成章，都由黄昌谷记录，记录稿记得很详细准确。每次记录完，把稿件交给孙中山先生看时，孙先生只改一两个字就定稿向报界发表了。

(三) 在孙中山先生“亦兵亦工”的革命思想指导下，部队的官兵都去参加桂林至全州这段马路的修筑，孙先生亲自去监工，因此，此路很快就完工，使交通运输方便快捷。

(四) 孙中山先生率领革命大军进桂林城时，大部分群众列队欢迎，盛况一时。

(五) 孙中山先生为培育人才，把旧广西大学从梧州三角嘴搬迁至桂林良丰，扩大学校规模，充实教学设备。

(六) 当时我在桂林北门外界牌地方剿匪时，曾与李宗仁的自治军打过仗。

(七) 孙中山先生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本人就是平等待人的模范。举例如下：

1. 从梧州抚河西上是水陆并行，本来孙中山先生是有轿子坐的，但孙中山先生问及轿夫有多大年纪，轿夫不过随口回答：“60岁了。”孙中山先生就说：“我的年龄比你还小，不该你抬我，应该我抬你才对。”于是孙先生就一路上和轿夫一起步行谈话聊天，让轿夫抬着空轿子走，孙先生一分钟也没坐轿。有时行得疲倦了，就下船稍睡一刻便又起行。

2. 有一次，我们跟随孙中山先生一起去参观桂林七星岩，有很多赤脚而且缺衣御寒的小孩，手持火把要求进洞导游，为的

是得点钱营生。孙先生不准我们驱赶他们，还和蔼地对他们说：“来，大家都来，排好队。”孙先生叫我们逐个小孩给钱，记得那天负责派钱的是副官黄惠龙。有的小孩拿了钱转了一圈又跑回来要钱，勤务兵伸手要打，孙先生立刻制止不让打，仍然再给钱。孙先生看到很多小孩一齐拿着火把来引路，把洞照得光亮如同白昼，孙先生很高兴，便训勉这些小孩说：“你们今天拿火把，长大了就要拿枪杆打敌人，参加革命，将来革命成功，你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了。”

到了七星岩，有河流过，很清凉。大家都洗手，还想喝一点。孙中山先生急忙阻止说：“不要喝，很凉，不卫生，喝了会生病。”孙先生经常带着望远镜和手杖，看到岩洞有一条条垂下的钟乳石，就喜用手杖把钟乳石敲下来，以此为乐。使我们也一同感到快乐。孙先生用手杖敲打钟乳石时，先告诫我们说：“我戴了通帽，不怕石头，你们没戴，快避开，不然就会打穿头。”孙先生对我们是多么关心啊！

3. 在阳朔，我们同孙中山先生一起看了伏波庙，孙先生让武将给伏波将军行礼。伏波像是全身披挂的，孙先生叫我们向马伏波将军学习。

4. 桂林所有的风景地方，我们都跟随孙中山先生去游览过了，现在还记得一些景名如叠彩山、孔明坛、老君洞、伏波山等。

（八）在桂林时因无电灯，汽车司机用汽车马达发电供给电灯，但只用5瓦灯泡安装，一只灯每月收5角，皇城里装了好几十只灯，用三个旧汽车马达来发电，但仍不够亮，办公室仍要加点蜡烛，才能办公写字。

（九）我们警卫团从梧州跟随孙中山先生至桂林时，我们驻守在皇城内西北两道护城城墙上，每晚我都去巡逻，每次当班四个钟头。

(十) 到桂林之前由李章达团附带了叶挺第二营，这一个营先到桂林布置皇城，迎接孙中山先生。

(十一) 我每日在独秀峰下的大操场训练军马（我是云南讲武学校十三期骑兵科毕业的），时见宋庆龄夫人站在骑楼上观看。

四、在陈炯明兵变过程中

正当孙中山先生整理和补充各路大军，准备翌年大举北伐之际，陈炯明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阻挠北伐。因原北伐计划无法实现，孙中山等经过开会决定，乃命北伐军由桂返粤，于1922年5月初移大本营于韶关，转向江西进攻，迅即攻下赣南一些地方，此时却得报陈炯明要在广州搞乱后方，孙先生乃率警卫团一、二营回广州坐镇，留第三营在韶关保护后方。并将警卫团扩充为两团，升任中校团附李章达为警卫第二团团长，少校副官蒋光鼐充第二团第一营长，并将姚观顺的卫士队60人扩充为一个卫士大队，任命李扬敬、梁世骥和我升任少校机关枪连长，李扬敬留在第一团，梁世骥派到第二团。我这连准备配属卫士大队，当时急急招募新兵补充。到了1922年6月13、14日两天，谣言甚盛，到处传说陈炯明在惠州召集其死党开会要请孙下野，所以15日一早，孙中山先生就写了一个手令，叫我到石井兵工厂找朱卓文厂长。我从兵工厂领了四挺粤制奥式水机关枪（即重机枪），两挺粤造的24响旱机关枪（即轻机枪），500支七九步枪，5万发子弹，到了日落时候，差不多6点钟才运到总统府（即现在的中山纪念堂）。我还未吃晚饭，第一连（即缪培南一连）有两个排长赖顺成、钟演廷（武校十二期同学）急来告诉我说：“刚才钟国祥、陈静庵、赵益坚（也是同学）特派人来通知，说钟景棠的部队已开返广州，准备今夜围困总统府。”我就将这个信息告诉陈可钰团长请他赶快报告孙大总统。陈可钰还假作镇静说：“不要紧，镇静些，赶快将机关枪装起来准备应战。”他叫第二营长

叶挺把第二营配置在德宣路警察第二区（即现在的越秀分局）到莲塘街这一线呈曲尺型，重点是巩固大闸门，加高沙包掩体；叫我将两挺机关枪配置在左右两翼。我对陈可钰说：“现在都是新兵，不但不会使用轻重机关枪，就连步枪的射击也未学过，三角瞄准也未教过，现在是要怎么办才好？”结果，陈团长叫叶挺营长在李扬敬四连挑了六个老兵来使用这两挺 24 响轻机关枪。到半夜 12 时左右，外面风声甚急，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等人劝孙中山先生改装出走。据报当时围困总统府的叛军有两万余人，起初孙中山先生不肯走，认为自己平乱有责，愿与总统府共存亡。但情况越来越危急，林等痛陈利弊，才得孙先生改扮成医生，身穿夏布长衫，戴起黑墨镜，手携药箱与林等一起离开越秀楼（孙先生与夫人住处即现在的越秀山“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碑）。他们经过敌军重重步哨，都是由林假说母亲患急病要请医诊治，并给哨兵们一些茶钱，这才通过了敌岗哨，从内街经电灯厂右侧出天字码头，走入陈策的江防司令部，乘楚豫舰开往白鹅潭上永丰舰到黄埔。其时马伯麟（长洲要塞司令）指挥着长洲总台，布置鱼珠炮台、牛山炮台、沙路炮台，准备对敌还击，以后徐树荣的掩护队（约两大队）与敌军战斗最激烈。

孙中山先生临行时，命令卫士队长姚观顺坚守越秀楼；并令警卫团长陈可钰坚守总统府，共同负责宋庆龄夫人的安全，约定翌日正午 12 时听海军炮响突围。孙先生离开越秀楼不久，大约在半夜 2 时左右，前哨接触就打起来了。越秀楼方面甚为激烈，当时卫士队只有 60 余人，寡不敌众。姚观顺被打伤了脚，其余的卫士不是伤就是冲散了。至天亮后，我眼见马湘、黄惠龙两副官扶着宋庆龄夫人从越秀楼过天桥避入总统府。他们刚通过天桥，天桥就被敌炮弹击中，即时起火焚烧了，当时我是新任机关枪连长，与第二营叶挺在陈可钰团长的带领下与叛军激战，志在保护宋庆龄夫人安全脱险，叶挺营长见情况急迫，匆忙率预备队

(第六连)冲锋,但冲了三次都冲不出去。陈可钰制止叶挺,说要保护夫人安全,不要随便牺牲,他就用电话向敌军指挥官叶举讨价还价,叶举说:“我奉总司令的命令围攻总统府。”陈可钰说:“我奉总司令的命令保卫总统府。”这样争辩了许久,结果围攻正门的敌人让开了一条路,想让我们冲出去时一网打尽。叶挺料到敌人的阴谋,机智勇敢地将队伍分布左、中、右三路。叶走中路。以预备队第六连垫后卫乘机冲出,占领了有利射击火线,组成交叉火力,压制敌人不敢前进。到下午5时多,还未听见海军鸣炮响应,这时的电话线、电灯线的线路都已被截断了。我们已经苦战一日一夜,弹药无多,后方无补充,又无援兵,情况十分危急,不突围等于灭亡,我们不得已冒着炮火往外冲出。首先是陈可钰带头,冲到公园围墙边,敌人的枪炮弹四面八方射来。叶挺不顾一切爬起来,用快步到达围墙弯脚(死角)避开敌人的射击目标,我即督住三个机枪手,提起一挺轻机枪,跑步到叶挺前面,用速射的猛火力掩护着,马湘背着孙夫人越过马路,陈可钰又跑到前头鼓起士兵的勇气,黄惠龙、叶挺押后,我跟随指挥着另两个机枪手托起另一挺机枪赶上来跟着冲。冲过马路,正想冲入芒果树街,到了街口,就被敌人阻击,走不通,那时不见黄、马两副官和宋庆龄夫人。陈可钰万分焦急,随后转移到华宁里口时,不知怎样又见到黄、马两副官扶着宋庆龄夫人,这时敌人渐渐围上来,黄惠龙提醒夫人丢手提包,夫人乘机打开手提包把钱、银、首饰等物撒在大街上。敌军只顾自相抢夺地上钱银,马湘即背起夫人又再越过马路,转入华宁里内街。宋庆龄夫人在黄、马两副官的合力保护下到这时才走脱。但我们突围队伍都冲散了,叶挺见势不好,即卸下军装,爬到公园围墙,跟着冲散的士兵逃脱(这是叶挺到了永丰舰后告诉我的)。陈可钰在公园前被俘,带到公安局。局长吴飞是陈的速成学校同学,名为对陈保护,实则将陈扣留。当时死伤的战士已难数计,我的左腿也被弹

片击伤，我从司后街（既现在的越华路）内街左转右弯，走到东校场魏邦平的卫戍司令部避难。在此遇到刘纪文，为我包好左膝上的伤口，用汽车送我回第一师司令部（长堤官铸局）歇宿一夜（整夜不能入睡）。到了天亮，我想法得到一张第一师的通行证坐小电船到永丰舰见到孙中山先生，立即向他报告突围经过，说明夫人已经脱险。孙先生听了，反悲为喜，旋把我分配在楚豫军舰参加战斗。孙先生亲自指挥各舰队开入省河巡来巡去，与岸上敌军对射。

6月19日孙中山先生接到由沙面转来张开儒电报，略谓率领滇军到达庆远、怀远（即现在广西宜山附近地方），请示行止。李章达向孙先生献议，说滇军内部多是张国森的同学，派张国森去传讯息比较适当。因此孙先生就亲笔写信，首先派我去梧州、柳州沿途请救兵东下。我接到命令后，即从黄埔搭省港轮船到香港，转坐“大明”轮船西上梧州，随我之后孙先生又派林树巍、林直勉、薛仰岳、邓刚等人陆续到梧州担任各方联络职务。

孙先生叫我带信西上去请救兵，我到梧州就第一个去找关国雄（第四独立旅旅长，孙先生秘密委了他当师长），但他司令部的人说关还在广州未回来，我就去第二团团部见吕春荣团长，吕谈：“要审慎，我的力量有限，现在第一团长杨锦龙早被陈炯明收买了，你们行动要小心谨慎，不要说来见过我。”那时莫雄（吕的第一营中校营长）在吕的鸦片烟床旁边，莫对吕说：“团长，你把孙先生的信给我，等我派人送给关师长。”莫雄拿了孙先生的信负责另派人带去广州交给关国雄，莫谓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度日若年，如果同意东下，他们第一营和第三营（营长是关的侄子）是关最信任的，肯定这两营人打先锋可以等于两个团的兵力，而且枪械又良好，机关枪和驳壳枪最多，编成就等于一个旅的战斗力。所以我又从梧州转返广州，入沙面上永丰舰向孙先生报告梧州情况，并说：“莫雄热心革命，如果需要他，即使无

关国雄命令，他都愿意随时东下打先锋，决不推辞。”孙中山先生听到我的报告，也谓香港方面传来同样的消息，认为莫雄热心革命，可以重用，因此孙中山先生就亲笔委任莫雄为中央直辖独立旅旅长，派我带亲笔委任令再到梧州，交给莫雄，望他准备起义东下。当时李章达是新任警卫二团团团长；在孙先生身边工作，我就对李章达说：“不知我用什么名义去送信？”李章达即同我入房问孙先生（当时许多追随蒙难的老同志都在舰上的大厅坐立，孙先生住侧房）。李章达向孙先生说：“张国森问他以什么名义送信请救兵呢？”孙先生说：“我正想到这个问题，就用大元帅副官名义好了。”即用永丰舰信笺写着“委派张国森为大元帅副官”，下署“孙文”二字。此后，人人见我都叫我张副官。我得此命令后，又从香港到梧州，将莫雄从中校营长升为旅长的委令交给莫雄。我临走时，孙先生说：“你先走，我打电报到香港筹划一笔发动费，再分别派人去梧州筹设行营，负责指挥西路讨贼军东下。”所以后来就有了林树巍、林直勉、廖湘芸等人从香港再去梧州，住在莫雄部，陆续来梧的人因莫雄部住不下，就在美国斯达医院开房（那时斯达医院等于租界，叛军不敢过问），共商东下大计。我到梧州后，把孙先生的委任令交给莫雄后，还要陆续西上，带信给桂军将领刘玉山和滇军将领张开儒。孙先生在战舰给我的旅费3000元是程天斗发行的纸币，在市面被敌人压制不能通用，全得莫雄给我500元港币作旅费，才能继续西上请救兵。我到贵平见到刘达庆，到武宣见到刘玉山，到柳州见张开儒，都是把孙先生的亲笔信分别交给各将领亲自收读的。后来东下就是这些杂牌军队首先攻入广州，尤其是莫雄首先起义，打先锋，先到广州驱逐陈炯明叛军。

我从梧州继续西上到贵平见刘达庆时，他将我扣留在公安局，不审不问，而用很好的饭菜招待我，不准我与别人见面。如此过了三天，刘达庆接我到他的司令部以上宾礼待我，即晚大排

宴席，推我上座，刘当席发言谓：“设便饭薄酒为张老弟压惊，因为陈炯明派了陈仲宾的儿子来动员我们，想迫我们与陈合作，愿意接济十万元，补充十万子弹，叫我们训练好部队，阻止滇军东下，但我是不会为陈卖命的。现在钱粮、军械到手了，我准备跟随东下讨贼，所以这薄宴为老弟饯行。”刘达庆是桂军沈鸿英留下来的人，几百枝杂枪，在当地靠包烟包赌维持军饷。在他之上有滇军，下有粤军，他力求生存，被迫跟西路讨贼军东下的。他送我西上与滇军先通消息，准备一同东下打陈炯明，这是后来滇、粤、桂军“白马会盟”东下讨贼的起点。刘达庆用电船送我到武宣见刘玉山，我将孙先生的信交刘，他杀狗款待我，在他的司令部设狗宴，并留宿一宵。至翌日他就用电船送我到柳州将孙先生的信交给张开儒。因滇军内部易帅纠纷，我不敢久留，但无船下行，得滇军独立团长朱世贵（武校同学）为我找到一个杉排乘搭。经过20天才到梧州，这时新任粤军第四师长兼驻梧陆海军总指挥的关国雄从穗回梧，他柬请驻梧各将领在紫洞艇中举行大宴会，并密约我和林直勉、林树巍等多人参与盛会，共商誓师东下讨陈大计。正在商议间，忽然接到韶关方面打来电报，略谓北伐军回师攻韶关、马坝时失败，已退入江西、福建。孙先生已离白鹅潭永丰舰转乘英国摩轩号兵舰往香港去了。大家听到这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冷水淋头，相对默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西路军暂时不敢发动。莫雄叫我们几个孙先生派来的人要快走，迟则有被捕的危险。

自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化装出走，驻白鹅潭永丰舰，亲自指挥海军舰艇与岸上叛军在省河相持40多天，这就是历史上的孙先生在广州白鹅潭蒙难。由于北伐军四师攻韶关、马坝失利，孙先生离舰赴上海的消息传来后，我们知道在梧已难立足，而且怕在梧州妨碍莫雄的联系工作，就由莫带我们乘“大明号”轮船往香港。在船上扮作火老、

水手，经过三水河口时，结果避免了陈部宪兵上船盘问，这些宪兵只是查问乘客中有疑问的人，没有查问机器房和水手房，宪兵离开，我们看到船离码头才放心。

我和林直勉、林树巍等乘港梧“大明”轮安全到达香港后，林等便留港就分别进行各自联络工作。我首先遇见叶剑英，同住在鸿安栈，整夜倾谈西上请救兵的经过情形。第二天早上我就到摩罗山见谢持、邹鲁、古应芬等诸人。我便将西上情况告知他们，谈我离梧州时一切的联络发动工作，由莫雄完全负责，等他们补充好，一切准备就绪，就会誓师东下，担任打先锋的就是莫雄这个旅。据邹鲁说，他们也接到密电报告，与我所说大概相同，我在摩罗山食过早餐，古应芬等给我一万元旅费赴上海。叶剑英、刘纪文送我上船，是晚招商局（广大轮）船，所谓官舱设在甲板上，我就住此单人房。

我到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报告西上的经过情形，孙中山谓已接到各方面的来电，都已有所准备，现正等东路军补充好就行动。

五、讨伐陈炯明中的几件事

（一）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时，急于攻破惠州城，将留在广州的滇、桂军开赴东江。但杨希闵、刘震寰也怕攻破惠州城要他们带部队去北伐，所以天天闹饷，故意不出发。孙中山先生发饷，要滇桂军出发，便叫胡汉民秘书长用大元帅名义手令到市政厅提取 20 万元。那天早晨八点钟，孙先生就叫我到秘书长室去取款，我一到市政厅从八点钟等到十一点钟，见孙科上楼入办公室，我边将取款手令交给他。孙科一见手令就说：“我不会印银纸。”说完就将手令撕毁了丢入字纸篓，跟着就下楼坐汽车走了。原来孙科有一间别墅“小憩”，在二马路博爱医院隔邻，每晚打麻雀、跳舞，因那晚打麻雀输了 1000 多元，就借故发脾气，弄

到我无法回话。下午孙先生打电话问杨希闵、刘震寰两个滇桂军总司令的部队出发了没有，杨、刘说还未领到粮饷，部队不肯出发。孙先生又问会计司长黄隆生为什么还不发饷给滇、桂军出发，黄隆生说会计司无钱。孙先生又问市政厅 20 万元拨来没有，黄隆生说不知道有这回事。孙先生便亲自到二楼秘书长室问胡汉民有没有给手令到市政厅提取 20 万元，胡说今早派张副官带去。孙先生叫我来问，我将见孙科的情况如实汇报。孙先生听了又急又气，马上用电话叫孙科来。孙科来了，孙先生便大骂孙科说：“军情如此紧急，需款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没有这回事？你今天不办妥 20 万元拨款，你就不要做市长了。”孙科被骂无处出气，就到二楼秘书长室跟胡汉民吵闹，说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使他父子不和。胡毫不示弱说：“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怎么是假借命令？”孙科这时蛮不讲理，胆大包天，竟然拿起手杖打胡汉民。吵闹声音响到三楼，孙先生正要入浴室冲凉，还未下浴池，就穿上毛巾衣下楼来，见到孙科对胡汉民那种凶恶态度，几乎流下眼泪，就把守楼梯口的那个卫士的驳壳枪拿过来追打孙科，大骂说：“你这个死仔，反革命仔，不是我的仔，四万万同胞才是我的仔，我要枪毙你这个死仔。”孙先生连草拖鞋都脱了，直追到大门口，孙科急下电船仔走了。孙先生气愤地转回头来，惊动了黄隆生、路孝忱、朱培德、李烈钧都来劝解。大本营一向分两派，一派是元老派周之贞、朱卓文、李安邦等人，都抓有民军的势力；另一派是太子派如陈策、张惠长、陈庆云等抓了海空军实力。两派曾在江门、肇庆一带打起来，结果孙先生命令李济深的第一师用武力压服太子派，由邹鲁、古应芬出面要孙科向胡汉民斟茶认错才作了事，但元老派与太子派始终合不来。

（二）孙中山先生有一次因滇桂军领了军饷开到前方，不肯出力打仗，但是各军兵力合计起来比守惠州的敌军多几倍，孙中山先生召集滇桂军的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及各军师、旅长到大

本营训话。大骂一番说：“你们只会要钱要械，不肯出力打仗，一味坐地分肥，以为广东是你们的安乐窝，你们保全自己实力，为自己利益打算。”孙中山先生当时非常生气，愤愤而言：“你们纷纷联名电请我返粤主持国家大计，现在你们天天向我要钱闹饷，不愿去东江歼灭敌人，这样的军队不革命有什么用？你们叫我怎么办呢？老实对你们说，我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来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去革命，你们要反革命要造反，我也不怕。你们如果要革命就跟我来，准备北伐，打到长江流域、黄河两岸，比广东好得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处都是安乐窝。你们不要近视眼，只看目前，放弃革命，立心霸占广东，没有远见终将被敌人消灭。广东的肥猪肉不能长食，食得多会疴的。”他们虽经孙中山先生训骂一顿后静默了一时不敢说话，但过了几天，又故态复萌了。因此，孙中山先生才决心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聘请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创立新的革命军队，建立黄埔军校，首先培养一批革命干部。

（三）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气量大，待人宽厚，能使人改恶从善、心服口服的革命思想家。明知是来骗他的人，但他相信在十人中有一人不骗他的，这就是革命的力量，可以依靠。我当他的副官，代他接见过不少宾客。其中有求差事的或要求给钱的，孙先生总要使来人无不满意而去。但有些专搞民军的人想来骗钱，开口便说有多少部队，多少枪械，要求跟孙中山先生效忠革命，要多少钱开拔经费才能把队伍开到广东来听命任用。从几万元减到几千元，再减到几百元，甚至最后减到只要几十元给来往传信息的人作费用便算。我们每次都告诉孙先生，这个人假的，是来骗钱的。孙先生总是说：“岂有不知他是骗钱的，但他只敢来骗一次，不敢来骗第二次。古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人中有一人不骗我，我就成功了，这种来骗的人骗得到手便说你好，骗不到手便说你坏。好的是一句，坏的也是一句。来骗多少

没关系，得他说句好话就当给他一点宣传费。帮我们讲好话，帮敌人讲坏话，这不是有利于我们吗？”孙中山先生这样持革命的远见待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又如沈鸿英三次叛变，三次认错，孙先生不但没有杀他，只要他认错，孙先生就又起用他。

（四）我们跟孙中山先生革命，始终没正式发过一个月薪饷，以后经费困难，每日干部伙食发4角钱，士兵和勤杂人员每日发2角钱，都是五日发一次，甚至有时一个星期才发5日伙食费，有两日伙食无着落，有办法的是到亲戚朋友处食一餐两餐。所以身上的当票多过银纸，身上所穿的军服都是到四牌楼故衣店买旧的，逢星期六晚洗军衣，星期一干了才穿着上班。回忆在1922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广州白鹅潭蒙难后，我到上海住了没几天就要回家，不愿在外面吃苦。孙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回家？我说在外面没钱吃饭。孙先生说：“在家吃饭也要钱，出来吃饭也要钱，何不将在家吃饭的钱带出来外面吃饭，出来干革命，这不是更好吗？”

六、讨伐唐继尧

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之先，任命范石生为定滇军先遣司令兼军长入滇讨伐唐继尧，派我以大本营上校名义勦助范石生入滇。我另派人去策动驻临安独立旅莫璞起义。莫起义成功，还将个旧锡矿的护矿武装工人编成两个支队民军归我指挥，我就这样担任了定滇军（铁路方面的）迤南纵队少将指挥官。当时我把收编经过再去电请示胡汉民代大元帅时，胡照孙中山先生原定计划所指示，即复电委我担任这个临时指挥作战的称号，但只当了前后11天就失败了。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主要是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影响军心，更兼全军无接济，后无退路，致使入滇讨唐的军队失败。尤其范（石生）军主力攻开化时，在江那地方被龙云的军队包围，全部失败，虽不致

灭亡，但也永无振作之日了。我的部队与范的主力部队联络不上（当时并无电讯联络器材），消息隔断，彼此情况不明，只是各自为战。因此又被龙云、胡若愚两军汇合向我全面包围，因我的部队分散面广，被敌各个击破。河内国民党支部为我筹备了1000包大米，接济起义部队，当时莫旅长不肯带部队离开，拼命孤守临安，以保护他自己的财产，结果，我撤退到阿迷州之后，未久就闻他在临安阵亡。我撤到戈枯寨，最后一线突围冲出，退至滇越交界的小孟拉地方。这是一个村庄，我得了瘴气病，后来找了一个土人带我越过老街回到海防医治，呻吟了半年之久。真是功败垂成，亏于一篑。

（1979年）

追随孙中山革命见闻

黄梦熊*

一

反袁斗争结束后，孙中山退居上海，在沪设立党总部，因总部党务繁剧，职员众多，住处太过迫狭，不敷分布，拟另租一幢房子居住，他着林焕庭同志办理此事。但此幢房子必须与总部接近，往来方称便利。商有成议矣，经租房子的人，每临时推却不租，经受多次推却，林焕庭查知是北庭在沪坐探贿买经租人所为。北庭以孙先生居沪，妨碍他们的罪恶行动，欲运动领事团驱逐他出境，苦无理由提出，乃用此种卑劣手段，贿买经租人，凡知道是林焕庭经手的，即临时加以推却。林焕庭另想办法，与房主直接租赁，北庭坐探又向房主运动，提出限期取屋，用此方法迫迁。林焕庭无办法，将租房情形报告孙先生，先生以偌大上海、北庭何能尽贿房主，法租界不能租，向英租界，偏僻些如静安寺路房子亦可租。话虽如此，房子必须择妥适当地点，因为对于先生的安全，是占有重要关系的。林焕庭拟在外埠汇来总部款内划拨二三万元、购买房子一幢，以解决困难，商之胡汉民，胡汉民赞成，向先生报告，先生以汇来的款，只能用在革命运动上，买房子是图个人享受，不能动用。林焕庭乃走商廖仲恺，筹商方法。会有某埠华侨同志抵沪访廖仲恺，亦在座，聆林焕庭与廖仲恺谈，即答曰：“必须从速解决，需款几何”？林焕庭曰：“二三万元足矣”。某侨曰：“吾为你捐之。”林焕庭相宅议购，有

* 作者当时系孙中山副官。

成议矣，为北庭坐探侦知，贿房主，收回成议，事又不成。某侨知悉，大怒，亲自派人相宅议购，不令焕庭出面，使北洋坐探无从侦知，以二万元购宅一幢，献赠孙先生为住宅，此即旧法租界莫利爱路 29 号也。

当袁世凯称帝时，云、贵举义，各省继从。孙先生任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胶东举义，克复潍县。袁氏殒歿，东北军接孙先生命令暂停进攻，以静观政治形势的开展。适黎元洪以副贰正位大总统，恢复约法，国会重开。孙先生为促成和平统一，首先提倡实行统一军权。命廖仲恺持先生亲笔手札，晓谕东北军将士，接受政府命令，交由陆军部改编。东北军中的华侨义勇团，是由各埠自动辞工回国参加革命军的华侨组成，胶东潍县克复，卓著战功。聆廖仲恺传达孙先生手札后，以此行自动辞工回国，目的是参加革命，非有做官企图，兹目的已达，会当解甲，各回本埠，重复旧业，要求廖仲恺向孙先生转达他们的意愿，愿予遣散。各省同志中有不愿意接受北庭陆军部改编者，亦向廖仲恺作同样的请求，孙先生一律接纳。于是由山东解散来沪之华侨及各省的同志、陆续集结沪上者约数百人，租宅收容，膳食供应，在在需款，用费日增，实难应付。而各省同志回籍与各埠华侨回埠，又须斟酌程途远近，分别给予川资，需款更多。只得先近后远，先国内，次南洋，最后美洲。事先既未筹集巨款，临时又无法预算，借此以为挹注者，迄为各埠总支部汇来之款是赖。源既不丰，取用无穷，涸竭之形，势所必致。初则东张西罗，以致应急，终亦张罗乏术，仰屋兴嗟。川资发放，虽可得各埠总支部汇来之款应付，而日常膳食，则不能不设法维持，本部办事同志，同受影响。林焕庭没有办法，只得将困难情形报告孙先生，先生命焕庭将某侨赠送的汽车出让，暂救眉急。林焕庭以某华侨所赠的汽车，属先生私有，奚可出让，后如出入无车可乘，岂非辜负某侨盛意？先

生答曰：“我身已贡献革命，我所属之物都可为革命则贡献，他赠我车是私情，化私为公，我报他者亦大，并无负于他，我出入不多，每月须多费一笔车夫工资，亦属浪费，你照我意办理可也”。林焕庭不得已从之。

时聚居沪上候资遣散的各同志，经本部同志月余的努力，大体上已办理停妥，所余者只美洲各地华侨数十人，未能办了。因他们要求集体同时离沪，需费甚巨。其中更有离美时未办清离境手续，又需为他补办离境手续，所以多费时日。他们不谅本部同志办事困难情形，每日聚众在本部门前吵闹，使本部同志更增困难。孙先生聆悉情形后，问林焕庭需款几何？林焕庭答约3万多元。先生曰：“可将我的住宅出让，所余差数，可与廖仲恺商量，赶快筹足，送他们回美，免久留沪上生事。”孙先生住宅不能出让，林焕庭知之，孙先生已决定之事，非有充分理由提出，不能回先生之意，林焕庭亦知之。因是，孙先生提出让宅之决定，林焕庭不敢回答，免致使事态更难着手。乃将情形就商廖仲恺，廖仲恺与南洋烟草公司总理简照南商量，由南洋烟草公司借给3万元，资送华侨同志回美之事，乃得顺利结束。

孙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宋蔼龄之胞妹也。孙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任宋蔼龄女士为私人秘书。第二次革命失败，孙先生东渡日本，宋蔼龄女士亦东渡，仍任孙先生义务秘书。庆龄女士常随蔼龄女士晋谒孙先生，因此，深切了解孙先生革命的伟大人格。由信仰之深，发生相互之爱，于1915年12月15日在东京结婚。孙先生回沪后某夕，命林焕庭在私宅备宴，请总部的重要同志赴宴。孙先生向来对同志不作应酬，今突然请宴，与宴同志很惊讶，问林焕庭，林焕庭亦不知。筵开，孙先生偕夫人出来，介绍于诸同志相见，申述结婚缘由，诸同志齐向先生夫人道贺，才知道这是结婚喜筵。胡汉民同志代表各同志向孙先生请示对夫人作何称谓。先生答曰：“你们大家称呼我为先生，就以

师奶称之可也。”胡汉民以师奶称谓太普通，不足以表崇敬，古礼尊崇妇人，孺人、安人、夫人之称谓，应称为夫人，以示崇敬，各同志拍手欢呼。

1921年10月，孙先生拟由广州出发到桂林督师北伐时，拟携夫人宋庆龄同行，廖仲恺等以夫人不便随行，请先生慎重考虑，依中国习尚为便。孙先生举出韩世忠六破金兀术于黄天荡，全赖夫人梁红玉击鼓助战振奋军心为例。可知中国军队并非不许妇人参与其中，亦不见得影响士气。廖仲恺又提出梁红玉击鼓助战，为历史上特出之事，因播为美谈，但中国习惯上仍以妇人不随军为原则，盖在甘苦之情况下，常会影响士兵发生不良反感，此不可不一加考虑也。孙先生听廖仲恺说出此话，乃是人情之常，遂终止偕夫人出征。

二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先生乘宝璧舰出巡广西，拟取道湖南北伐。宝璧舰舰身坚固，设备完善，在前清时代，为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坐驾舰，另派江汉、江巩两舰为护卫舰。随孙先生出发的有陈少白、胡汉民、参军胡毅、林树巍、副官黄惠龙、马湘、黄梦熊、司徒菲、邝石、伍慎修，俱坐宝璧舰。会计处主任林云庆、金柜伍家诚、辎重大队长陆志云分坐江汉、江巩二舰。孙先生出发日期，决定匆促，一切均未准备，亦未组织，在大总统府内原有职员中，抽调若干人员，随驾出发，待至桂林，然后组织大本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邓铿，以孙先生亲自率师北伐，在陆军第一师内，抽调兵员，组织警卫军一团，随驾出发警卫，亦因时间匆促，仅编成警卫团第一营，以薛岳为营长，孙先生抵梧州后，才开到梧州，执行拱卫任务。其警卫团团部、第二营叶挺部、第三营张发奎部，随后陆续编成，由团长陈可钰、团副李章达率抵桂林。

孙先生坐驾的宝璧舰，吃水深，航驶至车歪炮台前烂坦尾附近，时值珠江潮退，带水令舰偏左航，搁浅，后退，再偏左航，又搁浅。如是数次，俱搁浅。带水令后退停航候潮涨。江汉、江巩二舰向宝璧右舷航过烂坦尾，停船守候。孙先生走出舰面，询何故停航，带水告以潮退搁浅，须候潮涨，方能起航。孙先生问江汉、江巩两舰循何水道驶过烂坦尾。带水以江汉、江巩二舰吃水浅，向右水道驶过。孙先生命带水循江汉、江巩水道前进，带水以左水道比右水道深，左水道航不过去，右水道更不可能。况宝璧舰吃水比江汉、江巩深，更不可能。孙先生命带水试航看看。带水命起航，向右水道前进，果能航过。孙先生对大家说：“左水道比右水道深，是以前的，现在改变了，右水道比左水道深。带水的经验是由传袭而来，未加研究，亦未进行测量，不知道水道已经变迁，我的经验是根据英国刊行的珠江水道图，故知水道变迁，此图是英国人距今三年前测的，英国人在三年前已知烂坦尾水道变迁，我们的带水，现今还不知道。可知英国人对中国事情如何注意、如何研究，我们中国人反不知道。中国人不知研究，不肯改良，所以事事落人后，弄成中国今日的现象，为世界列强的次殖民地，我们要救中国，就要学英国人，不但对自己国内的事情时时注意，时时研究，即使对外国人的事情，亦要时时注意，时时研究，如同英国人研究我们国内的事情一样。”

广州至梧州，水程 726 华里，非旦夕所可达，孙先生常行至甲板加入大众谈话。他曾告大家他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上书李鸿章，说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富强治国大道，李虽善其言，而无实行意，只给农桑会筹款护照。他携护照赴檀岛，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自己加入洪门会，对抗保皇党。自立志革命之日起，创立兴中会以至同盟会成立时期，革命起义十次，虽遭失败，予并不因起义失败而灰心，仍策励同志，再接再厉。卒得人民的协助，同志的努力，辛亥革命，推翻

满清，终告成功。舰过九江，沿江岸一带，筑有厚且高之基围，随河身蜿蜒。孙先生指示曰：“此为沿江一带居民，用以防御西江洪水之建筑物也。此河堤若遭洪水冲破，堤内农作物，即荡然无存，人民生命遭受危险，每次洪水泛滥，人民遭生命财产之损失者，不可以数字记，应照予所著实业计划珠江水道整理系统，彻底整理，洪水之患，便可免矣。”

苍梧驻节，海关监督公署为梧州唯一的西式楼房，地方宽敞整洁。海关监督戴恩赛，是孙先生的快婿，接总统府电告大总统出发日期，将公署二楼房舍之一部，事先腾挪整理，备做行辕，为大总统及侍从人员驻止。孙先生抵梧，即以该公署为驻节。电知陈炯明，拟西上邕宁，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接电，知无法阻止孙先生北伐计划，电复孙先生，一俟诸事就绪，旬日间即可东下，请孙先生留梧稍待，免劳跋涉。孙先生接电，知陈炯明东下有期，遂终止邕宁之行。

梧州为抚、大两河之交汇点，水色清浊划分，有如泾、渭，俗称曰鸳鸯江。耸峙大河旁之火山，与耸峙抚河旁之蝴蝶山，位两河交汇点之两侧，为梧州入口门户之锁钥。陆荣廷盘踞广西，在两山上聘请日本军官因形设防，以资防御，故两山上掩体堡垒，交通壕堑，星罗棋布，设备周密，互为犄角。据守梧州，自擅其形胜之便。设非刘震寰响应，以当时粤军配备之劣，与江防舰队武器之残旧，欲攻下梧州，殊非容易。孙先生以驻梧余暇，率侍从人员游览两山，考察当时设防情形，命黄梦熊目测某点至某点上的距离，黄梦熊向先生报告曰：约 500 米。孙先生答曰：“不超过 400 米，你的目测不准确。”黄梦熊用复步测验，得 260 余复步，以是知孙先生目测准确。游蝴蝶山，命黄梦熊做旗语表演。黄梦熊答曰：“未习旗语。”先生曰：“欧美童子军都习旗语，你是军官，为何不习旗语。”黄梦熊答曰：“此属通讯兵事，我非学通讯，故不谙旗语。”先生解释旗语是极普通的通讯方法，以

后需要练习。

陈炯明东下无确讯。广西省省长马君武电请孙先生到南宁视察。孙先生命黄梦熊到粤军兵站总监部取小轮船。总监部据以电陈炯明。孙先生抵南宁，马君武召集农、工、商、学各界开欢迎大会，孙先生在讲演中忽然说：“请大家到外面操场集合，然后再讲。”当时人群中多穿破衣、烂鞋或赤足。孙先生即曰：“看看！各位穿的衣服那么破烂，有些人连鞋亦穿不起，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陆荣廷、谭浩明一班军阀剥削你们，弄到你们生活困难的结果。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过好生活。现在广西的军阀已经打倒，马君武做广西省省长，必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使人人都能够丰衣足食。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马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在省内占据的田地楼房都查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田耕，有衣穿，有鞋着。南宁的荒地很多，各位主人，马上开荒种植。生活自然会好转起来。”群众听了，非常兴奋，不断高呼“大总统万岁”。

孙先生在南宁逗留两天，与陈炯明同返梧州。某日，陈炯明谒孙先生于行辕，促膝长谈，讨论北伐形势。孙先生告以此次北伐，必能成功。直皖战争，表面上已告寢息，暗斗仍极激烈。皖系中坚人物多趋向本党，我军占领武汉，即可得其响应。赵恒惕复电，我军道出湖南，允予协助，赵恒惕本人虽无意参加北伐，但我军到达湖南后，湖南军队必有多数自动追随北伐军。我军实力到湖南后自然大量增加，攻占武汉，殊非难事。而直系又必须以其兵力之大部监视皖系，不敢抽兵南下。以我军现在实力足以击破吴佩孚，又有大部湖南军队参加，胜利更操左券，故此次北伐，为我党千载一时机会。北伐成功，我不回粤，两广事任由你处理。倘不幸而致失败，更有何面目重见广东父老，惟有战死一途，决不退回广州，致你受累。你仍是掌握两广实权，与北京商

议和平，自可安心。现在与你商量的，系北伐军饷弹问题，广东频年战争，财政或感困难。但一次筹足饷银 500 万元，子弹 500 万发，作有限度的接济大概不致负担不起。此笔数目，需要多少时日，才能筹足呢？陈炯明答回粤一月后，即可陆续筹备解交桂林大本营，先生到桂林后，大本营内部组织与外部军队整补，亦须相当时日准备，届时，我所筹的饷弹，亦可陆续解到。今次回粤，拟以三个月时间，把军队整补完毕，稍事修养，来春天暖，出师北伐，攻取江西，与先生分道扬镳。将来攻击开始，我先发动，益有可能，因粤北铁路贯通，转输便利故也。孙先生把赵恒惕来电传给电给陈炯明看。并曰：“你若能出师江西，北伐成功必更大。将来继我任国民党总理的人，唯你而已。”

在抚河上，孙先生与陈炯明商决北伐军饷弹接济问题后，陈炯明自梧州东下返粤。孙先生离梧州溯抚河北上桂林，命黄梦熊与粤军兵站总监部接收船只，拨交通辎重大队接管，辎重大队长陆志云，相度船只容量，规定每船乘员人数，编列号次，编制乘员号次姓名表，分给行辕乘员，使按表列规定，依号乘船，维持出发秩序。拨交警卫团第一营及许团的船，由薛营及许团自行分配。警卫队列，行进中警卫事宜，许团负指挥全责。每船给养由辎重大队长陆志云派员按乘员人数发给当日给养一天，到定泊地后，再发第二天给养。航行第一二天，水深，船只都能按次序泊宿，不发生困难。航程第三天，续见滩多水湍，船只已发生超前落后现象，第四天后，发给养的船亦落后，致给养中断。补救方法，每天缩短航程，用轻快船一只，先期出发，到宿泊地，指挥船只，不许超前，但仍有落后，秩序乃稍得维持。梧州至桂林，水程约 300 余华里，大小滩约计 360 个。每数里或一里，即有石滩一或二座，亘列水中，水湍流急，旋迴起浪，狭得仅容一船上下，宽的可并列二三船上下。大船具为载盐上桂林的盐船，舱底满贮盐斤，船户以船租发官价，不肯雇足船夫，每届上滩，并二

三船夫之力拖一船，费时多，航行缓。每日行程三数里或十余里，小船中午已达宿泊地，大船非至晚上六七点不能到达。以300余华里的航程，竟费时18天方达桂林，于此可知抚河航行之困难矣。

散兵游勇、出没飘忽，粤军西征，虽把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宝座推翻，但其残部，群龙无首，化整为零。由此而产生的治安善后问题，大增困难。散兵游勇，百十成群，遍地皆是，啸聚截劫，视为经常。抚河300多里水程，往昔是交通孔道，现在却是萑苻渊藪。船只航行，非军队护航，难期通过。孙先生北上桂林，许团以一营兵乘船为前卫，以两营兵力夹河两岸路行，为左右侧卫，以警卫团一营乘船为后卫。左右两侧卫在行进中间，不时与散兵游勇进行遭遇战。我人在船上，遥看散兵游勇，爬山遁逃，及枪声时作时止，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乘船人员，每以困坐船中为苦，多随军队路行，缓缓前进。军队休息时，有机会与民众叙话，周知邻近情况，反觉精神愉快。由梧州开航时，李总监民宇通知，广西人对广东人甚为仇视，航行中不容易购买给养，须在梧州备足。当时行辕人员，相信李总监的话，多在梧州买备给养，以防缺乏。沿途所见，未发现广西人仇视广东人，且随地皆可购买给养，与李总监通知，恰相矛盾。大抵当时粤军，多是不修纪律，对于人民，予取予求，购物短价，甚至强取，故为人民仇视。兵站人员追随军队行动，所得印象为军队与人民间的举动，李总监据以通知。以是知军队欲向人民取得便利，非先严守纪律不可。

两种经济，两种钞票。广西经济有两种：一种是军事经济，一种是商业经济。钞票通行有两种，一种是广西钞票，一种是广东钞票。军事经济，是陆荣廷统治时期，纸币不兑现。无准备金，他为了扩充军队，硬币缺乏，不敷开支，实行废银元、铜仙等硬币，发行钞票，钞票就是本位，市面上交易往来，只用钞票

做媒介，纸版低劣，伪币充斥，民众一律使用，莫问真伪。钞票分一元、五元两种，角票分五角、二角、一角三种，市面往来行使，多是角票，角票每张可分割成两张或四张零碎使用，通行全省，市面物价，不受到纸币影响。商业经济，是梧州广东商人的经济，权在广东商帮手里，梧州就是商业经济的大本营，广西全省商品交易，通用广东钞票，低折广西钞票，广西一元钞票，只值广东钞票四角七八分，市面行使作五折算，但广东钞票只在梧州行使，梧州以外不使用，须用桂钞（广西钞票）。离去梧州，必须用广东钞票在梧州兑换桂钞，方能在沿途上购买所需物品。粤军入广西，陆荣廷的统治被打倒，陆荣廷的纸币政策却未被摧毁。广东商人虽掌握了广西全省商业实权，只能在梧州低折广西钞票，梧州以外广西钞票并没低折使用。

孙先生所乘坐的船是漓江画舫。李总监特派专员赴桂林租赁来梧州，备孙先生乘坐。这种画舫，专备绅商在桂林抚河上游宴之需，与广州珠江上的紫洞艇性质相同。其富丽堂皇，不及广州珠江紫洞艇远甚，然亦宽敞舒适。孙先生与陈少白、胡汉民及二三侍从同坐。孙先生经常坐船首，浏览桂江景物。沿江居民，利用滩多水湍，在江岸两侧建立以竹为轮周，板为轮齿，木为轮轴，径约丈余的大轮，用竹架支撑，立在江岸两边，比比皆是，点缀漓江风景。孙先生指示曰：“此沿江居民利用水力的水碓发动机也。用时导水冲轮旋转碓因以上下而生动力。我中国人民，并非不晓得利用天然力，徒以因袭根性太深，不肯研究改良。既为沿江水碓，袭用者不知研究改良，故发生动力甚微，只能使碓上下，不能作别的用途。以桂江水势，筑坝设堰，发动水电，足供广西全省动力需用。此河整治，石滩太多，特别困难，不能用疏导方法。应自梧州分歧点起，以迄桂水，由此再溯兴安运河，顺流至湘江，因此以达于长江。于此建多数的堰与水闸，使船只得上升至分水界的运河。他方又建多数的堰闸，以便其下降。为

此，不但解决航行困难，且便利沿江富饶的运输，又可供扬子江流域与西江流域载货往来孔道之用。航行利益，已足偿堰闸建设之费，复利用堰闸建设水电厂，全省得有廉价动力供给，工业因而发展，治一河而得两利，益莫甚焉！”

昭平为梧州溯桂江北上首一县治，去梧州 280 华里，农产丰饶，以油糖为大宗，商业殷盛，水道虽狭而整洁。各界民众以孙先生北伐，道出昭平，机缘不易，咸欲一睹风采，同申景仰，乃联合各界，于 1921 年 11 月 22 日，开欢迎大会，恭迎孙先生莅临训导。孙先生以昭平民众，久处陆荣廷盗党专政之下，不知共和政体与人民的关系，为针对现实，唤醒民众，孙中山做了演讲。阐明本大总统此次北伐，所以救全国人民，脱离官僚专制，使民国为国民所有，民国为国民所治，民国为国民所享，希望广西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好广西。

三

1921 年 12 月 4 日，孙先生师次桂林，以广西省议会为大本营。广西省议会所在地本明靖江王藩邸故址，清初改建为贡院，清末废科举，入为省谘议局，民国成立，改为省议会，今借为大本营。孙先生特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胡汉民为文官长，以朱培德、李福林、许崇智、谷正伦、彭程万分领滇、粤、黔、赣各军，在原驻地集中训练整补，待命出发。大本营组织极简单，参谋处只有参谋总长，文官处只有文官长，其他职员未委任。参军处不设，随行参军副官，归胡文官长指挥调遣，会计处只处长一员，金柜一员，秉承胡文官长命令，辎重大队归参军直接指挥，政治军事外勤等委员由胡文官长统辖指派。胡文官长实等于大本营的总务长。孙先生以北伐军已是战时编制，各军都具独立作战能力，大本营只发号施令，组织可从简略，以节经费。抵桂林之初，忙于会见各军高级将领，个别垂询军情，讨论战争形势，及

敌我情况，对外勤委员，指示工作方针。

当时，我向孙先生提出（一）南北军队的配备，与作战技能的特殊，将循何道统一中国。（二）北伐成功后，国都在何处建立为适宜两问题，与孙中山先讨论。我问：南方军队只有步兵，无骑炮兵，南方丘陵起伏港汊分歧，地形复杂。南人生长其间，登山涉水，惯于自然，故北兵南来，鲜有不为南军所击败者。南军能用其所长，而北军则失其所长使然。设我军克服武汉，北出中原，平原旷野，遥远千里，炮骑纵横，马驰车骤，北军则善其所长，而南军即失其所恃。统一中国，将循何道？孙中山先生曰：北伐军克复武汉、南京后，不必挥兵北向，以武力统一中国。首先巩固武汉、南京的防卫力量，用吾人倡导的三民主义，改善收复地区的政治，使政治修明，人民安居乐业。北方人民与军队，久处军阀官僚暴政之下，见南方政治修明，必不甘愿忍受军阀官僚鱼肉，自然趋向南方政府。北方军阀，虽有精良武器与士兵，亦无所用。吾人循三民主义的途径，以政治力量，统一中国，不必需用武力，我问：北伐成功，武汉处中国的中心，为南北枢纽。顾亭林论武汉形势，南船北马，于此分途，实为中原腰膂，建立为民国首都，最为适宜？孙先生曰：武汉地域狭小，外无余地可资扩展，虽擅形势之便，催毅南北，但不适合建立国都要求。北京为旧国都所在，规模形势，均合国都要求。然以久处历代帝王专制政体之下，习染太深，一旦建立为民国国都，易受专制思想包围的危险。故只适为帝王旧宅，不宜为民国新都，将来民国新都，应于南京、西安中选择其一，诸葛武侯论江宁形势，龙盘虎踞。明代朱洪武、太平天国洪秀全，皆以之为首都，有革命的历史意义，洪、杨之后，元气未复，满目荒凉，建立新都，无须多所变革，举措容易，惜与上海接近，又有沪宁铁路纵贯其间，交通太过便利，政府公务人员，受上海物质繁荣影响，习染奢侈，难以刻苦耐劳。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争相盘踞之区，政

府设施，易受帝国主义干涉影响。自江宁条约成立以来，吴淞撤守。门户洞开，外国军舰，直航至此间。中国若与外国发生战事，南京决不能守，政治中心势非迁移不可。西安为古代帝都，擅形势之便，历数朝的废置，专制习染已不存在，后以叠经灾荒兵变，地荒人稀，建立为新都，亦无须变革，有陇海路纵贯其间，交通便利，离海岸甚远，纵与外国发生战事，政治中心不受影响，政府设施更不须防受帝国主义包围，公务人员，无物质繁荣影响，易习于刻苦耐劳。中国沿海各省，海禁开后，文化物质，已有相当进步，可任其随序渐进，无须提倡开发。西北各省则不然。国都迁移后，文化物质日趋低落，人口密度亦逐渐减少，欲恢复西北昔时繁荣，使文化物质与沿海诸省同齐水准，必须提倡开发。故民国首都，西安似较南京为适宜。一国之都所在地，即为全国文化物质的中心点，同时亦是人口密度的中心点。以开发西北言，西安较南京尤为重要。至选择何处，仍须按当时的形势，俟将来决定可也。

四

民国13年秋间，曹、吴用兵浙、奉。孙先生为声讨曹、吴，响应浙、奉友军，亲至韶关督师。以接济补充，诸待筹划，未能立刻解决，只得令北伐诸军，整训待命。江西陈光远，误解孙先生督师韶关，是虚张声势，无进入江西力量，遂派出部队协助江苏齐燮元，夹攻浙江卢永祥。孙中山见时机已至，即下令谭延闿所部湘军、朱培德所部滇军、樊钟秀所部豫军，向江西进发。师行顺利，未几进克万安、吉安。军事正在发展之际，奉直战幕已开。冯玉祥部突自古北口回师北京，推翻曹锟政府，与胡景翼、孙岳等通电停战主和，电请孙先生入京主持大计。孙先生即停止对江西军事进行。由韶关大本营返广州，筹划北上。孙先生告黄梦熊曰：“这回北京事变，不是偶然的。没有发生事变以前的五、

六个月，有几位同志从北京来了好多封信，催我先到天津等候，说不久他们便可在北京发起中央革命。筹划这回事变的人数很少，真是本党的同志不上十个，他们的见解，以为本党革命 20 多年，总是不成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成立民国，还不算是本党的主张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都是由于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少，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所以他们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传主义，布置一切。距此五六个月以前，来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说进行的成绩很好，军人表示同情很多，应该集合各省有力同志，在北京附近进行，只要几个月便可成功。当时各省有力同志，都在本省奋斗，没有能力能够在北京附近进行，而且当时北京很安宁，一讲到首都革命，在几个月便可成功，没有一个敢相信，我自己也觉得很渺茫。到江、浙战事发生以后，他们又来信催促，亦不敢相信，要我赶快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时期就在目前。这个时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如果就广东的计划，由韶关进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汉，然后才想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缓，很艰难的。假若放弃广东，一直到天津去，发动一个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的。我在当时以为要北京有事发生，才可以去。如果放弃广东的军队不用，先到天津去等候，恐怕空费时间，不大合算。所以约定他们，只要北京有事变发生之后，我马上便可以到北京去。当这次事变发生的时候，很像是一个中央革命。我们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了，现在就发生事变的情形而论，可以决定是我们的同志筹划。但是最近中央的力量，不是在革命党之手，还是在一班官僚人之手。拿这次事变的结果看，毫不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他们在北京奋斗费了许多大力，才有这次的变化，变化之后，对于本党表同情的，只有几个师长旅长，普通士兵都是莫名其妙。以少数的师长旅长，来做极大的中央革命，一定很难成功的。就是在事

变发生之初，我便进京同他们合作，想造成一个宏大的中央革命，也不容易做到。不过，经过这次事变之后，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确是有军队来欢迎革命主义的。从今以后，只要有人在北京筹划中央革命，一定可望天天进步，可以造成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并且知道北方的军队筹划中央革命，一定可望天天进步，可以造成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并且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也有天良与爱国心。有了天良爱国心，就可以受革命党的感化。我们从前看到北京的空气龌龊，官僚卑下，武人野蛮，人民没有智识，以为那些人用革命主义的力量，不能够感化。但今天看起来，从前的视察，实在是错误。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现在的事变，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不能说将来不能再起革命。只要此时用功去做，以后或者得好结果。就是能不能得好结果，此时不能预先知道，但是可以推测彻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发生。因为有这种希望，所以我为实践成约，以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到北京去。”黄梦熊曰：“事情既然这样，先生到北京去，有无危险？”孙先生曰：“不会有的，我这次到北京，不但本党同志欢迎，就是各省的反直派，也是很欢迎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自由行动。将来自由行动的结果，究竟是怎样？虽然不能逆料。但为前途发展起见，此时也不能不去。我到北京之后，不是马上就能发起一个中央革命。不过借这个机会，将三民主义带到北方去，作一次扩大宣传的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革命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预先固然不能断定。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便可进行。故今次到北京，不是希望段祺瑞实行我的主张，而是要达到将我的三民主义宣传入北京民众与军队的心里去的目的。你有点耳聋，到北京去，应接频繁；用耳力的时候很多，于你不适宜，不必随我到北京，趁空闲时间，在广州治疗耳病，帮助李福林整理军队，准备继续北伐，我到北京后，决不会久留，大约两

三个月便回广州，那时你回来办理。”

(1966年)

回忆孙中山二三事

潘乃德*

我和孙中山先生接触的回忆，大部分已经写在《孙中山先生对陆荣廷的争取和讨伐》一文里了，但有些材料是不能容纳在那篇回忆录里的，现另编记述如次。

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亡命日本东京。我和施正甫也因广东方面的失败，不能在广州立足，而亡命香港。我们两人都打算到日本去找孙先生，但是施正甫性急，独自一人先去了。施正甫虽然到了东京，见到孙先生，但孙对施不大信任，没有谈什么，施很不满意而回转香港。施往返都经过上海，在上海见到二次革命时南京的讨袁军事溃败之后、跑到上海自称讨袁军总司令的何海鸣，何大肆攻击孙中山先生，并拉拢施正甫。施上了当，回香港后主张抛开孙先生，拥何海鸣做头头。我不同意施这种做法，就接着东渡日本，找孙先生去了。

我到了东京，先找见古应芬。因为我和古的关系比较密切。古的老婆是广西平乐人，古的岳父是广州木材商，小舅子何炽昌在韬美医院学医，和施正甫是同学。我因和施来往而识何炽昌，进而认识古应芬。由古和刘古香介绍我参加同盟会。我的父亲那时在广州行医，租有一间房屋，古分配我的任务是掩护工作，我家屋常有革命同志来往，刘古香就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起义前，广西来的革命志士还是由我带去行街，认识道路和衙门所在地，可说古这段时间是我的领导人。我找到古就问及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怎样，可是古不回

* 作者系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

答我这一询问，而先责备我说：“你们怎样搞的？运动降军一点成绩也没有，使革命受很大损失。”在二次革命广东宣布独立前，古曾叫我和施正甫、苏无涯、邓鼎封、陆爱唐等人去运动龙济光的军队，冀其反正，使济军不能东下，但没有成功。接着钟鼎基叛变，龙济光抵广州。是时有一部分新军，深明大义，举起革命旗帜，反对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并深知龙部队多数是广西子弟兵，派一位连长刘灏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再接再厉，运动济军，我们继续做这工作，也没有成功，使新军不能发难，旋被解散。二次革命广东方面就是这样失败的。我们运动济军的工作没有成绩，当然那也是失败原因之一，但是我们的确是做了工作，陆爱唐就是因为运动济军，被龙济光发觉，在广州被抓去杀掉了。经我解释后，再问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古才说：“还是搞革命。”又说：“搞革命筹款要紧，你在南洋方面有无相识的人？广西有许多华侨在那里。”我说：“相识的人是有一些的，容县的人最多，该县的甘聘图是一个头子，是一个热心的革命者，我认识他，我们贵县也有不少人在那里，筹款一事总可想办法。”于是古转口说：“你不是要见一下孙中山先生？我和你去。”于是古应芬领我一同到孙先生的住处，孙先生精神很好，没有半点因失败而气馁的迹象。他询问我到广西争取陆荣廷的情况，此外，他还对我说了很多话。他说：“这次失败算不了什么！我们再接再厉，再干吧！”又说搞革命首先要筹款，各处都要派人去，筹得多少算多少，新加坡已经派人去了，南洋方面广西的华侨不少，你也可以去一个。他越说越起劲，接着批评陈炯明说：“你这么多军队，钟鼎基叛变开大炮你就走，你不知把军队拉回惠州躲避一下，再想办法反攻吗？”他又批评林虎说：“林虎湖口起义功劳很大，但做事做不好，不应该把部队退到湖南交给谭延闿，这样好的军队不知收容维持他们，真是可惜！你把这支军队带上山或带回广西不行吗？”又说：“林虎是个好军事人才，不自己掌握军

队真可惜！”跟着又掉转谈锋说：“有些革命党人（当时他不指明是谁）想同我分裂，大家搞革命那么多年，何必闹分裂，还是大家合作的好。”最后他说：“好吧！派你到南洋筹款吧。你虽然不认识南洋的大商家，但是不少广西华侨在那里，你去进行吧！那边你不认识人，我写信介绍你认识，你到新加坡，找邓泽如，到暹罗就找萧佛成，和他们联系。”谈后，我和古应芬辞去。古暗地里告诉我，孙先生说有些革命党要和他分裂，是指黄兴。林虎到东京见孙中山先生，几次向孙先生进言，孙说你没有发言权，就是由于不满意林虎自己不掌握军队，而将那支参加湖口起义的好军队带到湖南交给谭延闿。可见有人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先生和黄兴有意见，合作不来，是由于孙先生排斥黄兴，这是不确的。我见了孙先生曾去找林虎，林见面就说：“你又来，我都来错了！来了没有什么结果。”我把孙先生赞扬他是军事人才的话告林。林说：“不！”又说“以后搞革命很困难了，大家意见不统一”，显得意志消沉，比之孙先生那种败了再干、毫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更使人感到孙先生的坚强和伟大。我在东京住几天就回香港转南洋干筹款工作，以后我和孙先生只是通讯联系。

一直到1917年讨袁护国胜利之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国会，是时依参议院选举法，为二年改选参议院议员三分之一，我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到北京报到，道经上海，是时再次见到孙中山先生。（谈话内容见我另一资料《非常国会漫忆》）

孙中山先生率领海军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我也到了广州，孙先生任命我为大元帅府参议，这时和孙先生接触机会就多一些。孙先生要我专做争取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工作，我常常往返南宁、广州之间。到了孙先生被旧桂系军阀排挤，返回上海。而我在南宁打听到旧桂系军阀要进攻驻闽南的粤军的消息，就专程到上海告诉他。这时是1920年。我虽是同盟会员，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我一直没有正式参加。我把应该报告的事项报告孙

先生后，就乘这次机会由邹鲁介绍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宣誓那天，由孙中山先生亲临监督。宣誓后，孙先生对我说：“你们青年人要认真参加革命和彻底革命。你是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生，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认真学习继续深造，前途是大有希望的，将来我们要搞大同世界！中国有直接阅读和翻译外国文能力的人是很少的，我们不但要阅读而且要翻译外国的书籍，知道别人怎样搞科学，我们迎头赶上，才好搞大同世界。”又说：“你是年轻人，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和癸丑二次革命你都做了一些工作。在我看来，我们搞革命就得自己抓军队，拉拢军阀是靠不住的。以前，我们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党人没有抓军队。以后，我们革命党人一定要搞军队。你们回去运动桂军反正，或是撤退时不撤到广西接受改编，你搞到军队也可以成立一支军，由你抓起来。”从这次谈话，我得到了两点体会：一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情报的重要，孙先生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虽在革命斗争中也没有忘记它；二是孙中山先生过去对某些军阀（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就是其中之一）很有幻想，但事后事实证明，这些幻想终归破灭，他接受了经验教训，深深感到搞革命非得搞武装斗争不可，搞武装斗争非得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有建军的思想，以后黄埔军校的成立和党军的建立，就是这个思想的实践。

1924年冬，孙先生北上，经日本到天津入北京，到北京后就卧病了。那时我在北京参加国会，1925年2月间我去探视孙先生，那时他的病已很沉重，医生只许客人探望，不许谈话。我见了孙先生，但只点头示意而已。去时，恰巧张继和邹鲁也去探视，他们同样不许和孙先生谈话。我看见孙先生慈祥的面容很清癯消瘦，心里很是难受。探望过后，由汪精卫代表孙先生和我们谈话，他着重传达孙先生的指示，叫国民党人不要参加段祺瑞所召集的善后会议。那时孙先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而北洋军阀头

子段祺瑞则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孙中山先生反对段这个反动善后会议，到他临终时也坚持他的革命主张，毫不妥协。

(1966年)

难忘的教诲

朱仲华*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还在中学时期，记得是1916年8月，中山先生到我的家乡绍兴。绍兴各界人士在城内花巷觉民舞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山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当时我正值暑假回家，闻知这一消息，赶去参加，得瞻中山先生丰采，并且听了演说。那时中山先生虽属初次莅绍，但对绍兴很熟悉，讲演中指出绍兴是卧薪尝胆之地，报仇雪耻之邦，为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出现了不少志士名人，特别是徐、秋、陶三位烈士。他鼓励绍兴人士，发扬继承这些革命精神。谈到绍兴市容，他很中肯地列举了许多不足之处。这次听讲，在我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象。1919年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我那时已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迅速投身于这个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我被推为复旦大学学生会的会长，又在全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中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那时中山先生也在上海，对学生爱国运动非常关怀，经常接见上海的学生代表，指示斗争策略。为了工作需要，我同几位同学，有机会到莫利哀路中山先生寓所，多次晋谒中山先生，多次得到教导，特别是当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卖国贼的消息传来以后，中山先生显得很高兴。他操英语对我说了两句话，意思是“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这二句体现了中山先生为求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毕生奋斗的信条，这一教诲使我终身难忘，即使到今天，还是具有极深的教育意义。记得当上海学生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

* 作者当时系复旦大学学生会会长。

学的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敢压制学生参加运动，为华籍学生坚决抵制，毅然加入学联，参加全市游行。卜舫济恼羞成怒，竟无理将学生章益等 22 人开除，赶出校门，事为复旦同学得悉，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征得校长李登辉博士同意，将被开除同学全部由复旦接收，转学肄业。当中山先生闻知此事，很高兴地对我说：“上海是帝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顽固堡垒被你们攻破了，这是同学们团结的力量。”同年 10 月间，中山先生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赞扬五四运动，他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可见中山先生是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分裂的。

(1981 年)

孙中山的若干革命轶事

梁照林*

1923年2月，孙中山先生从沪经香港回广州。我的姑丈李荣介绍我在大元帅大本营服侍孙先生，使我有幸能经常追随孙先生，听到他的革命演讲，从中明白革命的道理。当时由于我年纪尚轻，认识不深。现在已是古稀以上的人了，相隔数十年很多事已经遗忘。再加上1937年七·七抗战起，经过八年离乱，辗转南北，物件损失殆尽，纪念孙先生的东西仅存纪念铜章一枚。现将尚能记得的事作片段的回忆。

一、1923年2月，孙中山先生从沪回穗，当时住东山区农林实验场（原是荒野之地，今为建筑物林立的农林下路）。未几，迁往河南士敏土厂大楼，是为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居住于后栋大楼的三楼办公，我和区恺洪一起侍候孙先生的日常起居生活琐事，常看到孙先生于深夜十二点以后还在寝室内展阅地图，时刻为国家操心。

二、孙中山先生也常到岭南大学（今之中山大学）演讲，与夫人宋庆龄同坐小电船后座；随从人员分坐两边护卫，手提机枪卫士背坐电船尾后作护卫。孙先生看见了即招之返入船中，并说：“不用在船后警戒。”

三、有一次孙中山先生率领随从人员到虎门炮台视察，回时遇有风暴，乘坐之“大南洋”电船由虎门炮台的差轮引至香山县（今中山县）一小河内避风。船到小河内未几，即见一大队人举着黄色旗奔向山上，同时岸上芦苇丛中有人向大南洋电船开枪射

* 作者曾服侍孙中山先生。

击，流弹在船旁如雨点落下水中，只见电船烟囱被击穿数洞，孙先生当时若无其事地从室内走出来，鼓励大家说：“不怕的。”是时卫士分队长谢昇继拟率领机枪卫士冲上岸追击。孙先生即予劝止，并谓：“必系匪类误以为进剿，作先发制人耳。”嘱不要理会。果然未几便平息无事，袭击便停止了。电船平安通过小河向广州回航。

四、1923年6月，孙中山先生赴东江各地讨伐陈炯明，到白沙滩炮台督战，上山时本备有便轿（即山兜）乘坐，孙先生由于体贴工人辛苦，只乘坐一小段坡路便自行上山。孙先生待人不论高低，无贵贱之分，态度温和，平易近人。孙先生常对我说只称他“先生”便可以了。所以随从人员见他时都叫他“先生”的。

五、1923年11月间，在石滩之役中，正当孙中山先生在石滩视察之际，忽闻附近枪声四起，知有意外事故，即令行营秘书李仙根书写一长横幅，上书：“大元帅在，无论官兵，不准退却，违者枪决。”在兵荒马乱中，孙先生由黄惠龙、马湘、区恺洪等数人随护，乘火车先回广州策划一切。当时在慌乱中，卫队长冯振彪不慎被火车碾去十只脚趾，即送返广州急治。当天大本营侦缉队员李荣，昼夜据守石龙火车站，将所得的情况随时用电话报告孙先生，事后孙先生批奖他毫银20元。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大元帅大本营行营设立金库处，金库长黄昌谷印行金库券（金库券五元票面的经黄昌谷签字），运送前方备发军饷。除金库券外，还要搭发部分毫银。我是被派在行营金库处助理押运，这次出发运去毫银2万余元备用。但在混乱中不能分发，这笔款便由我极力保护。当天深夜1时多才返抵广州，全部毫银安全押运返大本营，后蒙孙先生批奖我毫银50元。

六、孙中山先生的日常生活很简朴。每日早餐甜品一碗；除午膳外，从不吃杂食；每餐青菜、蒸鱼、炒蛋各一小碟而已，青

菜尽吃，鱼和蛋必剩余；经常只穿麻帆布衣服，不抽烟，不饮酒，但不反对别人抽烟和饮酒，且以好烟好酒款待宾客。

七、孙中山先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例如：1924年8月，商团私自非法运进武器被扣，商团便勾结英帝国主义威胁革命政府，英帝国主义声言要以炮轰革命政府来恐吓。孙先生则说：“广州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拥有主权，你们无权干涉，你们要开炮就开吧！”结果英帝国主义的横蛮气焰被孙先生的正义和勇气所压服了。当时民众都很敬佩孙先生这种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

八、惠州城高墙厚，有铁铸惠州城之称。陈炯明叛变失败后据该城顽抗，孙中山先生发动讨伐，屡攻未下，因而计划在该城根下埋藏鱼雷以爆炸城墙。当时派鱼雷局长谢铁良负责由黄埔鱼雷局用木船载运鱼雷前往飞鹅岭角，准备爆炸惠州城。在该城江面，因搬运过程失慎，雷管爆炸，全船被炸毁，人员死伤殆尽。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航空局长杨仙逸是日午膳后同到鱼雷艇上访问谢铁良，因此一同殉职。翌日，孙中山先生与随从人员到附近海滩视察情况，见有一大捆粗铁缆被炸至岸上。孙先生即命人到该地详细观察，找到一只手掌，其中一指上带有一金戒指，认得是苏从山之物，但苏从山的尸体不知去向。又在博罗停有一架水上飞机，晚上挂上红灯标志。第二天早晨，守机人员收取机上红灯时发现杨仙逸的尸体就在机旁绕着转，故得回尸体。至于谢铁良等人的尸体已全被炸毁。当时我因脚伤没有跟孙先生出巡，就留在石龙附近的船上（“大南洋”号）。事故发生当天下午4时许，我在船上看到水中有一人头涌动。我即呼叫，船上的人便放电船去把这个人救起，问他情况。据说他潜入水下很深，还感有破片落下，幸未被击中，料生还者无几，云云。据已故莫雄同志谈，惠州城确实坚固，攻破它是花了不少代价的。

我的姑父李荣原是远洋轮船海员，又是海外筹饷委员，在

1923年2月间孙中山先生由沪经香港回穗时，我姑丈即脱离航海，在香港海外联义社侍卫孙先生回穗，充当大元帅府大本营侦缉队队员（便衣警卫）。当时侦缉队长是陈龙韬，侦缉队员还有区玉、陈章、侯灿、梁东、林耀光等（其余记不清了），当时区玉兼充孙先生的厨师。林耀光兼充理发师。1924年10间，孙先生北上北京，区玉因年老未跟去，于是厨师由李荣和梁东兼充，随孙先生北上。孙先生不幸病逝北京，李荣在西山碧云寺守灵数年，直至孙先生奉安南京紫金山时，随赴金陵，至抗战时才返广东原籍，解放前去世。

（1980年）

关于孙中山的几点回忆

戴 岳*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实，我知道得有限，兹就身受训海的几点概述于下。

一、救国救民的号召

1924年2月23日谭延闿所部建国湘军第二军奉令由北江南雄、始兴调赴广州附近的江村，准备东征。孙中山先生为了激励士气，曾亲临校阅，戴岳时任该军第二师师长，担任阅兵指挥。孙先生校阅后向全体官兵作了约两小时讲话，题为《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大意是革命军是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有革命主义和革命目标的不怕死的人，是不扰民的军队。革命军应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作战要以一当十，能以一千人消灭一万敌人。他说广东现在虽有十多万兵，但不能说是革命军队，因为他们都是用一个去打一个敌人，他们不十分懂得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也就是说革命的军人只有先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才能发挥高度牺牲精神，他举出了黄克强先生在钦廉之役的例子。他说：你们是湘军，是从湖南来的，湖南老革命党员黄克强曾有一次由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抵抗革命军的清兵有两万人，黄克强带的兵不过两百多人，所有武器不过是两百支枪，用那么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了两个多月仗，至弹尽而援不至，还可从容退出。从这样一战役来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打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

* 作者当时任建国湘军第二师师长。

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这种精神不是别的，这是信仰三民主义具体体现。他为我们讲三民主义内容后，指出要实现三民主义之目的，对内民治民有民享，就得打倒国内军阀，澄清吏治，对外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希望湘军成为实现上述目的的革命军队。回忆孙先生此次讲话，不但给当时全体官兵以极大的勉励，而且深深地了解到只有真正的革命武力才能贯彻救国救民的主张，孙先生此后决计创建黄埔军校，其目的就在乎此。可惜他逝世太早，在北伐胜利中途蒋介石又背叛了他的教导，革命目的终未达到，这是孙先生所未及料的。

二、为国家统一随时不忘北伐

1924年10月25日，我接到韶关大本营行营电话，谓大元帅即时乘车来马坝准备到南华寺一趟，希望到车站迎接等语。我师部距车站有三里多路，我接到电话后，立即率兵一连赶到车站欢迎。我到车站，而孙先生早已到车站对面西山游览去了。我即前往照顾，见随孙先生游者只夫人宋庆龄与苏联顾问以及随从副官卫士等共10人，正从山上缓步下来，回到车站后，对我说：“身体不大好、南华寺今天不去了。”于是邀我到车上一谈，我当面报告了部队休整情况。孙先生问道：你知道北方最近发生新的变化没有？我答不知。他说：奉直交战，冯玉祥倒戈，曹锟已被囚禁，北方正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是我军北伐的大好机会，时不可再失，希望传知众将士努力杀敌等语，言时极为兴奋。我答：早已做好了准备，一有命令，即可率部队讨贼。孙先生莞尔道：“我国目前还处在军阀割据局面，舍北伐彻底打倒军阀、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外，没有其它道路。”至今回忆，言犹在耳。

三、一生好学病中不忘读书

孙先生一生好学，手不释卷，虽在病中亦不忘读书。他在韶关时，我师炮兵团担任外围，有一次我因事晋谒，时先生患病初痊，养息于平台靠椅之上，孙夫人坐在一旁，为之读外文报纸。先生不但喜研究政治经济，对军事亦具有远见。我记得当陈、叶诸逆遭受严重打击、损失惨重窜回老巢之际，彼时孙先生极力主张以滇桂军攻惠州，湘军全部乘胜由南雄、始兴取道三南（赣省的虔南、龙南、定南）直捣潮梅，谓陈逆惊弓之鸟，腹背受敌，东江可一鼓荡平。当时各将领以后路安全为虑，请绕道羊城、增城，先攻河源，以致拖延半载，使陈逆得以准备。假使当时遵循孙先生的指示，则东江早已肃清了。事后，我们钦佩孙先生的远见，悔不听先生之言，但已追悔莫及。

四、抱病入京参加国事会议

曹、吴失败，段祺瑞出而执政，电邀孙先生入京共商国事。先生行前在韶关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者有谭延闿、卢师谛、宋鹤庚、朱培德、吴剑学、路孝沈、王均、戴岳等约30人。先生首先说明了北方情况，顺次询问每个将领对他北上之行有何意见。我记得当时赞成北上的只有谭延闿等3人（其余两人记不起名字），其余都不赞成。我当时亦以先生病体及北上安全为虑，表示似应从缓成行。孙先生当即指出：我为国家民族，生死早置度外。目前段祺瑞的政权还处于过渡状态，难于持久，才发电邀我北上。我为国家而去，如能使他改弦更张，国家之幸；万一斗争无效，我更师出有名，不必以我身体为念，望各将领努力革命事业。会后即乘车赴广州，转轮北上。孙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主张，毅然入京，其影响之大，

自不待言。而我与孙先生从此就成永诀，但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而且也永远留在全国人民心中。

(1966年)

在新加坡成为“中山信徒”的回忆

张竞生*

一

这是辛亥革命前三四年间事，我被广东陆军小学开除后（因为我的错失是为调整同学食桌位置事，本来校方可以准许降级复学的），我不愿再读陆军了，不愿为清廷军官去屠杀汉人了，遂与一位王姓同学到新加坡跟随孙中山先生做他的革命信徒。

说到这间陆军小学派头真不小，两广总督兼任为挂名校长，另派一位日本士官毕业生韦某为监督。这位监督不学无术，十足官僚，校务不管。可是幸而我们有一位副监督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大家赵声（伯先）先生。可惜他无实权，只好自己读书与物色一些革命种子。赵先生在日本读书时，已接受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回国后，为新军统领，因有革命嫌疑，遂降调为陆军小学副监督。在我们数百名学生中，他详细物色了一些革命种子。怎样物色呢？那时，我们同学中不过几人自行剪发。在清廷制度之下，若无保障，便有革命党人的嫌疑，不留辫子便有杀头的可能。我也是自行剪发的，这便是给予赵先生目为革命种子的标志，因而常叫我到他房间闲谈，便给我《扬州十日记》等禁书，这些是记述清兵屠杀汉人的实录。又给一些《民报》，这是鼓吹革命，铲除清廷的极有力量的宣传品。赵先生后来在广州“三·二九”起义时，领导一班革命同志做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幸，这次起义仍然失败，他幸而脱离敌人虎口，逃到香港，因积

* 作者系同盟会会员。

劳而病死了。

那时在新加坡，中山先生住在一间二层的小洋楼。当我们谒见时，先生先对我们批评思想上的错误。先生说，做革命党人要先做清廷军队的人物，然后才能得其军权去打倒他们。故先生劝我们还是好好地回归中国，如能加入军队更好，否则就做了革命的宣传者与实行家；至于说到介绍到欧洲留学一事，先生说他的财力实在不能支持。

往后，先生向我们详细介绍他暂时在新加坡所做事，计有三项：首先揭发保皇党的无民族性与虚伪。先生说保皇党寄托满人实行的新政是全套落空的。因为此时执政是慈禧太后一派，腐败到不堪言说。至于光绪皇帝已被禁锢废黜，即使他能复位，也不能有何作为。他不过是一个少爷派，毫无学问与政治才能。戊戌变法所以失败，便是证实光绪的少不更事，毫无政治手腕，以致被慈禧派所击倒。至于六君子以及康梁诸保皇党首领也都是书呆子，不晓得怎样执行新政治的。故就国内外时势看非用武力把清廷打倒，一切新政是无希望能实行的。其次，先生说到团结华侨一事。他说南洋华侨素有洪门的组织，这个灭满复汉的社团是有深长历史性的。我们正好从华侨的爱祖国本性，联络洪门一切人物，鼓励他们第一脱离保皇党的影响。第二团结华侨的革命力量，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为祖国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第三，中山先生对于如何在海外组织一班青年回归中国实行革命事业事，因为事属秘密，只向我们说些大纲罢了。

一个多月在新加坡追随中山先生学习其革命学说与实行工作，我们得益良多。在别前有一日反对党报纸上登载有广东清政府近密派两位青年（暗指我与王同学）来新加坡暗杀中山先生一件奇闻。我们知是反对党故意造谣，只好付诸一笑。别了，这个短短在新加坡为中山先生信徒的时间，使我们终生烙印在心脑中，虽不能为轰轰烈烈的革命领导人，但也成为革命马前的一个

小卒了。

二

说到那时广东陆军小学的组织乃由北京陆军部直接统率的，所以两广总督兼任校长（挂名不到校的）。每年设有一班一百学生。第一班学日文，我是入第二班习法文的。照章每班三年毕业，再入南京陆军中学，又升到保定士官学校，毕业后就为军官。

因为重视这个军校，所请的教员都算优秀。尚有校医是日本人兼教生理学。此外，有四位日本军官专教操练。故名为小学，一切课程都等于当时的高级中学了。这间学校设立在黄埔江岸，风景宜人，每日散步于江边，共唱我们音乐老师在日本与友人合作的《中国男儿》长歌。这是一首激昂慷慨的好歌，有如世界闻名的法国国歌《马赛曲》一样，它开头是高音昂扬“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连接数十字，字字激昂慷慨。

总之，这间军校是具有革命气氛的，我们在其中自然接受了好多革命思想。况且，副监督赵声在其中秘密地散布革命的学说。他当然看我们的年纪不过十六七岁，也是可作为“革命种子”，但尚不能为革命实行家，所以他对我们只暗中供给一些革命禁书。每当我到他房间时，他极力勉励我为革命党人，奉行孙中山先生学说，实行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宗旨。赵校长在校中活动少，但时常到广州联络革命同志。

说到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所住的小洋楼（街名已忘记），这是一间极普通的二层小洋楼，离市中心不太远。孙先生极少外出，专心在住所接客与策划革命事宜。外出的职务都由胡汉民去执行。

我被孙先生接见了三次。第一次，他对我说及他在日本、南

洋与国内的革命计划。着重在对我国日本留学生——尤其是学陆军者的革命学说的宣传，以及他们回到国内的革命行动。他说我国的留学生受了日本人歧视的刺激，并觉悟到本国不革命即要亡国的教训，故将来国内革命，日本留学生一定会起领导的作用。

第二次，先生对我发挥他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创议。他详细为我解释，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与节制资本，二政策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申说别种社会主义政策，就那时说尚未适合于我国的需要。但先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后，其他的社会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也可逐渐推行。

第三次，他对我详论系统的革命学说与革命行动，并且推论到一切学问总要做到系统，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我在此极端感谢先生的教训，到今日我已 77 岁人了，尚在尊承先生的遗训，专心在写就“哲学系统”一书。

第四次，当我往见时，胡汉民下楼说今日孙先生极忙，不能接见，就由胡同志代表，说先生劝我应从速归国，好好跟随赵声先生实行革命的运动，云云。

(1965 年)

中山先生关于“系统”的一番话

张竞生

当我第一次从法国留学十年回广州时，适孙先生任大总统，正在积极举行北伐统一中国，我与张继专诚晋谒。孙先生知我新从欧洲归来，格外欢喜。在来晋谒之前，我已经准备一个专题，即“系统”的问题。我说：“我觉得欧洲人比我们中国人，无论学问上与做事上，都较有系统地去干，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说到此时，顺口念出 *systemence* 这个欧字。孙先生听此大为兴奋。他本有大演说家的口才，这次对我们更加发挥他的天才，滔滔地把这个“系统”问题一直说到两点多钟。我在此惭愧地不能全部介绍出来，只好择要来说一说。

孙先生说：“欧洲人因为普遍受科学的教育，所以做事较有系统。因为‘系统’就是对一种学术或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有始有终，认定一种有科学性的步骤去实现。例如我们的革命说，我们认定中国的革命即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是符合科学性的世界潮流，一定必能实现的。所以不管在辛亥以前若干次起义的失败，我们总不灰心，一直坚持革命的精神，继续苦干下去，所以得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幸，这个成果被袁世凯及一班军阀所盗窃，以致今日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我们仍然继续革命，主张北伐统一中国，以完成前此革命系统的事业。”

说到此，张继起立说：“外间如陈炯明辈说革命到今日已许久了，永久在革命，在破坏。应该是建设的时期，不必去再说到什么革命了。”

孙先生微笑说：“革命目的在建设，但建设的目的又要在革命。革命—建设，建设—革命，二者是相因而至的。这个真理为

陈炯明辈所不懂，所以他反对我北伐的主张。”

继而，孙先生对我说：“你就要去潮州任金山中学校长了，我们就来谈一点教育系统吧。所谓教育的系统，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是要有一个统一的系统逐步去发展的，完全不是如现在一样把它截开为几段的。故好的教育，在小学时期已教学生们具有科学与文艺初级的具体学问。到中学不过把这个初级的发展为中级，到大学发展为高级而已。这其间的学术，不过只有初级、中级与高级的分别，但根本的具体的学术是一样的。例如以最高深的天文学说，小学毕业生已能了然于所识天文学的大纲与具体的一切学问了。他们比大学的天文系学生，不过是初级的学问，但天文的一切具体的学问，并不比大学生为缺少。因为要这样，因为我们尚以小学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所以更要把一切科学与艺术在小学中建立一个整个的系统，然后人民普通文化的程度，才能在社会事业实践中逐渐提高。”

说到此，我起立向孙先生说：“我在法国看到一本社会主义者的书，主张国民的普及教育应以大学为标准，即使人人不论男女，当读到大学毕业……”

孙先生说：“我已看到这本书了，本应是这样的。可惜现在各国只有少数人得到家庭财产的优越关系，始能读大学，而大部分国民被排斥于大学的门外了。在这个科学昌明，世事复杂的时代，人人要有高等的学识，即人人要大学毕业，才能对付得好的。希望我国的经济充裕后，规定以大学毕业为国民普及教育的标准吧。”

谈论的末后，孙先生更加兴致勃勃然为我们纵谈世界的大势说：“苏俄已成功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它定能逐步达到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不过就我国现时的经济与人民的文化说，我们主张先从‘国家社会主义’入手，即把许多公众事业如矿产、铁路、银行等划归国营。至于普通工商业与农业暂由人民去自由经营，

但须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政策，以限制个人大规模的掠夺与剥削。”

在这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也可说是训话中，孙先生在电扇挥动之下，神采奕奕，然不吸烟，不饮茶，毫无一点的倦态，滔滔然如长江大河的讲演，时时夹入诙谐及譬喻与许多举例，使我们听者，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大革命家，而同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哩。

谈话毕时已到晚五点多钟了，孙先生向张继说你可去约吴稚晖老来一同晚餐，我有些话向他说。

张继去后，孙先生带我从那时的总统府（现在的中山纪念堂）后门一条木架的走廊上到达孙先生的寓所——一间木屋，内有一小厅与两间小睡房（现在竖立一个纪念碑，题为“孙先生读书治事处”），我们就在厅中晚餐。

食桌中，有一个大型的冬瓜盅（即把一个冬瓜割去一片头，内放入鸡肉火腿等好汤菜，把它整个煮熟的，这是广州的普通名菜品）与几盘普通的菜蔬。不饮酒，不吸烟，我们亲热地饱吃了一顿。

在席中，孙先生特向吴稚晖说，望他好好向陈炯明开导，劝他好好地赞成北伐的政策。并批评他与吴佩孚的“联省自治”的主张是要不得的，是各军阀割据各个地盘的一种借口云云。

素性大滑头的吴稚晖那时是倾向于陈炯明的。他面对孙先生不好表示反对，只说“先生北伐的主张是对的，但时间尚有问题，不必太急吧。只好等待适当时机，进行未迟”云云。

（1961年）

回忆孙中山先生几席话

叶菊生*

忆辛亥武昌起义，先生在美国得讯，乘船经欧回国，抵香港后，我同谢良牧等随先生乘德国邮轮同赴上海，那时我才识先生。先生态度和蔼，谈起国事，勉励我们说，革命前途荆棘尚多，你们青年要为革命尽力，为国家尽力。这几句话，我终身不敢忘。

1917年，先生率舰队及国会议员南下护法，道经汕头，住莫擎宇寓所，我和李次温去谒见，座中有章太炎，陈炯明亦随同南下。我问先生，革命是一定成功，我国幅员辽阔，南北风气究竟有些不同，南人重改革，北人重保守，可否如欧洲的奈渣兰半岛，分为比利时、荷兰二国，使南北各自发展，将来再徐图统一？先生说，南北风气有殊，思想不同，但亦不能一概而论，张溥泉不是北人吗？先生那时已决定要出兵北伐，统一中国，故不赞成南北分治。

先生度量宽宏，常以忠恕语人，尤重一个恕字。1922年，先生出师北伐，陈炯明主缓进，左右不善于维护，因此搞成孙陈分裂。及叶举叛变，各省军队联合致讨，先生犹谓陈炯明可赦，叶举不可赦。这是当时的同志皆知道的。

(1961年)

* 作者系同盟会会员。

关于孙中山先生二三事

韩 锋*

一

孙中山先生，每去纽约，必寄住新会赵伯索所开的餐馆，亲如家人，不另设食，与伯索一家同餐。视伯索的儿子士覲、士养、士南、士骅如子侄。先生每告匱乏，伯索视望颜色，已先知之。不待先生开腔，伯索即源源接济。1921年，先生以伯索年事已老，令将纽约餐馆歇业，举家返回广州。当北伐师次桂林时，先生任士覲为军粮局长，进驻全县。出发时，先生除令警卫团营长叶挺派第一连连长李扬敬率全连士兵随行外，并在众卫士中，挑选老成练达者四人，护卫士覲。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伯索被吓身死，葬黄花岗斜对面一土阜上。1924年6月19日，23岁的越南青年范鸿泰，在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轰炸越南总督梅林，没有命中，被迫跳水牺牲。翌日，先生不顾法帝国主义的抗议，毅然派人在珠江河面打捞起烈士的尸体，命士覲择地安葬。士覲转以命我。那时我在市工务局为测量主任，将烈士尸体，葬在伯索墓地的土阜脚下。使行人经过，皆得瞻仰。坟作馒头形，油白色，斜对马路。碑用黑石，隶书“越南烈士范鸿泰之墓”，字大平方十厘米，涂红色，为测量员史箴手笔（1958年，市人委重建烈士陵园，将烈士遗骸，移葬太和冈上）。先生死，士覲失所依倚，脱离政治舞台。士覲本患有肺病，故久未结婚。至是拜虚云老和尚为师，受剃度，修密宗，释名德圆。数年后，

* 作者于1924年为广州市工务局测量主任。

坐化六榕寺中。

二

先生毕生接物待人，皆非常厚道，观其对待老同志李杞堂，即可见一斑。李杞堂小名阿北，籍新会，是一个寄住西关的富豪子弟，又是华侨。粗识知无，惟醉心革命。政体改革后，新任财政部长为李煜堂，人多误认为李杞堂。李尝对人言：“我有百余万财产，嫁去九个女孩子，妆奁费用去9万。大冈那个金矿，亏去40多万。其余尽花在革命上面”。1921年北伐时，先生任命杞堂为大本营庶务部部长。有人问先生，杞堂连一张电报底稿，也起不成功，怎能当此要职？先生笑答：“部长名称好听，其实一无实权，手下仅得两个助理员，一个还是西关少爷，和杞堂一样。”因此，杞堂天天咬着个烟斗，闲得厉害，到处找人聊天。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谈洪福瑱（洪秀全的儿子）那件事情。单是那个瑱字，拆开来看，便是真王，就够他谈了半天（我听见人说，他年轻时，就因有人假冒洪福瑱，骗去他好些银子）。1924年，先生知道杞堂为搞革命，直到破产，晚景颇为萧条。适值赵士覲在新设的民产保证局，辞去局长职，遂介绍杞堂继任。多得士覲搞开了头，所以杞堂在民产保证局任内，顺顺利利，得到一笔钱，够他晚年浇裹，民产保证局便从此撤销。

三

1912年2月13日（即溥仪宣告退位的第二天），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先生在此期间，曾回粤一行。广州各社团，欢迎先生于东堤东园。是日忙煞了东园管理人郎瑞生，把东园布置得庄严肃穆。主人中谈锋最健的要算省议会那十位女代议士。就中除张沅（女师校长）和庄汉翘（人呼为庄伯母）、黎金庭、郑妙卿年龄稍长外，其他如梁绮川、易粤英、

冯文凤、伦耀华、李佩芝等，尚属妙龄。我还记得那天，先生作长篇演讲，其主旨所在，不外后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2字的扩大影子。最后节目摄影留念，先生坐在正中，左边为梳日本头的女秘书宋霭龄，右边为顶反正髻的瘦削女公子孙婉。将散会时，突然加上一段小插曲；有一个西装革履土头土脑的来宾，将西装裤子反穿，把开钮门那边，穿在屁股后面。纠察员丛生疑念，搜其身上，搜出两广陆军测绘学堂庶务员谭启标名片一叠。即打电话去测绘学堂查问，堂中主事人李孔昭亲来，认出是制作测量规标的木匠谭启，南海人，为人诚实。他非常仰慕先生，极思一瞻丰采，诚恐不得入场。乃购置西装革履，刊印名片。又怕以木匠身份，不能参见总统，故冒充庶务员。经李孔昭询明，由李带回了事。这虽小节，亦可见先生深入人心。

四

先生这次回粤，是同胡汉民一同偕行的（粤东反正后，胡汉民任正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先生调胡汉民至南京总统府当秘书长，正都督由陈炯明暂代）。陈炯明的爪牙，见汉民随先生回来，皆为之失色，欲拒绝其复任都督，以维持陈氏已得的地位，想出个极端拙劣的阴谋。当某日报界公会欢迎先生时，有人提议，请先生继任广东都督。先生笑说：“我任都督，和汉民任都督一样。我这次回来，是送汉民复任都督的。”于是提议者不敢再言。汉民复任都督，更无人敢持异议。十年后，陈炯明背叛先生，其远因已种于此时了。

五

先生驻节桂林大本营时（在独秀峰下，前明桂王朱由榔故宫），每餐与夫人、胡汉民、陈少白四人同食，所食多素菜。伍

老廷芳曾到桂林探望先生，亦加入同餐。伍老晨起，必食燕窝、花生肉，煲冰糖一碗，以三滚为度，谓能养颜益老，劝先生照样服食。先生笑却之。先生身边有两个厨子，一老一少，老的名区玉，少的名林荫生，皆属华侨，追随先生有年。那时我们住在大本营前、中、后座两边的厢房，区玉房门口，贴上“区玉先生寓内”小纸条一张。某日，先生行经区玉房门口，以手杖笑指小纸条对同行者说：“区玉乃孔明先生后身”。区玉本番禺石壁乡人，我返家乡，改经石壁，见临河码头上，竖有巨大石碑，上书“区玉码头”四大字。先生死后，人皆厌区玉老气横秋，不多理会。仅在各大机关，挂上个名字，支一份干薪，竟侘傺无聊以终。林荫生际遇，和区玉不同。任过博罗县长（林为博罗人）、南番沙田局长等职。

六

1912年8月，先生抵京不久，广东同乡在虎坊桥开会欢迎先生。当时有琼州人陈治安（曾留学日本，其岳丈吴某，为琼山县著名巨富），提议请将琼州改省，先生非常同意陈的提议。当场将琼州的重要关系，及其形势、物产、人口、气候等等，如数家珍，一一阐述无遗。旁及榆林、龙门（在防城的犀脚附近）的开港计划，对于该两处的水深、流速，亦非常熟悉。足见先生的建国抱负，其高瞻远瞩，诚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七

1925年底，八属联军将近失败时，总部参议余同信（字仲孚，台山人，毕业广东武备学堂后，送日本振武学习，预备转入第六期士官，因体格不合，改学法政）携同日本妻子，从琼州海口，乘日本商船赴香港。在船上与众乘客聊天，因先生去世不久，故谈及先生。余大放厥词，对于先生，诽谤备至。说：“先

生是个理论家，所言皆属纸上谈兵，实际不能做到，难怪人称‘孙大炮’。”语为船上广东籍的海员所闻，皆愤愤不平。准备船一抵港，登岸时即将余痛殴一顿以泄愤。日本海员通知余妻，余妻转告船主，请求保护。厥后船将靠岸时，由船主雇电船，将余夫妇接去。由此可见一般劳动人民，对于先生的热爱。

(1965年)

我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片段回忆

姚雨平*

我曾于辛亥前后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过去我曾为《广东辛亥革命史料》提供过《庚戌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二九之役》和《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两篇资料。本文就我所知道的辛亥前后的史实，对该两稿作一些补充，并对广东出师北伐后的情况作一些忆述。

一

乙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除致力于革命党本身组织工作外，对武装斗争工作特别重视，认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凭“改良”“维新”是不能达到目的的，非进行武装革命不为功。是年，我肄业于岭东同文学堂，发愿革命，旋转入陆军中学与陆军速成学校，该校学生不少受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熏陶，我便和一些同学在校内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布下武装起义的种子。至丁未（1907）年陆军速成学生十余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被校方以“学术无进步”为理由革退。这批人离开学校后，就更有时间来做革命工作，于是加入同盟会。入盟后，承担同盟会交给的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任务。

二

革命党人在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进行工作，非时刻提高警惕重视秘密不可。我曾在姚氏书室（在马鞍街即今维新路）设立

* 作者系辛亥革命时广东北伐军总司令。

联络机关，本人在晚上则住在距离姚氏书室不远的三槐堂楼上。姚氏书室前面厅堂租给一个裁缝师傅作为缝衣档。我们就利用这里作为和各方面联络的地点。因为姚氏书室是姚姓人的公共场所，人多一点出入，不致惹人注意；二来前面有一个缝衣档，顾客来往多，出入的人再复杂些也不成问题。三槐堂是全省的王氏宗祠。当时有一个同盟会员王狮灵（嘉应州人），住在此处，他为了掩护我，邀我同住，为策安全起见，叫我住在楼上“魁星点斗”神像后面的阁楼里。举凡有关革命策动的联系工作，属于普通一般的接洽，多半在姚氏书室进行，如果比较机密或比较重要的人则约到三槐堂。

王狮灵的祖父是清代翰林，他本人亦有学问，当时他担任广府中学的监学。广府中学由丘沧海（丘逢甲）任监督（即校长）。丘在当时具有相当声望，监督之下设监学（即今学校中的各处主任），那时该校有五个监学，郭德庵（大埔人）、王狮灵、何公博（兴宁人）、丘冬友（蕉岭人）、林鲁传（平远人）。广府中学在当时是一间有名的学堂，在该学堂当监学是相当受人敬重的。后来在保亚票运动失事后，清廷认为为首的系嘉应州姓王的，大概系指王狮灵而言。

同盟会在华南方面的总机构设在香港，以香港《中国日报》为联系的场所。《中国日报》系孙中山先生命陈少白创办的，以后交由冯自由负责主持。我经常来往于省港之间，到香港联系工作，大多数到《中国日报》接洽，住则多半在广嘉兴客栈。广嘉兴客栈是当时香港电报局总办温佐才开设，由其侄温葆六经营的。温葆六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嘉兴客栈也可说是同盟会的招待革命党人住宿的机构。

三

由于孙中山先生组织革命团体一开始即注意武装斗争，所以

同盟会成立后，积极加紧布置各地武装起义，以图早日推翻清朝。我于丁未（1907）年加盟时，适逢黄冈起义。在这次起义前，我曾到香港，有一个时期与许雪秋同住在兰桂坊。孙中山先生于丙午（1906）年委任许雪秋为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嘉一带起义工作。许是潮州人，他首先在黄冈地区（饶平县）展开活动；至丁未，嘱我和张赧村协助许雪秋布置工作，后以我和张二人须负责运动广州新军和防营，工作不宜中辍，又以潮州、黄冈一带土客之见甚深，我二人均系客籍人，不谙潮州话，到黄冈策动殊有不便，遂作罢。因黄冈起义事起仓猝，在发难时许雪秋尚在香港，由余丑暂为主持，迨许雪秋到汕头，起义已失败，许乃折返香港。

四

黄冈起义失败后不久，孙中山先生指示要再接再厉，有可能起义的地方还是要策动起义，并指示要加强新军和防营的工作。翌年戊申（1908）年三月就有云南河口之役，当时党人在梅县松口办有一个名叫体育会的机构，招收人员进行训练，名义上是体育训练，实际则系军事训练，为起义造就军事人才。我曾在该会任教员，布置河口起义时该会刚结束。我返抵广州，当时朱执信曾对我说，党人准备策动河口起义，嘱选派一些懂得军事的人员前往协助，我即电松口嘱曾在体育会训练过的郭典三、黄嵩南、丘仰徽、廖叔唐等来广州，以便商议赴河口协助。郭等接电后，随即起程，并由谭人凤率领，取道海防前往。詎料轮船到海防上岸时，因所携军旗被法国警察搜出，人遭扣留，迨营救保释出来后，已赶不及参加起义，起义旋亦告失败。河口失败原因固多，但缺乏军事人才指挥亦系其中之一。

五

为了配合和响应河口起义，党人在广州图谋策动巡防营发难，清大吏以新军多党人，不可靠。转而以巡防营为可恃，遂以巡防营驻扎观音山及龙王庙等重地，以便于居高临下，在紧急时期监视新军异动。革命党人窥破此点，认为如能争取巡防营，便可联同解决新军。我负责在巡防营发展革命组织，经过一段时间活动，在哨官、哨长中已有多人加盟。按巡防营党人反映，该营官兵大多数同情革命，但表示要举行起义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外面须有配合；第二，支援短枪和炸弹，并设法筹饷；第三，调人前来协助起义。当准备河口起义时，我认为这正是巡防营官兵所提条件的时机，当向党人李文范筹助 1000 元作为协助巡防营发难费；并派人到虎门嘱李济民（虎门讲武堂毕业生，与会党有联系）抽调十余人到广州协助；又派郭典三赴香港筹款和购买一些短枪。郭到香港后找到曾伯谔（港商），曾伯谔过去对革命筹款颇为热心，但这次他却不那么积极，仅筹出三四百元给郭典三，郭买得两支短枪回来。不久河口起义失败消息传到，鉴于外面配合已发生困难，款械筹措又有问题，遂将运动防营起义的计划暂时搁下。

六

孙中山先生对会党也很重视。记得我在丁未、戊申年间，曾由江伯坚（在梅县办新学，富有声名）介绍和五华人会党李少斌联系。李系数代教头，我们通过他，在五华籍打石工人中进行活动。此外又得张伟吾介绍我和兴宁在省的会党中富有信用的刘纯联系，通过他，在兴宁籍织布工人中进行活动。这些打石工人、织布工人后来部分曾参加“三·二九”之役及辛亥光复后参加广东北伐军。此外，上段所说的曾伯谔在河口起义前曾一度比较消

极，迨庚戌（1910年）新军起义后，看到清朝统治脆弱，内部都可以瓦解它们，因而又积极起来，竭力协助革命党人进行工作，除捐资接济外，并以其在广州所办瓷业公司作为掩护机关。

七

在进行会党活动问题上，戊申（1908）年间，革命党人葛谦、谭馥、曾传范、黎萼、严国丰等曾运用类似会党组织形式，运动巡防营以图举义。是年冬光绪、慈禧相继病故。在所谓“国丧”时期人心动乱，葛等运用湘鄂哥老会规程，在巡防营士兵及下级军官中组织保亚会，发放保亚票作为入会凭证，入会者达五六百人。后以负责联系发票的严国丰遗失保亚票被捕，旋葛谦、罗树沧、黎萼亦相继被捕。葛谦、严国丰被杀害。经此打击，事机尽泄，保亚会无形解体。葛谦等的保亚票运动，曾通过姚碧楼（万瑜）、曾传范等和我联系，以便取得同盟会的指示；惟在此期间我因事返乡，他们和我接触不多，工作联系多由姚碧楼负责进行，迨我再到广州时，该会已失败。

八

辛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相继独立，广东亦于九月（阴历）间光复，光复后组织北伐军，由我任总司令督师北伐。广东北伐军系用轮船运载至上海，再由上海经南京北上。当时南京已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江苏、安徽仍在清廷掌握中，南北对峙，革命政府遂有北伐之举。广东北伐军师至安徽、江北，在徐蚌一带时，适北军辫子军张勋部和倪嗣冲部又复相率南下，声言反攻到此，双方遂发生遭遇战，此役北军败绩，广东北伐军取得了固镇与南宿州两次大捷。固宿大捷后，南北议和期间北伐军改名为讨虏军，迨和议已成清帝退位后，以讨虏已成过去，除去“北伐”、“讨虏”名义。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五个军，广东北伐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是姚雨平。其他四个军是：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柏原任安徽都督；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徐一向驻扬州，自称扬州都督（光复前后，只要自己能掌握一部分实力，独据一方，就可以自称都督）；第三军军长王芝祥，王原率领广西北伐军，曾由直隶谘议局推荐给袁世凯仍任为直隶都督，袁不同意，未就任，后被改派为南方军宣慰使；第五军军长朱瑞，朱以后任浙江都督。孙中山先生辞让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后，袁世凯为笼络人心，授给五个军长以陆军中将、上将衔，同时授衔的共有十余人。

广东北伐军由三部分的成员组成。大部分来自新军，其次是巡防营和华侨。新军的步枪械都是六八和七九的新式枪。六八是广东兵工厂造的，较轻便，适合广东人使用。七九式是汉阳兵工厂造的。巡防营多数是旧式枪，间有九响的，还有单响的所谓洋枪。新军且拥有炮兵，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都有。广东北伐军的装备基本上是由新军转过来的，所用的系德国制的新式炮，有18尊管退炮，并有24挺机关枪，在当时来说，已是一支实力相当充裕的军队。但严格说起来，广东北伐军在武器配备上，不过是一个混成旅的实力而已。在固宿大捷时，炮兵所起的作用颇大。但由于炮身笨重，运送殊感不便，当出发到徐蚌一带时，在雪地里，广东马小拖不动炮，曾改用人来拖，相当艰苦。后来在上海买了八匹大洋马才解决了运炮的困难。

广东北伐军内有一部分是由隆世储的巡防营传过来的。隆世储在光复时任巡防营统领，驻肇庆，党人曾传范奉派到肇庆运动他反正，结果运动成功，隆率所部巡防营三个营到南京参加北伐军，改编为旅后，隆世储被任为旅长，曾传范任团长。

广东北伐军经费开始时完全由广东方面负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本身经费都要靠各省支持，广东北伐军费自然仍须靠广东。以后广东方面感到负担有困难，迨孙中

山先生辞让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后，广东北伐军（时已改为第四军）经费理应改由北京中央政府负责。当时袁世凯正进行五国借款活动，遂借口国家财政有困难，要维持这么多军队就要借外债。南京方面对借外债极表反对（曾由各军长联合签名通电表示反对）。为了杜绝袁世凯的借口，只好裁遣军队，以表示反对借外债的决心。在这种种情况下，广东北伐军便自请遣散。广东北伐军自请遣散时，广东都督胡汉民曾来电表示愿尽力筹措遣散费用。

九

第四军（广东北伐军）遣散后，袁世凯对我极其客气，曾于1912年5月间电邀我到北京会见。电文有谓：“……民国肇基，论功盖伟……捍卫江淮，声勋宿著……”。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亦表示愿意与袁磋商国事，并曾到北京晤袁，黄兴也曾前往与袁会面。在这种情况下，我接电邀后（原电系由国务院奉大总统令发出的），遂偕秘书长叶楚伦，秘书谢星桥等赴北京。我到北京后，住铁狮子胡同，袁世凯待以上宾之礼，接见时，十分客气，表示他“谦恭下士”的作风，同时设宴款待，并聘我为总统顾问。

我到北京后曾小住一时期，旋袁世凯派我出洋考察，并给我旅费二万元。我奉派后先返平远原籍省亲，途经汕头、梅县时，当地人民感慕广东北伐军战绩，沿途表示欢迎。我省亲后随即由汕头乘轮到上海，准备到日本去。殊料轮船抵吴淞口时，即听到消息，有一总长在上海被刺（宋教仁曾任农林总长），不禁愕然。迨船到上海登岸抵家（在法租界），行装甫卸，我的弟弟立即对我说，宋教仁被刺已死。我当即赴爱文义路黄兴处询问详情，并到湖南会馆吊唁。我见到黄兴后，黄直截了当对我说：“刺宋的幕后人是袁世凯，你出洋考察应暂时搁下，并希望你将出洋旅费

献出来。”我立即表示同意。

十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刺宋是在1913年3月20日，孙中山先生于3月底从日本返抵上海，认为袁世凯逆迹已彰，必须立即兴师讨袁，于是发动第二次革命。在酝酿反袁期间，我曾奉派赴浙江运动第五军军长朱瑞反袁。因我与朱曾有一段北伐期间同僚关系，固宿大捷，浙军在粤军后一线，对大捷亦有一定贡献，朱对我感情也还不错，故派我前往。我奉派后，即偕叶楚伦等三、四人到杭州晤朱，朱在表面上对我十分客气，除设盛宴招待外，并派参谋长、秘书长陪同游览西湖，但在晤谈时，只要稍为涉及反袁问题，不是避开不谈，便是推说：“关系重大，要慎重考虑。”我卒无结果而返。

二次革命自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随后有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相继响应，至8月底9月初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独立时，为时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当时革命党虽然拥有一部分军队，如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江苏程德全、福建孙道仁、湖南谭延闿、广东陈炯明、上海陈其美（南京则由黄兴亲自掌握），但各省都督不是意志不坚，就是实力不足。如程德全、谭延闿、孙道仁他们是一些清廷旧官僚来投机参加革命的，既无实力，又无决心。表示反袁最坚决的要算李烈钧和陈其美，但李烈钧部仅由一个混成旅扩充而成，实力有限，江西且没有兵工厂，因此力量不足道。陈其美在上海实力也薄弱。至于安徽的柏文蔚的第一军，虽反袁决心比较强，但也兵少实力差，也没有兵工厂。素称最可靠的广东陈炯明部下竟被袁世凯所分化。袁世凯为了瓦解国民党在广东的势力，曾派梁士诒的弟弟梁季典常驻广州活动。陈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独立旅旅长张我权均被收买，据说陈部的参谋长覃鎰鑫

亦被收买。记得当时朱执信曾寄语我说：“覃鎏鑫即将到上海，可能到克强处，此人靠不住，我们要提防他。”后来，覃被袁世凯派到云南活动，事泄，被唐继尧枪毙。

十一

龙济光盘踞广东的时候，革命党人为了瓦解龙济光内部势力，曾于1915年期间由我派罗鄂博到广州龙部进行策反工作。罗是辛亥光复后北伐军师部的秘书长，以后曾任博罗县长。罗到广州后曾和龙部一营长联系，该营长表面上对反袁讨袁极表同情，愿率部起义，但实际上却是龙济光诱捕革命党人的圈套。当时龙济光不但想捕罗鄂博，还想诱捕我。该营长对罗表示“起义准备已成熟，只要姚雨平上来（时我在香港）指示即可发难。”罗麻痹大意，毫不觉察，竟信以为真，曾对我表示该营长性情憨直，说了算事，劝我即命驾前往指导。我认为不可轻信，主张该部先行起义，然后我才上来。龙济光见诱我不成，乃在罗鄂博再到广州时，即下令将罗逮捕枪毙。

龙济光视革命党人如眼中钉，捕杀革命党人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广州有一个叫姚鹿琴的人，是前清拔贡，当过广西的县长；龙济光硬说是我的侄儿，竟将其逮捕，其实姚鹿琴比我年长，更非我之侄，也和革命党无关系，其荒谬可知。姚鹿琴被捕后，几经辩解始免于死。

十二

1918年春当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到达汕头、潮梅一带之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5月间由广州偕胡汉民到汕头，并到三河坝视察援闽粤军进攻福建时经过的战线和指示军事部署。我在汕头曾晤见孙先生并随行。孙先生到三河坝后便乘轮溯梅江上驶到松口探望谢逸桥、谢良牧兄弟，两谢均为老同盟会会员，谢逸桥本人

又是华侨，而梅县华侨众多，素有侨乡之称，孙先生到松口时，便对侨属备加慰问。当地民众曾开一盛大欢迎会，孙先生到会演讲，勸勉民众为革命贡献力量。

援闽粤军到达福建后，于1918年8月底克漳州，总部驻在漳州。孙中山先生曾于1919年6月间促陈炯明自福建回师广东讨伐桂系。至1920年7月间邓仲元（粤军参谋长）由漳州到上海见孙中山先生，请示粤军回师计划。时我也在上海，孙中山先生嘱我即到漳州，协助陈炯明部署军事。我以在“三·二九”之役时与陈曾发生芥蒂，赴漳未必为陈所欢迎，经孙中山先生再三劝勉，最后我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前往，也必须有陈炯明的亲笔函邀。孙先生表示同意。不久陈果然写来一亲笔函，措词恳切，我随即起程离沪到漳州。陈聘我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顾问，并给予优厚款待。是年（1920）8月间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陈在计划回师时，曾询问我，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汕头，我答以共需五天便可到达。陈表示惊讶，并谓如能在十天内克复潮汕已感十分满足矣。我接着说，如果要在十天内才能到汕头，恐怕连漳州都难保了。我建议，一方面加强正面的军事进攻，以急行军姿态向前推进，并尽量配合地方武装合击；另一方面对驻防潮汕一带的桂系刘志陆（梅县人）部进行策反工作，以收里应外合之效。此项建议提出后，陈炯明表示同意。于是我即函约姚海珊（平远人，姚碧楼的父亲，做过我的老师）到漳州组织地方武装及对刘志陆部策反。当时平远有一些地方的武装力量，殷商姚德和拥有百万家财，有长枪100多支、驳壳8支，并设一地方保安局主其事。姚德和死后，这批武装一直保留下来。此时姚海珊便遄返平远把它重新组织起来，编成一营，由姚海珊任营长。这支武装力量，曾配合援闽军回师潮汕。

对刘志陆部的策反工作的主要对象为刘部帮统周辉甫，周在民初时曾任广东北伐军炸弹队队长，和我有一定的关系，遂决定

由姚海珊商同谢星桥（曾任广东北伐军的秘书）负责进行。刘部实力大部由周辉甫掌握，如能策动周反正，则击溃刘志陆力量易如反掌，潮汕克复也是指顾间的事。此外还策动刘部独立营营长魏炯球（五华人）和刘部护士营营长饶富（大埔人）等。当时周辉甫且曾以陪母到普陀山拜观音为名，离汕赴沪与孙中山先生方面作进一步联系，此行决定了周部的行动。在酝酿反正期间，刘志陆部一个排长谢重高因事机不密，连同林德光、谢贻孙、凌上宾等四人被刘志陆逮捕枪毙。因在夜间执行，谢重高未被击中要害，棺殓后又因夜深未入土，不久谢复苏扑棺而出，庆得生还，一时传为奇谈。

策反工作虽曾发生一些波折，但基本上是获得成功的。当粤军回师进入粤境后，周、魏部即节节败退。待粤军攻抵汕头附近时，周、魏即宣布反正。刘志陆由潮安向揭阳狼狈退走，他的护卫营长饶富在此紧急关头也宣布反正，惟对刘本人仍念旧情，不但未予扣留，且派队护送出境，任由他逃往广州。

粤军回师仅花了四天半时间（1920年8月12日漳州誓师，8月16日攻克潮州），即克复潮汕。粤军入汕后，我被委为汕头卫戍司令。正当粤军向惠州、广州节节前进，胜利在望的时候，驻在漳州后方安海一带的浙军陈肇英部突告叛变（陈部原系起义来归的部队），并回窜龙岩，直趋大埔，拊粤军之背。陈部突变，事起仓猝，留守潮梅一带数营粤军部队装备太差，且多系桂军改编过来，兵力单薄，士无斗志。事变前，陈炯明又将王凤伦营从大埔调走（名义上是加强进攻广州的力量，其实是陈以王凤伦系嫡系，在即将入广州时，事先调王在身边），遂致粤军节节败退至潮州，时幸粤军已攻克广州，陈炯明闻讯，急派洪兆麟部回师汕头反攻，始将陈肇英部击败，迫使其全部缴械投降。

十三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后，自己避居百花洲，作幕后操纵。对外标榜退隐归田。陈曾为文曰：“放刀成佛，菩提不及尘埃；卖剑买牛，耕凿遥承庇荫”，装出一副伪善面目。当时我曾奉孙中山先生命，偕汪精卫、程潜、杨寿昌等赴惠州晤陈，促其觉悟。我到惠后，曾以书赠之，文曰：“未扫欃枪，如此湖山难消受；频忧乡国，满楼风月致澄清”。接着陈炯明邀我等泛舟游西湖，陈再请我题诗，当即以片纸书二句以赠，句云：“征西奔走劳鞍马，扫北归来理钓丝”，盖赞陈平定广西之功，冀其助孙中山先生北伐，俟成功后再作退隐打算。陈接阅后，摇首连称：“办不到，办不到。”我等见陈意已决，无可挽救，遂辞返广州。

我返广州后，复以七绝诗一首寄陈，指出革命与叛逆两条不同道路的后果，何去何从，任由选择，惜陈始终不悟。诗曰：“百花洲上影模糊，不听莺声听鹁鸪；铁像何如铜像好，凭君点缀此西湖。”记得当时友人张亦史主张将末句改为：“遥遥杭惠两西湖。”我觉得还是原句含蓄些好。

十四

1922年12月滇桂联军在广西白马会盟，即东下讨伐陈炯明，1923年1月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部退据惠州。陈部守将杨坤如曾一度由他的参谋长杨耿（直夫）通过谢良牧和孙中山先生方面接洽，伪称愿意归顺。孙中山先生派我到惠州收编（在陈炯明开始叛变时，孙中山先生已委我为中央直辖警备军司令）。杨坤如闻我将到惠州，假意殷勤，特派卫队到淡水迎接（我当时系由香港赴惠，须经淡水）。惠州方面人士闻讯，曾由杨果庵（惠州著名人士）、李益三（惠阳县县长，惠州巨商）等代表惠州各界对

我表示欢迎。

时陈部驻海陆丰的翁腾辉（照垣）系陈炯光属下，革命党曾由丘公复、叶柏质、丘耀西等对翁腾辉进行策反工作，丘公复等过去在粤军驻漳州时即已和翁腾辉有所联系，因而策反工作能顺利进行。翁表示愿意归顺。当时我对翁比较信任，但对杨则表怀疑，决定将翁部调驻惠州府城，以便监视杨坤如（杨部驻府城）。遂以“加强府城城防”为名，征得杨坤如同意调翁部来府城。殊料迨翁部刚抵府城部署未定时，杨坤如居心叵测，竟先发制人，派兵将翁部包围缴械。我责杨坤如背信。杨谓：“收缴翁械，系奉总理密令。”我以事出离奇，乃派黎铁峰赴广州，并从各方面调查，得悉杨坤如诡计多端，自己假归顺于前，复诱缴翁械于后。杨在翁部行将调府城时，在孙中山先生面前谎报翁部归顺系假的，谓翁系陈炯明之弟陈炯光部下，属陈炯明死党，决不可靠，应及时将翁部缴械，以除后患。孙先生信以为真，予以同意。我在翁部被缴械后，即返广州，据实报告孙中山先生，面谈辞职。孙先生不准，嘱我暂赴港休养。我面谒孙先生时，曾将杨坤如阴谋详为揭露，并指出杨坤如必将叛变，不久，杨果再叛。

十五

杨坤如再叛后，仍负隅惠州，孙中山先生下令免杨坤如职（杨归顺时其部队收编为中央直辖警备军第一师，杨任警备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此时陈炯明乘势于5月底进犯广州，孙中山先生亲自出发石龙前线督战，不久陈部被击退。自此以后，陈部时有进犯，孙中山先生经常乘座舰来往于广州、石龙、博罗之间，亲临前线部署军事。8月24日曾至博罗督师，31日到达苏村，此次我随行，并率驳壳枪队一队随时保卫先生。苏村江面狭窄，形势险要，土匪出没无常。我对警卫工作，特别小心谨慎。当时省方曾有飞机助战，其中有一架在飞赴前线时在苏村上空机

件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地点在距苏村镇二里的旷地。飞机师台山人（名字忘记），降落后即到我们驻地通知，当即派队降落地点戒备，听候处理，以免歹徒加以破坏。以后孙中山先生又曾于9月底亲赴飞鹅岭督率滇桂军猛攻惠州。至10月底陈炯明勾结外援，狼奔豕突又复反攻，滇桂军兵力不支，放弃围惠，向下游败退。11月初旬陈部率抵石滩，时孙中山先生退至石滩，由卫士队长马湘护卫。我是时在广州闻变，赶赴前线，甫到石滩，即遇见马湘，马仓皇告曰：“先生脱险到此，速协同护卫。”遂合力护卫到先生安全撤退返省。孙先生退至石滩时，态度非常镇定，再三勉励我们应努力杀贼，不必斤斤以他的安全为虑。

这个时期，我仍任中央直辖警备军司令兼惠州安抚使。记得我任此职，系在陈炯明叛变之初决定的。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这两个机构的作用是：就警备军来说，系准备收编陈炯明的归顺部队；就惠州安抚使来说，系准备在惠州安抚人心，收编民军及地方武装，故该部成立之初并无兵员。当时孙中山先生叫我担任此职，系由于我曾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有一定的人望，我又是客家人，陈炯明部多属客籍，策反工作比较容易进行。同时惠州也客籍人多，我过去在庚戌新军起义时期，又曾在惠州进行活动，和民党中人如丘锦芳、叶柏质、严德明、李子光、罗俊、张淮清等有联系，在地方有些基础。

十六

我返广州后，由于警备军无基本队伍，无实力，饷源无着，甚至部内人员薪金都难以支付，深感苦闷。适当时政府军队复杂，滇、桂、湘、豫军各树一帜，各自为政，在其驻地各自截留税收维持自己的部队。警备军既无实力，又无驻地，故无法维持。孙中山先生以一时未能迅速整顿部属截留税捐弊端，为解决警备军司令部经费困难，作一时权宜之计，委我兼任治河督

办。治河经费系由“关余”支付，不虑无着，由我兼任此职，便可权宜照顾到警备军司令部的困难。惟当时我国海关大权完全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海关总税务司系英国人），我们动用“关余”也要受他们监督。我兼任治河督办时，海关税务司介绍一个工程师（比利时人）来，名义上是当工程师，实际上是派来监督我们的。当时海关税务司规定，治河处一切开支须得工程师签字附署始发生效力。我当时认为这种规定，简直是有意侵犯我国主权，深表不满。有一次我出发前线时，在治河处支取 1000 元未得工程师签署，他就在孙中山先生面前表示反对，孙先生一时为难，未作肯定决定，随后我便辞职。

(1965 年)

孙中山先生轶事十则

罗翼群*

一、学习和救人的负责态度

1886年孙中山先生年21岁，在广州长堤博济医院（今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学西医，当时校长是美国人嘉约翰。该校规定男学生不能到产房看产妇分娩。中山先生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向嘉约翰提出要求改革，要求学校准许男学生到产房学习接生手术。当时嘉约翰以中国礼教载明男女授受不亲为词，予以拒绝。中山先生便严正的问他：如果学生肄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是否要诊治？如果要诊治的话，未经实习是不妥当的，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学校应当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结果嘉约翰无话可说。从此以后博济医院的男学生准许参加产科的临床学习。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在青年求学时代，便有极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便表现出对人民的强烈的责任心。

二、喜食猪红粥和牛肉饭

中山先生肄业博济医校时，晨餐喜食猪红粥（以米粥和猪血煮之，为旧日苦力及一般平民早餐之用），以其价廉味美而营养丰富也。当时，猪红粥一碗，价不过铜仙一枚而已，每晨吃其两碗，便足以裹腹。但正为其价廉，一般人多贱视之而不愿吃，且

* 作者系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长期追随者，曾任护法军政府少将参军、粤军总司令部参议兼广东省长公署参议等职。

谓猪红为不洁之物，惟下等穷人喜吃之，盖以其价廉，荷包上算，味亦可口，固不知它含有丰富而极有益于人身之铁质也。又广东地方通商较早，西人来粤见此者，曾鄙中国人食猪血以为粗恶野蛮（作者按：后来中山先生著《孙文学说》阐述“行易知难”之旨，其第一章以饮食为证，详言猪血之好处者以此），故中山先生当时力辟中西人士见解之谬，而毅然倡食猪血。

又中国当时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往往不食牛肉，亦以其价贱，且以为伪善者谓牛为耕田卖力，不忍食之。当时菜牛确是极少，所宰的大都为老病的牛，故亦有谓食牛肉不合卫生者。当时太平沙有间太白楼，专营牛肉食品，弄得非常可口，价又便宜，每味不出一角钱，牛肉饭每碗不过五个铜仙。但当时所谓“上流人”者，没有去问津的，惟一般平民则趋之若鹜。中山先生当时是学生身份，不管人家讥笑，午餐常去食其两碗，每星期还邀同学去笑叙。初时同学们尚多不愿去，后来觉得味美价廉，着实不错，也就不少自动前往了。（在1917年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时，帅府曾赁长堤照霞楼为招待之用，我和朱执信常出入该处，以地近太白楼，每市该楼牛肉饭以充午餐，每碗价一角，今匆匆40余年，太白楼亦已杳矣，每一念及，食指还动！）

以上两则是1956年中山先生后一班的同学刘谦一先生（名嘉福）对作者面谈而由作者采入本人《逸庐笔记》的。刘先生那年是86岁，还很健康，步履如常。

三、好学不倦举例

1916—1924年，我常在上海或广州，当时每因公入见或随侍中山先生，我见到他无论在燕居之暇或是在行营办公之余，都从不虚度时光，每每手不释卷或披阅图表。先生很喜研究各种海陆地图，每因著作需要，常命我代为收集购买。先生对地理特别是对中国地理极为熟悉，所以在他著《建国方略》时，提出了修建

全国铁路 20 万里，公路百万里的伟大理想，以及疏导黄河，治理淮河的水利工程与如何建设各个大港等等一套完整的实业计划。从这一计划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对祖国地理了如指掌；又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学问，不独是广博而且是专精的。而其所以博而且精，则是由于好学不倦所获致的。

四、治学精神举例

中山先生治学精神，亦值得学习，他阅读书籍，经常有札记，虽在百忙中，每每在书本上端加有眉批。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叛军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的书籍全被毁于炮火，间有些少散佚，事后有些烬余为人拾得。据曾经收藏过中山先生阅读过的书籍的友人告诉我说：他收藏过中山先生阅读过的《大学》一册，书头上就有中山先生不少的亲笔批注，特别是在“明德亲民”、“格物致知”那一段的上面。据友人说，这本有中山先生手批的书籍是在抗日战争时才失去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不独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书籍也是认真加以研究的，这更说明中山先生对于祖国固有的文化遗产是极其珍视的，也是一位热爱祖国而有远大眼光的大学问家。

五、宽宏大度，薄于责人

中山先生平日是多鼓励人，少责备人，且从不念怨。即使有负他甚至骗他的，先生见到他也只是婉言讽喻，从不令人难堪，这是他深得我国古贤“恕”字的精义，也是使人感激效忠之一法。例如陈炯明叛变后，吴稚晖以陈盘踞东江，实为北伐之害，请于中山先生，拟往海丰说陈归顺，问先生有何条件？先生谓：不要什么条件，只要炯明一纸悔过书便足。惜陈不能悔祸，致劳中山先生迭次亲自东征，潜受疾病，而不能见到北伐成功，实在是一件很痛心的事。

又1923年夏秋间，我任大本营兵站总监时，曾一度因公赴港，见及陈军守惠州之军长熊略，熊表示愿意归顺，要求给予港币十万元为清发该军欠饷，并请先给半数以示劳来之意。我以熊“态度诚恳”，当非欺我，惠州坚城不费一兵而能得到，总算便宜，况熊部尚有兵八千，敌损八千，我益八千，等于我方增了万六千兵力，殊为合算。我便擅交港币三万元与熊，回来面报中山先生，先生只说“恐靠不住”一语。过了一月，熊尚无反正表示，我始觉上当，不得不面陈中山先生，承认上当，请给处分。先生亦只说了“尔够目光”一语，虽无责罚，亦已令人愧极，无地自容矣。

六、自奉俭朴

中山先生一生俭朴，平日起居饮食，力求简单。他早年在日本，因事外出，有时在外间用膳，亦只系在普通食堂取一份“定食”（即客饭，日本人叫“定食”）。曾有一次，先生在横滨金陵楼进餐，亦系叫“定食”一份。店主人华侨潘君见先生自奉太薄，心里难过，特地为他添了两碟好菜。起初，中山先生辞谢，后来见店主一番诚意，才没有推辞。吃完结账，几乎不够钱，可见中山先生个人生活是十分节俭的。

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几十年，除由先生胞兄德彰和一些革命同志不时给以生活资助外，常在艰难困乏之中。我曾亲听见先生说过，他在伦敦蒙难后，滞留在欧洲两年，每天都是在图书馆里研究有关革命和建国的学说。当时所住旅馆，每天所费约合当时的银元八角，连饭食什费每天不过二元，仅仅和一个当时俭朴的留学生费用相等。又中山先生对于衣服也是很简朴的，即在辛亥光复以后，无论冬夏，总是以穿中山装为常，很少穿西装，更没有华贵的西装，其安于俭朴可想。

七、无私人，无私蓄

中山先生一生用人，只问其对革命有无贡献，能从其革命的，即量材器使，故无论留学生、华侨，及各界人士，间至国际友人，都愿为先生效命。但如无实学真才，虽其至亲，亦不愿大用。如1923年大本营筹设中央银行时，有人推荐宋子文为行长，先生不同意，其后委任林云陔为行长，而只给宋子文以副席，其他非亲非故而对革命有所贡献甚见信任者，就难以悉数了。

当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半年前，因住在南洋庇能的家属家用缺乏，贫病交迫，先生在旧金山写信给邓泽如，请他在同志中设法每月筹集一百元接济家人。先生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授予大勋位，并附送年金若干，先生辞而不受。先生一生对其个人方面，从不考虑金钱财物，凡不应得的，一介不取。还有，先生一生革命，从未置有住宅，又因先生搞革命，往往有房子的人怕牵累，不愿意租房子给他，于他工作上是有不方便的，因此，华侨同志中捐赠他上海一所住宅（即今上海香山路之中山故居）。这所住宅，还曾因革命事业有急需时，由一向经营党内财务的廖仲恺用来押款济急。直至先生临终时给家人的遗嘱还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我们从先生这短短的家事遗嘱中，可以看到先生至死亦无余财，无私蓄，实在是一个清廉的典范。

八、坚持反帝的大无畏精神

中山先生在领导革命，指挥革命战斗中，固然临阵异常勇敢（镇南关之役，东征梅湖炮兵阵地及石滩麾兵前进等）；而在反帝方面，更处处见到他的坚决与大无畏的精神。像在1923年冬天，

因粤海关抗交关余，便下令强制接收海关，这是当时任何外交人员所不敢做的。当时帝国主义的炮舰云集珠江河面（英炮舰四，美、法炮舰各二，日炮舰一），卸下炮衣，声言如敢来接收海关，当即开炮向大元帅府轰击。先生除据理驳斥外，并警告帝国主义者说：如敢恃强开炮，我立即派兵占领沙面。当时军政府外交部长为伍朝枢，广东交涉员并粤海关监督为傅秉常，恐酿大事，迟疑不敢奉接收海关之命。适有少壮党员罗桂芳（顺德人，曾任桂军总部参议，大本营东江兵站支部长，诨名“大炮罗”），进谒先生说：请给我十支驳壳（盒子枪），我便可把海关完全接收过来，遑论关余。先生壮之，即任以粤海关监督。罗带兵十名前往接收，海关无敢抗者。盖当时海关职员除税务司及一二高级职员外，其余尽是华人，平日受外国人气受够了的，当然同情本国此举。因此，接收非常顺利，关余也便如数收回过来。帝国主义理屈气沮，“炮舰政策”没有吓倒中山先生，反而被中山先生的大无畏精神吓缩了。事后，中山先生常对人说：谁谓罗桂芳“大炮”，其实他是有胆有识，只是你们怕惯了洋人吧！

还有，1924年秋，广州商团受帝国主义指使，勾结东江陈炯明叛军，企图倾覆当时的广州革命政府。中山先生在韶关大本营电令广东省长胡汉民决以武力镇压商团叛变。当时帝国主义者亦同样以其“炮舰政策”出面干涉，想威吓先生，先生仍以同样方法对付之，卒将谋叛的商团武装，很快地解决了，而帝国主义者亦无可如何。

从这两件事，又足见中山先生严正地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干涉的一斑。古语有说：唯大仁才有勇，由于中山先生热爱人民，就是他的大仁，因为能为大仁，故任何恃强干涉恐吓，都不能吓退他，所以说中山先生具有大无畏的精神，是因其具有大仁大勇的崇高品质。

九、晚年胃病喜食鲍鱼抵抗

1922年夏间，中山先生改道北伐，师次韶关大本营，时我任广东宪兵司令，因公赴韶晋谒，中山先生留我共进午餐，同座为孙夫人和文官长胡汉民。四菜一汤，其中有红烧鲍鱼一盘，始初我以为是中山先生特别饷客的，我三人不过吃了一小半，而中山先生个人几吃了一大半。我惊讶地问道：先生不是有些胃痛么？竟吃如许多的鲍鱼，诚恐消化不易，对胃痛不会影响么？先生笑说：我正是来治疗我的胃痛，鲍鱼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可以增加食欲，自不消说，正因为它不易消化，我的胃气弱，要和它抵抗，若只是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而不抵抗，胃气将日益衰退下去，更不易治疗了。因此，我亦笑说：先生是“大国手”，治病如此，治国的道理也是如此吧！弱国遇到强国，还是要抵抗，不能持不抵抗主义而至不可救药！先生说：正是如此！饭罢，更出一大盘荔枝，先生个人亦吃了一大半。当时我心里虽然很欢喜先生啖量好是健康的象征，但亦不禁笑问：先生也喜欢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诗句吗？先生明白我问的意思，便说：我饭后多吃水果，水分已足，不喝茶，即日常亦不喝茶水，而于卫生较为有益。中山先生所说如此，我是不懂医学的，平常总是听见中西医生都说：患胃病的人，应以吃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今写此出来，质之高明医学专家有以见教。

十、难忘的回忆，深刻的教育

在中山先生尽瘁革命40余年的过程中，其丰功伟绩，嘉言懿行，已史不绝书，无待小子赘述。即其生平轶事，亦非浅薄如小子所能一一悉举。今再将当日我所亲历或亲见亲闻而至今还深刻难忘的两件补述如下。

(1) 先生谦虚诚恳和爱护后进。十数年来，无论何时何地，

在我所看到中山先生见客的场合，亦不论党员或非党员，总是和颜悦色，亲切有如家人，从未见过他有疾言厉色。他的谦虚态度与教导后辈的诚恳，特别使人感佩。我记得在 1923—1924 年间，大本营有个参议会议，这个会议是讨论当时的军国重事，总参议为胡汉民，参议先后 20 余人，大都为各省老同志，现在还健存在广东的只有姚雨平和翼群本人了。每周开会一次，由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中山先生公出时由胡汉民代）。有一次我因事忙，即席请假，我对先生说：我现在兼任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广东省长公署总参议等职务，每天事情很忙，拟请今后免于参加会议。先生听了不同意，但却诚恳而慈和地教导我说：人生过程是战斗，战斗必须要有枪，更要有子弹。人的身体，也犹如一杆枪，学习和经验就是子弹，枪杆缺少子弹是没作用的，人生缺少学问和经验，也就空虚了！尔还在壮年，学历未充，应当以参加开会作为学习的机会，在会议上收得的一切知识和经验，就等于补了尔的子弹。同时尔报告所得各方面的事情，也像带子弹来给我补充，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尔以后要来参加会议，而且要常来；还要知道，没有子弹，空枪上阵，是不能打仗的。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从此不惟不请假，并深感先生对后进之诚恳谦虚，使我一生感奋。

(2) 先生对革命建国的见解和谈话。先生对祖国、对革命的忠贞和他百折不挠与大无畏精神是举世皆知，无容多说。先生对于建设国家，认为先培育建国的人才，因此，他非常重视培育革命人才的教育。试看中山先生在 1921 年致苏联外长齐契林信中有几句话：“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便清楚了。早在 1919—1920 年间，拟派朱执信前往苏联考察，奈朱于 1920 年秋因公死了。后至 1923 年始派蒋介石去考察了半年。于是在 1924

年中山先生在广东亲自创办了两间有名的学校，一间是黄埔军官学校，一间是广东大学（就是以后纪念他的中山大学前身）。先生回顾他以往在无数次的革命斗争中，深深感到军阀之不可靠，他说：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认为必先建立革命的武装，这是他创办黄埔军校的动机。先生又认为建设富强康乐的中国，就要先有高深学术修养的人才，因此，将当时的广东高师、广东法科学院、广东农专、广东工专和广东公医等校合并和充实它成为一个综合的广东大学。这两间学校的确是为我国革命建设事业培育了不少人才，尤其是黄埔军校对当时的革命贡献很大。但黄埔军校筹办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一开始是中山先生命廖仲恺筹办，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也是极力赞助，我当时也奉命参预筹集部分军校开办经费的工作。是时我兼任广东省筹饷局总办，开始筹了3万元帮助开办，后来因扩充关系，经费亦常在困难之中，曾有一次学校当局对我说：学校款绌，连伙食常成问题，请我设法每月筹助1万元充伙食费。我便将筹饷局承商以往每月送总办之5000元上报大元帅府，请拨给军校补助（如此亦仅解决一半，至筹饷局结束时为止）。先生对这一事十分奖勉，并这样说：一个革命者，应该随时牺牲个人利益来贡献革命事业，倘使人人如此，革命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而且会成功得很快。先生平常教人也爱发挥“天下为公”的道理。从我所经历的这件事，又说明先生见到人们有一点一滴的好处，都毫不埋没，并极力奖勉，对教育后进，真是无微不至。人们有求先生写字的，先生也常常爱写“天下为公”四字。真的，用这“天下为公”四字来象征中山先生一生崇高的品质，也是最恰当的。

（1961年）

我当孙中山警卫的一些回忆

何问渠*

“共产党有办法”

1924年，孙中山先生驻粤任陆海军大元帅时，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时期。我回忆的是，当年季秋一个落日西斜的下午，我正为孙中山先生值勤警卫，这时他与胡汉民、汪精卫商谈政事。胡汪两人一言不发的坐着，尔后我听孙先生用粤语说道：“共产党有办法”、“共产党有办法”的连续说了两次。当时我很诧异。但在事后了解，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得共产党的支援，改组了国民党，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幸的是“大本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右倾分子不同意孙先生这样做，抵制和违反孙先生的政策，因之孙先生当时提出：“共产党有办法”这实话来勉励别人，安慰自己，这是孙先生当时处境的苦心。又因胡汪二人当时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奉行不力，且有了右倾情绪，特召以启示教育，这是历史的事实。后胡亡，汪变节做汉奸。“共产党有办法”这句话，是孙先生在卅余年前提出的，而在卅余年后的今日成了实践语。

孙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对革命有不断追求的精神，他过去不仅在国内知名和在人民的心中占有光辉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负有卓著的盛誉，他的政治观点、立场主张是有独到之处的。因此，他在生前对共产党的友谊“联共”和赞誉“共产党有办法”这些言词中，是有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观点的。

* 作者曾担任孙中山先生侍卫。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1923年，孙中山先生重返广东组设陆海军大本营任大元帅时，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并确定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的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政策（即三大政策），当时的民主革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平均地权政策有了坚决的实行。1924年为了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对大恶霸地主曾予以无情的打击，如当时广东省的广宁县有一部分的恶霸地主拒绝了农民的减租要求，还筑起了深沟高垒，残酷地压迫剥削和杀害农民。当时广东省政府当局派了几次兵去处理，均受恶霸地主的贿赂，无果而折回。孙先生得悉这件事后，大为愤慨，为了坚决贯彻实行“扶助农工政策”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便改派了他的亲信侍卫连前往支援该地的农民斗争运动，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的斗争运动，经过了两天三夜的战事，终将恶霸地主打垮，祸首解省城，严加追究。又将土地无条件的分配给农民耕种，欠租一律免交。还把地主多年剥削农民所得的几千元光洋分配农民作斗争的果实。当支援农民的武装力量离开农民时，他（她）们还扶老携少，欢呼送别，并流露了无限的深情。

沙基惨案

192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斗争掀起了高潮。自“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更激起了澎湃汹涌的反帝怒涛，6月23日，广州工人、学生、市民、军人集会举行援助“五卅惨案”盛大的反帝游行示威。当时，我也参与到了这个行列中，当游行群众路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兵首先开枪向游行群众射击，继而停泊珠江河的英法葡等外舰便开炮向岸上的游行群众轰击了。帝国主义的狰狞凶恶面貌再一次暴露无遗。

这个时候，有武装的斗士为了捍卫人民，为了尽军人的天职，沉着地对敌舰还击。手无寸铁的广大游行群众反帝的怒潮更不可以遏止，他们挥动反帝的旗帜，高呼反帝的口号，申张反帝的正义，更有以石头对着沙基帝国主义的兽兵掷击的。这时枪炮声、反帝的喊杀声、反帝的口号，交织成了一个战场的英勇战斗交响曲，这便是沙基惨案的战斗实况，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血肉的身躯，牺牲的精神，写下了光辉英勇的反帝史。战斗的枪炮声刚停，市街秩序立即恢复，可见当时人民反帝情绪的高潮。这次战斗，当场牺牲的群众 50 余人，伤 100 多人，这便是继“五卅惨案”后发生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我是参加了这次战斗实况的人，特为记之，以为这次惨案牺牲的烈士爱国精神，永垂不朽，并志纪念。

(1960 年)

附：

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

丁身尊*

北水乡是尤列的家乡，现为顺德县杏檀公社北水大队，人口有 2036 人，其中尤姓占 60%，余为梁、吴、简、黄、李等姓。北水乡在地理上东接龙潭，西邻吉祐，南界南朗，北通勒流镇。交通上有水路可直通广州，公路可通大良。

关于 1893 年孙中山和尤列、陆皓东等人，在北水乡设立兴利蚕子公司，其性质如何，进行了什么活动，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传说。有的说用机器制蚕春（蚕卵，下同）出卖；有的说名为制蚕春，实则制造和运输枪支子弹，准备“造反”（武装起义反清），并把蚕子公司和 1895 年广州第一次武装起义，事泄失败，陆皓东、程奎光、朱贵全、丘四等四人被捕牺牲的事件联系起来。多数人的说法是，公开名为蚕子公司，实为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但进行了什么秘密活动，他们说不出来。

现将我们调查访问各人的谈话，整理如下：

尤二九（男，81 岁）

尤列的祖先很有钱，有尤百万之称，很多田地出租，房屋漂亮，有新旧花园两座。到他父亲手上，已逐渐破落，剩下二三十亩田。尤列懂得中医，是跟他叔父（称九叔）学来的，又擅长打算盘和计数，连顺德护沙局的账手都曾拜他为师。后他和孙文从事革命，把田地都卖光了，靠拆卖房屋过日子。

兴利蚕子公司创立于北水乡新基坊尤列家旧花园旧址，新盖

* 作者系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委副主任。

一列式的平房四间，作为公司住址，前后各开一门，每个房间17桁（丈二宽）。公司没挂招牌，只在蚕纸上印有兴利蚕子公司字样。我那时约10多岁。

公司创始人除尤列、孙文、陆皓东三人外，还有龙江一姓薛（或姓郭，已忘其名）的胡须佬，身材高大。那时尤列已没什么钱，听说陆皓东是最大股东，出钱最多（按：我后到中山县翠亨村调查，有人说陆皓东变卖家中田产，作为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费用，有的说陆卖了6亩田，有的说卖了二三十亩）。

蚕子公司租别人的土地种桑，雇人挑水淋桑树，每担水三个钱。又雇本乡人尤德切桑叶，尤裕折看蚕。每顿吃饭有一二十人，饭菜比起乡人吃饭好得多。

孙文、尤列、陆皓东等人不是长驻公司，而是时来时往。听说陆皓东和南朗的三合会有关系，是否确切？说不上。孙文等人来公司时，有时也出来散步，看看人家种桑。平时蚕子公司关门闭户，外人很少进去。

一般人盛传兴利蚕子公司是用机器制蚕春（蚕子），我没见过机器，我想也不会有机器。我所知的是，蚕子公司制蚕春的方法较当时农民的方法新，即农民是用手探水温，温度把握不准，水不够热，蚕春孵不出小蚕；水温太热，会把蚕春烫死，因此产蚕率较低。蚕子公司用温度计探水温，温度适宜，蚕春产蚕率高，且专挑健壮大粒的出卖（不健壮小粒的即不要，用针刺穿）。因此深受农民欢迎，除本乡农民购买外，附近各乡农民也来购买。蚕子公司月产蚕春约二三百箱，如别人的每箱一元，公司的即一元三四毛钱。

蚕子公司产量有限，吃饭的人又多（有一二十人），一定蚀大本。但我看他们那班人不是作生意赚钱，而是有其他目的。蚕子公司创办约一年左右，即倒闭，大约是年底开办，至明年8、9月间结束。

广州“造反”（第一次起义）失败，程、陆、朱、丘四人被捕牺牲，尤列即叫人把蚕子公司房屋拆掉，以防清兵前来搜查。族人怕受连累，即动手把蚕子公司及尤列所住房屋全部拆平，杉木、楹桷及其他东西，低价出卖，屋地填上泥土，种上桑苗。这时我才看到蚕子公司四周有地牢（即地道）环绕，宽约6尺，一人多深，用砖头砌起，阶砖铺底，上盖石板，再盖阶砖，不知作何用？制蚕春，用不着；放东西，也不是。我估计是和秘密活动有关，为埋藏枪弹或躲人之用。这地牢是什么时候开的，我不清楚。事后清兵没来过北水乡搜捕。

尤景新（男，80岁）

我和尤列是同太公，但不是至亲，五服之外，叫尤列做阿叔。听说尤列的祖父有几十万家产，有尤百万之称，后来尤列搞革命花穷了。

尤列和孙文等在北水乡搞兴利蚕子公司时，我约10岁左右，已开始入私塾读书。蚕子公司用新法制蚕春（方法与上面尤二九所说相同），没听说用机器制枪弹，也没见过机器。蚕子公司有二三十人吃饭。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尤列即叫亲人把蚕子公司房屋拆掉，杉木、楹桷等物，平价出卖。

尤列71岁在香港做寿，我参加饮酒，摆酒20多席，北水乡亲族有10多人参加。参加拜寿的每人送一本书，内中写尤列的生平事迹。拜寿后不久，尤列上南京，很快就死了。

尤守信（男，69岁）

我七八岁在广州时，听父亲尤孝臣说，尤列在北水乡做过机器蚕春。广州起义失败后，尤列曾返北水乡，把枪丢在家里井中，然后才出走。由小路向勒流镇方向去。有一个在蚕子公司做过后生（杂工）叫尤惟英，送一件棉背心给他穿，他还带着一张毛毯，走得很匆忙。后听说他到了日本神户。又听我父亲说尤列曾在不（必）丹国，给国王招为驸马。

我 20 岁时，在香港见过尤列。是时我和尤列的姪侄尤永昌（后过继给尤列为子）在一起，永昌以看相为生，很潦倒。尤列从海外来香港，给 500 元和一药方给永昌，于是永昌制成了一种叫“招露华轩卫生药”。

尤胜心（男，42 岁）

听说尤列为搞革命，改姓龙，怕连累族人。尤列和孙文在北水乡做过蚕春，听说是用机器制造的。尤列 71 岁，在香港做寿，出过一本书，我看过。在书中说他在广州起义失败，走到不（必）丹国，医好国王的背疽，被招为驸马。后国王逝世，尤列摄理国政，及闻孙中山在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又离开不（必）丹国，前往找孙中山，一同继续搞革命。书中所说其他事情，因日久忘记了。

尤庆甫（男，51 岁）

我祖父的一个兄弟叫尤裕通，在广州博济医学院习医，由他介绍尤列认识孙中山。他约 40 岁左右就死了。他和孙中山、尤列的通信中，有谈到反对妇女缠脚等事，可惜这些信件已毁失了。

尤骚九（男，65 岁）

尤列早期的事情，我不清楚。他后期在香港，我曾做过他的厨子，有所接触。听闻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曾请他坐镇总统府。他和胡汉民是死对头（争夺权位矛盾），胡买通他的契仔（什么姓名，不清楚）行刺他。契仔向他告密，并说：“你走，我不走。你不走，我走。”他觉得处境危险，出走到香港，改名尤志方行医，制有一种药品叫“卫生露”出售。他晚年在港时，很穷困潦倒，又吸食鸦片烟，请客吃饭，要客人拿钱买菜。我曾见过他向后生（杂役）借过两个仙买肠粉吃。

1935 年，他在香港做 71 岁大寿。国民党要人中，除胡汉民、汪精卫外，都有送礼。蒋介石送一红寿幛，段祺瑞、马占山也各

送有寿联，其他礼物如银鼎、银器等很多。他印了一征信录，分送拜寿各亲友，书中写他生平事迹，有通书那么厚一本。

第二年他在孙科的怂恿下，送足盘川，请他到南京去。是时陈济棠和胡汉民、孙科等人在广东反蒋介石，尤列这时到南京见蒋，有什么任务目的，我不清楚。听说他到南京后，蒋介石殷勤招待他一番。不久，便暴毙了。传闻给蒋介石毒死，是否属实？我不敢肯定。

附记：

1. 《顺德县志新编》关于兴利蚕子公司记载，有这样一则材料：兴利蚕子公司门口，挂有孙中山手书对联一副，曰“兴自我创，利归于农”。材料出处已查不到了。

2.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尤列先生事略中记载：“先生（指尤列，下同）与周昭岳先生在松溪别墅故址，设立兴利蚕子公司。密友孙先生逸仙，陈君夔石，陆君皓东，杨君崑甫常来探访，或往数月，乃至一年。而陆君、杨君，则公司之股东也。会用之青天白日国旗，则陆君在先生家住听涛阁时所画，其颜色碟，至今犹存周君昭岳处也……”

3. 又同上书陆皓东传略书中记述：“……中东战起，清兵屡败，人心愤激，孙先生以时机迫切，由檀岛携巨款回，开乾亨行于香港为总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并在香山、顺德等地设立办事处，联络水陆军队暨各处会党，购运军械，烈士制定青天白日旗式为革命军旗。”

（1965年）

黄埔建军与东征

29

30

31

32

33

34

二次东征河婆战役的回忆

张性白*

国民革命军于1925年10月14日攻下惠州后，第一师第二团（沈应时）于15夜接师部（何应钦）转奉总指挥蒋中正命令大意：一、陈逆炯明残部，盘踞兴宁、五华等处的林虎逆军，以号称东江天险的惠州城已被我军攻下，自知孤军无援，所部军心动摇，妄想最后挣扎，准备南窜河婆，阻我进军潮、汕，本师奉命于明（16）日晨，由现地（惠州）出发向河婆前进，有截击该逆敌之任务；二、友军冯（轶裴）师全队由惠州向紫金、河源前进，占领紫金、河源后，即进攻五华，直取敌巢。

该团须于明（16）日天亮，由现在（西河沿）出发在师前头行进，往海陆丰向河婆前进（限20日午后到达），到达后立即占领阵地，对五华、兴宁之敌严密警戒，遇敌南窜，即予以堵击，以迟滞该敌于高山地带，予我友军从容攻取五华，以断敌方归路。

由于当时的革命军队，政治教育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训练的，全队官兵的革命觉悟性很高，因之纪律良好，军行所至，极为人民群众热烈欢迎。20日午后3时左右，全团行至离河婆约五六华里的村庄时，河婆的农民协会代表四、五人与当地的人民群众，已备好茶水，夹道候迎。团参谋长张性白接待他们后，听取农协代表报告：我们（农协）早几天知道你们将由惠州开到河婆来，后又听说五华的敌军要开来的消息，我们马上就在这天早

* 作者时任东征军二师二团参谋长、中校团附。

上，派了我们会里两个同志去五华、兴宁两处，探听敌军的消息。去五华的同志，昨天赶回，报告说：五华敌军 18 日那天早上，派兵在街上乱抓挑夫，听说军队要开差到河婆云云。我询河婆附近的地形，又托代请熟悉河婆通五华、兴宁的大小山路的农民同志五六人晚前送到团队，遂命部队继续前行。4 时余，全团到达河婆，我即率团参谋李良荣及各营长往前方侦察地形。回来后，团队即下命令：第一营（詹忠言）附重机枪第一连占领河婆以北高山南端东高地阵地，第三营（俞元奇）附重机枪第二连占领河婆以北高山南端西高地阵地。东西两阵地各自配备轻重武器，互相构成交叉火网，严密封锁山口，夜间各该营并须控制一队兵力，以使与敌接战后，视情况的变化，随时迂回远出敌侧背袭扰。第二营（胡宗南）为团预备队，位置于团指挥所附近。

当晚 8 时余，我在团指挥所城上的小高地上，向敌方高山观察，发现五华方向由北向南约长达二三华里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断续微弱的火光，忽隐忽现。这时，我结合农协所报告的情报，断定敌大部军队，此时才到，估计敌方兵力确有上万，今夜就在山上露营，明拂晓必向我进攻。

沈团长应时在 15 日午后，接总指挥蒋介石电话进城谈话，16 日天亮，本团出发时也未及随队同行。我预料他在明拂晓前，决不能赶到，那时敌向我进攻，战斗必定激烈，指挥作战自然是我的责任，计算敌军兵力，固然比我多，但自信我们的实力，是有把握给予来犯之敌重创。再一盘算，觉得与其接敌后，把它击溃不如在未与敌接战前，以计使其自溃才是策之上也。当即决定，乘敌今夜行军远来疲劳之际，以少量的兵力，袭扰其无备，使敌众惊乱溃散。继思能执行这个繁重任务的人选，必须胆大心细、勇敢机智的战将，才能胜任；我认为除了第二营副营长蔡昇熙（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实无有出其右的，当即亲自电话邀他来谈，片刻他到，我把刚才所拟的计划告之并征求其意见，

他即欣然回答：“很好！愿听命。”并说：“机不可失，请速部署！”我得到他的帮助，意志更坚决了，当即电话通知第二营营长胡宗南立派该营营部手机枪排排长杨金标挑选士兵12名、手机枪2挺、步枪4枝、驳壳枪4枝，每士兵各携手榴弹2枚，听由该营副营长蔡昇熙率领指挥，准备妥后，立时出发；并指示如中途遇敌哨或迫近敌营，无论是否为敌发现，都必须不失时机地以猛烈的火力向敌袭击，万一遇到困难当不惜牺牲，想法完成任务，得手后速即归还。

当夜10时左右蔡昇熙率队带同农协派来领路的农民同志一人，从黑暗的夜色中，通过第一营阵地步哨线摸上通敌方的山路。约过了两小时光景，我在团指挥所附近小高地上即隐约听到手机枪、步枪、驳壳等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并远远的望见高山上敌露营处，灯光断续零乱向北窜去。约过了三四十分钟，灯光才完全熄灭，至此知敌已向北溃逃了。

约2时左右蔡昇熙来电话报告：我已率队回到营部；我奉命率队摸上敌方半山时，遇敌巡逻队十余人，其中有两人在黑暗中低声说话，我闻声即令队伍潜伏路旁，伺敌巡逻队过去十来米后，起而跟随前行，即向敌背后密集发射同时投掷手榴弹，敌队因受我军突然袭击，当即惊恐向北逃跑，我们尾追十余步后停下，听到山上敌军喊声与枪声嘈杂起来，我当即指示队伍就地集结查点毕，领循原路归还云云。

次早天亮后，前线第一营营长詹忠言电话报告：前半小时有山上农民来报，昨夜山上开到由五华来的敌军，宿满一山，到半夜光景，我们（山上农民）忽然听到人声枪声嘈杂起来，很快向五华大路方向去了；我们当时不敢开门探望，天大亮后从门缝向外看，没有看见敌人影子，后又没听到敌人的声音，才把门打开出去观看，已没有敌兵了。现在山上，一路丢满了行李，又有十多箱子弹，在山路边，还打死了一个便衣敌兵。李营长说，我当

即派兵一排上山侦察，又命将山路上敌人抛弃的子弹，全部拾取回来，山路上的行李，允由山上农民取去，尸体一具给资嘱山上农民就地掩埋。这时团部以电话命令前线各营，除酌留少数步哨兵在阵地附近监视外，其余撤至村庄附近集结休息待命，一面电话报告师部。

午前 10 时，沈团长应时由惠州赶回，稍休息片刻，他即询问日来怎样。我当即将奉命从惠州率队出发到达河婆后与昨日黑夜设计袭敌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对他报告了。他听到我的报告后半晌不说话，脸色由红变青，才开口说：15 日午后，校长（蒋介石）电话叫我进城（惠州）谈话，敬之（何应钦）不是不知的，攻惠州作战我们也是参加的，依理这次的任务，应该轮到别团，为什么又命我们担任呢？这不是不公平吗？又说何的确是有意乘我与墨三（顾祝同，中校团附，在广州出发攻惠州前请假回江苏原籍）都不在团的机会，要搞垮我们；我认为他是很知道逆军终究很快会给我军消灭的，命令我们先去与它作战，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教训试试：我们能不能抵挡住多几倍敌军的兵力，抵不住，会不会向他求援。甚至阵脚松了，他再命令一个团队加上去，丢了我们团的面子，可是料不到你会一声也不响，把敌人打垮了，这不用说他们意料不到，连我做梦也梦不到的。但是这种情形，完全是对付我的，不能因我个人连累整个团的同志吃苦头，我的良心很不安的，现在我已下决心到潮汕后，即电校长请假离开算了。我当即对他解释说：全团官兵在你的指挥教导之下，是团结一致的，是忠于革命的，对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昨夜袭敌的胜利，完全是归功于蔡副营长昇熙的勇敢机智与官兵听命，执行计划，尤其是当地的农民群众及时地供给敌军动态情报与黑夜领路等，才能获得这样的战绩。至此，沈应时始转谈其他。

沈应时为什么与何应钦矛盾会这样尖锐呢？由于蒋介石在孙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尽量收罗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等，充当心腹干部，为了要他们始终忠于他个人，运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手段，使这些干部，经常地互相倾轧，互相疑忌，为他随心所欲地掌握。何应钦过去原是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心腹、至亲妹婿，当时与谷正伦同是王家死党，黄埔军校创始时，乃蒋介石亲信王柏龄推荐任总教官。何久于官场，有一套高明逢迎的本领，得蒋的宠信。然而沈应时在蒋过去任粤军总部参谋长时，是总部直属炮兵营营长，为蒋所赏识，当时在蒋介石左右与王柏龄、王懋功、俞飞鹏、徐圣禅、周骏产等是一样吃香。沈蒋在平时接触频繁，沈遇事经常越级直接向蒋请示，这使何应钦非常难堪。因此，何、沈矛盾的发生与其他在蒋介石左右的干部一样，有时会尖锐化，有时是潜伏的，这都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这次何沈矛盾的突出，不过是蒋介石往常所掌握的许多矛盾之一个例子而已。

23日午后，师部通知：友军冯师已于昨（22）日攻入五华城，逆军残队纷纷溃退，歼灭在即。

第一师全部于24日晨，由河婆开潮州，27日午进驻潮州休息整理，这时溃退永定、大埔的逆军残部已完全缴械，潮梅全局至此底定。

11月上旬，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在奉令升第一军军长后仍兼第一师，并兼任潮梅绥靖主任，公署设汕头，任蒋伯诚为公署参谋长（代拆代行）。

约在10日左右，第一师的团长及以上官佐，聚宴于汕头天平酒楼，酒至半酣时，沈应时借机向第一师参谋长王俊（何应钦未到）寻衅。当时在座的有刘峙、钱大钧等，平日对王等也互有意见的，此时在旁冷眼观看，王俊为沈所穷，迨沈拔出手枪，几欲开枪击王时，钱大钧才慌忙劝止，同时刘峙劝王俊离开，这场的宴会就这样的不欢而散了。

次日沈应时即电蒋介石请假省母离开汕头，约 12 - 13 日，蒋介石由广州来电调升第二团团长沈应时任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任第三师参谋长，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任第二团团长，张性白升第二团中校团附，第二团全部开驻汕头市，担任汕头市卫戍，不久又担任潮汕铁路沿线防务，团部移驻铁路线中心站鹤巢。

(1963 年)

回忆东征时期周恩来在汕头

吴华胥*

今年3月5日是周总理诞辰81周年，全国各地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将会作隆重的纪念。联想到我52年前在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头后我有机会几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他的伟大形象，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现趁纪念周总理81周年诞辰的日子，把我和周总理接触的几件事情记录出来。

一、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那是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头的第二天一个上午，我正在汕头市立第三小学的教务室（当时学校是设在乌桥第二马路头即现在光华桥头西边）和教师们畅谈东征军入汕的动人情景，忽然杨石魂同志走进学校来找我，我迎接他同进我的住房，他对我说：“周恩来主任要我介绍一个人到惠来县去做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我认为你是惠来人，是最合适的人选。”并约定下午3时偕我同往东征军总指挥部（当时设在粤东绥靖公署，即现在汕头军分区地址）。我和杨石魂同志依时前往，经过传达，两人直上指挥部的二楼，在二楼一间约10多平方的小房子见到周主任，他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他穿着军装，两腮长满胡子，精神奕奕。那时，我已经26岁，他和我一样年轻，看不出他是刚从战场回来的样子。室内放着一张行军小铁床，一边放着小写字台，还有几把椅子。彼此坐下，他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改组各县国民党部的

* 作者当时系汕头市立第三小学校长。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任惠来县国民党党部特派员。

任务来。他说：东征军进入潮汕打倒军阀后，就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过去国民党各县县党部都由土豪劣绅包办，不可能执行三大政策，因此，非进行改组不可。接着他询问我国民党惠来县党部是谁负责？我说：负责人是陈淑，他是惠来县县立第一小学的校长，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这些知识分子应该争取，我现在派你做特派员，派他做副特派员，要好好地争取他合作。我接受任务后，第三天就启程到惠来去。我到惠来后，首先召集进步团体：惠来青年社、惠来工会、妇女会一些骨干分子谈谈新形势和研究县里在东征军入潮汕后各方面的反应，如何着手召集国民党党员大会进行改组领导机构，也征求过陈淑的意见，他是表示接受改组的意图的。可是陈淑的侄儿陈绍贤，是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学时已参加国民党CC派的组织，极力挑拨他的叔叔不要放弃领导权。因此，在开党员大会时，他纠集一些坏分子在会场捣乱，使会议不欢而散。当时参加东征军的黄埔军校学生都分别派驻各县参加发动群众工作，驻惠来的黄埔学生是一位姓左的同志，他参加了这次国民党党员大会，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许多国民党员都没有看清形势，所以受陈绍贤的挑拨，应该再做深入工作，等他们有所觉悟，然后再开大会，他要我先回汕头，把再开大会的任务交由他负责。我回到汕头后，适逢周主任到外地去，我只好将情况告诉周主任的秘书关学参同志。记得当时同我一样奉命被派往潮汕各县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的有：郭瘦真同志往潮安；方临川同志往揭阳、普宁；赵之朴同志往潮阳。

二、东江行政委员支持工会的政治斗争

1926年春，汕头设立东江行政委员会公署，管理惠阳、兴梅、潮汕各属的行政工作，由周恩来任东江行政委员。他的施政方针，认为要改革吏治，改变社会风气，主要是要发动群众，成

立工、农、商、学各方面的组织，汕头方面除巩固原有的潮汕铁路工会外，新成立的有：建筑工会、联安工会、理发工会、店员工会、缝衣工会、司厨工会、邮电工会、纺织工会、汕头海员工会、水电职员工会、甜料包饼工会、手车工会、轮船装卸工会、民船工会、洋务工会，1926年上半年才正式成立汕头市总工会。

汕头市在东征军第二次入潮汕后各行业工会的成立正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尤其在东江行政委员公署成立后，大力支持各个工人组织，因而展开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各种经济斗争也此起彼伏，1925年建筑工会和1926年潮汕铁路工会两次经济斗争取得胜利对反动势力引起很大的震动，从而导致反动势力支持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政治斗争，最突出的例子是建筑工会与警察的冲突。

冲突的经过：1926年底，竹叶业工人许阿八被老板郑猪哥借小事情加以殴打，阿八是建筑工会会员，奔向建筑工会报告，工会派纠察队员向郑猪哥质问，郑竟以恶言回答，纠察队即将殴人犯郑猪哥扭送第三区署。第三区署主办人受贿20元，借口区署扣留人犯不能超过24小时，即将郑猪哥释放。建筑工会知道第三区署擅自释放殴人罪犯，派纠察队向第三区署要回寄押人犯，该署推说已将人犯送公安局，纠察队根据所知具体事实驳斥，并指出该署受贿放人，遂与警察冲突，并互相斗殴，双方均有受伤。平日骑在人民头上的警察，今天竟受到站起来的工人反抗，认为有伤尊严，遂组织罢工，还筹备组织警察协会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这个事件，企图把事情扩大，镇压工人。当时警察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是汕头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在背后为警察撑腰，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组织全市警察包围建筑工会，声言要抓工人纠察队交公安局惩办，当时工会内只有工人和工会干部20人左右，与大队警察比较，力量悬殊，但工人并不示弱，用桌椅与警棍对抗。周围群众不断为工人助威，过了一会儿，东江行政公署周恩来委员得到建

筑工会的紧急报告，即派出警卫队到场制止警察非法行动，在警卫队未到达之前，工会纠察队已被警察拘送公安局的有 17 人，并扣上镣铐，即由东江行政委员下令公安局释放。自此以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由汕头以至各县逐步尖锐起来。

三、周委员召集汕头工商界开会

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建立后，除发动各行业成立工人组织外，对于汕头这个商业城市的商会组织也很重视。过去在军阀统治下，汕头市大商户所控制下的汕头市总商会是在军阀官僚支持下代表大商户的利益，把反动统治的横征暴敛转嫁给中小商户，中小商人在反动统治下敢怨而不敢言。东征军入汕后，周恩来委员指示改组后的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商民部发动全市中小商人成立商民协会，参加中小商户达 3000 户，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又有革命政府的支持，就敢于起来反抗市总商会对于他们的控制和压迫。周恩来委员看到这种形势，及时以东江行政委员的名义，召集汕头市总商会全体委员和市商民协会全体委员在永平酒店二楼开大会。我当时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也应召参加这次大会。当周委员、秘书关学参同志和随从副官陈赓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周委员不断招手致意，显出革命时期的活跃气氛。周委员等在主席台上就座后，会议开始，由市党部商民部肖师孟同志宣布开会，接着由周委员作政治报告，阐述当时广东以及全国的革命形势，并说明革命政府对于工商界的政策。对于税收和城市建设各种经费，将公布摊派办法，做到合理负担，废除过去一切苛捐杂税。在讲话过程中，不断引起到会者的热烈的掌声。这个大会开后，市商民协会中小商户受到周委员讲话的鼓舞，进行向市总商会提出改革过去不合理的在商户中行之已久的派款办法。在军阀官僚统治时期，对于商户派款，名目繁多，中小商户负担最重，因为过去市总商会为了转嫁给中小商

户，决定派款标准，以缴纳房租多少为尺度，许多做门市生意（即零售商）的中小商户，因为门面大，房租多，纳房租也多，其实资本额并不大，而做批发的大商户，因为不须摆门面，也不需要开设在热闹地点，房租较少，房租负担轻，因此，每逢上面派款或捐款，中小商户负担重，而大商户反而负担轻，中小商人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主要原因是：这些派款标准是市总商会决定的，且有军阀官僚做后台，稍有反抗，势必吃亏，现在形势转变，革命政府为中小商户撑腰，而且因市商民协会集体力量提出合理建议：认为以后临时派款，应以商户资本额大小为标准，取消过去以缴纳房租多少为标准。在这种新形势下，汕头市总商会迫于形势不得不采纳这个合理的建议，全市中小商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四、接待过周总理的汕头市第三小学

解放后的汕头市立第三小学和别的市立小学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潮汕革命活动或者在该校当过教师、学生而现在仍然健在的人，就知道它刚创立时就和大革命有着一段历史关系，它接待过周恩来、邓颖超、彭湃、恽代英、陈赓、关学参、杨石魂、方方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可惜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知道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现在趁着全国纪念周总理 81 周年诞辰的时候，把这段历史叙述一下倒是有意義的。

市立第三小学创办在 1925 年 3 月，当时校址位于马桥同济二路转角处，即现今光华桥头西边，是一幢旧仓库改建的贝灰沙二层楼房，面积约 60 平方，两层约 120 平方，楼上到楼下有 3 个教室，楼上大厅作礼堂，可容 100 人开会。我当时是该校创办时的校长，伍治之同志由韩山师范毕业后来校任教师，当东征军第一次入汕后，1925 年秋，杨石魂、方达史、方临川等同志相率由广州来汕进行组织“新学生社”，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期

都是在普宁组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常来市三学校和伍治之同志联系，我也和他们结识，来往很密。迨1925年冬，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后，周恩来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任东江行政委员，坐镇汕头，政治部和东江行政委员公署人员和杨石魂同志等因工作关系，也利用学校作为公开联系的场所。后来，市三变为潮汕党的一个联络站，周主任的秘书关学参同志、陈赓同志也常来这里和各方面联系工作。党召开党团员扩大会议，也常假座二楼礼堂举行，恽代英同志、澎湃同志也几次在这里做过报告，有时还有各县党组织派同志来汕参加会议。但是，每次会议规模都不会超过100人。

记得1926年5月，召开一次党团员扩大会议，由澎湃同志专题报告各地农民运动发展情况，周主任和邓颖超、关学参同志轻装简从步行来到市三小学参加这次会议，由关学参同志带他们直上二楼，会议仍未开始，我和伍治元同志马上从教务室取几把椅子打算放在主席台旁让他就座，周总理连忙说放在会场后边就可以。说明周总理是以听报告的一员而来，并非以领导者的身份而来，这种深入群众的风度在他年青的时代已经表现出来。

在东征军入汕后，由1925年至1926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市三学校经常有革命的党政军人员在这里出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目中，这个学校无疑是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据点，特别是汕头市立学校举行学生运动会时，市三学校学生都佩带劳动童子团的红领巾，尤其使人注目。1926年12月下旬，杨石魂同志往揭阳调解红白轮船工会纠纷事件，被揭阳反动派阴谋绑架的事变发生，接着1927年2月，澄海反动派策划杀害澄海农会领导人彭丕同志惨案发生后，潮汕地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期，党的扩大会议就不再在市三学校召开了。同时，周主任也因整个形势急剧转变，也由党中央召回到其他地方去主持工作了。

1927年4月15日，潮汕发动反革命清党事件。事变之夜，

我因筹备汕头教育会工作在其他地方，是晚就有人到市三学校周围监视。第二天，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反动头子陈特向就带领一帮喽罗到校搜查、接收。所有教师学生都相率离开，整个学校也改变颜色了。

(1979年)

回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潮汕的革命活动

吴华胥*

一、东征前的潮汕形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除分析了中国现状外，并提出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其奋斗的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政策。这是孙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和苏联帮助的结果。这次大会成为革命高潮的起点。同时，孙中山先生派蒋介石等7人筹建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效苏联军事制度，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建立，使全国各地，特别是广东各地倾向革命的青年都踊跃投考这个革命的军事学校。潮汕各县青年投考者也不少。同时，广东革命局势的发展，带动了各县革命群众组织。首先是海陆丰在彭湃同志的发动下开展了农会的组织，各县知识青年也纷纷成立组织。例如：1924年笔者在潮安县韩山师范学校任职，亲眼看到潮安城由旅外学生回来组织青年团体，如青年图书社、青年书店，当时还有佛山师范学校英文教师李笠农（后来叛变）和青年书店吴雄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笔者和伍治之同志也曾参加这个组织。同时笔者在家乡惠来县也发起组织青年社，还组织沿海盐场的盐民协会。这些革命组织成立之后，都先后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其封建势力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

* 作者当时系由周恩来派往惠来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的特派员。

线，革命力量有所发展，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国民党右派头子张继、谢持、邹鲁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统一战线，导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两次东征可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希望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结果因为段祺瑞私自召开善后会议而被破坏，接着军阀陈炯明所部杨坤如、林虎、洪兆麟盘踞在广东惠阳潮汕一带，得到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暗中援助，指使他们破坏广东革命根据地，镇压各地群众革命运动，苛捐杂税繁多，民怨沸腾，广东革命政府为着解除东江人民痛苦，由周恩来亲自率领黄埔军校两个团，于1925年2月开始第一次东征。

二、纪念十月革命八周年

1925年2月，周恩来亲自领导学生出师东征，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3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盘踞在惠州城的主力部队杨坤如，使东征军迅速向海陆丰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形势非常紧张，周恩来考虑到广州是革命根据地，关系重大，立即率领黄埔学生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蒋介石、何应钦则带领部分队伍配合由福建回师的许崇智进入潮汕。没有经过剧烈战斗就长驱直入，而陈炯明余孽则分别隐蔽潜伏，伺机作乱。是年10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再次唆使其残部林虎、洪兆麟重新向革命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所到之处，受工农群众热烈欢迎，到处有群众设茶水站，为东征军作向导、抬担架，协同东征军作战。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援，更增强了指战员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心。第二次东征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部歼灭陈炯明余孽在东江全部武装力量。领导东征的周恩来终于

在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的时候来到汕头，汕头市广大群众排列在汕头市主要街道夹道欢迎，比第一次东征部队到汕时尤为热烈。周恩来的威望在两次东征中已经传遍东江。

那是 1925 年 11 月 7 日的晚上，正是第二次东征军进入汕头的第三天，汕头市人民一方面庆祝革命军再度来汕，肃清军阀陈炯明余孽，解除人民痛苦；一方面庆祝十月革命第八周年，真是双喜临门。大会的会场设在永平酒楼（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地区支行地址）。永平酒楼三楼的大厅布置庄严的会场，镰刀斧头的红旗和列宁像挂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上有地方军政官员和各界代表，还有穿着军装佩带勋章的苏联顾问，其中有加伦将军。大会主持是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他在致开会词中，大力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灿烂的阳光，特别是列宁同志首先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满清王朝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922 年 8 月苏联派越飞同志来华和孙中山先生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事宜。接着于 1924 年还派军事顾问帮助孙中山先生建立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今天东征军能够取得两次的胜利，就是由于苏联帮助我们建军的结果。最后大会还通过给苏联政府的贺电。全场热烈欢呼和鼓掌。现在回想起 54 年前这段历史，敬佩周恩来对于马列主义坚定的立场和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经得起五十多年的考验，直至他离开我们，始终不变，真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联想起 1925 年 3 月东征军第一次入汕后，汕头各界举行欢迎东征军第一次入汕大会，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赞扬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时间过了两年，1927 年“四一二”他就叛变革命，挥舞着屠刀屠杀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也屠杀国民党左派人士，甚至在 1927 年底广州公社武装起义时，还屠杀苏联驻广州的外交官。回忆起这段历史，两相比较，使我们敬佩

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周恩来，痛恨口是心非的蒋介石。

三、建党、改组国民党及其它

1925年两次东征取得胜利之后，群众从现实生活中看清楚这是共产党协助国民党改组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建立黄埔军校的结果。因此，东征以后潮汕地区出现革命的新局面，群众都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功劳。党在潮汕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党通过各条战线所宣布的政策和措施，都符合群众的利益，为群众所衷心拥护。第一次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建立了中共潮汕地委，同时也建立了共青团的汕头市委，以后工农商学各群众组织中都有党团的基层组织。这时期的党团组织还不是公开的。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后，周恩来同志首先是关心健全党的地方组织，其次是注意各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到达汕头的第三天，就选派往各县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的特派员。当时派往潮安县的是郭瘦真同志；派往揭阳和普宁的是方临川同志；派往潮阳县的是赵之朴同志；我被派往惠来县。回忆当时杨石魂同志介绍笔者到东征军指挥部去见周恩来同志时，他戎装未卸，室内还放着行军床，经杨石魂同志介绍后，他面带亲切和蔼的笑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接着他用严肃的语气开门见山地谈起改组各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必要性。他说：东征军进入潮汕打倒军阀后，就要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过去各县国民党组织大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及封建势力所把持，如不加以改组，另选左派人物主持，不可能执行三大政策。接着向我了解惠来县国民党组织情况后，就写派令派我为改组惠来县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我奉命到惠来县后，遇到了地方封建势力多方阻挠，开展工作有很多困难，但在新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同时又有广大工农和青年们的支持，后来终于排除干扰，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从而带动了农村农会和沿海盐民协会的发

展，为建立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东征军取得伟大胜利后，由于海陆丰农会组织蓬勃发展，大军人城后，也推动工人组织的建立。当时汕头工会组织在杨石魂、陈振韬、方达史等同志领导下，先后组织起来的工会有：潮汕铁路工会、建筑工会、联安工会、理发工会、店员工会、缝衣工会、邮电工会、纺织工会、海员工会、轮船装卸工会、司厨工会、水电职员工会、手车工会、民航工会、洋务工会、甜料包饼工会。至1926年才正式成立汕头市总工会，选杨石魂为委员长。至于农会组织，因为彭湃同志先期在海陆丰培训了一批农会骨干，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后，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在汕头建立，彭湃同志亲自来汕主持，并调来海陆丰一批有组织农会经验的干部到潮梅各县帮助组织农会，使潮汕各县农会组织迅速开展具备条件。汕头市郊农会于1926年春成立，由张秉刚同志负责。

汕头罢工委员会成立——1925年6月，爆发震动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以后，在汕头英国轮船公司的轮船任职的海员和英国洋行仓库工作的中国人也相率罢工声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为着就近领导汕头罢工工人，派干部林□□和刘琴西来汕组织汕头罢工委员会，会址设于新马路红砖楼（即同济医院新址），并组织罢工纠察队。汕头各界为着支援罢工工人，成立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该会附设国民通讯社。

四、召开东江行政会议

在东征军第二次入汕之前，周恩来领导东征军经过揭阳县，揭阳人民纷纷向周恩来控诉揭阳县长曾靖圣贪污腐化，压迫人民，要求东征军撤他的职并予以惩处。周恩来通过派员调查，确有贪污扰民情事，当即以东征军指挥部名义给予撤职查办，另派随东征军来汕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卓凡接任。周恩来根据揭阳的

情况，同时摸查东江各县吏治的情形，知道在军阀统治下，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在革命政府统治下非来一次整饬吏治不可。1925年春，东江行政委员公署成立后，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东江行政委员周恩来认为，要整顿东江各属吏治，非召开一次行政会议不可，遂于1926年春在汕头市外马路原岭东商业学校（即现在汕头市东方红三小）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县长、各县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和妇女代表等，由周恩来委员做政治报告，并宣布革命政府施政方针及各项政策，同时勉励全体代表同心同德帮助和监督地方行政人员贯彻执行革命政府方针政策。通过这次会议，各地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特别是工农组织发展更快，革命声势震撼整个东江。

五、组织商民协会促进工商界团结

东征军第二次入汕后，经过改组的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在左派的掌握下，设立商民部，进行工商业者的统战工作，通过对工商界的宣传活动，结果组成商民协会。参加商民协会的中小商户有3000户。中小商户既有自己的组织，又有革命政府的支持，就敢于提出废除过去受到的不公平的剥削。革命政府对于被压迫的中小商人，给予同情和支持。于是在1926年初向市总商会提出改善今后派款建议：应以商户资本额大小为标准，取消过去以缴纳房捐多少为标准的不合理办法。结果，由于中小商户有自己组织——商民协会的集体力量，又有革命政府的支持，市总商会终于采纳这个合理的建议。在汕头商会协会成立之后，周恩来同志曾以东江行政委员的名义召集汕头市总商会委员和汕头市商民协会委员在永平酒楼开会，周总理除作政治报告外，便阐述革命政府对于工商业采取团结保护的政策，指出不能大户压小户，应该团结一致，遵守革命政府法令，共同维持革命秩序。这一席话使出席的工商界代表触动很大。

汕头商民协会除了提出改善派款建议之外，还向当时财政处提出取消“直凭票补水问题”。东征军入汕以前，汕头币制紊乱，达到登峰造极，私人银庄林立，每一银庄都可以印发纸币——七兑券；国家银行，如中国银行则印发大洋券，广东省银行则印发毫洋券。同时硬币银元、毫洋，也在市面混合行使，商户缴纳税款和商户款项收支都要直凭票（即七兑券），如用硬币大洋交款，还要补水，因为商户认为大洋重量不够七钱，如果收入是大洋，付出要七兑券，经常要补水，商人经常受损失，商人群起反对以直凭票为货币标准单位，商户联合向汕头市财政处请愿，要求应按全国通行以大洋为货币单位。当时汕头财政处长俞飞鹏支持商民协会的意见，取消了直凭票，改以大洋为货币单位。

汕头商民协会接着还做了第三件好事——请求取消货物转口税。在军阀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摧残工商业的发展，潮梅地区尤为严重。当时潮汕地区有所谓“转口税”，凡是潮梅货物出口，已经收了正税，但经过潮梅地区第二港口，卸存仓库，准备运往第三市镇销售的，应纳“转口税”2.5%。这样重复课税，加重国产货品价格，便利洋货倾销。汕头市商民协会于1926年春向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建议取消这种“转口税”，结果获得批准。

六、收回教育权与创办革命报纸

(1) 收回华英中学教育权——“五四”运动时期，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曾因英籍校长华何力不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曾举行罢课，结果一部分学生被开除转学到别的中学，而华何力仍旧凭借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的特殊势力，没有动摇他在华英中学校长的权力。东征军入汕后，华何力依旧采用奴化教育，压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激起学生普遍不满，于是全校师生在各方面推动支持之下，发动了收回华英教育权的斗争。当时汕头中国银行行长陈

玉锵，是捐资建筑华英中学校舍的陈雨亭（大资本家）的儿子，在群众推动之下，激起他的爱国热情，向华何力提出要将其父亲捐资创办的华英校舍全部收回由中国人自办，华何力不同意，咬定校舍已属于教会产业。广大群众大力支持陈玉锵，提出收回自办，双方相持不下，只好诉之法律，到地方法院打官司。结果由法院判决由中国收回自办，改名为南强中学。组织校董会，由陈玉锵为董事长，并由董事会聘请陈小豪为校长。当时东江行政委员公署认为外国教会任意在中国领土内设立学校，不受教育部门管辖，是侵犯中国内政，立即指示汕头市府发出命令：①教会学校应在政府立案，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辖；②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任校长。这项命令一发布，全市人民热烈拥护。

(2) 宕石中学收回自办——1926年底，继华英中学收回自办之后，宕石中学学生也发动了收回宕石中学自办的运动，当时宕石中学校长美国人贾斌和教员彭维，对学生施行种种压力，学生愤而殴打彭维，贾斌老羞成怒，宣布学校停办，后又迫于形势，宣布恢复，并由教会另选中国教师林天铎任校长。

(3) 创办革命报社——大革命时期，汕头的报纸有由同盟会会员吴子寿创办的《大岭东报》；潮安县政客谢伊唐办的《民声报》以及梅县政客钱若储办的《平报》。这些报纸，各代表一部分地方封建势力，为反动派服务，虽然在革命形势影响下，他们的言论和新闻报道略有转变立场，但还是左右摇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着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迫切要求建立革命的报纸，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决定设立《岭东民国日报》，由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李春涛任社长。创刊后，积极宣传国民党改组后的三大政策，南方和全国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运动的消息。副刊也丰富多彩，有分类副刊：革命、文艺、农工、青年、教育等。“革命”副刊的版头“革命”二字，是周恩来亲笔题的。报纸出版后，大受广大群众欢迎，销售超过本市各

报的总和。当时国民党右派对《岭东民国日报》的言论恨之人骨，但在革命高潮时，右派也无可奈何。到了1926年底和1927年初，右派先后在揭阳绑架杨石魂同志，在澄海杀害彭丕同志，形势不断恶化，于是国民党右派就发动抢夺革命的宣传喉舌——报纸。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突然派新选的候补委员方乃斌来汕接办，同时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原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春涛，于“四一五”汕头发生反革命清党后秘密杀害。至此，整个潮汕地区和全国一样陷进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白色恐怖中。

七、潮汕七日红

老一辈的人不会忘记：1927年“四一五”蒋介石在汕头发动反革命事变，屠杀千千万万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日子刚刚过了三个半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率领的“八一”起义大军由南昌向潮汕进军，于1927年9月24日占领潮汕，后于30日撤离，这就是革命史上有名的“潮汕七日红”。这虽然是短暂的时刻拨开云雾见青天，说明周恩来在肩负革命全局重任之下，时刻都关心为潮汕人民谋求解放。当起义军进入汕头的日子，我正在家乡惠来县农村组织农村赤卫队迎接“八一”起义大军南下解放潮汕，接到起义军进入汕头的消息时，我正启程前来汕头的途中，获得起义军撤出汕头的消息，只好折回惠来。接着在神朱镇乘木船往香港，与郭沫若同志在船上相遇，在谈话中得知“八一”起义军进入潮汕情况，他谈到周恩来在行军途中发高热，仍带病指挥作战，后来因敌强我弱，迫得撤离城市的情况下，周恩来为着武装农民，在潮阳、普宁、惠来、陆丰、海丰等地留下一批武装骨干和大量武器、弹药，为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后来在大南山、大北山开展游击战创造条件。

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年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蹂躏下的潮汕，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给我们奠定革命基础，随着全国解放而彻底

解放，整个潮汕已是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缅怀周恩来和无数先烈的历史功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附 记

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925年两次东征时期，周恩来在潮汕领导革命活动，耳闻目见，我是亲身经历的。解放后考虑到大革命时期潮汕的革命史料还没有人作系统的搜集整理，曾将这个意见向中共汕头市委领导同志提出，得到他们鼓励，于是曾约参加过大革命潮汕铁路老工人、建筑工人、老店员、老商人，开过若干次座谈会，共同回忆往事，互相启发，搜集了不少材料，加上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大革命时期汕头革命史料初稿。1957年曾将部分史料送汕头报发表，今年上半年又写了几篇关于周恩来东征时期在潮汕的革命史料交《汕头日报》发表，许多老同志鼓励我将过去搜集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周恩来在潮汕的革命史料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大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增添了我的勇气，现在所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在我所保存的潮汕革命史料中摘出来加以整理。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回忆起来，也许还有若干错漏的地方，希望参加过大革命时期革命活动的老一辈同志给我指正。

(1979年)

回忆周恩来追查廖案的片断

李甫*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会议后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排了各部部长，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孙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猖獗起来，就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先生。因为廖仲恺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执行“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紧密合作，又是工人部长。他支持工人运动，维护人民利益，誓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先生恨之入骨，必除之而后快。于是指使凶手于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他。出事地点是今越秀南路78号，当时称惠州会馆。“廖案”发生后，轰动全城。

黄埔军官学校全体学生闻讯后，群情激愤，要求追捕凶手归案，为他们的廖党代表报仇。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害怕起来，立即返回广州公馆，不敢回校。为此，学生军只好请求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全校师生的委托，回到广州市区来，追捕刺杀廖仲恺凶手归案。他从各方面深入调查研究，证实是国民党右派干的。当时认为凶杀案的主谋人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另一个是粤汉铁路局局长林直勉。

周恩来了解到我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党员，就通知我去见他一

* 作者当时系在广州铁路部门工作的中共党员。

面。我当晚就到广东区委见到了周恩来。他跟我打了招呼后，就问我：“你在铁路工作有多少时间啦？”我答道：“约4年左右”。他又问：“现在是谁当局长？”我说：“是林直勉”。他再问：“你有没有见过他，能认出他来么？”我说：“我常常和他见面。他个子清清瘦瘦，好似个官僚贵族的样子。”周恩来点了点头，不一会就带我到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他和我闲谈起来。他问我：“在工人运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党内生活过得怎么样？发展了多少新同志啦？”等等。谈话时已很晚了，他就指着对面的那张沙发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睡觉吧！明天早上，请你帮我做一件事。”到了深夜，周恩来又亲自拿了一壶开水和一盒饼干来，交给我，叫我吃。

第二天天刚刚亮，周恩来又来了。他带着我和4个武装的军校学生，步行到东山区一间公馆。入门后，他指着一个男人问我：“他是谁？”我说：“是林直勉。”他又问：“你没有认错人吧？”我答：“没有，一点也没有错，他就是林直勉。”于是周恩来立即叫那个4个学生军把林直勉带走。

周恩来又带我到了另一间公馆。入门后，我见到廖部长夫人何香凝正在痛哭，双眼的泪水往下直流，万分伤心。周恩来就上前去安慰她，并说：“我们全体军校师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廖党代表报仇！”他指着我对廖夫人说：“多谢这位铁路工人同志，将刺杀廖党代表的主谋人林直勉逮捕归案，党代表的仇已经报了。今后你不要过于伤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经过周恩来的一番安慰，廖夫人才逐渐安静下来。

周恩来办事干脆利落，机智谨慎，深入调查研究，平易近人的作风，虽然经历50多年了，但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1979年 潘展明、杨枫整理）

第二次东征中的五华双头之战

符昭骞*

《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李奇中先生所写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文，内容精审，条理不紊，洵为具有价值的资料；惟其末段所述“惠州战役结束后……仅在海丰附近，打了一个小仗，以后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挡了”，可以商榷。我当时担任东征军第三团参谋长，就亲身经历和回忆所及，当时除惠州战役外，何应钦没有打仗，但是别人还在打。双头之战役虽只打了一天，但消灭了李易标全部，缴获武器、俘虏敌人甚多。我认为，双头之战未可抹煞，爰将其概况补述。

一、敌我双方兵力装备概况

李易标系林虎部一员强悍的大将，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他第一次东征在棉湖、鲤湖、五华、兴宁等地一再被击溃后，损失至巨。林虎自审形势不佳，已逃匿香港，该部遂归李易标统率。当时陈炯明仍垂死挣扎，复与北洋军阀和英帝国主义勾结获得饷械的援助，并利用党军回师广州的空隙以其乡土（东江）为巢穴整军经武，妄图卷土重来。

李易标军计辖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刘志陆等部约四五万人，是陈残部的精锐。这支部队的装备就比较齐全，有德国克虏伯管退山炮两连，每个步兵团有马克沁水机关枪2-4挺，又有哈机开斯式轻机枪，步枪全为双套筒的德造七九。

* 作者时任东征军连长，后任团参谋长。

冯轶裴原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处长。因为前任参谋处长是谭家骏，当蒋介石任参谋长时，飞扬跋扈，独断独行，谭已窥见其野心很大，将来必去许自代，所以曾向许建议：“您勿信任蒋某太过，并须遇事躬亲自理，以免大权落旁，太阿倒持。如不防患未然，那将来必陷蒋的圈套，后悔莫及。”但许未采纳，连谭所说之话也对蒋和盘托出。谭乃假装消极不愿再干，并收拾行装拟赴沪，经许婉言挽留，始作罢论。但蒋则坚持非去谭不可，许为人过于天真，最后去谭留蒋，谭之遗缺由冯轶裴接替。冯为人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由此得蒋欢心，故第二次东征时，蒋派冯出任某纵队指挥官（番号已忘）。冯原来是东征军独立团的团长，以新任团长充指挥官，而指挥张和及余鹰扬两个资深的粤军老旅长。张、余对冯当然不会心服口服，但怯于蒋之权威，未敢异议。

冯之兵力仅为5个团，共约6000余人，重兵器较少，且无炮兵，重机枪4挺，但均有名无实，打起仗来，不是此零件发生故障就是那机件失灵，其步枪则有“村田”（日俄战争时日人库存之物，后来卖给古应芬。古利用冯团驻防四邑所得防务经费向日人买来的。此枪冯团约占80%）、曼得夏、日式六五马枪和一些破旧的粤造六八、汉造废品单筒七九等，故冯部未作战前，粤军咸以“三武鹅五”称之（广东人打天九：最大之牌为天九，次为地八，再次是人七，最小者为鹅五，三武鹅五，就是最不中用的杂牌）。

二、双头战役的经过

李易标部自惠州被我党军攻陷后，因为立足不易，企图撤回闽粤边境，但后来被何应钦、陈济棠、陈铭枢（后来不久又南开琼崖去打邓本殷）、张发奎、冯轶裴等部分途追堵和拦截，不料甫抵双头，又遭冯部截击。此时李易标军已拖得人困马乏，士无

斗志，故被冯解决，兹再述其战斗经过如下。

1925年11月某日，冯率张、余两旅及独立团从安流圩向场坑，施行超越追击，由早晨出发后，正向目的地推进，行抵双头交叉道口时，以前卫陈道衡团迷途，于无意中碰上了李易标的先头部队。李易标急就双头以南的风车牛东西一带高地展开，自上午9时左右，一直打到下午3时左右，双方增加后续部队，争夺风车牛甚烈，双方各有伤亡。迨敌炮在风车牛右侧发射后，火力益炽，冯部伤亡尤多，攻击颇现吃力。冯复以东征军独立团调至我们左翼寻机出击，隔敌仅三四千公尺，第九连连长符昭骞建议，以我营向敌炮兵阵地猛袭，必可挽回颓势，营长符麟瑞曾转向团长请示，未得允诺。然符连已独断专行，率部急向敌人右翼迂回，续向敌炮兵阵地猛进矣。因此一地带多为童山幼林，故尚可隐蔽前进，因敌大意仍未被发觉。符乃重新部署，匍匐向敌潜行，迨接近敌炮百余公尺时，遽以排枪向敌炮猛袭，号兵温玉麟吹奏冲锋号，旗兵梁超、班长周胜彪和符连长昭骞一拥而上，敌人惊惶失措，四散逃匿。周胜彪夺得轻机枪一挺，便向敌打了两梭子弹，敌乃大惊溃散。张、余两旅前线官兵亦向敌猛冲，于是敌全线崩溃，咸大呼：“唔使打咯！我地愿缴枪。”（粤语：不要打了，我们愿交枪）符因捷足先登，第九连缴枪三四千枝、轻重机枪30余挺、山炮6门，而张、余两旅，缴枪最多者为黄国樑和魏劲华（均云南讲武堂学生），其他各营连均有缴获。

这可说是冯轶斐部大获全胜，除李易标和三黄只身逃脱，刘志陆一股北窜外，其余大致被歼，冯轶斐于翌晨派队穷追，然刘已北窜投奔北洋军阀去了（后来刘跑到胶东，最后即演变成为刘珍年师）。我们从双头一直追至福建之上杭属之下洋，才奉命开返潮汕整训。

三、冯轶裴荣升师长，张、余反为阶下囚

部队移驻潮州后于 1926 年正月初二、三日，何应钦假借点验为名，派队来至意溪车站勒令张、余两旅缴械，其罪名是通敌有据，并派来第二、三期黄埔学生多人，将张、余两旅各缩编为一团，同时派薛岳为第一团长，涂思宗为第二团长，第三团则以原来独立团改番号，尚未缴械，但五个月以来的军饷则一笔勾销，官兵每人只给两元大洋了事；并以酆梯、贾伯涛、伍翔分任一、二、三团党代表，升黄国樑、魏劲华、符昭骞为一、二、三团参谋长。

温玉麟、梁超、周胜彪均以功升中、少尉，连同其他出力官兵遣送多人至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学习，惟张、余两旅长及其营长以上军官多被淘汰，立功者不赏，反而得咎，粤军将领大都积恨未消，然蒋已坐大，无奈其何也。

(1961 年)

参加东征的片断回忆

杨 立*

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叫做“国民党军官学校”或“陆军军官学校”，北伐后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苏联的帮助下苦心孤诣创办的、培养革命军官的学校。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讲话时说：“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作根本，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黄埔军校成立后，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参与工作，如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任教官。由国共两党保送各地的革命青年入伍。来自各地的革命青年，本来就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十分愤慨，因此，打起仗来格外勇敢。黄埔军校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以前，是有其光荣传统的。“四一二”以后，黄埔学生分化了，继续革命的跟共产党走，今天人民解放军中还有早期黄埔同学，担任高级军官的。

我于1924年底进黄埔军校第三期，编在入伍生团第二连受训练，比其他连队早三个月入伍。当时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叛军首领陈炯明趁机策划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1925年2月，革命政府下令讨伐，入伍生第二连奉命随同军校教导团第一团出发，担任团本部警戒与后勤业务，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史上有名的淡水、平山、棉湖诸战役。军校教导团是以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一期学生于1924年11月毕业），最初成立的党军，当时只有第一、二两个团。中国国民党从辛亥革命以来，到那时

* 作者系当时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才开始有了党的军队。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以前叫大元帅府），并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时黄埔二期学生已毕业）和其他参加革命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党军不同于军阀部队，党军重视政治工作。军中有党组织，连以上设有各级党代表。当时东征政治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妇孺挤观，鸡犬不惊，得到东江农民、工人一致援助，给东征军提供担架队、运输队和敌情，于是能打赢仗。

当时东征军分为三路出师讨伐：中路桂军，左翼滇军，这两路军队坐视成败，独担任右翼主力的黄埔军校教导团，由粤军配合，长驱直入，打了大胜仗。2月开始进攻，3月便击破陈炯明主力军于兴宁城下，随即攻克潮汕，席卷了整个东江流域地区。陈逆盘踞东江三年之久，滇、桂、粤、湘各联军始终未能击败它，这时却被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迅速击溃了。当时苏联加仑将军、军校苏联总顾问契列班诺夫在前线，目睹黄埔学生军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谓比欧战时之德国少年军尤有过之。

当黄埔同学在战场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之时，也正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生命危险的时刻，他仍然无限关心在东江战线的黄埔学生。入伍生二连进驻海丰时，连上宣读了孙中山先生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的电文，告诫他们要爱惜黄埔同学，不要把在校的学生用在前线，说宁可损失一个营，也不要牺牲一个黄埔学生。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但当时领导立即遵命宣布本连克日开拔返校。全连同学非常激动，都流下眼泪。当时连长何人已经忘却，尚能忆及者有个同学叫吴振刚（闽西连城人。解放前夕任国民党闽北师管区司令，驻福州，现在台湾）在场，触念既往，真是百感萦怀。

（1981年）

陈炯明军踞东江时惠州的给养

张友仁*

1923年11月陈炯明来惠州，除平山已设粤军总指挥处外，又在惠州设粤军总司令临时办事处。其时陈逆从老隆运大宗谷米来惠救济军食并施赈粥。陈逆对我说：粤军财政须有统一办法，断不能任军人自由罗掘。因为我在粤军回粤时任东江粮饷局副局长，即要我组东江筹饷局，随于12月底成立。当时杨坤如不愿该局之成立，妨碍其任意苛勒，乃于开局第三日，立即要度岁费5000元。我知道他们必然如此，想定办法，计惠州烟酒税月可收若干元，屠捐一万，盐税可收十万，其他花捐等原有捐税，如果涓滴归公，东江军饷伙食每兵2角、官长4角，每月的发薪，局中应付有余。开局之日，布告凡商人持原日承办执照即日起饷，不需要出示费黑钱等，所以两日就收得预缴两万元，已给5000给杨部等，再给5000，再给5000，杨等没有借口，筹饷局遂成立。各捐皆商办，惟盐税则由杨介绍其弟任职，不如法缴款，我立即依法撤他的职，杨大怒，我知局已成立，军人蛮横，我不能受，两个月即离职赴港。

嗣后杨坤如派殷仲甫接任供其利用，但不敢自由罗掘。平山总指挥部依照军饷局方法，在平山设立粤军财政处，除仍由殷办理城中筹饷，城外各圩及海丰等各局则由财政处管理统筹。于海丰设分局为办事处，谭史为处主任。但杨坤如另想出办法，在城中设局私铸毫洋，获利甚丰。毫洋成色比广州更低了。

子弹补给，原在粤军援闽时，陈逆派丘君一在海丰设厂翻抄

* 作者时任陈炯明属下之东江筹饷局局长。

子弹，四处收买弹壳，又设法造炸药，以支持东江各部队的子弹补充。陈逆部队退东江时，都拥有丰富的子弹，而翻抄仍旧继续。

潮汕似有筹饷局，我不清楚。

1925年，骆凤翔部归降胡思舜，原因复杂。大概杨将筹得饷项多人私囊，部下收入不平衡，以至长期处于艰难状态，因而对杨不满，此是原因之一。

粤军与吴佩孚等勾结情事，我全不知道。但是在平山粤军总指挥部曾接到吴佩孚的改唐诗一首，诗云“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革马羽书迟。鱼龙寂寞东江冷，河洛平居有所思。”后来吴失败居洞庭湖，叶举亦寄诗答复，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玉在湖。”把“在玉壶”改一下，嘲笑子玉先生。据指挥部中人说吴曾代寄广东省长命令与叶举，叶不理亦不发表拒绝，未悉确否。

(1964年)

1925—1927 年我经办各税收机关之回忆

温福田*

一、办理煤油类专卖和特税之经过

我于 1925 年 12 月间奉令将梧州煤油局撤销，回到广州办理结束后，即奉派为潮梅区煤油类专卖局长，又赴汕头设局开办。根据海关报告汕头入口之煤油月销由 5 万至 6 万箱。我已办到 5 万余箱，月中收入亦在 10 余万至 20 余万元。因广州群众示威反对，专卖奉命改为特税。其时我已奉准以月销 6 万箱交由商人承包，但财部之煤油总处亦已撤销并入林子峰所办之税务总处。他则陆续派人来接充课长以上重要职位。惟他所派来之人到局报到后只支薪而不到局办公，日夕则闲游于汕头市面一带。我见得如此状况乃即行辞职，奉准后即交卸回穗。

二、开办广州市河南禁烟专卖局之经过

1926 年 7 月间北伐节节胜利，国民政府拟改设在汉口，宋部长亦已赴汉口设部办公。粤方在孔祥熙尚未到粤之前，部务暂由秘书长兼禁烟总处长李承翼代行。我由汕头交卸回穗见李秘书长后，他即派我为广州市河南禁烟专卖局长，着即设局开办。我接到委令后得见李总处长，要求先给我两星期时间，以便调查一切。缘河南一带其时为国民政府第五军长李福林的根据地，烟赌方面向来由他兼办，别人不易占据，因此禁烟总处曾派数人前往而无一成功。幸而我有一知交冯业三在汕头相熟者，其时他系代表李福林之弟李芳（化名大眼芳）办理承办汕头赌饷事宜，阅报

* 作者时任潮梅煤油类专卖局长，广州市河南禁烟专卖局长。

章得悉我被派为河南禁烟专卖局长，乃来见我，由他得悉李福林是个好人，而在河南方面专搞事者为其弟李芳，因他曾海参崴之中国楼工作，故熟悉俄语，得获充第五军之总指挥军职，与俄国教官往来。至于他所搞之事系靠其侄李镇威（花名烟注）代为办理一切，故托冯君代为斡旋。而另一方面得悉李福林对于邓泽如颇为恭敬，又一方得见邓公，请他在李福林方面代为吹嘘；又亲自往各烟馆，表面上往吸烟，实则暗中调查其业务状况。于是估计每天销额总有 1000 两以上，而同时适在河南溪合李芳原设之俱乐部结束，乃谋租该地址为设局之地点。诸事就手后乃往见李处长，告以河南局可着手开办，但经费方面要求准予提成。如印花税为八成解部，留二成作经费；而我只要求五厘经费下九成五解部，但烟膏价值在河北方面为每两 6 元，在河南方面其时价值为每两 5 元，仍按每两 5 元计算。至于其时的销额定每天 500 两，只办到 400 余两，估计由我们办理于 4 个月后可办到每天 1000 两。倘以上条件奉准，可即奉命前往开办。李处长阅后即批准试办。其时为 1926 年 8 月，即开办河南禁烟专卖局之日期。开办后即公布所有烟馆名称一律改为戒烟治疗所，简称戒烟所；而烟膏称为戒烟药膏。各戒烟所分为第一、二、三等，要到局重新注册规定以床定灯，以灯定枪；以每枪日销烟 5 钱而定其销额。开办后在第一二个月日销额只得由 300 余两至 500 余两，而致提成收入不敷全局经费之开支。惟事有凑巧，适其时李芳存有长枪 30 余支存放在河南义和里烟注之俱乐部，为税务总处之缉私局查悉，派队伍到该处查缉缴去。李总指挥派冯业三来与我商议，设法向财部交涉归还。我即将此事报告李处长，并说明该项枪支系李总指挥于办理缉私护商卫旅营时所用，应予归还；并说如该项枪支得由我代他说项而获归还，我们在河南办理之禁烟可顺利而进行。李处长即批准归还。李芳得获枪支，甚为感动，并要求冯业三和我与他三人共结为义兄弟，并对第五军的驳壳营长

李烈及舰务处长秦棠说，我是他义兄弟，如我需用驳壳枪或舰船，可随时借用。得李总指挥之助力，我的工作进行极为顺利。从第三个月其日销膏额已达到 700 余两，而第四个月果达到 1000 余两。其时所得之提成经费及其他的杂款收入，除去本局月支经费 4000 余元之外，尚有净余七八千元为我个人的收入。李处长极为赞许，并着我荐我的秘书李智庵为副局长，继而升我为五邑禁烟支处长兼台山专卖局长及五邑专卖局副局长等职。似此明为升任实则暗降，因五邑又是新开办的机构；而在台山方面，其时的县长为刘裁甫，与此人合作殊非易事。所幸者不久孔祥熙来粤接任实业部长兼代理宋在粤之财政事宜。得获孔部长到穗之消息后我即回来见他。他看我的名片刻着五邑禁烟支处长，即说我原在盐务供职，何以办理禁烟，并问盐务好办，还是禁烟好办。我说盐务已上轨道，而禁烟系专与坏人作对，实非易办之事，因此当然以办理盐务之事为佳。他即答允于有机可乘时自当调我回盐务。我回五邑不久，即接消息以盐务总处副处长朱忠道奉派赴汉口组织盐务所，遗在粤盐务总处副处长派我充任。我即离五邑回穗并接任，并呈请禁烟总处准予辞去五邑禁烟各职。但李处长以我办理专卖事宜获利，故于我离开后仍用我的人办理，虽我要在广州做事，五邑的事以我的名义遥领之亦无不可，故只有听其自然而办下去。其时为 1927 年 5 月间适国共行将分裂之际，在粤方面财部由古应芬接任，而其时孔祥熙已赴港转沪，及李承翼又被当道扣留，我即解除各职赴沪。到沪后往见宋部长，他即着我往汉口。

三、在汉口办理各事务之经过

我抵汉口后，初奉派为财部库藏局，后改为国库司副局长，继而接任财部盐务总处长兼湖北省盐处长、鄂岸樵运局长、湘鄂赣缉私司令及金融委员等职。值至宁汉合作后我即奉命赴宁接收

盐处。抵沪后适南京局面又变，宋子文则离职，以孙科继任财部，而盐务则由刘维焯承之。孙科曾派李纪堂来见我，以我原系盐务稽核人员，拟派我为盐务稽核所总办，并征求我的同意。但宋诚恐我为他人所用，乃着蒋维先拿 350 元给我，着我暂时回粤休息，同时林子章亦对我说他决回粤，我乃随林君回粤。

(1965 年)

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财政情况

沈仲强 吴述彭*

一、沈仲强在广东省财政厅的点滴回忆

1923年到1925年，大元帅府期间，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是胡汉民系亲信人物古应芬（原文如此。1923年5月至1924年秋，广东财政厅由交通系叶恭绰、郑洪年主持。——编者）。当时大元帅府积极部署北伐，广东方面筹饷工作异常紧张，但财政来源十分困难。

当时杂牌军队很复杂，各据一定的防区。其驻防区内一切田赋、税收、公债等等收入，均被各部队的长官截留，自行支配，绝少上缴。各县市更公然开烟开赌，走私漏税，主其事的地方官吏和税捐人员，多直接向大小军阀纳贿联络，互相包庇勾结，广东省财政厅几乎无权过问。因此，一个时期广东省财政厅的主要收入，只靠广州市及接近省会地区的市镇的收税来挹注，长期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记得驻在广州的行政教育机关向财政厅请领经费时，不能如期发出，积欠甚久，有时连三几成也发不出来。大元帅府直属的后勤、警卫、参谋等机构人员的薪饷，也同样无法发放。而各地催发军饷的函电纷至沓来，广东省财政厅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后来有人向财政厅献议，将广州市的“官地”和近郊未开辟的山岗，划分地段开投，以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这个办法在

* 作者沈仲强时在广东省财政厅主办官产股事务；吴述彭时任广州市政府市库出纳主任兼广东省财政厅第四科科长。

当时比较易行而见效。第一次大战后，海外华侨不少汇款回国购地置业，建筑房屋，城内地皮求过于供，价格不断上涨。财政厅即与广州市政府筹划，以筹措北伐军费为名，大量开投“官地”、“官产”。

开投的具体办法已经记不清楚了，这种开投“官地”的办法，产生了不少弊端，与代帅胡汉民及古应芬有关系的人，在这方面得到了特殊的方便。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开投近郊的一个山岗，依照规定，只要看过蓝图，肯照底价付款，没有别人出来竞投，就算得标，马上缴纳地价，就发给执照营业。后来却发生了“多包案”，同一个地段，先后有几个人向财政厅投得，财政厅对于来投者是来者不拒，只要肯缴款承投，就收款发照。经办人员和居间人员从中向投承者索取贿赂。曾经有过同一个地段给六个人投承，收了六次地价，发了六张营业执照。后来发生争执，就向财政厅申诉，财政厅如果承认其中某一个投承人，就必须把其他几个投承人的地价退还，但财政厅经常库存空虚，只好用拖的办法应付，对所有投承人的申诉，一律以“等候查明办理”的官样文章批复。后来无法可拖，投承人之中又有后台，还向财政厅提出控诉和威胁。最后只好由古应芬出马，找着代帅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下一道命令，批示“由某某营业”。其余落空的只好向财政厅追还地价，财政厅又批复“等候库款稍裕时再行发给”作了。

二、吴述彭关于广州市变卖官市产的见闻

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后，财政万分拮据。卢梭魂建议，根据旧册籍，广州沿河、沿涌、沿濠两岸，淤积形成之土地为数甚巨，这些土地被人霸占，多已建成房屋，如沙基一带，市肆栉比，形成三江帮集中地点，就是由珠江河岸沙滩逐渐形成的；认定这些土地系公产，加以清理变卖，是一笔极大的收入；此外还

有不少市产，有些素属地方公产，有些是逆产——如李耀汉的长堤码头、杨梅彬的海珠戏院等；庙寺庵观历年聚敛所得的产业也为数不少。一概清理变卖，大可解决财政开支。这个建议由孙科呈请大元帅批准，立即实施。

大元帅批准实行变卖官市产之后，在广州市财政局设立官产股，任卢梭魂为主任，处理沿河、沿涌、沿濠官产，调查清理开投变卖事宜；另外成立市产股和庙寺庵产股，分别处理市产和庙寺庵产的变卖。

具体做法是：凡官市产经确定后，由市政厅定出底价，公告变卖，三天内原占用者有优先承买权，三天后即开投，以出价高者得，如无人承投，则任人照底价承领。承得者由市政厅发给执照营业。同时号召举报，举报属实的，以该产业价值20%为奖金。怎样才叫做官产？当时有一项规定，业主执有前清道光红契者为民产，否则就是官产。这个办法直接触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利益，广州市商会和广州商团等都极力反对，曾发动向省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不为所动，坚决照原定计划进行。

1924年初，我任广州市库出纳主任，财政局长是陈其璦。这个期间变卖官市产的收入，已不及刚开始举办、黄芸苏当局长时那样大。由于官市产多、价钱高（沙基一带土地每井800元）、投承者众，收入还是不少。我任出纳主任的三个月内，每天经手收入的变产款，多的一天有三四十万元，少的一天也有十万八万元，平均每天有20万元左右。当时财政除税契一项有些收入外，其他项目为数不多。大元帅府和广州市政厅的一切军政费用，可以说全靠变卖官市产的收入来开支。

每天下午3时左右，我的办公室就坐满了手持大元帅命令来领取各种款项的人，每天来领款的大约有几十人。有黄埔军校的、有广东大学的、有谭延闿部的、有樊钟秀部的，他们都拿着

孙中山亲笔批的字条。收入只有一项，支出却有多项，经常入不敷出。我应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根据当天收入的总数和大元帅命令应该支付的总数，平均分摊，没有领足的第二天再付，有些数目太大的，则协商分几天支付。由于采取“一视同仁”，平均分摊的处理办法，所以纠纷争执比较少。有个别领款者坚持要如数付清，我将收支数字给他看，把保险箱也打开给他看，使他看到的确是分文无存，也就无可奈何了。广州市政厅所属各局的政费，也是按日支付的，记得工务局和卫生局每天领 500 元。

变卖官市产的办法，规定以有没有道光红契作为划分官产民产的标准，但也常有伪造证件，或证件不足而引起的争执，有些业权所有人甚至到省署上控。因此，省设立了官市产审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项争执。审查委员会由财政厅第四科科长、市财政局官市产股主任及省府的一些科长组成，每周开会，对争执作出决定。广州市政厅还设立了民产保证局，凡确属民产持有证据者，经民产保证局审核后，即盖章确认。民产保证局对申请审核的产业，按契载产价收 3% 的手续费。这也是一笔收入。民产保证局的收入一部分缴给大元帅府，一部分用以偿还省、港资产阶级的借款（也有变卖的官产抵偿的）。广州市实行变卖官市产后，外县也有变卖官市产的。我在陈其瑗继郑洪年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时，跟陈到省财政厅任主管公产的第四科科长。任内外县没有分文现金上缴，因为外县市变卖公产都由驻军把持，现款全部截留，只交一张收据给财政厅。

这里还要谈到一件与官市产有关的事情。在大元帅府刚成立的时候，香港商人杨西岩、林护曾借出巨款给大元帅府，杨西岩将他祖遗的香港三角码头抵押了几十万，借出来做军政费用。孙中山任命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厅长，杨只干了三个月，因无法应付而辞职，接他手的是跟叶恭绰同来的郑洪年。杨西岩、林护借钱给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批准了要归还。杨就拿着借条和

大元帅的归还命令找孙科要钱，广州市财厅没有钱给，他们就要求以官产来抵偿，得到孙科同意。杨西岩曾问我要哪些产业好，我建议要庙寺产，将来不会有产权争执。结果以仁威沙庙产、大佛寺和华林寺的部分产业，总计作价百多万之抵还给杨西岩、林护。民产保证局局长李纪堂，情况也颇似杨、林。李纪堂是佛山巨富李荫南的儿子，李荫南在辛亥革命前曾捐献革命经费（按：原文如此。）。民产保证局收入的一部分缴交大元帅府，另一部分就用来偿还李纪堂。

在变卖官市产中，财政厅职员有一种提成奖励办法，按财政厅收入总数提取百分之几作为奖金，叫作“自理费”。这项提成奖金由财政局全体职员按薪俸额摊分，我任出纳主任的月薪是100元，提成奖金多的时候，每月可以到二三百元，少的时候也有100元左右。局长、市长这种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举报官市产有奖金，但是没有发现金，而是发给奖金单，举报人可以将奖金单积累起来，作为现金缴交领取产业。

（1965年）

变卖广州市产、官产前后的财政情况鳞爪

吴述彭*

1922年12月“白马会盟”后，滇桂军东下前，叶夏声回上海向孙中山先生领取开拔费用，先生当即将华侨赠送的上海莫利爱路住宅，向银行押款5万元交叶带回作军费。次年1月，滇桂军攻克广州，2月迎先生回粤复任大元帅。

其时，陈炯明势力仍占据惠州、潮汕一带，邓本殷则盘踞南路。而滇桂军骄横跋扈，官兵动辄夸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故在驻地截收税款，形成财政方面有支无收，异常困窘。

初，孙中山先生向华侨筹措革命经费，港商杨西岩、林护都借出巨款，杨并将其祖遗的香港三角码头押借数十万元充军政费用，遂以杨为广东财政厅长。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三月杨因无法应付而去职。乃电以擅长理财见称之交通系叶恭绰、郑洪年来粤，任叶为大元帅府财政部长，郑为次长兼广东财政厅长。接事后，曾成立税捐整理处，意欲整顿税收，增加收入，唯无法解决驻军截收问题，自无效果。财厅形同虚设，甚至连本身政府开支也穷于应付。

在财政万分拮据中，卢梭魂向广州市政厅长孙科提出变卖广州的官产和庙寺庵产的建议。卢梭魂辛亥革命前任广州《南粤报》主笔，光复后，任南海县第一任县长，由于曾任是职之故，根据旧册籍，知道广州沿河、沿涌、沿濠两岸，因日久淤积而形成之土地为数甚巨，这些土地历年被商民霸占，多已建成房屋。如广州沙基一带，市肆栉比，为三江帮集中地点，就是由珠江河

* 作者时任广州市财政局市库出纳主任，广东省财政厅科长。

的沙滩形成的。这些土地显为官产无疑，加以清理变卖，是一笔极大的收入。此外，广州还有不少市产，有些属地方公产，有些是逆产，如李耀汉的长堤码头，杨梅彬的海珠戏院等。庙寺庵观历年聚敛所得的产业也为数不少，一概清理变卖，大可解决财政开支。这个建议在当时确是筹款良策，由孙科呈请大元帅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于是在广州市财政局里，设立官产股，由卢梭魂任主任，处理沿河、沿涌、沿濠官产调查清理开投变卖事宜，另成立市产股和庙寺庵产股，分别处理市产和庙寺庵产的变卖，还设一测绘股由钱述任主任负责测绘工作。

具体做法是：凡官产、市产经确定后，由市政厅定出底价公告变卖，三天内原占有者有优先承买权，三天后即开投，以出价高者得：如无人承投，则任由商民照底价承领。承得者由市政厅发给执照营业。同时号召举报，举报属实的，以该产业价值20%作奖金。至于何者为官产，何者为民产，当时的规定以业主执有前清道光红契者为民产，否则为官产。这个办法直接侵犯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利益，广州市商会和广州商团都极力反对，曾发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但事关解决迫切的财政收入问题，志在必行，大元帅亦已核准，广州市政厅坚决按照原定计划执行。

1924年，我继伍汝拜任广州市库出纳主任，那时财政局长是陈其瑗。这个期间变卖官产、市产的收入，已不及刚开始举办、黄芸苏任局长时那样巨大；但由于官产、市产数量大、产价高（沙基一带土地每井价800元）、投承者多，收入还是不少。我任出纳主任的约三个月内，每天经手收入的变卖款，多的一天有三四十万元，少的一天有十万八万元，平均每天有20万元左右。那时财政除税契一项有些收入外，其他是绝无仅有，因此大元帅府和广州市政厅的一切军政费用可以说全靠变卖官产、市产

收入开支。每天下午3时左右，我的办公室里即坐满手持大元帅命令来领取各种款项的人。领款的每天有几十人：有黄埔军校来的，有广东大学来的，有谭延闿、樊钟秀部来的……他们都有孙中山先生亲笔批发的字条。收入只有一项，支出却有多项，僧多粥少，经常入不敷出。

我应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根据当天收入的总数和大元帅命令应该支付的总数，按照成数平均摊分；未支足应领款的延至次日再付，有些款额太巨的，则协商分几天支付。由于采取一视同仁、平均摊分的处理办法，所以比之伍汝拜任出纳主任时，和领款者之间的纠纷较少。事实上领款者都持有大元帅命令，都是紧急的必要开支，不允有所轩轻。有个别领款者，坚持要如数即刻领清的，我将收支数字给他看，把保险箱打开给他看，他看到的确分文无存，也就无可如何了。至于广州市政厅所属各局的政费，也是按日支付的，记得工务局和卫生局每天是支领500元。

在变卖官产、市产时，虽规定以有无道光红契作为划分是官产抑或民产的标准，但也常有伪造证件，或证件不足似是而非因之引起争执者，有些业权所有人且到省署上控。因此，省设立官市产审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类争执。审查委员会由省财政厅第四科长、市财局官市产股主任及省府一些科长组成，每周开会审查，对争执作出裁定。

同时，广州市政厅还设立了一个民产保证局，凡确属民产持有证据者，经民产保证局审核后，即盖章确认。民产保证局收取一定手续费。有产业者为避免麻烦，多到民产保证局办理确认手续，这里也有一笔收入。民产保证局局长是李纪堂，据说辛亥革命前在香港曾将全部家产约百余万元，捐献作革命经费，故先生在其境况困难时酬以此职，其收入一部分上缴大元帅府，一部分则作为偿还李纪堂之用。

上面说过，在大元帅府初成立时，杨西岩和林护曾借出一笔

款，那时也得孙中山先生批准，归还他们所借出的革命经费。杨等持借条和大元帅归还命令找孙科要钱，可是每天收入都开支清光，没有钱还给他们。杨等后来要求以官产、市产抵偿，并征得了孙科同意。杨西岩曾问我要哪些产业好，我建议他要庙寺产，将来不会有产权争执。结果以仁威沙庙产全部和大佛寺、华林寺的部分寺产，总计作价百多万元抵还给杨西岩和林护。

在变卖官产、市产中，主事人有无贪污中饱情事，我因未亲历，不敢确证。当时对开始举办变卖官产、市产时的财政局长黄芸苏和主事人卢梭魂攻击者甚众，据说两人“刮龙”不少。另外财政局的职员都有一种提成奖励办法，即按财政收入总数提取百分之几作为奖金，谓之自理费。该项提成奖金由财政局全体职员按薪俸额摊分，我任出纳月薪100元，提成奖金多时每月可分得二三百元，少亦有一百元左右。局长、市长是否分得更多一些，则不得而知。举报官产、市产有奖金，可是并无现金发给，只是发给一纸奖金单，由得奖人再另行投买官产、市产，可将奖金单抵缴现金，领取产业。

广州变卖官产、市产后，县市也同样有进行变卖的。我在陈其瑗继郑洪年任广东财政厅长时，也跟着到财厅任第四科（主管公产）科长，当时未见有分文上缴，因为县市变卖公产都是由驻军主持，已全部截留，只交一张收据上来罢了。

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令建立中央银行，委黄隆生为行长。据傅秉常告诉我：初孙夫人曾荐宋子文为行长，先生以子文年轻坚决不允，只委以副行长职。此一小事亦足说明先生用人为公。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但命令所有财政收入机关，一律只准收取中央银行纸币，缴税款者要以现金向中央银行兑换纸币缴纳，谓之现兑。因之广州十三行投机者一度炒卖中央银行纸币，加水高达一成至二成。以毫无准备金之纸币，价值能超出票面额，亦一罕事。

此外，本文开头曾提及，孙中山先生将上海住宅押款充作军费，以后，因为粤海关对报关行偷漏税收进行罚款，由粤海关监督傅秉常在罚款中提取了6万元，经我手汇出归还银行押款，赎回先生上海住宅。先生一生不置私产，逝世后遗产除书籍外亦仅此一座寓所而已。

(袁鸿飞整理，1965年)

港英政府扣留粤军兵船事件

张慕融*

一、东征军收复潮梅后情况

1925年春，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右翼总指挥兼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率部东征，收复潮梅之后，正在追击敌人于蕉岭福建边境，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变，张民达奉命到汕头开军事会议，即率随从人员，由蕉岭军次赶程赴汕；到达潮州时，大雨滂沱，水淹潮汕铁路，火车无法通行，乃改乘电船。不料船至潮州之湘子桥，舟覆身亡。在尸体未找获以前，传闻不一，有说获救生还，有说在外地已见他者，使人疑信参半。其时廖仲恺先生，亦以为张民达生还，特由广州到汕头，与许崇智总司令商悬赏，如知张民达下落能引见者，给赏金万元。因此仍保留该部番号与名义职位好久。在这期间，一切事务，均由参谋长叶剑英主持，后来杨、刘在广州叛变，东征军右翼总指挥全部队伍，奉命从蕉、梅回师广州平乱，莫雄旅先行开拔从东江回省到达石滩，继由张和旅、余鹰扬旅和其他各部，从潮州、揭阳、海陆丰前进，到达淡水一带，师司令部人员，则由汕头乘轮经香港返广州，解决杨、刘之后，再事部署作第二次东征。

二、港英政府扣留粤军兵船事件

1925年10月初，第二次东征，叶剑英参谋长率建国粤军第二师司令部，各处部分人员，约有官长三四十人和士兵一连一百

* 作者时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司令部军官。

余人，官长中有：饶汉杰、叶菊生、张慕融、严访武、王道、梁镜清、邓良、黄志伟、蔡浩、张公达等，其余姓名忘记了；连长冯若涛（平远县人），雇得平日行走广州——汕头或汕尾——香港的轮船，船名“太益号”，装运由广州天字码头落船，于是日晚上11时开船出发，预到澳头登陆，转淡水前方集合。翌日将天亮时，船到达距离长洲好远的外海（中国领海）时，香港英政府派了两只小巡洋舰到来，借口说我们船走进香港海域，将我船强截回长洲海面，稍事停泊。其时叶参谋长异常灵敏机警，外衣都不及穿，仅穿内衣服，也没带钱，随即从船上跳下海上一只卖生果艇，即向长洲方面出走，登长洲岸，在一家咖啡店饮了咖啡，把手上的手表给了店主，得了一些钱，然后转澳门去了。

我船在长洲海面仅停留片刻，英舰仍继续强迫我船驶进香港。在船开行时，冯若涛连长非常愤慨，命各士兵子弹上膛，准备战斗，不惜与敌同归于尽。我们官长临时决议，认为这时无谓作重大牺牲，劝止冯连长。船到香港，泊于对面油麻地海上，两只巡洋舰仍然监视，每天我们官兵伙食，是由港方在香港送到船上供应，因此有机会，让送饭人在剩饭内藏信带出，向各国领事揭发陈炯明勾结香港英政府在我国领海内强截我运输船，请主持公道。各国领事收信后，采取如何态度，我们不得而知。有一日，香港英政府派一个英国人来到我船叫我们去，去的有严访武、王道、梁镜清、张慕融等七八人。到油麻地岸上，那个英国人用手指我们看对面香港山上的炮台、海面上的战舰等，用以威吓我们。我们随即回答他们说：“你来广州看，我们一切都应有尽有。”当时那个英国人就用广州话说：“你唔使咁沙尘（你不要这样神气），我系华民政务司。”

在广州出发前一日，雇定的“太益号”轮船，讲明是由广州到澳头登陆。由于负责雇船的人员，思想麻痹，没有提高警惕，所雇之船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是否妥当，即予雇定，对军事行动亦未守秘密，致陈炯明反动派有可乘之机，阴谋勾结香港英政府强

截我轮。在问题发生之后，查得该船船东是海丰人陈某，是与陈炯明有密切关系的。

我船被香港英政府派舰强截到香港，停泊对面油麻地海上。第二日，香港方面有一小轮载来了两个人，登我们船上，一个是温翀远，一个是黄福芝，据说是来探问。当时我在船中，距离他们二人很远，可能他们看不见我，也没有和他谈过话，时间没有好久，他们二人就乘原来的小轮离开我们船去了。

温先生因为同僚关系，关心同僚而前来探访，这是善意的。但是同来者黄福芝，在陈炯明在广州执政时期任广州警察局侦探队长，与陈炯明关系密切的，在广州有杀人王的称号。如果黄福芝前来探访，说成是善意那就是使人怀疑。还有我船是被陈炯明勾结港英政府派舰强截到香港停在油麻地海面，日夜是有两只小巡洋舰巡逻监视，他们探访，非通过港英政府准许，是断不可能来的。

过了三四日之后香港英政府派员乘小轮到我船，带去我们人员有王道、饶汉杰、叶菊生、张公达等四五人系于狱中。

又过了几天，香港英政府，把我官兵全部武装解除，没收去长短枪枝（即步枪、驳壳、左轮）共 140 余枝，子弹数万颗，军用品及其他服装行李等，即解送我全体官兵，由尖沙咀乘火车到深圳，我们始恢复自由。是时我驻防深圳部队，是陈铭枢旅张我东团，在那里休息片时，我和邓良即换衣服回头到香港转澳门，把经过情况，向叶参谋长报告，以后和叶参谋长一齐从澳门返广州。到达广州之后，急于赶赴前方参加作战，因而这件事就放下，以后再办。

以上说被带去我人员四五人系于狱中的，约一个月后，英方自知理屈，也全数放回广州。

（1965 年）

40年前在香港的一宗旧事回忆

温种远*

阅张慕融先生写的陈炯明勾结香港英当局截留第二次东征时粤军第二师兵船材料，叙及兵船被扣经过颇详。其中涉及种远与黄福芝探望被扣兵船原因，似未甚了了。为了把问题弄清，现就我记忆所及将当日情况述之如下。

事情发生在40年前，即1925年某日早晨（具体时间记不清楚）。那天香港万通安记经理嘉属商会会长潘君勉至我的住所，告以第二师兵船被香港英当局扣留在港，其中有师部参谋长叶剑英先生及嘉属同乡多人，我身为嘉属商会会长有义务设法营救，请你想想有无办法。当时我只觉得此事要做，但想不出很好的办法。于是就约同潘先生到摩罗庙街张赧村先生处，请求他协助。那时张先生已脱离政治有年，闲居在港，对英当局扣留二师兵船原因彼此均不得其详。有顷张先生说，不妨找黄福芝试一试，其他没有别的好办法。于是我就和潘君勉先生到德辅道中号找邓士学先生（邓仲元兄弟，闲居在港，与惠州人较多联系），从他那里获悉黄福芝住址并由我按址找到了他，告以来意。黄福芝没有推辞，即穿衣同我渡海到尖沙咀一所英国人办事处的地方，同他们接头（谈些什么话我不清楚），旋由那里派出两个英国人偕同我和黄福芝在尖沙咀乘一艘汽艇直驶到被扣留的船边。我当时以为黄福芝已与英国人讲通了，当将来意向被扣船上的人声明，我是由嘉属商会派来探望、营救叶剑英先生和嘉属诸同乡的，请大家不必担心。船上人说叶剑英不在，我以主要营救对象已脱险，

* 作者时为香港嘉属商会会长。

没有停留必要，即由原船驶回原处与黄福芝分手。

为了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这里有两点须加以说明：

1. 我当时身份和行动动机。

我自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间，在国内时间很短，已没有机会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军政机关的工作，也从没担任过陈炯明的一官半职，且没有和他接触过。事件发生时我已在香港的华泰出口庄、广联通客行搞商业，营救被扣兵船，纯出于同乡感情。

2. 与黄福芝的关系。

黄福芝其人，我事前不认识，事后也没有联系，我当时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谁能打通港英当局，达到探望、营救被扣兵船的同乡的目的，就找谁。我当时找黄福芝的原因就在此。

(1965年)

广州第一制弹厂

许万全*

刘、杨统辖的滇桂军在广州被歼灭后，政府派廖恩勋接收滇军制弹厂，将厂改名为广州第一制弹厂。他任厂主任职，用陈锦源当工程师。乃招回旧有工人，将厂从新整顿，撤销修检部，仍以翻抄子弹为主要出品，并加强试制新弹。不久陈炯明的粤军在东江失败，汕尾制弹厂亦随之遣散工人停办。该厂的技术人员是从广州招去的，厂停办后，技术工人离汕尾经香港回广州市。抵达香港见到厂长周其崧（先逃到香港），各在港住了数天，周其崧便每人发给一月工资，打发各人回广州去。

廖恩勋到任后，见厂内搞了多年，仍未制出新弹，探悉汕尾厂一班技术人员回到广州，知这班人是制新弹的，乃设法招请来厂任职，加强技术力量。工程师陈锦源，从前和梁照同时在粤汉铁路任职，后知他在汕尾制弹厂当领首，今知他已回广州，乃到西村梁照家里相访，请他来厂帮忙。梁照以制弹技术复杂，工序又多，每个工序都非要熟练的人员掌握不可，自己只可掌握一个工序，要制新弹是办不到的。陈工程师则说厂方拟将汕尾厂回来的人员都请来帮忙，请梁照征求各位的意见。梁照答应了，便约定再会日期而别。

陈工程师将接洽经过向厂方报告，廖便集中有关人员研究，结果决定，人员可以全部录用，但要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制出新弹，正式投入生产。梁照则往约齐各人，集中研究答复厂方。各人齐集后，各发表自己的意见，得出结果是大家往厂看设备，如欠缺

* 作者时为广州第一制弹厂技术工人。

机床工具等，逐样补足，厂方能照办，我们是可以到厂任职的，制出新弹不成问题。决定后仍由梁照到厂接洽。梁照到厂对陈工程师转达各人的意见，得到厂方答应而回。

下午梁照便同各人再来厂，会见厂主任。首先由廖恩勋口头提出条件，汕尾厂回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原职原薪录用，不过要大家以一定期限制成新弹投入正式生产，欠缺机械多少都可以添置，接着命陈工程师领各人到各车间观察现有设备。各部门观察过，便回到厂办公厅，由蒋宽代表各人向厂方提出意见如下：

一、我们来厂工作后，不得无故开除旧有人员和工人。

二、欠缺之机械汕尾制弹厂都有，可派员到汕尾拆运回来补充。

三、以运回汕尾厂的机械到厂之日起计，我们在三个月内制出新弹，最迟不超过六个月正式投入生产。

这些意见得到厂方欣然接纳，决定三天后各人到厂工作。各人道别回去各自准备。三天后，蒋宽、梁照、梁德、朱新、彭达、施标、梁孔、龚苏、陈朝、黄铿等主要工人，便同时进厂到工。其他熟练工人亦陆续来厂工作。他们来厂后，以蒋宽负责弹头、弹壳总设计；车工则由梁照负责；钳工则由梁德负责；弹头、弹壳试制则由朱新、彭达两人负责。开始制造各工序的样板，各人分工努力协作，紧张地进行。厂方派员叫彭达同去汕尾将厂内机械拆卸运回。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便将厂内全厂机械雇船运抵广州市。除本厂适用的，运回安装外，其余的由石井兵工厂运去了。运回厂内各种机床，在工人的努力下，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安装好了。而各工序的样板已完成大半，便开始按工序试制。他们都是驾轻就熟，各工序试制出来的成品，都符合标准。再用一个月的时间，新的弹头、弹壳已完全试制成功。便取去装子部装药。经过多次发射，速率和胀力都是良好。于是厂方经过

几任人员，制造四年之久的新子弹便宣告制造成功了。

自新弹试制成功后，便正式投入生产。于是多招人员，扩大生产。于是谢珊、赵藻、黎启颐、张照、许万全技术工人，亦来厂工作。厂内工人已发展至300人左右，同时将翻抄部各种用手工制造的模具，改成半自动化。每日生产新弹和旧弹各2万颗，每月生产新、旧弹100万颗。厂方便将改革工具情形和月产品数字，禀报军械处备案。军械处觉得厂方发展很好，为着推动各厂不断发展，命令兵工厂属下各厂主任，各携带本厂出产子弹，来军械处评比，比质量、比产量、比成本。评比结果，质量是各厂差不多，均得良好。数量是广州第一制弹厂最多，因广州第一制弹厂包括制无烟药工人，全厂只有工人300人左右，每月生产新、旧子弹各50万颗。石井新弹厂有工人400人左右，不包括制无烟药，每月只生产新弹60万颗。而石井旧弹厂有工人280人左右，不包括制无烟药，每月生产新弹40万颗。比成本则相差更大。广州第一制弹厂每万颗子弹成本是1200元。而石井新旧两厂成本每万颗要2000元。评比过之后，军械处便将广州第一制弹厂改为独立厂，以廖恩勋管理有功，升主任为厂长，勉励他继续改进，多出制品充实军需。

自廖恩勋升厂长后，石井兵工厂厂长邓仕章，认为自己面子不太好过，便暗与阎菊泉计议，利用厂内旧有技术人员和蒋宽为首的新来技术人员在工资和技术上的矛盾，以此为借口，设法打倒廖恩勋，成功后推阎菊泉为厂长。当时第一制弹厂已组织职工俱乐部，设立在离厂不远的高阳里六号为部址。俱乐部的干部，除掌印书记二人是职员，其余都由工人充当。阎菊泉便利用俱乐部为密议地点，命他的侄阎苏和俱乐部同情他的干部，分头在各车间串连工人，到河南机器工会开会，阎菊泉则以监工身份，用各种借口，要新来厂的以蒋宽为首的各技术人员，交出各个工序的样板数据。但蒋宽等人认为这些是自己的饭碗，靠它吃饭的，

哪能轻易交给他，于是，一方面敷衍阎菊泉，一方面向厂长、工程师申诉。廖恩勋得知后，便与工程师等谋对策。第一步先打发蒋宽等主要的技术人员暂时离厂回家等候消息以避其锋，工资照发。第二步派出亲信工人杨达明、杨祥、杨德、梁孔等人，在各车间暗中叫人到小北新北园酒家饮茶，说有事大家商量。又派苗行昭、陈鉴成两人到新北园主持开会事宜。于是厂内工人议论纷纷，有的对两方来请都答应去。既到约定日期，苗行昭、陈鉴成两人，便先到新北园布置一切。待到了厂内工人人数过半时，便由苗行昭对大家说话，他说，现在厂内有人鼓动，叫我们大家到河南机器工会开会，这样做是违反厂规的，我们大家不要上当，切不可去开会。而且他们亦未有讲明开会的必要理由，我认为必有不轨的内容，是对厂不利的，对我们大家都不利的，请大家不要盲从。我们有什么向厂方要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俱乐部开会，集中我们的意见，反映到厂方。现在请大家喝茶，随使用点心，由我结账；大家如有什么好的意见请提出来，我可以将大家的意见，转达到厂方去，请大家不要客气了。于是众人便各适其适，各乐其乐，饱餐一顿，皆大欢喜。苗行昭、陈鉴成两人周旋各席之间征求各人意见。

阎菊泉等知得后，晚上就和他们的人，在职工俱乐部密议。决定明早上班时，用职工俱乐部名义，宣布全厂工人到机器工会开会。翌日早班仅到了八九成的人数，还未到开工时间，就由俱乐部的干部，向各车间工人宣布，昨晚俱乐部开会决定，今日不开工，全体工友齐到机器工会开会去，并叫司机不要开车。由他们约定的一班人，先行带头出厂往河南方面去。那几个俱乐部干部，往各个车间催人出厂。到了开工时间时，他们亦随大家出厂，避免职员到齐不好搞。当时出厂去河南的人数，只有全厂工人四成左右。有的看风头的人，便在中途利用大小便或买香烟的机会，转回厂中看究竟，如厂内多人开工他亦开工；如少人开

工，或不见开工时，再追上去河南机器工会。

上午8时全厂职员已开始办公，厂长廖恩勋见厂内不开车，便同工程师陈锦源同到车间，问监工阎菊泉因何不开车。阎菊泉则推说到厂后才知，有部分工人到机器工会开会去，司机亦同去。陈工程师便问各技工，有哪个懂开车的，先把发动机开动，然后全厂开工。当时有人推举施标，说他在汕尾厂亦是当司机的。阎菊泉便叫施标开车，施标对阎菊泉讲明，我开动车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负责看车的。开动车后由你看车，或找别人看车，我不管，你答应我就开，不答应我就不开了。厂长和工程师在旁催阎菊泉赶快开车。阎菊泉被催不过，便心生一计以便脱身，便对施标说好，你先把车开动，使工人开工，我马上到机器工会找司机回来看车好了。厂长、工程师都叫施标开车，施标于是立即动手，检查各油门、油管都无闭塞，便开始打火，很快发动机开动了，车栅上的车轴运转了，工人便开始工作。阎菊泉便对厂长、工程师说车已运转，我今往河南机器工会找司机回来看车吧。厂长则对他说，你立即去，迅速回来，否则发动机发生故障，你应负责的。阎菊泉连说几个是是，便离厂往河南机器工会去了。

阎菊泉到了机器工会后，对工友们不敢说厂内实际情形，只说厂已不开工了，便暗中与机器工会的主事人，商议要求机器工会派出纠察队协同来会人员，到河北去找人。机器工会则以复工后全厂工人加入机器工会为条件。商议双方答应后，便算决定了，便集合来会工人在一起，由阎菊泉宣布开会。首先说廖恩勋办事不公道，任用私人，新来的工人工资高，我们旧工人工资低；我们旧工友在厂干了多年，对厂有一定的贡献，对厂流了不少汗，对厂出了不少力，而他看不起我们，将功劳通通录在他的私人身上。因此我们要打倒他，从今日起我们要罢工。非打倒他不复工，我们得到机器工会大力支持，我们不要怕无饭吃。由今

天起，至胜利复工时止，都是在此处开饭，请大家注意开饭时间，我们胜利后都加入机器工会，此是我们的保障。明天起，机器工会派纠察队协同我们过河北去，凡破坏罢工者，便找他回来处理。请大家坚持下去，听候好消息。

自从阎菊泉说往机器工会找司机，他离厂后，厂方料知他不会转回来的。廖恩勋便立即分别派人去请被暂时离开厂避开阎菊泉威胁的蒋宽等人回厂主持生产。他们都在家中，并无外出。到了中午大家都回厂来了，集中到办公厅座谈。首由厂长讲述，今早有一部分工人停止工作，说是去河南机器工会开会去，事前亦没有向我请示过。听说是由职工俱乐部决定的，但俱乐部的职员，大概只阎菊泉个人参加，其他职员都没有参加昨晚的会，不知他们到机器工会搞什么，此事内里必定有人主使。现在你们都回到厂来了，要求各位回到各自的岗位，主持工作，使生产不停顿；你们都是厂内的主要技术人才，希望发挥你们的应有作用，努力协作，现在厂内虽然少了三分一工人，但他们多数是普通工，容易补充的。关于技术方面，我相信你们在厂的工友们，一定担当得起来的，现我派定蒋宽全权管理厂内分工等事宜，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可和陈工程师商量解决。其他问题总要我们厂日日有出品，就什么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我已派人在办公楼腾出几个房间，与你们暂时留厂食宿，不要回家去了，免机器工会中人为难。各人认为这样做很好，到此便结束座谈。

蒋宽回到车间后，便将各车间的负责人从新调整。梁德仍负责打磨部，梁照负责车工部，谢珊负责铜壳部，朱新负责弹头部，施标负责司机，施标只答应负责到厂内问题解决时止，调彭达接替施标的打磨工作。调整后各人都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厂内便日夜照常生产了。

厂方另命人起草一封以全体留厂工人的名义的控诉书，向农工厅告状。控告机器工会煽动工人乱搞罢工，破坏厂内生产，破

坏工人团结。当时农工厅长是陈公博，与廖仲恺是老朋友，廖恩勋是仲恺的弟弟，如往控诉定必接受处理的。

控诉书缮写后，便由车工龚苏、工具保管工保玉书两人去农工厅告状，不意在中途被机器工会的纠察队拦截，将两人带到机器工会去。到达机器工会后，机器工会体育部的当事人，向他们探询厂中情况，又要他两人不要回厂了，说在此处同大家在一起，有饭吃、有工资拿，保证我们一定会胜利复工的，将来回厂复工又有工资增加。两人始终要回厂工作，说罢便往外走。又被在门外的纠察队拦住不放，在门口争论不休。内里有人叫搜身，纠察队便动手，当堂在两人身上搜出往农工厅的控诉书。各人便大怒，骂他们破坏罢工，做厂方的走狗，便七手八脚将两人推上二楼扣押。为着防他两人逃走，便命人往外边的旧铁摊处买了一条 20 多斤重的旧锁链回来，将两人锁住。

机器工会的委员便和阎菊泉等人商议，见得事情不妙，搞了十多天，日夜有百多人食饭，又要借钱与工人作费用，若照此继续搞下去，不知拖到何时。以后筹款就成问题了，而且知得厂内日夜开工，要挟不来。后决定派人到石井，请兵工厂工人联合会帮忙，派员出任调解，使双方和平解决。

决定后便派人到石井，会见联合会的代表们，道达来意。当时联合会代表中大多数是阎菊泉、蒋宽两人的师弟或徒弟，左右为难，都不愿任调解人。当时有个何仲连，是由机器工会荐到兵工厂当铸工的，大家都推他当调解员。于是何便以联合会的名义，来到广州飞来庙见到厂长讲明来意。廖恩勋对以这是工人的事，你可以直接跟工人谈，我可以召集全厂工人在一起，你与众人谈好不好。何仲连认为不要这样，派几个代表来商议就够了。厂长便派人到各车间传达，要各车间选派一个工人代表来办公厅。各代表到齐之后，何仲连首先发言，说机器工会见得你们内部有纠纷，现在你厂有一部分工友留在机器工会内，因此机器工

会请托我们工人联合会出来调解，今联合会派我来，和大家研究解决办法，我们要以工人是一家的精神，来寻求解决方法。事情已做出来了，不可长此拖下去了，请大家发表你们的意见，待我将你们的意见带到机器工会与你们那方面的工友研究，使事情尽快圆满解决。厂方工人代表首先指出，机器工会是全国机器工人同全世界各地的华侨机器工人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钱而建成的，它的宗旨是发展中国的机器工业，维护工人利益；今机器工会的当事人做得太坏了，不是维护工人利益，而是作为制造工人纠纷的场所，更有甚者，竟将机器工会做监狱，随便扣押工人，请问何代表，机器工会这样做对不对呢？何仲连说这是不对的。厂方代表继续说，不只扣押，还当他是重犯，用条 20 多斤重的大锁链将龚苏、保玉书两人锁住，他两人是代表留厂工人向农工厅请求调解的，而他两人又犯什么罪呢？是何人授给机器工会有锁人的权呢？请何代表说句公道话。何仲连说锁人就更不对了，你们将有什么要求，大家应讲出来，待我将你们的意见和要求，转达给机器工会那边去，由他们商议后，我再回来回复你们，双方直接派代表共同商议。厂方便立即提出三条先决条件。三条条件是：

1. 要机器工会用汽车将龚苏、保玉书两人送回厂内，并要沿途烧鞭炮，由机器工会起至厂内止。

2. 要机器工会用书面向龚苏、保玉书两人道歉，赔偿两人被扣押期内的一切损失。

3. 两人回厂后，要到医院检查，如有损伤或被扣留期间因而引起各种疾病，要在医院留医，至完全恢复健康，能照常工作为止。所用一切医药各费及两人应得工资，均要由机器工会负责。

以上三条，机器工会若能办到，再谈其他的解决办法，未办到这三个条件以前，就不必再谈了。何仲连到河南将经过转达机器工会，使他们研究后再通知联合会帮忙，便回石井向联合会交

代所有两方经过情况。

在何仲连未来以前，厂方已用公文请求农工厅，派员调查办理。农工厅接到公文后，便派出姚观顺专责调查办理此案。姚观顺接受办理此案后，便先来厂了解。然后再到河南机器工会内，向各方面了解，见过被锁住的保玉书、龚苏两人，又在工人中分别向各人了解，往返多次了解清楚后，便将所有资料向厅报告。农工厅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处理办法，仍由姚观顺办理。姚观顺便通知各方面，派代表到小北飞来庙听候处理。各方面接到通知后，依时派出代表来到。姚观顺便将自己亲自了解的各方材料作了分析阐明，并宣读农工厅的处理决定书，作如下的处理：

1. 机器工会是民众组织，无扣押人的权利，今既非法扣押广州第一制弹厂工人龚苏、保玉书两人达 20 多天之久，实属违法，应立即在今日将保玉书、龚苏两人送到市公安局，由厂方派员到市公安局接回复工。

2. 所有广州第一制弹厂的工人，留在机器工会期间的伙食费用及借予工人的生活费，由机器工会完全负责。

3. 假借厂职工俱乐部名义，煽动工人到机器工会，然后宣布无原则的罢工，所有为首者一律处以革职开除的处分，其余受威胁或盲从者，用口头悔过回厂复工，罢工期内工资不能补发。

宣读后马上执行，如不执行者，再用行政手段处理。宣读后众无异议。姚观顺便回农工厅消案。

厂方立即买鞭炮，选代表用汽车前去市公安局迎接龚苏、保玉书两人回厂。由公安局起一路沿途燃放鞭炮至厂门口时，厂内全体职工，早已集合在厂门口，欢迎两人归来。在一片欢笑声中，各人一拥而上前与两人热烈握手慰问。廖厂长慰问有加的嘱咐两人回家休息，待精神完全恢复，然后上班，并分别将阎菊泉等为首的人开除外，其余的工人招回复工。于是厂内正常生产了。

厂方于是将厂中编制稍为调整，以适应新的要求。遂将监工一职撤销，仍以蒋宽为总匠目，调升谢珊为副匠目，彭达调升为装子部领首，施标调回钳工，另雇姓谭的当司机，其余各部领首照旧负责。而制药师梁基奉命调去第二制弹厂，乃改聘陈为当无烟药的制药师，并升余芳为制药部匠目。经过这次调整后，厂中生产日益稳定，质量又进一步提高。

厂内工人经过这次被阎菊泉、阎苏等人乱搞罢工的教训，大家以为非自己组织工会，就会受到外来欺侮，不能维护工人利益。在全厂工人的赞成下，开始筹备组织工会，厂方见到工人组织工会，乃派岑寿楷来协助，选出谢珊、彭达、何林生、保玉书、龚苏五人为筹备委员，聘岑寿楷为书记。在1925年8月筹备就绪，在原日高阳里的职工俱乐部内召开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选举结果以谢珊、彭达、保玉书、龚苏、何林生等七人得票数最多当选，由大会通过定名为广州第一制弹厂工会。大会散会后，就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选出各委员兼任工会各部部长，由谢珊兼任外交部长，彭达兼任财政部长，何林生兼任宣传部长，由各部长在会员中自选两人为该部干事，由执委员发出聘书，聘岑寿楷为本工会书记，并讨论加入哪一个领导工会问题。当时广州市有四个工会：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广东工人代表会。在这四个工会中，除机器工会扣押过我厂工人，决定不加入外，总工会资格最老，工会联合会、工人代表会，这两个工会是近年才组织起来的。在讨论中，各人认真的发挥自己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是工人代表会系工人部长廖仲恺亲自主持组织起来的，是最新、最进步的工会，于是通过加入工人代表会，由书记岑寿楷起草申请入会书。工人代表会表示欢迎，接纳第一制弹厂工会为会员，并批准为常务委员会常任委员。后由执委会会议决定，派保玉书为出席工人代表会的常务委员。广州第一制弹厂工会会址，就设在高阳里六号前职工俱乐

部旧址，于是开始会务活动，首先由各执委和干事等人分头向厂内外募集捐款，用为接济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此后会务不断发展，深为全厂工人所拥护。

(1965年)

许 济 自 传

许 济

我名许济，原名崇济，号佛航。广东番禺县人。老家在广州市高第路门牌 152 号，是个旧式老家庭，人口众多，向不分居，父亲名炳暉，由科举出身，分发山东省候补知府。我就在晚清光绪丁亥年二月十三日降生于济南，故名崇济，即公历 1887 年生。母生我未满月而逝世，父嘱咐三庶母朱氏抚育如己出。余幼少极愚鲁，有觉性，而思想迟钝，文化低而进度微。父改调江西，未几歿。庶母一人负担八口，四男三女，生活艰难，深恐我辈成长落后，无有长进，而广州湾、香港、澳门烟赌林立，恐怕我兄弟染此恶习，故使灏兄、清弟走鄂到冯姑丈启钧处寻找学校或兵工厂工作，使我走皖大家兄崇贵处就学。临行，庶母以发奋为人，再三谆嘱。那时正是晚清维新时期，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军，我则学文不成，投军学武，考取南京弁目养成所，毕业后由督练公所徐绍桢总办派赴第九镇骑兵见习士官。见习后，分派到徐淮巡防马步全部统领胡令宣部为第一营中哨兵。1911 年武昌起义，纷纷图谋响应，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徐淮海水路马瞳总巡提督军门张勋三人，均是封建旧官僚，保皇、保守，力图固守南京。胡令宣是张心腹，奉他电令率所部由徐州调至南京协防守卫督署。那时南京风声鹤唳，忙于奔命，一时说要缴新军械，一时说革命军要进城，突于十月廿三日夜，驻扎马群的第九镇三十三标攻袭南门外雨花台阵地，死亡甚众。未及天明退却，伤亡尸骸俱是慈善堂、红十字会殓收埋葬；城内无辫者杀无赦。十一月一日，镇江、上海同时光复，江之南北各省无不纷纷独立。上海集议举第九镇镇统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进攻南京。某日，胡

令宣统领步出营门（即毗灵寺门前）广场，唯我随行。遥望紫金山方面枪声逐渐迫近，他同我谈：“不料二毛子有此厉害，打得不错。”我答：“人有训练。”他又说：“我若不在，你是徐绍桢学生……”说至此未及回答，门面差官跑出请统领听电话，即入接电，令率所部赶赴通济门，向麒麟门、紫金山之线与张勋部之王有宏统领联络，加入作战。我们部队加入作战未几，王统领阵亡。在下午5时左右，前线解来新军参谋史久光一名前来，解至胡统领前供说是来到查江浙两军失联络误会开火，返部迷路被获。适我在左右，密请莫杀莫解，可留与谋响应，胡统领并不迟疑，遂谋一面促新军力攻，一面我们准备举城突进。临夜史久光率我与胡统领走谒见徐总司令。城陷，天明随同徐总司令由太平门进城，宣告光复。1912年，迎接孙中山先生到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那时任胡令宣为首都西南区卫戍司令，我则任为本区骑兵队队长。7月调我为陆军第一师二旅第四团三营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让位于袁世凯，袁氏不愿意迁都南下，经参议院议决，设留守府于南京，由黄兴任留守整理军队，镇守南京。袁氏得权后，以南京留守妨碍统一，主张撤销。黄兴遂辞留守职，袁又假借改编都督制的阴谋毒计，首先更换五省都督消灭革命军，以遂他篡权专制的美梦。“二次革命”起，江西首先起义。南京响应，举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出师徐淮。苏督程德全威胁后方，并宣言撤销讨袁军，迫黄辞职去沪。及以江西、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福建都被旧军阀、旧政客的反革命武装打垮，徐淮军队不得不退守南京。突然何海鸣由沪来密谋第二次独立，死守南京城，旋粮尽援绝。当时一、八两师都是滇、黔、湘、桂、粤的青年勇士，仓猝遇敌，无不炮步应战，如平时训练一样，军民欢呼，无不以为有此长城可赖矣。然不肖的中上职纷纷逃避，下级军官团结不固，不能掌握全军作战，遂至失败，这是应该深省的。我其时失

败到沪，荡荡之心无着。由庶母指示：许崇智在沪，何妨往访，乃带同前往见面。询及失败情形，并问我你还要革命么？我答，当继续努力不断，但我未曾入党如何。他说失败就是成功之母，只要时时肯在言行中警惕，我当介绍你向孙中山先生宣誓，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才可以入党，如是，我这时由他介绍入中华革命党，更名许济，这是1914年9月间事。“民五”袁世凯卖国称帝时，孙先生派我赴山东潍县东北革命军居总司令部任参谋。至1917年，孙中山在沪率北洋舰队程璧光由沪到粤组织军政府，举孙先生为大元帅，许崇智为参军长，我在参军处任科员职。1918年，组织援闽粤军，任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兼第一支队司令，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其时任我为第二支队司令部副官长兼卫队督带。师出闽北，进取汀、龙、连、永等处，节节胜利，会师南路漳、泉、同安、莆田一带。在同安之役，我身受重伤，伤愈升第十五统领，改编为第十五团团团长。1920年，孙先生见援闽连续胜利，拟乘胜率师北伐，被陆荣廷、莫荣新桂系军阀在粤主政作梗未得达成，电令回师安定粤局，歼除莫逆，直捣陆荣廷南宁巢穴。陈炯明屯兵南宁不动，另有企图。1921年孙先生亲自赴南宁与商大计，率我第十五团为随沪警卫。在桂林召开中央会议，继续北伐。陈炯明不听号令，乃以陈炯明仍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长名义专理后勤，供给前方，以观后效。以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率所部第五、六、七、八、九旅五旅，并拨第一军之第一师邓铿（仲元）部及李福林部统归许崇智指挥，升我为第七旅旅长（所余一、二、三、四等四旅），分往于西北两江为总预备队，联合滇、黔、湘、粤、赣等军，于1922年2月间，改道从北江韶关、三南向赣南、三南、信丰进攻，会师于赣州。滇、黔、湘、桂、赣军由桂林、韶关攻取上犹，向赣州与粤军会师于赣州。其时赣督为陈光远，是袁氏嫡系模范军，镇守赣南一带。在信丰之役，第一师攻敌正面，黄团长连胜阵亡，稍有

摇动，值我第七旅与陆学文旅攻敌右侧，我旅正袭敌于牛牙束，将敌之总指挥部击溃，乘胜追击，直扑赣州城下。敌溃不成军，不二日弃城潜逃。攻克赣州，并获得陈炯明通敌秘密文件整套。长江上下游震动，正拟会师向武汉进攻，不料忽得警耗，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先生蒙难，登永丰兵舰御敌，电令赶速回师剿逆。第一师由原来方向，向三南入粤攻惠州，我第七旅与五、六、八、九等旅回向韶关马坝攻粤汉铁路，以断敌后，直取广州。围攻韶关，竟达月余之久不下，而第一师受敌逆反间“粤人不打粤人”之计，陈修爵团投敌，后路断绝供给，并有赣敌攻袭后路之虞，惟有变更作战计划，转向取闽。王永泉师驻南平，允许反正，同取福州，铲除袁系军阀。王部师出连溪、黄泥坂，会攻大田，遇敌主力稍挫，值我们部队已将大田攻克，直趋水口袭断黄泥坂敌人后路，王永泉反攻，敌军全军覆灭，我军以及五、六、八、九旅、李福林部直攻福州，留我一部殿后守水口，与守南平之王永泉之王永彝部，取得联系，向汀州黄殿吕部警戒，我向赣边警戒。其时孙传芳部由赣率常德胜部（是白狼部队编成）追至，侵占闽境邵武建宁，有向建瓯袭击之势。建瓯杨镇抚使要求我旅增援，我以水口为入闽重点，邵武被占不能放弃，不能分兵援助，只可接直取攻势，同取邵武为间接增援，使敌不知虚实为愈，我即向敌取遭遇战，先发制人，遇敌于千松岭，将孙传芳部击退，追至邵武城下，因弹药不继，于夜间撤围，暂守于千松岭，以待补充，重作进攻。弹药补充足，正值除夕，重举复围，一鼓而克邵武，寻机收复杉关，将常德胜部歼灭，即交防于王永彝部，回师返粤。1923年，经上杭入粤收复蕉岭、梅县、兴宁、五华，直攻惠州。其时滇、桂军已收复广州，围攻惠州。陈逆闻我军回师，全部移师，固守惠、潮、梅一带，我们第二军回师分三路进军，连续节节胜利，将惠州外围林、李、黄三集团逆敌击溃。陈逆嫡系杨坤如部死守惠州，陈炯明逃港受英帝国主义护

庇，暗行资助谋叛，故有二次东征之役。1924年，粤局稍定，孙先生任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调回广州整训粤军全部。任蒋介石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时，正是孙先生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共产党联合一致，发布了民主革命政纲，这样革命统一战线就从新建立起来了。1925年，将黄埔军官学校首届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三团，第一团团长任何应钦，第二团团长任王柏龄，第三团长任顾祝同，校长蒋介石自兼为党军军长，廖仲恺任为党军党代表，准备二次东征，并拨粤军张民达一师及许济第七旅一旅、余鹰扬一团，统由蒋参谋长率师东征，向东江进军。以张师长民达率粤军许旅余团为前敌指挥，向增城博罗进剿，会攻淡水。淡水为惠州敌逆通港澳咽喉，水陆交通之要地，敌亦效惠州死守据点一部，其余大部分作山地战。是役张师与余团一部围攻淡水，我旅与张师一部将淡水外围山地之敌连续肃清，敌乃由汕头增援赶至，我旅却到平坦地带，引敌离山地，以卫立煌团抄袭右后，以是将敌击溃，追至下洋，张师亦于是夜将淡水城克复，乘胜向三多祝、惠来、普宁进剿。敌正混集各部残余潜伏于普宁、惠来、葵潭山地，被我料知敌诡计，将本旅三团制分作三梯队行军，以便展进灵活，取钳形夹攻，故敌被我击溃。不一月，而节节胜利，收复普宁、揭阳、兴宁、梅县，绕袭潮州，断敌退路，与张师会师于汕头。敌在汕闻吾旅已占潮安，惟有弃汕潜逃，战事告一段落。始知张师将兵力从惠来收复后用于汕头石角对海，以致未能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嗣后张师长力主人闽进剿，吾恐陈逆李、林、黄三部退入赣边三南，返袭我军后路，不得不加考虑；而且敌军临逃之时且有且看谁缴谁械之语。后因林部有不打孙先生的诺言，故仍照张师长入闽进剿之计。我由大埔、河源向永定进剿，张师出饶平，入闽会师于永定。至夜9时，得接许总司令电令，兴宁已发现敌军入侵，向五华前进，有袭击揭阳党军企图，许旅明晨改向

揭阳增援，听蒋参谋长指挥。我奉令后，即行处置，留卫立煌团守潮安，亲率谭曙卿团与陆瑞荣团专程赶赴揭阳，翌日中午赶到，敌已在揭阳普宁交界之鲤湖作战，党军已被李、林、黄三部之敌包围。正危急之时，我部从敌后将其反包，歼敌甚重，余敌向五华窜逃，围解。苏联顾问即令党军跟踪追击，与我部会师收复兴宁。我则转向汤坑，经猴子嶺之敌追击攻剿，兴宁敌闻风溃逃三南，被赣方编遣而终结。陈逆汕头残部潜逃闽边亦受闽方编了。惠州杨坤如之敌举城投降收编回师返汕，不幸于1925年3月，惊闻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已一星期，故于这星期日在汕召开追悼大会，许总司令并请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报告这次东征得失批评研究，加伦将军指出党军动作停顿迟滞，张师的兵力使往汕头对海，亦失联系，惟许旅进展迅速，这次东征甚为得力，但是革命事业前程远大，望各同志今后仍须努力。我得到这次深刻教训和鼓励，无时无刻不更加警惕，至今言犹在耳。1925年6月间，滇桂系军阀杨、刘在广州不法，乃回师铲除，以固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奠定后，升我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

自从蒋介石由1924—1925年两年，当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党军军长，孙先生去世后，冒了革命的战功，控制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1926年，他用阴谋排挤共产党，逼令许崇智离粤，恶毒阴险，混淆黑白，甚于袁氏陈逆等。他的所作所为已载诸历史，亦无须我再述了。但我与他同事，不得不将他与我有关的说出，以为后来者警惕深省耳。当其时曾有人问于许崇智云，何以让蒋如此作为呢？许答，孙先生在日，党政军大权均被他篡窃，有孙先生的明智者则可，无孙先生的明智者则篡。孙先生去世不久，我若与争论，不知者，意我为党见不合，及以我为权力而争。我桑梓十余年来，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人民精疲力尽，谁能分别，惟有看他行践如何。革命事业正与不正，自有公论，那时人人得以诛之，讨伐岂能少我一分子？如是亦嘱我一同

离粤，我亦认为蒋阴谋恶毒不能共事，如是我就离粤躬耕于杭。在未退役之前，我仍为少将军事委员会参议。乃至 1932 年，意为抗日运动可以献身党国，回粤效力寻找工作，可能为支援第十九路军在沪抗日之效，即电蒋光鼐、蔡廷锴，愿在粤招集旧部志士为该军作补充兵员之需要，由陆路经闽浙以赴前线来作支援。蒙复电允许，竟为陈济棠所忌妒而排挤，未果。于是从此闭门不出，研求哲学与生理等学，以省其私。

(1956 年)

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

刘 骞*

1925年5月下旬，当杨希闵、刘震寰两军阀叛迹昭彰的时候，大元帅府曾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讨伐杨、刘，于是东江各地又为陈炯明叛军所占据。杨、刘叛乱平定后，跟着又发生廖仲恺被暗杀案，国民党内左右派展开尖锐斗争，陈炯明在军阀唐继尧的支持下，竟猖狂地要进攻广州，因此国民政府于9月下旬又有第二次东征之举。当时，黄埔军校学生队第一、二教导团已扩充为一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周恩来同志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林康侯（共产党员）任第三师（是由粤军改编的）政治部主任，笔者任第三师第八团第三营第一连党代表，亲身参加攻克惠州战役。

东征大军第一军于10月初由广州出发取道增城县、博罗县直趋惠州。因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沿途的老百姓都争相欢迎，挑茶送水的人不绝于途。革命军每到一处，政治部所组织的宣传队即四处活动，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陈炯明背叛孙大元帅的罪恶。当时，街头巷尾都唱着这样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至于所到各地城乡的墙壁，乃至土地庙和路旁的大树上，都贴满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革命军住宿的地方，临走的时候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向居民借用的东西，都归还清清楚楚，如有损坏，均照价赔偿。每次临走前，连的党代表便向附近

* 作者当时系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三营一连党代表。

居民告别，问明借用的东西还清没有，然后部队才开拔。在行军中宿营时，连党代表先到；开差时，连党代表后走。由于革命军官兵多守纪律，加以宣传工作又做得好，因此很得民心，革命军每到一个地方，就马上热闹起来，东一堆老百姓，西一堆老百姓，都在听工作队宣传讲演。茶水桌凳很快便从四面八方送来。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妇女运输队”（东征各地人民，男的大多在海外谋生，种田和一般劳动多由妇女担负）。她们争着为革命军挑运弹药，每十里给予广东毫洋4角的报酬。挑了一天到达宿营地还不愿去，各自找寻住宿地，第二天部队还未吃早饭，她们又自动齐集起来了，有些人连续挑运了四五天。她们穿着短衫，年龄多在二三十岁左右，头上戴着东江特制的斗笠，斗笠的周围都缀上一些红红绿绿的彩绸，一路长蛇阵般挑着担子，健步如飞的前进，从不掉队。在彩绸迎风飘荡中，时时传来“打倒列强……”雄壮的歌声。上述是在国共合作下所表现出来的军民合作的动人场面。

这时，彭湃（共产党员）已在海丰、陆丰等县做农民运动工作，早已撒下革命的种子，对于敌人的情况，农民随时为我军通风报信，因此敌情我们了如指掌。革命军一到惠州城附近，农民就对我们说：“叛将杨坤如听到革命军要来打惠州，就把他的部队龟缩进惠州城内，闭门坚守；城墙上四周都挖有枪眼，沿城墙脚下周围，都散布了五角叉铁钉，一踩上去就会把足背戳穿，如扑到城脚下，城上就会扔下火药石灰包。希望你们攻城时要认真提防。”

10月9日，革命军未遇任何抵抗，即抵达惠州城郊，安营后即侦察地形，搜索敌情，并选择进攻路线。因惠州三面环水，西湖在其西南，东江由东绕城北流过。飞鹅岭在西湖西边，高约100多公尺，可以俯瞰城中。这个高岭早已为我军占领作为炮兵阵地。当时周恩来主任和蒋介石均在飞鹅岭指挥。飞鹅岭左前方

有一长堤（堤面宽约一公尺）横跨过西湖，长约六七百公尺，对面湖边即是惠州城墙，湖边至城墙脚跟又形成二三十公尺的走廊。当时在西门方面即选此长堤为进攻路线之一。又在北门选了一条进攻路线。到了10日，各部队即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准备攻城，当时是以两个团围攻惠州城，第四团担任攻北门，第八团负责攻西门，其余为总预备队。总预备队即控制在飞鹅岭后面。是日午后4时，第八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10多个，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八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我当时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敢死队的编组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铁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八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冲锋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

当时每个敢死队员除携带一枝步枪、150发子弹外，又带上4颗苏联式手榴弹。各敢死队长亦分别对本队队员讲了话，鼓舞他们的战斗意志，并同着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大家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地准备明晨拂晓攻击。

第二天（11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那一队同其他三个敢死队绕过惠州西湖的朝云墓，掩蔽前进，经过一片竹林时即隐蔽起来，等待吹冲锋号。此时东方微微发白，我发现我们的位置正在飞鹅岭的左侧下面，前面正是通向惠州城的湖堤。堤长约六七百公尺，在晨光中远远望去，看见堤上敌人竖立

了三道木栅子。第一道距我们这面湖边约 100 公尺，堤的半中间又有一个木栅子，接近城墙那边的堤上，还有一道木栅子，敌人在这条独路上设了三重障碍物，企图阻止我军前进。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起来。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势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八团三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战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

当我们撤下来的时候，听见我军第四团在左侧方攻北门的枪炮声仍很激烈。当时该团团长刘尧宸看见伤亡过于惨重，曾报告何应钦，要求将部队撤下来整补，明晨再行进攻。但何应钦没有同意，在报告上批示：“此时天将傍晚，所余炮弹无多，今日不破城，恐无破城之机会。”刘尧宸乃振作士气，率领该团预备队，

向北门猛冲，到达北门石桥上时，举起手枪招引部队高呼前进。此时敌方弹如雨下，刘尧宸遂在石桥上阵亡；该团士兵亦伤亡过半，是日攻城战遂告停止。

当攻城战开始之初，苏联顾问曾建议将所有大炮和大小钢炮、迫击炮等集中施行重点射击。把敌人城垛下的机枪掩体和侧防工事轰毁后，我敢死队在强大集中火力掩护下，便立即奋起冲锋爬城，主力部队随敢死队突破缺口跟进，同时其他各要点仍采取佯攻，以分散敌人兵力。这一个攻城建议，蒋介石没有采纳。但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不能不重新考虑。

到了夜间，我警戒部队隔着西湖监视敌人，遥望惠州城上每约隔几个城垛就用长竹竿竖起一个灯笼，颇为明亮，以防我军偷爬城墙。同时敌人军乐队又在城上绕城吹奏一遍，以讥笑我军。

12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我们到了北门，住在一个祠堂内，吃了很好的早饭，上级又叫我们安睡。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

一、敌情：

1. 敌军主力集结于惠州北门城内一带地区。
2. 北门城墙上，敌人将城土挖空，设有机关枪掩体20多处，尤其侧防工事的猛烈火力，对我攻城队妨害颇大。
3. 在临近城墙脚下，散布有稠密的五角铁钉，阻止我攻城部队扑城。

二、决心：

我军决于今日午后攻破北门而占领惠州。

三、攻城部署：

1. 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
2. 午后2时我炮兵集中火力开始向北门当面之敌轰击，待

城上敌人机枪掩体和侧防工事被我炮兵轰毁后，乘敌人火力间歇时，立即奋起冲锋。

3. 各冲锋队借竹林掩蔽，用跑步以最快速度通过石桥，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猛扑登城。

4. 登城后立即扩张战果，扫除两侧和正面敌人，掩护我后续部队登城，并超越射击威力搜索进行巷战追击逃敌。同时打开北门，使我主力涌进城内。在任何艰苦情况下，绝不后退。

5. 在攻城得手后，各个士兵应受最接近的官长指挥，以免散乱。无须顾虑建制，免延迟追敌时间。

6. 破城后，敢死队专任肃清城内潜敌；追击逃敌，另由其他部队担任之。

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

午后1时，各个敢死队已分别依次沿着一带长约百余公尺的竹林掩护，用低姿势依次潜行进入桥头阵地。我暗中观察地形，看见一条小河横阻在我们的正面向西湖流去，宽约二三十公尺，水深不能徒涉；又因此河随岸弯曲，距北门城墙不到100公尺，在敌瞰射的强大火力封锁下，无法架桥。这是我们攻城最大的天然障碍。幸好流经竹林尽头，恰有一石桥，此处河面较窄，桥长约十七八公尺，两侧有石板式的桥栏（头一天刘尧宸团长即战死在此桥上），桥头有三四步石级。再从石桥往前看，距桥八九十公尺就是惠州城墙，破城全靠通过此桥。敢死队如一群猛虎隐伏着，养精蓄锐，等到2时大炮一响，就向前冲杀。

我们潜伏候攻中，频看手表，一秒一分地过去，恨不得立刻就到2时。刚到2时，我军大炮像雷鸣般向北门一带城墙轰击起来。每门炮的“集束弹道”经过我们头上构成弹幕，注射到敌人的机枪掩体，立见城垛崩塌，砖石飞腾。在我们正面的一带城墙

和附近的侧防工事，俱在我军强大的火网中，此时真像天崩地裂，山摇地动。经过二三十分钟的轰击，北门一带城垛和侧防阵地，皆为我炮弹摧毁，敌人机枪顿然无声。大炮刚停，我无数机枪紧接着狂吼起来，无数火龙从我们头上飞过，此时敢死队在冲锋号音中，奋起飞跑过石桥，踏着战友的血迹冲到城下。一时杀声震天，大家踏着门板，沿梯蜂拥而上，争为先登。有许多竹梯是将两个梯子用绑腿绑扎起来，因梯长而软，大家争先上去，所以有一些梯子忽然中断，梯上的士兵跌下来。又有些人因城砖被炮打松了，爬城的人忙中未踩稳失足堕落城下，同时落下的砖头又将城下的人打伤，亦有些人被五角铁钉戳穿脚背。虽然如此，但当时人人仍争先恐后。那种前赴后继的精神，实在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敢死队登城后，立即向城上左右和正面扩张战果，车轮式的机枪亦拿下了城墙。同时打开北门，让我大军涌进。敢死队除分向两侧包抄敌人外，并向正面搜索潜敌。所谓永远不能攻破的惠州城，就是这样被我们攻克了。

当天晚上，所有入城的队伍，除了负责追击或搜索残敌之外，一律住宿在城内的各祠堂庙宇中，另外有些队伍则在民房外边的屋檐下席地而睡。同时，各个队伍都是自携粮秣，自开炉灶，自己做饭。由于我军纪律严明，对商店居民秋毫无犯，加以我军政工队在城内广泛进行宣传，对民众做了不少政治工作，所以不到第三天，城内一切即恢复常态，群众前此的忧虑不独一扫而空，而且对我们很为亲切。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党员在队伍中所起的骨干作用。

(1964年)

讨伐杨刘广州之战亲历记

刘 骞*

1923年到1925年的上半年，广东省仍是四分五裂的，叛逆陈炯明盘踞东江，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则占据广州市和附近各县（杨、刘系被唐继尧逐出云南往依孙中山大元帅的），粤军李福林部驻在广州的珠江南岸，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则位于距广州40里的长洲岛上。

当时，廖仲恺任广东省省长同时兼财政厅长，又兼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军校的全部经费都由廖一人筹措，但因滇军的杨、刘凭恃武力把持一切财政，又贩卖烟毒，包庇烟赌，大抽烟捐赌捐，廖省长兼任财政厅长是有名无实的，往往黄埔军校的伙食费都无着落。有一次，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对黄埔学生讲话说：“……因杨希闵、刘震寰把持一切财政，使黄埔军校的经费常常陷于绝境，弄得伙食费有今天就没有明天，廖党代表为了办黄埔军校，往往深夜去向杨、刘交涉，因为他二人都是大烟瘾，白天睡觉，晚上才办事，要等他们把烟瘾过足了，才能开口说军校的伙食费，等领到钱马上派专人送到黄埔，你们学生第二天才有饭吃，所以廖党代表为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常常到深夜才能回家……”

确实，当时杨、刘恃仗武力，霸占广州，真是专横跋扈已极。他们士兵在广州市横行直撞，枪口向前，端着驳壳枪走，子弹都上了红槽，好像随时都可打死人的样子，老百姓畏之如虎，是不敢正视他们的。烟、赌、娼、匪，是滇军一手包揽，弄得广

* 作者当时系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

州市乌烟瘴气，没有人敢过问。至于广州市附近的石井兵工厂，完全为杨、刘所独占，造一枝枪，就提去一枝枪，他人是不敢过问的。因此孙大元帅常骂杨、刘：“你们戴着我的帽子，蹂躏我的家乡。”杨、刘听说苏联运有武器到黄埔军校，1925年春还密谋要来围缴黄埔学生的枪，因此有驱逐杨、刘，攻占广州之役。

孙中山大元帅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之后，杨、刘谋乱益急，蠢蠢欲动。是年6月的一天夜间，廖党代表突然由广州乘船来到黄埔（日期记不清楚了），当天晚上全岛即宣布戒严，所有各炮台俱加固加哨，第二天全校师生一律动员，停止授课，教导第一、二团的官兵和所有学生都在整理械弹，整装待发，全校官生顿时斗志昂扬而严肃起来。

第二天早晨约四点钟就起床了，吃了早饭天还未亮，各人都全副武装。计每个学生所携带的东西有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250发、手榴弹两枚、圆锹一把（或十字镐一把）、饭盒水瓶各一个、雨衣一件、毛毯一件，共计足有30多斤。

当时我们是黄埔三期入伍生团，由团长张治中老师率领指挥，我编在入伍生第一营第一连，营长是陈继承（保定生），连长是郜子举（保定生），副连长是陈赓（黄埔第一期学生，湖南人，共产党员，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陈赓大将），我当时是入伍第一连第一班的班长。

是日天将拂晓，我们即奉命由黄埔军校出发，每一条小火轮拖3只木船，我们入伍生团共计4条小火轮拖着木船依次航行。因我们是第一营，行军序列在最前头，航行在我们前面的是飞鹰兵舰，该舰是一条巡洋舰，因年久机器损坏，不能航行，平时即停泊在黄埔附近，这次用两条小火轮夹带航行，意在利用舰上的大炮以轰击敌人，因此多年不用的老兵舰又重上征途。这一天天气晴朗，海风浩荡，船头船尾都派有瞭望哨，时时准备杀敌。

8时左右，航行将到珠江边的猎德村，已逐渐接近敌人，此

时始知我们的任务是突破猎德村的封锁向广州攻击前进，命令限我们于本日午前攻破该村，向广州攻击而占领之。

我们航行至猎德村时，遥见对面一片广大的村庄，横在我们前面，是长约200米土筑的围墙，从江岸到围墙约有100多米，再从江边疏疏落落的树林望去，就发现沿围墙顶上有不少敌人在活动。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内究竟有多少敌人，但这一段围墙是全部村庄最突出的部分，也是离江岸最近的一部分，亦是我们首先必须攻破点，以免敌人左右侧射，妨碍我军进展。

我们在船上正在探视地形和敌情的时候，忽然张治中团长下达攻击命令，营长陈继承即命我营全部学生攻击当面的敌人，这是在敌人之下强行登陆，任务是很重要而艰巨的。小火轮拖着我们三只木船向对岸一直驶去，此时飞鹰兵舰上的火炮轰然雷鸣，当驶至距岸约七八百公尺的时候，小火轮上的机关枪亦同时怒吼起来，木船头上卧下的学生亦开枪向敌人射击，此时敌人机枪和步枪亦纷纷向我们还击。忽然，郑平同学的军帽被敌打穿了（郑平是共产党员，北伐中任营长，在江苏龙潭之役阵亡），船将靠岸的时候，我正在举枪射击敌人，卧在我身旁的副班长李志（广东人）忽然中弹牺牲，陈赓副连长令郑平担任副班长。

船将靠岸而未靠岸的时候，敌人的火力更加强大，陈副连长认为决不能在敌炮火下迟滞，多遭损害。因我们船上战斗员聚于船中，无法发扬火力，且时有中弹的，只有卧在船头上的少数人射击敌人，且船身被击破漏水，此时各同学愤怒已极，巴不得立即靠岸好痛击敌人。哪知船距岸二三丈远的时候，就搁浅在沙滩上了，此时千钧一发，只见敌弹打得水花乱溅。陈赓副连长大吼一声，命令各同学下水登岸，我一面跳一面招呼我那一班的同学下水时，陈副连长已先跳下去了。水有一人多深，因身上负重有30多斤，跳下去就沉了底，我闭着气拼命往岸边冲，没走几步就露出头来，但是在忙中还是吃了几口水。

人将抵岸，陈副连长命令我们沿河散开，射击隐伏于围墙内的敌人。但敌人的机关枪忽然不响了。我军既占领滩头阵地，勇气百倍，沉着勇猛地痛击敌人，因滇军未在围墙上挖有枪眼，必须凭墙顶上射击，我们看见沿墙顶一带无数的红边军帽（滇军的军帽在帽沿上边围镶一转红布边），一伸一缩的，成为我们显著的射击目标，只要敌一伸头，我们一枪打去，立即看见红边军帽飞去，而墙顶上的枪亦同时不见了。因为围墙距江岸不过100公尺左右，我们的射击几乎是百发百中；而我们的机关枪又随时在点射敌人，打得敌人不敢伸出头来，只好把枪身放在墙顶上盲目的射击，因不敢露头，更不敢露肩，所以枪口仰角很大，敌弹大多从我们头上飞过射入江中，故占领滩头阵地后，反而伤亡极少。

战斗约半小时，发现敌人的枪声稀少，似有退却模样，陈赓副连长立即命令奋起突破村庄。我军立即冲锋，手榴弹纷纷向围墙内掷去，敌人仓惶溃逃。陈副连长率领学生身先追敌。我们冲进村庄时，发现围墙内许多死尸，敌人俱未及搬走，大多都是头顶被打破的。我们正在搜索，忽见一逃敌绕一墙角奔跑，边跑边向我们放枪，忽被我军击中臀部，彼即回身卧下，向我军射击，立即被我军击毙，但尚未绝气，还在搬动机枪，被同学冲上前戳了几刺刀才不动了。此时村中老百姓纷纷出来为我们引路，帮着搜索，家家户户都搬些茶水出来，而村中的敌人都逃跑完了，并未发现有藏敌。

陈副连长立即指挥学生赶出村外向敌人跟踪追击，一出村庄尽眼一望都是稻田。这时虽是阳历6月，因广东气候热，禾苗已长得像人高。当时我们曾四处瞭望，看不见一个逃跑的敌人，陈副连长认为敌人纵逃得快，也不会这样跑得无踪无影，很可能分散藏在稻田里。立即命令学生一部分从本道追击搜索，大部分同学一字形散开下田搜索前进，我第一班同学正在端枪涉水前进

中，在正前面约 10 多公尺的地方，突然从禾丛中站起来四五个敌人，两手高举着枪，口称愿缴枪投降，大家遂一齐呼喝：“缴枪不杀，投降不杀。”并命投降的滇军高叫“学生军不杀我们，兄弟们快起来缴枪”。藏敌听见云南口音，遂纷纷从禾丛伸出，举枪投降，于是东几个、西几个，都从稻丛中站起来，远远望去，好像无数的田中水鸟，拖泥带水的走出田来，一一都缴了枪。总计全团所俘虏的，约有两三营人。

我军乘胜攻入黄沙车站敌人的师司令部时，司令部中已寂无一人，都跑光了，连电话和一切军用器材都未搬走。据车站工人说：“滇军师长赵成樑，在战斗刚开始时，即被大炮击毙。”赵成樑系滇军悍将，所率该师在这次战役中是主力军，是被我飞鹰兵舰大炮所击毙的。主将一死，军心涣散，又加上我军快速追击，敌人遂溃不成军。我大军于正午即进入广州市，敌人大部被我友军截击，缴械投降。杨希闵、刘震寰亦逃往上海去了。

我们进入广州市的时候，正当中午，天气很热，广州市家家户户，都摆出茶水或汽水或水果，拦着路请我们吃，我们只喝了一些茶水。欢迎学生军的标语，贴满全市。大街小巷都听见“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声。到了晚上广州市不但秩序井然，而且比平常更加热闹，完全呈现着军民合作联欢的气象，盘踞广州数年的刘杨，在短短期间内被肃清了。为是年秋消灭陈炯明收复东江，统一广东，打下了基础。

此处必须补充说明几点：

1. 在我军进攻猎德村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忽然打不响了。事后了解到，是因为石井兵工厂的工人同志，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在党的策动下，机关枪子弹多未装填火药，打几发就发生故障，无法连续射击，这时我军进攻，给予莫大便利，形成快速攻破猎德村的主要因素。

2. 猎德村的农民和广州市民，帮助搜索敌人，沿途送茶送水，收到军民合作之效。

3. 杨希闵、刘震寰的官兵，大多烧鸦片烟，盘踞广州数年，包揽烟、赌、娼等，官兵都大发其财，“钱多怕死”，因此官兵“有生之气，无死之心”。故一接触革命军，就各想顾钱逃命。

(1964年)

有关黄埔军校的一些回忆

林志光*

我的原名林超，于1926年投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在校受过入伍生训练和炮兵科训练，在训练期间参加北伐战争，迨至长江军事形势转定后，复员在武汉分校继续修业，时值宁汉分裂，再复参加反击夏斗寅、杨森等部进攻武汉之役，其间经过一年多错综曲折的斗争，爰将记忆所及，录之以供读者参考，这里仅仅涉及第五期一些片断材料而已。

一、入伍前后的政治形势

黄埔第五期是在1925年冬至1926年春先后分批入伍的，这期招考范围比较广泛，招考次数达10余次之多，我是在第13次招考入伍的。除广东地区招考外，远在全国各大城市及东北、西北、云、贵、川等省，在军阀割据地区，通过秘密或半公开招收和各地国民党组织保送受训者，因而这期招收学生人数特别多，共有4000多人，超过以前多期学生人数的总和。黄埔军校之所以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由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方向，为国共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二）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得到中共和苏联的帮助，开展了广泛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和学生运动，从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三）1925年“五卅”、“沙基”惨案相继发生后，推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尤以全国学生奔走呼号，急起救国运动，促

*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

成反帝斗争的浪潮空前高涨。(四)自从黄埔军校建立党军(亦称学生军)以来,配合群众组织,经过省港大罢工、两次东征、镇压陈廉伯商团事变、削平滇桂军叛乱,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为出师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黄埔军校即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二、训练情况

黄埔军校的创立旨在培养革命干部,以适应大革命时期建立国民党武装力量为目的,原系一种短期训练军事速成学校,原来名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全期分为两个训练阶段:第一阶段为入伍生训练,即典、范、令的基本训练;第二阶段为分科训练,即按照兵种如步、炮、工等分科训练。在第四期以前着重军事分科训练,从第四期起增设政治科后,军事、政治同时并重,故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学内容和训练时间亦有所更改。第四期是交叉入伍的,1925年冬第五期学生入伍后,第四期学生才开始分科升学,故早些入伍的第五期学生,曾通过甄别考试后,一部拨入第四、五期。两期学生共六七千人同时在校训练,校址不能容纳,故将第五期学生编成一个人伍生部,由方鼎英任部长。所属两个人伍生团,第一团团团长郭大荣,第二团团团长陈复,原来分驻东莞、石龙及西关泮溪一带,迨后集中在沙河燕塘马场旧址训练。所有编制和军事教材装备等部分采取日本式,部分采取苏联式的,政治课程亦增加社会发展史、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史略等,同时因学生程度不一,特增设数、理、化普通科学课程,以资补习。组织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平时强调铁的纪律,战时厉行革命军连坐法,有进无退,以一当十。生活作风崇尚俭朴,粗衣粗食,麻草鞋,黑布袜,实行苦干、实干、硬干。提倡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要求员生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民主自由等等。各级教职人员

亦很郑重罗致，其中有俄国顾问、教官，也有朝鲜教官，以及本国知名人士熊雄、恽代英、高语罕、施存统、张太雷等担任政治总教官或教官，时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后调武汉分校任教育长。武职人员中级军官以上多系保定及日本士官出身者。初级军官多系本校毕业及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在国共合作领导下，以及各级教职人员热忱教导，各项训练工作卓有成效，在校内外充满了革命气氛。

第五期入伍生于1926年4月底训练期满，5月开始分为步、骑、炮、工、辎、政治、经理等科分别训练。我分在炮兵科，该科为了北伐军前线需要，即将该科学生约500人，编成一个炮兵团，仍称为“黄埔军校入伍生炮兵团”，以蔡忠笏为团长，下属三个营，每营三连。每连四个排，第一、二排为山炮排，第三排为战车防御炮排，第四排为弹药通讯排。每连山炮四门，小钢炮两门，配以步马枪及通讯器材，全团共有各种口径炮六七十门，全部都是俄式装备。当时急于开赴前线作战，全团即在燕塘加紧训练，由俄国顾问及朝鲜教官担任训练工作，以夜继日，除教授炮兵技术及步炮协同作战原理外，常在瘦狗岭一带演习实弹射击。由于外籍教官语言不通，学术科都要由翻译人员讲解，对于学习进度破费周章，后来在讲授前印发讲义并绘制图案，讲授时按图讲解，收效很大。由于使用的山炮为当时较为新式的武器，系俄造“夫亦士”7.62口径山炮，每炮配有三棱镜“巴拿马镜”瞄准具一套，使用间接三角瞄法，能使炮位隐蔽在阵地后面一定斜度上，不易暴露目标，炮兵人员无需直接观测射击目标，只凭炮兵指挥官电话指示修正距离角度。此项复杂技术，要在短期内训练完成殊非易事，但在外籍教官和各级队长努力协助下，经过短短三个月的训练，基本上能够掌握一般炮兵技术。关于炮的装拆、驮载、运动及各种目标之射击，均能操纵自如，而且各级员生斗志昂扬，士气旺盛，跃跃欲试，随时听命开赴前线参战。有

些学生抱着必死决心，在出发前写好遗书，或在自己符号后面写上家庭通信地址，为阵亡后有人代为报丧之用。

三、参加北伐战争

1. 行军

1926年8月间，前线军事已攻克长沙赣州之线，炮兵团奉令开赴前线参战，部队从沙河出发乘火车至韶关后改为徒步经乐昌坪石、郴州、株洲直抵长沙。由于炮兵部队的行动极为笨拙，而且此项新式武器原适用于汽车牵引，乃因当时交通条件受到限制，只有使用部分骡马驮载外，大部要靠人力运输，每连雇用民犍多至七八十人，全团所需数量更属可观，为此使用大量民力，若非政治组织宣传工作，军民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要越过山区到达前线，实难设想。所幸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得到共产党的帮助，除组织省港大罢工工人运输队外，沿途人民群众亦积极支持，真正实现了军民一致的口号，而当时北伐军纪律严明，每个官兵都配有一个布质符号和红蓝白三色领带符号，后面印着“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这个简明的政治口号，却发生了无限威力。军队所到之处，毫无惊扰情事，备受群众欢迎。我随军由粤往湘赣等省两月有余，都在树林破庙宿营，从未有人进入民房。沿途群众多处设立茶水供应站，无人茶水站，北伐军亦照例给钱，平买平卖，秩序井然。尤以学生军更加受到群众的优待，当群众看到三色带的北伐军时，都亲切地称呼“家里人”，对北洋军阀则叫“侬佬”，这种敌我分明的界限不仅流露于言词间，而更重要的在行动上予北伐军巨大协作和支持，如提供军事情报，担任战地运输，以及带路通讯等等勤务，为北伐军出奇制胜或以少胜众具有决定性作用。炮兵团到达长沙后，团部和一、二两营配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在岳阳、汀泗桥一带作战，沿武

长铁路直趋武昌。我随同第三营配属朱培德的第三军，经萍乡、上高、高安一带进攻南昌。

2. 上高战役

上高、高安之线，原有孙传芳之唐福添师布防，制止北伐军前进，经第三军第七师王均部所击溃。唐部毫无斗志，一经接触并看见北伐军散发传单的飞机即纷纷逃窜，大部被北伐军包围缴械，盖因北伐军纪律严明，大有先声夺人之势，同时得到群众大力支持，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而北洋军阀都与此相反，完全陷于人民包围之中，如盲人瞎马处处挨打。当唐部溃退时，附近农民用扁担锄头加以截击，迫使唐军走投无路，唐福添本人亦被俘获。

3. 二次进攻南昌之役

1926年10月间，北伐军第三、六两军再次进攻南昌，在这以前，第六军程潜部曾一度攻克南昌，旋因北军反攻被迫撤退，后由第三军增援部队赶到，再次大举进攻。此役极为激烈，战事重心在南昌附近之牛行车站一带，亦称为“牛行之役”。此次孙传芳从苏浙两省调动三个师兵力增援死守南昌，双方激战八九天，随进随退，形成拉锯战。我炮兵第三营加入左翼作战，在牛行附近轰击敌军据点阵地，并掩护右翼向南昌城冲击。敌军曾一度全线出击，北伐军被迫退至万寿宫之线。当战局成为胶着状态之际，适武昌已经攻破，北伐军得从武昌抽调生力部队从赣北进击南浔铁路加以腰截，以使南昌之敌腹背受敌，全部被围缴械，并俘获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为北伐战役中一个重大胜利。我因负重伤，随同重伤员兵100余人，由野战医院转送长沙治疗，沿途经过七八百里，得赖民力担架运送，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四、宁汉分裂与校内派系斗争

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为适应形势要求，即在武

汉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2000 多人，编入武汉分校受训，其中包括女青年三四百人，在武昌两湖书院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邓演达为教育长，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黄慕松为总队长。所有各级队长和教职人员很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招收学生亦多系进步青年。女青年编成一个女生大队，同样受军事管理训练，一切和男青年一样，只有服装右臂加上“W”符号而已，社会人士称为“女兵”。女兵做群众运动和战地宣传工作顶出色，最易吸引群众和深入群众。此时，长江军事形势粗告安定，炮兵团即复员并入分校，编为炮兵科继续修业，另将黄埔本校工科、政治科亦相继拨为分校，全校共有四五千人，极一时之盛。但自炮、工、政三科并入分校后，校内派系斗争重复走向新的高潮，盖因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斗争由来久矣，自从成立之始，就存在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前者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后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为代表，两派之间在校内发生了许多暗潮。不过，在孙中山先生健在之日，在廖仲恺党代表全力维护下，右派集团仍有顾忌，只在暗中策划用“民生哲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三期时代则勾结西山会议派在校内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反对革命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至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廖仲恺党代表亦被刺殉难，右派势力顿形嚣张起来。在第五期时代，两派组织已成公开化，两派之间开展了激烈斗争，在同学中经常发生“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论战，有时更发生打架闹风潮等情事。孙文主义学会在蒋介石纵容唆使下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盲目排外思想去打击进步力量，气焰十分嚣张，许多进步学生常常受到歧视和诬蔑。我原先在入伍生二团十一连，连长许永相（黄埔一期，浙江人）、排长文重孚（黄埔三期，湖南人），都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经常唆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马志超、梁培等，去打击共产党员葛志坚（浙江人）、郭御屏（台湾人）、来

世升（江苏人）等，制造种种流言蜚语，煽动挑拨感情，卑鄙无耻地在厕所、饭厅涂写“打倒跨党分子”等标语。原来共产党员平时积极刻苦，在学生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葛志坚同志等经同学推举为炮兵团第八连连党部筹备委员，当炮八连在长沙正式成立连党部时，右派集团当众宣布中共党员没有选举权和表决权，强把葛志坚同志等排除党组织之外，引起许多同学愤愤不平，但多数同学是中间分子，慑于右派势力，敢怒而不敢言。迨至武汉分校时期，正当宁汉分裂之际，两派斗争主要表现在反蒋与拥蒋，斗争达到白热化。有一次全校员生在汉口“血花世界”（戏院）举行纪念会，会上有人发言指责蒋介石勾结昏庸老朽的张静江实行独裁反动阴谋时，台下反动分子便乘机进行捣乱，一群暴徒涌上台上进行辱打，一时秩序大乱，互相殴打，打伤员生数十人之多，其中数人伤重致死。事后调查，一批反动分子被捕，一部畏罪潜逃，后来捕获制造事件的幕后人物杨引之、×××等两人，均系黄埔第一期毕业的。杨引之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是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之一，学生群众对之无比愤怒，曾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对杨引之、×××两人进行过一场剧烈斗争。从“血花世界”事件发生后，校内更加急剧分化，凡在武汉分校有过反蒋言行者，均被反动分子列入“赤化分子”的黑名单，送向南京黄埔同学会会报，事后有很多分校学生被捕监禁。

五、反击夏斗寅之战

当宁汉分裂时，武汉政府军事实力虽拥有第二军、第四军、第八军等部队，但多已开赴河南进攻奉军，以及分布其他地区，武汉三镇仅有分校学生及叶挺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乘武汉空虚，除策划湖南许克祥叛变外，并令夏斗寅师从蒲圻向武汉袭击，又令杨森部从宜昌沿江而下进逼武汉，但杨部迟疑不前，采

取观望态度，夏师沿武长铁路进至距武昌 30 里之纸坊车站附近，形势极为危急。武汉政府仓猝应变，即将武汉分校学生临时编为“中央独立师”，詹连瀛任师长，是夜开赴纸坊附近迎击夏斗寅部，即在纸坊遭遇，双方激战一夜，卒将夏部击溃后，旋即移师专力对付杨森。杨见形势不利，不敢贸然东进，徘徊于宜沙之间，坐观成败。

(1964 年)

黄埔军校从创办到结束的回忆

卞稚珊*

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以校址设在广州市黄埔港对面的黄埔岛上原广东陆军学校与海军学校的旧址，故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军事学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中国革命、社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亲身参与其事的历史见证人不多了，它的创建由来、发展经过、消亡情况，特别是“清党”的来龙去脉，在广州起义中的光辉业绩，多为人所淡忘，甚至行将湮没。谨将我亲身经历、亲闻亲见可能回忆的，提供历史研究参考。

一、黄埔军校的创办及组织沿革

国共两党合作后，要想革命成功，单是组织成一个革命的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正如孙中山于 1924 年第一期开学典礼时，在训词中说：“中国的革命，有了 13 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个原因简单的说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复云：“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始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这骨干成了革命军，

*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第五期步兵第六中队长、第六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和校务委员。

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成功。”这就说明了面临当时的形势下，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27日开始筹办黄埔军校，任命蒋中正为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为筹备委员，设处办事，先甄录官长，训练下级干部，然后分省招生并择黄埔岛为校址，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位险要，实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5月5日，孙中山特任命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正式开学。于6月16日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该校设立了国共两党参加的特别党部，孙中山自兼黄埔军校总理，聘请苏联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后又聘苏联加仑将军为军事顾问。效法苏联红军建军原则，培育一批革命武装骨干，以备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用以实现国民革命。学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是黄埔军校的突出特点，因而与过去的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的士官学校等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保定军校、士官学校，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不同，因而强调绝对服从。黄埔军校则主张相对服从。而且规定每周六学生举行生活会，由学生主持，队长参加，听取意见。我的前任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郭唐彪在一次生活会上，因他不尽职，学生罚他在总理（孙中山）像前立正三分钟，他感到有失威信，第二天自行离职。后来这一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主要标志。这正是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黄埔军校组织上是逐步完善健全的。开始时，以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组织校本部，下设校长办公厅和政治、训练、教授、管理、军需、军医各部及总教官室。校长办公厅设主任一人，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总教官室设战术总教官一人，各部之外特别官佐若干人。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教导两团又相继

成立，学校教育与军事训练，俱增繁琐，故于11月增设教育长一员，以胡谦任之，秉承校长之命，处理校务。当时为了平定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12月复增设参谋处长职，以钱大钧代总教官任之，以襄军务。1925年1月曾一度将教授、训练合并为教育部，政治部仍旧，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编译处，以孔章虎任处长。到1926年广东军政渐趋统一，局势基本稳定，国民革命军已有六军之众，惟各军均设有军官学校，各自为政，于革命军的发展影响极大，故为统一军事计，乃将各军军官学校合并黄埔军校，于1926年2月1日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期集中人才，统一意志。改组后，于校长、党代表之下，增设副校长一职，以李济深任之。复任第一军军长兼潮州分校教育长何应钦兼本校教育长（前教育长胡谦因病，王柏龄代理，嗣由邓演达继任，至是邓调潮州分校教育长）。嗣因何应钦军务紧迫，不见视事，乃由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代。1927年10月因方已调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遗教育长职以李扬敬继任。11月初发生张发奎、黄琪翔事变。李扬敬擅离职守，第四军教导团长杨树松（前任叶剑英）继任教育长。广州起义后，李扬敬恢复了教育长职务。是年冬，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并没有放松对黄埔军校的统治，先派刘光前来代理校务，复于1928年5月又派何遂主持校务。嗣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命令，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翌年何遂辞职，又李教育长维持校务。5月间奉国民政府主席蒋命撤销本校副校长，7月命林振雄为教育长，9月本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30年9月，本校第七期毕业离校，乃奉蒋校长命停办黄埔本校，林教育长遵命结束。尔后，即以1928年3月6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本校。黄埔军校这个名称遂成为历史。

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采取日本式的军事课程，以学习战术、筑城、兵器、地形四大课程为主，与术科典、范、令

(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的讲解演习相结合。政治课程规定学习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侵略史、太平天国等。此外,本校学生皆可以购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有关书籍。政治部除对全校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外,在黄埔岛上做了很多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军校校内外的工勤人员多是岛上居民担任,而且多是青年女工。她们的政治觉悟很高,搬运工、勤杂工无不忠诚老实,以主人翁姿态对待本职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搬运军火、大米没有任何损失和差错,这充分说明政治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多么深刻、细致。政治部由周恩来同志任主任,1926年1月下旬,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遗缺以邵力子继任。政治教官基本上由著名的共产党人担任,先后有恽代英、叶剑英、肖楚女、韩麟符、聂荣臻、廖划平等。同时还请毛泽东、刘少奇、鲁迅、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何香凝等,以及苏联顾问作报告。政治部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办了一份《黄埔潮》,成立了“血花剧社”。政治教官除在课堂授课外,记得他们还积极利用每周六“血花剧社”为学生演剧布景的间隙,针对学生思想,灌输革命精神,博得学生热烈欢迎。教授部负责安排军事课程。军事教官大部是保定军校出身,一部是日本士官、陆军大学出身,英、法、德、意、比国的留学生为数甚少。训练部负责各兵种学生大队、中队(每大队直辖4个以上中队,每中队辖4个区队,每区队管50名学生)的军事训练。入伍生部负责各期入伍生团、营、连的军事政治常识训练。学生来源主要是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有大学生、外国留学生、海外华侨。中国共产党则由各地选派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校学习。此外,为了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前几期有由各省孙中山所属的部队保送的军官入学的。如第一期的李果(号岳阳)就是原讨贼川军石青阳部汤子模师的骑兵团长保送入学的。还有为仰慕黄埔军

校的革命名声，望风而来的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邻近国家有志青年，把到黄埔去视作最好的出路。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故的崔庸健委员长，即曾任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第一学生大队第一中队上尉区队长。录取的学生先入入伍生团接受一般军士具备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升入本校分科学习。黄埔军校是以孙中山签订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为校歌，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军歌，在军校大门曾贴着“革命者来”的横额，两旁贴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从精神到物质，从思想到行动，黄埔军校显示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深感与我住过的保定军官学校有本质上的不同，确实为创建新型的革命军队，改造旧式的部队，培养革命中坚培植军事政治人才的大本营，实现了孙中山说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训练一支革命劲旅”、“创立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的目的。

黄埔军校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总共办了六期。各期招收名额不等，学业时间亦不相同。由于为了适应当时局势的需要，基本上都是提前结业，或在训练中途，即投入使用。如：

第一期于1924年5月5日进校，同年11月毕业，共645人。

第二期于1924年8月相继由各地考取进校，内分步、炮、工、辎重、宪兵等科，修学时期各定6个月，而以随征之故，延至1925年8月始正式毕业，共449人。

第三期于1924年冬在广州、上海各地考取，陆续进校，分步骑两科，曾担负黄埔、虎门警戒，参与沙基惨案大游行等，至1926年1月肄业期满，毕业人数共1233人。

第四期于1926年1月进校，3月间升学，分步、炮、工、政治、经济等科，10月期满毕业，共2654人。从入伍到本校改组，因勤务很多，以致安宁授课的机会很少。如担任广州的卫戍、黄埔虎门的警戒、各兵舰的监视、廖案要犯的看守、第二次东征时

惠州的驻防等。

第五期于1926年11月开学，分步、炮、工、政治、经理五科。至1927年8月在黄埔军校的步兵、经理两科和在武汉分校的炮、工、政治三科学生都齐集南京举行毕业典礼。除“清党”被开除的学生以外，共毕业2418名。本期学生系1926年3月编第四期未升学的人伍生为第五期入伍生第一团，至7月成立第二团，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因而本期入伍生炮兵团、工兵营、政治队奉命随师北伐，参与鄂赣各役，10月10日完全占领武汉三镇后，即并入武汉分校肄业。

第六期有黄埔本校、南京本校、南昌分校之分。黄埔六期于1926年10月间招生，先后取录入伍生4000余人。至1927年10月升学，分步、炮、工、经理各科，至1929年2月毕业。因广州起义之故，致中途离校北上者甚众，至毕业时只718人。

第七期已非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而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但它仍打着黄埔军校的招牌。这期亦有黄埔本校、南京本校、武汉分校之分。仅就黄埔七期而言，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有预科与入伍生之别；预科是第六期学生升学后招收的学生军、军士教导队而组成的。其后因广州起义的影响，潜赴南京者甚多，仅余200余人。入伍生是将1927年秋第八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在燕塘组织的干部学校于1926年5月改为入伍生部招收的入伍生800余名。入伍生与预科生均于1928年冬升学，到翌年9月，只有666人毕业。

以上说明，黄埔军校无论国共合作或国民党包办时期共七期，卒业学生8783名。其所以不能按期读完学业时间和毕业人数有差距，完全是当时要为顺利进行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先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因而需要黄埔军校更多更快培养输送革命骨干，以适应不断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如1924年10月第一期还未毕业，就组织黄埔学生军和一部革命军平定广州商团叛

变。1925年2月1日开始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即是以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为主力军，6月间又将这支学生军撤回讨伐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紧接着又于8月下旬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将粤、桂、湘等小军阀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中由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政治部工作，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些旧式军队的雇佣性质。特别使人愤怒而难忘的是：是年10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合谋，竟将孙中山生前委任的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熊克武、军长余际唐、师长喻培棣等诱禁于虎门要塞，致使这支秉承孙中山之命，假道湘西，出师北伐未成，又适孙中山逝世，乃回师广东革命策源地，经过湘黔桂粤四省交界的崇山峻岭、地瘠人稀的地区，历时130多天，行程近万里的久经锻炼的3万多人（包括刘伯承同志当年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在内）的革命劲旅，不幸瓦解。当时蒋介石派第四军朱培德部和第二军谭道源师来粤北进行强制收编，未能得逞。随又派黄埔一期学生李果（号岳阳）为教导团团长、团党代表曾扩情到连县收容队伍，将我率领的建国联军随营干部学校的部分学员和全军的重伤病官兵800余人交该团护理，其中随营干校的分队长吴刚、钟百诚，学员王侃予（共产党员）、程子仁等则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第五期的高级班肄业。总部秘书吴礼谷（留日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同志在川军时的秘书）任朱培德的秘书，并邀我任第三军军官学校步兵科长，后并入黄埔军校。蒋介石诱禁熊克武等后，接连又进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直至1926年2月占领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才完全统一和巩固了。

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结束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国共两党又共同举行一场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1926年5月，广州革命政府派遣了由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广州革命政

府发表《北伐宣言》，随即派出 10 万国民革命军北伐。由于国共合作，军民一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于 10 月 10 日打到长江流域，完全占领了武汉三镇。与此同时，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继续升学。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军校规模也就随之扩大，任务更加繁重。这时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因北伐离校，由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副校长代校长名义。党代表因廖仲恺遇害，遗缺委汪精卫继任。教育长邓演达随军北伐后，以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任并代行校长职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因北伐离校，由邵力子继任。教授部、训练部由张华南、吴思豫分任主任。关于第五期学生升学后的分布情况是：

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队长帅崇兴辖 4 个中队（队长方既方、周博风、惠济等）驻校本部。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队长萧钟钰，辖第五至第八中队（队长李进德、卞稚珊、郑锡庚）驻蝴蝶岗。炮兵、工兵、政治三科学生则随军北伐，任务完成后，编入武汉分校（教育长张治中）受训。第六期学生，入伍时编为两团，第一团团团长郭大庸，第二团团团长李宜芬，同驻燕塘。此外，还创建了高级班，班址设在广州市天字码头附近，以周斌任主任，黄慕松任副主任，白兆琮任队长，内分军用化学科、无线电科、军事科三科，以军事科为主。所收学员限于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或其他正规军校毕业后服役两年以上的军官为合格。著名的共产党员黄公略曾在军事科肄业，当时名黄石。还有军事教导总队，专为训练军士备前方调用的。另有学员队则收容前方俘虏的官佐，先后三批，每批八九千人共计 24500 人。此时的黄埔军校生气勃勃，可谓极一时之盛。

二、黄埔军校“清党”纪实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蓄谋已久的背叛三大政策，篡夺胜利果实的总暴露。在此之前的“中

山舰事件”，还只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一个前哨战，一个试探，用这样一个阴谋事变来看看共产党究竟作何反应，试探共产党的虚实。紧接着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等规定，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不过这时蒋介石羽毛未丰、资历尚浅、声望不著，还不敢公开反共，还不敢和共产党决裂。他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苏联的帮助来窃取全国的胜利果实。因此，在“整理党务案”以后，蒋介石仍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仍旧在口头上表示联共联苏，一面则积极扩张私人派系力量，继续摄取党政军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更大规模的反共反革命阴谋。“四一二”政变，正是这一阴谋的实践，因而是蓄谋已久的。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蒋介石背叛革命，另立中央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他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收罗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如夏超、周凤岐等以扩充实力；通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等与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勾结，来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他反革命叛变的支持；接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走狗、江浙财阀虞洽卿等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的经济援助等等。蒋介石的反革命胆量就越来越大了。在“四一二”发动的前一日4月11日，蒋介石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当时我在黄埔军校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第五期），全大队住在离校本部里多路的蝴蝶岗。全校教职员生正在为北伐胜利，把统治中国10多年的北洋军阀迅速地给以决定性的击败而欣喜若狂。这时的黄埔，更是朝气蓬勃，堪称全盛时代。不料风平浪静的黄埔，无端传来了令人不快、使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谁都明白无风不会起浪，这又叫人忐忑不安。对此，大家只有强自镇静，莫谈国事，以免惹火烧身。尤其是负有维持军

风纪责任的队上官长，却不能放松警惕，让秩序稍有紊乱。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训练，多作精神讲话，勤于夜间巡逻。而无法掩盖的事实是黄埔军校海军码头到广州市天字码头，军校办事处维持交通的班航，突然停止了，这就更加引起教职员生的猜疑和不安。同时每星期六晚照例在大礼堂由“血花剧社”紫罗兰主演的文娱活动，虽未停止，但是每次演出利用布景间隙出来演讲的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韩麟符等突然不来了，大家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每次突击讲话虽只三分钟，都是抓住学生心理，进行引人深思、逗人喜欢的政治思想工作。虽事隔50多年的今天，仍使我记忆犹新。这时校外墙壁上又出现了“打倒新式军阀蒋介石”的标语。问题之严重，殊出人意外，但是谁也没有公开出面澄清问题。军校中平时就已争论不休的两个政治派系——代表左派学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代表右派学生的孙文主义学会，到这时反而双方严肃起来，不多言，不苟笑。而我们带队的军官则认为国共两党重视的教育机关，唯一的责任是要学生安心读书，不管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上级政府总会解决，不会风吹草动。军校一致照常上课到4月15日凌晨4时左右，天还未亮，突闻紧急集合号音，我从梦中惊醒，尚以为是夜间演习。奇怪的是，大部队为何不照往常那样先通个气，使我有所准备。不到5分钟，全大队官生徒手齐集操场，调整为训话队形时，天边渐见曙光，才隐约发现营房对面小山上，埋伏有队伍（军校设有一营加强特务营），枪口正对准我们，我知有异，我们被武装监视了。正当大家惊讶、极度紧张之际，遥望大队长萧钟钰从校本部方向急步走来，等到各队清点人数后，他立即郑重宣布：“奉校长蒋中正令，黄埔军校着即‘清党’，迅速划清国共两党界限情况上报……”等语。随即下达命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自行站出来。”仅我第六中队就有25人毫无惧色地应声而出。全大队站出来的共100多人。至此，萧钟钰又宣布：“隐瞒身份不站出来的，

互相检举，凡一人检举有两人附议的，即应站出来。”这是同每周六举行的学生生活会上提出问题、处理问题的办法，当时我感到不能简单地采用这个办法运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上，当即提出异议。理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而且国共两党党员有的是交叉入党，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平日的争论，代表那一政治派系的利益，也是很清楚的。双方之间的立场、观点距离这么大，很容易出现感情用事，挟嫌诬告，因此我建议：采取一人提议，须有9人附议的办法，以免“清党”扩大化。经我这一建议，也就再没有被人检举站出来的了（相反，入伍生部主任胡靖委员是一个极端反共分子，在他把持的“清党”委员会下，以“嫌疑”二字先后被冤枉关在南石头与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数千人）。这批因“清党”而站出来的学生，随即由四周担任警戒的特务营派队武装押送到预设在南石头炮台和珠江船上拘禁起来。当时我面临我亲手培训、朝夕与共的青年学生惨遭不幸的现实，在感情上不应影响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生活上应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为此，翌日仍派本队司务长黄赞将拘禁学生的伙食津贴及需用的衣物送去。后来闻这批被清洗的学生是由第六期入伍生看守。出于同学同志友谊，有的明知故放，有的乘隙逃走，也有的被沉入珠江的。最后交给广州市公安局关押的还有200多人。后来我们到广州走了一遍，才更加明白蒋介石搞政变早有布置。留守广州掌握党政大权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都是蒋的亲信，是遥相呼应的。在黄埔军校“清党”的同时，广州即已宣布戒严，派遣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所有的革命工会、农民协会，革命的学生、妇女组织也都被查封。因此而被逮捕和屠杀的有2000多人，包括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亦惨遭杀害。至此，国共

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蒋介石的叛变而告终。

三、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光辉业绩

现在有必要借此机会再谈一谈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从“四一五”以后，是否还有光荣的一页？到什么时候，才从历史上取消了黄埔军校这个名称？由于“清党”后的黄埔军校已名存实亡，不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了。全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全被血腥清洗，失去了革命灵魂的黄埔军校，实质上已变成了反革命组织。这时的黄埔军校，除少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外，其余的都是劫后余生，沉默寡言，虽然照常上课，心情则是十分沉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不料惊魂甫定，又传来汪精卫反动集团于7月15日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大规模地封闭工会、农会，压迫工农运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其残暴不亚于“四一二”惨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至此，宁汉合作，两逆合流，中国人民陷入了严重的灾难。在此之前，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还急急忙忙潜回黄埔军校以党代表名义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妄图收买人心。大家对汪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感到惊讶。在大礼堂内，众目睽睽地以怀疑和鄙视的眼光注视着汪精卫在孙中山总理像前，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汪竟一反过去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吻，暴露出一个十足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说什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妥协，这是破坏国民党；放手组织工农，武装工农，其计划是在消灭国民党。因此，需要坚决地把他们驱散、赶走等等一反其常的腔调，遭到了绝大多数师生的冷遇，嗤之以鼻。之后不几天，蒋介石来电调第五期（包括武汉分校部分）学生到南京。我们由海道前往。这时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蒋介石正亲率何应钦第一军、王天培第十军、陈调元第二十七军、柏

文蔚第三十三军、贺耀祖第四十军沿津浦线北上，意图收复徐州，反被孙传芳迎头击败。蒋介石于8月6日逃回南京，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乃枪毙王天培作替罪羊。孙军正准备乘胜大举渡江，龙潭大战之前，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遂于8月11日仓猝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举行毕业典礼。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这是他以退为进的惯伎，旋即赴沪转日本与宋美龄结婚，捞取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

第五期毕业后，蒋介石下野，军事委员会则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负责指挥。这时孙传芳指挥的李宝章、段承泽等7万之众的主力，正沿津浦铁路向浦口逼近，南京空气紧张，遂将第五期毕业生重点分配到据守南京附近及沿江的龙潭、栖霞、乌龙山一带的白崇禧第一军、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等。而龙潭成为8月30日双方决战，互相争夺的目标。经过一周的反复争夺，双方伤亡各以万计，其中包括刚毕业就上阵的第五期数百学生。这都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带来的灾难，是我黄埔同学不能忘记的惨痛教训。我将第五期毕业生分发后，即奉命回黄埔军校接受第六期入伍生升学。

第六期入伍生于1927年10月初升入本校分科生。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仍由蒋介石、汪精卫、邓文仪分别挂名。这时广东的实力掌握于第八路总指挥兼黄埔军校副校长代理校长李济深手里，他派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任教育长主持一切，何彤任办公厅主任，罗植桥任训练部主任，萧钟钰调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邓挥任炮兵队长，郑彬任工兵队长，皆驻校本部。卞稚珊升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下辖吴纲、白肇学、陈明仁、张良捷等中队驻离校本部约二里的平岗。学生来源，除郭大庸、李亚芬两团入伍生外，还有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学生五六百人，其中有的只有高小程度亦并入第六期肄业，引起中央与地方派系的隔阂，闹不团结。与此同时，还将原招的预科生（学生军和军

士教导队合组而成)与新招的人伍生合编为第七期入伍生,驻燕塘。经过一番调动调整,开始分科上课,学校的秩序、学生的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不料11月初突然张发奎的第四军派兵一营,由原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中于“清党”时被清洗出来的第五期共产党学生打先锋。因为他们熟悉黄埔岛上的地形,目的是用奇袭行动到校本部与平岗之间的鱼雷局军械库强制提取库存武器。最使人难忘的是,这批虎口余生的第五期共产党学生一登陆,即同住于校本部的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发生冲突。由于刚升学,每大队千多人还未全部发枪,每大队只发给50支步枪作警卫团。这批打先锋的学生因萧钟钰于“清党”时毫不留情,因此一登岸就去找他算账。结果李扬敬、何彤、罗植桥、萧钟钰、邓挥等高级负责人于混乱中都弃职跑了。当时我驻平岗,师生们正在上课,突闻校本部方向发生密集枪声,初闻似鞭炮声,旋有岛上居民跑来说,有土匪来抢鱼雷局的枪,又说在抢印刷所。这时电话已断,与校本部失去联系,枪声越来越近,我深感自己护校有责,更不容土匪骚扰,遂紧急集合全大队教职员生近2000人,就内操场坐下,宣布情况,准备战斗。我立即同中队长吴纲、白肇学(曾在长春,四平战役起义的国民党一八二师师长)各率两班精干学生分道警戒通鱼雷局的桥梁、右翼倒吊葫芦和正面的小操场上。由于学生初临实战,不沉着,一进入阵地就打响了,互相射击10多分钟,白肇学手部和一朝鲜籍学生腿部负伤,我才发现对方后续部队很整齐,戴的铜箍帽,知是正规军而不是土匪,乃吹停战号,双方对话。对方来人自我介绍是张营长,黄埔三期生,要我们照常上课,三天之内不得通过设在桥上的警戒线。我说:既都是黄埔同学,都有维护黄埔荣誉的责任,刚才误以为是土匪才开枪,双方伤亡各自料理(对方阵亡一排长)。在误会解释后,对方跑来10多名学生向我问好,才认出是第五期被清党出来的第六中队的共产党员学生,向我说明他们前次如何

逃出虎口后，即去武汉分校编入教导团的经过，此次来，专为提军械库的万多枝步枪、二三百挺机枪、几十门大炮，与军校教育无关等语。这样，我们才得安心上课。三天之后，他们运完枪炮，撤离军校之后，又马上派员接管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派教导团团团长杨树松（前任是叶剑英）接管原教育长李扬敬的职务，派教导团指导王侃予（原建国联军川军随营干部学校学员，黄埔四期生，共产党员）接管原办公厅主任何彤的职务，派教导团教官宋香涛（保定军校八期生，共产党员）接管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萧钟钰的职务。因学校高级责任人都已擅离职守，独我一人留校，坚守岗位维护好秩序，所以仍派我继续担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职务。同时在各中队基本上都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又恢复了比国共合作时期政治空气更浓厚的革命的黄埔新气象。但是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官生们，却感到军校整个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共产党手里，形势对他们不利，竟纷纷擅离职守，带头的是中队长陈明仁（后来在四平街战役中任国民党七十一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湖南起义）首先潜往南京告密，蒋介石即升任他为大队长，收容从黄埔军校北上的学生在杭州集中。但是绝大多数教职员生却感到黄埔精神恢复了新生。从1927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派杨树松等同志接管黄埔军校起，到同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止，这一段时间黄埔军校的整个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广州起义前，党派杨树松等同志夺取了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这一历史事实是与广州起义的光辉业绩分不开的。这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见证人，不容淹没。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年来，我留心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都是没有涉及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1956年12月史学双周刊社编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中李兰天写的《广州起义纪实》；195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16页记述

的《震动一时的广州起义》；1977年7月29日《解放军报》载军史资料《广州起义》；1978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载刘弄潮写的《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光辉》。上述文章翔实地记载了在广州市内起义军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立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光辉业绩，而没有涉及仅离广州市郊数十里外的黄埔军校的风云变化。但是事实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时间的消逝而被抹杀。在1977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载金应熙写的《广州起义中的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同志》一文的注解中注有：“接任团长（教导团团长叶剑英）是杨树松同志（中共党员），后来杨被调去黄埔军校。”又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几辑中载有刘祖靖写的《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一文中记有：“在11日晨，黄埔军校的特务营也在黄埔起义，把学校的反动军官关了起来，12日黄昏前他们乘船到达广州东郊，进达黄花岗与教导团第二营会师后，立即参加与敌李汉魂部的战斗。以后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向白云山方向转移到农村去了。”“这时担任防守沙河的是崔庸健同志（原第五期区队长）领导的朝鲜同志一百余人和教导团第二营的一个连，当敌人进攻时，他们英勇顽强战斗，鏖战半日，直至弹尽援绝，英勇不屈，绝大多数同志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再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载有孙同生写的《珠江风暴》一文中记有：王侃予和缪云人同志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冲破敌人的包围，到达龙眼洞与撤退出来的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会合后，继续撤到广州以北的花县，将在战斗中经受考验和锻炼，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千多人进行整编。于16日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通过民主选举叶镛为师长，王侃予为师党代表。这支包括有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掌握的特务营在内的红四师，经过三天时间完成整编后，又继续向从化、紫金挺进，沿途击退敌人多次阻击，终于到达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工农兵政府所在地的海丰城。此后即在彭湃、徐向

前同志的领导下，在普宁、揭阳、潮州、梅县、惠来一带与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同十倍于我之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顽强斗争着，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为尔后建立农村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从上述史实中，我才知道王侃予同志于1928年被捕，在广州被国民党枪杀。遗憾的是杨树松、宋香涛等同志至今不知下落。以上说明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是有建树的。但是，当时的黄埔军校既然整个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为什么几千学生却没有同特务营一致行动？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情况回顾如下：

在广州起义的前一天，1927年12月10日，广州市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拘留了许多人的消息传到黄埔岛上，引起了全校教职员生的窃窃私语，迨到11日凌晨，距离广州约40华里之遥的黄埔，突然听到广州市方向传来密集枪炮声，同时看到火焰冲天，交通通讯也顿时断绝了。我打电话与校本部联系，答复是：“要维持好秩序！照常上课。”为了稳定师生情绪，我乃召集全大队师生讲话，目的在用最近发生的事件消除大家的疑虑。也就是回顾11月17日张发奎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兵变，以发动“清党”，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口号，对留守在广州的桂系黄绍竑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缴了他的枪。这是粤桂之间的权力之争。粤系夺回了在广州的政权，这与作为教育机关的黄埔军校可以说是无关的。而且在此之前，军校库存枪炮早被该军强制提走，积极执行“清党”运动的代校长李济深这时已去上海，军校已没有什么东西足以使人觊觎的了。说虽如此，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现实面前，是不可能使人无动于衷、风平浪静的。特别使人注目的是，12日午后黄昏时候，王侃予、宋香涛、缪云人等同志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以急行军的态势，在海军码头乘轮渡江，向瘦狗岭方向开去，广州发生了重大事变，可以肯定。但究竟为的是啥？则无法知悉。幸得王侃予

同志临行前二小时邀我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到校本部紧急会议。决定：一、责成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队长卞稚珊行使校总值日官的职权，监督全校师生员工照常上班上课；二、特务营另有任务，所遗警卫团工作由各大队各选学生 50 名，由校总值日官统一指挥接替；三、经处理负责预支各单位 10 天经费，备足 10 天伙食；四、迨部队到达广州市后，再派人回校联系等。不料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此情此景，至今使人怀念不已。在共产党接管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之后，杨树松同志在广州的时间多，具体负责校务的是王侃予、宋香涛、缪云人等同志。在留用人员中，我的工龄比较久，资历比较高，情况比较熟，而且与宋香涛是保定军校八期同学，有历史渊源，与王侃予同志在建国联军随营干部学校则是师生关系，他与吴纲又是四川资阳同乡同学。更由于我们三人对当年蒋介石、汪精卫无端诱禁熊克武，瓦解我们建国联军，有着共同的义愤，今天又旧雨重逢，风雨同舟，感到倍加亲切，因而我们接触频繁，推心置腹，凡是他们所要了解的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孙文主义分子当时的思想言行和过去的活动情况，都毫无保留地竭诚相告。尽管如此，这一摸底工作不是短时间所能彻底弄清，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一；自从“四一五”“清党”之后，师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已经绝迹，仅凭少数初来的政治指导员摸清底细，做好转化工作，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二；由于陈明仁一走，在杭州公开收容北上师生，已使师生忐忑不安，再加李扬敬对待师生有中央与地方之分，闹不团结，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三；存在军械库作学生操练用的枪炮早被提走，不像教导团那样，缴了枪又重新武装起来，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四。这些客观存在问题，正是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起义中，没有来得及同特务营一道起义的原因。但绝不能因此抹灭了广州起义以前一段时间，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一光荣史实。这一光荣史实距今已

50多年，多为人们淡忘了。即使曾经亲历其境的，已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还健在的却也不多。所幸当年领导广州起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还健在，对党派杨树松等同志接管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是开创黄埔军校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奇迹，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特别是王侃予、缪云人等同志率领特务营参加广州起义，经过浴血战斗之后，冲出重围与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各一部合编为红四师，到东江与农民起义武装会合，继续战斗，而徐向前同志就是负责指挥亲与其役的历史见证人^①。因此，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应该载入史册。

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黄埔军校又恢复了由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局面，而不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了。李济深乘机急调陈铭枢、钱大钧、蔡廷锴军队从东江打回广州，徐景唐又从西江打来，把张发奎、黄琪翔赶走，夺回广东政权后，李扬敬又卷土重来，恢复了教育长职务。他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积极培植自己的党羽，把“拥蒋”变成“拥李”，导致属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学生，又继续大量逃跑。李扬敬对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外流。实际上，他是在甩掉包袱。他地方色彩浓，重用广东人，正如蒋介石重用浙江帮一样。先后逃跑的第六期学生和第七期入伍生，分成两股：一股是到杭州陈明仁那里被收编为三个大队，约千数百人；一股则到湖南粤汉铁路投奔前教育长、现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约有2000多人，编成学生队，派何浩若送往南京中央军校。以上两股逃跑学生加上当时长沙、武汉分校的学生，成为南京中央军校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别修学毕业。因此，第六、第七期学生，便有黄埔本校与南京中央军校之分。除了第六期在黄埔军校升学后，在共产党接管整个领导权那段时间是革命的、进步的以外，其余的时间，无论是在黄埔或南京的第六、七期学生都是为新军阀培植失了革命灵魂的军事骨

干。自此以后的变化是：

在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于 1927 年冬自日本回来，并不满足于第六、第七期大部分学生回到南京，也没有放松对他赖以起家的黄埔军校的统治，即特派刘光（号君实）前去黄埔军校代理校务，并提升我兼校务委员。由于时局混乱，仍难安定军心。不久又派何遂（号叙甫）前来主持校务。经过整编，原有 4000 余人的第六期学生只缩成步兵科三个中队、炮兵科一个中队、工兵科一个中队（不包括合并的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学生在内）。直至 1929 年 2 月第六期毕业，1929 年 9 月第七期毕业后，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只少数人调燕塘军事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至此结束。

四、黄埔军校结束后的尾声

燕塘军事教导队，是李济深任第八路总指挥时所办的培训军事的训练班，委该部副参谋长杜盖谦兼主任，地址设在市郊沙河的燕塘。1929 年春，蒋介石实行杨永泰的“削藩论”，因李济深反对蒋讨伐武汉政治分会的李宗仁，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汤山。这时胡汉民由苏联回国，蒋、胡重新合作。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胡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通过胡汉民关系，委陈济棠接替李济深的第八路总指挥，又任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到 1931 年 2 月，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强迫他制定一个现役军人可以当选总统的约法，蒋竟将胡扣留于陵园转送汤山软禁，因而激怒了国民党元老派，于是年 5 月 27 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唐绍仪、汪精卫、李宗仁、林森、孙科、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陈济棠、陈友仁、萧佛成、邓泽如、邹鲁、许崇智、古应芬、蒋尊簋等 16 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由是宁粤分裂。那时我任首都保安总队长，同宋希濂旅长分别兼任南京南、北城防指

挥。蒋介石把胡汉民移往南京城内双龙巷孔祥熙公寓，交我负责，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后因熊克武、但懋辛代表西南，派喻培棣潜来要我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因与他们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遂采取措施，把蒋介石的意图颠倒过来，名为监视，实则保护。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全国响起了团结对外的呼声。蒋介石为大势所迫，宁粤讲和，于10月14日蒋要我亲自送胡到沪，以显示他对胡不是扣留而是保护，同时还释放了李济深和方振武。

再说当宁粤分裂时，第八路总指挥部改为第一集团总司令部（包括第十九路军在内），陈济棠任总司令。燕塘军事教导队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其规模不亚于过去的黄埔军校，由陈济棠兼任校长、林时清任副校长、何彤任办公厅主任。我从1934年春到1936年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而倒戈陈济棠垮台时止，3年间我又担任该校步兵科长（下辖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兼预科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程子仁、第二大队长方既平、第三大队长曾匪石）。此外，该校还设有军事政治深造班，由民政厅长林翼中兼班主任。又设高级班，招收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以县长、行政专员任用。再有中级班，招收中学毕业生，毕业后，以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任用。陈济棠垮台后，燕塘军事政治学校改为中央军校广州分校，陈诚兼主任，陈芝馨（原张发奎的第四军副军长）任副主任。实际是余汉谋主持校务。到1937年因时局急转直下，该校先迁西江德庆，至广州沦陷，又迁广西宜山，改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一直办到第十三期而结束。

回顾广州沦陷时，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因他前任上海市市长时，我曾负责从日本手里完成接收“一·二八”战后淞沪战场的任务，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因而此次又邀我在保安处工作。在10月20日日本侵略军已从淡水登陆，绕道突破了我军在增城

一带的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消息传来后，吴铁城于深夜 11 时严肃地命令我负责于 3 小时内，安排整个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厅处局人员物资沿公路安全撤退到曲江。幸得事先有周密的准备，我是最后撤退的一人。在次日凌晨 2 时到达从化与良口之间，与敌便衣侦探遭遇，知将被敌截断退路。由于采取了紧急措施，终于完成了任务。从此与我视为第二故乡的广州、黄埔军校告别。岁月如流，至今已 50 多年。回首当年，感慨万千。特别对于黄埔军校的产生、发展，以致消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犹历历在目。但以事隔多年，总不免有遗漏甚至错误之处，为了把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如实反映出来，将尽我可能回忆的记载下来，以备曾经亲历其境、亲与其事的老同学、老同事予以补充、纠正，共同努力来写成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黄埔军校史。

(1983 年)

黄埔军校早期女杂工回忆黄埔军校

谢玉兰

我叫谢玉兰，今年87岁了。小时候住黄埔长洲平岗圩，父母靠摆渡为生，家境清贫。18岁嫁到长洲上庄。当时长洲风俗出嫁女仍住娘家，逢年过节才回夫家住几天，待身有孕才正式到夫家居住。

我记得20岁那年，长洲开办黄埔军校，需要在本地招收32名女杂工。我报了名，很快就被雇用了。

军校工钱不错，我们做杂工的每天四角钱、每月十二元。当时一角二分钱一斤米，二角多钱一斤猪肉。在军校饭堂搭食，一天才一角二分钱。

到军校做杂工的大都是19、20岁出头的姑娘，她们由一个三四十岁老成的男工带领，为军校种花除草，清洁卫生，修理房子，煮饭，挑水。

我们这些杂工，由学校管理部管理。管理部主任叫林振雄，为人“花心”，经常逗我们开心取乐。每个星期，管理部都安排我一至两次为蒋介石家挑水、干杂活。

蒋介石不住在军校，而是住在波斯楼对过山坳边的一间二层高的房子。当时没有中正楼，中正楼是后来才建的。

蒋介石是军校校长，喜欢穿长衫，有两个警卫随行，有两个勤务兵干杂活。他家中有一个老婆，很少出门，连叫什么名字，我们当杂工的也不知道。有两个儿子同住，一个叫蒋经国，一个叫蒋纬国。还有一个家庭教师，是个外省姑娘，约21岁，讲北方话，我听不懂。

当时军校提倡平等，人们之间关系比较随便。蒋介石是校长，我们认为无什么了不起，加上当时他又未发迹，故此，未现

出趾高气扬。比如，我到他家做活，常见他躺在帆布椅上看书报文件，我抹地板，抹到他身边时，他会自动起身，把椅子搬开，待我抹完地板后，又搬回原处，继续看书报文件。虽然如此，但对我们下人很少理睬，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

蒋经国稍懂事，蒋纬国当时十二三岁，非常调皮，常把家庭老师气得哭红眼。有时我在他家挑水上楼，蒋纬国趁你不在意，把手放进桶里或拉着后面的水桶，不让你上楼，气得我常顺手掴他一巴，他就吃吃地笑着走开。

周恩来在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我们都叫他周主任。周主任对人和蔼，常和我们打招呼。第二期开办时，我还跟过他到长沙出差，为他保管文件做杂务，大约去了一个星期。

黄埔军校有三栋木楼，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地方。军校的师生生活，紧张艰苦，出操的时候，一般人也受不了。上午训练三个钟头，下午训练三个钟头，日头猛也好，大雨淋也好，照样训练。军校纪律很严格，学生不准抽烟，自习时也不准饮汽水。大热天时，有的受不了，就从窗口递钱出来，要我们帮他们买烟抽，买汽水饮。一般从农村来的女仔，纯品怕事，不敢同他们买，而我就不同，我来自平岗圩，见识多，胆子也大，常帮他们的忙。

民国十四年，广州发生了反对英国人的游行，就是后来人说的沙基惨案。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去游行了。学校分配我们班杂工女当后勤，负责送面包汽水给学生们当午饭。那天，我也参加了送饭行列，半路上碰见参加游行的学生返回学校，他们说死了很多人，受伤的人就更多。我们见学生都回来了，就一起折回学校。

我在黄埔军校做了三期女杂工，后来因故离开。到修建东征烈士墓地和东征纪念牌坊，我又参加了修建工作。

（黄应丰整理）

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

魏治和*

1931年，广东发生了以所谓“西南王”的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孙科、汪精卫等人都到了广州，成立所谓非常会议，形成了西南反蒋的局面。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作为在这次反蒋运动中的一幕小插曲。然而，随着这次反蒋运动的破灭，它也就无形瓦解了。

1930年1月，我在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政治科毕业（这个班比照为黄埔军校第七期），与同学10余人（多是湖南、江西和两广籍的同学）被以实习员的名义分配到广东国民党省市党部（即广东省党部和广州特别市党部）工作。我分派在市党部，其他多数同学在省党部。

我们是中央而且是蒋介石派来的，在蒋粤矛盾中，当然是不免被歧视的，但他们又不能不接纳，只好叫我们剪贴报纸和抄写一些不重要的表册文件，每日照例上下班而已。幸而我们每月还可拿到生活费30元，也就无聊混混下去了，不觉也混过3年多。到1931年5月间，广州爆发了反蒋运动。

当反蒋运动开场，我们那些湖南、江西以及两广籍的同学有很多就事先闻风悄悄地溜之大吉，跑回南京去了。他们是趁此机会以脱险的姿态去南京邀功的。他们到了南京之后，是不是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留下来的，只有我和桂林同乡李丹卿（原名步墀，已故）两人。他被派在省党部组织部工作。由于我们两人虽然是受

*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

过了蒋介石的培养，但对蒋没有好感。我们之所以被算作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因为1928年间，蒋介石将所有全国军队的政训处裁撤，政工人员遣散。这批政工人员不下一二千人，聚集南京，向蒋介石吵闹，要生活要工作。蒋无可奈何，才成立这个班，以为收容。我们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收容进去的。一方面因为我们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是广西人，在当时蒋对广西的桂系的矛盾中，到南京去，我们是得不到好处的。个人打算不如在广州呆下去，依附反蒋，也许可以找到出头的机会。而省市党部的人，对我们的同学跑了和我们留下来这回事并不加以重视和追究。跑就跑了，留下来也就没有问题。

就这样，我们还是混混过日子。不料有一天，有两位自称是黄埔同学，一位名宋竹青（湖南人），一位名林××（广东人，名字记不起了），来找我们，说是想组织一个反蒋的黄埔同学会，但无进身之阶，想要我们通过林翼中向陈济棠进言，准许我们在广州号召黄埔军校各期同学组织成立反蒋的黄埔同学会。由于我们正在无聊中的时候，相谈之下，觉得这样搞起来，倒是一个出头的机会。于是就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活动，以我（化名为魏颂平）、李丹卿（化名为李杰）以及宋、林两人，再加上一位正在广州流浪闲住的黄埔五期同学张道如（化名张智，广西林桂县人，已故），并联系其他几个黄埔同学（那几个人及其姓名都记不清了），发起做了一个呈文，向陈济棠请求准予组织成立反蒋的黄埔同学会。这个文件由我送与林翼中转呈。大约陈济棠认为在这个时候拉拢黄埔学生也是反蒋的一注本钱，等于挖蒋介石的墙脚。所以不几天就得到批示，准予组织成立黄埔同学会，但要标出“讨蒋”、“剿共”的名义。并且派李扬敬为这个会的指导员，还拨给了坐落在广州市东堤原黄埔同学会会址的一座三层楼房为会址，又发给了一笔筹备费（数目多少记不清）。我们得到这些，皆大欢喜，都认为这一政治投机是投上了，于是不计利害，照批示决定筹组一个“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分头联

系在广州的黄埔各期同学。在这个时候，有改组派的黄埔同学李其中（自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詹冲（自称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以及他们所拉拢而为他们所掌握的黄埔同学若干人（不知究竟多少人，他们不说明），以集体的姿态参加进来。但他们想争取这个会的领导权，便与我们这些发起人对立起来。于是形成了我们依附陈济棠的一派和他们改组派的一派。因为这个同学会要有一个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名目是执行委员会，或是理事会，或是常务委员会，现在记不清了）。产生的办法，是由同学推选双倍的候选人，呈请陈济棠圈定。李其中他们要与我们平分秋色，所以在候选人提名中两派争执得很激烈。结果是两派各提出 10 名。这个名单还是由我送交林翼中转呈陈济棠，而在名单上我们打了暗号，记出那几个人是改组派。所以圈定下来的 13 人中，还是我们这一派占多数。

领导同学会的委员会确定了，委员会下分设组织、训练、宣传三科和秘书，由委员会的委员中推选兼任。这时就要推选出这些科长和秘书；同时陆续办理登记会员。登记的办法，是用黄埔军校各期毕业同学录做依据。来登记的，如果与同学录上的姓名和相片相符，也不审查他的政治背景，即认为会员。这期间，发觉原来找我们和李丹卿发起搞这个同学会的宋竹青和林××两人，是冒充黄埔同学的，就把他们两人排斥去了。这时已登记会员约有百余人，于是举行会员大会，宣布同学会的成立。同时推选各科科长和秘书。在举行会员大会那一天，将会址的三楼作会场，布置得很堂皇华丽。到会的会员约有成百人，汪精卫和李扬敬都亲自出席并在会上讲话。在会场中，我们这一派的人和李扬敬亲近；而李其中他们那一派人则和汪精卫亲近，露骨地表现出两派对垒的丑相。汪精卫两眼滴溜溜地注意着我们这一派的每一个人，情态显得很尴尬。我看着他觉得很可怜。大会开始，汪精卫和李扬敬都讲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勉励的话。接着由李扬敬主持以抓阄的方式选出委员会的科长和秘书。我们这一派原定要我兼

任宣传科长的，但我不会搞这项工作，同时觉得也不好搞。在抓阉的时候，李扬敬在抓阉时已暗示我要抓取那一阉。但我临时变卦，不去拈取那个得选的阉，就由投靠改组派的崔南山（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也是桂林人。他是走改组派的路线）拈去了。这时李扬敬对我大为失望，吭气不出声。其他各科：组织科长拈定是李丹卿，训练科长是詹冲，秘书是张智。自此，这个不伦不类的“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就正式挂牌出现了。

由这次我放弃了宣传科长当选权之后，我只是一个空头委员，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很少到会去。由于登记的会员中，有的确因闻风反蒋而来到广州的，尚未找到工作岗位，生活成问题；也有的是蒋介石暗中派来乘机捣蛋的，也来登记为会员。他们借口生活无着，鼓动其他同学到会乱吵乱闹。委员会无法，于是呈请发给生活费，得到批准，发给每个会员的生活费30元，才算安定下来。委员会还决定出版一个刊物，为反蒋运动摇旗呐喊。但由于宣传科长崔南山的无能和怕负责，一味耍滑头，因循敷衍，所以这个刊物始终没有出版。同学会的工作，除了登记会员和应付会员来会吵闹要生活费或请介绍工作等事务而外，简直没作出一点什么事。搞了不过两三个月，就接近反蒋运动的尾声了。而这时指导员李扬敬认为这个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同时又因为蒋粤和议日渐成熟，就把这个会置之脑后。会里有什么事向他请示，都置之不理，请领经费也领不到，于是这个会就奄奄一息。到蒋粤和议成功，局势一变，会址就给陈策的海军总司令部霸占了去。在会的负责人如张智、詹冲等人也就星散。而我和李丹卿仍旧照常在广东省市党部工作。于是这个昙花一现的“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就无形瓦解了。

（1962年）

黄埔军校学员生活点滴

陈希孔*

我于1926年冬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学习，次年七八月份毕业。

这期军官政治训练班的学员都是北方人，来自赣、浙、闽、苏、皖五省联军下级军官，年纪大的近30岁，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22岁。训练班编成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共500余人。

我是山东乐陵人，原在孙传芳部二师六团一营四连八班当班长，部队驻南昌。1926年六七月间，北伐军打到南昌附近，我部起义（按：原文如此）。有一天，上级通知说，要从起义人员中挑选一部分北方籍青年军官进黄埔军校深造，为北伐军继续北伐培养军官。为什么要挑选北方人呢？可能是考虑到他们能够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熟悉北方风俗习惯的缘故。本来我是不够格的，但当时我们团没有几个人想去。我打听到，连里没人去，营里也没人去，于是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敢于主动报名，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觉得自有点本钱。因为在这之前，我毕业于孙传芳部驻江西九江第三团军事学院，在那里学的正是下级军官那一套，连、排指挥我都会。本来毕业后是当官的，但由于将近毕业分配时更换了团长，原计划不算数了，就分配我去当班长。我想，此次若能准我去深造，简直是天赐良机。可是，很多人劝我说：“你千万别去呀！到广州派你去修铁路，当杠子队，做苦工。”我回答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上司批准，不管黄埔、

*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学员。

蓝埔，我都敢去。”

我们这批学员路过广东韶关时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欢迎的人们不断高呼：“热烈欢迎前方同学归来”。1926年冬，大约是12月，我们到达了黄埔军校。开学前进行了笔试，题目有政治和军事各一道。政治题目是：“什么叫三民主义？”五省联军根本不搞什么政治学习，所以我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作了答案，在试卷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不管三民主义、四民主义，只知道救国救民。”军事题是：“伪工事有何作用？”这道题没有难倒我。答曰：“一是分散敌人的兵力，二是消耗敌人的弹药。”出题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摸底，没有公榜，本人分数如何，无从而知。

开学典礼上，国民革命军后方司令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首先宣布：“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正式开学。”接着他讲了话，大意是：学员们毕业后要进行革命大北伐，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官僚主义。勉励大家专心学习。进行开学典礼仪式的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我记得，当时的教育长是方鼎英，教官主任是韩林甫。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军事教官多数是出洋的留学生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课程分政治和军事共两门，重点是学政治，政治与军事的比例是五比一。政治课包括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史两部分。讲三民主义时学员有课本，但上课不准看书，教官要求学员作笔记。教官解释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有一次，教官在课堂上讲到将来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时，有个学员说，现在还有抬轿子的哩。教官说：“到了将来，既没有人抬轿子也没有人坐轿子，大家都坐汽车。”讲帝国主义侵略史时，把鸦片战争、沙基惨案作为重点课题来讲，有课本，教官讲课时允许学员看书。“四一二”之前，萧楚女给我们演讲过。他个子不大，但讲话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边讲边打手势，非常吸引人。有一

次，萧楚女冒雨给我们和群众演讲，讲得极其生动形象。如讲到妇女要争取自由解放时说：“中国的男人受一层压迫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而中国的妇女则要受两层压迫。她们除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压迫外，还受男人的压迫……”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雨越下越大，萧楚女说：“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他只好继续讲下去。

开学两三个月左右，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半个巴掌大的铅印宣传品，书名叫《华北小册子》。

军事课有炮兵学、步兵学、地形学，有时搞点刺杀训练。整个学习期间，军事课占的时间很少。

本期的其他学员也是从各省各县挑选招考上来的，大多数是南方人，广东、湖南人居多，也有北方人，都比我们年轻。他们起得早一些，每当碰到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学员时，他们总是先向我们敬礼，接着第一句话就问你学习怎么样，然后就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人如何受压迫，毕业后要参加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每次见面时，跟我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起初，我们感到很不耐烦，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向我们灌输进步思想，在改造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着也真灵。由于我们听他们讲多了，又经常唱“打倒列强”这首歌，因此，对帝国主义就恨起来了，有的学员在睡梦中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不愿受压迫”。那时，我们感到打仗死了很光荣。有的学员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前方去打仗。”毕业时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用我们的肉弹去战胜敌人的炮弹！”后来同苏、鲁联军打仗时，这期学员打仗很勇敢，不怕死，前仆后继。“好汉死到阵头上”、“革命军人不怕死”，“不爱财、爱国家、爱人民”，这都是在阵地上经常听到的口号。

学习期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停课一个月。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经常打听：“为什么停课？”“怎么还不上课呀？”“四

一二”前夕，学校把发给我们的《华北小册子》收起来了。“四一二”之后，原来的政治教官不见了。复课之后，有位教官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有些政策是对的”。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上课了，十有八九是被捕了。

当时黄埔军校除了一间俱乐部砖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棚子，墙簾、草席，房顶是葵树叶子。每人发两套军装，两套衬衣，还有布袜子、草鞋、武装带，手纸也是发的。每人每月发18块小洋零用钱。伙食不错，早餐有馒头、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一盘花生米，一盘白糖。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一汤。每周可看一次无声电影。没听到过吹拉弹唱。纪律很严，外出要请假。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上街很麻烦。我在黄埔住了七八个月，没有到过广州市区。

1927年七八月份，说是前方用人之际，故从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里挑选了100多人开赴南京集中，我是其中的一个。出发时，军校举行了欢送会，李济深为我们送行，并讲了话。会上，我们致答词的代表还闹了一场笑话。他一上台，台下就热烈鼓掌，由于激动，又没有讲稿，一时不知讲什么才好。结果在台上站了很久也没有讲出一句话来。这时，李济深很慈和地说：“不要紧，你下去想好了再讲。”这才算为他解了围。我们在南京小营街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同学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某团一营当见习官，继而提拔为连长。后来由于我不满国民党军队的宗派主义，回家务农、做小生意。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人民军队里工作。

(1982年)

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经过情形

刘 骞*

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创立于1934年，我曾亲身参加筹备工作，馆中最重要的纪念品，有孙中山的遗物、廖仲恺党代表被刺血衣等件。现将该馆成立的经过及内容写出来，以供参考。

1933年正当张治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时候，命编纂黄埔军校校史，调教官刘骞（黄埔三期生）、杨宇僧（曾任过张治中的老师）、校部办公厅主任秘书夏维海（日本早稻田留学生）三人成立编史委员会，修编黄埔军校校史。到1934年校史将编竣付印之际，因收集的资料很多，送请考试院长戴传贤最后审核，他做了一篇序言，其中有“编写真实，然再求详，不可再得”之语；并认为许多文件，系革命历史珍贵资料，可成立“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张治中遂命原编史委员会三人兼筹备纪念馆事务，又加派梁鼎铭为筹备委员参加筹备工作，负责馆中图片设计和美术、陈设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工作基本完成，馆内重要内容，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一、黄埔军校重要文献，有孙总理与蒋介石校长商办黄埔军校函件、孙大元帅手订“军队连坐法”手稿和黄埔军校一切规章典则等，最重要的有孙总理亲手写的校歌手稿。

这个校歌，本是1924年6月1日孙总理由广州坐船到黄埔岛主持军校开学典礼，对学生写的训词。以后就谱为校歌。以后

* 作者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曾任黄埔军校编史委员会委员。

北伐成功，全国统一，黄埔校歌遂公布为国歌了。

二、黄埔军校各期教育计划，及改正教育计划草案等。

三、黄埔军校和各科人数统计表，各期毕业生同学录和纪念册。

四、第一次东征和第二次东征作战计划，大革命时期北伐大军各个战役经过简要说明。

五、黄埔学生参加革命牺牲的先烈的重要事迹，先烈的遗墨、遗著、诗文等。

六、重要战利品和有关战争照片与实物，及各种教育图片。

七、孙总理遗物，廖党代表血衣和遗物。

八、军校创办沿革和组织改进与变迁。

九、校史原稿和各项原始资料，与各种重要照片。

以上各项，其中几点须加以说明如下：

孙总理遗物，是中山先生所遗留下来的一套灰色华达呢西装。这套西装是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刘骞向马湘征集得来的。马湘，广东人，富膂力，精技击，曾任孙大元帅侍卫长，甚为中山先生所信任。总理灵柩于1929年奉安于南京紫金山后，国民政府任命马湘为总理陵园警卫处长。我与马湘同是洪门弟兄，平时常相过从，私交颇厚，我以他追随总理甚久，因黄埔军校系总理所创办，向他征求总理遗物，以便奉存黄埔历史纪念馆内，使学生得以瞻仰而激发革命情感。马湘说：“我尚保存有总理生前穿过的一套西装，这是我保卫孙总理于观音山脱险后，孙总理将他常穿的西装赐一套与我，这是他老人家对我解衣推食的恩惠。我领受这套西装后，即奉为至宝，从未穿过，慎重保存至今，每逢总理诞辰和逝世纪念日，我必供奉起来，焚香礼拜，纪念一番。今军校成立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要征集总理遗物，你老弟又亲来对我说，我现慎重的将总理这套西装，转赠军校，使学生们看见总理衣服，如亲见总理一般，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把

总理这套西装交与老弟拿去吧。”说到这里，马处长从一个大皮箱内将那套西装取出来，双手递给我。我当即向总理西装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礼，敬谨的捧接过来，放在客堂当中桌子上面。马处长无意中又去西装衣袋内摸出一张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孫文”和“逸仙”名号字样，马湘大喜道：“你连总理这张名片一并拿去，共同陈列起来，更有意义了。”我不自觉的说一句不伦不类的话：“这真是总理在天之灵。”我拿着总理的西装，如获至宝地跑回军校，向教育长张治中报告经过。张教育长看见总理的西装和名片，肃然起敬，对我指示道：“好好的陈列在纪念馆里，并写明征求经过。”那知在抗日战争中，中央军校由南京迁到四川成都，孙总理这套西装在成都北校场军校内，因保管人员不慎，竟被人偷去，后面当详加说明失而复得经过。

廖党代表血衣和袜子。黄埔军校于1924年创立的时候，孙大元帅任命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地位在蒋介石之上（当时廖任广东省省长兼财政厅长）。廖党代表对学生讲话时，蒋戎装佩刀站立在旁边；而蒋介石讲话时，廖党代表照例坐在一张藤椅上。当时黄埔军校的一切经费都由廖党代表负责筹划，他爱护学生有如慈母，学生对廖党代表都非常敬爱。因廖党代表坚决奉行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深为右派所忌恨，1925年8月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被人刺杀。全校学生闻耗皆痛哭，誓为廖党代表报仇，事后将反对总理三大政策的右派刺廖嫌疑犯魏邦平、梁鸿楷（粤军师长）等一一逮捕。在一天的夜间10点钟，校部命我带一班人（我当时是黄埔三期学生，任班长），将梁鸿楷押赴黄埔大坡地炮台监押，经过大操场时，梁以为要枪毙他，颤声问道：“到乜嘢地方去？”（广东话到什么地方去）一个湖南同学答道：“大坡地”。梁误听为“打靶的”三字，遂突然跪下不走了，哀声说道：“打、打、打靶，就在这里打好了。”我在月光下看见他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心里又恨又

好笑，大声说道：“不打你，起来走，到大坡地炮台去。”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黄埔学生是如何的信仰敬爱廖党代表，可以说当时如没有廖党代表的大力维护，黄埔军校是办不起来的。

1934年夏，廖党代表灵柩由广东移南京国葬，由意大利邮船康梯罗梭号载抵上海。张教育长派我代表军校赴上海还接灵柩，我晋谒何香凝师母面请廖党代表的遗物陈列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中，以备师生瞻仰。何师母郑重的拿住廖党代表被刺时身穿的白色西装衬衣和生前穿的一双袜子，热泪盈眶的对我说道：“这是廖党代表的血衣，被刺身死后，我不忍心洗它，一直保存至现在。你们黄埔学生都晓得廖代表是实行总理三大政策的人，是坚决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人，现在日本人如此欺负我们，你们黄埔学生看见党代表的血衣，知道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你们应本总理和党代表的遗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才不愧为总理和党代表的学生。”我当时俯首含泪向党代表血衣行三鞠躬礼，并向师母说道：“一定遵从师母的教训。”师母又将党代表的遗墨影印的《双清词稿》交与我一并带回军校陈列。

何香凝师母亲送廖代表灵柩到南京，张教育长治中率军校官生到下关车站迎接，同时中央党部和各院部负责人俱到车站迎灵。廖师母当时因有足疾，不良于行，下车后坐在手摇半自动藤椅上，对军校官生训话，大意是向学生说明廖党代表创办军校的苦心 and 一切困难经过情形，鼓励学生要坚决抗日等语。因一时未设有播音器，命我向学生传达，诸生当时甚为激动。党代表灵柩跟即国葬于紫金山之东首山麓。遗灵自康梯罗梭号邮船一直到国葬地点，沿途迎接祭奠的照片，一并陈列在馆中。

我在上海迎柩时，廖师母曾亲画梅花一幅赐给我，又给我一本珂罗板印的亲笔画册。这本画册是“九一八”日帝侵占我东三省后，何香凝师母痛恨蒋介石不抵抗，送蒋女人衣服一套，“愧以巾幗”，意在激发其抗日。当时中外各报遍刊此消息，在蒋政

权淫威统治之下，这一豪迈壮举，是其他人不敢做的。同时何香凝师母亲自作了若干画义卖来酬助抗日经费和救济东北难民，当时争购一空；上海爱国人士又将这些画影印成画册。

馆中的陈设布置，和美术设计统由梁鼎铭负责，所有陈设品俱放在钢架的玻璃橱内，四面透明，面面都能看得见。总理的西装和遗墨等和廖党代表的血衣、遗物、遗墨等，各陈列一玻璃橱，总理的名片即放在西装上面。这两个玻璃橱位置在馆的中央，凡参观的人，到此二橱前面时，都会自觉的行礼。一切陈列品都写有卡片说明。例如：

总理遗服征求经过

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在教育长张治中策划督导之下，既告成立；凡有关本校史实各种典章文献，俱尽力加以征集陈列，规模初具，斐然可观。惟创办本校之总理遗物，尚付阙如。适旧友马湘，来校参观，马君字吉堂，曾任大元帅侍卫长，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时，身负总理出险者，后任总理陵园警卫处长，因云尚保存有总理服用之西装一套，系生前所赐给者，有感于总理解衣推食之恩惠，敬谨珍藏未敢服用，亟愿转赠陈列馆中，永资纪念。授受典礼时，向总理遗服行三鞠躬礼，同时发现衣袋内尚有总理名片一张，尤为宝贵，后之瞻仰者，崇敬之心，革命之念，必油然而兴起矣。

刘骞谨志

民国二十三年夏

在抗日战争中，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四川成都，校址在北校场。1935年关麟徵任军校教育长时，政治部主任王锡钧

(号克廉，湖南人，黄埔一期生) 派上校教官谢廷献（四川人，黄埔二期生）负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俱乐部、图书馆管理之责。另有专任管理员分别负责。某日纪念馆管理员有一朋友来访，向他借钱未遂，他去吃了午饭回身转来的时候，发现那位朋友不告而去，同时总理的西装亦不见了。该管理员大为惊慌，遍寻不得，逼得无法，只得据实陈报谢廷献转陈政治部。王锡钧大为震怒，即派人押着那个管理员到广汉去抓着那个朋友，据其口供，偷了西装是实，拿到成都东门外卖与一个收荒的去了。于是王锡钧马上通知成都警察局长徐中斋、警备司令严啸虎、稽查处长周迅予，全班人马总动员，以偷儿为眼线，四出侦察，务必找着那个收荒的。其他凡是收荒的都在侦察之列，闹得满城风雨。果然不出 24 小时，又在东门外找着那个买西装的收荒人，询问之下，云西装已被人买去，好在是个熟人，跟即找着那个熟人，而那人说：“那件西装初穿的时候很合身，穿久了周身都不舒服，已转让一个朋友去了。”这一下终于找回总理的西装。谢廷献和那个管理员分别受到不同的处分。以后总理的西装就藏进军校的保险箱去了。

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有关大革命时期的资料不少，解放后军校被接收时，这些资料不知尚存在否？现写出来，俾历史工作者参证之一助。

(1965 年)

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台籍黄埔军校 学员李友邦的一段经历

佚名*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台湾台北县芦洲人、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集美兑山村，生于1906年4月10日，1952年4月22日冤死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李友邦是一位台湾抗日史上的著名人物，曾任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是一位亲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台籍黄埔学员，忠实的孙中山先生追随者；又是台湾革命的理论家。他一生献给了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的抗日战争，献给了台湾的革命事业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的爱国爱台思想是经过曲折、艰难，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而形成的。

我的外公是李友邦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闽南办事处主任，这使我对弄清李友邦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广州，是李友邦将军走上台湾回归祖国革命道路的启蒙阶段，更是他接受国民革命和新三民主义教育的摇篮。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在廖仲恺先生这个国民党左派、学者型政治革命家的影响下，他从一个质朴、激进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新三民主义者，促使他不断地思考、探索台湾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台湾革命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奠定了他一生至死不渝地为探索、谋求台湾的民族独立解放与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统一之路。李友邦以及那个时代的台湾抗日爱国

* 见陈映真：《台湾革命理论家》。

志士们的精神是伟大的，他们不屈不挠的爱国心、祖国情是他们反台独、促统一的理论根基。

悲愤的青少年时代

李友邦出生于台湾武装抗日末期（1906年4月10日），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人民实行极为残暴的殖民统治，除军事上进行血腥镇压外，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多领域实行高压政策，颁布了“六·一三”法，对台湾人民进行“同化”教育。李友邦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日本实施歧视性教育的牺牲品。日本殖民者实行殖民地差别教育制度和“同化”政策，将初等学校分为小学校、公学校和教育所三种等级，小学校师资、设备最好专收日本学童，公学校师资、设备很差招收台湾学童，教育所由警察执教专收原住民学童。1912年，李友邦进入台北和尚洲公学校读书，在学期间学校规定只准讲日语，禁读汉文，老师80%是日本人，学校通过修身、历史等课程对台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以培养效忠天皇的顺民思想为目的。由于台湾学生在校内地位比日生低，台生与日生争吵，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受罚的总是“番薯仔”（台生）。但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性教育非但没有使台湾人民屈服，相反地促使许多台湾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反日”意识，李友邦身上的民族烙印也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敢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李友邦在他所著的《台湾革命运动》中写道，我还记得我在孩提时候，曾以“失言”被掌的一段故事：某日，因与一个日本儿童互谑，被侮，遂愤然说：“如在中国，君我当异于是！”恰被一个日籍教师听见，立刻跑来，不问情由，不分皂白，大巴掌直向我的脸额打下来，并令我住嘴，不能再说。这是我所以终身以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今日回忆，往事历历，犹在眼前。那个亡国的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人都经历着各种不平等遭

遇，少年李友邦所经历的亡国奴般不平等遭遇，在他的心灵深处积淀着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火种。而李家代代相传的中国文化教育更是从小就为李友邦打下了深刻的中华民族烙印，我是中国台湾人铭记心底，使日本同化教育在李家子弟身上失败。

台北师范学校里的反日激进热血青年

1918年4月17日，李友邦从台北和尚洲公学校毕业，升入台北师范学校学习。李友邦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兑山少年”（兑山李友邦的老家）的中华民族认同和抗日志士的鲜血促使这一时期的台湾青年学生投身岛内的反日运动。而这一时期又正值中国大陆发生划时代的政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大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延续近2000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政治之路，大陆的民主革命运动也鼓舞着台湾人民“驱逐日寇，收复台湾”的斗争信心。这一时期岛内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与祖国辛亥革命遥相呼应，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启发鼓舞着台湾的仁人志士的民主和民族革命思想。这个时期，台湾岛内发生了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同盟会会员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余清芳、罗俊、江定领导的西来庵事件等，都体现了台湾人民尽忠报国，恢复台湾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李友邦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弥漫着民主和民族革命思想的氛围中度过的，义不臣倭的抗日义士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抗日义士的抗日保台思想和事迹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爱国主义素材，并激励一代代台湾青少年前仆后继，为争取台湾从日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回归祖国而奋斗，李友邦正是这样一位台湾少年。

李友邦进入台北师范学校的次年，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

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给正在摸索台湾独立解放之路的台湾人民指明了文化启蒙的方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留日学生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学习汉文，使用中国年号，称中国为“祖国”，掀起“祖国”热。当时留日学生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蔡培火等率先在东京成立“声应会”、“东京台湾青年会”，并于1920年7月募捐筹资出版了《台湾青年》杂志，1921年10月在岛内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们还把大陆的进步刊物辗转到日本，再偷偷带进台湾，期望以知识启蒙来提高台胞的民族、民主意识。台湾文化协会常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以文化启蒙感召台湾人的祖国意识。这些来之不易的大陆进步刊物和中日文字的《台湾青年》杂志等，使满眼只见日本文字的台湾人民欣喜不已。他们在20多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与祖国文化长期隔绝，青年人不懂汉语，但深埋在心底的祖国情结和认同感始终难改，他们秘密传阅，积极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讲座、学习会等。进步青年的觉醒使“台湾文化协会”迅速壮大，在全岛各地产生了许多分会和青年进步组织，身受台日不平等待遇之苦的台湾青年血气方刚，反抗情绪强烈，学潮也不断涌现。李友邦是这一时期台湾青年的代表，他虽不会讲中文，但在家中深受祖、父亲们的国文启蒙教育，偷阅《台湾青年》更唤起他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从日后李友邦参加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创办台湾义勇队等，都用《台湾青年》作为刊物的名称，可见《台湾青年》对少年李友邦的影响甚深。

李友邦是文化协会会员，他积极响应蒋渭水的主张，主动参与文化协会的活动，与蒋渭水、王敏川等关系密切，常利用李宅古厝作文化协会活动场所。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活动，另一方面将思想付诸行动，参加反日学潮，成为台北师范学

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李友邦就读的台北师范学校在1922年2月和1924年11月的两度大学潮中^①，带领两个弟弟投身该校学生运动，二弟李承基在1922年2月的学潮中被开除，李友邦也在1924年11月的学潮之前，因冲击日警派出所被勒令退学。如台湾文献记载，“然而，文化活动似乎无法满足热血青年的必欲行动而后快的意志。1922年，18岁的李友邦与胞弟李承基及几名激进学生袭击海山郡新起派出所（今廷平北路一带），事情并未爆发，人未查获。1924年，李友邦又伙同后来的台共创始人林木顺、林添进再次夜袭派出所，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事件轰动全台湾^②……。”次日夜晚，日警突袭逮捕李友邦，幸好得到同学相助而逃脱。从李友邦两度冲击派出所之行动中，可了解少年李友邦正因从小耳闻目染抗日义士的义举，在“台湾文化协会”的文化启蒙中感悟到，要谋求台湾的自决、解放，乞求于日本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唯有以武力对付武力才能将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逃脱在外的李友邦感到在台湾难以呆下去，于1924年4月和林木顺、谢雪红三人一起逃至高雄，搭上偷渡轮船来到祖国大陆^③。

黄 埔 从 军

李友邦三人到达大陆的第一站是上海，由于长期受日本的“同化”教育，他们只会讲闽南话、日语，根本听不懂上海话、

^①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第229页。

^②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第四章第二节，《台湾文化协会》。

^③ 严秀峰：《李友邦与中国抗战和台湾光复》。

国语。语言不通使他们困难重重。当时大陆的现状是北方黑暗、南方亮，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虽然国民革命屡受挫折，但广州仍是中国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1924年1月2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此次大会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①。改组国民党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重燃那些因辛亥革命而悲观失望者的希望之火，对渴求真理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奋斗方向。对于逃离日警追捕，越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寻找革命真理的台湾爱国者来说，更是像茫茫大海中的救生艇，使陷入困境中的李友邦看到了革命的曙光。1924年夏天，李友邦毅然告别林木顺、谢雪红独自南下，在厦门小住一段时间后来到了革命圣地——广州。

李友邦初来广州，语言仍是最大的障碍，广东人只讲粤语，外地人用国语交流都挺困难的。但李友邦对这两种语言都不懂，语言交流更难。据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女士追忆说，李友邦曾感叹初来大陆之艰辛就是语言关。生活中的困难尚可应付，以手势、画图等解决，买鱼画鱼、买菜画菜。但李友邦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警追捕到大陆，其抱负是要探索、寻找“救台救国”的革命真理，上海难以久呆可回福建老家，福建厦门完全没有语言障碍，但李友邦的抱负是救台湾、救中国，探索台湾革命的出路和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正是李友邦所探求的。因此，南方广州才是他奔赴的目的地。李友邦来到广州后，恰逢

^① 余炎光：《廖仲恺和国民党“一大”》。

黄埔军校招收第二期学员，黄埔军校对李友邦的吸引更大。他早在岛内参加反日学运时就确立了，要谋求台湾的自决、解放，唯有以武力对付日军才能将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之理念。如今遇到了为中国国民党培养军事力量的黄埔军校招生，这更是“激进”青年李友邦的投身之处，兴奋之中李友邦立即报考，他虽不会讲国语，但从小在家中接受祖父、父亲的国学熏陶，所以认识中文，才顺利通过了考试。

在中山精神感召下接受新三民主义教育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以推翻腐败无能清政府时，就有许多台湾同胞积极投身该运动。孙中山在组织兴中会时，曾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恢复台湾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的。因此，台胞中的孙中山支持者不少，参加广州起义的杨鹤龄和他的族弟杨心如（兴中会台湾分会负责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1897年7月，兴中会中坚人物陈少自由日本来台湾，联络杨心、吴文秀等组建了兴中会台湾分会^①。1890年9月25日，孙中山为策划惠州起义，亲自来到台北，对台湾兴中会会员鼓舞极大。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一部分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员也先后参加同盟会，投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自《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岛内一系列抗日复台斗争从未停止过，愈败愈坚强愈不气馁。台湾同胞很崇敬孙中山先生，很支持他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因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台湾给异族，其切肤之痛难以痊愈。因此，在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之革命目标是极为一致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在台湾影响也很大，很多台湾同胞尤其是青年人到大陆的

^① 《是天民之先觉者》第84页。

厦门、广州、北平（北京）读书，辛亥革命的成功直接启迪着义不臣倭、英勇顽强的台湾同胞继续与日本殖民统治者作斗争，启发着台湾仁人志士的民主和民族革命思想。李友邦成长于这一时期，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在岛内反日而逃到广州，追随孙中山革命，为恢复台湾而奋斗。他投考黄埔军校而不投考广东大学是基于其抗日复台之抱负的目的。李友邦到广州后，因他是由任剑若介绍的关系而被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录取，也考虑到他是台湾归来的革命青年，被安排在由廖仲恺担任党代表的讲武学校学习更合适，李友邦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队长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校管理十分严格，每日三操两讲，晚上二小时自习，午睡一小时，夜间八小时睡眠，每天除了九小睡眠外，其余十五小时都在训练中，每月还要全副武装演习、行军一次，近距离走十华里，远距离则走二十华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未使人感到疲劳，反而个个精神饱满。

在“革命左派”家中的启蒙教育

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对讲武学校学生的思想教育很重视，李友邦对廖仲恺先生很钦佩，李友邦就读讲武学校时，廖仲恺是该校党代表还身兼十三要职，如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等，超负荷的工作并没有难倒他。他对讲武学校的重视使他多次来校讲演，所讲内容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据李友邦夫人追忆说，李友邦还记得党代表廖仲恺是这样语重心长说过，“辛亥武昌起义，得到各省响应，把几千年的君主制废除了，建立了民国。但是这次革命没有完全成功，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卖国贼篡夺了，中华民族还是处在半殖民地中。帝国主义、军阀互相勾结，搞得中国民穷财尽。我们要救国救民，就

要继续革命。革帝国主义的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革依赖帝国主义生存的军阀的命，把它歼灭掉。”廖党代表还满怀希望地对学生们说，“这个革命任务落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李友邦对廖先生这段讲话刻骨铭心。

李友邦进入讲武学校后，语言仍是听课的主要障碍，他只能制定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学习方法，上课时只能应付时间，下课后便刻苦读书，学习方法主要靠自己读教材讲义，幸好教官中有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队长可请教，靠勤学苦读他居然也能跟上学习进度。在这里还有一段鲜活故事，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到学校演讲，这是一堂难得的课，学校师生都很重视并精神饱满的聆听，但李友邦由于夜读太累，听着听着便打起瞌睡来，军校值星官捏其大腿才令他猛醒，但这一切都逃不过孙中山的眼睛。课后，孙中山把李友邦叫到跟前，面对孙中山的批评李友邦既惭愧又不知所措，欲言又止急红了脸。此时，值星官向孙中山报告道，“这是从台湾来就学的革命青年，刚就学不久，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都听不懂，只会讲日语和闽南话。”经这一说明孙中山马上改用日语与他交谈，双方才沟通无阻。孙中山从言谈中看到这位台湾青年的革命热情，对台湾革命事业来讲，这样的革命青年应注重培养，鉴于李友邦的语言问题，孙中山要他每周一次到党代表廖仲恺家中补习国语。廖仲恺、何香凝早年留学日本，因此，用日语和国语对李友邦进行双语教育，这是李友邦的“福分”，从此，这个台湾青年在广州廖仲恺家中学得一口带着广东口音的“广东国语”^①，不解这段历史的人都难解李友邦的“广东国语”为什么讲得那么地道，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① 杨渡：《如此痛苦地拥抱祖国》。

廖仲恺一家可谓是革命世家^①，廖仲恺、何香凝自参加同盟会便与孙中山志同道合的革命，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廖仲恺一家不仅“左”，而且是个学者型的政治革命家，家中收藏大量社会上难得一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西方社会革命书籍、日本社会活动家的著作和世界名著等，这些书在台湾都是禁书，在大陆也很少见。李友邦的“福分”便是有缘到这个革命左派家中学中国话，在书海中遨游，尽力吸吮书中养分，阅读革命进步刊物、书籍开阔了他的眼界，升华了他的思想，使他从一个质朴、激进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新三民主义者。这段不寻常的学习是李友邦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对他日后成为台湾革命理论家奠定了基础。这个教育对李友邦的政治生命影响甚大，但也决定了他日后政治道路上的坎坷多难。在廖仲恺家中，除学得一口“广东国语”之外，还学到西方先进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理论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等革命道理，黄埔军校的磨练为李友邦日后建立台湾义勇队打下了较好的军事思想基础，广州从军应是他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1943年李友邦在撰写《台湾革命运动》一书时，还常常念及1925年间他在廖仲恺家中阅读革命进步刊物对他的影响，书中写道：到了1925年，时日推移已有10年，然台人对祖国的深情，那一年也未尝有丝毫的变易。在那时期有《台湾新青年》社成立，曾出版《台湾新青年》，在其宣言中也说：“我们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中国）着手，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必先致力于中国革命之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台湾才有恢复之日，待中国有势力时，台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②，这种

^① 陈正平：《李友邦与台胞抗日》第18页。

^② 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第2页。

思想升华是在这个革命左派家中熏陶出来。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起人张深切说，李友邦的“奇怪、激进”也源于此。张深切回忆当时来广州读书的台湾学生中有两种现象，一是读中山大学没有加入国民党系统的学生比较关心台湾自身的解放运动，而加入黄埔军校的台湾学生因受国民党系统的教育，较关心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而李友邦在这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左派家中学习使他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的“奇怪、激进”了。广州，是李友邦接受比较系统的国民革命思想和新三民主义教育的摇篮。

李友邦在黄埔军校学习了一年，目睹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认识的升华使他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坚定的投身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他成立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把台湾革命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1925年9月6日，年满20岁的李友邦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被派去主持国民党两广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是中国国民党最早的对台工作机构^①，从此李友邦奔走于广州、日本、台湾之间。

^① 李仲：《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

广州商团事变

2

■

2

1000

1

10

10

20

■

10

■

10

■

10

10

1924年商团事变见闻

黎初日

1924年商团事变时，笔者时适住在广州，耳闻目见颇多，现已距40周年，许多事情尚能记忆，虽属一鳞半爪，但对历史研究，或亦不无裨益也。

一、客军入粤

广州之有商团，最初系由本市的巨商们所发起，纯属自卫性质，往日商界中人，虽不全与官府往来，然大都“在商言商”，安分守己。迨陈廉伯出任团长数年后，1923年滇粤桂联军东下，陈炯明撤退东江老巢，孙中山亦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粤，重组大元帅府于广州，那时各省军队，打着革命旗号云集广州的共有13省客军之多，其中除真的有实力如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湘军谭延闿部及本省粤军许崇智部外，余的或一两千，或三五百人，少的甚至不过得十余人，也挂起总司令的招牌在粤投革命之机，故广州社会当时“无兵司令”不少。

客军入粤时一般装备不全，衣衫褴褛如叫花子，既占有广州富裕地盘，便大开烟赌，日事搜刮民脂，上行下效，下级官佐亦在横街浅巷里摆设赌档，用扑克牌翻“三公”，或用“鱼虾蟹”等赌具诱骗市民入彀，有些兵士竟敢穿起黄色制服，头戴红边圆帽，肆无忌惮地坐着包赌。有的则用小药瓶满储清水，路上遇着衣服整洁的市民，即上前相碰，故意把药瓶跌落地上打破，即向之纠缠敲诈。类似的纠纷，几于无日无之。其时东江战事亦殷，每逢部队出发，便在市区的乱抓犍役，被抓去的人往往一去永不见回来。客军视广东为征服地，常对人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

广州市的秩序，给那批小军阀们搞到一团糟。后来越弄越凶，在十三行稠人广众中竟公然白昼“起膊”^①。不久，绑架事情也在广州市开始发现了，黄祥华药店的老板在浆栏街店内白昼给人家绑去，勒了十万元才得释放，事后查明，绑架事件是滇军某部干的。因此，那时的广州真可算得“盗贼如毛”了。

二、商团扩大

孙中山当时曾三令五申移军郊外，无奈那班骄兵悍将抗不遵命，陈廉伯此时于是极力制造舆论，鼓吹扩充商团，以图增高自己的地位。^②而市民亦因经过此种刺激，尤其有切身利害的商家们，就更踊跃参加商团，以图自保身家，商团组织便因此扩大起来。

三、港英煽惑，商团变质

上面说过，商团组织，最初并没有政治野心或政治背景的，假使没客军进粤为祸广东，则商团不会扩大；假使没陈廉伯作为商团领袖，则帝国主义者亦未易进行煽惑。陈敢于明目张胆反抗孙中山，最大的原因是有港英为他撑腰。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组后即明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自争取关税余款不达目的后，广州更掀起“抵制英美运

① 广州的银铺（钱庄）原聚设于十三行灯笼街（和平东路）、打铜街（光复南路）一带，当时的通货是硬币，银铺交收，系着店伙肩往，“起膊”即是从店伙的肩上将银劫走。

② 当时社会舆论，颇主扩充商团，《现象报》有社论云：“溯自鼎革以还，萑苻遍地。本年军兴之后，贼势愈横，当道内忙筹饷，外务战争，从事救国，何暇剿除？故道路有抢惊之呼，闾阎受骚扰之患。此虽政府保护未周，亦缘吾人自卫无术，诚以倚赖不若自存，官卫不如民卫也。自卫之法若何？则扩充商团是也。”其他报刊文字鼓吹扩充商团的亦同一论调。

动”。帝国主义者认定孙中山系他的真正敌人，便要在广东物色一个忠实走狗来反抗孙中山，恰巧商团领袖是陈廉伯，而陈又是沙面英商汇丰银行买办，于是水到渠成，不用再向外面物色了。陈此时的心境已从憎恨客军转到害怕革命上去，因此双方一拍便合。彼以为外面有番鬼佬撑腰，里面广州的实力派——滇军，又已取得联络，更派人往东江怂恿叶举陈军发动反攻，他便认定一举手，可把孙中山搞垮，此时陈的胆量真的越来越大了。

当陈廉伯认为广州商团的力量，尚不够作为作乱的资本时，就把广州与佛山、江门、石龙等地的商团一并结合起来，以后更进一步，索性把府城各镇的乡团也纳入总部来联成一气。所谓“联防总部”成立之日，笔者适因事到佛山，佛山的商团长为陈恭受，佛镇九十六乡乡团长是何江。陈乃张槎（佛山附近）人，以足智多谋见称，系陈廉伯的一张“王牌”，何是澜石（亦佛山附近）的绿林翘楚，颇能号召当地的大天二，但当商乡团联合之日，何突遇刺殒命。

“联防总部”成立之时，佛山到处贴有四字的韵文布告，内书：“商乡各团，联为一家，只知自卫，不知其他。大局未定，市面巡查，扰乱抢掠，痛击严拿！”语气相当凌厉。有人说，他们岂仅“自卫”，连军警保卫治安之权也给篡夺了。

四、军械被扣，中山训话

陈廉伯所购的械是由一艘挪威船“哈佛”号载运进来的，甫抵广州黄埔，即被政府发觉，加以扣留。陈便鼓动商人反对，谓购械系经政府批准的，这样处理实不公平。不明内幕的人，以事涉本身利益，亦多随声附和，一时群情颇为激昂，大有“械存与存，械亡与亡”之概。孙中山召集全市商团到大元帅府训话，亲自向他们解释说：“陈廉伯确曾向政府领得购械入口护照，但护照不过五天，械便运了进来。照理，购械是应先要取得政府同

意，这一宗交易，倘谓业已预先取得政府同意的话，怎会在五日的短短期间内可以从外国买了运进广州来？那显然是陈廉伯自己的私货！以后可能尚有继续运来的，那才是请领入口那一批。捉猪问猪脚，我要弄清楚！你们大家也不要上了陈廉伯当！”末后又说：“革命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们试想，龙莫时代，你们去请愿时，他会亲自出来接见你吗？”

五、煽动罢市，西濠冲突

向政府交涉，不得要领，商团便煽动罢市要挟，10月10日，政府应各方调停，还给他们一部扣械。是日系辛亥革命纪念日，学生工人们在市上集会游行，过西濠口时，群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口号，领得枪械的商团军就与学生工人冲突起来，一时枪声卜卜，历时数十分钟，当场击毙多人，有一工人被害后，还给商团割下了肾囊。

以后局面便继续恶化，谣言峰起。甲说政府已采取强硬措施，将要强逼开市；乙又说：“老陈埋城了”（陈炯明攻到广州城下了）。商团散发告市民书，攻击孙中山三大政策，内有一段说道：“秋风起矣，蟋蟀开矣。吾同胞乎，甘以身为蟋蟀而中带草者之毒计自相残杀乎？须知斗而胜，自己所得亦不过折手折足而已，而带草者之荷包肿矣！”措词极尽挑拨，但谁为蟋蟀？谁是带草者？陈廉伯如果不昧天良，自己当会明白了。

六、武力解决，商团缴械

14日，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许崇智（粤军）、谭延闿（湘军）、樊钟秀（豫军）五总司令会衔布告，限令商团即日开市，恢复秩序，否则以武力解决。政府态度已转趋硬化。但商团方面，仍未见接受劝告。居民知战祸已不能避免。是日午，城内商团军已经纷向西关集中，彼时的西关并未开辟马路，

街市通衢，木栅林立，屋顶则架设天桥，以备守望。自罢市后，许多街市昏后便把街栅关闭起来，交通断绝。是日因风声紧迫，有些地方业已把街石撬起来，堆积沙包，做好巷战工事。下午7时许，枪声大作，机关枪声及冲锋号声整夜不歇。走上天台探视，但见火光烛天，流弹四射。是夜因电灯熄灭，乃燃烛为灯，又防被流弹击伤，乃与家人席地而坐，终宵不寝。至翌日上午3时许，则枪声逐渐疏落。笔者时寓西关冼基东街，该地本设有商团分部，破晓，从门隙窥观，见有一商团军官，由两名持械团军夹护，神色惶惶，匆匆跑过门前，似欲突围而去。良久，便有少数部队冲入街中，向前搜索，作试探性射击，迨不见还击后，便用枪托猛击各户之门，高喊“开门！”不应，则又大呼“放火！”坊众均上屋顶走避，但却没有纵火情事发生。

事后听说，当战事发生时，许多理发店被搜出纵火之物，不少理发工人给商团捕杀了。但我处附近有理发店两家，而其地又设有商团分部，战事爆发前，店内职工悉已离店，没给商团抓去，也没有纵火之事发生过。

以后，滇军即派人挨户勒缴团械，有些已参加商团而尚未领得枪械的团户，则须缴纳代金200元（确实数目记忆模糊，但约为200元之谱）。

商团被解决后，笔者即趁夜船往港。船出虎门，便复见许多溃退下来的商团军，他们大骂滇军长官不守信义，谓曾保证向政府调停，不致有战事发生，即使发生，滇军宁坚守中立，不作左右袒。但战幕甫揭开，滇军即派一连部队，吹起军号，从西濠口一直跑到长庚路西门，而事后向商户勒缴团械的，又是那批家伙。

那时香港有《大光日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三种报纸，《大光日报》是亲孙的，《华字日报》是反孙的，《循环日报》是中立的。双十节那天，西濠口发生血案，《大光日报》用斗大

字标题：《商团生番之不若》。商团被解决后，《华字日报》却用大号标出《贼政府收缴广州商团军械详情》。《循环日报》本以不偏不倚自居，但在商团垮台后，也糊里糊涂地骂起广州政府来。

数月后，商团在港出版了一本《广东扣械潮》，根据那本书说的，谓当风潮闹得最凶狠时，孙中山曾忿忿地说：“这趟风潮，魏邦平卸不了责，因滇桂军东下时，我在上海曾有电给他，着檄调江门的陈章甫部开往西江堵截，不使他们进入广州市，魏不理睬，现在广东搞到如此田地，实在对不起广东的父老。”此说果确，则孙中山之心目中，似亦以滇军入粤为酿成商团事变之主要原因也。

广州商团叛变记实

邓警亚* 唐璞园

我国之有商团，肇始于上海。当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义英法租界，急谋自卫，遂动员义勇队伍，保障地方。因所有成员，纯属商民，故定名商团。刘丽川失败，上海洋商之商团始告解散。但其组织机构，仍旧留存。迨光绪末叶，上海华商亦步其后，创立商团，一切规模，均取法于外。

广东光复后，广州秩序麻紊。穗市商人，备受虚惊，惩前毖后，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于是殷商巨贾，各大行店，因而乘时倡办商团，参加者初仅 300 余人，但装备整齐，精神焕发。一切营勇，均望尘莫及。舆论咸为称许。

龙济光入粤以还，军纪废弛，市面频受骚扰。商民饱尝痛苦，为避免敲诈勒索损失，纷请入团，借以自保门户，减少“外江壮士”威胁，团员顿增至千名左右，并推举岑伯著为团长。民国 5 年，伯著死于海珠会议，由黄鹭塘（黄祥华药油店东主）继任，加选罗雪甫为副团长（沙面鲁麟洋行买办、前清秀才，罗文干之兄），延李戒欺当秘书（述善堂董事李务兹之父）。① 申请入团者，更形踊跃，以逾杏坛弟子之数。惟只发给符号，自制服装，苦于枪械不足，未免美中不足，乃纷请采购。惟迭次进行，均无成议。然团务日趋发展，在西瓜园已建有商团公所，并新辟宽敞操场，延聘军事人员教练。

黄鹭塘久任厌烦，倦勤求退，扬言决不再干（当时各团友正

* 作者时任大元帅府内政部佥事、大本营宣传局总务科科长。

① 李戒欺为商团副团长。——编者注。

酝酿选他再次连任)，如有复我，当在汾上（他是佛山人）。陈廉伯风闻此事，不由见猎心喜，跃跃欲动，认为发财有路，不宜放过。于是大破悭囊，从事活动，遣其爪牙，排日宴请各分团核心人物（共有十个分团）。酒酣耳热之际，话匣既开，纵谈市上银根情况，牵涉到沙面汇丰银行，财雄势大，其买办陈廉伯，实权独揽，一切贷放按揭业务，自由处置，行长全不过问，故为所欲为。他身家富厚，手段灵通，上官下府，头脸峥嵘，且交游广泛，各国豪商巨贾，多与往还；所以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不愧为商场巨擘。你们如欲购买军械，可靠拢斯人，万无一失。若举他做团长，互相联系，必能了此心愿。寥寥数语，便搔着各人痒处，正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此种饮食征逐，作为选举宣传，以团外人打入团内，夺取领导地位，竟收到相当成果。由是各分团纷纷集议，酝酿团长人选问题，多数赞同提出陈廉伯为候选人。当日罗雪甫本参加竞选，但众意不属，名落孙山。选举揭晓，陈廉伯为正团长，邓介石、李颂韶为副团长，罗被屏弃忿忿不平。虽同是买办阶级，因名位冲突，怀恨在心，从此对陈之举动，恒处于对立方向，但莫奈伊何。

陈廉伯既取得商团领导职权，邓介石介绍《粤商公报》记者关楚璞（他是大新街中医关澄弼次子，毕业于公立法政专校，叶夏声得意门徒，兼他的律师书记）于廉伯。某首次召开会议，着重于购械问题，决定授予全权给团长专负其责，陈亦满口应承。随通过凡认购枪弹者，长枪每枝先缴港币 100 元，驳壳每枝 80 元，将来多除少补，由公所征收，汇存于汇丰银行，俟货到由团长提取拨付枪价，众无异议，照案执行。陈廉伯以利权所在，亦急切赶办。计定购者达 4000 余杆，得款约 40 万元。但陈氏多次向各洋商采购，都没有接盘。最后，始得到南利洋行愿意承接，陈廉伯遂因以图利。按照团友定购数量，扩大一倍，另增加机关枪 50 杆，备将来暗中私售，用饱荷囊。并无告诸公所当事人，便与南利签订合同。订明在 7 月底长船放洋，运抵广东。购械手

续，遂告一段落。他满以为肥肉行将到口，可以大扒特扒矣。

陈廉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获充洋奴（他先代经商安南致富，其先人启沅目光特殊锐利，能在扇面写完全部康熙字典，故诨名鬼眼七，少时随父赴越后返国首创丝偈，用机器代替手摇，为缫丝工人群起反对，酿成捣毁风潮，拘讼于南海县署。邑令徐赓升极力调解，令各安生业。是以启沅先受损失后终获利），故早日派头十足，铜臭气味，咄咄逼人。掌握团务后，对团内中上层人物，则极力拉拢，其他便鲜与接近。邓介石年青活泼（第八甫某丝庄少东，为行中有名数字号，父死后，由伊叔接管，但按月支给数百元供他挥霍，故恒与各团友在陈塘流连花酒，作局消遣），常往来于各分团，与中下级成员接洽，即普通团众亦多与结纳，故实力与陈廉伯各有千秋。李颂韶本老实商人，全无政治欲望（他是小市街著名金铺西成号老板兼司理），因宗姓关系，同李福林颇投契，团友对他亦有好感。关楚璞才具平庸，素持拜金主义，对陈极力吹捧，奉命唯谨，博其欢宠，故陈廉伯引为心腹。对邓李二人，陈阳示亲密，以图利用，不敢蔑视。盖因彼等在团内具有实力，取得部分信仰。惟貌合神离，不啻同床异梦，未能收三位一体、精诚团结之效也。

当时孙中山领导之政权，只能行使于西北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带。陈炯明余孽，仍占据惠、潮、高、雷、钦、廉各属。且客军方面，滇桂两部，志在搜刮货财，包烟庇赌，借以扩充势力，对于大元帅命令，阳奉阴违，择其有利于己者方切实执行。而孙中山先生旨在救国，实行革命到底。陈廉伯已拥有广州商团 6000 余众为基本部队，视同项羽之江东子弟；更思展拓其范围，扩及全省；冀异军突起，活跃于政治舞台，化买办洋佣为达官贵人。故陈阴与文胆关楚璞、武胆杜绶英（杜贡石弟，银号老板兼司理）秘密筹谋，组织商人政府。叛变之蓝图既描绘就绪，遂着着进行。物色帅府参军祁耿寰（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参谋长）搭桥，与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往来。然后撇开祁耿寰，单独与范廖协

商。复遣使至香港陈炯明军机关接洽，游说其连合倒孙，信使往返，约定如先入穗市，即率领各社团拥戴其督粤。

合纵之工作业已告成，爰于民国 13 年 5 月，召集外县市 138 个商团，推派代表来省开会，协商联防事宜。报到者达 108 埠，代表人数共 300 余人。27 日首次会议，陈廉伯、邓介石、李颂韶被选为主席。提出议案共 40 件。主张组织联合最高机关，以便统率者占 30 件。该案一致赞成，无异议通过设立联防总机关。乃推举陈廉伯、邓介石、李颂韶、谭良予、胡沛云、陈志寰、王仲庸、谢寿彭、张励图、陈东璋、陈振之、梁养能、邓迈千、冼澄宇、陈铁庵、何镜宣 16 人为起草委员，选邓介石为主任。旋提出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章程、总部规则、代表大会规则、参议会规则、各区联防分部规则草案，交大会讨论，均照原案决定。乃进行选举，选出陈廉伯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副长。陈恭受字益南，南海张槎乡人，前清附生，宣统二年充广属清乡总办江孔殷书记，辛亥粤省独立，江解职荐他于陈景华当司法科长，历邓瑶光、王广龄、凌鸿年、王顺存、魏邦平各任均蝉联不动。粤军回师讨莫，魏李联合兵谏，陈恭受反对甚力，劝魏不可轻举妄动，因此失欢于魏。陈炯明长粤，魏免去其职。乃失意返居张槎，不甘寂寞，组织莲华四十七乡联团，获充团长，武断乡曲，雄视一方。他本与佛山商团绝无关系，但该团举出陈恪予为团长，陈恪予力辞不就，并举陈恭受自代，缘他亦是莲华联团副团长，陈恭受因此大出风头。陈廉伯看中此人握有佛山一带商乡两团实力，又属旧交，故引为心腹，遂获充全省商团军副长。又选举冼澄宇、李颂韶、岑琼波、陈铁庵（南海叠滘乡人，时充帅府卫士，其父是佛山利源银号东主，已去世）、谢毓生（长堤泰安客栈老板兼司理）、袁灼光、谢寿彭、邓迈千（三水人，英德鸦片烟商）、梁养能（三水人，四会信和银号司理，四会商会兼商团长）、何镜宣、岑瑞亭为参事。互推李颂韶当参议会会长。选举完毕，复议决定期 8 月 13 日举行联团开幕

典礼。

先是粤省商团总公所初定之章程，系以维持公安、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为唯一宗旨，奉有军政民政长官核准立案，并呈奉陆军部、农工商部立案。印戳启用，文曰“粤省商团总公所”。此次联防总部本属改组性质，但未经重新呈报立案，便谬然举行联团开幕，于法殊有未合。故省署于前数日遽下令制止，盖已侦悉其将有异动矣。况粤省商团总公所立案章程，并未有说及商团军联防之举，所以省署借此不准其成立。彼等方兴高采烈，忽然冷水浇背，当然非常愤恨。联防参议会遂向当道请愿，要求收回成命，未获允许。警所又奉令督拆各街庆祝联防各牌楼，但旋拆旋搭，并以武装团员守卫。各警区不敢过于强硬干涉，只用善语开导，劝将联防二字删去，不了了之，此亦欺软怕硬惯技。

8月10日哈佛洋船运载商团定购之军械入口。帅府下令停止起卸。因此商团对省署禁止联防成立、再待改组一事，愿意让步，即改为联防筹备处。总副团长佯为宣告辞职，但各商店仍然热烈庆祝，大书“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同伸庆祝休业一天”字条，贴于门上。省署以为商团业已就范，遂批准联防筹备处成立。诘13日广东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公然遍贴布告，文云“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代表大会选举陈廉伯为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副总长。兹准于13日就职，并准联防参事会呈咨外，合行布告，仰各属商团军一体知照。”至此其顽强对抗政府状态，已暴露无遗。当局岂能哑忍，因而扣械事件，益趋恶化。

初，陈廉伯接到运械船已放洋电报，即向军政部领取护照。部派许崇灏向商团接洽，须缴照费5万元，方可发给。商团答允先缴万元，余款俟起械后交纳，遂取得护照。8月运械哈佛轮船已抵沙角炮台附近，廉伯翌日将货款付清，领到载纸，准备派团军守候，待船抵白鹅潭起运。先向税务司报告，税务司称要有大元帅命令方准起卸。及船到珠江口江固兵舰尾随监视。11日省

署和军政部发出布告，取消商团运械护照。商团代表即日向公安局长吴铁城请转达帅府准予起卸，没有结果。旋开紧急会议，全体职员提出辞职，声言不再负责。各团员集合在公所开会，达2000余众，旋向河南出发，请李福林带领到帅府请愿，仍属无效。陈廉伯弟陈廉仲以总商会会长名义，出头召集各行商开紧急会议，决定以罢市要挟。但仍待19日答复，再定第二步办法。15日下午，桂洲商团长胡沛云、北江商团代表潘适存及郑杏圃等人，携同呈文往谒大元帅，由黄秘书接见，答云：商人既向陈廉伯订购枪支，应向陈氏追讨。政府因其手续不合，必须查明确实，方能答复。19日帅府派林直勉、连声海、邓彦华到公所正式答复。团方由黄叔明（十分团，系小商人）、陈荫廷、叶子刚（银号司理，颇有口才）、冯星垣代表接见。林等宣达大元帅意旨，谓政府素来尊重民意，与商团本属一家，且商团是安分良民，政府无漠视之理。对于购械问题，应仿照民团领枪办法，每支步枪定为底价160元，如在商团公所领有收条者，向政府缴价60元，无收条者，照160元领回。代表答以须征求同人意见，未能即席答复。旋各善堂院善董黄砺海（杨巷鸿彰匹头店东，商团稽查长）等，善后委员会伍平一，商业维持会李朗如、梁培基、区述之、区叔权等，均于是日开会调停。推举李朗如、梁培基暨两区为代表到省署谒见政务厅长陈树人，报告调停情况。20日总商会、善后委员会、商业维持会复开会调停，举出代表请发还扣械。当会议时梁朗秋（老雅多、多福仪仗店司理，邓介石好友）发言，谓政府现在通缉团长，而商团则挽留团长；政府暂行制止联防，而商人则积极进行，似乎于手续冲突。不若由我们另举一有名誉之人任团长，然后由政府解决，双方始不发生枝节。某商人驳云：今日所议者为维持地方治安及商团枪械问题，不能混入联防之事。多人附和，并齐声喝打梁朗秋，秩序大乱，极力制止始宁息。

扣械风潮演变至是，政府尚无膺惩商团意思，只采用制止联

防、通缉陈廉伯等温和方式，使商人便于备价领枪。盖明知对抗政府策划，系由二陈把持所致，非全体团员主张，故仍欲宽大处理，免弄成僵局。虽当时军政要人如廖仲恺、蒋中正都提出按照私运军械法例，全部没收。缘蒋欲分配于学生军，廖亦思发给工农军。而胡汉民力持息事宁人，以免风潮扩大，曾拟订体恤商艰，准其备价领枪；联防改组，须候政府颁布规章，然后成立，但商团必须受政府之指挥监督。并请以向与商团中人有交谊之李福林任市长，便于调解。

孙中山采纳其议，方按步实施。奈主持逆谋之二陈，自以为实力充沛、民众附从，足以压倒政府，丝毫不肯迁就。陈廉伯虽被通缉，不能存身羊石，但陈恭受、陈廉仲仍利用总部名义，发号施令。当各社团调停未获解决之际，陈恭受召集各属商团代表到佛山开秘密会议，由他亲自主持。会议决定21日从佛山及各属实行罢市。并发出传单，定于夏历七月二十二日起，凡属全省商店应一律实行停业（但各县市商团占商店总额少数，故未能响应）。并提出两项要求条件：（一）联防总部自由成立；（二）枪械无条件发还，企图以全省罢市威胁政府，促其屈服。

适中央银行恰告成立，发行新纸币，首创现兑破天荒制度。所有各项赋税，均须缴纳新纸币。纳税人须持现银向中行兑取纸币，故谓之现兑而非兑现。于是，从事“剃刀门楣”（指出入兑换都有收入）讨生活之银号，失却大宗利润，且不能操纵金融，极为不满，陈廉仲乘机唆使“武胆”杜绶英亲身出马，在银业会馆召集全行大会，即席决议全城银业大罢市，拒绝新纸币在市面行使，所有汇兑都窒息不通。以致各行各业均感呆滞。帅府乃下令通缉陈恭受，因其在石湾招集土匪，冒称民团，企图进攻省城也。

直至8月27日穗市各商店仍复停业。于是范石生、廖行超乃出任调停。商团举派邓介石、总教练徐福斋、杜绶英等七人为代表，赴江防司令部会议调解。范廖提出六项条件：（一）陈廉

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然后取消通缉令；（二）范廖担保，军政部发出护照所载之军械数目，完全发还；（三）商团联防改组应受省长节制，七日内公布批准立案，期满如有不完满之点，由范廖出面仲裁，要求立案；（四）各商店一律于29日复业，军队于商店复业后立即解严，其在扣械潮发生后回省军队，一律请帅令各回原防；（五）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缴纳；（六）商团联防改组完毕后，范廖担任全部军械点交商团总所。以上六条经大元帅批准交范廖全权与商团接洽，双方签字，然后发生效力。商妥之后，代表辞出，返总公所，发出函电传单说明本案已完满解决，请商民立予复业。在调停条件中签名者为杜绶英、邓介石、关劲武、黄叔明、邓佩芝、陈兆钧（藤器商人）、郑杏圃。政府方面为范石生、廖行超。罢市期间，李颂韶接受李福林劝告，拟从速复业。他便往港请示二陈，被陈恭受拍案大骂，不敢再说，垂头丧气而返。

在联防总副长就职后，二陈与邓介石同在公所一室办公。邓专理市团业务，二陈则主办联防各事。虽非明显划分权限，实为各做各事。邓介石对他们范围，甚少发言及表示意见，惟已窥破其对抗政府野心和部分计划。曾到粤商公报聊天，无意中甘六持、唐璞园说过，陈廉伯做了联防总长，俨然以督军自居；陈廉仲久掌总商会职务，等如省长。两兄弟包揽商场大权，真可称炙手可热，言下微露不满。迨察觉其俟联络各县乡团运动成熟后，便实行叛变。他从旁揣测，预料其羽毛未丰，基干不强，徒凭外力，依人成事，必无可能。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可断言。倘孤注妄掷，冒险横行，则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况身居副长，当然名列罪魁。乌狗得食，而白狗当灾；白鳝上沙滩，唔死亦周身潺（残），因此焦虑不安，惟苦于无法摆脱。某夜邓径诣甘六持住宅。两人一榻横陈，孤灯相对（甘有烟癖），娓娓长谈，喁喁细语。邓介石坦率披陈，直言不隐，请求指点，愿听应付良策。甘六持谓陈廉伯轻举妄动，以卵击石，焉能济事？纵

使孙中山再次蒙尘，然广东政权，亦必落于军人之手，非操诸范石生，则属于陈炯明，几何轮到持筹握算之商人身上？真可谓痴人说梦矣！老哥位膺联防副长，倘嶠山失利，先轸功成，三帅虽无殒灭之灾，能拜元戎所赐，而刀笔之吏，必载在爰书。纵非替罪羔羊，亦是丧家之狗。即使幸而得逞，也必居仲子胯下；三司要职，大有人在，谅难分杯羹。如不言禄，禄亦弗及，则介石变作介推，人皆笑尔拙矣。现在君之处境，不特如坐针毡，且置诸洪炉之上，危险属甚。若不飘然隐退，虽不致灭门之祸，亦有毁家之虑。时乎不再，曷弗速行自决，趋吉以避凶。邓介石沉思后，喟然曰，无故而去，难以自解，人将疑我变节投降，何面目以见团友亲朋？我欲趁其联络乡团尚未进行之先，自告奋勇，担任此项专责，彼必不见疑。师鬼谷阴符妙术，以连横之策，破合纵之谋，从中运用挑拨离间，拉拢分化方法，使勿为二陈利用，若辈便无所施其技俩，则政府免动干戈，而商场亦获保元气，未审以为何如耳？甘六持赞成其说，谓此釜底抽薪工夫，足以削弱其凶焰。好自为之，毋怠毋忽，及早完成，迟恐有变。邓介石又云，事势虽有可为，金钱却苦难筹措。盖应酬征逐、信使往来、主宾接洽、夫马舟车、居停机构，在在须款，非有二三万金，无从推动施展。甘六持答以君既有诚意，我愿为臂助，当借箸代筹，但成否未敢必耳。邓介石谓姑尽人事，以观其后，成败利钝非吾侪所能预期也。谆嘱而别。

甘六持因是邀邓警亚磋商。邓以策反平乱，亦应尽义务，乃乐为奔走。因胡汉民对此案力主和平，走他路线，或有希望。遂转托邓慕韩往告于胡，他亦认为可行。但帅府经费奇绌，无从挪拨。邓慕韩以弃之甚为可惜，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胡汉民道，我也同此意思。在无办法中，寻求办法，姑着警亚往觅苏群（周之贞字）商量，看他有无可能。即挥函致周之贞，说明有急需，希挪拨2万元交付来使。邓警亚持信往蔚庐（俱乐部）见周之贞（他当时系中央直辖第二师长兼顺德县长）。周说有无款项，

我亦不清楚，当问诸军需。即叫许天民吩咐，着取款2万元交帅府应用。许对以师部饷粮，时感不敷，焉有此巨量现金？如必要上缴，请师长另行设法。周之贞默然。邓警亚问县署方面，能抽草花之数，以应眉急否？周对以县署收入，悉供军饷。邓因两处都已落空，请周设法代筹。答云以苏群名义，向亲朋挪借，极量不过三几千元，断难如额。倘不嫌数少，必尽力张罗。能否节约干办，你可自行酌夺。邓料僧多粥少，未饱枯肠，杯水车薪，难浇烈火，数米为炊，空心设肆，必无成果，遂对以容俟考虑，再行就商。乃乘兴而来，扫兴而返。此项分化商团设计，便胎死腹中。邓介石因缺乏支援，不能抑制主动派的煽动，眼看其铸成大错，诚非出于本愿也。

商团首次举行罢市和抵制中央纸币之际，大元帅赫然大怒，檄调部分粤军回防，入驻市内，用资镇压。而商团经已在西关通向太平、丰宁马路一带街口，设置木闸或铁栅以备顽抗。英领事杰尔逊，见双方对峙形势紧张，特为商团声援，施展恫吓花招，致牒帅府，谓如军队向商团攻击，英国驻白鹅潭之战舰，即施以炮轰。并装腔作势，飭各舰脱卸炮衣，指向陆上。孙中山接阅来文，镇静如常，毫不动摇，飭外交部严词驳复，并致电英伦内阁表示抗议。谓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私运军械，图谋不轨。我政府处理叛逆，平定暴乱，自有权衡，毋庸外人干涉。在我平乱之际，英舰如敢轻举妄动，必坚决予以回击，后果应由英方负责。因此，杰尔逊之诡计，遂不得逞。

范廖二人，冀图运用两面手法，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出而作缓冲之举。及协议成立，商店复业，范石生持调解条约，亲谒大元帅，请求批准，交其全权办理。中山以陈廉伯、陈恭受串连英领事陈逆，蓄谋叛变，岂能容忍。若发还枪械，更如虎添翼，助长凶焰，益难收拾。乃对范详细解释，以陈廉伯私运军械，经查有证据，按其所领护照面额，超出逾倍，显系别有用心。陈恭受到处煽动，助纣为虐，故将其通缉。若徒事姑息优容，则纪纲坠

废，政府威信何存？你份属军人，当服从政府功令，不可附和其无理要求。范慑于中山严肃态度、坚决主张，不敢多辩，唯唯而退。

滇军之调停既失效，二陈在港向陈军机关催促其从速发动进攻。陈军方面但索取军费 50 万，然后开拔。盖已探知其与英领事、滇军互相勾结，若无代价便兴师动众，纵侥幸取得胜利，但长途跋涉，须费时日，又与敌人在外线作战，即兵抵郊区，而滇军已捷足先登，入关者王，后至为宾，徒耗实力，与他人作嫁衣，何自苦乃尔？不若袖手旁观，坐在城头看虎斗，较为合算。因陈廉伯未能应其需求，遂寂然按兵不动。

陈廉伯、杜绶英见英舰已露炮示威，撑腰呼应，即决定 10 月 10 日再行罢市，并重提佛山会议决定之三项条件。乃派遣团军四出巡逻，声势更比前次汹涌，且先期促邓介石赴港会商对策，实则防其发生异议，阻碍停业也。届时全市商店开门营业者，实占多数。总部立即出动团军，威胁各肆闭门停业。复增调大量队伍，在长堤西濠口一带，实行戒严。并四出出动，沿街站岗扼守，如临大敌。适各界集会庆祝双十节，并结队游行，途经永汉南，由天字码头转入长堤时，团军哨岗，不准通过。群众以其蛮横无理，不服制止，遂起冲突。商团兽性勃发，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徒手群众数十人，有一工团军死后且被割去生殖器。翌晨联防总部发出布告，称现派商团军梭巡，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定予痛剿。其狂妄野心，暴露无遗。

大元帅认为猖狂若此，非用武力不能镇压乱萌，指定粤军担任主力进攻。许崇智遂偕朱培德、廖仲恺往见范石生，说明政府不能不解决商团理由，并将所定作战计划告知，请其与廖行超所部恪守中立。范表示赞同。因商团已陷于包围网内，无可挽救，故态度突然转变，坐视其崩溃，不敢加以袒庇。旋再至滇军总部与杨希闵共商作战最后决定。大元帅乃授全权与总参议胡汉民指挥剿灭商团任务，所有中央部队均归其节制。14 日胡先颁布明

令解散商团，15日下总攻击命令。划定太平桥以北至丰宁、盘福路，由莫雄旅部进攻。太平桥之南及西堤二马路等处，属李福林之福军进攻。其他部队则分布各要隘。先是杜绶英发动西关各大行店出资，派人到顺德雇佣打手300名，替充团军。14夜政府部队集结于太平、丰宁、西堤二马路各地，封锁西关各街口，准备进攻。雇佣军急分据街内当铺、高大洋房及扼守各闸口险要地点，负隅顽抗。拂晓时，先开枪向马路扫射。军队即鸣号冲锋猛攻。惟栅闸牢固，且团军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形，而军队全无掩蔽，所以屡攻不下，颇有伤亡。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不得已用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团军据点遂尽丧失，退守街内，巷战移时，全线崩溃。除当场缴械之外，大部败军向西村方面溃退。途经范、廖防地，以为可以安全通过，不料滇军出动队伍，把守各路口，截缴枪械、搜刮财物后，始克放行。故范、廖所得枪支，多于进攻部队收缴之数量，可谓不劳而获，安坐以占尽便宜。历时十余载之商团，遂灭亡于二陈之手，一蹶而不复振。

商团之丧钟既响，而廉伯之野心未泯，犹冀死灰仍可再燃，且有吞没枪价之余资，足供其作孽之挥洒。于是分头运动，使者络绎于途，邓介石、关楚璞两人为代表，先往北京求谒段执政。因冯玉祥、张作霖皆与孙中山有联络，段亦然，故弗接见。不得已又思其次，乃往访过时之龙济光。龙以为财神临门，盼有所得，乃殷勤相款，优礼有加。寒暄既毕，邓介石道达来意。龙谓云南猛将如李嘉品、纳顺洪辈，多在身边，随时可供驱策。广东昔日队伍想至琼崖者，若颜启汉等，其部曲现散处家乡，都可召集成军。他们韬养多时，髀肉复生，老骥伏枥，仍志在千里，倘重着征袍，荷戈上阵，必然锐不可当。商团如欲报仇雪耻，正好利用此种人才。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万军俱能准备，只欠东风而已。有钱方可使鬼推磨，否则虽则千呼万唤，亦不肯出来干这拼命生涯。关楚璞听罢，因他招牌虽老，惟未见板样，便先讨

价，等如炒友之抛期货，买空卖空，不宜搭手。遂答云：将军威望，粤人印象极深，能起巨大作用，将来总须借重；俟筹有款，再行奉教。旋赴江西与方本仁接洽，到福建会晤臧致平，返南路同邓本殷联系。陈廉伯又亲自与叶举、林虎的代表常相过从。据邓介石透露经过情形，谓各军阀头子，谈及出兵入粤问题，动辄开口要钱。陈买办本是空心老倌，焉能拨出大注现金？所以绝无成就，都是处处碰壁而已。迨吴佩孚东山再起，又思借重其力，夺取广东政权。关、邓仍为专使，奔走于吴之门。但吴佩孚方有事中原，未暇兼顾，只云当俟隙图之。

陈铭枢长粤，始撤销粤团事变通缉案。陈恭受因香岛生活日高，居究不易，遂返南海张槎老家，创立佛社，吸收一般善男信女，敛取其金钱布施，藉饱囊橐。抗战胜利后，陈恭受运动为南海县参议会议长，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因其民愤深重，处以极刑。陈廉伯则于日本投降前夕，举家由港迁徙濠镜，全船炸沉，无一生还。独邓介石返粤之后，伊曾经营一素菜馆于第十甫，鼓吹戒杀持斋。商团联防总部三领袖，只他一人得寿终正寝。

(1966年)

顺德商团见闻

余 照 等

一、顺德商会状况

顺德商会成立于前清光绪三十年，位于东关新路对涌济生善社（即今华侨中学），采用会长、会董制，会长、会董由各大行业之司理担任。其会务是管理各商号申请开业、歇业、债务纠纷、召顶承受，并联络各税捐公司，商榷各行业税捐之增减，领取商业牌照和所谓筹饷事宜。

除上列会务外，还有一项特别而又重要的会务就是巴结官场，凡县令、县长接任或卸任，都有一套迎新送旧仪式。无论接任、卸任的官员一律设宴款待，以表官商感情。又预先通知上海傍街（由果栏桥脚至先锋庙）大街、碧鉴街、细圩、笔街、紫府庙大街、阜南街、县前直街所有各商号一律购买一万头爆竹一串，挂在铺门前，其中大商号更要在铺面中间摆列一张四仙桌，围以绣金线的狮子滚球的红缎台帏，台上陈设酸枝小镜屏一座，点着一炉檀香，清水一碗，黄皮树叶一束，大意表示该县官“清如水，明如镜，香风四溢，廉洁可风”，等待新旧县官接任、卸任，进出衙门时，经过上列各街道，各商号即鸣放那一万头炮竹以表示迎新或送旧。并赠送卸任县官以红缎横一幅，上书“泽及商民”或“萑苻绥靖”或“布施德政”四个大字。上款是某某县知事、县长德政，下款是顺德商会同寅鞠躬。然后会长、会董送他们下船。

二、顺城商团建立之原因

民国9年（公元1920年）商会仍是会长、会董制，会长潘

景文（其父潘玉璇曾任浙江省某县知县告老归家，广置田亩，景文继承父业，并在碧鉴街开设汇安银号、迎香茶楼），会董计有余桂卿（怡泰油店司理）、龙仲举（积隆咸蛋腊味店股东）、梁河石（九章绸缎店司理）、程继宗（合兴海味店司理）、黄子芬（遂源炭店兼代理亚细亚火油公司司理）、曾寿如（碧鉴街广经绸缎店司理）、梁照南（大纶绸缎店司理）、刘晓堂（良合油店司理）、梁采山（升平街良兴银号司理）、林配乾（汇安银号司理）、罗侶琴（江盛鱼栏司理）、辛勉旋（永和当铺司理）、刘瑞楷（华安绸缎司理）、罗机南（慎言银号司理）、陈聪（谦信糠米豆酒麸批发店司理）等 32 人。又聘请陈鲁玖（其胞兄陈官韶在前清时曾任某省知县）为文案。其时各派军阀争夺地盘，不断以师旅之众进驻顺城。而县知事、县长一年数易，更换无常。盗贼蜂起，堂口多如牛毛；掳人勒赎，收行水兼打单，江河不靖，轮船被劫。人有被掳之忧，货有洗劫之虑；各行商号咸怀戒心，夜寝难安。为此，商会同人乃共同商议将碧鉴街、果栏街、上海傍街、杉街（即下海傍街）、伏波街各商号组织起来，成立城南五坊商团。至于枪支弹药则由参加之商店自筹。指定各备白银 30 元购买九响长枪一支、子弹一百发，并出一人为团员，多数是店东、司理或“太子爷”（店东之子）、“黄马褂”（店东之亲属）充当。又将原来碧鉴街之七名街勇，上海傍街五名街勇（清末时称安勇，辛亥后改名街勇，是雇佣性质，日夜巡逻街道者）之枪支、人员都列入商团名册，以保卫该处商号安全。

当时有 60 间大、中店铺商号同意，即席盖章，由商会造就名册呈报县公署，得到当任县长王光廷批准。而王光廷之所以批准建立商团，有一段顺城绅士、政客争夺势力的内幕。王光廷本系顺城同盟会的成员，他当上县长，总感到自己的力量孤单，每事都受到大绅的束缚，为了发展自己力量就利用商团组织，作为外围的帮助，故此很顺利地批准商团成立。于是由商会通知各店铺商号即备银两领取枪支弹药。“城南五坊商团公所”于民国 9

年9月正式成立，所址设在上海傍街永昌栈右边巷口某屋（该屋原来是五坊商店街坊商议事情之地点），用白纸写着“城南五坊商团公所”贴于门前。又设四间分所于泰山庙、天妃庙、伏波庙、先锋庙。

城南五坊商团公所及分所的负责人分别是：城南五坊商团公所余桂卿、黄子芬；泰山庙分所龙仲举；天妃庙分所余桂卿；伏波庙分所辛勉旋；先锋庙分所黄子芬。

三、五坊商团扩大范围

民国11年（即公元1922年），由于冬防吃紧，商会会长、会董等商议将原日城南五坊商团扩展至迎恩市（即细圩）笔街、紫府庙大街、阜南街、县前街、东门头（即东胜街）、北门头（即永安街）。得到当任县长冯葆熙（本县古楼堡人，拥有田亩甚多，是前清绅士，由周之贞委他为县长，再用四大绅士、顺城总局、商会等名义呈报陈炯明正式委任）批准。于是一般较大的行业，如米粮、栏口、京果海味、金银业、麦油、布疋、按押、杉炭、酱园先行参加。另外有丝厂13间，大爆竹店、大竹篾店都陆续加入。如前一样各备白银30元购买枪支弹药，并出一人当团员，小店无力购枪者则只出人（此是极少数）。至于原来丝厂自卫之枪支及人员，扫数归商团统一调配使用，将城南五坊商团公所改名为顺城商团总所，下设八个分团驻所。

总所及各分团驻所的所址和负责人如下：

总所地址：新路商会左邻。正团长：罗邦翊（绅士）。副团长：岑质卿（顺安旅馆司理）、黄伯仁（生生影相店店主）、龙侠朗（积隆腊味咸蛋店司理）、余桂卿（怡泰油店司理）、龙学龄（碧鉴街某银号司理）、冯鹤龄（广州市茂丰批发油店店主）。

第一分团驻所：地址在天妃庙。所属地方范围：由先锋庙九眼桥脚三益猪肉店起经天妃庙（简名大圩）直至十二亩（即今之

同福米机)止。分团长冯信何,副团长梁海波。

第二分团驻所:地址在碧鉴街泰山庙。所属地方范围:碧鉴街、果栏街(今之果栏路)。分团长龙仲举,副团长忘其姓名。

第三分团驻所:地址在大信米机。所属地方范围:是由先锋庙、上海傍街、果栏桥至顺安旅馆,直至十八间止(包括大良米机、顺威隆米机、大信米机、十八间之丝厂在内)。分团长程继宗(合兴海味店),副团长刘日楷(大华染布店)。

第四分团驻地:地址在伏波街(即布街伏波庙)。所属地方范围:由德聚大油器店(即今大良毛巾厂)伏波街至三眼桥脚止。分团长梁朴庵,副团长黎渭田。

第五分团驻所:地址在笔街某屋(即今之法院)。所属地方范围:由迎恩桥即迎恩市又名细圩至笔街紫府庙,大街、阜南街、南门城楼上,分团长曾某宝(均安和当铺),副团长梁镛朝。

第六分团驻所:地址在大生洋货店。所属地方范围:县前直街、县东街至东门城楼上,又由县西街、文秀桥街直至北门城楼上(包括元吉当铺、艺华织造毛巾厂)。分团长廖心石(艺华毛巾厂),副团长陈星桥。

第七分团驻所:地址在北关北帝庙(俗名真庆宫)。所属地方范围:永安市(简称北门头)、岗头庙市、锦岩庙市。分团长冯仁甫(厚源长生店),副团长罗福坤(罗邦翊之胞侄)。

第八分团驻所:地址在东关上街庙。所属地方范围:东胜街(又名东门头)至花基云路庙止(包括粤和当铺、云路庙之丝厂)。分团长吴仁生(粤和当铺店东)。

顺城商业资本家都聚在南关一带地方。龙葵湖即系顺城总局正绅,又系南关龙姓大绅士,自然在顺城商场具有支配的力量。商团扩大组织就由其亲信岑质卿出来主持,可是因岑的声望未足,号召力量未够,因此找到北关前清绅士罗邦翊(即罗仰寰,前清广西省举人),通过商会选举,以罗为正团长,岑质卿为副团长,增大声势。商团经费来源是靠“一益会”的收入,所谓

“一益会”是由各商店每日拿出白银二毫做会金，每日开会一次，以出利息高者得，将此利息作为商团经费。

商团的任务，再扩大组织之前，是专为保护商场秩序而设，系一种自卫性质。自从扩大组织后，则负有协助当地政府维持地方秩序和治安之责。如遇政府有所谓出差剿匪时，即派出团员防守各要隘路口，维持顺城的治安，由此商团继续参与政治活动。

商团的头面人物，以岑质卿、龙侠朗、黄伯仁为最活跃，举凡对外交际，都是他三人专任。岑质卿结识了一个在广州珠玑巷口开设广源银号的胡沛云（别字永腾，混名一哥腾，是桂洲商团的负责人），凭其关系经常找广州商团的头目陈廉伯共同研究商团工作。

当时各商号向县署购买枪支，但是只能供应得一部分，其余准许商人自找经纪购买，然后由县署发给正式枪照。各商号之枪支大部分由香港转运而来，枪的种类已经不单是“九响”，还有曲尺、驳壳、左轮等等，可谓阵容充实，人强马壮，从此顺德县的商人得以武装力量参加政治。

四、顺城商团改为商团军

民国 12 年（公元 1923 年）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入粤后，广州秩序骚乱，市面上常有军人强买、强卖、强借等事发生，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乃呈准孙中山先生成立了商团军，以维护商场。举陈廉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恭受分任正副团长。并直接领导各县市的商团。

同年 9 月我县继广州之后将顺城商团改为商团军，顺城商团总所改名为顺城商团总部，下设八个分部。当时罗邦翊在商团里究竟势力孤单，被岑质卿、龙侠朗、黄伯仁三个结连龙葵湖把他挤掉。结果举出岑质卿为正团长，龙侠朗、黄伯仁、余桂卿为副团长。又聘请胡织垣（据说军校毕业生）、何国南（基督教徒）

为正教练，郑剑郎（南关小学教员）、罗福坤（罗邦翊之侄）、陈少卿（基督教徒）为副教练。郑全门当文书，总庶务梁河石（碧鉴街九章布匹店少东）。总团部设在隔冈三庙公所，体操场有二，一在隔岗观音景，一在花基龙氏大宗祠，总团部雇用警卫人员朱老四、陈临等五六人。分部的地址和人选如前不变，当时约有商团军 300 余人。

顺德县共有十个地方行政区，除第一区属大良城，第四、九区没有组织商团外，其余各区乡镇多有商团及商团军，现将各区列举如下：

第二区鸡洲乡有鸡洲商会，也有商团。伦教镇也有商团。

第三区陈村镇（当时是省、佛、陈、龙四大镇之一）有陈村新圩商会，也有商团。陈村旧圩商会也有商团。

第五区乐从圩有商团。水藤乡商会也有商团。

第六区勒流乡商会有商团。黄连乡商会也有商团。

第七区龙江镇商会有商团。甘竹滩商会也有商团。

第八区杏坛圩商会有商团。龙潭圩有龙潭商会，也有商团。

第十区容奇圩有容奇商会，也有商团。桂洲乡有商会，也有商团。

顺德县各地区都普遍设立商团的原因是：顺德商业相当发达，尤其蚕丝与银业，同省、港关系密切；广州、顺德既扩大商团军组织，各地区自然随之而兴。及到商团军因叛变被镇压后，顺德县商团的军械、武装全属李福林所获，此是后话。

顺城商团军自从正式成立后，即行加紧训练，每日早晨 6 点钟至 8 点钟上操，晚上初更至三更三点又上夜操。操场上点着大光灯如同白日。并日夜轮值警卫。在操练和警卫时，每个团军都穿上黄斜制服，扎脚绑，戴军帽，束风纪带，俨然一个正规军人。团长们更挂上东洋刀，威风凛凛，尤其是岑质卿，个人花了一百多元买一匹大马，经常在街道驰骋，居然八面威风，不可一世。防务工作比前更严密，除值班警卫外，并设置“天桥”，由

碧鉴街、迎恩桥涌、果栏街、果栏桥起至先锋庙（即上海傍街），九眼桥至天妃庙（即大圩）等地方，都在店铺之瓦面上架搭“天桥”。并设更夫每晚打更巡逻。又在隔岗、禽琶岗、笔街岗上设置更楼。如发生盗警以鸣锣为号，火警以打鼓为号，无论鸣锣或打鼓都规定一声长一声短为东，一声长两声短为南，一声长三声短为西，一声长四声短为北。另有灯号和旗号，遇有什么布防工作，即与县署联系，晚间防卫戒严口令也由县署颁发。

商团军的武器随着商团组织扩大而增多，并且逐渐精锐犀利。如：左轮手枪、驳壳枪、七九步枪，甚而手提机关枪都有三四挺。

岑质卿、龙侠朗、黄伯仁三个团长经常与省商团联系，省团又频频派胡沛云到顺指示机宜。由于机构庞大，人员增加，添置武器，加强防务等等，以“一益会”的收入不足开支，于是规定每日每家商号出资白银六毫，中等的出四毫，小店出二毫。不管你生意如何，都一样要按时缴交，不得拖延。所以一般小商店被迫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各商号派出的商团军人员，多数是股东、司理或“太子爷”（店东之子）、黄马褂（股东的亲戚）等青年、少年、中年、老年式式具备。他们平时生活散漫，特别在操练的时间，司令员叫同一个动作，而他们缓急先后，样样都有，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是“老少咸集”，更有称之为“公孙班”者，笑话百出。

由于这些问题，老的少的各成派别，意见诸多；老者采取消极放弃态度。结果各商号改派少东和少壮之司理或年轻的店员（当然是黄马褂）充当。自从老团军退出后，商团军的成员完全是“清一色”的少壮派，绝大部分是轻佻浮躁，嫖、赌、饮、荡事事皆能。每当华灯初上，即咸集于桥珠、迎香茶楼。头面人物则经常与胡沛云联系，他们聚集于顺安旅馆等候上操，罢操后即回旅馆聚集，呼雉喝卢，逐酒征歌，几无虚夕，拍麻雀牌，打大番么骰，玩啤牌，放紫洞艇等，视为生活课程。又经常玩弄手

枪，失枪虚惊，无日或歇。总部及各分部的负责人亦均如是，因此不少商团人员染上恶疾，经济方面亦临困境；有甚至因而破产者。即如刘瑞楷之华安绸缎店要召顶亦在此时。所以当时有人说“商团里面五淫齐”，即嫖、赌、饮、吹、枪之所谓也。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10月间广州商团军的领导人陈廉伯、陈恭受等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用广东省商团军总部名义发出宣言“请孙下野”，企图成立广东商人政府。进行这反叛革命行为，事前曾派胡沛云（即一哥腾）到顺德联络，指示机宜，作好准备工作，以便到时响应，并指定派出队伍参加作战。于是岑质卿、龙侠朗、黄伯仁等以保护商场为名，迫令各商号集资白银二万元，交龙侠朗往广州商团总部购买军械（军械来源由陈伯廉暗与英商订购，当时顺德商人多数不悉内情）。后来军械运抵广州被政府截获，各商号受了很大损失。龙侠朗以“无面见江东”逃往香港汇隆银号。

陈廉伯等率领广州商团军叛变，孙中山先生调广州工会工团及军队，镇压商团叛变。陈廉伯等见事不济，在沙面逃亡往香港。

顺德商团得知此讯，岑质卿即畏罪逃亡，其余各分团的主干如黄伯仁（生生影相馆店东）、余桂卿（怡泰油铺司理）、龙学龄（碧鉴街金银业）、胡织垣（据说是军校毕业生）、何国南（基督教徒）、郑剑郎（南关小学教员）郑金门、梁河石（碧鉴街九章布匹店）、冯信河（成昌泰窰网店）、梁海波（全盛砖瓦店）、龙仲举（积隆腊味咸蛋店）、刘日楷（六华染布店）、梁朴庵、卢信田、黎渭田（纸料店）、曾锡宝（均和押）、梁镠朝、廖心石（艺华毛巾厂）、张显桥（大生洋货店）、冯仁甫（厚源长生店）、罗福坤（罗仰寰侄）、吴仁生（粤和押）、黄子芬（遂源炭店）、刘瑞楷（华安绸缎店）、冯鹤龄（从广州回家）、龙荫荪（迎香茶楼）、罗叔平（洞天酒楼）、曾寿如（经章绸店）、梁照南（大纶绸缎店）、刘晓堂（良合油店）、梁采山（良兴银号）、林配乾

(汇安银号)、陈俊林(洪源酒米店)、罗侣琴(江盛鱼栏)、罗琴五(联昌饼店)、辛勉旋(永和押)、李仁甫(仁隆京果店)、曾勉南(永和篦店)、何善卿(彬源竹器店)、罗机南(慎言银号)、陈聪(谦信糠米店)、罗桐楷(牙科医生)、苏浣竹、罗仲卓等,见事不妙,慌忙失措,胆怯心惊,隐在家里,销声匿迹。

当此之时,李福林又奉孙中山先生命接收各县商团军的军械。顺城商团军的副团长黄伯仁逃避在罗邦翊或龙葵湖之家里,他见到岑质卿、龙侠朗等商团军的主要人物都逃亡的逃亡,隐匿的隐匿。他一方面是以商人身份在商团里有一定地位;另一方面同顺城龙、罗两姓大绅亦有瓜葛。于是乘时进行拉拢活动,奔走于北关大绅罗邦翊之门,企图造就个人地位,而且能够维护商团军崩败后的局面。乃运用金钱手段贿赂当任县长邓雄(原是福军的参谋),直接疏通到李福林撤销了顺城商团军头目的通缉令。通过官绅合作,多方奔走笼络,遂告成功。于是由县长邓雄指令商会,通知各商号将枪械汇集商会听候接收。于10月底把顺城商团改编为“大良市民团”,以罗邦翊为该民团团团长,黄伯仁为副团长,归顺德县保卫民团总局直辖指挥。至于各区、乡、镇商团,均照顺城一样收编,而该总局长吴近也是李福林所属人员。这个亦贼亦官的李福林坐收渔人之利,扩大他的武装势力。而顺城商团军也曾威武过一时,亦从此结局。

(1965年)

容桂商团始末

梁 永

一、容桂商团成立的背景

容桂就是顺德县属容奇、桂洲两地的简称，在解放前该两地与对河的马岗乡合为顺德县的第十区，人口合计五六万人左右，其中容奇圩头位于西江支流，河面宽阔，港汊四达，为西江下游一大镇，20世纪20年代顺德丝业全盛时期，是丝茧的散集中心。由于丝业带动，钱银业及其他商业也极一时之盛。桂洲虽然没有成为码头，但因人口密度高于容奇，而又与容奇毗连，故商业亦极一时之盛，只稍逊于容奇而已。

1920年，容桂工商界仿照广州方式，设立商团。在1924年商团事变中，容桂商团亦有所活动。笔者是当地人，幼年在乡里读书，以及见商团组织，特别是后来充任桂洲商团团长的胡沛云，是笔者的世伯辈行，所以笔者对其中内情，和一些主要人物参加叛变活动等，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当时笔者不过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在15岁时，就放下书本跑到广州来找生活，因此对商团后期到失败的一段活动，知之较少。幸而胡沛云的长子胡拔和他的侄儿胡梦觉先生，现在还尚健在。他们都比笔者年龄长，又是商团团长胡沛云的亲属，他们的忆述补充了笔者的不逮。这是应该向两位致谢的。

1920年以后几年，广东局势动荡，顺德自然不能例外。容桂商团就在这种局势下组织起来的，初时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到了1924年孙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的辅导

下，工农政策得到贯彻实施，革命策源地的工运农运，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直接冲击了商界的利益，一部分商人开始对革命政府的政策措施，采取敌视态度。笔者回忆在青年当店员时代，听到老板们不少痛诋孙先生，认为他是“共产”，对于“共产”，他们似乎抱有不共戴天之仇，同时也谈虎色变。中小城镇的商人，其中不少是兼有地主身份，当时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大闹减租减息，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口号，这更触动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又怎能对革命政府抱有好感呢？在他们胸怀不满之际，有些野心家如陈廉伯之流就认为有机可乘，推波助澜，妄图利用商团，来实现他们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迷梦，终于出现了1924年10月的商团叛乱事件。而容桂商团，也充当了这个事件的帮凶。

二、主要人物

1. 胡沛云，广州十三行天祥、华商、兆利和第十甫广源、同源银号，十七甫两间金铺等七家金银业商号的老板，而主要是第十甫的广源、同源两家银号，自己充当司理，其余不过占有一些股份的外股东而已。广源和同源两家银号所在的第十甫，当时是广州商团第六分团的辖区。胡虽然不是团总（团总是梁作庸和黎寿如，梁是沙面西桥脚元亨办馆的少老板，黎寿如是第十甫永安金饰店的老板），但却是该团的评议长，有左右该团的潜力；又是总团的评议员，凭总团评议员的身份，与陈廉伯搭上了关系。胡拥有七家金银业商店，俨然以商界巨子的身份出现于广州商界。胡又好出风头，远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粤商维持公安会上，已担任了稽察课和庶务课两项职务。胡又是顺德桂洲外村乡人，受陈廉伯的主使，把容桂商团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上。因此，胡虽然在自己原籍没有什么商号，但以广州商团评议员的身份，充当了桂洲商团的正团长，进一步把容奇商团也归纳在自己指挥之下，更与香山大黄圃的商团头子吴某（译名“高老松”）、

杜祝三等勾结。广州商团的叛乱仅一两天即为革命军队荡平，胡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只得只身逃亡香港三四年，直到事过情迁，才敢潜回广州市。

胡为人颇狂妄，任桂洲商团团长时，花数百元擅制一套北洋政府时代的陆军将官大礼服，制后及穿着起来，端坐家堂，令子女儿媳向其罗拜，用以自娱。又其女出阁上花轿时胡乘马戎装佩剑，在马上赐酒三杯为其女饯别，然后让其上轿，用以向坊邻炫耀。又每次从广州回乡时，特制一大旗插于渡船之头，上有白字一行为“桂洲商团团长”，中间斗大一个“胡”字。船泊容奇码头，必预先通知容桂商团派出一二十个全副武装团员在码头站队欢迎，候胡登岸时检阅。随即乘容桂商团自置的小汽船名“容桂商团巡河舰”驶回桂洲外村老家。即此数端，已可窥见胡的嚣张骄横。

2. 梁镜台，容奇某丝厂的老板，亦是容奇人，平时好出风头，容奇商团成立初期，即出任正团长，自从胡沛云出任桂洲商团团长以后，一方面与胡臭味相投，另一方面则震于胡的财雄势大，遂与胡深相结纳，沆瀣一气，成为胡手下的得力健将。到后期胡抱有政治野心，参加广州商团陈廉伯的叛变，阴谋策划外围暴动，此时梁已受胡的影响甚深，与胡朋比为奸，一切行动，都唯胡的马首是瞻。广州商团失败，容桂商团亦随之而解体，胡逃香港，梁亦销声匿迹、远走他乡来躲避政府的追捕。

3. 李均干，台山人，是当时桂洲麦地基忠信和丝厂的老板，也好出风头，因业务关系寄寓桂洲，与梁镜台是同业。当桂洲商团成立之时，被推为副团长。胡沛云出任正团长以后，以同事关系，与胡过从甚密，受胡的影响也深。梁镜台对他也有一定影响。胡沛云不常在桂洲，往广州时，一切团务都交李执掌，成为胡手下第二员健将。

4. 岑伯衡，桂洲里村人，桂洲路心细市某猪肉店的老板，

桂洲商团成立时，也被举为副团长。岑为人有勇无谋，胡沛云对他只作驱使，信任程度，远不及李均干。岑亦自知小行小店，比不上胡、梁、李诸人，故在团内不敢争权揽势，只有唯唯诺诺，亦步亦趋而已。容桂商团失败后，他没有离开故乡，仍旧当其屠夫生涯，政府亦知其不是当权派，没有找他的麻烦。

5. 潘奕林，桂洲里村人，细市怡龙银号司理。潘为人胆小怕事，与胡作风不同。桂洲商团在筹备时期，商人推他为临时团长，潘以业务所关，不能不出任。到正式成立时，胡沛云插手其间，潘亦乐得接替有人，洁身引退。以后商团之事，他决绝少闻问，故容桂商团失败，他倒没受了什么牵连。

以上有关容桂商团的主要人物，除潘奕林一人外，其他都是由头至尾的首要分子。

三、从筹备、成立、发展到失败

容奇和桂洲地相接壤，而两地都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唇齿相依之势，久已形成。商团成立，开始于容奇，为了互相呼应，在容奇商会的影响和推动下，接着桂洲也着手筹备，而更主要的影响，则是广州商团。广州商团成立已有十年，组织形式，逐渐巩固，武装实力，亦逐步充实，于讨龙、逐陆等军事变动中，发挥了一定保护地方的作用。加上一部分在广州商界的容桂人士，在广州商团担任要职，如胡沛云之类；更因容桂是蚕茧的散集地，也是生丝出产的大镇，丝蚕业与钱银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容桂丝蚕商人与广州银钱业同乡接触频繁，他们在业务之余，自不免谈一下时局，谈一下自卫。而当时军阀的部队，都忙于争夺地盘，对保护地方、绥靖盗匪，只不过挂上一个空名，舆论方面，也大唱“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容桂商团也就在这个时期（1920年）着手筹备起来。容奇方面，自然是梁镜台领衔负责，桂洲则由潘奕林筹备，容奇团部设在杉街容桂公所，桂洲

团部，则设于桂山书院。着手筹备以后，即开始征求会员。会员资格，则以店户、丝厂、茧栈为单位，大约每店户可以报一至三个团员，因为当时丝厂、当铺、银号等，业务较大，人员较多，枪械亦较为充足，自然要多报一两个人来充实自卫力量。容奇方面记得的有一分团设于上街市，因容奇地形狭长，呼应不易，自圩头至北镇长屏、乐莘，以至上街市、莘头市、塘头市等地，均有商户，而丝厂也分设上列地址，如北镇、长屏之成栈，乐莘之同安泰（后改粤经）、东亚和，坝头市之协之才、颂维亨，塘头市之永昌成等丝厂。全镇可说由头至尾，均有商店工厂，故设分团部在上街市云里庙，以便就近易于照应也。

经过半年左右的筹备，两地商团，先后正式成立，以容奇成立较早一些。桂洲商团成立之日笔者尚在乡读书，当日亦有到团部门前看热闹，门前升起就职红榜，门口交叉高挂五色旗，中门大开，团长副团长大小队长均戎装佩剑。容奇商团亦由梁镜台等全副武装，率领团员，列队往贺，两镇团员合计约二三百人，就在桂洲团部门前，拍照作为纪念，当时俨然一新官上任和新机关成立仪式。商人而用此排场，确是一件怪事。

当时商团枪械，全是自备，丝厂、银号、当铺等，平日都有自卫枪支，自然不会有什么困难，其他商店，则需购买。幸而当时军阀混战，失败的一方，不少失去联络的士兵，不能归队，他们便将枪械出售，得回一些盘缠，脱去军服，各自逃生。因此，这些枪械，流落民间不少，为商团提供了军械来源。

容桂商团成立后两三年，就遇上日本大地震，这场地震，对日本的损害极大，日本的工厂，陷入于半瘫痪状态，一向执世界丝业牛耳的丝厂，大部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两年间，广东生丝在世界市场失去了一个劲敌，隐然独占市场。洋商定单，雪片飞来，原有丝厂，供不应求，于是容桂各地大小丝厂，纷纷设立。由于丝业带动，容桂的其它各行商业，亦出现欣欣向荣之

状，商店和工厂大量增加，为容桂商团发展提供良好基础，于是容桂商团由二三百人逐渐扩大到千人左右。这是容桂商团的发展期。

容桂商团的实力一天天增大，胡沛云、梁镜台等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大，除了容桂商团的上千武装部队紧紧握在自己手上，作为政治资本外，更谋进一步把外围的商团，吸收在自己手上。首先就向邻近的香山大黄圃方面着手，大黄圃的商团头子梁某（混名“高佬松”）、杜祝三等，和胡等也是素识。大黄圃是以前香山县的九区区府所在地，辖下沙田万顷，是这个区的政治中心。该镇商业相当繁盛，除了没有丝厂和银号以外，其余应有尽有，商团也有三二百人。大黄圃毗邻大沙田区，当时沙田地区是强徒出没之所，“高佬松”等正苦于势力单薄，恰巧胡等向其游说，与容桂商团成立三角联盟，好买卖送上门来，安有不满口答应之理。从此胡等势力，又外向跨出了一步。胡等这次力量向外扩张，一面是想加强自己的声势，另一方面是在陈廉伯面前，炫耀自己的手法，使陈廉伯信任其在外围活动，确有办法。于是，陈派他到陈村、勒流、九江、江门、西南、肇庆等地，与各地商团头子联络，希望通过胡的活动，把西江沿岸上述地区的商团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外围势力，到起事时作臂助。

胡衔陈廉伯之命，到上述地区，与各商团头子接洽。各地商团以胡是广州总团派来的，不能不假以辞色，骨子里是见机行事，也并不是死心塌地给胡牵着鼻子走。但胡当时迷了心窍，以为此行各地商团负责人都会优礼相待，便算大功告成。回广州后又加油加醋，在陈廉伯跟前自我吹嘘一番。果然陈廉伯认为他是可用之材，到起事前夕，除了要他率领容桂大黄圃商团，出兵响应之外，还暗地里委任他为西江沿岸商团总指挥，令他策动各地商团，一齐动手，来做一个里应外合。

1924年10月，陈廉伯趁孙中山先生抽调了一部分部队和自

己亲赴韶关督师北伐的机会，认为时机即至，公然威胁商人，举行罢市，来进行对抗，奸谋不逞，又将广州商团结集在西关准备暴动，来颠覆革命政府，梦想达到买办资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的迷梦。除广州实行武力夺取政权外，还布置其爪牙事前分往各地策动反动武装来响应，东西北江都有布置。据笔者所忆及，佛山南海以至三水西南方面，由陈恭受负责发动，除上述地区商团外，还有莲华九十六乡民团参加，民团是地主封建势力的反动武装，由于陈恭受是一个大地主，兼了莲华九十六乡民团团团长，可见中小城镇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西江由陈村至肇庆一带，则由胡沛云指挥。其它东北两江的策动人姓名，已记忆不起了。

为什么上述地区的商团，没有什么行动呢？主要原因有下列各点：一、绝大部分商人参加商团的动机，不过是保境自卫，确乎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因为成功了他们也沾不到好处，失败了便身家性命难保。所以绝大部分人和他们的头子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当胡沛云去策动他们时，大多数报之以敷衍态度，坐观成败。二、商团分子多数是少老板或老板的亲戚兄弟，他们平日养尊处优，叫他们去对付一些鼠窃狗偷，倒是声势汹汹，胜任有余；叫他们去疆场效命，出生入死，却是不敢领教。三、当时交通工具，不是掌握在他们手里，各地距离广州，有远有近，但起码也有半日航程；他们不能像军队一样，随意封船运兵。何况，各江险要之区，又有政府的段舰巡泊，插翅也难飞渡。有此种原因，响应广州商团之举，便成画饼了。

胡沛云以策动无效，广州商团又土崩瓦解，形势不妙，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化装间道经石岐赴澳门。蛇无头而不行，容桂商团，便全部解体。

容桂商团因广州商团彻底失败而解体。但实力毫无损失，解体之后，大部分改编为民团，这类以没有政治野心的分子较多。

其余一些野心分子，深惧株连，由梁镜台率领，携械转至江门，改名换姓，投入江门建国粤军第一独立旅李一谔部下，成为正规部队。至此，历时四年的容桂商团，只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而告终。

(1966年2月)

一 些 补 充

前稿写成后，携向胡拔先生和一些同乡旧好就正，承改正一些错写的人名、店名外，还补充了如下数点：

一、胡沛云与陈廉伯的结识和获得陈的信任，除了在粤商维持公安会至广州商团的十多年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内幕。胡沛云有一个兄弟叫胡西平，胡沛云经营的金铺银号，他占有不少股份。此外，渣打银行（英商）买办林绩臣、好时洋行买办徐杰庭开设办房时，缴交给英国人的保证金，也由胡西平代垫。其中好时洋行保证金港币20万元是胡独垫。因此，胡西平派其长子胡梦觉在该行充管仓。渣打银行保证金胡只占10万元，故派他的亲信（侍婢的丈夫，即俗称“荷包女婿”，又曰“鸭姑爷”）梁仕朝在办房当出纳。由于胡沛云是胡西平的亲属，林、徐两买办又依胡西平为靠山，所以胡沛云利用这点关系，向陈廉伯走门路。特别是渣打是汇丰的兄弟行，林、陈各任一行买办，接触更多，向陈进言也比较有力，所以胡沛云就被陈廉伯特垂青眼，许以重任了。

二、据胡拔先生回忆，1914—1915年间，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四出收买笼络。胡沛云曾受袁的一枚三等嘉禾章的奖赠。当时广东都督龙济光，亦赠胡以一枚一等奖章，广州商团主要人物自然不会例外，可惜他当时年少（12—13岁）记忆不来。但有

一事是当时目睹，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商团中主要分子有一晚深夜将广东筹安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埋葬于广州商团岑伯著团长墓中。可见广东筹安会中有商团分子。这项文件，都有他们签名，故埋入岑墓，以图灭迹。此外，在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大元帅职后，叶恭绰被任为财政部长，叶聘胡沛云充当大元帅府财政委员（虚衔）。

（1966年2月补写）

商团事变前后南海县官山商团的动态

陈天杰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变事发前后，陈廉伯家乡南海县西樵官山的商团有不少活动。笔者是当地人，时在官山的大公茧市住宿，并非亲历，但却目击；与关系人石伯雅、梁宝六等都是世交，堂兄陈庆厚就是以大公茧市代表的身份参加商团的。师爷陈仲明、陈彬如、郭玉俦以及外层的大眼明，同为南海西樵简村同乡。世昌纶代表的张祯，与陈廉伯为亲戚，商团事过后，笔者为避匪患而赴越南去，即赖张祯顺途提带，故对于当日事发前后种种情况，知之颇多。惟因时年尚少，虽有见闻，但当年活动情态，尚觉模糊。近得世伯谢松，他是官山的老工，今已70多岁，援引事例，指对说明，特将这些资料，忆述如次。

这里得先一述官山及附近各圩市的一些基本情况：官山是南海西樵一大市镇，有店户1000多家，其中有同和等丝偈（缫丝厂）8家，当押业就成等7家，米机源龙、惠来祥、同泰和、裕盛隆、协同和等5家，金铺谭昆玉、丽生、广生成等4家，茧市有人和、大公、共丰年等3家，大型茶楼有如意居、聚花、金华等五六家，猪栏有公平、广和隆等五六家，此外大杂货店大元、福昌等十多家，著名的西樵大饼店、绸缎店、杉竹栏、果栏、柴栏等十二三家，小本和家庭式的一般商店数百家以上，商业颇盛。更有附近的民乐市，店户有200多家，大岗圩约百家，太平、丹灶、紫洞等13个圩市，各有店户数十家，除圩市外，另有望心乡，虽不是圩场，但乡里只放机店已有24家，还有绸艇、丝艇等，其经营比民乐市还活跃，乡内更有棋盘型的石室30多间，西樵人称之为小长堤，盛状可见。这些圩场、乡村，不啻为

官山的辅翼，陈廉伯在广州当上了商团团长后，对于家乡的商团组织特别培植。陈廉伯虽每年只返乡一次，但石伯雅、陈仲明等经常到广州陈廉伯的大厦议事。

1920年至1922年间，官山及民乐等13个圩的商团，只是略具雏形，至1923年，规模已备，1924年春夏之交，官山和民乐市等的商团，已成立了13个中队，几个大队（共若干大队记不清，只记得官山、民乐、大岗都有一个大队部），官山圩、海口、民乐市、大岗圩、太平圩、沙基圩、丹灶圩、华夏圩、紫洞圩、大岸圩、银河圩、黄岗圩，每圩有一中队，挂的招牌是“粤省商团南海县官山分团某某（圩地名）中队团练部”（各大队和中队长的姓名已记不起）。官山设有分团部，分团长为吉水乡人潘某（名字记不起，只知其弟外号叫“牛精强”，得乃兄之力，在官山电灯局做看机），分团部之外，还有团董若干人，组成一个团董会，是一个商团的规划和施令机构。团董会设在官山圩边的存真仙馆内（这与距官山数里的名胜区云泉仙馆不同，规模很小，只十数名道士居士在此修道）。

陈廉伯在1923年初，有心发展官山商团，于是物色了几个人物，一为石伯雅，乃西樵余村的大地主，活动力颇强，也晓得些官场行规，凭乡绅身份，当上了西樵名胜之区的云泉仙馆主持（1936年后，更充任南海第八区即官山区长），在西樵一带，算已显露头角了。二为何东，别号日初，人们以“日初东”呼之，在官山拥有店屋甚多，有“半边圩”之称，意即他的家财，可占半个官山圩；还在官山经营大型商号十多间。他见到陈廉伯祖父陈启沅开设丝偈而兼营茧市致富，也想效法，便在官山开设永成丝偈和共丰年茧市，又在大岗圩等地，做了或大或小的股份生意不少，如广合烧腊店、福沅当铺等。他究有多少财产，虽未确知，但有一次农历年尾，在大岗圩一带年结水账，把收得白银，满放在广合烧腊店的长肉板上，这块肉板竟被压断。三为大公茧

市的股东梁宝六（杏头人，是地主恶霸，解放后闻已枪毙）。四为大元杂货店的老板陈老祖。此四人是陈廉伯在官山和西樵各圩的主要代理人。次如和利生果店的梁新如、公平猪栏的何流东、金华茶楼的张家汪、福昌杂货店的洗发、德和的刘义，以及民乐市祥记放机店高某（名忘），大岗圩的潘九山、潘精伯，望心乡的谭合兴、谭沅兴等，都罗致在团董会内，或聘为名誉团董之类。这些人都是地方有财势者，陈廉伯既为扩充外地商团力量，后者亦欲借陈廉伯声势，互有需要，因而结合起来。

此外，更有一批师爷，为商团事务策划奔走的，专任省乡联络的有陈彬如（简村同乡学界），常驻官山的有郭玉俦（也是简村同乡学界）、陈仲明（简村同乡，曾任大岸乡长、官山区长）等。

其时南海地方，土匪堂口林立，著匪如“金山珠”、河清潘拱、“歪嘴裕”、“黑骨宁”等，确实为患地方。官山商团原旨系在维持治安，但陈廉伯别有用心，示意石伯雅等不可开罪土匪，更要与土匪合作，而密订两不相犯。陈廉伯说，这是安抚作用，也可“以匪防匪”（这是梁宝六经常在大公公公开讲的，张祯在世昌纶同样讲过）。因此，首以简村匪首“大眼明”、“化学良”、“皇帝真”、“总统贺”，吉水乡的“驼背桥”、“胡须贵”、麦芬，杏头的“老仄”等为扶植对象。陈认为这样做在其家乡固可收团匪合作之益；若有进一步的需要，还能扩充武装力量。其每年回乡，这班人总不离左右护卫。

官山等圩市的商团，经过石伯雅等团董逐步扩展，1924年初，已有400多人，民乐等十三圩及望心乡总数，已达千多人。当时加入商团的商号和人员，大略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因土匪林立，不时抢劫、打单、绑票，官兵无力保护，想生命财产获得安全计，乃决心组织商团，以作自卫。代表者如谭海珊（官山某药店老板，亦为当地的有名中医）、彭重城（在官山各商店中

做了许多家的外股)、陈干六(保平安香店老板)。第二类为富豪巨商,有了商团团董名义,在社会上总算有些名望,特别是一般“太子爷”们穿起军服,佩戴枪剑,威风十足,且因同是商团团员,殷商巨户,接触联络自频,生意机会亦多。这类人的代表是何日初、梁宝六、陈老祖等。第三类是闲散游民,正业做不来,当土匪没有胆,许多商店老板为自卫而参加商团,但要他荷枪出操则视作畏途,看中有这些闲游分子,便雇用来作顶替,而这些闲游分子也乐为之。代表如潘九山、“牛精强”等即是。整个商团,以第三类人占约半数。当时商团枪支种类:六八、七九步枪约180多支,驳壳枪约220多支,弹药服装都充足齐备,并有大炮五六门,聘用李某(名忘,李福林部旅长李群介绍的)为教练,亦有分班轮流担任务。如武装梭巡市面,守望海口和民乐两条主要通道圩口。晚间在当楼上或碉楼(商团成立后,曾在官山圩头尾,分建碉楼二座)警戒,由于其时各地匪徒披猖,官山商团虽与本地股匪有暗通,近匪或不为患,但远匪也许会从鹤山、高明、顺德等地来骚扰。商团为保护本身利益计,亦尽过一些责任的。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驻九江镇的滇军军纪腐败,与当地商团不时冲突,有一次滇军乘西潦为患之际,竟想把桑园围一段掘陷,以作威胁。九江商团派人到官山请助,官山商团曾派出百多人到九江,和滇军激战了数日,保护堤围安全。

又民国10年前后(哪一年记不清)一次饥荒,官山团董利用陈廉伯钓誉心理,请陈出钱举办平糶,陈果答允,于是从广州运回大米一大批,包一电船由商团武装押返官山举办平糶。此举确为贫民做了好事。殊不知大部米包里,都藏着大量烟土,团董们就乘机发了一笔横财。梁宝六说过,烟土售出获利总数,约白银6000多元。

1924年8月,因运械被政府扣留,广州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争执。官山商团表面似甚平常,但团董们则频频开会,尔时主

脑之一财神何日初，因染上了疯疾，不愿多向社团交际，故石伯雅、梁宝六、谭沅卿以及师爷郭玉俦、陈仲明等，不时秘密集议，商量万一商团真的受到政府解散，官山应如何应付，又如何与防军联络得紧等问题。约10月初，曾有一晚上在存真仙馆会议，石伯雅邀集了官山商会会董、商团团董如关伯、谭海珊、洗发等多人，简村世昌纶丝厂也派了张楨出席。在开会时，石云陈廉伯派梁竹朋（是陈亲戚，在西樵设有放机店，店名记不起）从广州回来参加开会，又说近日报纸常常刊登政府责难商团非法运械，但也有舆论支持广东商联合会，据理反驳的。政府摧残商民自卫，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我们纯是安分商民，本来不该卷入争执漩涡，但因地方多故，盗贼披猖，商民倚赖政府保护，既不可靠，组织武力自卫，是天经地义的事。省城商团与我们唇齿相依，我们要确实保护自己财产生命，自宜妥善筹度。望各人本同舟共济之义，尽抒己见。最后又说，梁竹朋正从广州回，陈廉伯有说话托其转告，乃请梁说话。梁说：老总（指陈廉伯）十分关心家乡，尤其商民的自卫，近日政府对商团运械，发生误会，故将商团运回的一批军械扣留。商人现在据理请求，相信总有发还的一日。但因社会上谣言颇多，又有人从中挑拨政府与商民情感，老总恐官山各位不大明白实在情况，故派我带口信回来。老总讲过，伯雅哥办事有主张，有办法，但事是众人的事，希望各人协助伯雅哥，遇有困难，更望衷诚合作等语。表面似甚普通的说话，各人随便东拉西扯，无非都是只求自保、不惹外事之类的意见。世昌纶代表的张楨于散会后，跑回简村时，已11时多了。翌日便对人说，梁竹朋此次回到官山，是带有陈廉伯命令，发动石伯雅和团长潘某等有所动作。盖陈廉伯认为官山等处商团，有过千力量，不算单薄；且官山距佛山不远，佛山已有陈恭受主持，能与广州商团同时动作，官山的商团，如需要时，能与佛山方面，一致行动，必然引起顺德、东莞等市镇商团的响应。梁在

存真仙馆开会时，表面装成平淡，实则未开会已和石伯雅、梁宝六等谈过，石已答允，如广东省团联团总部一有命令到达官山，可即派出商团四中队约 280 人乘电船往佛山，会同陈恭受等一起动作。陈廉伯在广州与李群曾取了联络，官山商团一切行动，李群都不干预。

陈廉伯又与北方取得联络，北方派代表许某（名记不起）10月初便会到广州或到香港。许某到广东是与陈炯明洽商回师广州驱走客军的。东莞石龙祐泰银铺老板黄大（陈廉伯的妹夫）已到广州说，东莞商团团董某（名字忘记）已有准备与广州商团一致行动等语。张祯是陈廉伯亲戚，故梁竹朋曾将秘密消息，略告他知。笔者也在越南亲听到张祯和陈廉伯之堂叔陈位行讲过。

经此之后，官山商团平时每天或三天出操一次的，改为天天出操。每天早上 7 时许，便有佩步枪、驳壳枪制服整齐的商团三四百人，在佩着指挥长剑的分团长们率领下，在官山圩口云瀛书院面前，大公茧市之侧的大空地出操，煞有介事，声势十足，出操后还检查枪支。团董固然常时开会，石伯雅等还在官山圩心的如意居、聚花等茶楼晚饭，深宵才散，都是会谈商团的事。官山协同和米机更购进大量稻谷，碾成米后，运存于存真仙馆、云瀛书院。简村“大眼明”等也集结一批“捞家”（即匪众，西樵一带的捞家约百多人，经常在南海县西与鹤山县接壤的西海劫掠过往商船货艇的）数十人，在简村边的冼氏宗祠开大锅饭（乡村匪伙聚集开饭，习惯称之为“开大锅饭”），结队携枪在简村前后出没。村人知有“大眼明”在，且有“皇帝真”招呼，故不畏惧；但简村父老如陈恩波（笔者伯父）、陈镜之、陈梦锡等以及官山商董谭海珊、洗发、彭重城等，目击这种情形，引为忧虑。陈恩波第三子陈庆厚（迨后，曾到广西陈廉伯的金矿工作），本已加入为商团的，借词往沪经商，不回官山参加出操。但这些人见陈廉伯正狂热于商团经营，亦无如之何，惟有抱着少问众事、免惹

麻烦的态度。洗发更在那时离开官山回简村去。

与此同时（约10月8、9日），官山的七家当铺当楼，堆上不少沙包叠成小堡，圩的头尾碉楼亦同样布置，郭玉俦、陈仲明等，正想利用官山商会名义，印发通告及文书，说明政府扣械无理摧残商民自卫。文中有“政府既批准购械于先，又扣留商民所自置之械于后，出尔反尔，失信失德”，“商民誓死力争，不获发还枪械不止”等语。还有四六骈体，有普通文词。但此项文告，似已印就而来发出（起稿的人是笔者塾师陈梦锡）。

石伯雅更不断派员催收枪费，分次的三三五五约集大商号大股东叙会，每次必说政府的措施不当，大家要服从陈廉伯命令，力争到底等。其时驻官山的防军是李福林部旅长李群所属某团（番号忘记），团长潘枝，名义上有一个营另两个连，还有机枪连。当官山商团日夕操练，煞有介事的七八天中，防军方面像没有什么特别举动。石伯雅、梁宝六有时宴请，团营长们均一样赴席。石仍认为梁竹朋所说陈廉伯在广州已与李福林打通暗盘，并认为驻军潘团暗中会协助官山商团，官山商团定能达到企图。詎知广州商团事变消息传到官山，10月11日驻军突然宣布戒严，所有官山圩出河口、往民乐市等往来通道，都派重兵把守，更又派了一排兵持有轻重机枪登上官山百步石上（官山圩上西樵山的主要通道，名为百步石），居高临下。更通知官山商团团部，在戒严未解除之前，不得集队出操，商团董会亦暂时停开会，必要开会时，事前必要报告批准。同时派出班哨，持枪实弹，整日整夜，在高街官山商团分团团部附近梭巡。云瀛书院集会之地，存真仙馆团董会址，以及商团主要团董居住等地，特别加派兵巡察，监视石等行动。而官山往简村民乐市的必经道路大石压观音庙内，驻哨兵一班。同时又派兵在码头守望。凡广州开到的合记花尾渡、大中小电船（均客船）、丝艇绸艇（专从广州载现款回西樵，又从西樵运生丝纱绸，不载普通客人的货艇），诸多盘问。

就是官山商团所谓有地位的团董，一样受到诘问，连日无不如此。石伯雅、潘某（分团长）、郭玉俦等闻知，深兹忧虑，曾派商会师爷陈仲明往找潘部的某营长（忘名）洽商，但某营长推作不知，只说是奉命办理。石究竟是老奸巨猾，知有蹊跷，旋即（日期记不清）避居往云泉仙馆，梁宝六也睡宿于大公铺尾隔一河的搭棚店内，不仅不提什么“集结商团往佛山”，“不力争不止”等前言，商团事务，也由陈仲明为主持。经过三两天，广州商团已被政府打垮，陈廉伯跑走，石伯雅更不敢露面。防军这时已知只找前团长潘某和陈仲明等交涉，必难解决，乃派人通知石伯雅，限日将全部商团枪支缴出，迫石返官山会同潘某遵令解散官山商团。石被催迫，欲逃往广州，又未明广州真相，只得硬着头皮，返官山偕同潘某办理善后。驻军潘团提出，已奉李群密电，解散官山全部商团，收缴全部枪械弹药，查究团董中暗与陈廉伯勾通实情。石伯雅惊慌失措，表示愿报效一些军费。石为人毕竟老于世故，他想平日和福军所属过从极稔，福军此次虽则表面公事公办，但他要拿人，尽可派兵到云泉仙馆扣留自己，却再三的着分团长潘某催促，在言谈说话中，多少领会到潘团是要“敲竹杠”。破财可以挡灾，乃先用愿报效军费来打动潘团。他果然猜中了。经过磋商，暗里斟数，结果，由石报效军费 8000 元，由潘团向上层呈报，对石等几个团董和团长等概不论处。接着在官山各间商店缴出枪支，又要罚款，每家 200 元（广东双毫），此项办法，潘团对石等表示，是照广州一样办法，还责成石等负责督促各家照缴，后来又经过石等与潘团斟好黑盘之后，罚款是分次缴交，但却没有规定期限，有的拖到半年才缴。至于枪械只收驳壳枪约百支，长枪 120 余支，余则保留，说是拨作办理民团之用。至民国 16 年后，各地民团恢复组织，官山民团的枪械，大部分是当日官山商团留下來的。民乐、大岗、太平等 13 圩市的商团枪械，都先后被李群搜缴和罚款。

这时只余望心一乡。潘团当解决官山商团未同时追究望心，盖望心比别处不同，一是富户多，二是乡人性较强悍，三是望心枪械比别处较多，且系新式（私人自置的在内），四是望心平时守望相助，与附近各村，平时订有传锣互相呼应规约，故潘团对于望心有意留后处理。望心团练部主持人谭合兴、谭沅兴、谭国发，明知官山商团所遭命运，本村必有事故，但各人心有不服，以乡中财雄力大，决定遇有万一，实行抵抗；曾即招致一大批“捞家”，在望心开大锅饭，每人每天并发给双毫一元。果然，李群于收拾了官山商团后，对望心的“肥猪肉”哪肯放过，乃集中了潘团大部兵力前往缴械，望心的谭氏等带动乡中子弟和雇用的“捞家”，极力拒击，战斗激烈，把潘团兵员打死了四五十人。此一役，李群也为之惊讶，于是改用缓兵计，收买望心招雇来的部分“捞家”暗通消息，事隔约一月，知望心防范已松懈，突然开出兵力一连袭驻望心乡的谭氏祠堂，随即发出大兵浩荡进乡，宣布清乡，望心民团、捞家们因疏于防御，不战而溃。乡中的富户财宝无算，清乡的潘团，正是发财机会，连粪桶也要打破看过，洗掠终日，枪财均空。谭合兴等是日潜逃邻乡，旋即逃往广西。潘团沿途经过民乐市，市边部分也被蹂躏，最后还要向望心苛索赔偿，故意把开花炮放在吉水独岗上，炮口对准望心而作待发弹状，威胁结果，望心被勒榨广东双毫一万多元。官山商团被解散，事变于是了结。

1926年间，此事经过了年多之后，在简村世昌纶任职而经常和商团联络的张祯，侨商于越南1923年曾回国两年的陈镜之都到了越南，把当年商团事向陈廉伯的堂叔陈位行谈过，有一次在堤岸广府大楼聚会，陈氏叔伯们像陈紫垣、陈星南，亲戚麦君博、程孝功等亦在，笔者也在座。张祯、陈镜之都说：陈廉伯的失败，最主要是走错了路，因为商团当年能够发展，是由于广东客军林立、军纪败坏、盗匪乘机作恶，商旅不安，商团自卫确起

过不小作用。惜陈廉伯立错了主张，所委托的族兄弟陈篆鼎在港联络香港英政府，由于陈篆鼎眼光如豆，既不能为陈廉伯在港督方面做出工夫，又不明国内形势，规劝陈廉伯转变方向，靠拢孙中山政府，以致前功尽废，害及一般商民，互谈之间，表示无限慨叹惋惜。

(1964年)

我所知道的“香城商团”

郑砺石

1923年滇、桂军人广州后，治安极坏，盗贼蜂起，于是石岐依照广州办法组织了商团——“香城商团”，由石岐商会主办（石岐全镇2000多间商店）。它分设14个分团，每一个分团管辖3个小队，每小队30人，统计全镇商团，依编制应有42个小队，团员人数为1260人。每个分团，设正副分团长各一人。总团部设在石岐大庙商会内，有总团长一人，副总团长二人。总团部里，设有文书、会计、庶务各一人，另聘黄鼎南、郑宗霖两人为教练员。黄、郑都是石岐人，他们曾在陆军学堂毕业。在这时候，商会副会长黄泳初经已死，由曾凤俦（昌和菜栏司理）、高渭川（东昌海味杂货店司理）二人分任正、副总团长。后来再度改选，由刘秩民任总团长，高渭川、彭光亚分任副总团长。

商团成立后，它的团员和装备规定由每间商店出一个人，一支长枪，子弹100粒，采用陆军式黄斜服装，由各团长自备。大的商店要出两人或三人，如果没有出人，又没有出枪，则每月须缴团费5元至15元，由总团部另雇人充任。因此，香城商团的团员有的是商店的工人，有的是商店老板的子弟，有的是由外处募来的壮丁，颇为复杂，体格又强弱不同。凤鸣路、南基路一带的商店，以米机、油榨、菜栏、猪栏为最多，所雇的工人，大半是新会礼乐乡人，体格强壮，刻苦耐劳；而店东的子弟，则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一经操练，便相形见绌了。

商店老板的子弟平日养尊处优，世俗上叫他们为“太子爷”，他们多数在商团中充当小队长，为慕虚荣，经常穿着黄斜军服，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佩着一把指挥刀，皮靴托托作响，昂昂

然招摇过市，好像一个少年军官，夜间更在“泰东戏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往来穿插，对人说为维持秩序，实际上是借此大出风头罢了。他们还组织俱乐部，以供消遣。在今孙文西路华强印字馆楼上（今海鲜酒家二、三楼）有一所大俱乐部名叫大东公司，就系总团长刘秩民、副总团长高渭川等所开设，规模宏伟，陈设华丽，电灯放亮时候，小队长等和各界人士，便源源而来，大赌特赌，麻将、牌九、骰子等应有尽有，每晚抽水多至二三百元。此外另有一所俱乐部，设于湾泊在悦来路尾新街河面的“江天画舫”，系石岐商会在夏秋两季长期雇用以为商人避暑消遣的场所。太子爷们午后便登艇，搓麻将，呼卢喝雉，嘈吵不堪。晚间经常召新街的妓女侑酒，鬼混至深夜始散。不少人为着狂嫖滥赌而破产，也有因不理店务以致生意倒闭者。有一个商团小队长高裕昆，他父亲死后，遗下茂昌盛鞋店一间（在悦来路口），北区附郭田 30 多亩，家里人口不多，如果勤俭经营，不失为一个小康之家。但他做了小队长后，日夜混在俱乐部里，花天酒地，尽情挥霍，不到两年光景便花光了家中财产，及至石岐沦陷时终于饿死街头。

香城商团队员有 1200 多名，则枪械配备就要 1200 多支长枪，这个数字，在当时购买并不困难。由于当时政府尚未颁布持枪的禁令，又没有办理过枪炮登记和枪炮领照等手续，因此，民间买卖枪支，视为寻常的商品交易，买卖两方，都不用避讳。县属港口、隆都、小榄和九区一带的沙田地方，一向为“大天二”的渊藪，从前辛亥革命、讨袁、讨龙、讨莫、讨陈诸役，他们都是借着机会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军”。战事结束后，他们又回到老巢，回复原来面目，依旧过“大天二”生活。在“大天二”和民军司令之间的联络人，就是惯走“民军缆”的地痞，俗称“捞家”。商团的枪械，就是通过这些“捞家”搭线买来的。“大天二”们储藏的枪支，数不胜数。旧式的已视为无用。因此，就乐

于出售。走“民军缆”的“捞家”们，听到石岐开办商团要购买大帮枪械的消息，认为系一种发财机会，顿时活跃起来，终日往来于商团总部和各大商店间，双方经过多次接洽后，商团全部枪械，便顺利到手了。但是枪械式样五花八门，有毛瑟、村田、单九响、六八、七九等。至于手枪，系各分团团长和各小队长所需用，他们为着要出风头，不论价钱昂贵，只求新式合用。他们在无法购买时，便转向香港、澳门两处购买，由行走港、澳轮船中人代为偷运入口。

商团成立后，他们为着要维护石岐治安，不免要做一些防御工事，于是由今孙文西路西山寺脚至天字码头，沿着马路两旁的铺户、近街处的骑楼，一律开凿两个枪眼，以便有事发生时，对准马路射击敌人；又两旁铺户的骑楼和邻店相连的墙，一律开辟小门一处，彼此相通，接连构成一条防线，把整条今孙文西路可在二楼走通而能首尾呼应；又在悦来路口、汇源里口、马巷口、南基街口等处（当时各街尚未建筑马路），各搭天桥一座，横跨马路，上铺钢板、棉胎、沙包、鱼网等物，借此居高临下作防卫。又在烟墩山最高处，搭一座瞭望台，来瞭望报警。又在各内街头尾建筑一副木闸门，雇工看守，入夜到一定时间关闭。这一系列的措施，对石岐治安有一定影响，日间惯于打荷包的扒手，夜间的小窃，都为之稍稍敛迹；对外来的防军或有在市场上强买行为，也可能劝止。在这个时期，地方军警常有拉夫举动，工人们常被拉去充当夫役；有时或被警探认为形迹可疑，提去湾底棚仔的队部里扣押起来。自商团成立后，每个队员都有一个椭圆形布质证章，作为护身法宝，军警们就不敢再以他们为勒索对象。

1924年10月间，陈廉伯、陈恭受等勾结英帝国主义，率广州商团叛变。事前，两陈对于广州以外各地的商团，早有派人联络，约期响应。香城商团当然不会例外，正在倚装待发中，孙中山先生早已下令广州军警把广州商团包围缴械了。串同广州商团

叛变的有佛山、江门等几处商团，行至半途，又被当地军警缴械去了。刘秩民等正在探听消息，忽然又接到县长林警魂的命令，谓奉到省方上级命令，要将香城商团立即缴械，如敢违抗，从严究办等语。刘秩民等奉到命令后，惊慌失措，立即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筹商应付办法，结果推定代表二人，并托第一区警察区长郑伟夫一齐去见林警魂，表明香城商团并无反动行为，请他取消命令，不要执行。林志在乘机发财，采用先擒后纵的手法，故意表示坚决的态度，交涉几次，都不得要领。后来由郑伟夫从中斡旋，林警魂始答应每一支枪要缴罚金 33 元，方免缴械，仍要即日停止活动，听候改编。这个办法回报到总团部后，各人没有异言，但因团员人数和枪支数目与开办时数目不符，仅得 900 支枪，故即日筹集白银 3 万元，缴入县署，林警魂收了这笔罚金后，便即电复省方，极力说“香城商团，并无反动，现因保卫地方起见，已将它改编为‘石岐镇民团’，从前‘商团’二字，不许存在”等语，省方接电后，也不再追究。一场商团缴械风波，便从此结束。未几全县“联团总局”成立，石岐镇民团划归它指挥，到了 1927 年又复改组为“石岐镇警卫常备队”。林警魂索取这笔巨大罚款后，则中饱私囊，卸任后没有交代，新任的县长也无法追讨。

(1964 年)

新会城商团始末

麦炳琨 黄霄南

一、商团发展经过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地，盗贼四起，军队警察不能保卫商场。1917年（民国6年）新会商会会长何锦棠遂报拟以全国商会联合会制定的商团组织大纲，多次邀集商会商董商议，倡办商团，维持商团治安，但由于意见分歧，屡议未就。

1918年8月3日夜，古兜梁恩、梁社匪股百余人，抢劫会城承恩、浚渗、濠桥三街，劫赃数万元，掳商人57人，打死谢平山等3人，造成震惊全城的打劫案。被劫时，驻西门的城楼的警察游击队龟缩西楼，一枪不发，任令匪徒从容洗劫。自此次浩劫后，全城商人，无不鹤唳惊心，谈虎变色，都认为“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建立武装自卫要求，甚嚣尘上。何锦棠见时机成熟，遂因势利导，召集全城商董商议，再提出组织商团，防范土匪，得到全体商董支持。会后，由与会商董分赴全城各店，发动年轻的店东、少东参加商团。经过一个多月筹备，参加商团的有百余人，认“保安会”达万份（每份五元，先缴加一开办费五毫，其底金五元仍储认会之店生息，年息一分，以充商团经费），并公推何锦棠当任商团团长，那时会城商团仅具雏形。

1919年，曾遭匪劫的承恩、浚渗、濠桥三街的商人，首先成立第一分团，接着，生意最大的南隅街成立第二分团，环城外的帝临堂、百岁坊、泗冲等交通孔道的商店，相继而起，分别成立第三、四、五分团。只半年时间，共成立五个分团。1920年春，成立总团，选出第一届商团团长何锦棠，副团长李梓臻、张达

廷，评议长张子衡，副评议长何耀光。那时会城商团已初具规模，总团暂设在商会内。

总团成立以后，何锦棠等商团头子，为树立个人势力，积极购枪械，置团服，筹经费，将“保安会”改为“日会”（每个会以300份为本位，每日供银二毫，至300日为满金，每日以60元标投，内扣2元津贴团费，实为银58元标投，以利多者得，其利钱除支“会工”六毫半外，其余利息均分未得会之商店），并拟定发展十个分团的规划。在总团的推动下，商团不断扩大。1921年，西墩街、黄家楼、三丫营等离城稍远地区，分别成立第六、七、八分团。1921年，城内中心区如大新街、南山堡，以及商店很少的县前三街，也先后成立了第九、十、十一分团。至此，会城商团组织比原规划发展了，而成立一个拥有11个分团，团军四五百人，长短枪800支的相当规模的军事组织。

那时商团的编制，形同正规军队。总团之下辖11个分团，每个分团辖两个至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团军20至30人，总团有正副团长，分团有团总，队有队长。每个分团都聘请有曾在军校毕业或在军队里当过连排长、具有军事学识的人充当教练员，专门负责军事训练。总团教务长为何绳武，总管全体商团军的军事训练。总团还设有评议会（由每个分团各推选评议员5人，共55人组成），是商团的最高权力机构，决议商团所有一切重要事宜。此外，总团公所和分团支部，都设专人负责财务、庶务、文牍等日常事宜。

同年9月，选举第三届商团，商团的领导权，都落入那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富商巨贾、地主豪绅手中，他们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封建势力，而且大多数人都有封建土地关系。兹将那时的商团骨干分子简介如下：总团团长李梓臻（裕丰淦银号店东），副团长张达廷（益和故衣铺店东）、戴心海（前清武官，六和酱园外东），第一分团团总林春五（捐棍，县议会议员），第二分团团总

何均庭（叙宾素茶楼店东），第三分团团总陆梓南（洞南乡恶霸地主，国民党新会县党部执委，葵扇会馆董事长，陆豪胜扇庄店东），第四分团团总伦树荣（和源山货铺店东），第五分团团总何耀光（果採基大地主，有葵基两三百亩，业记葵扇、明安银号店东），第六分团团总李沛（阔栈酒醋铺店东），第七分团团总杨拱辰（泗利铜铁铺店东），第八分团团总陈东璋（首任新会劝学所长，1925年3月任顺德县县长，均兴隆葵扇店东），第九团团总余献之（基督教徒，医生），第十分团团总李柳门（前清武官，小同乡地主恶霸，分团团长），第十一分团团总施琼波（讼棍），稽查长谭光（流氓打手，葵扇会馆侦缉）。评议会的正副评议长是何锦棠（何家大塘地主当权派，历任江门、会城商会会长）、李凯门（前清武官），评议员有：朱绳裘（新光电灯公司经理，新玲电话公司董事，沦陷时就任日伪江门商会会长）、何若珊（前清秀才，何家大塘地主当权派，何长丰银号、履和柑皮庄、江门果栏等司理，新会商会会长，李宗仁的谊父）、赵能坚（祥和故衣店东，首任新会商会会长）、刘子钊（刘怡记葵扇、柑皮庄店东）、陆锐世（泰鳌饼铺店东）等55人。

1922年12月5日，会城商团成立。开幕之日，排场极了，全城商店，张灯结彩，还邀请古兜碉楼善后事务所派出“新江”兵舰停泊于西河口防卫，以壮声势。商团总公所内灯火辉煌，满挂着有广州，佛山，番禺城北、市桥、屏山、沙湾、紫塘，南海九江、梦行、官山、朗心，顺德陈村、水藤、鸡洲、乐从、均安、桂洲，香山小榄、大黄圃、鳗子洲，东莞石龙、茶山，增城新塘、花县，三水西南，高要广利，肇庆，台山公益、广海，江门，以及新会双水、古井、荷塘等各地34个商团，和江、会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来的对联、帐幅、匾额、镜屏，琳琅满座。还邀请粤省商团派员亲临指导，新会县长王光海，驻军粤军第五独立旅第一团营长锺天衢，和江门商团团长赵秀石（后来当了汉

奸)，公益、肇庆商团团长等，都在成立开幕典礼上致辞。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江门英美烟草公司主任苏洛威（西人），对会城商团极为重视，除了以公司名义赠送十支庄“欢迎”牌香烟 50 盒外，还亲送 50 支装“大嚏士顿”香烟十罐，对商团发展规划，备加赞许。开幕典礼后，会城商团为了要在人们面前耀武扬威，与江门、肇庆、公益等商团军会操于北较场，结队游行城厢内外，所经街道，各商店燃放爆竹致贺，观者如堵，热闹异常。

二、商团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会城商团制定“冠冕堂皇”的禁约：一、不得吸洋烟及入赌场；二、不得酗酒滋事；三、不得穿团服入妓院、花艇、花酒场中；四、不得恃众欺人等。商团还设有稽查队，执行团军的军风纪，形同正规军的宪兵队。但是，实际上各个分团团部，都成为吹烟聚赌的地方，地方军警，无奈之何。有一次，浚渗第一分团团军在团部聚赌，被军队抓获，各店闻讯出队，把军队重重包围，军队只好被迫将缴获的赌具赌款全数退回。又一次，军警到泗冲第四分团所辖石狗基广合兴扇寮抓烟，该团团军如临大敌，把守石狗基两头巷口，军警知情不妙，只好悻悻而去。自此，商团更加跋扈，无法无天，根本不把地方军警放在眼内。商团总公所内，更是肆无忌惮，经常设有几副烟具，供商董、团总、评议员吞云吐雾。商团总公所所在地的何家大塘，在何锦棠、何若珊、陆焯南等商团头子的庇护下，烟赌林立，有小澳门之称。入夜，该处赌博兴旺异常，牌九、番摊、木牌、荷兰牌、十二位、骰钵，种种具备，喝雉呼卢，通宵达旦。此外，总团和分团的理财员、收会员，几乎无一不侵吞公款、会份。商团头子们随意挥霍，滥支公款，甚至挪用商团经费来做私人生意，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商团头子们整天叫喊“保卫商场，维持地方治安”，看来煞有介事。各分团所辖交通要道筑碉楼（全城碉楼林立，其中规

模较大的有大云山、西龙桥、西墩街、聚贵巷、三丫营、南隅街等十多个)，建街闸，搭天桥，铺与铺的天棚、屋顶都接连起来。每间商店，置铜锣一面，天棚备有豕笼、蚬灰、水埕。如遇有警，各店鸣锣助势，如土匪窜入街内，团军则居高临下，用豕笼阻其前进，用蚬灰迷其眼睛。冬防期间，照例出队日夜巡逻，晚上一交初更，即紧闭街闸，加派团军在碉楼守望。还在西河口、上浅口设卡驻守，美其名曰“保护水路交通”。他们在“保护商场”的幌子下，大肆勒收商团经费，商团所辖街道的商店，住户，一律要做商团“日会”，还要按月勒派商团经费十元、八元、库容六元、四元不等，变成一费两征。甚至在街内摆卖鱼虾、菜蔬、水果的小贩也不能幸免。一般小商小贩，每日营业所得，往往不能供会，无不怨声载道，但迫于团总、队长的淫威，只得哑忍屈从。商团出队巡逻，所辖街道商店，要派“宵夜钱”，美其名曰“巡查费”，晚上居民经过街闸，也要给以“开闸钱”。来往西河口、上浅口的大小船只，一律勒收“火烛钱”。劳民伤财，商店住户负担重重，到底治安如何？事实告诉人们，商团只能抓到一两个扒手、小窃而外，城内的盗窃、抢劫、掳人、打杀，几乎无日无之。就是最繁盛中心区——南隅街，也连续发生巨窃案。溢隆、丽章两间苏杭铺，先后被窃去绸缎布疋，各值千多元。甚至商团军的枪支，也常被盗窃光顾。南隅街第二分团孚生银号被窃去七九步枪一支；三丫营第八分团团军蔡民的团枪，被小窃何芝光顾了；帝临堂第三分团在李庄拿商团经费时，被叶栋（绰号“大支笔”，解放后已镇压）窃去团枪一支。会城各大商店，经常接到长坭陈孟律、陈俊，礼乐梁锡芬，深垒徐草等著名匪首的打单信。会城开往江门及之乡船渡，在西河口、上浅口经常被劫，来往客商，随时有做“羊牯”的危险。

会城商团军从外表看来，冬春着深蟹青色呢绒军服，夏秋穿黄斜军服，除领章、胸章外，另佩深黄色底，用丝绣有“新会城

商团军某号”字样的号带一条，以别于其他军队。枪支配备，不是簇新的驳壳、左轮，就是比较新式的步枪。队长以上则横直皮带，荷枪佩剑，足蹬马靴。总团团长、分团团总一律骑马。每当友团访问，结队游行城厢内外，耀武扬威，商团头子们经常在人们面前夸耀商团军的实力，自命为“冈州虎旅”。这支少爷兵的實力如何，能打仗吗？就在商团开幕前后的一年里，会城曾发生几次较大的劫案，而这支“冈州虎旅”，不但不能保卫商场，反而大出洋相。1922年6月，新会匪股麇集，劫茶坑、飞鼠下、天禄等附城乡村，被劫数百家，缴去乡团团枪十支，掳“羊牯”200余人，并扬言将扑会城。而平日在人们面前耀武扬威的商团军，在匪势环伺之下，都被吓得惊慌失措，紧闭街闸，龟缩在碉楼内，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还急电广东省长公署、卫戍司令部，请派大军到县，以解倒悬。同年12月16日夜（即商团成立开幕后11天），陈孟律匪股60余人，劫诗书街端严学校，掳去学校生27人，失赃千元，万昌酒米店张素石，林芝记米店少东林伯同时被掳。劫时未响一枪，劫后濒行，放枪数十响，商团军才从梦中惊醒。1923年4月22日夜，礼乐梁锡芬匪股劫募前街冈州酒楼、美源隆砖瓦铺、大合棚厂、益寿棺材铺。商团军接报出队，第九分团团总何均庭带领团军围捕，赶到景行里口，黑夜中遥见募前城头有人影蠕动，疑是城楼警察游击队（县兵），团总何均庭大声呼喊：“我是商团！我是商团！”城头上的人没有答话，他怕对方听不清楚，即刻把第九分团的灯笼点亮，城头上把风土匪，一轮枪打了过来，何均庭当场被打得蒙头转向，丢了灯笼。其余商团军也抱头鼠窜，争相逃命，有的被吓软了脚，堵塞景行里口，于是互相践踏，有碰破头皮的，有摔伤手脚的，丑态毕露。其实商团军哪能打仗？总团副团长张达廷，不谙枪机，闹过用枪打伤自己的脚的笑话。县前三街火警，该街第十一分团出队维持秩序，团军误扳枪机，闹出一枪两命的人命案（打死一个

砸石工人和一个皮鞋匠)。第十一分团成立，巡行城厢内外时，该分团团总施琼波，伏在马背上，慌做一团，连腰也挺不起来，丑态百出，一时观者，无不嗤之以鼻。所以明白商团内幕的人都说：商团军不过是“绸衣公子”（好看不顶用的意思）罢了。

三、商团军的反革命活动

早在 1922 年商团成立开幕时，商团头子们已毫不掩饰地提出“商人政府”的政治主张。商团团长李梓臻、评议长何锦棠等在就职宣言中曾这样说：“商团乃我商人所结合，互助保卫之团体，一如外国之义务队。世界政治之趋势，已由官僚政治而渐趋于商人政治，我商民团不能不应时势之要求，尤不能不赖群力而图存。”

1924 年，陈廉伯阴谋组织商人政府，于 5 月间召开全省商团联防会议。会城商团总团团团长陈东璋亲自参加。会议期间，陈东璋还被推为会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陈东璋会议归来后，积极进行倒孙活动。他一面发动会城各店备价购买枪支（购械办法是：步枪每支预缴毫银 100 元，驳壳每支预缴港币 80 元。预缴价款，暂储银号备用，一俟枪支运到，核算每支价款，按价多除少补）。那会城商团有四五百人，而长短枪竟达 800 余支，在枪械上可以说是绰有余裕，但由于枪价便宜，比之商团新成立时，向粤军总司令部价领的残旧五响密底枪要便宜得多，也比当时国内枪价便宜得多。加之商团上层骨干带头预购，如第九分团团总余献之，原有窄嘴枪一支，他还带头缴款预购七九步枪一支、驳壳一支。在骨干带动下，各团军商店购械异常踊跃，计预购长短枪共 300 余支。同时总团还准备筹款购巡河舰一艘。另一方面他们大肆攻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贪污舞弊、卖官鬻爵、包烟庇赌、横征暴敛、抽剥商民。与此同时，会城盛传全省商团联防总长陈廉伯将出任广东省长，会城商团副团陆绰南将接任新会县长。

是年8月，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枪械，阴谋叛乱，被政府通令通缉，陈廉伯的副手陈恭受以全省商团联团名义，通令全省商店一律实行总罢市，以促政府“觉悟”。陈东璋立即与江门商团联系，继佛山商民罢市之后，于8月20日在会城宣布戒严，江、会两地商店，一律停止营业，响应全省商民总罢市。但由于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先后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因而，江、会两地商团，采取伺机应变态度。罢市期间，不关街闸，不派队梭巡。驻军粤军第一军长梁鸿楷、二十六团团团长梁休年不执行孙中山大元帅和革命政府命令，对江、会这次罢市，采取不干涉态度，还饬令官兵无事不得游行街市。江门军警督察处则出安民布告：“当兹扣械风潮尚未尽息，我军警商团，自必倍加亲爱，一心一德，保持我固有之安宁。”新会县长陈永惠（新会大泽乡人，加拿大华侨，早年资助孙中山革命，他与劣绅梁纪常、何锦棠、何若珊等关系很密切）则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亲到会城商团总公所，邀集商会会董和商团上层骨干开会，晓谕商团要以地方安宁为重，循例“文明罢市”（即半掩门，半做生意），切勿扩大事态，静候事件和平解决；会后，还亲到南隅街、大新路各大商户劝喻店东。同时，罢市期间，副食、日杂、茶楼、酒馆仍继续营业，秩序比较安定。10月中旬，广州商团叛乱，会城也蠢蠢欲动，但来不及响应，而广州商团叛乱已被革命政府镇压下去。广州商团事件平定后，会城商团表面上没有参加叛乱，加上驻军梁鸿楷、梁休年、地方官陈永惠的纵容包庇，因而商团反动武装没有受到镇压，商团反动头子仍然逍遥法外。只是形势对商团不利，不得不摘下“新会城商团总公所”的招牌，暂时停止活动，伺机再起。

1925年2月，会城商团又故态复萌，利用印花税驳脚稽查佟月元（二十六团机枪连退伍班长）“省牛王”事件，乘机煽动商人，反对革命政府税收，企图借此达到“停止纳税，以封锁孙

政府之经济”（佛山秘密会议议决内容之一）。但事态发展，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闹出哄动全城的“二万八”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南隅街九章苏杭铺店员甄波，携借货簿往大新街广源号拿货，在大魁里口被印花税驳脚稽查佟月元借检查印花税为名搜去身上的钱。甄波当场呼喊抢银，南隅街各店团军，闻讯赶到现场，喝令佟月元拿出稽查证件，这个临时雇用的驳脚稽查，哪能拿出证件呢？正在纠缠间，已有团军飞报第二分团公所，其时商团队长钟雅葆正在手拿酒杯，饮得面红耳热，闻报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喝令：“拿人！”团军得令，便把佟月元扭回南隅八社（更馆），拳脚交加，把佟月元打得奄奄一息。队长知情不妙，马上转解商团总公所，岂料转解中已一命呜呼，随即由商团公所通知印花税公司会城办事处主任关协启认领。关协启见事关人命案，拒不承认佟月元是他雇用的驳脚稽查，但却暗中着人通知粤军二十六团团团长梁休年。梁休年认为发财机会已到，于是声称佟月元是二十六团所部机枪连排长，一面使人领回佟月元尸体，一面索赔人命，乘机大敲竹杠。提出三项条件：一、抚恤死者家属五万元；二、全团缴械；三、交出凶手20名。南隅街第二分团团总、团董、队长以及肇事的团军商店，因事关人命案，早已逃匿一空，且因条件苛刻，以至无人答复。延至2月9日（即旧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早，该团乃采取强硬手段，派军队一连，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进驻南隅街第二分团公所、何姓祠堂、隆新苏杭铺栈房等处。南隅街两头街闸、路口，均为军队把守。并在肇事商店前放置火油，声称限三日内要完满解决，否则拿人、缴械、罚款、放火。该街商店，一见军队进驻分团公所，人心惶惶，不敢营业。会城最繁盛之商业区，顿时形同死市。上灯时候，二十六团还派人扛棺到南隅街，置放益和故衣店门首（该店司理张达廷，县总团副团长，当该街二分团团总，发生人命案后，匿不露面）。在二十六团派队进驻南隅街之前，梁

休年本拟把总团副团长陆绰南扣留，随由县长陈永惠、县绅梁纪常担保，始获省释。至农历二十八日，商团仍无解决消息，遂催促陈永惠交出陆绰南，陈不过是中间调解人，事情至此，只得下令，由稽察第一区区长陈某，带同稽察前往商团总公所，传陆绰南到案，然后解二十六团团部。至此，商团的上层骨干以及第二分团的团总、团董、队长及肇事商店店东，为早日保释陆绰南和保全自己的铺业财产，匆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解决办法，会议决定由均裕司理黎沛三（混名颠鬼三）委托他的姻亲冯伯娄（曾任江门市政厅长，江门市稽察厅长，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的赌友）出面调解。迨至农历除夕晚（二十九日），始行解决，由南隅街补回恤金 28000 元，星夜用轿扛毫银 3000 元，其余 25000 元，由该街大商号同时发出银单，送交二十六团团部。是夜一点钟，始行把商团副团长陆绰南释放，驻扎在南隅街第二分团公所等处的军队，也拔队他去，益和故衣铺门首的佟月元棺柩，亦同时扛走，此案才告一段落。

“二万八”事件，除了赔偿恤金 28000 元外，加上了颠鬼三、冯伯娄等调解人从中借祸发财，前后共用去 34000 元。在派数问题上，商团内部又掀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南隅街所有商店和会城的团军商店，都被卷进这场风波。首先是南隅街的团长、团总、团董、队长商店，肇事商店及垫款商店，如益和故衣铺司理张达廷，何长丰银号司理何锦棠、何若珊，泰鳌饼铺店东陆绰南、陆锐世，宝兴银号店东黄登卿，裕丰隆银号店东李梓臻，祥和故衣铺赵能坚，隆新苏杭铺店东凌畅亭，均裕银号店东黎健闲，九章苏杭铺司理汤义炯等，频频秘密议会议，决定把该由肇事商店负担之恤金，分摊全街 110 多间大小商店平均负担，计每间商店要负担 300 多元。对这无理决定，全街中、小商店为之哗然，都认为此次闹事是南隅下街的事，不能由全街商店负担。南隅中街（即由大义巷至南塘里口心为中街）商店，首先停止营

业，以示反对。张达廷、陆绰南等商团头子迫于坊众压力，不得不再行秘密集议，商量对策，决定以该街各店认缴水车防御费（即消防费，共约 300 多元）为底金，加 100 倍（即每认缴水车防御费一元，就要勒派 100 元，余类推）的办法，强加全街商店负担。还采取强硬手段，连日请军队协同沿各店催缴，限三日内缴足，否则封铺拿人。该街德寿堂药材铺司理林中灵（政治掮客，曾任第一届省议员，总团评议员，南隅二分团团董），前因竞选第四届商团团长，曾被张达廷、陆绰南等所击败，早已含恨在心，伺机报复。今见有机可乘，为泄私愤和树立个人威信，遂召集全街中、小商店集议，经众推举他草拟呈文，并由参加集议的 70 多间商店盖章，分别联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广东省长胡汉民、新会县长陈永惠和粤军第一军第二十六团长梁休年，控告张达廷、陆绰南等恃势凌人，勒派恤款。另一方面，全街中、小商店一律停止营业，并粘有四言短句于各店门首，其词曰：“正凶不办，秘议勒派，飞累难偿，请官维持，主张法理，迫暂停业。”梁休年据呈后，甚为震惊，诚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便立即邀同新会县长陈永惠，亲到南隅街公所，召集该街团总、团董、商董及中、小商店代表，讨论科派恤款办法。随由陈永惠、梁休年二人责成该街团总、队长及为首的肇事团军商店，有益和、宝兴、均裕、裕丰隆、九章等六家，科以重派，以示惩戒；遂将支出之实数分作三分，以二分归团总、队长及肇事商店均派，以一分归全街商店，按各店认缴水车防御费加 30 倍算派（即每认缴水车防御费一元要科派 30 元，余类推），双方始行允从，当场签字认可。

商团头子张达廷、陆绰南、何锦棠、何若珊、李梓臻等勒派恤款阴谋失败后，他们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遂利用职权，以商团总公所名义召开商团骨干会议，提出南隅街二分团团总、队长及肇事团军商店派款过重，亟应设法捐助，以尽患难相济，谊属

同袍之情，竟然不顾大多数团总和评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了捐助南隅二分团团总、队长、团军商店的议案。捐助的办法是：第二分团团军每人助银 20 元，其余各分团团总、队长、团军每人助银 5 元。这项无理决议，又遭到全体团军的反对。南隅街各团军商店，认为此次闹事，是几间团长、团总、团董、队长商店的事，由全街中、小商店负担罚款三分之一，已属不均，况此案早经当众签字承担，款已照缴，对张达廷、陆绰南等又假借总团名义，强行向团军再行抽剥，表示极大愤慨。林中灵又联合该街大部分团董、团军，联名请二十六团团总梁休年主持公道。梁休年敲取了 28000 元巨款后，自然不想事态继续蔓延，于是严斥张达廷、陆绰南等当事人不得取巧翻案，借势抽派，自招烦忧。而其他各分团团军，均以事不关己，对总团的无理决议，采取拒不承认态度。

经过“二万八”事件，张达廷、陆绰南、何锦棠等商团头子，企图“停止纳税，以封锁孙政府之经济”的阴谋不但没有达到，相反，他们在全体商团军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四、商团的解散和改组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平定后，全省各地商团奉命解散，会城商团只是摘了“新会城商团总公所”的招牌。曾参加过广州“西瓜园会议”和佛山秘密会议的陈东璋，以及张达廷、陆绰南、何锦棠等商团首要分子，由于得到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新会县长陈永惠的包庇，仍旧安然无事，逍遥法外。商团武器，奉命一律遵照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颁布的“查验枪支注册领照办法”，办理报验枪支，缴费领照手续，方承认是人民自卫枪支，仍归团军商店所有。枪支注册费分甲、乙两等，甲等枪缴费 40 元，乙等枪缴费 20 元，由于缴费过重，各团军商店，迟疑观望，未肯交缴。后经许崇智批准，甲等枪减征 10 元（即 30 元），乙等枪

减征5元（即15元）。西江财政整理委员会还派张海洲亲到会城商团公所催缴，总团派员协助按户征收。这样，会城之团军商店又多了一笔负担。

1925年2月，陈东璋、张达廷、陆绰南、何锦棠等商团头子不甘心商团的解散，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已经停止活动的商团复活，于是，玩弄改头换面的把戏，把会城商团总公所改名为“新会城民团筹备处”；不久又把民团筹备处改名为“新会城民团总局”，并于7月间宣布成立。这么一来，陈东璋、张达廷、陆绰南等商团头子，便摇身一变为民团总局的正、副团长，何锦棠则由商团评议长变为民团董事长，其他评议员则改称民团团董。商团所辖的11个分团，仍依照原有编号改为11个民团中队，分团团总改称民团中队长。商团直辖的常卫队则改名民团常备队。名堂改换了，但原有机构、武器仍原封不动地保全下来。由于这次所谓“改组”，只是改头换面换了个招牌，因此，新会人民和新会地方报纸，并没有因为它改换了招牌而改变对他们的称呼，仍旧叫它做会城商团。就是他们自己，也自称商团。其实商团的真正的改组，还是1926年的事。

1926年，省民团统率处裁撤，复设省团务委员会，重修民团章程，饬令全省各地商团、民团、乡团重新改组。原日的商团头子，为了争权夺利，又闹出一场哄动全城的内讧丑剧。全城“民团”奉命改组后，张达廷、陆绰南等立即通知各分团办理各种表报，归编改组。不料南隅街第二分团团董林中灵，不甘心前第四届竞选商团团长的失败，对此次“民团”改组，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重整旗鼓，奔走钻营，企图东山再起，他与第四分团团总谭美瑞（大德米铺店东）、第十一分团团总林仲瑜（流氓讼棍）互相勾结，以第二、四、十一分团为政治本钱，积极展开活动，拉拢各分团团军商店，打起“新会城民团联合会”的招牌，企图以此来左右民团改组。另一方面，他总结了前次竞选商团团长的

失败，是由于没有争取何锦棠的支持，于是便凭着他同何锦棠有表亲关系，暗中对何锦棠进行贿赂，请何锦棠支持他竞选民团团团长。素称老奸巨猾、两面三刀的何锦棠，表面满口答应，但背后则与张达廷、陆绰南等朋比为奸，而林中灵却蒙在鼓里。张达廷、陆绰南等获悉林中灵的动向后，便以“民团总局”名义组织征求队，由评议员陆锐世率领，分往各乡进行拉拢收买，还以民团大队长的甜头饵诱第九分团团总陈耀石，以金钱收买第九团团董何丹葵，并唆使他们串同第八、十分团出任调人，邀请没有林中灵、林仲瑜、谭美瑞等人参加的分团联席会议，企图通过会议，把林中灵等排除于“民团”改组之外。不料林中灵、林仲瑜、谭美瑞等率领第二、四、十一分团大部分团董突然参加会议。在会议中，林中灵大肆揭露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报棍，《民众日报》社社长，第三分团团总）等把持商团的劣迹，并以仅超过半数的多数通过林仲瑜提出的三项条件：一、择地迁团；二、交铃封存；三、以分团为单位，每团设队长一人，评议员五人。张达廷、陆绰南等玩弄分团联席会议排挤异己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自讨苦吃，先输了第一个回合。

接着，林中灵步步进逼，由他的党羽谭美瑞、林仲瑜以第四、第十分团名义分别发表宣言，揭露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等互相勾结、把持商团、屡抗改组、挟戳匿款、蓄意盘据五大罪状，宣称此等败群之马，若使其任一城之职务，则一城受害，任一方之职务，则一方受苦。若非预为排除，流毒伊于胡底；并号召各界主张公论，同申公愤，如去草务使斩草除根。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等自然不甘示弱，立即进行反击，发《新会城全城商店团友重要宣言》，列举林中灵生平秽史，攻击林中灵是阴险无耻小人，林仲瑜、谭美瑞是其忠实走狗，阴谋推翻商人自卫团体，危害全城治安，其行为可耻，其心术可诛，表示誓必斗争到底，务铲除此障碍而后已，并号召各界人士，主持正义，鸣鼓齐

攻，使其不能现形于化日光天之下。

与此同时，林仲瑜、林中灵等又以“新会城民团联合会”代表名义，电呈广东省民政厅，控告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等“对商团改组，始则任意延宕，嗣竟勾结把持，驯至群情涣散，形同虚设。县城内外，亦复发生劫掠在案，殊为地方治安妨碍，请批斥查办。”由于林仲瑜的胞兄林某（任李福林的秘书）在广州积极向省民政厅钻营，随奉广东省民政厅批示：“飭新会县即速勒将旧日商团戳记缴销，并将经手数目交出公算刊布，一面择地召集各中队长，依照民团条例，妥为改组，以重团务，而维治安。”这么一来，张达廷、陆绰南等又输了第二个回合。林中灵等乘胜追逼，派去二分团书记刘琴荪带了省民政厅的批示，大闹商团总公所，进行逼宫夺印。张达廷、陆绰南等见批示皇皇，惊慌失措，立即召开商团骨干会议，商量对策。一面由新会城商会会长何若珊，商民协会会长谭仲藻（《民众日报》编辑，前清举人，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分别急电省民政厅，控告林中灵、林仲瑜等诬控破坏，妄行通电；另一方面则加紧拉拢各分团归编改组，连日在第九分团团部赶造团军名册，枪械清册，并串同一、八分团朋比暗自到广州，由何锦棠等以民团总局团董名义，呈报省团务委员会，称已遵令改组民团，业经成立，请予以立案。还请新会联团总局陈立予（前清秀才）、新会商会会长何若珊先后电催省团务委员会，请迅予批准会城民团立案，以维持治安，并飭县彻究林中灵、林仲瑜等诬控破坏之罪。希图一经获准立案，就可排除二、四、十一分团于民团之外。林中灵等获悉张达廷等瞒呈立案的消息后，又以“新会城民团联合会”代表名义，电呈省团务委员会，控告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等蔑众翻异，冒用民团总局名义，窃易职员名字，瞒呈立案，群情愤激，请批斥严究。他们勾心斗角，互相攻击，闹到天昏地暗。这场笔墨官司的结果，最后经省团务委员会批示：“……双方各执一词，

查该团局现说改为民团，自属人民自卫团体，关系新会城各界治安，应由该局定期召集全城各界依法选举，并由本会派员监选，方昭公允。”至此，张达廷、陆绰南等瞒呈立案诡计又宣告破产。尽管如此，但由于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等得到何锦棠、梁纪常、谭仲藻、陈立予等大绅的支持，竞选结果，仍然被选为民团的正、副团长。而林中灵在会城的商人中，到底是势孤力薄，因而名落孙山。林中灵希图登上民团团长宝座的美梦全部破灭了，他早就购置好的团长军服，也随着竞选的失败而束之高阁。一场争夺民团团长丑剧才告结束。

五、镇压工人运动

会城商团贪污、腐化、无能，根本不能保卫商场，维持地方治安，商团内部骨干之间，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但是，他们在镇压工人运动方面，却是步调一致，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1924年，新会各行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新会县总工会，领导各行业工人向封建行会和资本家进行废除行规陋习和签订劳资协议的斗争。他们到处宣传革命，举行示威游行，展开“齐行”（罢工）斗争，向来骑在工人头上的商会、商团头子，如何锦棠、何若珊、陈东璋、张达廷、陆绰南、谭寄尘、钟应春等，对工人运动刻骨仇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一面收买李次鹏、叶章、梁华、左季等工贼，成立所谓“新会县工人代表会”，并在各行业中成立“葵扇联义工会”、“三旗玻璃葵扇工会”、“广东省新会县金属葵扇总工会”、“三鸟工会”、“鲜鱼工会”、“酒楼茶室工会”等黄色工会，来同进步工人组织对抗，一面阴谋用高工资雇请工人叛徒，来对付工人的“齐行”斗争，还提供武器给“新行”（新人行）工人挑拨其惹是生非，并扬言如因械斗致死的，抚恤安家费300元，打伤的包医。以“葵扇大王”陆绰南为首的葵扇老板，还在大口冲秘密集会，

斩鸡头，当天发誓：“宁使（花费）一万（元），不加（工资）一分（钱）。”誓与工人斗争到底。他们还依靠已经组织起来的商团军，用来作为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当葵业工会筹备会的征求队到西墩街征求会员时，该街第六分团团军，在副团长陆绰南的阴谋策划下，预先埋伏在该街莘利祥老葵铺工场内，待工会征求队一到，该铺店东余荣（该街六分团团董）推倒柜台，呼喊：“有贼抢铺”，预先埋伏在工场的30名商团军，荷枪实弹，闻声蜂拥而至，不由分说，见到工会征求队就打。手无寸铁的征求队员，当场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还把汪湘、熊洪、梁波等捆绑回商团总公所，诬控以“聚众抢铺”罪名，转解县衙。后经新会县总工会向县长陈永惠提出抗议，始将汪湘等三人释放。汪湘由于伤重不治身死。葵业工人群情激愤，于汪湘出殡之日，沿途高呼“打倒资本家”口号，并依法向法院起诉陆绰南教唆杀人罪，无奈法院贪赃枉法，接受陆绰南的重贿，致使正凶逍遥法外。

1925年，新会葵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葵业联合总工会”，还组织了“葵业工人生产合作社”，以抵制资本家对葵业工人的剥削。这么一来，葵扇老板大为震惊，视之如眼中之钉，于是千方百计要把这新生婴孩扼杀在摇篮之中。有一次，葵业工人生产社直接同葵农买了几十万生扇，被葵扇会馆的稽查与第三分团队长谭光知道，马上向葵扇大王陆绰南报告。买卖葵扇，向为葵扇会馆垄断，买卖双方，必须经过葵扇会馆挂号，缴交佣金，领取会馆发的“公单”，才能割扇。这么一来，便触犯了葵扇会馆的条条，在葵扇大王陆绰南看来，自然是“无法无天”。于是出动了百多名商团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硬说葵业工人生产合作社同农民私买“走佬扇”，一声命令，把几十万生扇抢回葵扇会馆。葵业联合总工会闻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星夜派人通知杜阮、木朗、丹灶、大泽、沙冲、七堡等乡农民协会出队支援，各乡农民协会随即派出农民自卫队支援，照原定计划，浩

浩浩荡荡分三路向金刚北葵扇会馆挺进，准备把陆绰南的商团包围，把它打个稀巴烂。陆绰南闻讯，惊慌失措，急忙派员到葵业联合总工会道歉，说是出于误会，甘愿赔偿生扇损失，严惩聚众滋事的商团队长谭光，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至此，葵业联合总工会才派人通知已出发在途中的各乡农民自卫军折回。当时东北方如杜阮乡农民自卫军已开到大石头途中。经过这次较量，狠狠地打落了商团军的威风，也充分显示出工农联盟的巨大威力。

19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事前已传闻反动军警将出队镇压，但是进步工会、学校学生，不畏强暴，仍照原定计划游行，庆祝自己的神圣节日。各行业工会会员，一律胸佩徽章，身缠白布，以防反动派破坏，各校学生则身边暗藏锋利竹签，准备随时同反动派进行搏斗。是日参加集会游行的有葵业联合总工会、米业工会、碾米工会、山货陶瓷工会、水泥建筑工会、木艺建筑工会等行业工会，和一中、师范、邑城一小等学校，游行队伍，手持“劳动圣节纪念”、“打倒资本家”等纸旗，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等口号，游行队伍步伐齐整，锣鼓瑞狮非常热闹，沿途观者如堵。游行至募前桥时，商团军协同军警突然实行武装镇压，一时互相搏斗，队伍散乱，当场打伤工人、学生无数。商团军队长钟应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六乡乡长，大兴杉铺店东）还率领商团军沿途兜截游行的工人、学生，并将一中学生邓福根（新学生社领导人之一）逮捕。事后邓福根的母亲找钟应春还给儿子，钟应春说：“邓福根是共产党，要杀！”商团头子仇恨共产党和工人，由此可见。

1927年，广州反革命政变，原日商团头子张达廷、陆绰南等，更加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他们开具黑名单，并派爪牙谭光、谭龙（河南警察所长，原日商团队长）协同军警到各乡进步工会，大肆搜捕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总工会的吕棠，米业工会

的尹钦，碾米工会的黄保、吴起、聋耳钜，山货陶瓷工会的夏汝彬，五邑船艇工会周华等，无辜被捕，葵业联合工会骨干司徒厂（共产党员）在江门竹排街被谭龙逮捕，梁尚七同时在会城河南大桥被谭龙逮捕。司徒厂被解广州，壮烈牺牲，梁禹、尹钦等革命志士，则在江门范罗岗被集体屠杀，临刑时，他们毫无惧色，正气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此后，革命走向低潮。在漫长的黑夜中，会城各行业工人仍坚持此起彼伏的“齐行”斗争，但都被商团起家的陆绰南等镇压下去。

(1964年)

略谈莞城商团

聚 成

广东自陈炯明叛变后，滇、桂、湘等军阀相继统率部队入粤，广东形成混乱局面。陈炯明部退居东江盘踞惠州，时时伺机进攻广州，而滇、桂军等常兴兵进攻惠州。东莞县地处东江下游，为广州与东江水陆的交通要道，常遭兵灾。当时滇桂军纪律废弛，横行霸道，四处勒索，强买强卖，又时常拉夫，人民深受其苦，对这些军队极为痛恨。其时土匪亦是蜂起，掳人勒索无时不闻，商旅多受其祸。各县市具有野心的富商巨贾，借口自卫，继广州之后，纷纷组织商团，与广州商团勾结，图谋推倒孙中山所组织的革命政府。东莞县亦不例外，张励图、张科、李仕才等人时思组织商团，为增加自己武装力量，把持东莞称王称霸。适1923年六七月间西路军罗星渠团驻防莞城，他的部属四出勒索，一次拿着低折纸币到杂货海味恒安店买东西，强要十足通用，该店老板张老寿不肯十足收款，要按市价计算，军队不允，引起争执。军队即动手动脚打人，一脚将张老寿踢死，激起商人愤慨，并且人人自危。商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提出效法广州组织商团自卫，经三四日时间酝酿，多数赞同，便于1923年七八月间成立。成立时，各店户张灯结彩，以示庆祝，状甚热闹。

商团成立后，团部设在西北圩社学，名称是十二坊商团（十二坊是莞城工商业最集中的地区，范围包括水仙五坊、孙子庙四坊、竹排三坊，是从清朝相沿旧习称呼而来），设团长一名，副团长二名。团长张励图，是士绅；副团长一是张科，德安堂药材店经理；一是黄衍南，新华布匹店经理。下设一团总，专管武装队伍，由李仕才充任，李是遂心茶楼经理。下辖四个分队，第一

分队长何浩，第二分队长陈坚，第三分队长冼玉、袁满，第四分队长黄香，共有团员 120 余人（这数字是仅指已有枪械商户所出人数，当时还有部分商户已出钱由莞城商团托广州商团代买枪支，因枪未领到，没有出人），副团长黄衍南数月后即辞退不干，由李仕才继任。

评议会为商团议事机构，其组织设正评议长一人，副评议长一人，评议员十余人。评议员初期是关纶充任，他是英纶布匹店经理，又是团长张励图的襟兄弟，其子是商团团员，后因追打土匪失利，为匪抓去，花了两千余元银毫，才赎回来。关纶认为其子是为公被掳，商团不予负责，遂愤而辞退评议长不干。据闻当时各商店反对由商团备款赎人，认为此例一开，今后难以负担。商人再推举何月湖充任，何是天泰布匹店经理，副评议长为叶商延，叶是广永和果栏经理，评议员也都是商店中大户经理充任，为卢树坚、关湘南、何耐彭、叶旭章、张贺秋、陈任恒、阮伯英等人。凡商团征收一切费用，如团费、筹建炮楼费等，或与商户有关事项，经由评议会研究，推动各商户遵照执行。

莞城除十二坊商团外，还有城内商团和高楼三坊商团。城内商团团长是杜亦荪，杜是当地绅士，并非商人，杜的父亲在明伦堂任事，又是当时虎门要塞司令何镇的亲戚。副团长是陈鹤朋，也是绅士。团员初成立时仅 30 余人，后陆续增加约达 60 人，团部设在城内兴仁社学。高楼三坊商团长是张叶梦，他是鱼蜆栏经理，副团长张友生，他是劣绅张祝山的儿子，又一名副团长是张舫守，是聚利柴店经理的兄弟。团部设在省渡码头红楼，团员约有 40 余人。

莞城商团依据地区分成三个独立组织，是由其封建势力的矛盾所造成的。城内为县的政治中心，商户约近百户，为地主官僚豪绅聚居之地，这一带地方为他们势力所把持，因此城内商团团长均为绅士中人充任；高楼三坊为博厦张姓的势力范围，亦有百

余户商店，其商团长均为张姓族人充当；十二坊是莞城镇工商业繁盛地区，有五六百户，因此商团的组织比较庞大，亦较完整，团长除张励图是绅士（他亦是博厦张姓族人，其祖是清朝大官，其家族在莞城拥有铺产百余户，分租各商店，因此与工商业中人关系密切，他在当地有低头老虎之称）外，其余的人都是商人中的头面人物，各方为了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既得利益，商团遂不能统一组织而各自独立，每事协商进行。城内和高楼三坊两方面的一切行动，均以十二坊团的马首是瞻。

商团的团员是由各商店派人充当，多数是商店老板和“太子爷”（俗称老板之子），其次是商店的店员。规定每商店出人出枪，有的大商店出二、三人，出枪二、三支，中小商店几间合作，一出人，一出枪，有的出钱（二三十元或三四十元不等），交由商团集中买枪募人充当。其时商团宣布过买驳壳枪一支，要100元，配发子弹100发，据闻由广州商团代办是每枪配发200发子弹的。商团枪支多为驳壳、左轮等枪，长枪甚少，服装一律是黄斜陆军服，服装费由团员的商店负责，商团统一代办，那时“太子爷”的团员身佩驳壳或左轮手枪，穿着军服，随街行走，耀武扬威，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由于团员都是商店派人充当，日间在商店做买卖，夜间出队巡守地方，当时商团招募闲散壮汉一二十人，为守团部及跟随团长出入之用。为了加强商团战斗力，对团员施以军事训练，为避免影响营业，规定逢二、五、八下较场，圩期停止操练。操练时间为当天上午，将四个分队编为两组，第一、二分队为一组，第三、四分队为一组，这两组团员隔天轮流训练，初时找不到教练，由新记海味杂货店的“太子爷”陈槐担任。几月后雇请杜日华为教练，杜曾在地方武装义营当过排长，亦因资望不孚，几月后解雇，改请从军校出身的唐月池任教练。城内商团亦请何植任教练，从此每天早晨在西北圩社学的广场上、水仙庙高墩的广场

上操练。初时参加操练的人极为踊跃，由于大部分团员是“太子爷”，怕吃苦，怕早起，后来越操人越少，今天甲来，明天乙来，操练时停时操。

商团成立后，为了加强对莞城的防卫，在十二坊的四周建筑或加固炮楼，派第一分队驻守咸扒栏炮楼防守沿河一带，第三分队驻守卫屋炮楼，第二分队驻守阮冲炮楼，防守通往博厦郊外通道，第四分队驻守竹排炮楼，防守通往棠梨川郊外通道，并在各街道修建闸门，重要街道架设镶钢板铁闸，便利关闭。入夜各炮楼有人守望，外围闸门有人看守，又组织巡查队，并规定夜间10时以后，外围街闸关闭。驻守炮楼名为守望，其实团员在炮楼内聚赌吹鸦片打麻将牌，常常通宵达旦，亦有消夜饮醉，一睡天明。一次大合陶瓷店东的侄儿巡查后，饮至深夜，颇有醉意，身怀驳壳手枪回大芳园住家，行至偏僻处，为驻守该处的西路军缴去。他向商团团部报告，虽经多次交涉，卒因驻军矢口否认有其事，后来不了了之。商团中人认为驻军不给面子，摩拳擦掌，十分愤恨。

商团首领以保卫为名，拉拢商人组织商团，但商团开支甚巨，中小商店感到负担过重，时有怨言。当时商团对大商店头面人物阿谀奉承，每当这些人有婚丧喜庆事，商团派十名八名武装为他们守卫。一般小商店认为自己生意小，土匪不注意，出钱多自己吃亏，别人受益。如悦华糖果店老板阮少香对商团时有抨击，为商团中人所仇视，因他不愿交纳团费，商团即派武装团员，持枪到店，拿去店门；并将阮老板拘去囚禁团部内，后经多方央人说项，商团始允释人。经此一事，对商团不满的人噤若寒蝉，多不敢公开抨击。

当时莞城驻军乃是西路军罗星渠团，该团征收一种名叫经界费的捐税，每户约收三元，军队挨家征收，声称如不缴交即将门户钉封。市桥街同栈肉店抗不缴交，与军队发生争执，军队立即

回报上峰，加派兵员，以备拘人封铺，该店亦鸣警笛示警，商团闻警纷纷持枪赶来，占据商店两旁，并声称如军队拘人封铺，唯有武力对付。后经县长杨森出面调解事始寢息。自此以后，商团气焰更为嚣张，看不起西路军。

商团为了扩大力量，与莞城附近各乡联络，倡组联团，取得各乡赞同，遂于1924年六七月间成立联团，参加有乌石岗、主山、三坳、岗贝等24乡乡团，该乡团长是张玉生，是岗贝圩两盛榨油铺的经理。还有篁村一带18乡乡团，该乡团长是张仲旋，是地主豪绅，后曾任东莞县县长。江城洲一带乡团亦同参加。成立之日约有四五千人，集合在东门学宫前，整列队伍沿莞城繁盛街道巡行一周，以壮商团声威，十三坊商团长李仕才，骑马参加巡行，洋洋得意。联团总长为谢澳波。

1924年六七月间，莞城澳山渡满载粮商的稻谷驶往外处出售，刚出海口，为土匪骑劫，驶往排楼基直趋大汾乡。商团得讯后，立即召集队伍荷枪实弹渡万江河，前往追赶。由于水浅，船载量又重，以至浅搁，为商团追及。土匪在追兵来路旁麻地潜伏，待商团兵追至，开枪扫射，商团是未经临阵的乌合之众，一闻枪声，立即惊惶四散。英纶布匹店“太子爷”关球为土匪所抓，文华布匹店老板惊慌流尿，丢去枪，又脱去军衫军裤穿着民装潜回莞城，遂有商团“打甩裤”的戏语。其后英纶老板备款2000余元将儿子赎回，谷船因浅搁，土匪动不得，乃退回大汾，这船谷卒未为匪所劫。

1924年春夏之间商团副团长李仕才曾前往广州开会数次，后闻商团中人讲今年秋广州商团邀集各市县商团派队往广州会操，并领枪械，其后由于枪械被扣留，结果未有派队前去。

是年年初三晚，十二坊外围街闸关闭。适有一些军队要入街，叫商团开闸，商团开枪，军队亦还枪，一时枪声大作。商团人多且有掩蔽，军队不支退走。商团恃势出动人马，往妓馆烟馆

去搜查，捕抓西路军十余人，锁在水仙庙内。翌日十二坊商团召集城内、高楼三坊商团中高级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驻军，以便共同行动。当时，因各方利害关系，未能统一意见。城内方面莫雨庄、郑中平主张不打，认为难以抵抗军队，恐城内居民受害。十二坊和高楼三坊两方面主张要打，认为既已发生冲突，一不做二不休，可以战胜军队，会上争论不休，最后任由城内方面自由行动（意即参战与否由城内自己决定）。会后，张励图等人立即发出请帖，邀请各乡联团派队来莞帮助，其后联团陆续到来，声势壮大，派队分头袭击驻守城外西街观音庙、豪离贝陈家祠、迎恩街华光庙及王氏家庙的西路军。由于众寡悬殊，军队不支，退入城内坚守不出。是役互有死伤，商团方面被打死李初、刘统二人。商团此时企图消灭驻军，发动攻城屡攻不得手，相持数日；为了增强战斗力，还用钱请土匪刘伦、袁虾九部众来助战。刘伦驻扎在炮台街一带，守卫西圩，袁虾九驻扎在包爷庙一带，守卫北圩。

其时西路军在城内向商户勒索巨款，作为军饷，仅一当铺勒索400元，其余一二百元不等。冲突发生后，城内商团已将枪支、军服藏匿好，团员亦已逃走。待至初八初九日西路军从石龙方面调来援兵，刚迫近莞城时，与袁虾九匪部接触，土匪不支撤退。西路军援兵源源入城，火烧北门镇海街，数十商户被焚。南门驻军百余人开城冲击，各乡团见势不对，蜂拥而退，南门外岗贝圩十余商户遭抢劫火烧，东门罗村亦遭洗劫。此时商人极为震动，纷纷逃跑，“太子爷”的商团多不敢露面，只有坚弯乡团留守十二坊。乡团凭险据守，同时商人又央求普济医院德人缪加丽出面调停。西路军马旅长带援兵入北城时，为商团枪击下马，入普济医院医治。德人趁此方便，两方周旋，经几次讨价还价，卒从开始索取赔偿费40000元，遂减为20000余元赔偿作了。此笔巨款先由各银号垫付，后由各商户摊派筹集互还，当铺银号每户

400元，米店、杂货海味店每户100元，布匹店每户100余元，一些小户几十元不等。后闻该马旅长卒因伤重不治而死。

在此次团军冲突事件中，出现不少乌龙事情。商团中有地位的人，通过购买子弹大“打斧头”（即贪污），又将买入的子弹偷盗出去，再转手买入。后为人发觉，当事人推说是乡团所为，因各乡团和刘伦、袁虾九匪部确将领导得子弹，假手他人卖回给商团。及后当事人暗中将发出子弹画上符号，结果有符号的子弹，从子弹贩子手上又买回来，因此当事人以此证明子弹偷盗事不假。据祯祥布匹店老板忆述，当时缴交买子弹费甚巨，曾有一天征收三次，每次要缴二三十元。其时自己心虽不愿缴交，但又恐为西路军打人，必遭抢劫一空，认为既已洗湿头，唯有剃下去，忍痛缴款而已。

莞城商团与广州商团关系是很密切的。商团长张励图被推举为广州商人银行筹备委员之一，广州商团又派谢澳波常驻莞，以便联系，并被莞方推为联团总长。据闻商团叛变前，东莞商团副团长李仕才曾到广州开会数次。

莞城商团经叛变赔款后，各商店的枪械均送往农村不敢存放在店内，避免惹事。当地官府受了黑钱亦不深究。此时张励图辞去团长职务，退居顾问，实质还是他把持的。当时推举宽裕榨油店经理卢展逵当团长，及后卢见势不对，不敢恋栈，辞职不干，并标贴辞职布告，大意有云：余经营于穗、港、沪之间，无暇在莞，因而辞职等话。自此以后，商团便销声匿迹了。

（张创业整理，1965年）

商团事变时石龙商团活动点滴

陈天杰

广州商团叛变时，外围的东莞县石龙商团，因有陈廉伯的妹夫在这里开设裕泰银号，故也大有活动。笔者和这银号的黄晗，及当时活动的重要人物陈永，因亲谊关系，时有过从。兹特忆记其当时情形，概为记述。

一、陈廉伯在石龙的布置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变。各地商团，有不同程度的附和，甚至有欲开到广州壮大陈廉伯声势的。早在是年5月间，广东全省商团代表在广州开会以后，陈廉伯就作了部署。除广州以外，各县市镇有商团的地方，陈廉伯都以保护商民利益为名，四处联络；若有他的心腹或亲朋故旧居留或经商的地方，更不放过。东莞县石龙镇就是显著的一例。陈廉伯的妹夫黄大，在清末时已在石龙经营了一间裕泰银号，这是石龙镇的一家大银号，由于有陈廉伯时予资金上的支持，运筹灵活，颇获石龙各家商号和地方绅耆的信任。黄大其人，外表沉默温和，却颇工心计。陈廉伯既存心以全省商团的力量有所作为，于1924年初，便和黄大（黄在广州的家，就是逢源沙地陈廉伯的大厦之一部，黄经常来往于广州石龙之间）商定，要在石龙商团做做工夫，并注意东莞县城商团的主要人物。是年5月在广州召开全省商团代表大会，选出了陈廉伯为全省商团联防总长，议决了许多增强商团力量的方案。石龙商团是由副团长叶静山代表出席。黄大先将叶拉拢过来，当叶到广州时，黄大即陪同往晤陈廉伯。在开会期间，陈廉伯不时密邀多人到家密谈，叶也是其中的一个。大会开过之后，黄陪同叶一起回石龙，他们就加紧活动，除密切查探东江陈炯明

所部调动情况外，还经常与广州的商团总部联络，联络的方式多是用商业行情的传达来作掩护，或拍电或邮函均有，有时也派人传递口讯。

二、石龙商团的基本情况

这里，先述石龙的地位和商团的一些基本情况。石龙是广东东莞县的一个商业繁盛的大镇，位于广九铁路樟木头站以西、石滩站以东，有石龙桥为广九铁路的主要通道，于军事上为孙、陈两方必争的要地。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后，盘踞东江，虽不时说打回广州，但主要在外围布置，在东莞曾收买东莞股匪首刘发仔，经常在东（莞）增（城）一带出没劫掠，虚张声势。时东莞全县还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府辖治，1923年孙中山出师东征，时以石龙为大本营行营所在地。石龙时常有军事争夺、股匪骚扰之忧。居民处在惊涛骇浪中，兴嗟抱怨，所在难免；特别是拥有财产而已就地落业的商家们，嗟怨比诸一般人更甚。黄大等都是商人，颇知商人心理，于是不时和石龙商团正团长许劲卿（石龙镇隆大布匹店老板）、副团长叶静山（一家绸缎店老板），以及裕泰银号司理吴仲弼（吴也是陈廉伯亲戚，裕泰本为黄大独资开设，因其在广州还有许多生意，故由吴当经理，黄只经常来往于广州石龙之间作照料）、商会会董张励陶（出席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东莞县商团代表）、张成祖、李才等人筹商所谓“保商卫家”、“维持地方”的方法。张、张、李等三人，原是东莞县商会、商团负责者，在石龙亦有不少财产商号。是年因驻东莞城的桂军刘震寰部，与商团冲突，刘震寰曾下令通缉张、张、李三人。迨后东莞县城德国教堂一个牧师名茂加礼者，代向刘震寰请求，乃获取消。张、张、李仍恐吃亏，乃避居石龙。彼辈日夕聚谈，遂有“官之卫商，不如商之自卫”，以及“商人只知自善其身，也不能保护本身权益”的论调，进而便和抱有野心的陈廉伯勾搭起来。

石龙镇的商团，是早在清末期间，由石龙的亦商亦绅之叶石朋、苏杰卿、陈某（忘名）等所倡办，旨在维持市面治安，使商店能安心营业，尚无其他野心。因此从民元而迄民十三年（1911—1924），大抵都是这样。到了1924年5月，叶静山代表石龙商团、张励陶代表东莞县商团参加了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回来之后，叶与正团长许劲卿等筹商之后，即逐步用石龙商团团部名义，与防军许廷杰团价领步枪、驳壳枪等共200多支，子弹3万颗。旧时代，防军出卖枪支是惯见的。当时枪价似乎有的每支120元，有的100元。子弹价值，看种类而定，多少未详。从此，石龙的商团，由原有的驳壳、左轮、长枪（包括六八、七九、川田、毛瑟等）总数40多支，扩至将近300支，人数则按商店大小、营业性质派出店员，或雇用民团分子，此种雇用者，只担任警戒任务，平时不到的。人数共200多，编成四个队。

三、活动情况

石龙商团正团长许劲卿、副团长叶静山、陈廉伯亲戚吴仲弼等，既由叶静山带回同陈廉伯讨论过的石龙商团活动的方策，便和张励陶、张成祖等筹商；为了更得地方大户助力，又与东莞县绅陈晴峰搭上，共同筹商商团应付局势办法。陈晴峰富资财，善投机，读过多少书，工心计；在旧社会那地主、富豪、官僚、劣绅、匪霸所左右下的乡村市镇中，可称得上有地位之人物。他们几个人，频频密谈，无日不在紧张布置。到了10月初，驻防石龙的许廷杰团忽通知石龙商团，说已奉令移防，立即行动，但未有别的部队来接防务。石龙情况，于是顿形紧张。因其时陈炯明部的熊略、洪兆麟和陈部收编东莞、增城股匪袁虾九、刘发仔等，驻在石龙以东一带地方，如知许团他移，难保不到石龙来劫掠，此是一般商民所引为忧虑的。但许、叶、吴、陈、张等则毫不介意，不时邀集三五大商或商团团董、地方绅士等，在商团部

内或大店号的小客厅聚谈（石龙较大的商号，每设有小客厅，供老板们聚谈及招呼老主顾客人用）。

一日，叶持一电报稿到裕泰晤吴说，已照计划拟定由石龙商会、商团名义发出的电稿，那电稿的内容是：全省商团联防正副总长，是由本年5月全省商民代表大会选出，任期未满，不能改选；如强要改选，无异否认5月的大会选举合法，这更谈不到改选，改选是违法，请求各界主持公道，勿任枉法等语。接着叶又说，接广州商团总部谭师爷（指谭荔垣）私人函，商团军械被扣留事已由日本领事天羽两访廖仲恺，廖允商量。吴答说：陈廉伯不喜欢日本领事斡旋此事，主张由商团总部的总教练官徐馥斋（东北籍旧军人）向胡汉民交涉。吴还说：陈廉伯还坚持如政府不发还扣械，政府新成立的广东中央银行的钞票，便拒不使用。谈话时黄晗也在场，事后对我说过的。

约在10月五六日时，裕泰成了吴、叶、陈、张等密谈会所，有时谈后分别外出，有时个别聚头，在这时期的晚间，吴曾一连写了五六张信，是由叶到时来取。内容不知，但总是为商团的事。而陈廉伯的妹夫黄大，突从广州到石龙，在裕泰约同叶、吴等密谈后，三人同往石龙镇尾土名新围的德国教堂会晤一个德国籍教徒谦娱（译音）。从这时起，裕泰成了谦娱、叶、黄、张、陈晴峰等的常聚地。在一次密谈两小时后，黄即搭车往香港去，过了几天，黄又从香港返广州（这次返广州曾偕同陈廉伯的姨太同行），再到石龙。行装甫卸，陈晴峰即向黄晗报知说：“接到消息，九江黎鼎臣率领商团百多人已下封备的轮船，正将升火开往广州，但被李福林部李群的军队阻止，勒令不准开行，否则必在两岸放枪夹击。黎被逼不敢开动。”这时，叶、陈、谦、张的接触更形频繁。

一天，叶又到裕泰，在皮公文袋里取出一大束复写的《广州商界同人通电》，内文是请陈炯明回师驱逐祸粤的客军和“引狼

入室”的孙文，电文没有团体名衔，也无人名，更无盖章。黄、许、吴、陈、张等看过了后，商量如何散发办法，而叶已先找到了一些人员负责，除在石龙散发一部分外，并邮寄各地约 200 份。越日，叶更复印邓本殷、熊略、陈章甫等指责孙中山先生“纵容”共党、客军的通电，对黄说，仍是依前办法散发，于双十节前，黄即返回广州。不久，石龙市面急传陈炯明军队已由惠州进占东莞县城，陈家军向西推进。照常理说：既有谣言，市面的商团警戒，应要加强，但实况却反是。叶、吴、张等并不因军事波及石龙而紧张。黄、吴经营的银号，本是大生意，有军事风波，原应畏忌的，但也没有丝毫作防避的准备，他们频出频入，所紧张的不在生意上面，而广州、香港、汕头等地拍来的商业行情电报，几乎无日无之。这里所说的商业行情电报，当然不是真的为商业行情的交换，实是陈廉伯和汕头刘焕拍来的政治行情电报。据黄晗在裕泰时曾收过许多电报，却是明码的。但译时的加减，他却不明，因此内幕情形，未能详知。在谣言炽盛的三数日中，吴曾一度往广州，返石龙后，即与叶、许、张以及陈永（陈晴峰的侄儿，经常往来于东莞城、虎门、广州的，其时陈晴峰去了香港，嘱咐陈永代表他与黄、叶等联络）等不时密谈，商量如何配合陈炯明军事行动的事。陈永旋即被派到香港转赴汕头，其任务系奉命与刘焕（时刘焕居汕为陈炯明的谋士之一，刘焕与陈廉伯私交极好，曾合伙做过私铸银毫勾当）联络，任务是看广州的商团情况如何，孙中山先生统率的滇桂军对商团态度如何。万一有机可乘，陈家军即向西进兵，尔时石龙商团、商会、绅士们，则冒用什么全体商民等名义，欢迎陈军。不料广州商团叛变，不堪一击。之后，陈廉伯逃跑到香港，也无法再图另举。陈永在汕头呆了一月多，也回香港了。这是陈永和笔者说过的。

到了 10 月下旬，许廷杰团又由石滩开到石龙，并即召集叶江宁等一班商团团董们，宣布广州商团叛变已平，各地方的商

团，应遵照政府命令改编，不许妄动；并说东莞城的十二坊商团黄衍南、谢波沃等店，纵容商团与地痞，焚烧店屋数十家，已派兵镇压制止，石龙商团，不可被人唆惑。黄、叶、许、吴、张等知无可为，迫得在懊丧中结束了他们替陈廉伯效力“立功”的妄念。他们更作贼心虚，就在十月杪，先后逃往香港暂避去了。

(1964年)

范石生与广州商团事件

万寿康*

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15辑第98页，李朗如等《一九二四年广州商团事件见闻》一文，内有“另有一说，陈廉伯的阴谋是外则勾结英帝国主义，内则以商团为基本团队，同驻粤客军中势力较为强大的滇军杨希闵所部师长范石生、廖行超密切联系，筹谋倒孙，夺取广东政权，自为省长，因而急运枪械。事为孙大元帅所知，召集商会商团要人和范石生、廖行超等座谈，明斥商团此举之非。时范、廖分坐孙大元帅左右，孙直指范、廖说：‘我不怕商团联合左右两只老虎向我反噬’，劝商团解除武装，安分守业，众默默无言，会毕各散”。

据笔者所知及所掌握的一些原始资料，同李朗如等所述有异，兹分述如次，以供参考。

一、范石生调停械案的经过

范石生当日在广东是滇军第二军军长，据1924年12月除夕出版的滇军第二军战史记载：“8月17日范军长自惠州驻所归粤垣，而商团购械案适起……8月7日挪威轮船（按：应系丹麦轮哈佛号——编者）自欧洲来，军械累累……枢府侦知之，恐轮舟漏运，……乃令永丰兵舰监视之，迁之于黄埔。商人有好事者，酝酿罢市以要挟政府，陈廉伯及佛山团长陈恭受欲外结陈炯明以颠覆枢府，坚持还械议。24日通电驻粤客军，明粤商团无排挤客军意。翌日，广州商肆突然闭市，佛山诸埠亦然，人心恐惧，

* 作者当时是范石生侄范家康同事，稿据范家康所藏资料写成。

险象环生，范军长立命驻省之警卫队出维治安，人心稍安，且电商团苦劝复业。27日许崇智、刘震寰等，劝商人开市，弗听。27日兼卫戍司令杨希闵、广东省长廖仲恺会衔布告，苟不复业，将置罢市商肆于军事范围之下。亦弗听。28日大元帅孙公予范军长令立调处，范与第二师长廖行超出应命，军参谋长李宗黄与廖部参军王西园奔走疏解竟日夜，反复劝导，告以勿为奸人鼓动，致坐令璀璨之广州商肆，顿成糜烂。宜俯从范军长意，俾政府早日还械，商人从之。市将启矣，而公安局捕杀邹竞先，议又变。范军长忧之，邀商团六代表至军部喻以30日全市复业。”据此则范石生、廖行超出面调停械案，是在杨希闵、廖仲恺8月27日会衔布告之后，形成僵局，孙大元帅始命范、廖出面调停，结果双方签订条件。兹将调停条件列后，按此六项条件，同《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04页卫恭所记《商团事变前后见闻杂记》所载之六项，中间有出入之处。卫恭所记为9月29日，时间不符，应为8月29日，下列六条是照录当日铅印原始文件：

一、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按卫恭所记无“并发还封产”一句）

二、范军长、廖师长担任向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同卫恭所记文字有出入）

三、商团联防改组应受省长节制，其细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善被驳之点，由军、师长出而主持公道，要求立案。（卫恭所记仅有“商团联防改组，受省长节制”两句。）

四、各商店须一律于廿九日复业，军队于商店复业后立即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回省军队，一律请帅令各回本防。（卫恭所记为“各商店即日复业，军队同

时解严”。)

五、商团报效军费五十万元，于领械时缴纳。

六、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成立，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卫恭所记是“商团联防改组完毕，由范廖担任将全部军械点交商团总所”。)

以上六条经大元帅俞允，交范军长、廖师长全权与商团方面首领会商妥协，各签字为信。

范石生 廖行超

杜绶英 邓介石 关劲武 黄叔明 邓佩芝

陈兆均 郑杏圃

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上述条件签订后，广州 30 日即全市复业。孙大元帅由韶关电告胡汉民、廖仲恺取消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并发还财产。并于 9 月 19 日，由大本营秘书处将此事函知范石生，并命令范石生、李福林、廖行超负责，按照政府所订手续，次第发还。见下录三则原始文电：

一、广州胡留守廖省长鉴：仲恺电悉，陈廉伯、陈恭受既经通电拥护政府，着即取消通缉，并发还财产，仰即由留守府令行可也。文印

二、径启者：取消陈廉伯、陈恭受之通缉令，本日奉帅座谕：已令广东省长即行遵照执行矣，相应函达查照，并盼转告为荷。此致

滇军第二军长范

大本营秘书处启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三、前派范军长石生、廖师长行超与商团接洽发还枪械案件，现商团已履行第一项手续，并应遵照民团条例改组，改组后，着由范军长石生、李军长福林、廖师长行超负责，按照政府所订手续次第发还。此令！

范石生在签订上述六项条件前，既得到孙大元帅的俞允，签订后又得到孙大元帅的指令，会同李福林、廖行超负责按照政府所订手续次第发还。在广州方面，并经胡汉民答允可以实行，军械也可以移归调入共同保管，并且写信给范石生，如商团将枪支借给政府北伐，也可以全部发还（见下商团信件）。商团方面向范催促后，范于9月12日函告商团，还械问题迁延的关系，是因为陈廉伯的通电没有发出，既经胡汉民转达帅令允许全部发还，则为时很快，并且将胡汉民写给他的原信也检交给了商团。9月13日范石生又函告商团，说他愿派兵船同商团代表向政府取回枪械以交还商团，日期不过五日（仍见下商团信件）。范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单纯，认为就此可以解决。殊不知胡汉民事后又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是械案问题演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二、胡范条件不一致与范石生的处境

胡汉民在范石生原订六条的基础上，又重新提出了新的六条，其中前四条为手续问题，后两条承认租捐一月，及承认公债两百万元，是新增加的条件。

- 一、陈廉伯悔过呈文。
- 二、商团遵照民团条例改组。

三、商团、乡团呈报购械数目，由政府查明核领枪械人，联保具结。

四、报效北伐军费五十万元。

五、承认租捐一月。

六、承认公债二百万元。

（按此六条原始资料之笔迹，似为汪精卫亲笔所写。）

上述条件，根据胡汉民亲笔写给西路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一封信，说是商团到汪精卫处已经承认，并商谈发械手续问题，先发省城的枪支而后及子弹，四乡则由总公所呈请政府发给护照后，并由政府派员监视发放，亦是先发枪支而后及子弹。照胡汉民的说法，在14日的中午，商团因为得到范石生的通告后，说是五日内全部发还，所以商团即要求取消前说，并批评范石生全不讲手续与条件。而商团方面呢，则抓住范石生五日内发还的信件，更要求实践前言，于21日以前，将军械全部移归范、廖两部暨商团共同点验保管，以便照约履行。这明明是给范石生一个难题，并责备范、廖乃至等于欺诈。更由团友署名写给杜英等六代表一封信，还说他们是被团友责难，“饰无可饰，诿无可诿，辩无可辩，诉无可诉”，作为向范石生交涉要挟的材料。同时刘震寰也写给范石生一封信，说范这种做法是犯众怒，风波甫平，又将其掀起。而范石生呢，则自从胡汉民提出新的六项补充条件后，上下两难，两方面都不讨好，由下面的六封信中，就可以看出当日范石生处境的困难。

胡汉民给刘震寰的信

显丞吾兄总司令惠鉴：今早商团来精卫处，承诺弟所提六条件外，更商发械手续。先发省城之枪支而后及子弹，四乡则由总公所呈请政府发给护照，并由政府派

员莅乡监视发给，亦先枪支后及子弹云云。迨午间，渠等得小泉（按即范石生号）兄通告，谓五日内全部一气发还，遂又来要取消此说，原来小泉兄全不与讲手续与条件，实在难行。故今日专函托兄代达一切，大局能多得好处，岂有小泉兄不愿之理，唯太爽快，则偏于一方面，而忘却他方面矣。今请兄赶速为小泉兄言之，使亦为同样之提议，盖补开条件手续亦非食言，前日弟函固有此诸点也。其条件手续不宜互有参差，使人投机取巧，而弟等所以断断如此者，亦岂乐与乡人为难，盖纯粹为公家、为大局计耳。小泉急于解决自是为公，然实未周全妥当，果小泉兄必固执不改，则弟不敢与闻此事，并不敢与闻后方一切任务矣。专此即颂晚安！

弟汉民手书

九月十四日

西路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给范石生的信

小泉吾兄鉴：商团械如何发还，条件、手续，兄应与精卫、展堂妥商，免有参商，较易就手，弟前次与兄言之，盖不欲兄犯众怒。詎风波甫平，兄又掀起，弟恐从此多事矣。兹将展堂致弟与组安函夹上，请查收，此事如何，此项条件能否办到，希立覆一函。弟能为力处，无不竭力相助也。专此并候勋安！

弟寰启

十四日晨

粤省商团总公所给范石生、廖行超的原信（第一封）

小泉军长、品卓师长公鉴：敝团军械前被扣留，辱

荷两公出任调停，妥订条件，幸告解决。方谓风潮平息，团械可望收还，乃一月以来，重劳两公奔走磋商，费尽唇舌，敝团以信任两公之故，劝谕商民首先开市，团长通电亦全照政府拟定原稿发出，改组各节亦再三呈催省署，听候批示办理。是敝团所以委曲求全，迁就政府者，无非以两公威德，商民素所钦崇，知必能保证实行，挽回劫运。惟为慎重起见，故要求政府先将全部军械移归调人公（共）同保管，以表诚意，亦经胡总参议对军长答允实行，并承军长于九月十三日亲函表示，期以五日务将团械发还敝团收领。现五日之期已过，团械不特未见发还，并且移交调人公管之说，亦未能实现。而外间盛传敝团之械已分散各军，某领若干，某领若干，言之凿凿。各团友闻讯愤激，痛不欲生，责问之词，纷如雪片，万一因此激动风潮，宁不辜负两公调停之初心及维持地方之盛意？用特具函声明，务请实践前言。尽于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将敝团军械全部移归两公暨敝团公同点验保管，以便照约履行。如不获办到，则是政府显无诚意履行还械条件，鄙人等唯有引咎解除代表职务以谢同人，特此陈明，伏维公鉴。此颂勋安！

粤省商团代表 关劲武 邓介石 黄叔明 邓佩芝
杜绶英 陈兆均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粤省商团总公所给范石生、廖行超的原信（第二封）

小泉军长、品卓师长麾下：本月十九日曾上一函，请于二十一日以前将团械全部移归两公暨敝团点验保管，否则鄙人等惟有引咎解除代表职务以谢同人。现计

逾期多日，而敝代表等前函所要求者，仍付诸渺渺茫茫之数，此则大惑不解者也。查调停条件总括一节内载，以上六条，经大元帅俞允，交范军长廖师长全权与商团方面首领会商妥协，各签字为信等语。是还械办法，大元帅付全权于两公，自应照约履行，以昭大信。乃自八月二十九日双方签订条件后，七日发还之说，既未实现，至两星期而寂然，再候至三星期而乃寂然也。然敝代表等往返磋商，疲于奔命，犹不惮委曲求全者，深信两公声威崇隆，信义昭著，断无反汗之理。今事将匝月，而团械发还托诸口惠，签定条件，等于戏言。敝团同人固愤激万分，而代表等亦备遭责备，咎无可辞。独是两公全权办理此案，竟贻有初鲜终之诮，政府威信何在，两公信用奚存？此则不能不追溯经过情形，披露政府反复真相，冀有以谢我同人者也。念自八月二十九日双方签订还械条件，即日由敝团刊布传单，通知各商店一律复业，罢市风潮因此解决。而事前回省添防军队，延至本月有奇，始渐次撤退，现又纷纷增防，是对于条件第四项，敝团履行至速，而政府则旋履旋翻，此失信者一。至联防改组一节，经九月十一日呈请省长公署核示办法，迄今事阅两星期，始奉指令知照，而又囑向民团统率处呈请核办。是对于条件第三项所谓细则于七日内公布者，办法既不相符，而所云师长、军长出而主持公道要求立案者，又等诸空谈，此失信者二。敝团长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政府，其电文诸多挑剔，往返磋商，延至九月十五日，卒照政府拟定之稿发布，亦经登诸报章，是于条件第一项通电手续完全办到。乃九月十二日接军长来函内云：前还械事迁延至今，实因陈廉伯通电未发出耳。兹幸胡总参议转述帅令，已允全部发

还，为期至快，届日石生当代表为负责办理也。同日又由贵军长交出胡总参议致军长一函，内云：“商团既不愿借枪政府北伐，亦可将全部枪支发还”各等语，信据具在，而消息渺然，此失信者三。又九月十三日，接军长还械确期函内云：石生愿派兵船，同商团代表，向政府取回全部枪械，交还商团公所，日期不过五日等语。计今何止五日，且十日有奇矣。而所谓派兵船取回全部枪械者，盖付诸子虚乌有之列，此失信者四。又九月一日闻奉帅令，将此项团械全数交由李军长福林暨两公共同保管，迨于九月二十三日，又闻帅令改交杨、刘、谭、许各总司令共同保管各等因，是否见诸事实，尚待查考。而对于保管一层，数日之内，已节节更易，则其无诚意发还也必矣。罔民之术，愈出愈奇，何以昭信于天下，此失信者五。以自称提倡民治，扶植民权之政府，乃尽力摧残民治，压抑民权，以受与全权办理还械事件之师、军长，乃至等于欺诈。以至还械无期，此则于敝团自卫前途至为不幸。代表等备承团友责难，饰无可饰，诿无可诿，辩无可辩，诉无可诉，惟有解除代表职务。还械与否，一任政府操纵，此后更不敢多所饶舌，亦不再事磋商。但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心所向，即无意所归，此中枢机，历无差误。且凡物压力愈甚，则反力愈高，将来争持至何程度，敝代表等概不负责。戆直之言，尚希鉴原。除向团友宣布暨登报表明外，特函达查照，诸惟谅解，此颂勋祺！

粤省商团代表 邓介石 杜绶英 关劲武 邓佩芝
黄叔明 陈兆均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粤省商团军全体同人给六代表的信

代表诸君公鉴：吾侪之械被政府扣留，瞬将两月，诸公日日奔走于政界之门，极尽其哀恳求怜之能事，而械仍未还也，调停者自调停，分械者自分械，诸公其尽在梦中耶，抑明知故与政府相周旋，以懈我全体之志耶？同人等以索械重责付托于诸公，应如何瘁厉进行，与政府磋商切实办法，苟无办法，即应将内中原委宣布大众，引咎辞职以谢同人，来去光明方为正当。乃既不能达得械之目的，又不为解职之声明，日日受人愚弄，而不知歧路徘徊，坐使阴谋者得遂其私，同人等日夜焦思之目的，终无达到之望。试问诸公等何以对同人，何以对总副长？今请与诸公约，现时械案交涉至如何情形，军械是否尚有归还之希望，务请克日宣布，以定从违。若再依违其间，同人等誓本械存与存，械亡与亡之旨，以与诸公周旋，勿谓团友为可欺也，即颂公祺。

粤省商团军全体同人公启

范石生在胡汉民与商团交相责备之后，答复商团的信件，除解释商团所提出的增防问题与枪械保管问题外，也指出商团方面所应负的责任。如联防改组问题，原定于8月29日，而商团迟至9月11日始呈请省署核示，是商团违约，所以5日内不能发还的责任全在商团。另外更明白的指出除改组问题外，政府想借械一部分的问题，与报效军费的问题，也是重点之一，见下录范复商团的回信。

范石生复商团的信件

商团代表诸君鉴：读九月二十八日手书，以反复诬

政府，以欺诈诬石生等，不胜诧异。石生等忝绾军符，行阵之外无所参与。此次广州因扣械事件，酿成纠纷，石生等受帅座之命令，应商民之要求，出而当兹难局，但求无乖大义，不惜委曲求全。乃于黽勉从事之际，无端受此诬谤，不能不将真相详述，以告国人之关心此事者，不仅为诸君发也。案诸君所藉以为反复欺诈之佐证者，不外函中所述五端，请分别论之如下：（一）政府前以商团运动罢市，深恐歹徒乘机作乱，危害地方，故调兵防护。自开市以后，各军已奉命陆续调回原防，广州市内安谧如常，所谓纷纷增防，真是向壁虚造。近日帅座亲率诸军北向讨贼，对于东江军事已发明令停止进攻，诸君不于此时谋所以济国家之急，与恢复本省之和平，乃故作危词，引人疑骇，其意何居？（二）商团联防改组附以期日，原所以促其成立，顾条件订于八月二十九日，而联防改组直至九月十一日始呈请省署核示，是七日之约诸君先不依照，更何能以愆期责人？且省署既已颁布民团条例，设立民团统率处，委任民团督办，不但已有办法，且已有负责之机关，则其囑向民团统率处呈请核办，事属当然。倘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石生等何惜口舌之劳，以期早日解决。乃诸君子于改组手续自不履行，而反指石生等为空谈，抚心自问，其亦有所不安否？（三）陈廉伯、陈恭受通电发出之后，政府即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此事完全办到，无丝毫失信。石生等九月十二日之函，说明二陈苟有真正觉悟之通电，而帅座对之未能霁威息怒无他，一切更无从说起。若通电既发，赦令既颁，则发还枪械之手续可以开始商订，而发还枪械之日期亦可以确定。是通电之结果可以邀取赦令及开始发还枪械之进行，绝非即可以邀

取发还枪械，其理至明，何至误会。（四）石生等九月十三日之函，以为发还枪械之手续至为简单，五日之内必可竣事，初不料即联防改组一节，诸君已迟至九月十一日始呈请省署核示，其他事可以类推。以手续之纠纷，政府时日因以迁延，何能独归罪于石生乎？（五）枪械发还以前如何保管，是政府分内事，以郑重保管疑为无诚意发还，设想离奇一至于此！以上五者，事理至明，无待深辩。诸君所指为失信者非无即妄，则反复欺诈云云还请诸君自受。平心而论，此次发还枪械事件，所以纠缠至今未得解决者，除改组问题之外，政府以北伐事亟，商借枪械一部分，及商报效军费亦为一原因。夫北伐为民国盛衰安危所系，诸君具商民资格，同时具国民资格，卫国之诚当尤烈于自卫，对于政府之要求慨然承诺，固急公好义者所宜尔，即使不愿，政府亦未尝相强。以此之故，往复商榷，累稽时日，诸君未尝不可见谅于团友，何至即出此决裂态度乎。议者谓诸君殆别有用心，不然何以自解。至于函中肆口诋訾，挑拨恶感之语不一而足，石生等不必以恶声相加。

由上面这封信便可以看出当日范石生对此事处境的困难，不像以前勇于负责，而是推卸责任。因为胡、范条件不一致，所以当时就有人说范左袒商团，赞成罢市。实际范石生并不赞成罢市，只希望将这件事情和平解决。在覆商团信中说：“……受帅座之命令，应商民之要求，出而当兹难局，但求无乖大义，不惜委曲求全。乃于黽勉从事之际，无端受此诬谤，不能不将真相详述，以告国人之关心此事者，不仅为诸君发也。”同后来10月18日所出的布告：“……风潮甫息，发还枪械延期，调停苦衷纯以大局为前提，免致各走极端，变本加厉。苟使地方不糜烂，商民

不受痛苦，本人虽牺牲一切，亦所弗恤。此责言之来，所由引过不遑者也。”又由其1924年10月9日亲笔所写的醉挥书中就更明显的看出了这个问题。醉挥书中说：“……此次风传将罢市，又有诬石生赞成罢市……缘本军无隔宿之粮，靠本市逐日收入以为生活……商团如再罢市，我部将饿死……”这些话也是当日的实际情况。因为当日各省在广东的军队，政府没有发给足够的款项，全靠在防区内的捐税来维持。商人罢市，无捐税来源，影响到军队的生活，范石生当然不赞成罢市。至于说到商团同范石生“密切联系，筹谋倒孙则非事实”。不过因为胡汉民没有照他同商团所签订的条件实行，看来他对胡汉民是不无意见的，在他总认为胡汉民违约。胡范两人各有各的立场与看法，因此，范石生同情商团未能照约领回枪械，也是事实。至于商团方面呢，陈廉伯、陈恭受等，不仅反孙，而且还要反共，由其致雪梨中华总商会的电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兹照录两则原始文件如下：

范石生醉挥书

第一次罢市，诬廖师长中立，此次风传将罢市，又有诬石生赞成罢市者，人之多言，至于如此。缘本军无隔宿之粮，靠本市逐日收入以为生活。石生而赞成罢市，不啻自请绝粮。人纵庸妄，何至于是？又有谓石生不赞成，则商人万不敢罢市，夫商人果畏强力，则前次之军事处分，久已屈服，又何待六条件之签订乎？政府亦非畏强力者，如其畏之，则闻石生赞成之谰言，当早解决，何待今日？商人受屈，无可告诉，当然只自杀的抗拒。条件失效，不自今日，决心罢市，已将半月，皆石生以友谊的哀求（商团如再罢市，我部将饿死），以为曲突徙薪之谋。言者不察，而以此相诬，实太不近人情，而与事实绝对违反矣。石生对人无迁，自第一次罢

市，即有多数商团中人见访，皆以曲突徙薪之法相喻，晤面之人不少，可以复按。小人终于为小人，多见其厚诬贤者而已矣！因慨夫人心之险薄，特书贴座右，聊以自白耳。

范石生醉挥

十月九日

广州商团联防总部致雪梨中华总商会电

雪梨中华总商会鉴：八月四日电悉，孙派代表调停，敝部委曲求全，先行开市，械仍未还，民愤益甚，孙文决行共产，赤俄惨祸即在目前，民商团一切牺牲在所不惜，乞鼎力援助，以救全粤。

三、二次罢市的情况与范石生的态度

根据滇军第二军战史记载：“……政府还械久之未决，9月3日江浙战事起，18日大元帅孙公北伐督师赴韶关，而团械之案悬而未决，商团中人鼓动二次罢市甚力。范军长以还械已得帅座之许，则事当由政府派员专理之，10月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兼长广州市政厅，受命主还械事，9日商团武装出巡，张布告通衢，托词自卫，语意多不逊，形势益急。福林运械自黄埔归，返还其大部。翌日国庆，有共产党人率学生及工农团军游行于市，谓示威运动，将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商团中人揶揄之，双方仇视，商团遂出枪击游行，伤数十人，一人死后裂其腹，肝肠出于外，馘耳，去其势。舆论大噪，翌日，而复罢市。西关一带栅栏遍布，布以铁网，通以电流，交通梗绝，明抗政府。李宗黄出席商界会议，苦劝复业，垂涕而道不听。……”

按李福林还械日期及枪弹数目，《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89

页谭礼庭谓是 10 月 9 日。所还子弹数目，李朗如等所述 20 万发，实际确数是 124552 颗。10 日商团枪击游行队伍后，广州即二次罢市。并由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名义，发出紧急通告，要各商号坚持到底。兹照录该会当日铅印通告原始文件如下：

扣械仍未解决，切勿冒昧开市

顷接商团通告，政府发还军械，实得长枪（马枪在内）贰仟壹佰肆拾玖杆，短枪驳壳壹仟捌佰伍拾壹支，子弹壹拾贰万肆仟伍佰伍拾贰颗。尚欠交长枪贰仟柒佰余杆，短枪壹仟壹佰余杆，子弹叁佰叁拾余万颗，所差尚巨等语。查我商人全省罢市，要求发还完全团械，及豁免苛捐，今团械虽还一部，但枪数未及十分之五，弹数未及十分之一，即未完全发还。是第一条件犹未臻妥协，当然遽难开市。特此紧急通告，希各商号继续坚持，照旧罢市。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把定坚持到底之旨，勿亏为山一篑之功。嗣后非有敝会正式及专人派送之传单，切勿开市，以杜伪冒而昭划一，是为至要！

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 启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日

据上述两次罢市后，范石生还派过李宗黄去出席商界会议劝导复业，又写信给商团不要使广州糜烂，要求商团合集商会、商会联合会、三团联席会议商讨复业问题（见下商团复信）。而商团 10 月 11 日写给范石生的信，对复业问题不提，仍然要坚持还械，并蓄意挑拨胡、范关系。如信中所说：“……似此情形，显系有人蒙蔽帅聪，希图播弄，藉便私图，公等以首善屏藩，勋隆望重，詎宜任令奸谗，陷政府于背信失义之途，贻公等以为德不

卒之谓……”显然是有企图的一种挑拨言论。10月13日给范石生的信，又说不还械则所谓“……商民之公愤难平，劝导之词即无从而入……”，更是要挟走极端的一种说法（见后系两封原始信件）。至于三团体开会的结果如何，还没有函覆范石生，韶关孙大元帅决定剿办商团，收缴枪械的电令下来了。

粤省商团总公所给范石生的原信（第三封）

筱泉军长大鉴：敬启者，此次敝团购械被政府误会扣留，迭荷我公奔走调停，代恳政府明令发还，无任钦感。惟昨日交付枪械，仅得步枪同马枪贰仟壹佰四十九杆，驳壳曲尺等短枪共壹仟捌佰伍十壹杆，子弹壹拾贰万四千五百五十二颗，是枪械发还未及十分之五，子弹发还未及二十五分之一，与原额相差甚巨，显与大元帅明令完全发还不符。似此情形，显系有人蒙蔽帅聪，希图播弄，藉便私图。公等以首善屏藩，勋隆望重，詎宜任令奸谗，陷政府于背信失义之途，貽公等以为德不卒之谓。用敢具函上达，伏希我公俯念商艰，成全终始，敦促政府，立将未交各军械子弹，迅予扫数交付敝团收领，以便分发，则不特敝团之幸，抑全粤之福也。专此，即颂勋祺。

粤省商团总公所谨启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粤省商团总公所给范石生的原信（第四封）

筱泉军长、品卓师长台鉴：迭承致团长手示，嘱即劝导商人复业，否则地方糜烂等因，具见公等爱护地方，无微不至，感激之私，匪可言喻。惟此次罢市系出

自全省商人公意，敝团为商人一部分之团体，全体商人因政府未履行全部发械之约，及明令豁免苛捐，仗义执言，为敝团鸣不平之气，不惜罢市以示坚决要求。在政府未清还所余械弹以前，敝团实无辞劝导，用特专函奉复，乞予俯鉴下忱，转陈当局，克日再将未还之械及手机关枪、子弹等发还，交到敝所，则自余各事均易磋商。否则，商民之公愤难平，劝导之词即无从而入。徒用高压手段，则商民畏怯兵威，去复业之途愈远，当局诸公明达，当能洞见及此也。函示召集商会、商会联合会三团体联席会议一节，当经分函约定本日开议，结果如何，再行函达，知注并闻。特复，并颂勋祺。

粤省商团总公所谨启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范石生于接到胡汉民转达收缴枪械的电文后所作的反应，据《滇军第二军战史》记载如下：

十四日政府决定剿办商团，十五日晨，粤军李福林、张民达部、警卫军吴铁城部，合兵攻西关。商团据栅以拒，轰移时，互有死伤，遂入西关，火起八九处，光熊熊然。先期，范军长知战祸不能免，而伤无辜商民，同罹浩劫，命警卫联队长华封治，派遣卫队维持老城治安，他军有乘机劫掠者，华褫其徽章，立杀数十人，乱始已。……十八日范军长以调护商民未能如愿，出布告引咎曰：

“为布告事，照得此次事变，开羊城未有之局，政府容纳共产党人，而国民误为实行共产。社团游行纪

念，而商团误为运动示威。上下隔阂，疑云疑雨。在商团方面，起初本属超然，且为政府所奖掖。自扣械发生后，少数团员，鼓吹罢市，石生再四调停，苦苦维护，庄严灿烂之广州，幸免流血之惨剧。乃风潮甫息，发还枪械延期，而六代表之责言屡至。在石生当日调停苦衷，纯以大局为前提，免致各走极端，变本加厉。苟使地方不遭糜烂，商民不受痛苦，本人虽牺牲一切，亦所弗恤。此责言之来，所由引过不遑者也。不料未及旬日，二次罢市又行实现，贫民受累，更觉不堪。政府为保全威信计，及俯徇商团代表所请，所有扣械发还大半，詎意枪械到手，误会冲突之事愈难收拾。石生奔走调停，垂涕面道，卒无效果。甚至锁闭市闸，严设炮垒，威逼罢市，断绝交通。一般血气未定少年，私放冷枪，暗加阻击。敌党羽翼，从旁助威。以致池鱼之殃，良善不免。火炮之下，玉石俱焚。抢掠烧杀，受尽切肉剥肤之痛，妇孺子女，横遭焦头烂额之悲。惨目伤心，谁尸其咎？石生至此已计穷力竭，乏术挽救，抚心自问，愧对商民，此更泣血椎心而饮恨无地者也。及后衅端之启，补救不及，军以羸杂，难辨真伪，不得已划出防线，爰令扼守。差幸石生所部官兵，均能服从命令，严守军纪，对于商民秋毫无犯。然调处无方，演此惨剧，私衷耿耿，负戾滋多，所望本军防线内各商店居民，即日开市，安心乐业，倘有不逞之徒，阑入骚扰，一律格杀。天日在上，实鉴斯言。特此布告，咸使知闻。”

盖自 15 日西关变起，广州市间，人心惶惶，若不保其室家者，而商肆尤甚，至 17 日犹未启市。而西关

繁盛街衢，则瓦砾纵横，悉成焦土。日暮以后路绝人行，居民一夕数惊，卧不安枕。迨范军长之布告出，而商肆始相续复业，民心亦渐安。商团溃散时有走西村者，诸军悉截其械，得数百支，且搜市肆之藏械，入团者人科百金为罚锾焉。……

据此，则政府最后剿办商团，划出防线，范石生按兵不动，仅派警卫联队维持老城治安。由其所出布告来看，一方面总结他对械案的态度，自始至终均希望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其布告中所述：“……上下隔阂，疑云疑雨，风潮甫息，发还枪械延期，……石生当日调停苦衷，纯以大局为前提，免致各走极端，变本加厉。池鱼之殃，良善不免。火炮之下，玉石俱焚。惨目伤心，谁思其咎。……调处无方，演此惨剧。”这是针对政府与商团两方面，因为没有照他的调停办法，所以演成惨剧，各打五十大板的一种说法。

范石生在抗战初期，回昆明后不久，即被人刺死。笔者与范石生素昧平生，以上所述，是根据原始资料分析，以企保存广州械案之事实。不过由这些资料中来看，范石生当日在广州虽没有跟陈廉伯等勾结筹谋倒孙，但其眼光短浅，只知靠捐税来源养活军队，而忘却革命大义，对商团不惜委曲求全，结果两不讨好。至于最后布告中说：“计穷力竭，乏术挽救，抚心自问，愧对商民，此更泣血椎心而饮恨无地者也……私衷耿耿，负戾滋多”。故难怪有人说他态度暧昧，左袒商团。但是，我们看他调停械案的这个问题，其中最大的关键，因为胡、范条件不一致，商团未能照约领回枪械也是事实。不过，即照范、廖原订条约实行，以陈廉伯之野心勃勃，蓄意反孙、反共，也难免会与政府冲突对抗。而对于范石生方面呢，根据上述，总不能说他与陈廉伯等有

所勾结，筹谋倒孙。

(1964年)